



中世纪教会史

Medieval Church History

毕尔麦尔 (Bihlmeyer) 等 编著

雷立柏 (L.Leeb) 译



宗教文化出版社



中世纪教会史

Medieval Church History

毕尔麦尔 (Bihlmeyer) 等 编著

雷立柏 (L.Leeb)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世纪教会史/(德)毕尔麦尔等编著;(奥)雷立柏译.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0.4

ISBN 978 - 7 - 80254 - 260 - 0

I. ①中… II. ①毕…②雷… III. ①基督教史 - 中世纪 IV. ①B97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67455 号

中世纪教会史

毕尔麦尔(Bihlmeyer)等编著

雷立柏(L. Leeb)译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010 - 64095215(发行部) 010 - 84037602(编辑部)

责任编辑: 王志宏

版式设计: 范晓博

印 刷: 北京人卫印刷厂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32 印张 500 千字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54 - 260 - 0

定 价: 60.00 元

目 录

译者序 / 1

第一段 早期中世纪(692年 - 1073年)

教会在种种格尔曼/日耳曼、罗曼和斯拉夫民族中的传教和文化工作。

希腊教会和拉丁教会的分裂

概论 / 2

第一章 在格尔曼/日耳曼民族和斯拉夫民族中的传教工作。伊斯兰教对欧洲的冲击 / 4

79 阿勒曼尼人、巴伐利亚人和图林根人的皈依 / 5

80 盎格鲁 - 撒克逊人在欧洲大陆的传教工作, Willibrordus(维利波德)和 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法兰克教会的革新 / 10

81 萨克森人和北部格尔曼人的皈依 / 16

82 西部教会在斯拉夫和匈牙利人地区的传教工作 / 22

83 希腊教会在欧洲东南部斯拉夫人的传教工作 / 28

84 伊斯兰教在欧洲西部和南部的征服 / 31

第二章 在11世纪以前的教宗和种种国王的关系。西部的“基督徒帝制” / 33

85 教会国的形成;各教宗和法兰克人的联盟 / 33

- 86 Carolus Magnus(查理大帝)和教会。西部皇权的恢复 / 38
- 87 第9世纪的教宗。卡洛林王朝的衰落 / 45
- 88 所谓的“黑暗时期”。意大利贵族统治下的教宗们。萨克森人的皇帝和早期的法兰克人皇帝 / 52

第三章 教会的教育和著作。各种神学争论、异端和分裂。希腊教会和拉丁教会的分裂 / 64

- 89 西部教会的教育和著作 / 64
- 90 西方关于“由子”和“嗣子论”的教导。预定论和有关“圣餐”的争论 / 74
- 91 东方教会和它的特征。神学与教派 / 79
- 92 破坏圣像运动及787年Nicaea(尼西亚)主教会议(第7届大公会议) / 83
- 93 在Photius(佛提乌斯)宗主教时代的动荡。869/870年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主教会议(第8届大公会议) / 88
- 94 东、西方教会1054年的分裂 / 92

第四章 教会制度、礼仪、纪律和习俗(以西方教会为主)。受格尔曼/日耳曼影响的教会法。教会改革的开始 / 96

导论和概括 / 96

- 95 圣职人员和教区的管理制度 / 97
- 96 教产和“私有教堂”的制度 / 100
- 97 高层圣职人员的政治地位以及君主对任命圣职人员的影响 / 103
- 98 礼仪和领受圣体的习惯。基督宗教的艺术 / 106
- 99 忏悔习惯和教会的处罚方式 / 109
- 100 节日和守斋日。对圣人及对圣髑的尊敬。朝圣 / 112
- 101 隐修院传统的衰落和恢复。Cluny(克吕尼)及其修会 / 115
- 102 西欧教会民众和圣职人员的宗教生活和道德生活 / 119
- 103 德国来的教宗。1073年之前教宗对教会改革的影响 / 124

第二段 中世纪的全盛时期(1073年 - 1294年)

宗教生活和教会文化的兴旺发达。宗座权势的顶点

概论 / 134

第一部分 从额我略七世教宗到切来斯提努斯三世教宗(1073年 - 1198年)

/ 135

第一章 宗座和皇帝 / 136

104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教宗)及其改革工作。授权之争 / 136

105 授权之争的发展和结束。1122年的 Worms(沃尔姆斯)协议 / 143

106 圣 Bernardus(伯尔纳德)的时期。两个教宗的分裂和罗马共和国 / 150

107 Fredericus I Barbarossa(红胡子腓特烈一世)皇帝与 Hadrianus IV(哈德良四世)、Alexander III(亚历山大三世)的搏斗; Henricus VI(亨利六世)与 Coelestinus III(切来斯提努斯三世) / 155

第二章 基督宗教在欧洲东北部的传播。与伊斯兰教的冲突 / 165

108 教会在欧洲东北部的传教工作和文化工作 / 165

109 在12世纪末之前的十字军运动。与欧洲伊斯兰教的冲突 / 168

第三章 教会的领导和管理制度。种种异端及其镇压 / 175

110 宗座、罗马教廷和教会的统一管理。教会法典 / 175

111 教会与国度的关系 / 181

112 教区管理制度及其机构 / 185

113 广大群众异端的出现。清洁派及有关的异端派别 / 186

114 瓦尔多派。12世纪末之前对它的镇压 / 189

第四章 宗教生活和教会生活。教会艺术、教育和科学 / 193

115 隐修生活的崛起。Hirsau(希尔骚)修院及其影响 / 193

116 加都西会、熙笃会和其他的遵守本笃会规的修会 / 195

117 有会规的圣职团。圣 Norbertus(诺伯特)和 Praemonstratenses(普雷蒙特会)。
灵医会和平信徒的种种联合会 / 199

118 骑士团 / 204

119 圣事、礼仪、祈祷和庆节 / 206

120 教会艺术。罗马式建筑风格及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开始 / 212

121 经院思想的形成及在 12 世纪的发展。共相之争 / 214

122 12 世纪的神秘思想 / 221

第二部分 从依诺森三世到切来斯提努斯五世(1198 年 - 1294 年)。

宗座和教会文化的辉煌时期 / 224

第一章 宗座和世俗力量。十字军运动的结束和传教工作 / 225

123 宗座权势在 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的顶峰时期。第 12 届大公会议
(1215 年) / 225

124 教宗们与 Fredericus II(腓特烈二世)的搏斗。最后的 Stauffer(施陶费尔) / 230

125 从 Gregorius X(额我略/贵格利十世)到 Coelestinus V(切来斯提努斯五世)的历
代教宗(1271 - 1294 年) / 238

126 在 13 世纪进行的十字军运动及其结果 / 243

127 基督宗教在欧洲东北部、亚洲和阿富利加/非洲的传播 / 248

第二章 新兴的修会。教会生活。教会指导下的学术和教育 / 253

128 托钵修会概论,其制度以及与教区圣职人员的关系 / 253

129 圣 Franciscus de Assisio(方济各/法兰西斯)及方济各会 / 256

130 道明会及其他托钵修会 / 260

131 在 12、13 世纪出现的异端 / 264

132 与异端的搏斗。镇压 Albigenses(阿尔比派)的战争和宗教裁判所的形成 / 269

133 圣事、礼仪、民间信仰和教会艺术 / 273

134 大学的兴起及其影响 / 280

135 经院思想的兴旺时期 / 283

136 宗教生活和道德生活。教会和文化 / 290

第三段 中世纪的晚期(1294年 - 1517年)

教会和宗教生活的衰微,宗座权力的衰退。改革的要求。信仰分裂的预兆

概论 / 296

第一章 13世纪末到15世纪中期的宗座。改革问题和大公会议至上主义

/ 298

137 教宗 Bonifatius VIII(博尼法奇乌斯八世)与法国的冲突 / 298

138 教宗 Clemens V(克雷孟五世)与教廷向 Avignon(阿维尼翁)的迁移。圣殿骑士团的消失 / 304

139 教宗们与 Ludovicus Bavarus(巴伐利亚人路易)的搏斗。教廷回归罗马 / 308

140 宗座的税务制度和任职权 / 317

141 西方教会的大分裂到 Pisa(比萨)主教会议(1378 - 1409年)。大公会议至上主义 / 321

142 1414 - 1418年 Constantia(康斯坦茨)的大公会议 / 328

143 1431 - 1437年 Basilea(巴塞尔)的改革主教会议。教宗与会议的搏斗 / 334

144 1438 - 1442年 Ferrara - Florentia(费拉拉 - 佛罗伦萨)的合一主教会议。教宗分裂与国家 - 教会协约 / 336

第二章 教会的神学和宗教生活 / 343

145 哲学和神学。经院思想的衰退。对《圣经》的研究 / 343

146 神秘神学家和“神之友”;以德国为主 / 354

147 宗教改革的前驱。Wiclif(威克里夫)及其在英国的影响 / 362

148 Hus(胡斯)及波希米亚的教会改革与社会改革 / 364

149 15世纪的一些反教会改革者 / 370

150 中世纪的犹太人和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 / 372

151 修会团体:衰落、改革、新的团体 / 375

152 圣体圣事、弥撒、大赦、庆节、祈祷 / 381

153 讲道、群众的宗教教育和灵修文学 / 385

154 教会艺术:哥特风格的高峰期和晚期;文艺复兴 / 389

第三章 教会在过渡时期:从中世纪到近代 / 394

155 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 / 394

156 从 Nicolaus V(尼苛劳五世)到 Paulus II(保禄二世)的文艺复兴教宗
(1447-1471年) / 401

157 从 Sixtus VI(西克斯图斯六世)到 Leo X(利奥十世)的文艺复兴教宗
(1471-1521年) / 407

158 中世纪末期的宗教危机和教会危机。信仰分裂的预备 / 416

外语-汉语索引 / 427

附 图

附图1 公元500年的欧洲 / 498

附图2 约900年的欧洲 / 499

附图3 德国和意大利地区的王国、公国与伯国(约1200年) / 500

附图4 8到13世纪的教会国(意大利中部) / 501

附图5 欧洲部分大学的分布和创立年代(13到15世纪) / 502

附图6 法国地区重要城市 / 503

附图7 德国地区重要城市 / 504

译者序

本书的原名是 *Kirchengeschichte* (《教会史》), 并分为三卷:《古代教会史》、《中世纪教会史》和《近代教会史》。它不仅仅叙述教会“内部”的发展, 而且也从文化、社会道德和政治的角度来分析基督宗教在欧洲历史上的影响和发展。这是一部经典著作, 其前身是德国历史学家 Franz Xaver Funk (傅恩克) 于 1886 年写的《教会史教科书》。这部著作曾在德国的大学和神学院中广泛被用为教科书, 在 1907 年已有第 5 版, 可见它很受欢迎。作者 Funk (傅恩克) 是“教父学”的专家, 他不断增加和更新其内容资料。在 1911 年后, 德国学者 Bihlmeyer (毕尔麦尔, 1874 - 1942 年) 继续修补这本书, 而在 1942 年后, 另一位德国的教会史学家, Tüchle (提克肋), 继续增补这本教科书。他又加上新的研究成果和新的文献目录, 在 20 世纪 50 年代出版了第 16 版。似乎可以说, 这本教科书影响了在德国大学里的教会史教学工作 100 年之久, 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另外, 它在 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被译成别的欧洲语言 (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波兰语等)。因为德国的专家多次修改和增补这部书的内容, 可以认为它是一部很完整的教会史教科书, 也值得中国研究基督宗教历史的专家学者们参考和阅读。

Bihlmeyer - Tüchle (毕尔麦尔/提克肋) 的《教会史》想“结合严格的历史学批判精神和对教会的同情态度”(Tüchle 在 1948 年的序中的

话)。这部书的内容和章节非常系统,每一小章分为几个节:5; 5.1; 5.2等(后面的索引提供这些章节的号码)。

原著几乎在每一页都有一些注脚,其中列出很多著作和文献。这些著作大部分是德文、法文、意大利文或拉丁文写的,而且都是1960年以前的研究专著,在中国很难找到,所以我决定不翻译这些注脚中的文献资料。

在正文中如果出现外文人名、地名或书名,我尽可能会保留原文,但是最常见的地名只用汉语的译名(比如:“罗马”、“希腊”、“叙利亚”等)。在外文人名和地名的原文后,我加上天主教的翻译和新教的翻译,有时候也加上社会上普遍用的翻译,比如 Paulus(保禄/保罗),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满足天主教、基督新教和社会上读者的需要。我先写天主教的译名是出于历史的考虑,因为有的汉语译名已经有400年的历史,比如“亚当”或“亚里士多德”中的“亚”是17世纪的译者(Ricci 利玛窦、Aleni 艾儒略、Buglio 利类思等人)规定的(参见拙著《汉语神学术语辞典·清初汉语神学术语辞典》,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人名和地名的汉译名主要来自两部很杰出的辞典:辅仁神学著作编译会编《神学词语汇编》,光启出版社,台北,2005年;卢龙光主编《基督教圣经与神学词典》,宗教文化出版社,北京2007年。很悲哀的事实是,外文人名、地名和书名的汉译形成了很混乱的局面。我希望中国的读者能逐渐采取一种“直接读ABC”的习惯,这样不再会有“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烦恼(实际上, Antiochia 的希腊文意思是“坚定的”,但从汉语的译文中无法查出这个原义)。

在古代和中世纪的人名和地名方面,我多以拉丁语为标准(而不是以希伯来语、希腊语、英语或德语为标准),比如德文的 Johann(若望/约翰)和法文的 Jean 以及希腊文的 Ioannes 就是英文的 John,但我决定在正文中用拉丁文的 Johannes; 意大利语的 Firenze 等于是英语的 Florence,但它来自拉丁语的 Florentia(“茂盛的城市”,即“佛罗伦萨”或

“翡伦翠”)。中世纪的文献和早期的教会史著作多用拉丁语的名称,所以我也倾向于施用拉丁语的名称,并在“外语-汉语索引”中提供不同语言的称呼。因为汉语的基督宗教术语尚未统一,我倾向于施用国际符号,比如“《马太福音》13章2节”在汉语中可写为“太13:2”(新教的写法)或“玛十三2”(公教的写法),本书却多用 Mt 13:2(这似乎是全世界通用的写法)。

在书中,作者曾多次用 *katholische Kirche* (“大公教会”)的词来指“正统教会”和“分出来的教派”(比如“蒙丹教派”、“多纳图斯派”等)之间的差别。在近代历史上,“*katholische Kirche*”指“罗马天主教”,但在古代教会史上,这个词应该译成“大公教会”或“正统教会”。

在本书中出现很多基督宗教方面的术语,比如“复活节”、“宗徒/使徒”、“洗礼”、“教区”、“基督论”等等。这些术语在正文中都没有解释,因为读者可以在相关的辞典中查清这些术语的意思,请参见卓新平主编《基督宗教知识辞典》(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卓新平主编《汉语神学术语辞典》(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

这部《教会史》资料丰富,论述很系统,深入浅出,具有教科书的优点。作者 Funk 和修补者 Bihlmeyer、Tüchle 虽然都是天主教徒,但他们也曾参与过一些跨越教派的历史研究,而他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客观地描述教会的发展。希望中国的读者能够通过这部《教会史》更全面地理解基督宗教的文化和教会的发展。张思华先生认真细致地审阅了全书,在此致以特别鸣谢。

雷立柏

2007年9月13日于北京通州

第一段

早期中世纪(692年 - 1073年)

教会在种种格尔曼/日耳曼、罗曼和斯拉夫民族中的传教和文化工作。希腊教会和拉丁教会的分裂

概 论

从第 17 世纪以来,人们用“中世纪”一词来指称欧洲历史上的关键时代;在这个时代开始有“民族大迁移”和这个迁移所带来的后果——民族上的、政治上的、宗教上的和文化上的转变。从教会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中世纪”第一个阶段大约包括 400 年,即从 692 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到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教宗上任(1073 年)的时期。这个时期是学习、发展和逐渐变成熟的时期。教会在古代社会中所面对的任务以及她在这个新时代中所面对的任务完全不同。教会的活动地区不再是希腊-罗马的“地中海世界”,而是欧洲中部和欧洲西部那些正在形成中的,且有 germanisch-romanisch(“格尔曼-罗曼”)特征的民族和国家。(romanisch“罗曼”指古罗马晚期的文化,就是在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地区约于 500 年到 1200 年间的社会和文化风格。)首先,教会必须在那些 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民族中进行传教和教育工作。影响了整个中世纪历史的基本事实即是:种种 Germani(格尔曼/日耳曼)民族接受了基督信仰并进入了公教会——这是一个前后维持 800 年的过程。基督信仰带给了那些德意志部落第一个“统一意识”,这样唤起了一种“民族团契”的概念(das Bewusstsein der Volksgemeinschaft)。教会给这些民族带来的东西不仅仅是一些“超自然的”精神价值,同时也是古代文化遗产的保护者,这样她也传播了一种比较高级的文明。因为这样,教会激发了一种原来无法想象的文化进步。这些格尔曼/日耳曼人有才能和潜力,且思想开放,所以他们如饥似渴地吸收了这些教会介绍的新因素,并根据自己的民族性去接受和处理它。三个传统共同造成了中世纪的社会:基督信仰的精神,格尔曼/日耳曼人的动力和罗马人的创造力(christliches Ethos, germanischer Tatendrang und roemische Formkraft)。中世纪的人在宗教和道德上有很多共同的概念,所以这些来自不同传统的因素仍然造成了一些很坚固的社会形式。中世纪的国度都有精力和“更高使命”的自我意识。一般来说,在 1073 年之前,国度占优势,因为教会当时仍然很需

要世俗权威的保护,只有这样才能够完成她的任务。当时就开始了“中世纪全盛时期”的典型结合:教会和国度的结合也意味着宗教因素和世俗因素的密切结合,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国家的教会化”和“教会的社会化”(Verkirchlichung des Staates und Verstaatlichung der Kirche)。“教会社会化”的表现包括这样的现象:教会和国度一起承担了政治上的和社会上的任务;教会的制度适应了格尔曼/日耳曼人的法律意识、他们的农业制度的封地制度(参见私有教堂,高级圣职人员在社会中的地位等)。在法兰克人的国度中也开始有一些可能会导致一种有偏向的“政府统治教会”或“国度与教会合一”的倾向(starke Ansaetze zu einem einseitigen Staats- und Landeskirchentum)。然而,圣 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发动的改革基本上就克服了这种倾向,这样使法兰克人与罗马教会有更多联系。法兰克人和罗马的联盟导致另一个结果:罗马的教会长期隶属于“东罗马”(即君士坦丁堡),但现在能够脱离东方人的控制。在意大利形成了一个特殊性的“教会国”。Carolus Magnus(查理大帝)在他的庞大王国中结合了格尔曼/日耳曼人和罗马人,这样统一了原来罗马帝国的一大块。这个国王于800年在罗马被加冕为罗马人的领导也意味着古罗马帝王的传统被恢复了。这样,西欧人就建立了一个新的文化整体,一个普遍的神圣的帝国,这个帝国的理想就是 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天主/上帝之城”,所以它能够追求最高级的文化成就。Carolus(查理)的继任人比较弱,所以这种“格尔曼-罗曼帝国”又分裂,但 Otto Magnus(奥托大帝)于962年重新建立了一个王国——虽然它比较小——并称之为“罗马-德意志帝国”。在此以后几百年的历史时期,帝国(皇权)和教宗(教权)一起成为政治和教会政治的枢纽。当然,这两个力量的关系也包含着很多张力——这些张力导致了“政权”(Imperium)和“教权”(Sacerdotium)之间的搏斗和冲突。

东方的希腊教会遭受了伊斯兰教会的严重打击;她在中世纪早期几百年中没有经过比较根本的转变。希腊教会等于“没有中世纪”。虽然她的传教力量和文化创造力仍然存在,但内部的严重冲突(破坏圣像运动等)和一种强大的保守主义阻碍了她的发展。很不幸,希腊教会和拉丁教会之间早就存在的裂痕越来越大,最终导致了1054年的大分裂,这个分裂一直维持到现在。

第一章 在格尔曼/日耳曼民族和斯拉夫 民族中的传教工作。伊斯兰教 对欧洲的冲击

正如第 1 卷(参见 43)所论述的那样,格尔曼/日耳曼人接受基督信仰的过程发生在 4 到 7 世纪的时期内。“民族大迁移”使这些民族踏上罗马帝国的领土,但他们接受的基督宗教形式首先是 Arius(亚略/亚流)派的信仰。法兰克人的国王 Clovis(= Chlodwig 克洛维)和法兰克的贵族人士约于 500 年接受了公教的信仰,而这一个事件就决定了公教会在格尔曼/日耳曼人中的胜利。不久后,Rhenus(莱茵河)东部地区的格尔曼/日耳曼部落(如 Alamanni 阿勒曼尼人,Bavari 巴伐利亚人,Thuringii 图林根人,Frisii 弗里斯兰人)也归于法兰克人的统治,而“十字架的宗教”在他们中间也开始传播。当时的法兰克国在宗教上很弱,所以没有进行有计划的传教活动,但从 Celtae(克尔特)地区或盎格鲁-撒克逊地区来了一些“职业性的”传教士,他们在德国地区传教——这些人受过良好教育,态度严肃,最重要的是他们自身榜样的吸引力。在这些部落的皈依过程中也有一些政治的、经济的或其他世俗的因素。在 Carolus Magnus(查理大帝)之前的时代,没有“施加压力”或“强制接受信仰”方面的证据。无论如何,大多数的格尔曼/日耳曼人很快地转向了基督宗教——这就明确表明,他们的传统宗教在“民族大迁移”的时代已经动摇了。这些格尔曼/日耳曼民族再不认为,基督信仰“不符合自己民族性”或是“外来的”。他们愿意接受那个“更强大的神”,因为他比“命运”更强有力,基督被视为“拯救者”——他克服了死亡和地狱。只有那些似乎完全生活在外教文化中的 Saxones(萨克森民族)坚定地拒绝接受基督信仰,但 Carolus Magnus(查理大帝)出于国防和扩展政权的考虑强迫他们转向基督宗教。在这种“以刀剑进行传教”的作法中,政治和宗教的观点都结合为一。北部的格尔曼/日耳曼民族(在丹麦,瑞典,挪威和冰岛)在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中(从第 9 到第 12 世纪)接受了信仰;部分上(挪威)也

有国王施加的压力强迫人们接受基督宗教。因为保存的文献很少,我们无法详细地研究格尔曼/日耳曼人的内心生活和内心的皈依。向基督宗教的转变既不是一种“悲痛的事”,也不仅仅是在外表上用一个新的神来替代旧的神(以 *Christus* 基督代替 *Thor* 雷神)。转向基督宗教肯定是内心上的重大事情。教会在这方面能够利用某些原有的观念和社会制度,她也尽可能不伤害格尔曼/日耳曼人的传统和习俗。除了大家族以外,那些部落还强调对于“元首”的服从和忠贞。这样,他们视基督为伟大的元首,他是人民的君王,而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忠信的服务”。罗马人的秩序感和格尔曼/日耳曼人的个人主义结合为了一个自身具有张力的整体。欧洲各民族的自然才华被净化,得到发展,他们的全部精神生活和道德追求被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虽然他们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来掌握基督信仰的核心,但这种深层转变的果实也一个一个都出现了。后来的基督宗教 - 格尔曼/日耳曼文化的丰富表现和其深度都为此作证。

因为西部的格尔曼/日耳曼民族(包括萨克森人)最终都接受了基督信仰,他们在文化上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这就为后来的德意志国度的形成创造了前提条件。另外,这些民族能够共同阻挡阿拉伯人的侵略。那些属外教宗教的民族(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再也不能席卷欧洲。法兰克人反过来开始向这些民族进行传教,另外派一些殖民者到巴伐利亚东部和 *Elbe*(易北河)以东的地区。德意志民族向东的扩展也意味着教会获得了一些新的地区。

79

阿勒曼尼人、巴伐利亚人和图林根人的皈依

79.1 德国中部地区的 *Alamanni*(阿勒曼尼人)和 *Suebi*(苏维比人)从3到5世纪就突破了罗马人的边界墙(*Limes*),他们在 *Main*(美因河)以南的地区定居,覆盖了从 *Main*(美因河)到 *Alpes*(阿尔卑斯山脉),从 *Lech*(莱希河)到 *Vogesen*(沃格斯山脉)的地区。他们进入了罗马人的城市文明地区,但仍然保持了自己的生活方式;除了个别人以外,他们也没有成为基督徒,他们继续是外教人。根据拜占庭的历史学家 *Agathias*(阿格提阿斯,约于570年)的记载,他们崇拜的是树木、河流、山谷的神,并为这些神明献上了许多马、牛和其他的动物。法兰克人在 *Clovis*

(Chlodwig 克洛维)的率领下于 496 或 497 年(参见第 1 卷 43.7)部分上征服了他们的地区,而北边的地区直接变成法兰克人的地区。因为法兰克人已经是基督徒,所以这些被征服地区的格尔曼/日耳曼人也开始接受信仰。在那些属于法兰克王家的地区以及在 Alamanni(阿勒曼尼)贵族人士的居住地不久后就出现了一些教堂或圣堂。人们将这些教堂奉献给圣 Martinus(马丁努斯)或总领天使 Michael(弥格耳/弥额尔),后来也奉献给 Maria(玛利亚),Johannes(若望/约翰洗者)或其他圣人/圣徒。他们地区的教区似乎都是在罗马人的时代成立的,比如 Augsburg(Augusta Vindelicorum 奥格斯堡),Chur(Curia 库尔,在 Raetia),Windisch(Vindonissa 温迪施),Augst(Augusta Raurica 奥格斯特),Strassburg(Argentoratum,在 Alsatia 阿尔萨斯地区)。然而,这些教区和法兰克人一样,它们并没有发挥比较强有力的传教作用。在 Alamanni(阿勒曼尼人)的核心地带,教会约于 600 年建立了一个新的教区:Constantia(康斯坦茨)教区,第一位有确切记载的主教是 Gaudentius(高登提乌斯,613 年去世)。Dagobertus 王(达格贝图斯,629 - 639 年)曾经规定了这个教区的界线,而它后来成了 Suebi(苏维比)地区的主要教区,也成为德意志帝国最有威望的教区之一。Carolus Magnus(查理大帝)后来使它隶属于 Mainz(美因茨)总主教区。

在第 6 世纪末,基督宗教对于 Alamanni(阿勒曼尼)民族的影响大概已经很大,所以贵族们聚集并决定要正式接受这个新宗教。来自这个时期的最早的阿勒曼尼人法典(*Pactus Alamannorum*《阿勒曼尼人的协议》)已经显示出一些基督宗教的因素。考古学家也在第 7 世纪的墓中找到了很多金箔十字架。那来自外面的传教士——其中很多是爱尔兰或苏格兰来的——在传教信仰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他们的苦修和克己热忱促使他们到远方去。他们在很多地方建立了一些隐修者的房屋(*cella*)和隐修院(*monasterium, claustrum*),这样创造了传教工作的基地,同时也提高了人民的文化水平。那位(约于 6 世纪?)来自高卢 Poitiers(普瓦蒂也)的圣 Fridolinus(弗里多林努斯)被认为是 Hilariuskirche(希拉留斯教堂)和 Rhenus(莱茵河)的 Saeckingen(色肯根)的双方隐修院的创立人。在德国南部的 Breisgau(布莱斯高)有圣 Trudpertus(约于 643 年去世)的墓,而人们就在那里建立了一座隐修院。关于他们的历史资料不多,但关于另一位传教士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他就是信仰坚定、精力充沛的爱尔兰人 Columbanus(高隆班,参见第 1 卷 72.8),他曾是 Luxeuil(卢修)隐修院的院长。Austrasia(奥斯特拉西亚)的国王 Theudebertus II(投德贝尔

图斯二世)曾命令他于610-612年间在Zuerichersee(苏黎世湖,Tuggen地区)和在Bodensee(博登湖)地区向那些外教人和“半基督徒”宣扬福音。据说,Ueberlingen(=Iburninga)的Gunzo(贡走)公爵当时已经是一个基督徒。当Columbanus(高隆班)去了Arbon(=Arbor felix阿尔本)时,他遇到了一个本堂神父(名为Willimarus)以及一位执事(名为Hiltibold)。在Brigantia(=Bregenz布雷根茨)城,外教人侮辱了一座献给圣Aurelia(奥勒利亚)的小教堂,而Columbanus(高隆班)恢复了这个小教堂中的朝拜。圣Columbanus(高隆班)于612年去意大利北部,但他的朋友Gallus(加卢斯,约于645年去世)——他会说德语——留下并继续他的工作。他后来在Steinach(斯太纳克,瑞士)建立了一个小隐修院,在8世纪发展成为著名的St.Gallen隐修院。圣Pirminus(皮尔明努斯,753年去世)是一位“巡逻式的主教”(Wanderbischof)大概不是爱尔兰人或西班牙人,可能是西哥特人;他奉Carolus Martellus(查理·马特,一位法兰克领导)的命令,并于724或725年在博登湖的岛上建立了一个本笃会隐修院——Reichenau(赖兴瑙),这个隐修院不但成了教会文化的基地,也成了法兰克人在阿勒曼尼地区中的基地。阿勒曼尼公爵Theudebaldus(投德贝尔图斯)于727年驱逐了Pirminus(皮尔明努斯),所以他在Alsacia(阿尔萨斯),Schwarzwald(黑林山),Pfalz(法耳次)传教,并建立或以圣本笃的会规恢复了一些隐修院(比如Murbach, Gengenbach, Schuttern, Hornbach等)。他的著作(*Dicta seu Scarapsus*《向新信徒的劝勉》)表明,他深受了Caesarius de Arles(恺撒留斯)和Martinus de Braga(马丁努斯)的著作的影响(参见第1卷,78.4)。他更多是教会的“巩固者”和“组织者”,而不是“开拓者”。阿勒曼尼人于724年或730年宣布的*Lex Alamannorum*(《阿勒曼尼民法》)已经表明,当时的阿勒曼尼人大多都是信徒,而教会的组织相当有秩序。在这个法典中,教会的权利占有首要的地位:受保护的项目是教会的财产,教堂中的避难权(asylum),圣职人员的不可侵犯性,星期天的休息,教会规定的忏悔补赎,宗教誓言等。法兰克人在第6世纪举行的主教会议也都要求了这些法律规定。在Merovingi(梅洛温格)的时代(约于700年),法兰克人在Schwabem(施瓦本)地区的统治比较松散,但Carolus Martellus(查理·马特)和他的儿子Carolomannus(卡洛曼)和Pippin(丕平)再次巩固了他们对该地区的控制。Carolomannus(卡洛曼)于746年镇压了阿勒曼尼人的起义,并取消了本地人的“公爵”尊称——这些都是政治上的措施,与该地区的传教活动毫无关系。当时的传教工作也并没有结束,阿勒曼尼人在信仰上的转化很慢,他们的某些迷信传统是

根深蒂固的。St. Gallen(圣加卢斯)隐修院的院长 Othmarus(欧特马尔)派遣了两个修士(Magnus, Theodorus)去(瑞士)西南地区传教。他们的祈祷所后来成为两个隐修院(Fuessen 和 Kempten = Campodunum)。在北方地区(就是在法兰克/巴伐利亚边界地区)出现了一些隐修院,其中最有名的是 Ellwangen(埃尔万根),其创立人是法兰克贵族人士 Hariolfus 和他的弟兄 Erlolf(他是 Langres 的主教)。建立这个隐修院的目标并不是介绍信仰,而是强化和巩固信仰,以及支持文化和教育的努力。

79.2 **Bavarii**(巴伐利亚人)是 Marcomanni(马克曼尼)族的后裔。他们在第 6 世纪上半叶离开了 Bohemia(波希米亚)地区,并且进入了今天的巴伐利亚地区(在四条河的中间:Lech, Enns, Etsch, Donau = Danubius)。他们很快也被迫接受法兰克人的统治(约于 540 年)。在阿尔卑斯山区以及在 Danubius(多瑙河)地区仍然有很多信仰公教的罗马人。在他们中间进行传教的人中曾经有一个非常受尊敬的克修者,圣 Severinus(色维林努斯,482 年去世,参见第 1 卷,43.4)以及(稍后)圣 Valentinus(瓦伦提努斯)——他曾是 Meran 附近的 Mais(梅斯)隐修院的院长和主教(Abtbischof)。罗马省 Raetia(瑞提亚)的省会是 Augsburg(奥格斯堡),它也是一个很古老的主教座堂的地方。在 Brixinum(Brixen 布里克森)附近的 Sabiona(Saeben)也是一个古老的主教座堂。这样,巴伐利亚人很早认识了罗马形式的基督宗教,但一些来自东哥特人的 Arius(亚略/亚流)派的影响也存在。在 788 年之前,法兰克人允许了巴伐利亚人的 Agilulfringi(阿格卢分格)公爵贵族的存在,而这个贵族家庭大概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公教家庭。属于这个家族的公主是 Theodelinde(特欧德林德),她后来成为 Langobardi(伦巴第人)的女王(参见 43.4)。一系列外来的传教士也有比较深远的影响。在 7 世纪初有 Columbanus(高隆班)的学生和在 Luxeuil 隐修院的继承人 Eustasius(欧斯塔修斯)以及另一些来自 Luxeuil 的隐修者,他们都在巴伐利亚地区传教一段时间。后来有一些传教士——他们是一些无固定住所的主教(Missions- oder Wanderbischoefe)——也进入了巴伐利亚地区,他们是法兰克人或爱尔兰人,其中有圣 Rupert(= Hrodbert 儒佩特),他来自 Worms(沃尔姆斯)并通常被称为“巴伐利亚的宗徒/使徒”。巴伐利亚公爵 Theodo(特欧斗)约于 696 年邀请他来 Regensburg(累根斯堡),而他在 Danubius(多瑙河)地区以及奥地利 Salisburgum(萨尔茨堡)地区传教。罗马人曾经在那个地区建立了一个城市,名为 Iuvavum(尤瓦乌姆),而在这个城市的废墟上,这位传教士建立了

Salisburgum(萨尔茨堡)的教堂和圣 Petrus(伯多禄/彼得)隐修院。来自 Poitiers(普瓦捷)的 Emmeram(艾梅兰)主教(Chorbischof,他于715年被暗杀)曾在 Regensburg(累根斯堡)创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隐修院。圣 Corbinianus(科尔比尼安)曾在 Freising(弗赖辛)建立一所主教座堂。巴伐利亚的公爵 Theodo(特欧斗)曾于715年去了罗马,主要目的就是采访罗马教宗(ad limina beati Petri apostolic)。他请 Gregorius II(额我略/贵格利二世)教宗写一份组织巴伐利亚教会的诏书,但由于一些不知道的理由,人们没有落实这份诏书。后来,Odilo(欧迪罗)公爵于738/739年请圣 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整理国内的教会制度。他将巴伐利亚地区分为四个教区,即 Passau(帕骚)、Regensburg(累根斯堡)、Salisburgum(萨尔茨堡)、Freising(弗赖辛)。他也开除了一些不称职的圣职人员。这位公爵不允许教会祝圣一个总主教,大概是因为他不想提高教会的政治地位。当时建立的 Neuburg-Staffelsee(纽布格-斯塔弗尔色)教区不久后(约于800年)被列入 Augsburg(奥格斯堡)教区。早在8世纪已经有很多隐修院被创立。740年(或744年)颁布 *Lex Baiuvariorum*(《巴伐利亚法典》)的条款证明,当时的巴伐利亚是一个基督宗教的国度。该法典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保护及支持教会。不久后,巴伐利亚(比如 Salisburgum 萨尔茨堡,Passau 帕骚)派遣了很多传教士到东部和东北部的斯拉夫地区(Carantani 卡兰塔尼人, Moravi 摩拉维亚人, Bohemi 波希米亚人)以及到 Hungaria(匈牙利)地区(参见28)。这些传教活动的发动者是 Salisburgum(萨尔茨堡)的主教 Virgilius(维吉留斯,784年去世)——他本来出生在爱尔兰。因为 Carolus Magnus(查理曼)提出这方面的要求,Leo III(良/利奥三世)于789年提高了 Salisburgum(萨尔茨堡)的地位,使之成为巴伐利亚及东方斯拉夫地区的“大主教府”(metropolis)。

79.3 在早期, Thuringia(图林根)曾经是一个很大的王国,几条河(Saale 萨勒河、Harz 哈尔茨河、Tauber 陶伯尔河、Danubius 多瑙河)勾勒出它的边界。法兰克王 Clovis(克洛维)的几个儿子于531年征服了这个地区,使之附属于法兰克人的统治。当时已经有一些基督徒在那个地区,部分是 Arius(亚略/亚流)派的人,部分是大公教徒(比如圣 Radegundis 是图林根王家的公主,参见第一卷,43.8)。在西南地区有一些法兰克人基督徒定居,所以这个地区后来被称为 Franconia orientalis(东法兰克地区)。大约于685年来了一个爱尔兰的主教, Kilianus(= Killena 基利安努斯),他与一位长老(Colonatus 科伦纳图斯)和一位执事(Totnan 投特南)一起传教,

并且有很大的成就。当地的公爵 Gozbert(高斯贝特)与大部分的民众都放弃了他们原来的多神论信仰。然而,在一些暴动中这些传教士都被杀了(689年),而多神论又排除了基督信仰的种子。为了推动民众的皈依并且为了建立教会组织还需要第二次传教活动——这都是圣 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的贡献(参见 80.2,3)。他于 741 年建立了 Wuerzburg(维尔茨堡)教区——该教区管理着图林根南部——并且祝圣自己的学生 Burkhard(布克哈德)为第一任主教。

80

盎格鲁 - 撒克逊人在欧洲大陆的传教工作, Willibrordus(维利波德)和 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法兰克教会的革新

80.1 在 Germania(格耳曼/日耳曼地区)进行的早期传教活动为民众的素质教育和宗教教育做了良好的贡献,但仍然缺少一种统一的制度,缺少固定教区和本堂区的规划。那些来自爱尔兰或苏格兰的传教士大多是“巡回式的”司铎或主教,说他们是“牧灵者”不如说他是“克修者”(mehr Asketen als Seelsorger),而且都是很有个性的人(ausgepraegte Individualisten 个人主义者),他们一般各自为政地传教,他们在外国也固执地坚持自己的风俗,不太重视教会的组织和教会的圣统制。在这方面,来自盎格鲁 - 萨克逊地区的传教士带来了一个转变。Celtae(凯尔特人,即爱尔兰人)缺少某些能力,而盎格鲁 - 萨克逊人都有这些优点:耐心和持久的能力,适应的能力,组织能力,对普世教会制度的同情心,以及对于教会的核心——罗马的宗座——的热忱依靠。由于这些盎格鲁 - 萨克逊传教士的努力,英国地区那种新颖生动的基督宗教学术和教育被输入到欧洲大陆去了。在这些传教士中最重要的是号称“Friesenapostel 弗里西亚的宗徒/使徒”的 Willibrordus(维利波德)以及号称“德国宗徒/使徒”的 Winfried - Bonifatius(翁弗利德 - 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

在德国北部的 Frisia(弗里西来)部落的人居住在北海海岸地区,在内地,他们占领了 Weser(威悉河)及 Schelde(= Escaut, 斯凯尔特河)中间的地区。在这个部落中,基督信仰遇到了特别大的障碍。他们抵抗了西边的法兰克人,想保持自己的独立,因此从一开始也排斥法兰克人的宗教——基督宗教。尤其他们的国王

Radbod(拉得博得,719年去世)很固执地坚守他们的传统多神论。所以,早期的传教活动限于 Schelde(斯凯尔特河)和 Maas(马斯河)之间的地区,因为这个地区不久后归于法兰克人的控制。曾在这个地区活动的传教士包括圣 Amandus(阿曼都斯,约于675年去世),他是一位来自 Aquitania(阿奎塔尼亚)的巡回主教,被称为“比利时的宗徒/使徒”,曾创立了许多教堂和隐修院(也许是 Maastricht 第一位主教);圣 Eligius(= Saint Eloi 厄利基乌斯,660年去世)——他曾经任 Dagobertus I(达格贝特一世,629-639年)王的铸币管理人,后来成为 Noyon - Tournai(诺用-托乃)城的主教;Colonia(科隆)的主教圣 Cunibertus(库尼贝尔图斯,约于663年去世);以及那位从英国被驱逐的 York(约克)的主教 Wilfrith(威尔弗里得,678/679年)。比这些传教士更有影响的人是 Wilfrith(威尔弗里得)的学生 Willibrordus(维利波德),一位盎格鲁-撒克逊的隐修士和司铎。他在690年与11个同事一同从英国来到欧洲大陆。法兰克人的领导 Pippinus(= Pepin 丕平)支持他的传教活动。他去罗马并获得了 Sergius I(塞尔基乌斯一世,687-701年)教宗的各种传教特权,后来在 Frisia(弗里西亚)的西部地区传教50年之久,虽然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最终能够巩固当地的教会。当 Willibrordus(维利波德)第二次去罗马时(695年),教宗回应了 Pippinus(丕平)的建议并祝圣了 Willibrordus(维氏)为弗里西亚的总主教,主教府在 Utrecht(乌得勒支),又给他起名为 Clemens(克雷孟/革利免)。Willibrordus(维利波德)致力于扩展传教到丹麦,并曾经在 Helgoland(赫尔果兰得岛)传教,但效果不大。他在 Trier(特里尔)建立了一所隐修院作为他的传教活动的基地。在他去世(739年)后,圣 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他曾经在719-721年间当过 Willibrordus(维氏)的助手——于753年又来到 Frisia(弗里西亚)地区传教。在780年后,Carolus Magnus(查理曼)继续消除多神论的成分,部分上是通过和平的手段,部分上使用武力。785年颁布的《弗里西亚法典》已经以“基督宗教地区”对待该地区了。

80.2 Winfried - 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是德国最伟大的传教士,原名为 Winfrith(= Winfried),后来改名为 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他673年生于英国西南部的 Crediodunum(Wessex 西撒克斯),并不是一个贵族人士。在 Exeter(埃克塞特)和 Nhutscelle(努特谢勒)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在隐修院的学校当一位受重视的神学老师,又在一些主教会议中充当顾问。他和其他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样也怀着这样的心情:想去欧洲大陆向那里的同胞们宣讲福音。他于

716年第一次去 Frisia(弗里西亚)传教,但没有成功。于718年他第二次离开了家乡,一去不复返;他先到罗马,而当时的教宗 Gregorius II(额我略/贵格利二世,715-731年)给予他指导和传教的权柄,派遣他在 Rhenus(莱茵河)东部的 Germania(格爾曼/日耳曼)地区传教(719年5月15日)。当时,他接受了一个罗马殉道者的名字: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这位殉道者的节日是5月14日。第8世纪的学者认为,Bonifatius这个名字来自拉丁语的 bonum fari(“说好话”)或 bonum fatum(“好命运”)。因为 Radbod(拉得波得)王于719年去世了,Frisia(弗里西亚)的情况变得比较开放一些,而 Bonifatius(博/波氏)先从719年到721年帮助 Willibrordus(维利波德)总主教传教。他锻炼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传教士,但不让总主教指定他为自己的接班人。在721年,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去了罗马所指定的传教区,即 Hessen(黑森)和 Thuringia(图林根)。写了 he 传记的一位来自 Mainz(美因茨)的司铎 Willibaldus(维利巴尔都斯)记载,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能够在 Oberhessen(上黑森)和 Niederhessen(下黑森)为成千上万个人施洗,又使那些曾经受过洗,但后来放弃了基督信仰的人再次拥抱正统的信仰,比如两个酋长 Dettic(得提克)和 Deorulf(得欧儒尔夫)。他在 Ohm(欧姆河)附近的 Amoenburg(阿美内堡城)建立了一所教堂和一所隐修院。因为他写过一份很乐观的报告,罗马的教宗召叫他去罗马,并祝圣他为 Rhenus(莱茵河)以东的 Germania(格爾曼/日耳曼)地区的传教主教,但没有规定一些固定的主教府(722年11月30日)。在这个祝圣典礼中,他向教宗发了一种特殊的誓言,要严格遵守罗马教会的规律和罗马的制度,就如同那些属于罗马地区的主教一样。与其他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样,他也认为,教会发展的前提条件是与罗马的密切关系,并一生恪守了他的诺言,有时候似乎过于谨慎地担心罗马的规定。法兰克国的强大统治者 Carolus Martellus(查理·马特)为他写了一封保护书,所以他能够在723年春天继续进行在 Hessen(黑森)地区的传教工作。他在 Geismar(格斯马尔)砍掉了一棵属于 Donar(雷神)的橡树,这样似乎证明了“神木”信仰的荒谬。他用“神木”的木材建立了一座小教堂,将它献给圣 Petrus(伯多禄/彼得)。在附近的地方,他又开始建立 Fritslar(弗利茨拉尔)隐修院(Wigbertus 维格贝图斯当院长)。在 Thuringia(图林根)地区,多神论曾经排除了基督信仰(参见79.2),所以 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去那里,在这个地区传教10年左右(约725-735年)。他克服了某些(来自爱尔兰的?)司铎的抵抗,并在 Gotha(哥达)附近建立了 Ohrdruf(欧得

儒夫)隐修院。他与英国的家乡保持了联系,曾向盎格鲁-撒克逊的朋友写了很多信,而英国人通过祈祷支持了他,他们也送给他书籍、圣物和一些传教人员,就是一些来自英国各地隐修院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男女隐修者,他们怀着崇高的理想去了欧洲大陆传教。在德国地区,Bonifatius(博/波氏)也吸引了一些贵族人士,比如一位法兰克贵族人士 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和一位巴伐利亚贵族人士 Sturm(斯图尔姆)。这样,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能够创立更多的本笃会隐修院——它们都成为基督宗教教育和学术的中心,传教活动的基地以及培养本地圣职人员的重要学院。这些隐修院是:Tauberbischofsheim(陶伯比守夫斯海姆)的修女院——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的亲戚圣 Lioba(利欧巴)当院长,她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修女;还有在 Kitzingen(克庆根)和 Ochsenfurt(牛津)的隐修院——在 Ochsenfurt 修女院的院长是 Thecla(特克拉);在 Eichstaett(艾希施泰特)附近的 Heidenheim(海登海姆),他通过 Wunibaldus(翁尼巴都斯)和他的姐妹 Walpurgis(瓦尔普格斯)创立了一座男女并立的隐修院(751/752年)。他自己最喜欢的是于744年在 Buchenwald(布很瓦得)地区的 Fulda(富耳达)建立的隐修院,在那里的院长是 Sturm(斯图尔姆)。他认为,这所隐修院应该按照意大利的 Monte Cassino(卡西诺山)隐修院成为德国的典范修道院。因为 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提出了相关的要求,Zacharias(匝加利亚)教宗早于751年规定,该隐修院不属于当地主教的管理权,而直接属于罗马圣座的管辖。

80.3 在732年,Gregorius III(额我略/贵格利三世)教宗(731-741年)送给了 Bonifatius(博/波氏) pallium(白羊毛披肩带),提升他为总主教,又任命他为德国的传教区祝圣一些主教。在这个时刻就开始了 Bonifatius(博/波氏)的组织工作和改革任务。他于737/738年第三次去罗马,在回来的旅途中整顿了巴伐利亚的教会制度(参见79.2),因为他当时的身份是“宗座向德的特使”(legatus Germanicus Sedis Apostolicae)。741年他指定了一些要有主教府的城市:Hessen(黑森)地区的主教府要在 Fritzlar(弗利茨拉尔)附近的 Buraburg(布拉布格),Thuringia(图林根北部)的主教府在 Erfurt(爱尔福特),而图林根南部(即“东法兰克地区”)的主教府在 Wuerzburg(维尔茨堡,参见79.3)。最后,巴伐利亚北部地区(即 Danubius 多瑙河和 Main 美因河中间的地区)的主教府在 Eichstaett(艾希施泰特),他祝圣了 Wunibaldus(翁尼巴尔图斯)的弟兄 Willibaldus(维利巴尔图斯)为隐修院院长兼主教。后面这两个教区一直到今天存在着,但 Buraburg(布拉布格)教区因 Saxones

(撒克森人)的压力不久后被取消了;Erfurt(爱尔福特)好像根本没有成为一个主教府。从一开始,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也打算使 Saxones(撒克森人)皈依信仰,但当时的困难比较大(参见 81.1),所以他无法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

同时,这位传教士注意到了广大的法兰克地区和西法兰克地区的教会,因为这个教会迫切地需要一个革新(参见第 1 卷 43.8)。其中的宗教生活似乎失去了力量,下层的圣职人员既无修养又不守纪律,下层圣职人员和世俗的事务有不正当的牵连,似乎脱离了罗马宗座。虽然掌握权力的 Carolus Martellus(查理·马特,714 - 741 年)能够抵挡阿拉伯人对法兰克人的攻击(参见 84.1),这样对教会也有贡献,但他不太重视教会的权利,随意从政治的角度来任命一些主教,没有考虑到这些主教人选的宗教资格,又毫不犹豫地利用教产,使之为世俗的目的服务(参见 96.1)。他的两个儿子 Carolomannus(卡洛曼)和 Pippinus(丕平)于 741 年开始实际上统治法兰克国,一个在西部(Neustria),一个在东部(Austrasia)。这些儿子曾在 St. Denis(圣狄尼斯)隐修院受了教育,他们也比较注重教会的任务,在这方面超过了他们那位好战的父亲。他们举行了一系列的主教会议,其中让教会的领导和世俗的贵族人士一起开会(所谓的 concilia mixta 混合的主教会议);742 年举行了“德国第一次主教会议”(Concilium Germanicum primum,地点不明,在 Austrasia 地区);743 年在 Hennegau(黑内高)的 Estinnes(= Liftinae)举行了一次主教会议;744 年在 Soisson(苏瓦逊)为 Neustria(法兰克国西部)举行主教会议;745 年和 747 年举行了一些全法兰克国的主教会议。在圣 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的指导下,这些主教会议作了一些很有帮助的规定来革新法兰克的教会。会议的规定被宣布为教会和国度共同肯定的法律(所谓的 capitularia)。比如,主教们要求圣职人员要过一个符合教规(canones)的生活(禁止他们随身带武器,禁止他们去打猎,禁止他们穿平信徒的服装,又禁止他们与妇女有不正当的关系)。会议要求圣职人员服从于主教,要求隐修士遵守圣本笃的会规,禁止一些迷信的风俗和异端邪说的传播,要求主教需要正当的任命手续(排除平信徒的任命权),要求每年举行主教会议,指定某些城市为“大主教城市”并规定被没收的教产要归还教会(参见 96.1)。那些在 747 年主教会议聚集的主教们送给 Zacharias(扎卡利亚斯/扎迦利)教宗(741 - 752 年)一封共同宣认的《信经》,其中也肯定教会的合一性,并宣布他们要一生听从罗马教会的指导。在 744 年,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祝圣了 Pippinus(丕平)王所提名的主教,就是法兰克国西部(Neustria)Rhemi(兰斯)、Sens

(桑斯)和 Rouen(鲁昂)的总主教。针对法兰克国东部(Austrasia)的情况,745年在 Colonia(科隆)举行的主教会议规定 Colonia(科隆)要成为“大主教城市”(metropolis),所以在那里也得建立一座主教府。然而,人们没有施行这个规定,而 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成为 Mainz(美因茨)的主教(747年),因为在那里的主教 Gewilib(格维利布)是一个没有资格的人,他被撤职。在 Carolus Magnus(查理曼)的时代,Mainz(美因茨)才成为一个总教区(780年/782年)。当法兰克贵族人士选 Pippinus(丕平)为王时(参见 85.1),他也接受了 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给他举行的傅油典礼(751年),这样教会正式肯定了国王的权威。

80.4 在 Willibrordus(维利波德)去世后(739年),Frisia(弗里西亚)地区的传教工作被中断了,而八十高寿的 Bonifatius(博/波氏)再一次去那个地区,要在那里完成他的传教任务。他规定自己的学生 Lul(鲁尔)当他在 Mainz(美因茨)的接班人,并于753年夏天开始在 Zuidersee(须德海,荷兰西北部)以东进行很有成就的传教活动。他在 Utrecht(乌得勒支)过冬,第二年的春天继续传教。然而,他的努力突然被终止。在圣神/圣灵降临节后的星期三(754年6月5日,根据 Fulda 富尔达文献的记载)来了一些狂热的外教人,他们在 Dokkum(多库姆)的 Borne(博内河)河岸攻击传教士们的帐篷,打死了 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和他的朋友,共有52个人殉道。正如他所渴望的那样,他的墓被修建在 Fulda(富尔达)。不久后,英国人和德国人都开始纪念和庆祝这位伟大的圣人和殉道者。他曾是一个怀着最纯洁理想的修道人和牧灵者;他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宗教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在欧洲历史上,他的生活是光荣的一页。他的基本态度是严格克修,他是一位英雄,始终相信圣人们的共融、天主在人间的国,尊敬罗马的宗座。他的成就超过一切在他以前在德国地区出现的传教士,而他的人格令人敬佩。后来的人给他“德国的宗徒/使徒”这样的称号,这也是适当的,因为他忠信地并且很成功地在德国进行传教,又组织了教会,改革了法兰克西部的教会,使德国地区和法国地区的教会与罗马有更密切的关系,这样给予地方教会新的生命力,新的力量和统一。不仅如此,他与罗马的关系也促进了各地德意志部落的合一过程,使他们后来在 Carolus Magnus(查理曼)的时代成为一个王国,并且使他们一步一步走入欧洲的宗教文化共同体(Hineinwachsen in die christliche Kulturgemeinschaft des Abendlandes)。在“文化斗争”时代(1872-1887年)曾经有人说过,Bonifatius(博

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不顾一切地破坏了欧洲大陆的早期教会——这个教会据说是爱尔兰性质的,旺盛的“福音派的和脱离罗马的”教会——并且用“罗马的枷锁”来控制德国的教会;但是这样的主张是牵强附会的,它歪曲了历史的真相。

萨克森人和北部格尔曼人的皈依

81.1 那些居住在德国北部的 Saxones(萨克森人)曾经是一个庞大的格尔曼/日耳曼民族,他们的地区从 Elbe(易北河)地区伸展到靠近 Rhenus(莱茵河)地区,而当 Thuringia(图林根)国崩溃时(531年),他们控制的地区更大,从 Eider(艾得河)伸展到 Thuringia(图林根)及 Hessen(黑森)。他们认为,基督宗教是他们政治敌人(法兰克人)的宗教,所以他们顽固地抵抗这个信仰。在 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去世的时候(754年),他们是唯一的似乎都还没有基督信仰的德意志部落。在7世纪末和8世纪初曾经有一些盎格鲁-撒克逊传教士在萨克森地区的边缘地带进行和平的传教,但两个名字为 Ewald(所谓“黑的厄瓦德”与“白厄瓦德”)都被杀,成为殉道者。Willibrordus(维利波德)的朋友 Suitbertus(苏伊特贝特)的传教工作没有多少效果,而 Lebuinus(= Liafwin 雷布因)及 Willehad(维利哈德)的努力也都落空。虽然 Carolus Martellus(查理·马特)和 Pippinus(丕平)曾经打败了萨克森人,但萨克林人继续侵略并劫掠法兰克人的个别地区。因此,Carolus Magnus(查理曼)下了决心要征服萨克森人的地区,这样彻底消除来自他们的威胁。他的征服首先是一个政治上的项目,但必然也涉及到宗教的问题,因为——正如写过查理曼传记的 Eginhardus(艾因哈德)所说(参见 *Vita*, c. 7)——如果没有共同的宗教信仰,萨克森人和法兰克人不可能成为一个民族。因此,征服萨克森人的战争成为一种“用刀剑来进行传教”的战争(“Schwertmission”)。这个战争开始于772年,断断续续地维持了30多年。在第一次进军时,Carolus Magnus(查理曼)就征服了 Engern(恩格尔)的部落,攻克了 Eresburg(厄瑞斯堡)的城堡,又于772年毁灭了萨克森人的宗教中心 Irminsul(伊尔明苏尔)。在几次战役后,Carolus(查理曼)赢得了一部分的萨克森贵族的支持(775/776年),而在那个时候的和平谈判中,宗教的问题才被提出来(776年)。萨克森人自己说,为了保证他们的顺从,他

们愿意接受基督信仰。在 777 年的 Paderborn(帕德博恩)的“国会”(Reichstag)中,所有的萨克森人被要求皈依基督宗教。当时很多萨克森人接受了圣洗。然而,一位很勇敢的 Westphalia(威斯特法利亚)地区的贵族人士 Widukind(维德金特)领导了萨克森人顽强地保卫自己的独立和旧的宗教传统。因此萨克森人破坏了许多基督宗教的教堂,驱逐或杀害传教士们,向那些接受了基督信仰的同胞们施加很大的压力。萨克森人引起了一个暴动并且他们不忠于他们几次作的誓言,所以 Carolus(查理曼)——根据法兰克人的编年史以及根据其他的文献资料——采取很残酷的报复方式:他在 Aller(阿勒尔河)附近的 Verden(费尔登)使 4500 个萨克森人质遭受死刑(782 年)。被杀者的人数也许是不确切的,但这次屠杀的事件本身是不能怀疑的。然而,这个可怕的行动恰恰相反地更激起了萨克森的斗志。在 Detmold(得特摩得)和在 Hase(哈色河)的两次交战中,法兰克人打败了萨克森人的军队(783 年)。Widukind(维德金特)意识到继续抵抗是没有希望的,所以他与很多随从一起在 Champagne(香巴尼)的 Attigny(阿提尼)接受了圣洗(785 年)。Carolus(查理曼)亲自当他的代父(教父)。一个很严峻的文献——*Capitulatio de partibus Saxoniae*(《关于萨克森地区的规定》)——也许来自那个时代,其中说拒绝洗礼、施行外教风俗(比如火葬亡者、包括杀人的祭祀、吃巫婆的肉)等行为要处以死刑。法兰克人很严格地征收了什一税——Alcuinus(阿尔库因)后来为此感到悲伤——这也引起了在萨克森北部地区的暴动(792 年到 804 年)。当几千个萨克森家庭搬到法兰克地区,法兰克家庭又移民到萨克森地区后,情况才逐渐平定下来。这个新地区一步一步地受到教会上的组织化,先设立一些属于一些隐修院的传教区,后来建立了这些教区:Bremen(不来梅教区,有 Willehad 维利哈德任主教,787 - 789 年),Verden(费尔登教区),Minden(明登教区)和 Paderborn(帕德博恩教区,Hathumar 哈图马尔任主教,806 - 815 年),Muenster(明斯特教区,Liudger 卢德格任主教,804 - 809 年)以及在 Westphalia(威斯特法伦)地区还有 Osnabruock(奥斯纳布吕克教区)。在 Ludovicus Pius(虔诚者路易)皇帝的时代(814 - 840 年)还加上了 Halberstadt(哈尔伯施塔德)教区与 Hildesheim(希尔德斯海姆)教区,这些教区处于 Ostfalen(东法伦)地区。一些新建立的男女隐修院继续引导了教会的文化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 Corvey(科尔维)的本笃会隐修院,它 822 年建立在 Weser(威悉河)附近的 Hoexter(赫克斯特),其母院是法兰克西部地区的 Corbie(科尔比)隐修院。萨克森人很快地、又很有深度地接受了基督信仰,这方面的证据是 *Heliand*(《救世

主》)。《救世主》这首诗是对《福音书》的通俗叙述,大约形成在 Ludovicus Pius (814 - 840 年)的时代。这部著作作用格尔曼/日耳曼人的风格描述《圣经》中的人物和社会关系,比如基督成了一个强大的君主,而他的宗徒/使徒是一些“勇敢的士兵”(tapfere Degen),但它也不折不扣地叙述了天国的“神圣奥秘”——这个奥秘在黑暗中带来光明,在罪恶中带来救赎。早在 9 世纪,萨克森人就有自己的神学家,就是隐修士 Gottschalk(格特沙克,参见 90.4),他是一位既有才华又有深度的神学家。

通过萨克森的顺从和该地区的基督化,一个统一的德意志王国成为可能的。100 年以后,萨克森人就开始领导德国的种种民族。Henricus I(亨利一世)的妻子是圣 Mathilda(马蒂尔德),她是 Widukind(维德金特)的曾孙女并成为萨克森皇家的祖母。

81.2 萨克森人的皈依开辟了通往那些信奉多神论的北部格尔曼/日耳曼民族(Nordgermanen)的路。Carolus Magnus(查理曼)还征服了在 Elbe(易北河)河口与 Eider(艾得尔河)之间的地区。在他的儿子 Ludovicus Pius(虔诚者路易)的时代(814 - 840 年),Denmark(丹麦)的南部地区(Schleswig 石勒苏益格)接受了基督信仰。Frisia(弗里西亚)的宗徒/使徒,圣 Willibrordus(维利波德)曾经约于 700 年试图在丹麦进行传教(参见 80.1),而现在有 Remi(兰斯)的总主教 Ebo / Ebbo(厄博)——一位萨克森人——来继续他的工作。教宗 Paschalis I(帕斯卡利斯)任命他为“宗座在北方的使者”(822 年)。更有影响的人物是圣 Ansgarius(安加略),他先在 Corbie(科尔比)隐修院修道,后在萨克森地区的 Corvey(科尔维)隐修院当修士和 scholasticus(老师)。丹麦的国王 Harald Klak(哈拉尔·克拉克)在自己的国度中遇到接班人的问题,所以他想获得法兰克人的帮助,因此于 826 年和 400 个随从一起在 Mainz(美因茨)附近的 St. Albanus(圣阿尔班)隐修院受洗;Ansgarius(安加略)和另一个隐修者(Autbertus 奥特贝图斯)陪同这个国王回到丹麦去。Ansgarius(安加略)后来在丹麦与瑞典为传教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因此获得“北方之宗徒/使徒”的尊称。Ludovicus Pius(虔诚者路易)于 831 年在 Hamburg(汉堡)设立了一个总主教区,任命 Ansgarius(安加略)为总主教,因此 Hamburg(汉堡)就成为北方传教工作的基地。Ansgarius(安加略)自己于 831/832 年去罗马,要求 Gregorius IV(额我略/贵格利四世)教宗确认他的职位,而且他还获得了 pallium(白羊毛披肩带)。教宗任命他(与 Ebo 一起)为丹麦人、瑞典人和北方的斯拉夫人的

使者。北方的传教工作获得了良好的发展,但也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因为一些诺曼海盜于 845 年毁灭了 Hamburg(汉堡)。Ansgarius(安加略)接管了 Bremen(不来梅)教区(848 年),使之与汉堡合并。Nikolaus I(尼苛劳/尼哥拉)教宗于 864 年确认了这个 Hamburg - Bremen(汉堡 - 不来梅)总教区,也规定 Bremen(不来梅)不继续附属于 Colonia(科隆)的管辖;这个决定有效,虽然 Colonia(科隆)的主教们几百年以后还感到不满意。Ansgarius(安加略)能够在一定的限度内继续进行他在丹麦和瑞典的传教工作。在他去世后(865 年),他的学生和他传记的作者 Rimbustus(林伯特,865 - 888 年)总主教接管了他的工作。

德国的皇帝 Henricus I(亨利一世)于 934 年打败了丹麦人,而在那个时期以后福音才能够比较深入地影响丹麦人民;当时有 Adaldag(阿达尔达格)任 Hamburg - Bremen(汉堡 - 不来梅)的总主教(936 - 988 年)。在 948 年,德国皇帝 Otto I(奥托一世)帮助在 Juetland(日德兰半岛)设立一些教区:Schleswig(石勒苏益格)、Ripen(瑞本)与 Aarhus(奥尔胡斯)。约于 960 年,国王 Harald Blauzahn(哈拉尔·蓝牙)与他的儿子 Sven Gabelbart(斯文·叉胡)接受圣洗,但在 Sven(斯文)当王的时期(988 - 1014 年),多神论者又反对基督宗教。当时,丹麦人征服了英国,而这一事件加强了他们本国的教会。Sven(斯文)的儿子 Canutus Magnus(克努特大王,1018 - 1035 年)曾经是一位强大的统治者,他同时也管理英国和挪威。他受了英国地区一些司铎的支持,并大力协助了基督宗教和教会。他于 1026/1027 年去罗马朝圣。Hamburg - Bremen(汉堡 - 不来梅)的强大总主教 Adalbertus(阿达尔伯特,1043 - 1073 年)想扩展自己的教区,使之成为“北方的宗教区”(Patriarchat des Nordens),但罗马教廷不支持这个计划,所以他仅仅被指定为“宗座的使者和代牧”(1053 年)。在 1104 年,Lund(隆德)脱离了 Hamburg - Bremen(汉堡 - 不来梅)并被提升为管理丹麦、瑞典、冰岛和格陵兰的总主教府。因为丹麦曾经与英国有密切的关系,它也一样向罗马教会交纳了一个“伯多禄税”(Peterspfennig,参见第 1 卷,44.4),瑞典和挪威也有同样的习惯。

81.3 如上所述,最早在瑞典传教的人是圣 Ansgarius(安加略,829 年/831 年)。他在 Maelsee(梅拉尔湖)边的 Birka(比尔卡)建立第一座教堂。Remi(兰斯)的 Ebo(厄博)总主教(参见 81.2)派遣了自己的一位亲戚——名为 Gauzbertus(高泽伯特)——到瑞典,要他当一个传教主教(832 年)。这个传教士一开始也获得一些成就,但于 845 年被迫离开,因为外教人反对他。Ansgarius(安加略)后来当

Hamburg - Bremen(汉堡 - 不来梅)的总主教并于850年第二次去瑞典传教。当时的国王 Olaf(奥拉夫)允许传教士们公开宣讲福音,因为他进行抽签,而抽签的结果支持教会。不过瑞典地区的战役和暴动连年不停,所以教会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虽然另一位 Olaf(奥拉夫)国王于1008年受洗。不久后,在 Westgotland(西哥特兰)地区的 Skara(斯卡拉)设立第一个主教府,后来又创立了4个教区。外教文化一步一步往后退。自从12世纪,一些属于 Cistercian(熙笃会)的隐修士也致力于传教工作,他们巩固了教会在文化上的地位。Alexander III(亚历山大)教宗于1164年将 Uppsala(乌普萨拉)提升为瑞典的全国性总教区。

挪威和冰岛的基督化经过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变化。关于其他的 Germani(格尔蒙/日耳曼人)的宗教信仰我们没有很多资料,但关于当时的挪威和冰岛部落的信仰我们有相对深入的了解,因为有 *Older Edda*(《古埃达》)和 *Later Edda*(《新埃达》)以及古冰岛的 *Sagas*(《萨迦》)等文献。这些文献的记载是在13世纪完成的(已经是基督宗教的时代)。在9、10世纪,古老的多神论信仰已经相当腐化。人们害怕鬼怪,有宿命论、悲观主义、怀疑论,甚至实际上的无神论也出现了。在这种缺少确定性的情况中,基督信仰提供了一种坚定的基础和安慰,对人生的种种谜底有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基督宗教的神到最后还是超过了那些格尔蒙/日耳曼人的神——Tyr = Ziu(天神)、Odin = Wodan(命运之神)、Thor = Donar(雷神)。

挪威的皈依是从 Hakon(哈孔)王开始的,他曾在英国的盎格鲁 - 撒克逊宫廷接受教育,从938年到961年统治挪威。他想推广基督信仰,但仍然无法规定基督宗教为国教,因为当地的农民坚定地遵守着自己的古老传统。Olaf Trygvason(奥拉夫王,码汉995 - 1000年)曾在英国受洗,而 Olaf Haraldson (= Olaf the Saint 奥拉夫·哈拉尔逊,1014 - 1030年)——他后来被称为“圣者奥拉夫”——在诺曼底受洗。通过这些国王的努力,基督信仰传到挪威,而一些盎格鲁 - 撒克逊传教士很快地征服了当地的多神论宗教。少数的人拒绝了基督宗教;如果无法说服他们,国王们也采取了武力方式,甚至在个别的案子中采取一些残酷的措施来强迫这些少数的人接受信仰,所以多神论的宗教也有一些殉道者。Olaf Haraldson(奥拉夫)王为挪威的基督宗教文化奠定了基础。他在 Stiklestad(斯提克勒斯塔得)的战役中阵亡(1030年),当时他想镇压一些不服从的部落和丹麦人。不久后,民众就尊敬他为国家的主保圣人。在第11世纪,挪威已有3个教区(后来是5个),它们先附属于 Bremen - Hamburg(不来梅 - 汉堡)的总教区,但在1104年归于 Lund(隆德)总

教区。1152年设立一个独立的挪威教省,其核心是 Nidaros - Drontheim(尼达弱施-得润特海姆)的总主教。在开始的时期,挪威人的皈依似乎只是外表形式上的皈依,所以实际上继续存在着很多外教人的观念或风俗习惯。尤其在下层的民众间流传着各种迷信、魔术或残酷的复仇,而在贵族当中仍然有长期的家族间的冲突。在圣职人员中,只有在13世纪才逐渐实行了独身制的规定(参见104.1)。

国王 Olaf Trygvason(奥拉夫)的宗教热忱甚至扩展到挪威在外面管理的地区,就是 Faroer 岛、Orkney 岛、Shetland 岛及 Hebrides 岛,甚至到冰岛和格陵兰。国王派遣了一位萨克森司铎——Dankbrand(但克布兰得)——去冰岛传教(997-999年),但因为这个传教士多采取一些激烈的传教方式,没有太大成就。然而,当地的长老们(Landgemeinde)于1000年在开会时决定说,所有的冰岛人都应该接受圣洗;他们的领导(Gesetzessprecher)说,坚守祖先们的信仰是没有希望的,因为 Weisse Krist(“白色的基督”)在各处都获得了胜利。虽然他们接受了基督信仰,他们还是允许了人们举行一些秘密的祭祀、抛弃小孩子、吃马肉。Olaf Haraldson(奥拉夫)于1016年才禁止了这样的风俗。新的教区建立于 Skalholt(斯卡赫特,1054年)与 Holar(赫拉尔,1106年)。在10世纪末,冰岛的人开始去格陵兰,在那里定居。由于 Olaf Haraldson(奥拉夫)王的努力,格陵兰的居民也接受了基督信仰,但在14、15世纪,那些信奉多神论的爱斯基摩人(Eskimos, Skraelinger)再次消除了当地的基督宗教。诺曼人早就发现了北美洲的海岸(他们称之为 Winland),而基督信仰于11世纪初传到那里了。然而,在那里的移民又于14世纪离开了那些地区,关于这些事后来就没有什么记载了。

81.4 所谓的 Normanni(诺曼人)是那些居住在丹麦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北方格尔蒙/日耳曼人;他们是能干的航海者和勇敢的战士,亦被称为 Vikings(维京人)。自从第8世纪以来,他们长期侵略并抢劫了北欧的沿海地区以及沿河地区,从德国的 Elbe(易北河)到法国的 Garonne(迦伦河)以及北欧的海岛。他们也曾经走到很远的地区(比如俄罗斯),又在那里建立了一些新的王国(参见83.4)。在876年到912年间,诺曼人的领导 Rollo(若罗)使整个法国地区的人感到恐怖36年之久。一直到912年,法国的 Carolus Simplex(“单纯的”查理)王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并且割让那片后来被称为 Normandia(诺曼底)的地区给他,这个“恐怖分子”才接受了基督信仰和洗礼。Rollo(若罗)的随从大多都模仿了他们领导的作法,也同样接受了基督宗教。这个新的统治者非常能干,又有智慧,所以他的公国很快就经过一个

旺盛的时代。不久后,法国地区的诺曼人似乎完全被“罗马化”(fast ganz romanisiert),但他们保存了他们的军事能力。他们于11世纪初征服了意大利南部的 Aversa(阿维撒)和 Apulia(阿普利亚)公国,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的诺曼人的公国(参见 103.2,5; 105.3)。

西部教会在斯拉夫和匈牙利人地区的传教工作

82.1 斯拉夫人分为很多不同的部落;他们从第3到第7世纪占据了那些格尔蒙/日耳曼人离开的地区。他们逐渐到达了 Elbe(易北河)和 Saale(萨勒河)地区,又进入了 Bohemia(波希米亚)的森林、Main(美因河)上游地区、Danubius(多瑙河)地区、阿尔卑斯山脉的东部地区一直到 Adria(亚得里亚)的海岸地区。罗马的教会和拜占庭的教会都努力在斯拉夫地区进行传教活动,在不同的程度上获得了成功。这些传教计划影响了这些地区的发展,一直到今天有很深的意义,即宗教上的以及文化上的和政治上的影响。比如,一些斯拉夫民族在历史的过程中曾经改变了自己的教会关系:保加利亚人曾经属于罗马的教会,但他们后来加入拜占庭,而摩拉维亚人原来属于拜占庭,但后来归于罗马的管理。

82.2 基督宗教的“西方教会形式”主要是通过 Carolus Magnus(查理曼)和他的继承人传到斯拉夫人的——这些法兰克统治者想向东方扩展他们的王国。在8世纪最后25年中,居住在 Main(美因河)上游地区和 Regnitz(瑞格尼茨河)的斯拉夫人接受了基督信仰(这大概是回应查理曼的命令),但在1000年他们部分上仍然是外教人。Henricus II Sanctus(亨利二世)皇帝给他们建立了 Bamberg(班贝格)教区(1007年)并赋予这个教区很多财富。Salisburgum(萨尔茨堡)和 Passau(帕骚)的主教们都派遣了一些传教士到 Slovenia(斯洛文尼亚)地区的 Carantani(卡兰塔尼)人(在 Carinthia 卡林提亚、Krain 克瑞恩、Styria 斯提瑞亚地区那里),而这些人第8世纪逐渐接受了基督信仰。居住在 Drau(Drava 德拉瓦河)以南的地区的克洛提亚人更早一些皈依了信仰:大概在670年到680年,一些来自罗马的传教士使大部分的克洛提亚人接受信仰,到9世纪初,他们全部皈依了。一个与匈奴人有较多关系的骑马民族是 Avari(阿瓦尔人),他们曾居住在 Pannonia(帕诺尼亚)地区

(今天的匈牙利)。在他们的地区保存着一些来自罗马帝国时代的基督教因素。Carolus Magnus(查理曼)于796年征服了Avari(阿瓦尔人),又派遣了传教士到他们那里,所以这个被战胜的民族主动地说要接受基督信仰。然而,由于斯拉夫人的压力,这个民族(阿瓦尔人)早于9世纪中叶消失无遗。另一个民族是Moravia(摩拉维亚)人,他们的王国从Bohemia(波希米亚)地区伸展到斯洛伐克与(匈牙利的)Balaton(巴拉顿湖)。在Carolus Magnus(查理曼)的时代,他们附属于法兰克国,但这些关系是比较松弛的。一些巴伐利亚的或法兰克的传教士曾经去摩拉维亚传教。摩拉维亚的国君Privina(普里维纳)和他的人民于850年都接受了基督信仰,至少在外表上。然而,Rastislaw(拉斯提斯拉夫)大王转向希腊的教会(参见83.2)。到了9世纪末,“大摩拉维亚”国分裂了,而那些属多神论的匈牙利人侵略了并占领了他们的地区(905年)。约于1000年,摩拉维亚的范围大概符合今天的摩拉维亚,但它成了波希米亚的一省,这样受到了罗马教会的影响和西方的文化熏陶。

82.3 在805年,部分的捷克人被迫接受Carolus Magnus(查理曼)的统治,因此基督信仰也能够传到Bohemia(波希米亚)地区。845年有14个捷克酋长和他们的随从在Regensburg(雷根斯堡)受洗入教——当时的东法兰克君主是Ludovicus Teutonicus(路易),而他的朝廷在Regensburg(雷根斯堡)。然而,基督宗教的传播发生在第9世纪的最后20年,当时的波希米亚在政治上附属于Moravia(摩拉维亚),而一些摩拉维亚的司铎传播了基督信仰。据说,圣Methodius(美铎第/美托迪乌斯)曾经给捷克第一位基督徒君主Borziwoi(波西沃伊)施洗(参见83.2),但实际上,波希米亚第一位基督徒君主是他的儿子Spitigniew(斯彼提涅夫,约于895年)。他再次承认了德国人的权威,邀请了德国的圣职人员到捷克来,又在各地建立教堂。

在10世纪,公爵的家族和捷克国遇到种种灾难。Borziwoi(波西沃伊)留下的寡妇是Ludmila(卢德米拉),一位高尚的妇女,但她的儿媳Drahomira(达赫米拉)唆使人暗杀她——这个Drahomira(达赫米拉)虽然受过洗,但她在内心上还是一个外教人。Ludmila(卢德米拉)的孙子是圣Wenceslaus(文策劳/文西斯劳斯),他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信徒,过着一种苦修者的生活,但他的弟兄于929年在Alt-Bunzlau(旧本泽劳)杀害了他。这个凶杀案同时表示出反对德国人和反对基督信仰的态度。曾经杀害了弟兄的Boleslaw I(波列斯拉夫一世,929-967年)——他被称为

“残酷者”——起初能够巩固自己的统治,但于950年必须接受封地主Otto I(奥托一世)的权威。他的儿子Boleslaw II(波列斯拉夫二世,967-999年,号称“虔诚者”)更多支持了教会。因为Regensburg(雷根斯堡)的主教圣Wolfgang(沃尔夫冈)很慷慨地让步,波希米亚获得了自己的教区:Praga(布拉格,设立于973年)。第一个主教是一位萨克森人,Dietmar(狄特马尔),第二个主教是一个在Magdeburg(马格德堡)受过教育的捷克贵族人士,原名叫Woitjeh(沃伊捷克),圣名为Adalbertus(阿达尔伯特),于983年任Praga(布拉格)的主教,后来到Prussia(普鲁士)地区传教,在那里殉道(参见108.4)。然而,在波希米亚地区的一些外教风俗还维持相当长的时间,逐渐才被基督宗教消除。一位来自Niederaltaich(下阿尔泰赫)隐修院的独修者——Guenther(翁特尔,1045年去世)——在11世纪才在波希米亚森林的地区传播信仰。

82.4 从波希米亚地区,基督宗教传到了波兰。波兰人自从Otto I(奥托一世)的时代(约950-973年)以来承认德国国君为封地主。在965年,波兰的公爵Miesko / Mieczyslaw I(梅士科一世,960-992年)——他的祖先大概是诺曼人——与波希米亚的Boleslaw I(波列斯拉夫一世)的女儿Dubrawka(杜布拉夫卡)——一位基督徒——结婚。这位女士劝国王接受信仰,而波兰的国王一年后(966年)受洗入教。通过波希米亚和德国来的司铎的传教工作,整个波兰地区的民众早在1000年以前就皈依了基督信仰。因为波兰人接受了基督宗教的拉丁语形式,他们在文化上也与西欧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第一个波兰教区建立于Posna(波兹南,968年)。德国的Otto I(奥托一世)本来想让这个教区附属于Magdeburg(马格德堡)教区,但他无法实现这个计划,因为罗马的教廷反对这种作法。对那些新兴的东方国度来讲,与罗马教廷的直接联系给它们同时带来了独立性与西方文化的输入。Posna(波兹南)头一批的主教(Jordanus和Ungerus)是德国人。Miesko(梅士科)的儿子是Boleslaw I Chrobry(“勇敢的”波列斯拉夫,992-1025年)。在他执政的时代,德国的皇帝Otto III(奥托三世)于1000年[在Silvester II(西尔维斯特)教宗的同意下]在圣Adalbertus(阿达尔伯特)的墓那里建立了一个波兰全国性的教区,即Gnesnia(Gniezno, Gnesen 格涅兹诺)教区。那些更早一些建立的斯拉夫地区的教区都被列入Gnesnia(格涅兹诺)这个总教区的管辖:Pomerania(波美拉尼亚)的Kolberg教区、Silesia(西里西亚)的Breslau(Wroclaw)教区、Cracovia(Krakow 克拉科夫)教区和Posna(波兹南)教区。

Adalbertus(阿达尔伯特)的一个弟兄——Radim - Gaudentius(瑞丁 - 高登提乌斯)——成为 Gnesnia(格涅兹诺)总教区第一位主教。在 1000 年, Otto III(奥托三世)在 Gnesnia(格涅兹诺)赋予了 Boleslaw I(波列斯拉夫一世)一个新的荣称,称他为 patricius(“首长”,意味着他是“皇帝的代表”)。这个 Boleslaw I(波列斯拉夫)王曾经率军攻击德意志帝国、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波美拉尼亚及俄罗斯。通过这些战争,他能够扩展自己波兰的领土,最后他也摆脱了德意志帝国的管辖并宣布自己是“国王”来肯定波兰的独立地位(1024 年)。因为 Miesko(梅士科)公爵曾经于 990 年将波兰“赠给”(Schenkung Polens)罗马的教宗 Johannes XV(若望/约翰),教廷自从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的时代(约于 1080 年)要求波兰每年交纳一种“伯多禄/彼得税”(Peterspfennig)。在 Boleslaw I(波列斯拉夫)去世后,外教传统有强烈的反弹,想镇压基督信仰。只有在 Casimirus I(Kasimir 卡西米尔一世)王的时代(1040 年),教会的秩序重新被建立起来了;德意志人在这方面也提供帮助。波兰的本堂区制度在 13、14 世纪才被建立起来了。

82.5 在德国北部还有一群部落,他们就是所谓的 Wenedi(文德人)。这些“文德人”居住的地区是在 Elbe(易北河)、Saale(萨勒河)和 Oder(奥德河)中间的地带。当萨克森族的皇帝们(Henricus I 亨利一世, Otto 奥托一世等)征服 Wenedi(文德人)后,他们也开始受到基督宗教的影响。然而,他们接受信仰的过程比较慢,因为一种尖锐的种族上的冲突激化了政治上的和宗教上的对立。在 Henricus I(亨利一世, 919 - 936 年)的时代有 Verden(维登)的主教 Adalwardus(阿达尔瓦都斯)在 Mecklenburg(梅克伦堡)的 Obotrites(奥波特利特)部落传教。后来, Otto(奥托)皇帝(936 - 973 年)认为,进行传教是帝国的任务。他将 Carolus Magnus(查理曼)视为一个榜样,所以他不仅仅要确保边境的安全或征服一些新的地区,而且也要传播基督宗教的信仰和伦理道德。在中世纪的时代,殖民政策和传教活动似乎都是“手拉手地”实现的(Kolonialpolitik und Mission gehen im Mittelalter fast immer Hand in Hand miteinander)。Havelberg(哈韦尔贝格)教区和 Brandenburg(勃兰登堡)教区成立于 948 年(为 Wilzen, Redarier, Heveller, Liutizen 部落而建立); Stargard - Oldenburg(斯塔格德 - 奥尔登堡)教区成立于 968 年[给 Holstein(荷尔斯泰因)的 Wagrier 和 Obotrites 建立的]——这个教区后来(于 1160 年)被迁移到 Luebeck(吕贝克)。Otto(奥托)皇帝愿意在 Magdeburg(马格德堡)给 Elbslaven(易北斯拉夫人)建立一个总教区;虽然 Mainz(美因茨)的总主教反对这个计划,皇帝和 Johannes

XIII(约翰内斯十三世)教宗仍然在 Ravenna(拉文纳)的主教会议上(967年和968年,参见88.5)建立了这个总教区。他们同时还在 Merseburg(梅泽堡)、Zeitz(蔡茨)——后来迁到 Naumburg(瑙姆堡)——和 Meissen(迈森)建立了一些教区; Meissen(迈森)处于 Sorben(索本)部落的地区,在 Saale(萨勒河)与 Elbe(易北河)中间的地区。Magdeburg(马格德堡)第一个总主教是处于 Alsatia(阿尔萨斯)地区的 Weissenburg(魏森堡)隐修院的院长 Adalbertus(阿达尔伯特)。

虽然教会和国君想努力推广信仰,但 Wenedi(文德人)的基督化进行的非常慢。在 Otto II(奥托二世)的时代爆发了一次可怕的暴动(982-983年),这个事件给传教事业造成很大的打击。Henricus II Pius(虔诚者亨利二世,1002-1024年)曾经依赖于 Liutizen(留提曾)部落来抵抗波兰人,所以他不得不允许他们保留他们的外教军旗。Wenedi(文德人)的一个基督徒君主——Gottschalk(格特沙尔克),他来自 Obotrites 的部落——大约在11世纪中叶建立了一个很大的王国并借着一些德意志的司铎们引导相当多的文德人进入基督宗教;Hamburg - Bremen(汉堡 - 不来梅)的总主教 Adalbertus(阿达尔伯特)在这方面协助了他。然而,外教人的派别于1066年引起了一次暴动,当时的外教人打死了 Gottschalk(格特沙尔克)和许多圣职人员,所以在文德人地区的基督宗教又一次被镇压,似乎消失无遗。

82.6 Hungari(匈牙利人,亦称 Magyari 马扎尔人)原来是一个来自蒙古地区的骑马民族(mongolisches Reitervolk)。他们的酋长 Arpad(阿尔帕德)于895/896年率领他们征服那些被 Avari(阿瓦尔人)占据的地区,就是今天的匈牙利地区,在 Danubius(多瑙河)与 Theiss(蒂萨河)中间的地区。在 Pannonia(帕诺尼亚)地区保留了一些罗马时代的教堂,但匈牙利人毁灭了它们。这些残暴的游牧式的战士也曾多次侵略了中欧地区,尤其是巴伐利亚地区、施瓦比亚地区、意大利北部,在各处杀人掠物。Henricus I(亨利一世)于933年打败了他们的军队(在 Unstrut 翁斯特卢特的交战),而在 Lech(莱希河)的交战(在 Augsburg 奥格斯堡附近)最终消灭了匈牙利人的军力。德意志全国的战士联合起来后才克服了来自东方的威胁。Augsburg(奥格斯堡)城的主教,圣 Ulrich(乌尔里希)主教很勇敢地帮助保卫这个遭受严重攻击的城市。这次胜利对整个欧洲的历史都有重要的影响。匈牙利人开始(在今天的匈牙利地区)定居,不再侵略别的地区。当然,巴伐利亚东部的地区(今天的奥地利)还必须继续抵抗在东边的敌人,而匈牙利人接受基督信仰是10、11世纪的一个漫长的过程。

来自 Suabia(施瓦比亚)的一位隐修者 Wolfgang(沃尔夫冈)曾经在匈牙利人地区传教。这个人来自 Einsiedeln(艾恩西得尔恩)隐修院,后来成为 Regensburg(雷根斯堡)的主教(972-994年,参见 82.3)。Passau(帕骚)的主教 Pilgrim(彼利基姆,971-991),一位很能干的人,派遣了更多圣职人员和隐修士到匈牙利地区,最后自己也去匈牙利以便促进在东方的传教工作。当时,Salisburgum(萨尔茨堡)是一个 metropolis(大教区),而 Passau(帕骚)属于它的管辖。Pilgrim(彼利基姆)曾想脱离 Salisburgum(萨尔茨堡)的权威,所以他伪造了一些(据说来自罗马教宗的)诏书(所谓的 Lorcher Faelschungen)——通过这些诏书,他想证明,在 738 年以前曾经存在着一个来自罗马时代的 Lorch an der Enns(洛克)总教区,而 Passau(帕骚)本来属于这个“洛克总教区”的管辖。这样,他想建立一个管理 Ostmark(“东方边境”,即奥地利东部)、匈牙利和摩拉维亚地区的总教区。然而,他的计划落空。匈牙利人的公爵 Geisa(格萨,972-997年)曾经与 Otto II(奥托二世)进行和平谈判,其中被迫允许传教士更自由地在匈牙利地区活动。这位 Geisa(格萨)王的妻子是波兰的 Miesko(梅士科)公爵的姐妹 Adelheid(阿德尔海德),她是一个基督徒,而 Geisa(格萨)和他的儿子 Waik(维克)也接受了圣洗。Waik(维克)成为匈牙利的王侯,取名为 Stephanus(斯特凡努斯,997-1038年)——后来称“圣斯特凡努斯”——并与巴伐利亚公爵 Henricus II(亨利二世,他后来当皇帝)的妹妹结了婚。在 Otto III(奥托三世)的协助下,这位 Stephanus(斯特凡努斯)王成为匈牙利这个基督宗教国度的创始人(Gruender des ungarischen christlichen Nationalstaates)。他于 1001 年在 Gran(格兰)被加冕为匈牙利的王;据说 Silvester II(西尔维斯特二世)教宗送给他王冠,但有人怀疑这样记载的真实性。这个国王想采取全面的措施来引导自己的国民走向基督信仰。他建立了隐修院,创立了一些教区。他的首都 Gran(格兰)也成为一个大教区的主教府,并且不属于任何德意志的教区。Stephanus(斯特凡努斯)王也吸引了一些德意志的殖民者,这样更强化了基督宗教的影响。因此,匈牙利与波兰一样,都成为西欧文化的基地,与亚洲地区的外教人和脱离罗马的希腊教会有所区别。Stephanus(斯特凡努斯)去世后还发生了一次暴动,但 Bela I(贝洛一世,1061-1063)终于克服了外教人的文化,虽然一些非基督宗教的风俗习惯还继续存在一段时间。Stephanus(斯特凡努斯)王曾经将匈牙利赠给教宗,而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教宗后来要求匈牙利兑现这些许诺,因为教宗等于是封地主。这位教宗也宣布 Stephanus(斯特凡努斯)和他的儿子

Emericus(厄梅瑞克,1031年去世)为教会的圣人。

83

希腊教会在欧洲东南部斯拉夫人的传教工作

83.1 大部分的斯拉夫民族都是因希腊教会的努力而进入教会的。这样,斯拉夫人和拜占庭也有了比较密切的政治关系和文化联系。因此,在边界地区居住的信徒也经常遇到一些与西方教会的冲突。因为“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这个职位导致了希腊教会与拉丁教会之间的分裂,这些南斯拉夫民族也被牵入教会大分裂,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83.2 居住在 Croatia(克罗地亚)东边地区的人是 **Serbia**(塞尔维亚)人。拜占庭的 Heraclius(赫拉克留斯)皇帝(610-641年)曾劝他们接受基督信仰,但当他们脱离了希腊人的统治时(约于827年),他们也放弃了基督宗教。另一个希腊皇帝, Basilius I(巴西略/巴西流斯一世,867-886年)引导他们再次拥抱希腊人的统治和基督宗教。那些占领了希腊地区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斯拉夫人也在同样的时期通过希腊帝国的影响而皈依了基督信仰。大约在860年,希腊的传教士 Constantinus(君士坦丁)曾经在 Crimea(克里米亚半岛)和 Don(顿河)的下游地区传教,在那里居住的民族是一些属于芬兰-土耳其语系的民族,即 Chazari(哈扎尔人)。他的弟兄 Methodius(美多迪乌斯)也许和他一起在那些地区传教。他们两个人来自 Thessalonica(得撒洛尼加/帖撒罗尼迦)的一个贵族家庭。Constantinus(君士坦丁)的修道名称(即入隐修院时获得的新名称)是 **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西里尔),他曾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当过司铎和“philosophos”(学者和教师)。Methodius(美多迪乌斯)是隐修者,曾当 Cyzikus(西西库斯)隐修院的院长。在 **Moravia**(摩拉维亚)地区的传教士最早是一些来自法兰克和巴伐利亚地区的人(参见82.2),但因一些政治理由,摩拉维亚的 Rastislaw(拉斯提斯拉夫)王(846-870年)转向拜占庭,并邀请拜占庭派遣一些传教士到摩拉维亚。因此,Michael III(弥格尔三世皇帝,842-867年)和 Photius(佛提乌斯)宗主教于863年派遣了这两个“斯拉夫人的宗徒/使徒”到摩拉维亚。这两位传教士将《圣经》和(符合罗马礼的)礼仪经文翻译成斯拉夫人通用的语言(所谓的“教会斯拉夫语”,一个马其顿-

保加利亚的方言),因此在传教方面影响很大。为了进行翻译工作,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根据希腊字母创造了一套斯拉夫文字,所谓的 Glagolica(即 Cyrillic alphabet“西里尔字母”的早期形式)。

三四年后,罗马的教宗 Nicolaus I(尼苛劳/尼哥拉,858-867年)邀请他们去罗马给他作报告并且将(据说)在 Chersonesus(赫尔松)发现的圣 Clemens(克雷孟/革利免)的骨灰带到罗马。他们去了罗马;不久后,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在罗马的一座隐修院去世(869年)。Hadrianus II(哈德良二世)教宗(867-872年)任命 Methodius(美多迪乌斯)为 Pannonia(帕诺尼亚地区)的 Sirmium(西米翁)的总主教和教宗的使者,他回到摩拉维亚并继续很成功地传播基督信仰。然而,Salisburgum(萨尔茨堡)的总主教,Passau(帕骚)的主教和 Freising(弗赖辛)的主教认为,Pannonia(帕诺尼亚)属于他们的管理范围,所以他们激烈反对 Methodius(美多迪乌斯)。他们甚至在870年举行的主教会议上——德国的 Ludovicus Teutonicus(路易)王也出席这次会议——罢免了 Methodius(美多迪乌斯)主教并把他关进一座隐修院两年半之久。他们也多次质问或攻击他的信仰的正统性。Johannes VIII(约翰内斯八世)在漫长的谈判后批准了斯拉夫语的礼仪(880年),但在 Methodius(美多迪乌斯)去世后(885年),Stephanus V(斯特凡努斯五世)教宗又禁止它(885年)。Methodius(美多迪乌斯)的学生和拥护者被迫离开摩拉维亚。因此,摩拉维亚地区放弃了“斯拉夫的教会语言”,虽然是该语言的发祥地(参见 82.2),波希米亚人暂且接受了这个语言,后来又放弃它,但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俄罗斯人长期接受了它。

83.3 在 Bulgaria(保加利亚)地区的传教士是一些希腊的司铎(在850年后)。保加利亚人的君主 Bogoris(= Boris 鲍里斯)于864年接受洗礼,他的代父(教父)是希腊皇帝 Michael(弥格尔/米迦勒),因此这个新信徒也接受了“弥格尔/米迦勒”为他的圣名。他强迫自己的人民并用武力来镇压非基督宗教的抵抗者。但不久后,他又担心自己在政治上的独立性无法确保,所以他转向西方的教会。他邀请罗马教宗和德意志皇帝派遣一些传教士。因此,Nicolaus I(尼苛劳/尼哥拉一世)教宗于866年派遣了两位使者,即 Porto(波尔托)的主教 Formosus(福尔摩苏斯,他后来当教宗,参见 87.6)与 Populonia(波普罗尼亚)的主教 Paulus(保禄/保罗)。Ludovicus Teutonicus(德意志的路易)皇帝派遣了 Passau(帕骚)的主教 Ermanrich(艾曼利克)和几位圣职人员到保加利亚。除此之外,教宗在一部著名的著作

(*Responsa ad consulta Bulgarorum*《回应保加利亚人的询问》)中回答 Bogoris(鲍里斯)王关于教会法和罗马礼提出的问题,给保加利亚人一些明智的指导。德国人派遣的传教士后来被迫回家,但教宗的使者获得良好的传教效果,所以不久后整个保加利亚民族似乎都接受了信仰。然而,由于拜占庭的一些措施,Bogoris(鲍里斯)又开始转向东方。另外,他要求 Formosus(福尔摩苏斯)当保加利亚的总主教,但罗马教宗没有批准这个要求,所以 Bogoris(鲍里斯)于 870 年再次皈依到希腊教会那里。从此,他的国度始终与君士坦丁堡保持联系。Johannes VIII(约翰内斯八世)教宗曾经努力想改变这种情况,但都没有效果(参见 93.4)。Achrida(= Ochrida 阿克利达)成为保加利亚总主教区的主教区,或者说这个宗主教似乎是一个独立的首牧(*beinahe autokephales Patriarchat*)。在 Basilius II Bulgaroktonos(巴西略/巴西流斯二世,976 - 1025 年)皇帝的时代,保加利亚失去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并成为希腊帝国的一个省。保加利亚从摩拉维亚那里继承了斯拉夫人的教会语言,但他们使用的礼仪本身来自希腊 - 拜占庭的传统,这一点和塞尔维亚人及俄罗斯人是一样的。

83.4 **Russia**(俄罗斯)的庞大国度的形成要归功于那些来自 Scandinavia(斯堪的纳维亚)的——属于 Vikingi(维金人,诺曼人)或 Waraegi(瓦勒基,意思是“随从”)的一个部落——即 Rus(罗斯人/儒斯人)的部落。在 Rurik(留里克/儒瑞克)的领导下,这些罗斯人/儒斯人在 850 年后(据说是在 862 年)在 Nowgorod(诺夫哥罗德)地区和在 Ukraina(乌克兰)地区 Dnepr(第聂伯河)中游地区定居。他们的王国获得快速的发展,而 Kiovia(Kiev 基辅)成了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拜占庭的宗主教们 Photius(佛提乌斯)和 Ignatius(伊格纳提乌斯)致力于劝勉那些陌生人接受基督信仰——诺曼人也曾几次侵略过君士坦丁堡。根据一些文献的记载,945 年在 Kiovia(基辅)的部分诺曼贵族是基督徒;在那里也有一座献给圣 Elias(厄利亚斯)的教堂。大王 Igor(伊哥尔)的寡妇 Olga(奥尔加)于 954 年接受圣洗,取洗名为 Helena(海伦纳)。她的儿子 Swaetoslaw(斯维托斯拉夫)仍然保持外教人的传统,但她的孙子 Vladimir(弗拉基米尔,1015 年去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为了获得与高级的希腊文化的联系,他于 987 年接受圣洗,并与拜占庭皇帝 Basilius II(巴西略/巴西流斯二世)的姐姐 Anna(亚纳)结婚(989 年)。因此,他后来被称为“第二个君士坦丁”,“圣者”和“类似宗徒/使徒的人”。他命令在各地毁灭偶像,让人们公开鞭打主要的民间神灵 Perun(佩伦)神,又将其神像投入 Dnepr(第聂伯河)。人民群

众没有受到更多培育,但一批一批地接受了洗礼。当然,外教人的传统因素还保留着很长时间。在 10 世纪末的俄罗斯已经有 8 个教区。

Vladimir(弗拉基米尔)的儿子 Yaroslav(雅罗斯拉夫,1015 - 1054 年)巩固并组织俄罗斯的国教。这个教会在法律上、礼仪上和习俗上都有希腊/东方的特征。从保加利亚引入的古斯拉夫教会语言在礼仪中还是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作为拜占庭教会的女儿,俄罗斯教会在 12 世纪也同样脱离了西方教会。俄罗斯的大主教府(metropolis)建立在 Kiovia(基辅),而这个主教府在 1037 年后始终附属于拜占庭宗主教的管辖。一直到第 13 世纪,俄罗斯的大主教似乎全部是希腊人。根据 Athos(阿托斯,圣山)的模式,在 Kiovia(基辅)附近的“山洞隐修院”(建立于 1051 年)大大提高了人民的文化水平和道德水平;这个隐修院成为俄罗斯隐修传统、俄罗斯文学和艺术的摇篮。Kiovia(基辅)的 Nestor(涅斯托尔)隐修士(1114 年去世)被视为“俄罗斯历史学之父”,著名的《俄罗斯编年史》(约于 1112 年写成)据说是他的著作。

伊斯兰教在欧洲西部和南部的征服

84.1 阿拉伯人的“民族大迁移”——就是伊斯兰教向西方的广大迈进(参见第 1 卷 45)——并没有在 Africa(阿富利加/非洲)的西北角停止不前。一个北阿富利加/非洲的民族——Berber(柏柏尔人)加入了阿拉伯人的队伍,他们在 Tarik(塔利克)将军的领导下跨越了 Gibraltar(直布罗陀)海峡,并于 711 年在 Xeres de la Frontera(赫雷斯)战胜了西哥特人的国王 Rodericus(若得瑞克/罗得里克)。不久后,西哥特国——它本来因内部的纷争失去了精力——全都落入伊斯兰军队的手中,只有北部的 Bascia(巴斯克)山区保持着独立。早在 718 年,穆罕默德的热忱随从者跨越了 Pyrenaei montes(比利牛斯山脉)并侵略了法国地区;他们攻克了 Narbonne(纳博讷)、Carcassonne(卡尔卡松)、Arles(阿尔)、Nimes(尼姆),甚至威胁了 Loire(卢瓦尔河地区)。法兰克宫廷大臣 Carolus Martellus(查理·马特)率领法兰克人的军队并于 732 年在 Tours(图尔)和 Poitiers(普瓦捷)之间彻底击败了阿拉伯人——这个重大的成就意味着法兰克王国和它的基督宗教文化被保护,所以法

国地区没有遭受与西班牙同样的厄运。不久后,阿拉伯人被迫撤退到 Pyrenaei montes(比利牛斯山脉)以南的地区,而在后来的几百年当中,基督宗教在西班牙的领土一步一步被扩大。Alphonsus I(阿方索/阿尔丰索一世,739 - 757 年)建立了 Asturias(阿斯图里亚斯)王国;Carolus Magnus(查理曼)于 778 - 801 年在 Pyrenaei montes(比利牛斯山脉)和 Ebro(厄布罗河)之间征服了一个地区(称之为 spanische Mark“西班牙的边境”)。然而,在西班牙的核心地带,伊斯兰教的统治还维持了好几百年。在 765 年,Abderrahman I(阿布拉赫曼一世)所建立的王朝——后来成为 Caliphate de Cordoba(科尔多瓦的哈里发)——在第 10 世纪甚至经过一个旺盛时期。在那里的文化和学术(数学、自然科学、哲学)非常繁荣。伊斯兰教的军队还继续威胁了基督宗教的西欧地区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的海军控制了地中海,他们从拜占庭的手中夺走了 Sicilia(西西里岛)并多次侵略了法国南部和意大利的沿海地区——这些地区没有任何防卫设备;比如他们于 846 年劫掠了罗马城以外的 S. Pietro S. Paolo fuori le Muri(圣伯多禄圣保禄)教堂,参见 87.2。他们的基地曾经在 Gaeta(格塔)附近的 Garigliano(880 - 915 年),在法国南部的 Provence(普罗旺斯)的 Fraxinetum(889 - 975 年),甚至在瑞士的 St. Bernhard(圣伯尔纳德,930 年)。个别伊斯兰的巡逻军团曾经达到了 St. Gallen(圣伽伦)和 Chur(库尔)。

84.2 西哥特人的王国崩溃了,而这个事件当然也影响了西班牙的教会。很多人离开了教会。那些古老居民现在被称为 Mozarabi(莫扎勒布人,“阿拉伯化的基督徒”,关于他们的礼仪参见 98.1);虽然新的统治者说要确保他们的宗教自由,但因为接受伊斯兰教的人获得了很多优待,所以也有很多基督徒决定要改宗教,他们加入了伊斯兰教。那些坚定的基督徒也曾多次经历了严重的磨难。在 850 年爆发了一次激烈又比较长期的教难;这次教难的部分责任要归罪于当地的基督徒本身,因为其中有一些人公开辱骂了穆罕默德先知,但在伊斯兰教中,这是一个处以死刑的罪行。一个基督徒派别甚至似乎主动的寻找了殉道的机会。852 年在 Cordoba(科尔多瓦)举行的主教会议规定,信徒们不应该主动地在公开的地方宣布自己的信仰,但有的人并没有遵守这个规定。Cordoba(科尔多瓦)的长老 Eulogius(欧罗格乌斯)——他在 858 年被选为 Toledo(托莱多)的总主教——和他的朋友 Alvarus(阿尔瓦汝斯)支持了这个“激烈派”,但这位总主教于 859 年也殉道了。在这一事件后,情况又变得平静一些。Adoptianismus(嗣子论)的异端(参见 90.3)也与西班牙教会的解体现象有关系。

第二章 在 11 世纪以前的教宗和种种国王的关系。西部的“基督徒帝制”

85

教会国的形成；各教宗和法兰克人的联盟

历代教宗：Constantinus I(君士坦丁一世,708 - 715 年)；St. Gregorius II(圣额我略/贵格利,715 - 731 年)；St. Gregorius III(圣额我略/贵格利,731 - 741 年)；St. Zacharias(圣扎卡利亚斯,741 - 752 年)；Stephanus(斯特凡努斯,752 年,没有登宝座)；Stephanus II(斯特凡努斯二世,752 - 757 年), St. Paulus I(圣保禄/保罗一世,757 - 767 年)；Constantinus(君士坦丁,767 - 768 年,不合法的教宗)；Philippus(斐理伯/腓力,768 年,不合法)；Stephanus III(斯特凡努斯三世,768 - 772 年)。

85.1 当 Langobardi(伦巴第人)于 568 年侵略并占领了意大利时(568 年,参见第 1 卷 43.4),在东北部仍然有一些地区属于拜占庭的管理,但东方帝国的统治并不牢固:拜占庭征收的税很多,地方官员腐败,而拜占庭又没有提供足够的军事支持以保护当地人民不遭受 Langobardi(伦巴第人)的压迫。因此,臣民们并不爱戴拜占庭的统治者。同时,罗马圣座的威望和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教宗们很久以来都管理着在意大利和周围海岛的相当大的地产,这就是所谓的 Patrimonium Petri(伯多禄遗产)。在这个遗产的管理的组织化方面,圣 Gregorius I(额我略/贵格利,590 - 604 年)有很大的贡献。因此,教宗们在东方皇帝或皇帝在 Ravenna(拉文纳)的代表面前采取了一个相当独立的态度。在那个充满灾难的时期中,教宗们自然地成为意大利人民的领导者,尤其是 Gregorius II(额我略/贵格利二世)和 Gregorius III(额我略/贵格利三世)——他们很有远见并支持 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波尼

法修)的传教工作和法兰克人教会的改革(参见 80.2,3)。东方的 Leo III(利奥三世)皇帝(717-741 年)引起了关于“圣像”的激烈争论并也要把意大利牵入这个争论中来。意大利的信徒非常反对皇帝的这个运动;当时的教宗们对他们的保护者(东方的皇帝)表示忠信,但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忠信态度,意大利人也许早就中断与东方的关系。因为意大利北部的 Langobardi(伦巴第人)威胁了罗马,教宗和罗马的元老院在 739 年派遣使者向法兰克大臣 Carolus Martellus(查理·马特)求助;他们说愿意让这个大臣当“罗马的保护者”——虽然这本来是东方皇帝的任务。这是教宗第一次“脱离东方,转向西方”的尝试,表示政治上的重新定位和指南。然而,Carolus Martellus(查理·马特)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因为他认为,在抵抗阿拉伯人时,他需要伦巴第人的协助。下一任教宗——来自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 Zacharias(扎卡利亚斯,741-752 年)——能够和伦巴第王 Liutprand(留特布兰德,712-744 年)签订一个维持 20 年的和平条约。在这些谈判中,教宗已经以这样的角色出现:他是掌握了罗马地区的政治权力——所谓 Ducatus Romanus(“罗马十城”)指罗马城和属于它的一些其他的地区,即 Campania(堪帕尼亚)、Maritima(沿海地区)和 Tuscia(图斯奇亚)的部分地区。在 Zacharias(扎卡利亚斯)教宗的时代,圣座和法兰克人也开始建立一些联系,而这些关系对教会国的发展以及对整个欧洲历史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Carolomannus(卡洛曼)原来是 Austrasia(法兰克东部)的大臣;他模仿了一些盎格鲁-撒克逊王的榜样并于 747 年放下政权,随后去意大利当圣职人员和隐修士。他的弟兄 Pippinus(Pepin the Short 丕平)是一位有才华有雄心的人,又有信仰并尊敬教会。这个领导者掌握了整个法兰克王国的实际权力,虽然他只是“大臣”,因为国王仍然是那些属于 Merovingi(梅洛温格)王朝的人。Pippinus(丕平)要结束这种不自然的状态并且要自己成为国王。因此,他派遣了 Wuerzburg(维尔茨堡)的主教 Burkhard(布克哈德)和 St. Denis(圣德尼)隐修院的院长 Fulrad(夫尔瑞德)到罗马,要他们和教宗进行谈判:这个大臣的计划是让教宗作决定——教宗被视为人间最高的道德权威——这一个问题:如果正式的国王(Merovingi 梅洛温格王)无能为力,能不能允许这种政变呢?一个自己不属于王家的人能不能成立一个王朝——Carolingi(卡洛林)王朝? Zacharias(扎卡利亚斯)教宗答应了大臣的要求。因此,Pippinus(丕平)在 Soissons(苏瓦逊)举行了一个王国大会(751 年),让各地的贵族选他为王,并从圣 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和其他法兰克主教的手中受到“傅油典礼”——这个傅油的习惯效法着《旧约》

的榜样以及西哥特人和盎格鲁 - 撒克逊人的习惯。根据这种宗教礼仪,法兰克人的统治者(从 Carolus Magnus 查理曼,769 年开始)称自己为 *Dei gratia* (“依赖于天主/上帝的”)统治者。Merovingi(梅洛温格)王朝的最后代表——那位无能为力的 Childerich III(希德利克三世)——被关进一个隐修院里。

85.2 对 Pippinus(丕平)来说,报答教宗的机会很快就来到了。伦巴第人的国王 Rachis(拉赫斯)本来是一个爱好和平的领导者,但他的弟兄 Aistulf(艾斯图尔夫,749 - 756 年在位)强迫他下台。Rachis(拉赫斯)进入了隐修院,而他的弟兄不顾一切地恢复了原来的“征服政策”。他于 751 年从希腊人的手里夺走了 Ravenna(拉文纳)城——这是东方皇帝在意大利控制的地区的首都——这威胁了罗马。东方的皇帝 Constantinus V(君士坦丁五世)没有帮助罗马人,所以 Stephanus II(斯特凡努斯二世,752 - 757 年)向法兰克人求助。他亲自跨越 Alpes(阿尔卑斯山脉)并于 754 年的主显节(1 月份)在 Champagne(香巴尼)的 Ponthion(庞蒂翁)的王宫出现。Pippinus(丕平)很尊敬地迎接了教宗,象征性地牵引了教宗所骑的马(等于表示他是教宗的“马夫”leistete ihm den Marschallsdienst des Zuegelfuehrens)并且发誓说将要保护教宗不再遭受伦巴第人的骚扰。他这样做肯定不仅仅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同时(而且更多)也是出于宗教信仰,因为他认为他必须尊敬 Petrus(伯多禄/彼得)——宗徒/使徒们的领导——以及伯多禄/彼得在罗马的接班人。在 St. Denis(圣迪那),教宗再次给 Pippinus 傅油——现在与他的儿子 Carolus(未来的查理曼)和 Carolomannus(卡洛曼)一起——并且交给了他们 *Patricius Romanorum*(罗马人的元首)的尊称;这种尊称原来属于驻在 Ravenna(拉文纳)的东方皇帝的代表,或属于罗马的统治者,但曾经也有一些格尔曼/日耳曼将军和王侯获得了这个尊称。在比较长的谈判后,教宗和国王签订了一个“彼此协助,彼此保护”的盟约(*Schutz - und Trutzbuendnis*);在 754 年 4 月,双方在 Laon(拉昂)附近的 Quierzy(克尔西)宣布了一个文献——虽然一部分法兰克贵族人士反对——并在文献中规定 Pippinus(丕平)将要承担的义务(这篇文献没有保存)。这个著名的“赠予许诺”(Promissio Carisiaca = Promise of Quierzy)不仅仅包括国王在 Ponthion(庞蒂翁)作的“保护许诺”,也包含下面的规定:伦巴第人所占领的“属意大利领土”的地区——尤其是 Ravenna(拉文纳)地区——必须要“归还”(原文:reddere)于宗座(参见 85.3 的 Donatio Constantini“君士坦丁的赠予”)。Pippinus(丕平)在 754 年和 756 年两次率军到意大利,打败了伦巴第人,拒绝拜占庭对于他“以武力占据”地

区的要求,并将这些地区交给罗马教宗:从 Po(波河)河口的 Comacchio(科马基亚)地区到 Ancona - Jesi - Gubbio(安科纳 - 折西 - 古比奥),即 Exarchatus(拜占庭领土)和所谓的 Pentapolis(五城地)。法兰克人的国王又把“赠予文献”放在罗马城圣伯多禄的墓上,这样肯定他和教宗的友好关系——这种关系对欧洲历史有几百年的深厚影响,它指出一个基本的方向,即:罗马教宗和北欧的皇帝愿意积极地合作,保持欧洲地区的和谐。这些行动就建立了作为政治实体的“教会国”;虽然从国际法的角度看,这个地区的地位还不太明确,但它将会完全脱离拜占庭的控制,这只是早晚的事。

近代的一些学者曾经说过,在古罗马帝国的时代,罗马教宗的地位“仅仅是教会法方面的事”,罗马教宗的地位仅仅是“尊严和威望的问题,而不是信仰的问题”。这些学者认为,那些新皈依的盎格鲁 - 撒克逊人和他们的学生(法兰克人,通过 Bonifatius 博尼法奇乌斯)才开始将教宗视为一个真正“宗教性的权威”——这个权威涉及到每一个信徒(不仅仅与主教或圣职人员有关系),因为教宗是伯多禄/彼得的代表,所以他有“打开和关闭”的权利(参见《玛窦/马太福音》Mt 16: 19),因此教宗可以要求所有的愿意得救的信徒服从他。这些学者认为,就是因为那些格尔曼/日耳曼民族如此重视教宗,所以才可能有中世纪和近代的教宗形象,即一位要求在信仰和道德上指导全世界的权威。——实际上,罗马主教的权威性从一开始也有宗教上的特征,而早期的教会也在第 1、2、3 世纪中肯定了罗马主教的首席权威(参见第 1 卷,21)。同时,罗马教宗的特殊地位也是教会制度的一部分,而这个制度在基本上就来自教会的创始人——基督。因此,教会的制度也算为宗教信仰的事。当然,罗马主教对于自己权力的具体使用有所变化,因为它属于发展的规律。有的教宗——比如 Leo Magnus(大良/大利奥)、Gelasius I(格拉修斯一世)、Gregorius Magnus(大额我略/贵格利)——能够充分利用他们的权利(参见第 1 卷,64),但在 6、7 世纪大部分的时候,哥特人和拜占庭的统治者严重地限制和镇压了教宗对外的权力(参见 64.3,6)。毫无疑问,罗马的宗座在第 8 世纪经历了政治上的崛起。那些格尔曼/日耳曼民族根据自己的思想世界赋予了旧的宗教概念一些新的特征。对他们那些单纯的人来说,“宗徒/使徒们之王”(Apostelfuerst,即伯多禄/彼得)这个观念带给他们一个特别深的印象(参见第 1 卷关于朝圣和盎格鲁 - 撒克逊人的“伯多禄税”的记载,44.4)。当然,在新皈依者的眼中,宗座的地位相对提高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宗座”和教宗“首席权”的概念经过了根本上的变化。

如果从一开始认为,教宗和罗马教廷的历史都仅仅是政治追求和自私的权力欲的结果,那么这样“解读”历史的人必然会走入很多误区,他们无法全面地理解欧洲中世纪的历史。

85.3 在教会国形成的时代保存下来一份对世纪影响很广泛的文献,就是所谓的 *Constitutum*(《规定》)或 *Donatio Constantini*(《君士坦丁的赠予》),这部文献是伪造的,因为据说是古罗马 Constantinus(君士坦丁)的文献,但实际上大概产生于第8世纪。根据该文献的说法,Constantinus(君士坦丁)皇帝曾经感谢了 Silvester(西尔维斯特)教宗(314-335年),因为教宗治疗了皇帝的麻风病又给皇帝施洗(参见第1卷41.2)。因此,皇帝交给 Silvester(西尔维斯特)及他的继承人皇帝的权柄、尊严和权杖,交给教宗 Lateran(拉特兰)宫以及管理罗马的权力,又交给教宗一切“罗马帝国西部的行省、地区和意大利各城市”的统治权。因此,皇帝需要离开罗马而去拜占庭。——这部文献第一次在9世纪中期出现在另一部伪托的文献当中,就是在 *Pseudo-Isidorian Decretals*(《伪伊西多尔教令集》)当中(参见87.4)。似乎整个中世纪的人都认为《君士坦丁的赠予》是一个真实的文献。第15世纪的人文主义学者,比如 Nicolaus Cusanus(库萨的尼苛劳/尼哥拉,参见其 *Concordantia Cath.* III, 2)和 Lorenzo Valla(瓦拉,见其1440年写的 *De falso credita et ementita Constantini donatione declamatio*《论君士坦丁赠予的伪造性》)都证明了这个文献的伪造性。然而,一直到今天,学者无法确定这份文献形成的时间、地点和写作目的。它大概写成于750年后,可能还在 Stephanus II(斯特凡努斯二世,753年)的时代——这样它影响了754年在 Quierzy(克尔西)的协定(见上)——或是在 Paulus I(保禄/保罗一世)的任期内(757-767年)写的:这样它可以提供罗马管理某些意大利地区的合法权利,这样罗马教宗就能够抵抗伦巴第人或拜占庭人的侵犯。有的学者认为,这份文献是在9世纪写的,但这一点是不太可能的。文献的内容不太具体,语言“理直气壮”,所以后来的教宗们根据这个文献提出了更广泛的领土要求、政治上的独立,甚至可以要求对整个西方世界的(精神性)统治权。然而,只有1050年以后的教宗们(比如 Leo IX 利奥九世)有了这样的解释,而12世纪末的教宗们才提出了这样严肃的要求,因为他们面对世俗势力的攻击(参见 Innocens III 依诺森三世)。在另一方面,那些批评教宗的人或异端人物或教会内部的批评者(比如 Dante 但丁)也曾多次指出,这份文献为教会带来世俗化和腐败。

85.4 在 Aistulf(艾斯图尔夫)去世后,伦巴第人选择了 Desiderius de Tuscia(德

西得留斯,757-774年)为王。罗马教宗 Stephanus II(斯特凡努斯二世)的接班人是一个罗马执事,即 Paulus I(保禄/保罗一世,757-767年),他忠实坚持法兰克人与教宗的盟约。因为 Rachis(拉赫斯)现在又威胁了 Desiderius(德西得留斯),罗马教宗对 Desiderius(德西得留斯)的支持很重要,而这位伦巴第王也肯定了教宗在意大利北部的领土权利。当 Paulus(保禄/保罗)教宗于767年去世时,一些罗马贵族干涉了教宗的选择,这样引起严重的暴动。Toto de Nepi(托托)公爵用武力来协助自己弟兄的推选(Constantinus 君士坦丁,767-768年),虽然这个人只是一个平信徒。这个不合法的教宗在13个月后被迫下台。罗马人依赖着伦巴第人的帮助去推翻 Constantinus(君士坦丁),但现在伦巴第人又用武力来指定 Philippus(斐理伯/腓力)隐修士当教宗。最终,罗马教会还是用正当的方式选定了 Stephanus III(斯特凡努斯三世,768-772年)。Constantinus(君士坦丁)和他的拥护者遭受残酷的惩罚。769年的 Lateran(拉特兰)主教会议规定“教宗选举”的制度,这样做的目的是为预防那些刚刚发生的混乱情况。这些规定包括:平信徒不能被选为教宗,如果这样做就是严重违背教会的传统;平信徒也不能选教宗。平信徒只能赞同和支持(acclamatio)罗马的圣职人员所选定的人。这些规定都很重要,但在那个年代中,实现它们的条件不太理想。

86

Carolus Magnus(查理大帝)和教会。西部皇权的恢复

历代教宗:Stephanus III(斯特凡努斯三世,768-772年);Hadrianus I(哈德良一世,772-795年);Leo III(良/利奥三世,795-816年)

86.1 法兰克王 Pippinus(丕平)的儿子 Carolus Magnus(查理曼,768-814年)是一个伟人。在法兰克王国和整个西欧历史上,这个统治者都有着灿烂的贡献。整个中世纪的人都认为他是代表“基督徒-格爾曼人君王的美德”,他是“开明智慧”的化身。他既是战争中的英雄,又是和平之王,创立一个庞大的王国,其中包含了欧洲大陆的一切德意志民族,也包括大部分罗曼地区(romanische Gebiete)——这样他就创造了当时除了拜占庭帝国、伊斯兰教的领地外的“第三个超级强国”,即法兰克人的王国。除了这些世俗的贡献以外,Carolus Magnus(查理曼)利用了

Pippinus(丕平)和 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奠定的文化基础并且融合了格尔曼/日耳曼人的社会力量和组织力量以及古罗马的一些制度和基督宗教的思想传统——这些因素共同创造了一个“基督宗教王国”(Christianum Imperium):它在几百年的时期内代表着西方世界最优秀的理想,并且是一个强有力的文化载体。

Carolus Magnus(查理曼)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使命感:他想在各处传播基督信仰和基督宗教的文化,到了晚年,他对这个使命依然满腔热情,且卓有成效地实现了这个任务,使很多民族受益。他也曾经采取了一些强迫性的措施和武力的办法——这一点并不符合基督信仰的理想,但它很符合当时的普遍态度,而具体的政治情况好像也要求这样做。如上所述,他以刀剑征服了萨克森地区,强迫他们接受信仰(参见 81.1),他完成了 Frisia(弗里西亚)地区的皈依工作(参见 80.1),又准备或支持在丹麦人(参见 81.2)、Wenedi(文德人)、Avari(阿瓦尔人)、Moravia(摩拉维亚)人(参见 82.2)和 Bohemia(波希米亚人,参见 82.3)的传教工作。他以同样的热忱想在自己的领土中支持、巩固、组织教会,想提高自己人民的素质和道德修养(hoehere Gesittung)及教育。他定期宣布的法律(Capitularia《法令集》)表明,他不仅仅深入理解教会的文化任务,也明白教会的宗教工作。他建立很多教区和堂区,在德国创立了4个总教区:Mainz(美因茨)、Colonia(科隆)、Trier(特里尔)和 Salisburgum(萨尔茨堡)。在 Ludovicus Pius(虔诚者路易)的时期还加上了 Hamburg - Bremen(汉堡 - 不来梅总教区,参见 81.2),在 Otto Magnus(奥托大帝)的时期又加上了 Magdeburga(马格德堡)总教区。Carolus(查理曼)强化了主教在自己教区的地位,因为他要求定期举行教区的视察和教区会议(参见 95.3),他又巩固了教会的经济基础(关于“什一税”参见 96.1)。他特别注意到圣职人员的培养和在宗教与道德上的提升(关于推广 Vita canonica“圣职人员的共同祈祷和规律的生活”参见 95.4)。他也想普及教育,因此他规定要在大堂、隐修院和教堂附近建立一些学校(参见 89.3)。他劝勉圣职人员努力于牧灵工作,尤其强调讲道的文化(参见 98.4)。他推动平信徒圣化主日参与弥撒,并要求每一个人都能背诵 Pater noster(天主经/主祷文)和 Credo(信经)。这一切努力实际上就是继续实现 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的改革主教会议的种种规定,而国王的努力结出了美好的果实。由于 Carolus Magnus(查理曼)的影响和推动,教会的学术和艺术都经历了一个繁荣时期(参见 89.3; 98.6)。当然,除了这些光明的贡献以外,Carolus(查理曼)的个人生

活和他的政治也呈现出一些比较黑暗的因素,但从整体来看,我们可以说,他的时代是“格爾曼/日耳曼地区第一个文化春天”,是“中世纪文化的早期花朵”。

86.2 就国度和教会之间的关系而言,Carolus(查理曼)政策的特征是政教密切结合和相互融合。他在第一个 *Capitulare*(《法令集》,769年)中称自己为 *devotus sanctae ecclesiae defensor atque adiutor in omnibus*(神圣教会在各方面的虔诚保卫者和协助者),但他也是国度教会的“主宰”,他想监督和控制教会。他的宫廷神学家称他为 *rector ecclesiae*(“教会的指导者”),794年在Frankfurt(法兰克福)主教会议聚集的主教们称他为 *rex et sacerdos*(“国王和司祭”)。当他和内部圈子的人在一起时,他们称他为David(达味/大卫)——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称呼。和古罗马的Constantinus(君士坦丁大帝)或东方的Justinianus(尤斯廷尼安努斯)皇帝一样,他也在教会最核心的问题上有所干预,甚至参与了信仰方面的争论[参见Filioque(“由子”)、Adoptianismus(嗣子说)、圣像争论,90;92.3]。法兰克地区的主教和隐修院的院长似乎无例外地都是他指定的,但他注意到提名一些能干的、有尊严的人士。他召开并主持了一些全国性的主教会议,他吩咐主教和圣职人员遵守他们的职责,他处置教产如同处置一些属于王家的财产(至少在他任期的开始是这样的,参见96.1)。他认为,教宗的角色是“作祈祷的Moses(梅瑟/摩西)”(参见《出埃及记》Ex 17:11),并且在教会政治上的任务方面也在教宗面前采取了一种“领导者”的态度。不过,这种关系还不能称为“政教合一”或——像拜占庭的制度那样的——“政治控制教会”(kaum mit Recht als Staatskirchentum oder Caesaropapismus aehnlich dem byzantinischen bezeichnen)的关系,因为Carolus(查理曼)始终区分这两个权柄,他——至少在理论上——认为宗教的权柄超过世俗的权柄,而且他的基本态度更多是“完成自己的义务”,而不是“控制教会”。他的政权也许也受了古格爾曼/日耳曼传统的影响,所以他的王权有一些“神权统治”因素(einen theokratischen Einschlag)。他认为,神交给了他当国王的种种义务和权利(von Gott uebertragene Koenigspflichten und -rechte)而这些“王的职责和王的权力”也包含对于教会的责任以及在教会中的特殊地位;他的行动来自基督信仰,他认为他要为基督徒民众负责任。他眼中的理想是对奥古斯丁“人间的天国”的一种简化的解释;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著作 *De civitate Dei*(《天主/上帝之城》)也是他最喜欢读的书(参见Eginhardus, *Vita Karoli*, M. c. 24)。这部著作也在后来的几百年中,即在中世纪的政治思想和历史哲学思想中占有主导地位。

86.3 在早期的阶段中, Carolus Magnus(查理曼)在意大利的政治不太符合教宗的希望和教会国的需要。国王的母亲 Bertrada(贝特瑞达)推动他在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之间签订一个条约,而 Carolus(查理曼)就和 Desiderius(德西得留斯)王的一个女儿结了婚约(770年);这个行动使 Stephanus III(斯特凡努斯三世,768-772年)教宗感到非常不安。然而,一年后, Carolus(查理曼)又送回伦巴第人的公主;他的弟兄 Carolomannus(卡洛曼)于771年去世,所以他单独一个人统治整个法兰克王国;这时他再次转向他父亲那种“与罗马保持友好关系”的政策。下一个教宗 Hadrianus I(哈德良一世,772-795年)是一位来自罗马贵族的人士,他很成功地排除了伦巴第人在罗马的影响——伦巴第人也仅仅在最近几十年获得了这种不正当的影响力。不幸的是,伦巴第人的 Desiderius(德西得留斯)王攻击了宗座在 Ravenna(拉文纳)地区的财产,又率军到罗马郊区,而且他也没有落实原先给予的许诺(参见85.4)。因为教会呼吁了法兰克人,北方的保护者再次介入了(773年)。法兰克人攻克了伦巴第人的首都 Pavia(帕维亚,774年6月),结束了伦巴第人的统治,并且把他们的领土并入法兰克王国。当法兰克军还在围攻 Pavia(帕维亚)时, Carolus(查理曼)探访罗马(774年复活节),当时就重新肯定 Pippinus(丕平)的赠予,又加以扩大,因此他还赠予了 Desiderius(德西得留斯)王预许的城市 Imola(伊莫拉)、Bologna(博洛尼亚)和 Ferrara(费拉拉)。

根据 *Liber Pontificalis*(《历代教宗传》)中的 *Vita Hadriani*(《哈德良传》,参见41-43)的记载, Carolus(查理曼)甚至还赠予了其他的地区,比如 Corsica(科西嘉)、Venecia(威尼斯地区)、Istria(伊斯的利亚)、Spoleto(斯波雷托)、Benevento(贝内文托)。当国王提到了这些地区时,他大概仅仅指那些属于罗马教会的农场、房产、个别城市或一些税收——伦巴第人曾经占据了那些,而 Carolus(查理曼)将它们还给教会。法兰克人的统治者也要求教会为每一个地产的所有权提供证据,所以归还的过程比较慢,而 Hadrianus(哈德良)教宗开始抱怨。然而,当 Carolus(查理曼)于781年下次去罗马时,他与教宗达成协议。

86.4 在781年后,拜占庭皇帝对教会国——名义上的——的统治权完全消失。比如,教宗开始以自己的名字和画像铸造硬币。他不再以皇帝上任的年号算日子,而是以自己上任的年代写日期。然而,教宗在自己的领土上也不是毫不受限制的统治者,因为法兰克人的统治逐渐取代了东方皇帝的控制。在774年后 Carolus(查理曼)自称 Rex Francorum et Langobardorum(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之

王),从此他也想更多影响罗马和教会国。他也多次利用了 *Patricius Romanorum* (“罗马人的元首”,参见 85.2) 这个很有弹性的头衔,这一个事实暗示着他认为他对于教会国有某些主权,就像原先的拜占庭皇帝对于 *Ravenna*(拉文纳)一样享有主权。事实上,他确实认为他在教会国的管理和法律问题上是最高的权威。他领导的王国似乎和古罗马帝国的领土一样辽阔,而教宗自己也将 *Carolus*(查理曼)与 *Constantinus*(君士坦丁大帝)加以比较,所以查理曼大概也很想获得“皇帝”的荣誉——对于当时的种种民族来说,“皇帝”这个词会唤起一些光荣的怀念和感受。无论 *Carolus*(查理曼)是否追求了这个皇帝的荣誉,他实际上在下任教宗的时代获得了这个荣耀。

罗马教宗 *Hadrianus*(哈德良)的接班人是 *Leo III*(利奥/莱奥三世,795 - 816年),他也是一位罗马人,马上通知 *Carolus*(查理曼)他被立为教宗,又送给法兰克王 *Petrus*(伯多禄/彼得)墓的钥匙和罗马城的军旗,因为他自己的地位很不稳定:前任教宗的一些亲友控诉他,说他的生活方式不理想,他们又在 799 年的 *Markusprocession*(纪念圣马尔谷/马可的游行)攻击和殴打了他。教宗迫切地需要法兰克人的帮助,因此他在法兰克人的保护下跨越 *Alpes*(阿尔卑斯山脉),在 *Paderborn*(帕德博恩)和 *Carolus*(查理曼)会谈。国王很尊敬地欢迎教宗,派人护送他返回罗马,并于 800 年 11 月亲自去“永恒之城”来澄清这个争论,恢复秩序。主教们在罗马的伯多禄/彼得大堂中聚集开会,而 *Carolus*(查理曼)也参与了这次会议。根据几百年的传统原则——“没有人可以审判宗座”(参见第 1 卷 64.1)——这个会议没有作出什么决定。教宗在 12 月 23 日隆重地发誓说,他没有犯下那些控诉他的人所说的罪(不洁和发虚誓),这样教宗的形象就洁净了。在他的加冕典礼后,*Carolus Magnus*(查理曼)将教宗的控诉者判以死刑,但因教宗的求情,他们仅仅被流放。

在 800 年 12 月 25 日(圣诞节),在罗马的伯多禄/彼得大堂发生了一件欧洲历史上耐人寻味的事件:*Leo*(利奥/莱奥)教宗给 *Carolus*(查理曼)加冕,宣布他为“罗马皇帝”,在场的民众三次以欢呼声(*acclamatio*)拥立他为 *Augustus*(奥古斯都,即皇帝),而符合拜占庭的礼仪,教宗在他面前跪下,跪着表示尊敬。这就是所谓的 *Sacrum Romanum Imperium*(神圣罗马帝国)正式诞生的时刻,虽然这个称呼(“神圣罗马帝国”)仅仅在第 13 世纪出现。典礼是这样进行的,但关于教宗的动机以及 *Carolus*(查理曼)的加冕前后的行动也有很多疑问(见下)。然而,这个典礼的象征

意义和历史上的影响力是谁也不能否定的。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它实际上意味着476年崩溃的西方皇帝传统的恢复,但这是在一个新的——本质上是基督徒的——意义上的恢复,这当然也意味着意大利和宗座在政治上脱离了拜占庭。虽然法兰克人的国王通过加冕礼没有获得外在的权力的扩展,但在各个民族中,他的道德权威性和政治权威性被提高了,而且他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宗教性的尊严(eine einzigartige religioes - sakrale Wuerde)。在这个独特的尊严的基础上,皇帝可以说他是西欧其他国王的元首,他有保护宗座和教会的权利和义务(advocatia ecclesiae),他必须保护教会不受外在和内在敌人的干扰,并且要尽力协助天国的发展和拓展——以和平的手段,但在某些条件下也需要用武力的手段。恢复皇帝的荣位也表达了另一个事实:西方基督宗教世界的统一性以及法兰克人的领导地位。这个行动又很符合各个基督宗教民族所怀着的“人间神国”(Idee vom Gottesstaat auf Erden)的思想——就是 Augustinus(奥古斯丁)和 Gregorius Magnus(大额我略/贵格利)的“天主/上帝之城”的思想——就是说,教宗是宗教元首,皇帝是世俗元首,他们以密切且和谐的合作要共同照顾人类在现世和来世的需要。当时的人认为,帝国是一个道德性和精神性的秩序(ein Reich der sittlichen und geistigen Ordnung),而在其中会有这样的理想条件,使“正义与和平(iustitia et pax)彼此拥抱”(参见《圣咏/诗篇》Ps 84: 11)。当然,在后来的时期中,具体的政治情况似乎很少达到了这样崇高的理想,因为这个理想的实现都取决于时代的情形以及取决于历代教宗和历代皇帝的人格和性格。一切属于人的因素都有很多缺陷,而且宗教和世俗的必然结合也会导致一些干扰,甚至会引起两个权柄的激烈冲突和搏斗。教宗和皇帝关于“帝制”(Kaisertum)的理解呈现出一些差别而且差距越来越大。虽然如此,这种“世界统治的二元论”(Dualismus der Weltregierung)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有生命力的,是创造性的。在好几百年的历史阶段中,“皇权”和“教权”(Imperium et Sacerdotium)是欧洲中世纪真正的“推动力”,是欧洲历史发展中的积极因素。

86.5 历史资料没有提供更多关于加冕典礼的动机的记载。查理曼的传记者 Eginhardus(艾因哈德,参见 *Vita Karoli*, M. c. 28)仅仅记载皇帝曾经说了一句话:如果他预先知道教宗要给他加冕,他那天就不会进教堂,虽然是圣诞节这样的大节日。如果说 Carolus(查理曼)完全没有想到加冕的可能性,这一点也似乎不能令人相信。所谓的 Lorsch Annalen(《洛尔施编年记》,见 MGSS I 38)好像有更多的资

料,它们说教宗和罗马人民预先决定,要那位已经统治罗马和意大利地区的法兰克王将来也被称为“皇帝”。从国家法的角度看,最关键的因素是罗马人对皇帝的选择(Kaiserwahl),而罗马人民在伯多禄/彼得大堂中对新皇帝的欢呼声(acclamatio)就表示这个因素的存在。对Leo(利奥)教宗来说,他显然首先需要有一个“最高法官”,所以他要Carolus(查理曼)镇压自己的(即教宗的)对手;根据罗马法的原则,只有皇帝能够审判这些人,能审判他们为“冒犯君主罪者”,这样才能恢复教会国中的秩序。因此,在圣伯多禄/彼得大堂中的典礼不是一个没有效果的“欢呼声”和“赞扬新王”的礼仪,而是具有深远政治意义的行动:当时的人认为,这个礼仪真正意味着西部帝制的恢复(renovatio imperii)。Carolus(查理曼)也早在801年在一个文件中自称为serenissimus Augustus a Deo coronatus ... Imperator, Romanum gubernans imperium(“由天主/上帝加冕的崇高的皇帝,统治罗马帝国的奥古斯都”)。根据Eginhardus(艾因哈德)的记载,Carolus(查理曼)不太高兴,但这一点也许是因为教宗的行动很独立——查理曼也得考虑到东方的皇帝!当时的查理曼正和东方的皇后Irene(伊任内,797-802年)进行着结婚谈判,而东方的皇帝(Michael I 弥格路/米迦勒一世)后来于812年才承认了他当Imperium occidentale(西方帝国)的元首。在教廷的圈子里有了这样的看法——这显然是根据第一个基督徒皇帝(即君士坦丁)对教宗的赠予形成的观点(参见85.3)——:教宗本来也有“皇帝的权柄”,所以教宗Leo(利奥三世)根据自己的权力主动地交给法兰克王皇帝的尊严。这些人还进一步解释说,希腊人和东方的皇帝由于“破坏圣像运动”而失去了当皇帝的尊严,所以罗马教宗将皇权“迁移”给法兰克王(所谓的“迁移理论”translatio)。

86.6 教宗的加冕意味着,Carolus Magnus(查理曼)在法律上成了拜占庭皇帝的继承人,因此对于罗马和教会国拥有某一种主权(Oberhoheit)。双方的权利的详细界定发生于824年:Ludovicus Pius(虔诚者路易)委派自己的儿子Lotharius(洛塔尔)与教宗签订了Constitutio Romana(《罗马规写》)。根据这份文献,皇帝拥有最高的法律权威,他也可以监督教宗的管理,但教宗在教会国中是国度的元首,在法律和管理有执行权。根据传统的教规,能够选举教宗的人是罗马人。然而,与先前东方皇帝一样——皇帝有某些参与的权利(参见第1卷,60.3)。这个权利的具体表现是“肯定当选的新教宗”的权利;虽然这种权利不是马上被施行的,也不是在每一个新教宗的选择后都有皇帝的“肯定”,但在后来的时期中一般都有这种“肯

定”。另外,当选的教宗应该先在皇帝的代表和在人民面前宣发“要忠于皇帝”的誓言。与皇帝的权利相对的是教宗的权利:教宗有权利给皇帝加冕并给他傅油。查理曼以后的两位皇帝先从自己父亲的手接受了王冠:Ludovicus Pius(虔诚者路易,813年)和Lotharius I(洛塔尔一世,817年),但两个人后来还是请教宗重新举行这个加冕礼:Stephanus IV(斯特凡努斯四世)于816年在Remi(兰斯)为Ludovicus(路易)加冕,而Paschalis I(帕斯卡里斯一世)教宗于823年在罗马为Lotharius(洛塔尔)加冕。这样,在第9世纪形成了这样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在整个中世纪都被尊重——即:唯独教宗能正当地给皇帝加冕,而最恰当的地点就是罗马的伯多禄/彼得大殿。在Ludovicus II(路易二世,872年)和Carolus II(卡洛卢斯二世,875年)的加冕礼上,这个原则已经非常清楚。

第9世纪的教宗。卡洛林王朝的衰落

历代教宗:Leo III(利奥/莱奥三世,795-816年);Stephanus IV(斯特凡努斯四世,816-817年);Paschalis I(帕斯卡里斯一世,817-824年);Eugenius II(尤金尼乌斯二世,824-827年);Valentinus(瓦伦提努斯,827年);Gregorius IV(额我略/贵格利四世,827-844年);Johannes(约翰内斯,844年,对立教宗);Sergius II(塞尔吉乌斯二世,844-847年);Leo IV(利奥/莱奥 847-855年);Benedictus III(本尼迪克三世,855-858年);Anastasius(阿纳斯塔修斯,855年,对立教宗);Nicolaus I(尼苛劳/尼哥拉一世,858-867年);Hadrianus II(哈德良二世,867-872年);Johannes VIII(约翰内斯八世,872-882年);Marinus I(马里努斯一世,882-884年);Hadrianus III(哈德良三世,884-885年);Stephanus V(斯特凡努斯五世,885-891年);Formosus(福尔摩苏斯,891-896年);Bonifatius VI(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六世,896年);Stephanus VI(斯特凡努斯六世,896-897年);Romanus(若马努斯,897年);Theodorus II(特欧多儒斯二世,897年);Johannes IX(约翰内斯九世,898-900年)。

87.1 Carolus(查理曼)的儿子 Ludovicus Pius(虔诚者路易,814-840年)在很多方面都不如他的父亲伟大。在他的时代,卡洛林王朝已经开始衰落。首先,他失

去了国度的统一。Ludovicus(路易)是一个性格善良的人,也很虔诚地支持教会,但在政治舞台上他太弱,缺少独立性,因此他无法保存父亲的遗产。他和自己的儿子们有长期的冲突。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儿子是 Lotharius(洛塔尔,他从 817 年以来是“同皇帝”Mitkaiser),Pippinus(丕平)和 Ludovicus Teutonicus(德意志人路易),他的第二个妻子是来自 Welfes(威尔夫贵族)的 Judith(犹迪特),她的儿子是 Carolus II Glaber(秃头的卡若卢斯二世)。这四个儿子也都想争夺自己的地盘,他们的争论带来了灾难,并在 843 年签订 Verdun(凡尔登)条约,其中规定把领土分为三块:东法兰克国(由 Ludovicus Teutonicus 路易 843 - 876 年管理),西法兰克国(由 Carolus II Glaber 卡若卢斯 843 - 877 年管理),以及“中法兰克国”和意大利(由 Lotharius I 洛塔尔一世 840 - 855 年管理)。当 Lotharius II(洛塔尔二世)于 869 年去世时, Ludovicus Teutonicus(德意志人路易)和 Carolus II Glaber(秃头的卡若卢斯二世)在 Meersena ad Maas(马斯河的梅尔西纳)签订了另一个条约(870 年)并分裂了“中法兰克国”。这就意味着,在 Alpes(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法兰克王国分裂为两半:一个罗曼的、法国的,一个格尔曼/日耳曼的、德国的(eine romanische und germanische, franzoesische und deutsche Haelfte)。

因为当时的教会和国度有很密切的联系,所以教会也因此变动遭受牵连,虽然在一开始的时候情况还没有太恶劣。因为法兰克人缺少了一些强大的领导者,罗马的宗座能够争取更大的独立性,能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其中一个有力的因素是在法兰克地区有一些严格遵守教会要求的主教,他们支持教宗的要求[比如 Lyon(里昂)的 Agobardus(阿格巴德)主教,Remi(兰斯)的 Ebo(厄博)主教,Orleans(奥尔良)的 Jonas(尤纳斯)主教]。这些主教根据 Gelasius I(葛拉西乌斯)教宗给东方的 Anastasius(阿纳斯塔修斯)皇帝写的信(494 年,参见第 1 卷 64.5 和下文 111.1)认为,教宗的宗教权柄和皇帝的世俗权柄是平等的,甚至说教宗的权柄是高于皇帝的权柄。但在另一方面,在那个时期没有出现一个能够全面领导西欧世界的皇帝,所以罗马宗座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保护者,因此无法对付意大利地区的小领导——这些小伯爵越来越多成为意大利的真正主人。这种发展为教宗职位的分配(即教宗的选任)和宗座管理造成很恶劣的后果。祸不单行——自从 8 世纪末、9 世纪初诺曼人的侵略(参见 81.4)和伊斯兰军的攻击(参见 84.1)变得很频繁,而因为没有强大的政治力量,西欧大部分地区无法抵抗那些侵略者。

87.2 Lotharius(洛塔尔)曾于 833 年邀请 Gregorius IV(额我略/贵格利,827 -

844年)来德国,他要求教宗在家族内部的冲突中充当调停者,但因为教宗比较倾向于 Lotharius(洛塔尔),所以他的介入毫无效果。在 Colmar(科尔马)的“谎言战场”,法兰克人的军队放弃了老父亲 Ludovicus(路易),所以儿子们弹劾了父亲并要求他作教会要求的补赎,但他于 835 年再次被宣布为统治者。这就是对皇帝的尊严的重大打击,当时似乎无法弥补。

在 Sergius II(塞尔吉乌斯二世)的时代(844 - 847 年),穆斯林军不仅劫掠意大利南部和 Sicilia(西西里),而且也侵略了罗马地区并劫掠圣伯多禄/彼得和圣保禄/保罗的大教堂(846 年)。为了预防将来再次发生这样的灾难,Leo IV(利奥四世)教宗(847 - 855 年)在 Vaticanus(梵蒂冈)周围建起围墙,他这样成为“利奥城”(Civitas Leonina)的创立者,就是 Tiber(台波河)以北的城区。罗马人与希腊人一起在 Ostia(奥斯提亚)的海战中打败了穆斯林军(849 年)。Leo(利奥)教宗于 850 年给 Ludovicus II(路易二世,意大利之王 844 - 875)——他是 Lotharius(洛塔尔)最大的儿子——傅油,立他为皇帝,但加冕礼是由 Hadrianus II(哈德良二世)在 872 年举行的。在 Leo(利奥)去世后,罗马的一个亲皇帝派想立 Anastasius Bibliothecarius(阿纳斯塔修斯)为教宗,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有雄心的司铎和枢机,但他无法达到目标,因为合法当选的人是 Benedictus III(本尼迪克三世,855 - 858 年)。

在这里也应该提到一个奇怪的传说,就是关于女教宗 Johanna(约翰纳)的传说。据说她是一个来自德国(Mainz 美因茨)或英国的女孩,以男人的服装去了 Athenae(雅典)读书,并在 Leo IV(利奥四世)和 Benedictus III(本尼迪克三世)之间当了教宗 2 年 7 个月之久(以 Johannes Anglicus“天使般的约翰内斯”为名号)。最后,她怀孕并在一次游行活动中生育,因此被发现为骗子。这个传说最早在 13 世纪中期在一些历史书中出现,不久后在一部很受欢迎的书中(Martin de Troppau OP = Martinus Polonus 的《教宗和皇帝编年史》,MGSS XXII, 428)被广泛地传播,而一直到第 16 世纪,人们似乎普遍地相信这个故事。中世纪末期的学者(比如 Ennea Silvio de Piccolomini = Pius II 比约二世)曾经对这个传说的真实性提出疑问,后来一位改革宗的神学家,荷兰的 David Blondel(布兰德尔)于 1649 年证明这个故事**的虚构性质**。这个故事的形成尚未清楚;关于东方(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有类似的故事,在第 10 世纪据说有一位女宗主教,也是虚构的传说。也许某些人误读了一些**旧的铭记**,或利用了另一个古老的传说题材:在男人隐修院有一个穿着男人衣服

的女人；也许那些在 10 世纪控制罗马宗座的一些无纪律的贵族妇女在民间引起了“女教宗”传说的形成。

87.3 Benedictus III(本尼迪克三世)的接班人是 Nicolaus I(尼苛劳/尼哥拉一世),他是一位来自罗马贵族家庭的人。毫无疑问,他在 Gregorius I(大额我略/贵格利,约 600 年)和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约 1080 年)之间是最伟大的教宗。他的任期仅仅是 9 年半,他的政策也并没有在各方面取得良好的效果,但他基本上已经为罗马宗座勾勒出一个角色,而在 11 世纪的改革运动中,罗马宗座其实获得他所瞄准的地位。在当时的人眼中,他是“第二个 Eliah(厄利亚)”,因为他“吩咐各地的国王和各种独裁者”(这是 Regino de Pruem 瑞格诺的话)。这位教宗拥有政治家的才干、良好的神学教育和法学知识、毅力和精力、清楚的法律概念、行动中的正义感及强烈的道德感。他的主要目标是确保教会的自由和独立性,拒绝外面世俗权威对教会内部事务的干涉,提高和强化宗座的地位。他怀着一些伟大的前任教宗——Leo I(利奥/莱奥一世)、Gelasius I(葛拉西乌斯一世)、Gregorius Magnus(大额我略/贵格利,参见第 1 卷 64.4,5,7)——的精神,并能够在教会内发挥教宗在精神上的领导权。在法兰克和拜占庭的统治者面前,他提高了教宗的政治地位。他很清楚地提出这样的要求:教宗在宗教和道德问题上对于世俗统治者拥有某种“指导”(directiva)的权柄。然而,他没有直接地介入世俗的政治事务。当他编写自己的重要文献时,早期的“对立教宗”(见上 87.2) Anastasius Bibliothecarius(阿纳斯塔修斯)充当他的秘书,但这个人只是顾问,对教宗的政策并没有发挥决定性的影响。他仅仅“借给”教宗自己的美妙文笔和在教父学方面的知识,这样为教会的思想论点提供支柱。

在 Nicolaus I(尼苛劳/尼哥拉一世)的任期内发生了一些变化和纷争,而在这些冲突中,教宗始终坚定地保卫了基督宗教的种种原则和罗马教会的首席权。Ludovicus II(路易二世,850-875 年)支持 Ravenna(拉文纳)的总主教 Johannes(约翰内斯),所以这个总主教向教宗提出了一些过分的要求。Nicolaus(尼苛劳/尼哥拉)抵抗了他并在一个罗马主教会议上能够克服这位总主教(861 年)。教宗还面对了法国的一位自高自大的总主教,就是 Remi(兰斯)的总主教 Hincmarus(安克马尔,845-882 年),他也是 Carolus II(卡若卢斯二世)的顾问;这位总主教在一次关于管辖权的争论中在一个教区会议上罢免了 Soissons(苏瓦松)的主教 Rothadius(若塔丢斯)——这是 862 年的事件。受害的主教向教宗求助,而教宗规定要重新

恢复 Rothadius(若塔丢斯)的主教职(863/864年);教宗在这里就相当清楚地提到了不久以前出现的 *Decretales Pseudo - Isidorianae*(《伪伊西多尔教令集》,见下 87.4)。教宗也保卫了基督教的婚姻法;Lotharius I(洛塔尔一世)第二个儿子是 Lotharingien(洛塔林格)的国王 Lotharius II(洛塔尔二世,855 - 869年),一位相当缺少纪律的人;他放弃了自己的妻子 Thietberge(提德贝格),因为她没有孩子;他想提升自己的情妇 Waldrade(瓦尔德拉得)为正式的妻子。他王国中的主教们也在一段时间内同意了国王这种作法,但教宗全心全力地保护了不幸女王的权利,因此他罢免了 Colonia(科隆)的总主教 Gunther(巩特尔)和 Trier(特里尔)的 Thietgaud(提特高德)总主教,因为他们和国王一样有罪。因为教宗说下一措施就是开除国王,Lotharius(洛塔尔)在外表上服从了教宗并再次接受了 Thietberge(提德贝格);然而,他的欲望仍然无法控制住,所以这个丑陋的婚姻纷争一直维持到国王在 Piacenza(皮亚琴察)死亡后(869年)。在那个时候当教宗的人是一位很老的和善良的,但也许态度上不够坚定的人,就是 Hadrianus II(哈德良二世,867 - 872年)。

最严厉的搏斗发生在 Nicolaus(尼苛劳/尼哥拉)与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之间。在东方的宗主教们 Ignatius(伊格纳提乌斯)和 Photius(佛提乌斯)和拥护他们的人之间发生了冲突,这就引起了教会的重大混乱(参见 93)。Nicolaus(尼苛劳/尼哥拉)教宗无法阻止拜占庭和罗马教会之间的分裂(虽然这是比较短期的分裂),而他的接班人也不能阻碍新皈依的保加利亚国脱离罗马的主教体系(参见 83.3)。关于两个“斯拉夫人的宗徒/使徒”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和 Methodius(美多迪乌斯)在摩拉维亚地区的活动以及关于“斯拉夫人的礼仪”的问题,请参见 83.2。

87.4 在当时代的伪造文献中,所谓的 *Decretales Pseudo - Isidorianae*(《伪伊西多尔教令集》)是一些在 9 世纪中期伪造的教会法方面的文献。这些文献的目标是支持法兰克王国中改革派的要求。这些文献大概来自 Remi(兰斯)总教区,成书时期在 845 年和 857 年之间。我们不知道编者是谁——也许有好几人编者——但他自称 Isidorus Mercator(“商人伊西多尔”),而后人认为这就是 Isidorus de Sevilla(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参见第 1 卷 78.4)。根据作者自己的说法,“伪伊西多尔”的目标是整理和编写那些分散的教会法资料(*canonum sententias colligere et uno in volumine redigere*),这样他想提高圣职人员和信徒的道德修养。这个愿望当然很好——作者要帮助建立法兰克国的教会、抵抗政治对教会的控制、确保教产,但他

用的方法——伪造某些文献——是应该被拒绝的。这个文集包括一些真实的古老资料,这些来自 *Collectio Hispana*(《西班牙文集》,参见第 1 卷 65.4) 记载的主教会议文献,但同时也包含着很多伪造的文献,比如 *Donatio Constantini*(《君士坦丁的赠予》,参见 85.3)。其中有一些自从 *Clemens I*(克雷孟一世)教宗到 *Melchisedechus*(梅尔基亚德)教宗(即公元 90 - 314 年)的 *decretales*(教宗的法令),其中有 60 篇是伪造的,而在第三个部分(据说是从 314 年到 731 年间的“教宗法令”)有 45 篇伪造的法令。伪造人的主要目标显然是保卫教会不受世俗力量的控制,并且协助主教们不受总主教们和教区会议的压力。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编者提高了罗马教宗的权柄,称他为 *caput totius orbis*(全世界的首长)。原来,法兰克王有权利召开主教会议及批准这些会议的决定,但“伪伊西多尔”规定,唯独教宗有权利召开主教会议。那些被控诉的主教们可以向教宗申诉。一切重大的事务(*causae maiores, id est causae episcoporum*, 重大事务,就是主教们的事务)都需要教宗作最后的决定。如果一些世俗法律的法规不符合教规或教宗的法令,它们就是无效的。这部著作中的新因素在一定的程度上在早期的文献中也有[比如参照 343 年 *Sardica*(撒迪卡)主教会议关于“申诉”的规定,文献第 3 - 5 条;参见第 1 卷 64.1],所以我们不能说,这部著作是一个“全新的教会法典”。在 *Cluny*(克吕尼)改革和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改革的时期,这部文集更被重视,对教宗地位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教宗们与这个文献集的形成没有什么关系。《伪伊西多尔教令集》获得迅速的传播——这一点意味着,它表达了当时的普遍态度。这个文集也被视为真的。只有在 15 世纪的学者(*Nicolaus Cusanus*; *Johannes de Torquemada OP*)开始怀疑这个文集的真实性。耶稣会会士 *Franciscus Torres*(托雷)于 1572 年仍然替它的真实性进行辩护,但属于 *Calvinus*(加尔文)派的荷兰人 *David Blondel* 于 1628 年证明该文集是伪造的。

87.5 在 *Nicolaus I*(尼苛劳/尼哥拉一世)的接班人后,教宗很快失去了原先的高水平并被牵入意大利那种越来越混乱的社会情况。*Johannes VIII*(约翰内斯八世,872 - 882 年)在毅力和才华方面相似前任的伟大教宗,但他的思想稍微世俗化一些,而且他无法控制东方的动荡(*Photius* 佛提乌斯的纷争,参见 93.3,4),又在西方遇到重大的困难。他两次为德意志皇帝举行加冕礼。当 *Ludovicus II*(路易二世)去世后,他于 875 年圣诞节给法国的 *Carolus II Glaber*(秃头的卡若卢斯二世)加冕(这是“依靠宗座的特权”*per apostolicae sedis privilegium*),虽然这个国王的哥

哥 Ludovicus Teutonicus(德意志人路易,876 年去世)更有权利获得皇帝的荣誉——他是在 Ludovicus Pius(虔诚者路易)的儿子们中最能干的人。在 Carolus II(卡若卢斯二世)去世后(877 年),教宗又于 881 年给 Suabia(施瓦比亚)的 Carolus III(卡若卢斯三世,号称“胖子”,881 - 887 年)加冕,他是 Ludovicus Teutonicus(德意志的路易)的最小的儿子,是 Alemannia(阿勒曼尼亚)和 Italia(意大利)的统治者。自从那个时代,教宗被视为唯一的“指定皇帝的人”;“选举”和“人民的欢呼声”再没有太大的重要性。然而,两个被加冕的皇帝都没有积极地帮助 Johannes VIII(约翰内斯八世)教宗。他面对穆斯林军的攻击——甚至被迫每年向穆斯林军纳税——以及面对意大利的一些贵族家庭。他于 878 年被迫逃往法国,但 Carolus II(卡若卢斯二世)的儿子 Ludovicus II Balbulus(结巴者路易二世,877 - 879 年)也没有更进一步地帮助教宗。在 885 年后,Carolus III(卡若卢斯三世)再一次统一了整个卡洛林家族的地区(除了 Niederburgund 下勃根第地区),但他无法抵御诺曼人,所以在 887 年在 Tribur(特瑞布尔)召开的王侯会议罢免了他;他在 888 年去世,并埋葬在 Reichenau(赖兴瑙)隐修院。Carolus Magnus(查理曼)的帝国从此分裂为五个部分:德国、法国、Hochburgund(上勃艮第)、Niederburgund(下勃艮第,即 Arelat)和意大利。Carolus III(卡若卢斯三世)的弟兄 Carolomannus(卡洛曼)的儿子 Arnulf de Carinthia(阿尔努夫,887 - 899 年)——一位很能干的公爵——被选为德国的国王。

87.6 据说有一个贪婪的亲戚暗杀了 Johannes VIII(约翰内斯八世)。他的接班人是 Marinus I(马瑞努斯一世,882 - 884 年),Hadrianus III(哈德良三世,884 - 885 年)和 Stephanus V(斯特凡努斯五世,885 - 891 年)。他们时代的环境和工作条件非常艰难。Friaul(弗里奥尔)的 Markgraf(边疆伯爵)Berengar(贝伦格尔)和 Spoleto(斯波雷托)的公爵 Wido(= Guido 维多)——他们两个都属于法兰克种族——想争夺意大利的统治权。Wido(维多,891 - 894 年)取得胜利,所以教宗 Stephanus(斯特凡努斯)被迫宣布他为皇帝,给他加冕。Formosus(福尔摩苏斯教宗,891 - 896 年)——他先前当 Porto(波尔托)的主教,后来在保加利亚进行传教(参见 83.3)——也曾经于 892 年给 Wido(维多)的儿子 Lambertus(兰贝图斯,892 - 898 年)加冕。由于 Spoleto(斯波雷托)派的强大压力,教宗呼吁德国的国王 Arnulf(阿尔努夫)帮助他抵抗那些“坏基督徒”。Arnulf(阿尔努夫)来了,攻克了罗马,于 896 年 2 月接受了皇帝的冠冕,但不久后患病,无法坚持德国人在意大利的控制。德国人再也没有办法帮助教宗,因为 Arnulf(阿尔努夫)的儿子才七岁(Ludovicus Puer 儿童

的路易,900 - 911)——他是最后的东法兰克国的卡洛林贵族人士。由于内部的斗争和匈牙利人的侵略,德国陷入一种困难的状态。

因为他给一个“北方的野蛮人”加冕,Formosus(福尔摩苏斯)教宗遭受了严厉的惩罚。他的接班人 Bonifatius VI(博尼法奇乌斯六世)仅仅在位两个星期。新的教宗是 Stephanus VI(斯特凡努斯六世,896 - 897年),他原来当过 Anagni(阿给尼)的主教,受了 Spoleto(斯波雷托)派的支持,并且激烈地反对法兰克人。他从坟墓中掘出 Formosus(福尔摩苏斯)的尸体,并在一个主教会议上审判了这个亡者。他们又宣布 Formosus(福尔摩苏斯)不是合法的教宗,因为他曾经与另一个主教替换了自己的主教座——一些古代的主教会议曾经禁止了这种作法(参见第1卷60.5)。他们也宣布 Formosus(福尔摩苏斯)教宗所举行的祝圣典礼是无效的。在一次暴动中,Stephanus(斯特凡努斯)却被杀,而一位长老,Romanus(若马努斯,897年)被拥立为教宗。Theodorus II(特欧多儒斯二世,897年)和 Johannes IX(约翰内斯九世,898 - 900年)想恢复 Formosus(福尔摩苏斯)的名声,所以他们毁灭了“尸体会议”的文献。根据 Lotharius(洛塔尔)于824年宣布的 Constitutio(《规定》),898年的一次罗马主教会议规定教宗选举的秩序:那些属于罗马地区的主教和罗马城的全部圣职人员要选定教宗,罗马元老院和罗马民众要赞同这个选择,而在他的祝圣典礼上要有皇帝的一些代表出席。

88

所谓的黑暗时期。意大利贵族统治下的教宗们。

萨克森人的皇帝和早期的法兰克人皇帝

历代教宗: Benedictus IV(本尼狄克四世,900 - 903年); Leo V(利奥五世,903年); Christophorus(克利斯托夫,903 - 904年); Sergius III(塞尔吉乌斯三世,904 - 911年); Anastasius III(阿纳斯塔修斯三世,911 - 913年); Lando(兰多,913 - 914年); Johannes X(约翰内斯十世,914 - 928年); Leo VI(利奥六世,928年); Stephanus VII(斯特凡努斯七世,929 - 931年); Johannes XI(约翰内斯十一世,931 - 935年); Leo VII(利奥七世,936 - 939年); Stephanus VIII(斯特凡努斯,939 - 942年); Marinus II(马瑞努斯二世,942 - 946年); Agapetus II(阿格佩图斯二世,

946 - 955 年); Johannes XII(约翰内斯十二世, 955 - 964 年); Leo VIII(利奥八世, 963 - 965 年); Benedictus V(本尼迪克五世, 964 年); Johannes XIII(约翰内斯十三世, 965 - 972 年); Benedictus VI(本尼迪克六世, 973 - 974 年); Bonifatius (Franco) VII(博尼法奇乌斯七世, 对立教宗, 974 年); Benedictus VII(本尼迪克七世, 974 - 983 年); Johannes XIV(约翰内斯十四世, 983 - 984 年); Bonifatius VII(博尼法奇乌斯七世, 984 - 985 年); Johannes XV(约翰内斯十五世, 985 - 996 年); Gregorius V(额我略/贵格利五世, 996 - 999 年); Johannes XVI(约翰内斯十六世, 对立教宗, 997 - 889); Silvester II(西尔维斯特二世, 999 - 1003 年); Johannes XVII(约翰内斯十七世, 1003 年); Johannes XVIII(约翰内斯十八世, 1003 - 1009 年); Sergius IV(塞尔吉乌斯四世, 1009 - 1012 年); Benedictus VIII(本尼迪克八世, 1032 - 1044 年); 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 对立教宗, 1012 年); Johannes XIX(约翰内斯十九世, 1024 - 1032 年); Benedictus IX(本尼迪克九世, 1032 - 1044 年); Silvester III(西尔维斯特三世, 1045 年); Gregorius VI(额我略/贵格利六世, 1045 - 1046 年); Clemens II(克雷孟/革利免二世, 1046 - 1047 年)。

88.1 罗马和西欧大部分地区的混乱状态没有改善, 甚至变得更恶劣。第 10 世纪被称为“黑暗的世纪”(saeculum obscurum, 原意“阴暗、无光明的时代”), 也被称“铁的时代”, 因为国度的秩序和文化都崩溃了, 尤其意大利和法国都陷入了一个充满暴力和粗鲁的状态, 各处发生暴行, 恐惧统治着人心。三个民族不断骚扰着西欧: Normanni(诺曼人)、Saraceni(撒拉森人 = 穆斯林军)和 Hungari(匈牙利人)。无数的城市和隐修院遭受劫掠, 很多地区完全变为荒凉的地区, 一切纪律和道德约束力都松散了。909 年在 Laon(拉昂)附近的 Trosly(托斯利)举行的主教会议说:“世界充满不洁和奸淫, 教堂被劫掠, 人们被杀害, 穷人被压迫。”教会的地产和隐修院的地产大部分落入贵族们的手中。西法兰克国中的教区在很多地方完全成为贵族人士的 Eigenkirchen(私有教堂, 参见 96.3; 97.2), 这些主教管区被赠予, 被购买, 被继承为家族的财产。那时也在相当多的地方出现了“平信徒主教”或“平信徒隐修院院长”。上层和下层的圣职人员都对于牧灵工作者的种种义务相当冷漠; 无知、贪婪、享乐主义、圣职买卖和无序充斥着很多圣职人员的生活。由于教宗失去了其保卫力量——皇帝, 所以陷入了意大利地区的激烈纷争, 成为几个罗马贵族的傀儡——这些贵族人士不管某人是否有资格当教宗, 只要是属于自己家族的人他们就支持他登上伯多禄/彼得的宝座。意大利和法国地区完全处于一种解体的状

态,但德国能够在 925 年后在萨克森家族的一些能干的统治者的领导下(919 - 1024 年)脱离无序的状态,并且也改进了教会的情况。德国的新王朝和皇帝制度的恢复对于被如此侮辱的罗马宗座也带来一些帮助。

88.2 一位很年轻的皇帝——Lambertus(兰贝图斯,898 年)——突然去世,所以 Benedictus VI(本尼迪克六世)教宗于 901 年给下勃艮第(Arelat, Provence 普罗旺斯)王 Ludovicus III(路易三世)加冕,宣布他为皇帝。但那个人不久后必须让步于 Friaul(弗里奥尔)的 Berengar(贝伦格尔)——他想单独统治意大利。Leo V(利奥五世,903 年)和 Christophorus(克利斯托夫,903 - 904 年)教宗都在监狱中去世。他们的任期不长。Sergius III(塞尔吉乌斯三世,904 - 911 年)早在 898 年就想登上宗徒的宝座,现在依赖于一个强大的罗马贵族党派。这个派别的元首是 Theophylactus(狄奥菲拉克图斯),他被称为“Dux, Magister militum, Consul et Senator Romanorum”(君主、将军、执政官和罗马人的元老);他的妻子 Theodora([老]狄奥多拉)和他的两个女儿 Marozia(马若基亚)和 Theodora([小]狄奥多拉)都是一些非常有才华但缺少纪律的妇女,她们在后来几十年中影响了罗马的发展和教宗的选举。然而,如果说这个历史阶段仅仅是“淫乱统治”或“妓女统治”(“Pornokratie”, “Hurenregiment”,这是新教神学家 V. E. Loescher 于 1704 年第一次提出的说法)——这也是夸大的说法。关于 Theophylactus(狄奥菲拉克图斯)和这些妇女的影响,有的当代历史学家赞扬他们,有的学者批评他们。Cremona(克雷莫纳)的主教 Liutprand(留特布兰德)在其著作 *Antapodosis*(《报复》)中的记载上有很大的偏向,并受“追求丑闻”的影响,所以只能很谨慎地看,虽然他的书是关于那段历史的主要资料。

在 Anastasius III(阿纳斯塔修斯三世,911 - 913 年)和 Lando(兰多,913 - 914 年)这些没有影响力的教宗后,Ravenna(拉文纳)的总主教 Johannes X(约翰内斯十世,914 - 928 年)通过“女元老”(Senatrix)Theodora([老]狄奥多拉)的影响被拥立为教宗。他于 915 年给 Friaul(弗里奥尔)的 Berengar(贝伦格尔,924 年去世)进行加冕礼,宣布他为皇帝。这个皇帝在一份文件中肯定罗马教会的种种权利和教会的地产。Johannes X(约翰内斯十世)能够在意大利各地的君侯和拜占庭之间达成一种协议,使他们共同抵抗穆斯林军,并于 915 年在 Gaeta(加埃塔)附近的 Garigliano(格利利亚诺)打败了阿拉伯人,当时教宗和 Theophylactus(狄奥菲拉克图斯)一起率领了罗马的军队。在内部,Johannes X(约翰内斯)教宗的政治也相当坚

强,但最后他无法抵抗 Marozia(马若基亚)第二个丈夫——Tuscia(托斯卡纳)的 Wido(= Guido 维多)公爵,教宗被捕,在监狱中去世。在 Leo VI(利奥六世,928年)和 Stephanus VII(斯特凡努斯七世,929-931年)后,充当“Senatrix et Patricia”(“女元老和元首”)的 Marozia(马若基亚)推举自己的儿子当教宗 Johannes XI(约翰内斯十一世,931-935年),并且要利用他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据说,这个儿子的父亲是 Sergius III 塞尔基乌斯教宗。)Marozia(马若基亚)再一次失去了丈夫,并于932年和那个狡猾的和放纵的 Hugo(胡格)——普罗旺斯和意大利之王(926-948年)——结婚。大概她希望,自己和丈夫都被冠为皇帝。然而,她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儿子 Albericus de Spoleto(斯波雷托的阿尔伯瑞克)在他们结婚那一天率领罗马人起义,他们驱逐了那个“骄傲的外地人”。现在 Albericus(II)(阿尔伯瑞克)自己以 Senator et Princeps omnium Romanorum(“一切罗马人的元老和首领”)的身份——似乎与一位国王一样——统治了罗马和教会国22年之久(932-954年)。他限制了自己的弟兄 Johannes XI(约翰内斯十一世)教宗,仅仅让他举行一些牧灵性的事务。他也同样限制了他后来推举的四位教宗:Leo VII(利奥七世,936-939年),Stephanus VIII(斯特凡努斯八世,939-942年),Marinus II(马瑞努斯二世,942-946年),Agapetus II(阿格佩图斯,946-955年)。这些教宗基本上都是很有尊严的、有资格的人(wuerdige Maenner),他们致力于提高罗马城和罗马地区的隐修院文化和纪律,而 Albericus(阿尔伯瑞克)及 Cluny(克吕尼)的杰出院长 Odilo(欧迪罗,参见101.3)也协助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罗马 Aventinus(阿文提努斯山)的玛利亚隐修院成为 Cluny(克吕尼)来的院长的居住地。临终时,Albericus(阿尔伯瑞克)王还要求罗马人发这样的誓:在现任教宗去世后,他们将会推举他17岁的儿子和继承人 Octavianus(屋大维)。在955年12月,事就这样成了。这个年轻的王侯——一个本来根本没有资格的人——当教宗 Johannes XII(约翰内斯十二世,955-964年)。他再一次结合了宗教权柄和世俗权力。他以“约翰内斯”代替了原名“屋大维”;这种“起新名”原来不是新任教宗的习惯,但自从10世纪末,这就成为一个习惯。继续某人的名字当然也意味着要继承他的政策。

88.3 在同样的时期,意大利的政治情况经历了深层的变化。德国国王结束了长期的“弱势状态”并且再一次开始向南部扩展自己的权力,再次提出“获得皇冠”的权利。来自萨克森民族的 Henricus I(亨利一世,919-936年)和他那位具有才华的儿子 Otto I Magnus(大奥托一世,936-973年)很成功地推动了德国的复兴。

他们为狭义上的“德意志国”(deutscher Staat)奠定了基础并在西方世界中提高了德国的权威和名望。他们首先对抗外来的攻击,并且保护和扩展德意志王国,而在这方面殖民政策和传教计划有了密切关系(参见丹麦的情况 81.2,波兰、波希米亚、匈牙利的情况 82.3-6)。在国内,他们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这一点也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教会的合作,因为各地的主教和隐修院院长接受了国王给予的地产(Reichsgueter),并且接受了公法上的权利,因而成为“邦君”(Reichsfuersten,参见 97.1),所以这些主教和院长在后来的时期中是国王的最好支撑者并形成了一个很有效的“衡重物”(Gegengewicht)来对付各地公爵的地方主义(Partikularismus der herzoglichen Gewalten)。在萨克森皇帝的时期有好几个杰出的德国主教,他们非常出色地完成了牧灵者和“邦君”的各种义务,比如 Otto(奥托)的弟兄 Colonia(科隆)的总主教 Bruno(布鲁诺,965 年去世),他同时也是 Lothringia(=Lorraine 洛林)地区的公爵。Bruno(布鲁诺/布汝诺)曾经是皇帝的明智顾问和忠实助手,帮助他保护和巩固国度。一些其他的杰出主教是 Augsburg(奥格斯堡)的主教 Ulricus(乌尔里克,973 年去世);Constantia(康斯坦茨)的主教 Conradus(康拉德,975 年去世)和 Gebhardus(格布哈德,995 年去世);Regensburg(雷根斯堡)的主教 Wolfgang(沃尔夫冈,994 年去世);Praga(布拉格)的总主教 Adalbertus(阿达尔伯特,997 年去世);Mainz(美因茨)的总主教 Willigis(维利格斯,1011 年去世)——他曾经当 Otto I(奥托一世)和 Otto II(奥托二世)的宰相;Hildesheim(希尔德斯海姆)的主教 Bernwardus(伯恩瓦尔德,1022 年去世)和 Godehard(格德哈德,1038 年去世);Worms(沃尔姆斯)的主教 Burchard(布克哈德,1025 年去世)。通过这些人的努力,德国的教会再次走向一种比较高的道德水平,在经济上也获得了良好的发展,而教育及学术走向繁荣(参见 89.5,6)。

88.4 在 Hugo(胡格)的儿子 Lotharius II de Italia(意大利王洛塔尔二世,948-950 年)去世后, Otto I(奥托一世)乘机介入意大利的政治——当时的意大利在社会和教会方面完全处于一种解体状态。Ivrea(伊夫瑞亚)的边疆伯爵 Berengar II(贝伦格尔)——他是 Berengar I(贝伦格尔)皇帝(参见 88.2)的孙子——实际上早就掌握政权,但于 950 年他拉拢人选他为意大利的国王,又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子 Adalbertus(阿达伯尔图斯)举行加冕礼。Lotharius(洛塔尔)的寡妇 Adelheid(阿德莱德),一位年轻的来自 Burgundia(勃艮第)的女子拒绝了向她求婚的 Adalbertus(阿达伯尔图斯),所以 Berengar(贝伦格尔)逮捕她,但她逃跑了并求 Otto(奥托)帮

助她。因此, Otto(奥托)于 951 年率军跨过 Alpes(阿尔卑斯山脉), 要求人们在 Pavia(帕维亚)奉他为“伦巴第人之王”, 并与 Adelheid(阿德莱德)结婚。因为当时的罗马统治者 Albericus de Spoleto(斯波雷托的阿尔伯瑞克, 954 年去世)反对, Otto(奥托)放弃原来的计划——即去罗马接受加冕为皇帝的计划。Otto(奥托)将意大利王国交给 Berengar(贝伦格尔), 这就等于把这块地当作德王给予意大利王的封地。然而, Verona - Friuli(维罗纳 - 弗留里)地区被归于 Bavaria(巴伐利亚)国。不过, 当 Otto(奥托)第二次去意大利时(961 - 965 年), 他结束了 Berengar(贝伦格尔)的统治(963 年)。引起这个行动的人是 Albericus(阿尔伯瑞克)的儿子——Johannes XII(约翰内斯十二世, 参见 88. 2)。他完全卷入于世俗的事务, 是一个不严肃的、放荡的人。他想恢复或扩展教会国, 因此 Berengar(贝伦格尔)向他施加压力。出于这种威胁, 他转向德国的国王并表示愿意给他皇帝之冠(960 年); 在罗马的改革派大概也劝他这样做。德国的 Otto(奥托)是一位有尊严、有勇气、有能力的人——他以 Carolus Magnus(查理曼)为榜样——带领庞大的军队到罗马, 他多年的梦想现在被实现了: 他与妻子 Adelheid(阿德莱德)在 962 年 2 月 2 日一起被加冕为皇帝; 在此之前, 他向教宗发誓说要保卫罗马教会的地产和种种权利。在加冕礼后, 教宗和罗马人发誓说要忠于皇帝, 永远不要支持 Berengar(贝伦格尔)和 Adalbertus(阿达伯尔图斯)。这样, Carolus Magnus(查理曼)的帝制——它从 924 年以来完全中断了——再次被恢复起来, 而且在将来几百年中, 皇帝的尊称也一直与德国国王联在一起。当然, 现在的皇帝的领土小多了, 因为法国地区不再属于他。这样就形成了(如同人们在 13 世纪以后所说的)“神圣罗马帝国”, 而在 1450 年以后, 历史学家还加上了“德意志”: (Sacrum Romanum Imperium nationis Germanicae)。无论是在 Carolus Magnus(查理曼)那里或在 Otto I(奥托一世)那里, 最关键的概念对他们来说都是保护基督信仰。德意志帝国也在 300 年的时期中忠信地完成了他的任务——这是一个在世界史上有重要意义的任务——保护教会, 保持西欧的和平和秩序。整个德国民族都以自然的信仰和自豪感扮演了这个角色。在那个于 962 年 2 月 13 日签订的著名文献(Pactum Ottonianum = Privilegium Ottonianum《奥托协议书》)中, Otto(奥托)肯定了 Pippinus(丕平)和 Carolus Magnus(查理曼)给教会的赠予(地区), 并根据 Lotharius(洛塔尔)的 Constitutio(《规定》)恢复了皇帝的主权(Hoheitsrechte), 这就包括: 教宗必须是根据教规合法选举的, 他在祝圣之前必须向皇帝宣发保持忠信的誓, 皇帝对于教廷的官员有最高的司法权

和监督权(参见 86.6)。

88.5 在 Otto(奥托)离开罗马后,不守信的 Johannes XII(约翰内斯十二世)教宗开始与 Berengar(贝伦格尔)、Adalbertus(阿达尔伯特)以及皇帝的其他敌人联系。因为 Otto(奥托)还听到一些关于教宗生活方式的丑闻,所以他于 963 年 11 月再次回到罗马去。他要求罗马人发誓将来不要推举任何没有 Otto(奥托)皇帝或皇帝儿子批准的教宗。皇帝在伯多禄/彼得大堂召开一个主教会议并在会议上审判了 Johannes XII(约翰内斯十二世)。由于一些严重的控诉(杀人、发虚誓、褻渎、圣职买卖、奸淫——但这些控诉大概是夸大的,不符合事实),教宗于 963 年 12 月 4 日被弹劾,而一个新的人——Leo VIII(利奥八世,963 - 965 年)被拥立为教宗,他原来是教宗的秘书(protoskrinarius“保存文献员”),是一位平信徒。这个人在一天内接受了所有的祝圣礼(执事、司铎、主教)并登上教宗的宝座。皇帝这种作法违背了一个有效的法律原则(即:没有人可以审判教宗);在 Leo III(利奥三世,参见 86.4)时这个原则被遵守,但在 963 年 Johannes(约翰内斯)教宗没有被审问,他无法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这个审判没有被普遍接受。在 Otto(奥托)离开了罗马之后, Johannes(约翰内斯)教宗返回罗马,且驱逐了 Leo VIII(利奥八世),并于 964 年自己召开了一个主教会议(部分主教是参与去年会议的人),但他的会议与上次的会议完全针锋相对:对于 Johannes(约翰内斯)的审判被取消,Leo VIII(利奥)被驱逐,他接受的圣品被宣布为无效。Johannes(约翰内斯)以残酷的手段镇压了他的敌人,但不久后便去世了。罗马人选举的人是一个很有资格的人,即 Benedictus V(本尼狄克五世,964 年),他是一位有学问的(当过 grammaticus 语文学教师)枢机执事。然而, Otto(奥托)皇帝第二次去罗马,于 964 年 6 月又恢复 Leo VIII(利奥八世)并将 Benedictus(本尼狄克)流放到 Hamburg(汉堡)——他在那里于 966 年去世。据说,Leo VIII(利奥)曾经写过这样的 bulla(诏书):皇帝和皇帝的继承人有权利提名一切主教,包括罗马的主教,但这个文献是在“任命权争论”时期(11 世纪)伪造的。在 Leo VIII(利奥八世)去世后(965 年),罗马人在皇帝的认同下选定了 Johannes de Narni(纳尼的约翰内斯)主教——他大概是 Theodora Minor([小]狄奥多拉)的儿子——为 Johannes XIII(约翰内斯十三世,965 - 972 年)教宗。然而,罗马的贵族派反对他并且不久后把他关入监狱。他逃走后,依靠自己亲戚的支持,再次登上教宗的宝座。Otto(奥托)皇帝第三次去意大利(966 - 972 年),他恢复罗马的秩序并严格镇压了那些叛徒。在他的保护下,教宗可以安心地工作。他给年轻

的 Otto II(奥托二世)于 967 年圣诞节举行加冕礼,后来(972 年)又给他的妻子 Theophanu(狄欧法努)——一个拜占庭公主——加冕。教宗和皇帝在 Ravenna(拉文纳)举行了两个主教会议(967 年和 968 年),其中规定,德国的 Magdeburg(马格德堡)将要成为总主教区——这个教区是 Otto(奥托)最喜欢的教区(参见 82.5)。另外,皇帝将 Ravenna(拉文纳)和周围的地区(原来是拜占庭的 exarchatus[领土])还给教宗——在相当长的时期教宗无法管理这些地区——,这样恢复了原来的教会国的范围。

88.6 德国的 Otto Magnus(大奥托)皇帝于 973 年去世,而在新的教宗 Benedictus VI(本尼迪克六世,973-974 年)的任期内罗马又陷入灾难性的暴动中,一直持续到 1000 年左右。暴力运动的领导者属于一个强大的贵族家庭,就是 Crescentii(克瑞申蒂)家族。这个家族的成员在未来的 40 年中多次统治了罗马。在 Crescentius de Theodora(狄奥多拉的儿子克瑞申蒂乌斯)的领导下,Benedictus VI(本尼迪克六世)的统治被推翻,且被投入监狱(后来在那里被杀)。一位很有雄心的枢机执事,Bonifatius Franco(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法兰克)——他是在罗马的希腊派的首领——被立为教宗,改名为 Bonifatius VII(博尼法奇乌斯七世,974 年),但在六周后,一位皇帝的使者驱逐了他。他逃到君士坦丁堡,并且带走圣伯多禄/彼得大堂的一些财宝。Crescentius(克瑞申蒂乌斯)在罗马进入一个隐修院,在那里去世。在 Otto II(奥托二世,973-983 年)皇帝的保护下,下一任教宗的任期相对平稳。Benedictus VII(本尼迪克七世——他也错误地被称为 Domnus II 或 Donus II)在 974-983 年间指导罗马教会。皇帝的计划是驱逐阿拉伯人,使他们离开意大利南部的 Apulia(阿普利亚)和 Calabria(卡拉布利亚)地区,但这个计划引起希腊人的反感(意大利南部在传统上都属于拜占庭的管辖)。皇帝的军队在 982 年 7 月在 Cape Colonna(科罗纳海角)的 Cotrone(克托内)遭受了毁灭性的攻击,而 28 岁的 Otto(奥托)皇帝于 983 年在罗马去世,其墓在伯多禄/彼得大堂。在临终前,皇帝还推动罗马人选定 Pavia(帕维亚)的主教 Petrus(伯多禄),就是 Johannes XIV(约翰内斯十四世,983-984 年)。然而,Bonifatius VII(博尼法奇乌斯七世)又于 984 年从君士坦丁堡回罗马并占据了宗座。他将他的对手 Johannes XIV(约翰内斯十四世)投入罗马的 Castel Sant' Angelo(罗马的圣安杰罗城堡),使他在那里饿死。在 985 年 7 月,这个“可怕的人”(monstrum horrendum)自己也突然去世(具体情况不明),怀着愤怒的罗马居民后来侮辱了他的尸体。

在 Johannes XV(约翰内斯十五世,985 - 996 年)的时代,号称 Numentanus(努门塔努斯)的 Crescentius II(克瑞申蒂乌斯二世)掌握着罗马的世俗权利。当皇帝的母亲 Theophanu(狄奥法努)于 989/990 年去罗马时,她代表了德皇——他的儿子 Otto(奥托)出生于 980 年;当时,Crescentius II(克瑞申蒂乌斯二世)这个罗马领导至少没有反对德国皇帝的权威性。然而,他的统治是一个独裁者的统治,所以教宗于 995 年邀请 Otto III(奥托三世,983 - 1002 年)来罗马帮助他——这个皇帝于 995 年被宣布为“成年人”,所以能够掌握政权。他于 996 年去意大利,但 Johannes XV(约翰内斯十五世)在同一年去世,所以罗马人请那位 16 岁的皇帝提名一个新的教宗。通过皇帝的决定,第一个德国人(但参见第 1 卷 60.3:Bonifatius II 本来是哥特人!)和第一个法国人当上教宗,这两个教宗都是杰出的、怀着改革思想的人物。然而,两人的任期太短,他们无法发挥长期的影响。第一个被皇帝提名的人是 24 岁的 Bruno de Carinthia(卡林提亚的布鲁诺),他是 Carolus Magnus(查理曼)的曾孙子,曾在王家的家庭圣堂当宫廷司铎。他改名为 Gregorius V(额我略/贵格利五世,996 - 999 年)并在 996 年 5 月给 Otto III(奥托三世)加冕,宣布他为皇帝。然而,在皇帝离开了罗马之后,Crescentius II(克瑞申蒂乌斯二世)再次夺取政权——在此之前,教宗曾经请皇帝宽免 Crescentius II(克瑞申蒂乌斯),所以他并没有遭受损失。Crescentius(克瑞申蒂乌斯)驱逐了 Gregorius V(额我略/贵格利)并拥立 Piacenza(皮亚琴察)的总主教 Johannes Philagathos(一位希腊人)为“对立教宗”,改名为 Johannes XVI(约翰内斯十六,997 - 998 年)。Otto(奥托)带回自己支持的教宗并在罗马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Johannes XVI(约翰内斯十六)被折磨,被弄瞎并被关入一所隐修院;Crescentius(克瑞申蒂乌斯)和其他的叛徒被斩首(在 Castel Sant' Angelo 安杰罗城堡)。根据 Otto III(奥托)的愿望,新的教宗是 Gerbert de Aurillac = Silvester II(西尔维斯特,999 - 1003 年),他原来是 Ravenna(拉文纳)的总主教,曾经是皇帝的老师和顾问,具有罕见的才华,在哲学、数学和天文学方面都有成就,因此有的人甚至说他是一个魔术师。他与皇帝的关系始终很友好,并且影响了皇帝的思想(inspirierte dessen Plaene)。Otto III(奥托三世)曾经在罗马的 Aventinus(阿文提努斯山)在教宗的旁边建立了自己的宫廷并享受类似于拜占庭宫廷的光荣(umgab sich mit allem Prunke byzantinischen Zeremoniells)。这位很有才华且信仰坚定的统治者在内心失去了平衡,他既要实现一些庞大的帝国主义的计划,又要追求极端的刻苦理想,想离开世俗的世界。Praga(布拉格)的主教 Adalbertus(阿达尔伯

特,参见 82.3,4) 和 Ravenna(拉文纳)的主教圣 Romualdus(若姆阿尔德,参见 101.4) 都是皇帝的朋友。皇帝的理想是重建罗马帝国(Resstitutio, Renovatio Imperii Romanorum),但他想建立一个基督宗教的体制,一些平等国度的联盟(共同体),并且应该是以罗马为中心,所以不受德国王的统治。怀着这种态度,他与 Silvester II(西尔维斯特)教宗一起创立了波兰的 Gnesnia(格涅兹诺)总教区(1000年,参见 82.4),又推动了 Stephanus I(斯特凡努斯)王在匈牙利创立 Gran(格兰)总教区(参见 82.6)。然而,他的普世性计划很早就崩溃了。罗马人于 1001 年 2 月发生的暴动迫使他 and Silvester(西尔维斯特)教宗一起离开罗马城。他很早在 Paterno(帕特诺)城堡(在 Soracte 索拉克特山附近)去世(1002 年 1 月 24 日),但他的墓在 Aachen(亚琛)的大教堂。Silvester II(西尔维斯特二世)教宗在 1003 年 5 月去世。

有的历史学家(比如 Cesare Baronio)曾经说,在 1000 年前后,人们都期待着 Antichristus(反基督)的到来或害怕“世界末日”的到来,因此社会生活处于瘫痪的状态。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在有的教会圈子里确实有末世论的精神状态,但在很多方面,这些因素恰恰促进了人们积极地建立教堂,进行传教,建立殖民地或推动宗教改革。

88.7 因为德国的国王在 1002 年后没有介入罗马的事务,所以当时的几个教宗重新遭受了一些罗马贵族的压力。那个于 998 年被斩首者的独裁者的儿子是 Johannes Crescentius III(约翰内斯·克瑞申蒂乌斯三世),他在 1003 年到 1012 年这段时期内掌握政权并控制当时的教宗们: Johannes XVII(约翰内斯十七世,1003 年), Johannes XVIII(约翰内斯十八世,1003 - 1009 年), Sergius IV(塞尔吉乌斯四世,1009 - 1012 年)。在 Crescentius(克瑞申蒂乌斯)去世后(1012 年), **Tusculani**(托斯库拉尼)的家族在罗马掌握政权。Albericus Tusculanus(阿尔伯瑞克)伯爵——他是 Theophylactus(狄奥菲拉克图斯)和 Theodora(狄奥多拉)的后裔——能够一连串地为三个属于他家族的人确保教宗的荣耀,两个是他的弟兄,第三个是他的儿子,但他们都是平信徒。第一个是 Theophylactus(狄奥菲拉克图斯),他取名为 **Benedictus VIII**(本尼迪克八世,1012 - 1024 年)。他的对手是 Crescentii(克瑞申蒂)的候选人 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这两个候选人都请德国国王 Henricus II Sanctus(“圣者”亨利二世,1002 - 1024 年)承认他们。Henricus II(亨利二世)原来是 Bavaria(巴伐利亚)的公爵,他是一个杰出的统治者, Eugenius III(尤金尼乌斯三世)教宗于 1146 年宣布他为圣人。在选举这位德国国王的过程当中,上层圣职人

员和 Mainz(美因茨)总主教 Willigis(维利格斯)的“投首票权”(Erststimmrecht)有了重大的影响。Henricus(亨利)有良好的修养,又有深切的信仰。他建立了好几个教堂或给予他们一些地产。他很关心圣职人员和隐修院纪律的恢复,想协助 Cluny(克吕尼)的改革(参见 101.3)。与此同时,他也确保了一些传统的任命权,比如在提名主教或隐修院院长的权利(参见 97.2)。他也严格控制德国教会的领导者(hielt die deutschen Praelaten in strenger Abhaengigkeit)。在两个教宗候选人的争论中,他支持 Benedictus VIII(本尼迪克八世),被邀请去罗马,并在 1014 年 2 月 14 日在罗马与妻子 Cunegundis(库尼贡德)一起从 Benedictus(本尼迪克)教宗的手中接受了皇帝的冠冕。这位教宗虽然是一个比较世俗化的人,但他并没有忘记教会方面的种种任务。他很成功地抵抗了穆斯林军,并且从他们手中夺回了 Sardinia(撒丁岛)。他与皇帝一起强调那些反对司铎结婚的传统教规,又反对那些浪费教会财产的人。他于 1020 年到 Bamberg(班贝格)探访 Henricus(亨利)——Bamberg(班贝格)是亨利最喜欢的教区。教宗与皇帝一起于 1022 年在 Pavia(帕维亚)举行了一个很大的改革主教会议(Reformsynode)。会议的文献尤其反对那些违背独身制的司铎们。主教们规定:如果一个司铎结婚,他就被撤职。

Benedictus VIII(本尼迪克八世)的继承人是他的弟兄,是号称 Consul, Dux et Senator(执政官,领导和元老)的 Romanus(若马努斯),他改名为 Johannes XIX(约翰内斯十九世,1024 - 1032 年)。他不是很有资格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很慷慨地送给某些人钱。他在 1027 年的复活节给 Conradus II(康拉德二世,1024 - 1039 年)加冕——这是第一个来自 Franci(法兰克)或 Sali(萨利)家族的统治者(萨利就是法兰克人的主要支派,而萨利的统治维持从 1024 到 1125 年)。Conradus(康拉德)有杰出的才华和精力,他在巩固德国王国方面很有贡献,但在推动教会改革方面,他不如前任皇帝,也不如他的接班人。在分配一些教区的时候,他甚至进行圣职买卖,而且他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改进在罗马那些不理想的情况。在 Johannes XIX(约翰内斯十九世)去世后,在罗马的 Tusculani(托斯库拉尼)派又把自己的亲戚推上教宗宝座,而 18 岁的 Theophylactus(狄奥菲拉克图斯),他是刚刚去世的 Johannes(约翰内斯)的侄子,取名 Benedictus IX(本尼迪克九世,1032 - 1044 年)。他是一个不严肃的、无纪律的人,所以他那种无耻的行为在 1044 年引起了罗马人的暴动。因此,罗马人选择 Sabina(撒比纳)的主教 Johannes(约翰内斯)作为教宗,改名为 Silvester III(西尔维斯特三世,1045 年)。在七个星期后,

Benedictus(本尼狄克)再次上台,驱逐他的对手,但罗马人拒不接受他,所以他在1045年春天把教宗的尊位交给自己的 patronus(主保) Johannes Gratianus(改名为 Gregorius VI, 1045 - 1046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的主保给了 Johannes(约翰内斯) 1000斤白银。这位 Gregorius VI(额我略/贵格利六世)是一个总长老(archipresbyter),他有威望,与教会改革者的圈子也有良好的关系,他当教宗的目的主要是解放教会不受一个完全没有资格的人的控制,但他的方式(圣职买卖!)仍然受到很多人的批评,所以那些比较严肃的人认为,应该再次选任一个教宗。通过德国国王 Henricus III(亨利三世, 1039 - 1056年),这个混乱的局面逐渐被澄清。他是最好且最能干的德国统治者之一,而在他的任期内,国王和皇帝的权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他和 Henricus II(亨利二世)一样保持国王对于德国教会的特权(任命权),但他选择的主教和院长都是在灵修上有资格的人。国王自己很严肃,有很深的信仰,也深信帝国的制度是一个充满神圣使命的制度。他诚心支持教会,并且因为他的第二个妻子 Agnes de Poitou - Burgund(阿格内斯, 1043年后)与 Cluny(克吕尼)的改革有联系,所以又热心地支持了这个改革。Cluny(克吕尼)的院长 Hugo Magnus(大胡格)成为他儿子 Henricus IV(亨利四世)的代父(“教父”, 1050年)。Henricus III(亨利三世)也支持在德国地区的“神的和平”(Treuga Dei)运动(参见 102.2)。为了确保德国在意大利的地位以及为了处理当时的两个教宗的对立局面,他于 1046 年去罗马。他在 Sutri(苏特里)召开并主持了一个主教会议,其中在 1046 年 12 月 20 日弹劾了 Silvester III(西尔维斯特三世)和 Gregorius VI(额我略/贵格利六世),第一个被关进一所隐修院,而 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他自己也谴责了自己的行为——被流放到 Colonia(科隆)。一位年轻的罗马圣职人员——Hildebrand(希尔德布兰德,后来的 Gregorius VII 额我略/贵格利七世)陪同他到德国去。另一个在罗马伯多禄/彼得大堂举行的会议(12月23/24日)弹劾了 Benedictus IX(本尼狄克九世)。此后,主教们、圣职人员和罗马人选定了 Henricus(亨利)所提名的 Bamberg(班贝格)的主教 Suidger(苏伊格尔),改名为 Clemens II(克雷孟/革利免二世, 1046 - 1047年),在圣诞节被祝圣为罗马的主教。这位教宗也马上给德国国王和他的妻子举行了加冕礼。当时的罗马人交给 Henricus(亨利)皇帝将来提名教宗的权利,而皇帝后来施用了这个权利几次,并且没有人反对他这样做。由此可见,德意志 - 罗马皇帝获得了一种能够控制教宗的权利——他的权利范围甚至超过了 Carolus Magnus(查理曼)时代的权利。

第三章 教会的教育和著作。

各种神学争论、异端和分裂。希腊教会 和拉丁教会的分裂

89

西部教会的教育和著作

89.1 那些新皈依信仰的格尔曼/日耳曼部落无法马上做出一些学术上的成就;他们先必须受教育,而这种教育自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教育的任务首先属于教会,而教会也以不懈的热忱投入到这份工作中,并且获得良好的成果。在早期中世纪的时代,各地的隐修院承担了大部的教育工作。因此,中世纪的教育工作在很大的程度上有教会的特征:教育的指导者和监督者是圣职人员;高级教育的语言和学者的语言是拉丁语。教育制度与古罗马晚期的教育制度很相似。学生先学习最基本的知识(所谓的 *elementa*, 比如 ABC),接着研究“七个自由学科”(*septem artes liberales*);它们分为两块:先有三个语言科(所谓的 *Trivium*): *grammatica* (语文学、语法)、 *rhetorica* (修辞学)、 *dialectica* (包括逻辑学和辩论术);后有四个和数学有关的学科(所谓的 *Quadrivium*): *arithmetica* (算术学)、 *geometria* (几何学)、 *astronomia* (天文学)、 *musica* (音乐)。第一个学科(语文学、语法)包括阅读一些古典的著作和教父的著作。当时的神学教育的主要目标是理解《圣经》,并掌握那些具体牧灵工作所需要的知识。遗憾的是,中世纪的教育普遍地不够重视圣职人员的灵修教育和克修训练(*eigentlich geistliche Erziehung und asketische Schulung*),这就导致了很多不理想的情况的出现。

802 年在 Aachen(亚琛)召开的主教会议要求圣职人员都必须掌握宗徒/使徒

的信经和所谓的“*Athanasius*(阿大那修斯)的信经”、“天主经/主祷文”(包括其解释)、圣事礼仪经文(*sacramentarium*)以及读经本(*comes, lectionarium*, 参见第1卷67.1,3)、弥撒的固定经文(*canon missae*)、驱魔经文、“我把灵魂交给上主”的经文(*commendatio animae*)、告解书(*poenitentiale*, 参见99.2)、计算教会庆节的书(*computus*)、教父们的讲道文献(作为讲道的楷模,参见98.4)以及罗马圣歌的书(参见98.5)。后来在 Fulda(富尔达)当院长的 *Rabanus Maurus*(拉班努)在他的著作 *De institutione clericorum*(《论圣职人员的教育》,819年)中提供了一个教育制度,其中将重点放在理解《圣经》——根据其历史意义、神秘意义和道德意义解释经文——以及在讲道的能力上。上面的要求相当高,大概需要有良好的学习条件才能够满足这些要求;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有机会上大堂的学校、隐修院的学校或(后来)大学。大部分的圣职人员——尤其是乡下的圣职人员——满足于一种比较基本的、具体适用的知识,就是那种本堂神父的助手在礼仪中所需要的知识。这种情况基本上在整个中世纪都是这样。

89.2 英国的学者最早产生了一些高水平的神学著作。*Vitalianus*(维塔利亚努斯)教宗曾派遣了 *Theodorus*(特奥多尔)与 *Hadrianus*(哈德良)到英国,吩咐他们要注意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教育;*Theodorus*(特奥多尔)是一位生于 *Tarsus*(塔尔苏斯)的希腊人,他很有学问,后来成为 *Canterbury*(坎特伯雷)的总主教,而 *Hadrianus*(哈德良)是一位意大利一所隐修院的院长。不久后,在英国本地出现了一些新的人才。在 *Canterbury*(坎特伯雷)和 *York*(约克)的大堂学校以及在某些本笃会的隐修院中形成了一些杰出的学校。在圣 *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的时代(约700-750年),英国的女修院也已经呈现出教育方面的高度。*Malmsbury*(马尔梅斯堡)的院长 *Aldhelmus*(阿尔德海姆,650-709年)成为“盎格鲁-拉丁文学之父”。平信徒隐修者 *Caedmon*(凯德蒙,630-680年)用盎格鲁-撒克逊的语言来表达《圣经》的一些题材。卡洛林文艺复兴(*karolingische Renaissance*)的先锋者是一位很虔诚的隐修士:***Beda Venerabilis***(“可敬的”比德/伯达/贝达,约673-735年),他是一个很安静的学者,在 *Jarrow*(雅弱)隐修院是一个不懈怠的老师。他的著作很多,而他的书表明,他掌握着那个时代的一切知识;在中世纪的神学传统中,他算为一个很重要的权威。他最有名的著作是 *Historia Ecclesiastica gentis Anglorum*(《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教会史》,这部著作也是英国人的民族史,是唯一的包含早期英国史料的著作)。*Beda*(比德/伯达/贝达)的圣经注解和讲道稿对后人都产生

了相当大的影响。8 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盎格鲁 - 撒克逊学者是来自 Northumbria (诺森伯兰) 的 Alchvin 或 Alcuinus (阿尔库因, 730 - 804 年), 他曾经当过 York (约克) 大堂学校的校长, 后来在法兰克人的王国那里发挥了他的才华 (参见下文 89.3)。然而, 由于丹麦人的侵略所造成的毁灭, 英国和爱尔兰地区的学术和教育在第 9 世纪陷入了彻底的衰落中。英国的国王 Alfredus Magnus (阿尔弗烈德, 871 - 901 年) 曾经保卫了祖国, 创立了英国的君主制度, 又热诚地支持教育和学习。他提供比较好的条件, 恢复各地的教堂、隐修院和学校, 且亲自翻译了 Boethius (波伊提乌斯, 476 - 524 年) 和 Orosius (奥罗修斯, 390 - 440 年) 的一些著作, 还翻译了 Gregorius Magnus (大额我略/贵格利) 的著作 *Regula Pastoralis* (《牧民守则》), 将这些拉丁语的书译成盎格鲁 - 撒克逊语。

89.3 在法兰克王国中, Carolus Magnus (查理曼) 的时代带来了第一个“精神春光” (Geistesfruehling) ——这个国王很同情地培养及保护人间一切美丽和伟大的事。他不仅仅愿意努力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 (reges Bildungsstreben fuer seine Person), 且也慷慨地和有远见地为提高圣职人员和民众的教育水平而工作——他认为, 教育是国度和教会的主要任务之一。他的第一个 *Capitulare* (《法令集》) 早已要求“悬挂”那些缺乏教育的司铎, 而如果他们不愿意改进, 就要罢免他们, 因为“那些不知道天主/上帝法律的人也不能向别人宣布它”。查理曼还采取一系列的积极措施来补充这个规定: 一切主教大堂和隐修院都需要建立学校 (Admonitio generalis《普遍劝令》789 年); 这些学校的首要目标是培养一些人当圣职人员或隐修者, 但为平信徒也有益。在部分隐修院里有两种学校: 一个“内部学校” (schola interior) 负责年轻隐修士 (“奉献给修院者”, oblati) 的教育, 和一个“外部学校”或“公学” (schola exterior 或 schola publica) ——这个“外部学校”培养教区的司铎和平信徒。乡间的司铎也被要求为男童创办一些学校 (这是 Mainz 美因茨主教会议于 813 年规定的), 但这一条只能在非常好的条件下实现。那些将被祝圣为司铎的候选人应该在祝圣之前经过一个考试来确认他们的教育水平 (803 年的 *capitulare* 《法令》)。Carolus Magnus (查理曼) 意识到, 在法兰克王国内没有几个学者, 所以他从各国 (尤其从英国和意大利) 邀请一些重要的人才——学者、诗人、艺术家——来到他的宫廷, 并要他们形成一种“学者的学院”。这些学者的带头人是 York (约克) 的 Alcuinus (阿尔库因, 参见上文 89.2), 他成为法兰克王的顾问, 似乎可以说成为一个“教育部部长”、宫廷学校的校长和 Tours (图尔) 的 Martinskloster (圣马丁

隐修院)的院长。他的主要著作 *De trinitate libri tres* (《论三位一体》3卷)根据 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思想讨论基督信仰的基本教导。其他的应该被提到的人是这些:一位伦巴第人 Paulus Diaconus(保禄/保罗,799年去世),他原来在 Monte Cassino(卡西诺山隐修院)修道,后来到了查理曼的朝廷;他写过一部很受欢迎的 *Homiliarium* (《讲道集》,参见 98.4)以及编写了自己民族(伦巴第人)的历史 (*Historia Langobardorum*《伦巴第人历史》); Petrus de Pisa(比萨的伯多禄,799年之前去世)和 Paulinus de Aquileia(阿奎雷亚的保利努斯,802年去世,身为 Aquileia 的宗主教)是两位来自意大利的 *grammatista*(语文学专家)。Theodulfus(特欧多夫)是一位来自西班牙的哥特人,他后来成为 Orleans(奥尔良)的主教(821年去世),写过优秀的诗。来自 Main(美因河)的法兰克地区的 Eginhardus(= Einhard 艾因哈德,840年去世)是一个有艺术灵感的人,他是平信徒,结婚了,但仍然成为 Seligenstadt am Main(美因河的色里根施塔德)隐修院的院长;他曾经根据 Suetonius(苏埃托尼乌斯)的模式写下了 Carolus Magnus(查理曼)的传记(书名为 *Vita Karoli Magni*《查理曼传》,参见 86.1)。Eginhardus(艾因哈德)也曾经建立了一些相当出名的教堂(参见 98.6)。全国中最杰出的教育机构是早一些建立的 Schola palatina(宫廷学校)——它首先培养了一些高级官员和教会的高级领导,还有 Tours(图尔)隐修院的神学院;后来很多别的隐修院都模仿了 Tours(图尔)隐修院的制度,比如 Fulda(富尔达)隐修院、Reichenau(赖兴瑙)隐修院、St. Gallen(圣伽伦)隐修院、Corbie(科尔比)隐修院、Corvey(科尔维)隐修院、Werden(维尔登)隐修院等。

法兰克王国中的精神生活很活跃,而且众多新的著作支持了这种精神生活,尤其在神学的领域中。在9世纪中,当法兰克人的政治情况走下坡路时,这些学术活动还能继续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当时的学术努力主要意味着学习古代的著作和教父的书(尤其是 Gregorius Magnus 大额我略/贵格利和 Augustinus 奥古斯丁),这样就有“回顾”和“模仿”的特征,比较缺乏独立性和原创性。格尔曼/日耳曼民族的因素似乎不明显。虽然存在着这些缺点,但所谓的“卡洛林文艺复兴”以及后来的“奥托王朝文艺复兴”(karolingische und ottonische Renaissance)都算为早期中世纪最美丽的成果之一。这些复兴运动都表明,格尔曼/日耳曼民族的精神和古代-基督宗教的精神结合了。

89.4 参与这次文艺复兴运动的学者大部分能够从记载当时神学争论的文献中得到认识(参见 90; 92.3,5),比如 Fulda(富尔达)隐修院的 Gottschalk(格特沙尔

克)、Lyon(里昂)的总主教 Agobardus(阿格巴德,840 年去世,PL 104[= 拉丁教父文集第 104 卷])与 Hincmarus(安克马尔,882 年去世,PL 125 - 126)——这两个总主教都是重要的教会政治家和作者,Corbie(科尔比)隐修院的 Paschasius Radbertus(帕斯卡修斯·瑞德贝图斯,856 年去世,PL 120),与 Corbie(科尔比)隐修院的修士 Rathramnus(拉特兰努斯,约在 868 年去世,PL 121)。

德国 Fulda(富尔达)隐修院的院长 Rabanus Maurus(= Hrabanus 拉班努,856 年去世)后来成为 Mainz(美因茨)的总主教(847 年),他是 Alcuinus(阿尔库因)的学生,一位非常勤奋的学者和具有影响力的老师(其尊称是 Praeceptor Germaniae 德国的老师)。他的著作(PL 107 - 112)很多,尤其受欢迎的是他对《圣经》写的注解(没有独立的研究,大部分是抄录),一部很厚的 *De universo*(《论宇宙》,即根据 Isidorus 的《语源学》编写的百科全书),以及一部 *De institutione clericorum*(《论圣职人员的教育和任务》,参见上文 89.1)。

Hilduinus(赫尔都因,840 年去世)是 Alcuinus(阿尔库因)的学生,曾经任 St. Denis(圣德尼)隐修院的院长和 Ludovicus Pius(虔诚者路易)的宫廷神父,他是一位编年史家(历史学家),也是第一次将 Pseudo - Dionysius Arcopagita(伪丢尼修斯)的著作译成拉丁语的人(参见第 1 卷,77.1)。

Haimo(海莫,853 年去世)是 Alcuinus(阿尔库因)的学生,教会历史学家(参见第 1 卷 4.3),圣经诠释学家(PL 116 - 118),后来成为 Halberstadt(哈尔伯施塔德)的主教。

Amalarius(阿马拉留斯,约于 850 年去世)成为 Metz(梅斯)的主教,他的著作 *De ecclesiasticis officiis*(《论教会的种种职务》)使他成为中世纪的象征性礼仪学的创始人(Begründer der mittelalterlichen allegorischen Liturgik),因为他对感恩祭等礼仪中的细节作了详细的比喻性解释。

Walafrid Strabo(瓦拉夫瑞德,849 年去世)原来是 Rabanus Maurus(拉班努)的学生,他成为 Carolus Glaber(秃头卡若卢斯)的老师,在 Reichenau(赖兴瑙)隐修院当老师和院长(著作参见 PL 113 - 114)。他既是诗人,又是圣经学家(被归于他的 *Glossa ordinaria*《一般的注解》一直到 14 世纪是最通用的圣经注解手册,但大概不是他写的),既是圣人传作家(Hagiograph),又是礼仪学家(*Liber de exordiis* 等著作)。

Severus Lupus(塞维卢斯·卢普斯,826 年后去世)当 Ferrieres(弗列)隐修院的

院长。他原来是 Rabanus (拉班努) 的学生, 在“预定论”方面写过 *De tribus quaestionibus* (《论三个问题》), 因此站在 Rathramnus (拉特兰努斯) 一边 (参见 90.4), 但他也写过一些圣人的传记以及 132 封提供当代重要史料的信 (参见 PL 119)。

Aeneas de Paris (巴黎的艾内亚斯, 870 年去世) 与 Rathramnus (拉特兰努斯) 一样也替拉丁教会辩护, 以对付 Photius (佛提乌斯) 宗主教的攻击 (参见 PL 121)。

Ado (阿多, 875 年去世) 曾是 Vienne (维恩) 的总主教, 他编写了一部世界史和一本很受欢迎的 *Martyrologium* (《殉道者列传》; 参见 PL 123)。

罗马的 Anastasius Bibliothecarius (阿纳斯塔修斯, 约 879 年去世) 曾经是“对立教宗” (855 年), 后来成为 Nicolaus I (尼苛劳/尼哥拉一世) 的秘书和罗马教会的图书馆馆长; 他虽有学问, 文笔好, 但没有平衡的态度, 思想不安宁。他的贡献主要在于翻译工作: 他将第 7、9 届大公会议的希腊文献译成拉丁语。

在第 9 世纪的学术界中最奇怪的和最重要的现象无疑是一个爱尔兰人, 即 Johannes Scotus (或 Ioannes Eriugena 艾利基纳, 877 年以后去世), 他曾是 Carolus Glaber (秃头的卡若卢斯) 建立的宫廷学校的校长。他是一位敏锐的和具有灵感的思想家, 在他的主要著作 *De divisione naturae* (《论自然的区分》, 5 卷) 中, 他创造了一个哲学和神学体系, 一方面利用很多新柏拉图主义的因素, 但另一方面又想削弱这种思想的泛神论倾向。然而, 通过他那种“灵性主义的解释” (spiritualistische Auffassung), 使他对于感恩祭的看法陷入严重的错误中 (参见 90.5)。因为他翻译了 Pseudo-Dionysius (伪丢尼修斯) 和 Maximus Confessor (马克西姆斯) 的一些著作, 他也对中世纪的神秘主义神学 (Mystik) 有了重要的影响。不过, 称他为“经院哲学/神学之父” (Vater der Scholastik) 是一种太夸大的说法 (德国学者 Staudenmaier 的主张, 他曾提出这种夸大的理论)。

在一种很漫长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德国的和德语的文学传统, 这个传统用人民的语言和诗歌的形式来表达宗教的内容。尤其重要的是 *Heliand* (《救世主》), 这是一部古萨克森语的“基督史诗” (Christusepos)。这部著作可能写在 Werden (维尔登) 隐修院, 约于 822 - 850 年间; 作者利用了 Tatianus (塔提安) 的 *Diatessaron* (《四部福音合编》) 以及一些对于福音的注解书, 将《圣经》中的资料引入格尔曼/日耳曼人的表达方式 (参见 81.1)。来自 Rabanus (拉班努) 的 Fulda (富尔达) 传统的隐修士 Otfried de Weissenburg (奥特弗里德, 约 800 - 870 年) 大约在 868 年创造

了一部有韵律的 *Liber evangeliorum* (《福音合编》), 是一部很有吸引力的著作, 以 rheinfraenkischer Mundart (莱茵-法兰克方言) 写成。在那些比较小的文献中应该提到的是 *Wessobrunner Gebet* (《维索布伦的祈祷》) 以及 *Muspilli* (《穆斯皮利》, 其中描述世界的末日)。

89.5 第 10 世纪基本上在学术和教育方面是一个水平不高的时代, 但也有一些优秀的成果。个别的学校或人物表现出对科学的热心追求。在德国的地区甚至可以看到一种“文艺复兴”, 即 *Ottonische Renaissance* (奥托朝代的文艺复兴), 这个复兴用古典的“外衣”表达出德国人的灵感。Otto Magnus (奥托大帝) 的弟兄 Bruno (布鲁诺, 去世于 965 年)——他是 Colonia (科隆) 的总主教——很努力培养了“七个自由学科”。在隐修院中占有领先地位的是 St. Gallen (圣伽伦), 它在第 10 世纪进入了旺盛时期。Notker Balbulus (诺特克尔, 840 - 912 年) 是一位著名的诗人, 他创造了很多很有灵感的圣诗和 *sequentiae* (对经经文) 或一些短的散文; 他也编写了一个通俗的 *Gesta Caroli Magni* (《查理曼言行录》)。他的学生是那位很有权威的 Salomo III (萨罗莫三世, 890 - 920 年) 院长, 他也是 Constantia (康斯坦茨) 的主教。不久后, 在 St. Gallen (圣伽伦) 工作的学者和诗人还有 Ekkehard I (艾克哈德一世, 973 年去世) 与 Ekkehard II (艾克哈德二世, 990 年去世), 他们两个也写过圣诗和对经经文, 但大概不是 *Waltharilied* (《瓦尔特之歌》) 的作者, 以及 Notker Physicus (诺特克尔·弗西库斯, 975 年去世) 和 Notker Labeo (= Notker Teutonicus 诺特克尔·拉贝欧, 1022 年去世)。后者曾经是一位很受欢迎的老师, 他对德语的发展很有贡献, 因为他第一次很巧妙地用德语来翻译一些学术性的著作 (翻译了拉丁语的非神学性的和神学的著作), 在教学时也用德语。

在 Eifel (艾费尔) 地区的 Pruem (普若姆) 隐修院的院长 Regino (瑞格诺, 915 年去世) 编写了一部相当有价值的 *Chronica* (《历史书》) 以及一部关于主教如何进行视察和巡逻法庭 (Sendgericht) 的手册 (*Libri duo de synodalibus causis et disciplinis ecclesiasticis* 《论巡逻法庭的案件和教会的纪律》, 二卷)。

在当时的 Remi (兰斯) 有一位很杰出的历史学家, Flodoardus (弗罗多阿德, 966 年去世, 参见 PL 135) 以及那位在很多方面都有学问的 Gerbertus de Aurillac (格尔夫伯特), 他就是以后的 Silvester II (西尔维斯特) 教宗 (参见 88.6)。

在 Sachsen (萨克森地区) 的 Gandersheim (甘德斯海姆) 修女院, Hrotsvita (或 Roswitha 罗斯维塔) 修女为那些贵族修女 (Stiftsdamen) 写了一些圣人的传记或一些

世俗的故事,她用的是拉丁语的韵律,她甚至根据 Terentius(古罗马的泰伦斯)的模式写了一些话剧。除了 Gandersheim(甘德斯海姆)以外,Quedlinburg(奎德林堡)修女院也是 Otto(奥托)王朝建立的隐修院,并且成为一个培养高文化水平的妇女的地方。Widukind(维特金德,973年后去世)隐修士在958年之前写了那部很有价值的《萨克森大事录》(*Res gestae Saxonicae*)。

第10世纪的意大利虽然比较落后一些,但他们中也有一些历史学家,比如 Cremona(克雷莫纳)的主教 Liutprand(留特伯兰德,970年去世,参见88.2),而 Vercelli(维尔切利)的主教 Atto(阿托,961年去世)是一位热心的改革神学家(PL 134)。

荷兰人 Rather(拉特尔,974年去世)是一位非常特殊的人,他曾经任 Verona(维罗纳)和 Liege(列日)的主教,性格不安宁,他喜欢辛辣地批评别人,有奋斗的精神,他的众多著作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悲哀因素,尤其著名的是他的主要著作 *Praeloquia*(《导论》),这是中世纪第一部社会伦理方面的书(PL 136)。在 Liege(列日)的大堂学校以及在其他当地的隐修院的学校也都是很杰出的教育机构,而 Liege(列日)的优秀主教 Notker de Liege(诺特克尔,1008年去世)支持这些学校——他是 Otto I(奥托一世)皇帝的侄子。在 Hennegau(赫内高)的 Lobbes(= Laubach 老巴克)的隐修院受 Heriger de Lobbes(赫瑞格尔,1007年去世)的协助,他是院长同时也写书。

89.6 在第11世纪,虽然名副其实的神学家仍然很少,但至少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编年史的作者和历史学家:Merseburg(梅泽堡)的主教 Thietmar(提德马尔,1018年去世)写过一部《编年史》(*Chronicon*);Rodulfus Glaber(若都尔夫,1056年去世)曾经在 Cluny(克吕尼)和其他的隐修院写过书(参见 PL 142);Hermannus Contractus(Herman the Lame 瘸子赫尔曼,1054年去世)来自 Suabia(施瓦本)的贵族家庭,他是一个很慈祥的人,又有渊博的知识(著作见 PL 143);St. Gallen(圣伽伦)隐修院的院长 Ekkehard IV(艾克哈德,1060年去世)继续编写那本 *Casus S. Galli*(《圣伽伦史》);在 Bremen(不来梅)大堂当老师的 Adam(亚当,1076年后去世)——一位很有才华的人——曾写了一部《汉堡历代主教史》(参见 81.2);Constantia(康斯坦茨)或 St. Blasien(圣布拉修)隐修院的修士 Bernoldus(贝尔诺德,1100年去世)热切拥护了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的改革,他写了很多“论战文章”(参见关于“圣餐”的论战,90.6)。他也写了一部 *Chronicon*(《历史

书》),也许还编写了对礼仪学很有价值的 *Micrologus*(《小论》,参见 PL 148; 151); 在 Hessen(黑森)的 Hersfeld(赫尔斯费尔德)隐修院修道的 Lambertus(兰贝图斯, 1078年后去世)的文笔很好,而他写的《编年记》相当严厉地和片面地反对 Henricus IV(亨利四世)。

在 Bavaria(巴伐利亚)的隐修院,比如在 Tegernsee(特格尔恩湖)隐修院和在 Regensburg(雷根斯堡)的 St. Emmeram(圣艾梅兰)隐修院,都有很活跃的学习、研究、写作精神。在 Tegernsee(特格尔恩湖)出现了一个拉丁语诗人 Froumund(弗若孟德,约于 1008 年去世);他的同学(后来当院长)是 Ellinger(艾林格尔,1056 年去世)。在 St. Emmeram(圣艾梅兰)有一个著作众多的修士,即 Otloh(欧特罗,约于 1070 年去世),他也曾经写过一种自传(*Liber visionum*《神视之书》、*Liber de temptationibus*《试探之书》),还有其他的书(参见 PL 146)。在 Hildesheim(希尔德斯海姆)的大堂学校有一位杰出的人任教,即 Thangmarus(汤马尔,约于 1022 年后去世)和 Godehardus(格德哈德)主教(他于 1038 年去世)。Worms(沃尔姆斯)的主教 Burchard(布克哈德,1025 年去世)为那些牧灵者编写了一部 *Collectarium*(《教会法令集》,亦称 *Decretum*,参见 PL 140)。

在法国,Chartres(沙特尔)学派比较有名,一位很突出的学者是 Gerbert de Aurillac(格尔贝特)的学生 Fulbertus(夫尔贝特,1029 年去世),他于 1006 年当 Chartres(沙特尔)的主教。来自 Lotharingia(洛林)地区的 Moyenmoutier(摩耶穆铁)隐修院的 Humbertus(亨伯特)修士代表着严格改革派的思想(他于 1061 年去世)。Leo IX(利奥九世)教宗于 1049 年带他到罗马,他被提名为 Silva Candida(西瓦·坎地大)的枢机主教(1050 年),也成为教宗的顾问。在教会政治方面,他的影响很大,他于 1054 年当教宗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使者(参见 94.3),在“圣餐争论”(参见 90.6)和在反对圣职买卖、司铎婚姻、平信徒任命权方面(参见 102.3),他都写过一些文献,尤其在 Nicolaus II(尼苛劳/尼哥拉二世)的时代(参见 103.5)。他针对希腊人写的著作以及他的 *Libri tres adv. Simoniacos*(《反驳圣职买卖》3 卷)都表明,他广泛地掌握了教父们的文献,他文笔优雅,有辩论的才华并且具有激昂的性格(参见 PL 143)。Humbertus(亨伯特)的朋友和一位“志同道合”的人是 Ravenna(拉文纳)的 Petrus Damiani(伯多禄/彼得·达米阿尼,1072 年去世),他在 Gubbio(古比欧)附近的 Fonte Avellana(丰特·阿维拉纳)指导一个隐修者的团体(参见 101.4),但 Stephanus IX(斯特凡努斯九世)指定他当 Ostia(奥斯提亚)的

枢机主教(参见 103.4),他曾经在很多国度(包括在德国)充当教宗的使者和一位具有影响力的“忏悔宣讲家”(Bussprediger),1059年在Milano(米兰)管理Pataria(帕塔里亚)运动(参见103.6)。他用他的口才和文笔服务于教会的复兴,曾写过许多著作(如Liber Gomorrhianus《哈摩拉书》,反对圣职的婚姻,参见102.3)。教会政治方面的著作是他的Disceptatio Synodalis(《主教会议辩论》,1062年,反驳Honorius II(诺霍留斯),参见103.6),还有一些灵修学的书和隐修精神的著作(参见PL 144-145)

意大利的Petrus Damiani(伯多禄·达米阿尼),德国的Othloh(欧特罗,见上)和Alsatia(阿尔萨斯)的Lautenbach(劳登巴克)隐修院的杰出学者Manegold(马内格德)都和世俗的哲学保持距离——他们都认为,哲学仅仅能当神学的ancilla(仆人)。然而,在同样的时期出现了一个比较自由的思想流派,尤其在意大利和法国地区,就是所谓的dialectici(“辩证者”,或称philosophi“哲学派”或sophistae“智者派”)。这个思想派认为,理性思考对神学应该拥有更大的影响力;也有一些人甚至太强调理性,同时贬损了信仰,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是Berengar(贝伦格尔,1088年去世),他曾经是Chartres(沙特尔)的Fulbertus(夫尔贝特)的学生,后来在Tours(图尔)当老师(scholasticus)。他的原则是“per omnia ad dialecticam confugere”(在一切问题上依赖辩证法),但这个原则为教会的教导带来了很大的危险,关于“圣餐”的新争论就显示出这一点(参见90.6)。因为这次争论引起很多人写了一些反驳性的文章,但这个争论对神学思想还是有促进作用(wirkte er anregend auf den Fortschritt der Theologie)。Berengar(贝伦格尔)的主要对手是Pavia(帕维亚)的Lanfrancus(兰弗朗克,1010-1089年),他曾经在Normandia(诺曼底)的Bec(贝基)隐修院当老师和院长,后来当Canterbury(坎特伯雷)的总主教(1070-1089年),这样也在Wilhelmus(William the Conqueror 威廉)的时期组织并改革了英国的教会(参见105.4)。另外,Lanfrancus(兰弗朗克)很快意识到“辩证方法”(methodus dialecticus)为神学有一定的用处,所以自己适当地利用这个方法(他曾说过tego artem“我保护这种知识”)。他已经站在scholastica scientia(经院思想)的门槛。一些伪造的文献——它们想证明Canterbury(坎特伯雷)对于York(约克)有管理权——曾经被托于Lanfrancus(兰弗朗克),但这些大概是Eadmer(埃德梅尔,1055-1124年)隐修士写的(Lanfrancus 兰弗朗克的文献请参见PL 150)。

西方关于“由子”和“嗣子论”的教导。

预定论和有关“圣餐”的争论

90.1 早期中世纪一般都是信仰坚定的时期。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异端仅仅在东方的希腊教会中出现,而西欧没有。在那些新兴的格尔曼—罗曼国中(*germanisch - romanische Staaten*)当然也开始有一些神学家在思想上不小心或高估理性的能力,所以他们走入一些误区,而希腊的圣像运动对西方教会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参见 92);不过,这一切争论和冲突都限于神学家自己的圈子,很少有普通群众的参与,而且这些争论相当快地被结束了。

90.2 西方教会自从第 5 世纪以来在信经中加上了 *Filioque* (“由子”)一词,这样表达,圣神/圣灵是“由圣父及由圣子共发”的(参见第 1 卷 49.3)。这种说法在第 8 世纪也传入法兰克人的地区。*Aquileia* (阿奎雷阿)的宗主教 *Paulinus* (保利努斯,参见 89.3)也曾在 *Friuli* (弗留利)的 *Cividale* (西维达尔)的主教会议(796 年)上替它进行辩护。法兰克王 *Carolus Magnus* (查理曼)也让人们在他的宫廷教堂在 *Aachen* (亚琛)唱这个信经。在耶路撒冷的橄榄山上修道的法兰克隐修士也同样使用了这个“由子”,虽然当地的希腊人因此严厉地批评了他们(808 年)。因为这些隐修者向家乡的人提出抱怨,*Carolus Magnus* (查理曼)请 *Orleans* (奥尔良)的 *Theodulfus* (特欧多夫,参见 89.3)说明这个“由子”的意义,而 *Theodulfus* (特欧多夫)写了一本书:*De spiritu sancto* (《论圣神/圣灵》)。除此之外,*Aachen* (亚琛)于 809 年的主教会议也同样卫护了这个“由子”。*Leo III* (利奥三世,795 - 816 年)考虑到希腊人的感情,所以他不赞同这个“由子”被引进信经,他曾经劝勉了法兰克人再次拿掉这个词。同时,他在圣伯多禄/彼得大堂建立了两个很大的银牌,上面刻着拉丁文和希腊文的信经,但其中没有“由子”。然而,法兰克人没有回应他的愿望。后来,罗马的教会也接受了这个“由子”,据说是因为 *Henricus II* (亨利二世)皇帝推动了 *Benedictus VIII* (本尼狄克八世),但也许是更早一些被接受的。在 *Cerularius* (切汝莱)向罗马提出的攻击当中(参见 94.3),这个“由子”后来扮演了一个灾难性的角色,这一点是令人感到悲哀的。

90.3 在西班牙出现了一个新的异端,就是所谓的 *Adoptianismus* (“嗣子说”),它是 *Nestorianismus* (奈斯多略/涅斯多流/聂斯托利主义)的一个回应。在 780 年的 *Sevilla* (塞维利亚)地区,某一位 *Migetius* (米格提乌斯)根据 *Sabellius* (撒贝留斯,参见第 1 卷 22.6)的理论说,神三次启示了自己:在 *David* (达味/大卫)内有圣父的启示,在基督内有圣子的启示,而在 *Paulus* (保禄/保罗)内有圣神/圣灵的启示。*Toledo* (托莱多)的总主教 *Elipandus* (埃利班多斯)反驳他说,*Logos* (逻各斯)在本质上是神的儿子,但作为人的基督只是神的“嗣子”(Adoptivsohn)。在西班牙边疆地区的 *Urgel* (乌尔格勒)的主教 *Felix* (菲理克斯)马上支持了 *Elipandus* (埃利班多斯)。然而,*Libana* (里巴纳)隐修院的 *Beatus* (贝亚图斯)院长和 *Asturia* (阿斯图利亚)地区 *Osma* (欧斯玛)的主教 *Etherius* (埃特留斯)反对那种“新的 *Nestorius* (奈斯多略/涅斯多流)派”,而 *Hadrianus I* (哈德良一世)教宗也支持他们。因为部分的争论者在他的领土内,*Carolus Magnus* (查理曼)在 *Regensburg* (雷根斯堡,792 年)和 *Frankfurt* (法兰克福,794 年)的主教会议上请主教们谈论这个问题,而他们就谴责了“嗣子说”。法兰克地区中有个别的学者反驳“嗣子说”,尤其是 *Alcuinus* (阿尔库因)。在一个罗马的主教会议上,*Leo III* (利奥三世)教宗也谴责了这个错误的主张(798 年)。在 800 年于 *Aachen* (亚琛)的主教会议上,*Alcuinus* (阿尔库因)在谈论中驳倒了 *Felix* (菲理克斯),所以后者就发誓要放弃这个学说,这样很多其他的人也放弃了这个异端。在 *Elipandus* (埃利班多斯)去世后(802 年),这个异端就消失了。

90.4 因为人们在第 8、9 世纪开始更深入地研究 *Augustinus* (奥古斯丁)的著作,*praedestinatio* (预定论)的问题成为激烈神学争论的原因,正如在第 5 世纪一样。萨克森隐修者 *Gottschalk* (格特沙尔克)——他是 *Berno* (贝诺)伯爵的儿子——引起了这次争论。他在孩提时代被送到隐修院,但在祝圣神父之前,他从隐修院中逃跑。829 年在 *Mainz* (美因茨)举行的主教会议解除他的修道义务,但他的院长 *Hrabanus Maurus* (拉班努)反对,所以 *Ludovicus* (路易)皇帝再一次要求他修道。现在这位才华横溢、信仰很深的青年被送到 *Soissons* (苏瓦松)附近的 *Orbais* (欧尔白)隐修院,并开始圣 *Augustinus* (奥古斯丁)的著作中寻找安慰。他的著作似乎都没有保存(PL 121),在 20 世纪初有一些学者发现 *Gottschalk* (格特沙尔克)的 *De trina Deitate* (《论三位一体》)和一些诗。也许他因自己一生的命运或由于萨克森的传统宿命论,他很强调神的预先决定。他从一种严格的奥古斯丁主义

出发,认为预定等于是神的永恒、无法改变的决定;他说,神仅仅愿意拯救一部分的人(partikulaerer goettlicher Heilswille),又提出“双重预定”的说法,就是“向生命”或“向死亡”的预定。同时,他又否认“犯罪的预定”或“行恶的预定”。他认为,“向死亡”的预定来自神的预先知晓,因此似乎不能说他是一位执异端的人。不过,他没有很清楚地区分这两种“预定”的性质,并且在更大的圈子当中传播了自己的主张,又在意大利和德国的旅游路线中在群众面前讲道,所以有的人就开始反驳他。847年后任 Mainz(美因茨)总主教的 Hrabanus Maurus(拉班努)马上攻击了一种“向死亡的预定”,说这种说法是不能容忍的。Rabanus(拉班努)于848年在 Mainz(美因茨)主持的主教会议谴责了 Gottschalk(格特沙尔克)为异端人,而 Remi(兰斯)的主教 Hincmarus(安克马尔)于849年在 Quiercy(克尔西)举行的主教会议谴责他、审判他,并取消他的司铎职。他被鞭笞后被关进 Remi(兰斯)附近的 Hautvillers(欧特维尔)隐修院,再不被允许出来。他在868年或869年去世。

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反对了 Gottschalk(格特沙尔克),但不久后也有一些虔诚的以及有学问的人支持他。因为 Hincmarus(安克马尔)在他的论文 *Ad reclusos et simplices* (《致隐修者和平信徒》)很严厉地反驳了预定论,那位爱好 Augustinus(奥古斯丁)著作,在 Corbie(科尔比)修道的 Rathramnus(拉特兰努斯)——一位满腹经纶的人——保卫了预定论。Ferrieres(费列)的院长 Servatus Lupus(塞尔瓦图斯·卢普斯),Troyes(特洛伊)的主教 Prudentius(普卢登提乌斯),Sens(桑斯)的主教 Wenilo(维尼罗)主教和 Lyon(里昂)的 Remigius(瑞米格乌斯)总主教都支持 Rathramnus(拉特兰努斯)。因为双方的观点都在一些主教会议上得到表达——支持 Hincmarus(安克马尔)的观点在 Quiercy(基尔西,853年的会议),反对他的观点在 Valence(瓦伦斯,855年)和 Langres(郎日,859年),这个争论进一步变得更为激烈。在 Toul(图勒)附近的 Savonnières(萨翁涅瑞)举行的全法国的主教会议(859年)就面临了双方的碰撞,但860年在 Toucy(图西)举行的主教会议又能够调解双方的观点。Hincmarus(安克马尔)编写的主教会议文献强调了上主的“普遍拯救愿望”以及“得救的普世性”,但这个文献没有提到“向死亡的预定”。

90.5 大概在同样的时刻,关于“圣餐”的争论使西方神学家们感到不安。古代的基督宗教传统为感恩祭的奥迹提供了两个可能的解释:一个是圣 Ambrosius(安波罗修斯)那种认为面饼和酒真正“变成”(希腊语 *metaballein*,拉丁语 *mutare*)主的圣体和圣血;第二个解释是 Augustinus(奥古斯丁)那种更精神性的、动态的解说

(mehr dynamistisch - spiritualistische)。这两个观点在第9世纪以及在后来的争论中都影响着神学家们的思想。“最后的拉丁教父”，Sevilla(塞维利亚)的 Isidorus(伊西多尔)也是一个重要的调和者；他关于“圣餐”的教导更多属于 realism(“实体说”)的观点，但他主要从礼仪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那位很渊博的圣经诠释学家/解经学家 Paschasius Radbertus(帕斯卡修斯·拉德贝特，约于856年去世)——他曾是 Corbie(科尔比)的修士和院长——他的著作 *De corpore et sanguine Domini*(《论主的圣体和圣血》，831年撰写，844年修改并发行，献给 Carolus Glaber 秃头的卡若卢斯)符合教会的传统信仰意识：在感恩祭中虽然表面上是 sub figura panis et vini(“以面饼和酒的形式”)，但实际上是基督的圣体和圣血，而且 non alia plane caro, quam quae nata est de Maria et passa in cruce et resurrexit de sepulcro(“不是别的血肉，而就是从玛利亚诞生的，在十字架上受苦的，从坟墓中复活的血肉”，参见第1章)。然而，这位学者太强调历史的基督和感恩祭中的基督的一致性，不够清楚地区分“表现形式”(Erscheinungsformen)的差别。个别的言词甚至倾向于某种“粗糙的，kapharnaitische(葛法翁的/迦百农)式的”，(参见《若望/约翰福音》Jn 6:52)的表达方式(即：“吃耶稣”)。因此，一些人提出反对意见。Mainz(美因茨)的总主教 Hrabanus Maurus(拉班努)向 Eigilius de Pruem(艾格尔)院长写了一封信(约于850年)，其中清清楚楚地强调一点：基督在历史上的身体和感恩祭中的身体仅仅在本质上(naturaliter)，而不是在表现形式上(specialiter oder in der Erscheinungsform)是一样的。Carolus Glaber(秃头的卡若卢斯)要求 Corbie(科尔比)的隐修士 Rathramnus(拉特兰努斯，参见上文90.4)表态，所以这位学者更强调历史上的身体和感恩祭的身体之间的区别。他甚至拒绝一种“本质上的改变”(或“体变”)，并且似乎认为，在感恩祭的圣事中仅仅有了基督一种精神性的 - 象征性的临在(quaedam virtus carnis et sanguinis 根据 Radbertus 的说法)。与他同时代的人是一个位大的思想家——Johannes Scotus 或 Johannes Eriugena(艾利基纳，参见89.4)；他根据自己那种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模式也在感恩祭教导方面支持一种相当淋漓尽致的“精神主义和神秘主义”(huldigte einem ausgepraegten Spiritualismus)。根据 Remi(兰斯)的 Hincmarus(安克马尔)的记载，他仅仅提到一种 memoria veri corporis et sanguinis Christi(“对基督真正的身体和血肉的纪念”)，而一部分的学者也拥护了这种观点。但在另一方面，一些人又说，耶稣的圣体也和别的食品一样，他被消化，将会变成粪土。自从第11世纪以来，这种观点被称为 stercorianismus(粪土主

义)。

90.6 在 11 世纪出现一个更有影响力的“圣餐争论”，它的发起人是 Tours(图尔)大堂学校的 scholasticus(校长) Berengar(贝伦格尔)。他是一位思想很敏锐的 dialecticianus(辩论者，逻辑学家，参见 89.6)，也倾向于理性主义。他更夸大了 Augustinus(奥古斯丁)和 Rathramnus(拉特兰努斯)关于圣体的学说，使之成为一种纯粹的象征主义(reiner spiritualistischer Symbolismus)：他否认了基督的身体和圣血真正临在于圣餐当中，他也否认面饼和酒在祝圣的时候真正有本体上的改变(“体变”)。一个基督徒(而且只有他)能够在领受圣体时仅仅接受基督真正身体和真正血肉的力量。虽然他的朋友们——尤其是他以前的同学 Adelmanus de Luettich(阿德尔曼)——都警告他，Berengar(贝伦格尔)甚至攻击了对方的观点并在一封写给 Bec(贝基)的院长 Lanfrancus(兰弗朗克，参见 89.6)的信中批评了他们(1050年)。因此，神学家们之间的学术性谈论变成了一种非常激烈的论战。其中有一些神学家，他们不仅仅反驳了 Berengar(贝伦格尔)，而且也是当时教会改革的倡导者——这一点也并不是偶然的事。1050年在 Vercelli(维切利)和罗马召开的主教会议都谴责了 Berengar(贝伦格尔)。1051年在巴黎召开的主教会议甚至规定，那些执 Berengar(贝伦格尔)观点的人应该受死刑。在罗马教宗的使者 Hildebrand(希尔德布兰德，即后来的 Gregorius VII 额我略/贵格利七世，参见 103.2)主持下于 1054年在 Tours(图尔)召开的主教会议上要求 Berengar(贝伦格尔)表态，而当他这样说，祝圣后的面饼和葡萄酒就是基督的圣体和圣血，情况平安一些。Nicolaus II(尼苛劳/尼哥拉，参见 103.5)教宗于 1059年在罗马 Lateranus(拉特兰)召开的主教会议要求 Berengar(贝伦格尔)参加，而因为害怕，他通过签名接受了一个主教们预先准备的教导形式——虽然这是一个相当粗糙的、过于具体化的表达形式——：verum corpus Domini sensualiter, non solum in sacramento, sed in veritate manibus sacerdotum tractari, frangi et fidelium dentibus atteri(“司铎们用手摸的、劈开的和信徒们用牙齿磨的就是主的真正身体，仅仅在圣事中，但也在真理中”)。这种说法的编写者是 Humbertus de Silva Candida(亨伯特，参见 89.6；103.4)。十年后，Berengar(贝伦格尔)却收回了他的同意并开始攻击那次 Lateranus(拉特兰)会议的说法以及反驳 Humbertus(亨伯特)。这时，Lanfrancus(兰弗朗克)以及其他的神学家以 *De corpore et sanguine Domini*(《论主的圣体和圣血》)的论文——它第一次非常清楚地表达了 transsubstantiatio(“变体”)的概念——反驳了 Berengar(贝氏)，但

他于 1076 年又写了一部 *De sacra coena* (《论圣餐》), 其中抵抗他们的观点[这部书于 1770 年由 Lessing(莱辛)在 Wolfenbuettel(德国沃尔芬布特尔)发现]。这部著作又最极端地表达了 Berengar(贝伦格尔)的观点: 感恩祭中的“圣体”仅仅是基督身体的“记号”或“象征”(Zeichen oder Symbol des Leibes Christi)。因此,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要求他到罗马来, 使他在 1079 年的“四旬期主教会议”上收回自己的观点并接受一个正统的说法: panem et vinum ... substantialiter converti in veram et propriam et vivificatricem carnem et sanguinem Jesu Christi(“面饼和葡萄酒……在本质上变成耶稣基督的真实的、本有的和充满生命的身体和血”)。因此, Berengar(贝伦格尔)与教会和好了, 他回到自己的家乡, 并于 1088 年去世了; 然而, 他的错误说法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很多。Constance(康斯坦斯)的 Bernold(贝尔诺德)在 1088 年还写了一部 *De veritate corporis et sanguinis Domini* (《论主的身体和血的真实性》), 而 Liege(列日)的 canonicus(大堂团员) Alger(阿尔格尔)在 1121 年之前还写了他的 *Libri tres de sacramentis corporis et sanguinis Domini* (《主的圣体圣血的圣事》三卷, 由 Erasmus 编辑于 1530 年发行, PL 180)。

91

东方教会和它的特征。神学与教派

91.1 希腊的教会在这个阶段中越来越多离开了西方的教会, 走了自己的道路。她的精神更多是一种保守主义和传统主义 (Konservativismus und Traditionalismus), 这样在教义、制度、礼仪、克修和宗教感情方面都基本上保持着第 6、7 世纪所达到的水平。在希腊教会那里, 教会的信仰意识和教会生活没有——像西方教会那样——经历一个有机的成长、革新和多元化过程, 也就是说, 她没有“中世纪”, 她仅仅继续着古代的基督宗教生活 (kein organisches Wachstum des kirchlichen Glaubensbewusstseins und Lebens in neuen und mannigfaltigen Formen wie im Westen, kein Mittelalter, sondern nur eine Fortsetzung der christianisierten Antike)。西欧的基督宗教呈现出某一种跨越国籍的、普世性的特征, 但东方的教会拥有明显的民族性和国教特征。在东方那里, 民族、教会和国度之间有密切的结合, 它们彼此渗透。皇帝被视为神在人间的代表 (Der Kaiser wird als Stellvertreter Gottes auf

Erden gefeiert)。他被视为一个“相似基督的”、世俗的“司祭 - 国王”，一切法律的代表，自己却凌驾在法律(Kanones 教规)之上。他支配着教会教导的发展、教会的法律和管理制度。这种 Caesaropapismus(“政教合一”)的制度意味着，拜占庭的教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失去了独立性和她的尊严。虽然 Syria - Isauria(叙利亚 - 伊骚利亚)王朝(717 - 867 年)和 Macedonia(马其顿)王朝(867 - 1057 年)的一些能干的皇帝勇敢地面对沉重的压力并能够保卫“新罗马帝国”(Rhomaerreich)及其首都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上主所保护的城市”，及“众城之首”。这些皇帝们能够抵抗阿拉伯人和斯拉夫民族的冲击，这样帮助了基督宗教文明，但他们也曾多次以武力的、灾难性的方式干涉了教会最内在的生活领域。

希腊基督徒的信仰基本上呈现出一种悲观的态度，所以他们缺少西欧那种爱好文化的乐观精神及动力(kulturfreudige Optimismus und die Aktivitaet des Abendlandes)。西方的教会想根据基督信仰的种种要求改造个人和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但希腊基督徒很少有这种动力。希腊人将教会生活的核心迁移到礼仪的奥秘，而在这些神圣的戏剧性的礼仪奥秘中，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体验到拯救的恩典和神秘的力量。教会的重要任务本来是“当灵魂的指导者”，但在希腊教会那里，这个任务被忽略或被委托给隐修士们(参见第 1 卷, 68. 1 关于“忏悔和补赎”的论述)。的确，拜占庭的教会在那个时代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为她能够使东南欧洲地区的斯拉夫民族皈依基督宗教(参见 83)，而这种皈依在政治上也有很深远的影响。虽然在那个时代的学术活动似乎有普遍衰落的趋势，但希腊教会在神学方面还是有一些重要的成就。那些古老的异端和教派部分上在东方继续存在，又发展一些新的流派，所以神学家们必须重新讨论它们提出来的问题。那种很受欢迎的 catena(串珠文学)和 florilegia(文集, 参见第 1 卷, 77. 1)也继续结出美丽的果实。

91. 2 在这种“后继者的时期”(Epigonenzeit)中，最有威望和影响力的希腊神学家是 Johannes Damascenus(大马士革的约翰内斯)，有“希腊教会最后的教父”的美名，虽然他并不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思想家，而仅仅讨论和编辑传统的文献。他出生在 Damascus(大马士革)一个基督徒家庭，这个家族的男人历代任高级官员(大概负责叙利亚的税务)。Johannes(约翰内斯)也曾当了官，但大约在 715 年辞职并在耶路撒冷的 Sabas(撒巴斯)隐修院修道，749 年在那里去世。他的著作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那些保卫圣像敬拜的论文(参见 92. 1)、一些赞美诗(圣诗)、*Sacra Parallela*(《神圣金句合观》)——这是一部庞大的教义和克修方面的

florilegium(文集)。他的代表著作是分为三部分的 *Pege gnoseos* (*Fons scientiae*,《智慧之源》);第一部分的内容是一种哲学导论(称为 *Dialectica* 或 *Metaphysica*),第二部分包含种种异端的历史发展,而第三个——最重要的——部分根据历代教父和各个主教会议的规定阐述基督宗教的教导(称为 *De fide orthodoxa*《论正统的信仰》)。《智慧之源》一直到今天还是东方教会的“教义书经典”。12、13 世纪的西方学者将它译成拉丁语,而 Petrus Lombardus(伦巴第人伯多禄/彼得)与 Thomas de Aquino(托马斯)之类的西方神学家甚至更尊敬这部教义书。这本书的方法已经有经院思想的特征:它基本上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来描述和保卫种种信条。

在第 9 世纪初,抵抗那些“破坏圣像者”的人是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 Nicephorus(尼克弗若斯,815 年由 Leo(利奥)皇帝流放,829 年去世)和 Theodorus Studita(特奥多尔,826 年去世)。后者是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 Studios(斯图丢斯)隐修院的院长(参见第 1 卷 72.5),他有严肃的克修精神并勇敢地反对拜占庭的“政治凌驾于教会之上”的制度,为教会的自由而奋斗(参见 92.4)。然而,在第 9 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无疑是 Photius(佛提乌斯,897 或 898 年去世),他曾是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很有雄心(关于他引起的教会政治争论见 93)。他文笔优雅,很有说服力,才华横溢,并且在很多知识领域中都有惊人的学问:在语文学(philologia)、文学、文学评论、圣经诠释学、教义学、教会法学(Kanonistik)、辩论学方面。他曾写过很多反驳 Pauliciani(保利基阿尼)和拉丁语教会的论文。除了一些讲道稿和很多书信外,今天还保存的有一种文学史,即 *Bibliotheca*(《图书馆》亦称 *Myriobiblon*《万本书》)以及 *Amphilochia*(《安菲洛基亚》),这部书献给 Cyzicus(西基克斯)的总主教 Amphilochius(安菲洛基乌斯),其中讨论一些圣经诠释学和教义的问题。希腊教会的重要法典(Nomokanon《法规》)也被托给他,但这部法律文集大概是更早一些编写的。

在拜占庭的圣人文学(Hagiographie)方面,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 Symeon Metaphrastes(西默盎/西面,约在 1000 年之前去世),他曾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当过 logothetos(国务卿)及 magister(教师)。他改写了一些古老的圣人传记或传奇,这样编写了一个巨大的文集(所谓的 *Menologion*《梅诺逻辑翁》,10 卷),这部巨著在教会中很受欢迎,其中的圣人传记或殉道故事大部分没有很大的历史价值,但仍然是一部名著。

在 Studios(斯图丢斯)隐修院受培训的“新神学家”Symeon(西默盎/西面,1022

年去世)曾充当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 Mamas(马马斯)隐修院的院长。他是最伟大的希腊神秘学家(groesste griechische Mystiker),也是一位思想很深奥的诗人。他不懈地称赞在基督徒心内那种“内在的神圣光明”。他的思想有泛神论的倾向,所以他准备了 Hesychastes(“宁静者”)的威静主义(quietismus);这种“宁静派”的传统尤其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在 Athos(阿托斯圣山)以及在 Sinai(西乃山,特别在第 14 世纪后)的隐修院中被强调。963 年在 Athos(陈托斯圣山)创立了一个小小的“隐修院共和国”——它一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包括 5 所大的和 16 所小的隐修院。“宁静派”的主要代表是 Gregorius Palamas(帕拉马斯,1296 - 1359 年);这个灵修派曾经一段时间很流行,但也遇到一些反驳者。在第 9、10 世纪的圣经诠释学家/解经学家主要是 Cappadocia(卡帕多西亚)的 Caesarea(恺撒勒亚)的总主教 Arethas(阿瑞塔斯,约于 932 年去世),他来自 Photius(佛提乌斯)的学派,还有 Achrida(阿克瑞达)的总主教 Theophylactus(狄奥菲拉克图斯),他约于 1078 年当总主教。另一个解经学家是 Euthymius Zigabenus(优提米乌斯,1118 年后去世),他曾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当隐修者,不仅仅有圣经学方面的知识,也是一个教义学(信理学)专家和辩论家(参见其 *Panoplia dogmatica*《神学宝库》,PG 130)。

一般来说,希腊教会的圣职人员的教育水平在那个时代大概没有多少超过西方圣职人员的水平(参见 89.1)。我们没有更确切的信息。787 年在 Nicaea(尼西亚)召开的主教会议要求一个主教候选人必须背熟 Psalms(《圣咏集/诗篇》),并且有能力阅读和研究下面的文献: canones(《教规集》)、《福音书》、*Apostolos*(《宗徒/使徒集》,即在礼仪中要宣读的《新约》书信或《宗徒大事录》的经文)以及整个《圣经》。主教候选人的生活方式也必须符合上主的诫命,因为他们是民众的榜样。

91.3 在 650 年后不久,在小亚细亚东部以及在亚美尼亚地区出现了 Pauliciani(保利基阿尼)的教派——这种称呼大概来自反驳他们的人,因为这个教派的人特别尊敬圣 Paulus(保禄/保罗),他们自称“基督徒”。他们的创始人是亚美尼亚 Cibessa(基波撒)的 Constantinus Silvanus(君士坦丁)。他们的教导是一种严格的二元论,大概来自 Mani(摩尼)的教派或 Marcion(马尔西翁,参见第 1 卷,30B; 31): 他们认为“这个世界的主”和“天上之主”是两个力量。他们放弃教会的礼仪、圣事、对圣人、圣髑和圣人像的尊敬。希腊的皇帝们,尤其 Leo V(利奥五世,813 - 820 年)和 Theodora(狄奥多拉,842 - 856 年)有时镇压了这个教派,对顽固的信徒处以

死刑。很多 Pauliciani(保利基阿尼)信徒逃难到阿拉伯地区,并从那里通过几次强盗行径使拜占庭帝国动荡不安。直到 Basilius I(巴西略/巴西流斯一世)皇帝才能够彻底地打败他们(871年),他们被送到 Thracia(特拉基亚)的 Philippopol(菲利波贝尔城),在那里看守边界地区的堡垒,以抵御斯拉夫人的入侵。在12世纪,他们逐渐消失,但部分的人也许成了后来的 Cathari(清洁派)和 Bogomili(波格米勒派,见下)。

从 Pauliciani(保利基阿尼)的教派那里好像发展出了另一个教派,即所谓的 Bogomili(波格米勒,“神的朋友”),他们也同样倡导一种二元论:有一个善神和一个恶神,他们反对圣洗和圣餐,认为对圣物、圣像以及圣十字架的尊敬都来自魔鬼。他们不结婚,也不吃肉。他们在10世纪初出现在保加利亚,在10世纪末以 Phundagiagites(Thondrakier)(冯达加基特)的名字传到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各地,很强烈地打击“外在的教会形式”以及教会的缺陷。Alexius I Comnenus(阿雷克休斯一世皇帝,1081-1118年)在1110年命令烧死他们的精神领袖——一位名称 Basilius(巴西略)的医生,又逮捕了他的拥护者。虽然面对这种压迫,但 Bogomili(波格米勒)在保加利亚和波斯尼亚地区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获得了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们后来发展到西部,与 Pauliciani(保利基阿尼)一起形成了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的 Cathari(清洁)教派(参见113)。

92

破坏圣像运动及 787 年 Nicaea(尼西亚)主教会议(第 7 届大公会议)

92.1 对于圣像的尊敬,在希腊教会中早就成为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了(参见第1卷,70.4)。希腊教会的精神领导——隐修士们——也培养和推动了这种尊敬,而对圣像的重视似乎已经成了宗教信仰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但在希腊教会中也一直存在者反对的声音,因为一部分的人认为,尊敬圣像是向异教文化的让步和妥协。对于圣像的崇拜也确实导致了某些误用和迷信的作法。在第8世纪,皇帝和政府与这些反对者一起来消除圣像,这就意味着宗教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导致全帝国中最激烈的搏斗和争吵,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一百年之久,又引起了东方和西方教会之间的张力和冲突。

这次争论是这样开始的:被称为 Isaurus(即“叙利亚人”)的将军皇帝 Leo III(利奥三世,717 - 741 年)在军事方面很有贡献,因为他成功地抵御阿拉伯人于 717/718 年对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攻击。他于 726 年颁布一道敕令,其中要求信徒取掉或盖住种种圣像。他想进行一些改革,要重新整顿拜占庭帝国,而关于圣像的规定是其中一项改革。这种规定的理由有很多:《旧约》有关于禁止圣像的命令(参见《出埃及记》Ex 20:4);他考虑到那些反对圣像的 Pauliciani(保利基阿尼)派(参见 91.3),又顾及穆斯林和犹太人;另外,他要在自己的帝国中同时成为“皇帝与大司祭”(basileus kai hieres eimi),想在各方面使教会服从他的规定,尤其想控制那些具有自由精神的隐修者。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些为圣像辩护的人同时也想争取教会的自由和独立性,使教会不受皇帝的独裁控制。一些小亚细亚的主教支持皇帝的措施,尤其是 Phrygia(夫里基亚)的 Nacolia(纳克利亚)的主教 Constantinus(君士坦丁),但大部分的圣职人员和民众以及所有的隐修士都反对这个规定。在帝国以外出现了一个有学问和威望的支持圣像的辩护者,就是 Johannes Damascenus(大马士革的约翰内斯,参见 91.2),他是耶路撒冷附近的 Sabas(撒巴斯)隐修院的修士并写了三个辩护论文(*Logoi apologetikoi*《辩护论文》)。皇帝的敕令引起争论,甚至引起暴动。然而,皇帝依赖他的军队,采取武力的方式来镇压反对他的人。希腊地区的人拥立了某一位 Cosmas(科斯马斯)当“对立皇帝”,但这些人都会被克服。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 Germanus(格尔曼努斯)本来比较支持圣像,所以皇帝于 730 年强迫他辞职,任命那位立场比较软弱的 Anastasius(阿纳斯塔修斯)为宗主教。在 Anastasius(阿纳斯塔修斯)的批准下,皇帝于 730 年宣布一个新的敕令,其中要求人们破坏和捣毁圣像。

东方教会的抵抗似乎效果不大,但西方教会的立场被尊敬。Gregorius II(额我略/贵格利二世教宗,715 - 731 年)写过两封尖锐的信,其中劝告皇帝放弃“破坏圣像”的立场,又说皇帝不能干涉教义方面的问题,因为教义问题全是主教们决定的。他的继承人 Gregorius III(额我略/贵格利三世教宗,731 - 741 年)早在 731 年在一次罗马主教会议上规定:谁捣毁、亵渎或侮辱圣像,谁就被开除教籍。皇帝的种种威胁激起了意大利人的愤怒,他们差一点完全摆脱了拜占庭的统治(参见 85.1)。皇帝于 732 年派遣海军要惩罚意大利的教宗,但没有成功;因此,皇帝采取另一些(对教会造成很大损失的)作法,对教宗进行报复:他占领了罗马教会在意大利南部地区和 Sicilia(西西里岛)的地产(patrimonia),将这些地区与 Illyria(伊吕利亚)教

省一起从罗马的管辖转到君士坦丁堡宗教区的管辖。后来的教宗们曾多次对这次武力行动提出抱怨和抗议,但都无效。这些冲突也说明,为什么教宗们后来转向法兰克人,并且为什么希腊人在意大利北部和意大利南部的统治衰落了(参见 85.1, 2)。

92.2 Leo(利奥)皇帝的儿子是 Constantinus V Copronymus(君士坦丁,741-775年),他加重了东方教会中的破坏圣像运动。他的妹夫 Artabasdus(阿尔塔巴斯都斯)是一位比较拥护圣像的人,他于743年组织一次起义,但被镇压。皇帝于754年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召开了一个主教会议,参加的人有338名主教。这次会议自称为“第七届大公会议”,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宗主教参与(帝国首都的宗主教刚刚去世)。根据皇帝的愿望,主教们支持破坏圣像运动,说尊敬圣像是魔鬼的事,是新的偶像崇拜。这个主教会议谴责原来的宗主教 Germanus(格尔曼努斯)和 Johannes Damascenus(大马士革的约翰内斯),将他们开除教籍。皇帝不顾一切地执行了这次主教会议的种种规定。全帝国的主教们也被迫在规定上签字。人们在各地取掉教堂中的画像,很多被捣毁;墙上的壁画或马赛克被刷白,或用一些没有宗教意义的画(比如树木和花鸟)来代替它们。只有隐修院的修士有勇气来抵抗皇帝的残暴和独裁霸道。自从761年,皇帝非常残酷地迫害了隐修士,很多隐修院被改成军训基地或军库,隐修院的财产被没收。一些修士也成为圣像运动中的“殉道者”,比如 Stephanus(斯德望/司提反)院长,他于764年去世。一批一批的东方隐修者移民到西方。虽然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宗主教和耶路撒冷的宗主教都公开谴责破坏圣像运动,但他们的呼吁并没有改变具体情况,而罗马教宗的声音也没有被聆听。在769年的拉特兰主教会议上,Stephanus III(斯德望/司提反三世)宣布,754年在东方召开的、支持破坏圣像的主教会议是一种“可恶的会议”(synodus execrabilis),将参与的主教们开除教籍,但东方的反圣像运动仍在继续进行。

Constantinus(君士坦丁)皇帝的儿子和继承人是 Leo IV Chazarus(利奥四世,775-780年),而他的态度稍微宽容一点;他允许那些被驱逐的隐修者回到家乡来。但他并没有取缔那些惩罚拥有圣像的人的法规;如果有人提出这方面的控诉,法庭就会执行这些法律。皇帝在780年去世,而皇后 Irene(伊任内)替自己还小的儿子 Constantinus VI(君士坦丁六世)掌握政权(780-790年);那时发生了一次重要的转变。这位有才华有雄心的妇女早就私下敬拜了圣像,甚至因此遭受了流放。

她再次恢复了帝国的宗教自由,使任何人自由地制造和尊敬宗教圣像。Irene(伊任内)想完全恢复教会的平安,所以她想召开一个新的主教会议,就是第七个真正“大公的”主教会议;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 Tarasius(塔拉修斯)宗主教和 Hadrianus I(哈德良一世教宗)支持她;教宗派遣了两个使者。这个主教会议根据计划要在 786 年 8 月在君士坦丁堡召开,但反对圣像的军人派解散了会议,所以会议迁到著名的 Nicaea(尼西亚),在 787 年秋天终于召开(“第二届尼西亚会议”Nicaenum II)。最后一个聚会还是能够在首都君士坦丁堡召开,而 Irene(伊任内)皇后及她的儿子都出席。参与该会议的有 350 名主教。他们屏弃了 754 年的“虚假主教会议”并根据教会传统规定,人们可以虔诚地尊敬(timetike proskynesis,“敬礼”,词根 kyneo 本来是“亲嘴”的意思)圣十字架、基督和圣母的种种圣像、天使和圣人/圣徒的圣像;这种“敬礼”可以包括点燃蜡烛、上香(焚乳香)和跪下敬拜,因为这些表达尊敬的方式都指向 prototypos(画像所描绘的人)本身。然而,只有天主/上帝才可以受到真正的朝拜和崇钦(alethine latreia 真实的朝拜)。这些规定就明确地区分对圣人/圣徒的尊敬(敬礼)和对天主/上帝的朝拜(钦崇)。后来还有两个拜占庭帝国的皇帝继续肯定这次会议的规定,就是 Nicephorus I(尼克弗若斯一世皇帝,802-811 年)和 Michael I Rhangabe(弥格尔/米迦勒一世皇帝,811-813 年)。允许尊敬圣像的规定成效达 30 年之久。

92.3 东方的圣像争论在西方教会中引起了一种奇怪的尾声和余波。Hadrianus(哈德良)教宗认为,Carolus Magnus(查理曼)的法兰克王国也应该接受 Nicaea(尼西亚)会议的决定,但他在这方面的努力遇到了坚定的抵抗。其中一个原因是会议文献的拉丁译文不完善——这些翻译文件没有恰当区分“朝拜”和“敬礼”,甚至颠倒了这两个概念,而 Anastasius Bibliothecarius(阿纳斯塔修斯,参见 89.4)才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译文。更重要的因素是当时法兰克人和东罗马帝国之间的冲突;查理曼看到拜占庭的皇帝们统治和保卫教会,又照顾正统的信仰,所以他自己也要为法兰克王国当“教会的主保”(参见 86.2)。这样,他不想承认 787 年 Nicaea(尼西亚)主教会议的规定,因为法兰克的教会没有参与那次会议。因此,查理曼让自己的宫廷神学家(其中最重要的大概是 Theodulfus de Orleans 特欧多夫)再次检察 Nicaea(尼西亚)的会议文献,使他们编写一个篇幅相当大的“备忘录”,就是所谓的 *Libri Carolini*(《卡若卢斯书卷》,789 年或 791 年)——这些书以前多次被怀疑是后人伪造的——,其中尖锐地批评会议的规定。这些书卷既摒弃 754 年

的主教会议,又反驳 787 年的——称之为“崇拜圣像的”——会议,声称 754 年的会议在“圣像”和“偶像”之间划了等号,而 787 年的会议的错误在于允许圣像的“朝拜”。根据 *Libri Carolini*(《卡若卢斯书卷》)的说法,圣像既不要捣毁,又不要尊敬,因为这些画像仅仅是教堂中的“装饰品”,其作用只是纪念已往的事;根据教会的传统,值得尊敬的是基督的十字架、《圣经》、感恩祭用的器皿以及圣人/圣徒的圣髑。法兰克人寄给 Hadrianus(哈德良)教宗这些《卡若卢斯书卷》的初稿(文件长达 85 章),但教宗在 791 年(或 792 年)的回答中保卫了 Nicaea(尼西亚)会议的立场。Carolus Magnus(查理曼)虽然收到了教宗的回答,但他仍然于 794 年在 Frankfurt am Main(法兰克福)举行了一个谴责 Nicaea(尼西亚)会议的主教会议,而教宗派遣的使者们也赞同那次会议的文献。这一事件对教宗来说肯定是一个打击,但他很明智地保持缄默,没有进一步激化他和法兰克王的冲突。

92.4 在东方的人不久后也再一次讨论或反驳 Nicaea(尼西亚)会议的结果。号称“亚美尼亚人”的 Leo V(利奥五世)皇帝(813-820 年)认为,以前的皇帝们不能战胜阿拉伯人的原因是他们崇拜了圣像,所以他于 815 年恢复了 iconoclasms(破坏圣像运动)。他恢复了 754 年那些反对圣像的规定的有效性,强迫 Nicephorus(尼克弗若斯,参见 91.2)宗主教辞职并流放他。Studios(斯图丢斯)隐修院的院长 Theodorus(特奥多尔,参见 91.2)——一位很渊博的学者——成为保卫圣像的强有力辩护人;虽然他遭受了压迫、侮辱、鞭策和流放,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反驳皇帝并向罗马教宗提出呼吁。这次的迫害又沉重地镇压了隐修者并持续 30 年之久,因为号称“结巴的”Michael II(弥格尔/米迦勒二世皇帝,820-829 年)和 Theophilus(特欧菲卢斯皇帝,829-842 年)也是“捣毁圣像者”。在后来的几年中,拜占庭的历史好像重复以前的转变,因为在三个反对圣像的皇帝后又出现了一个肯定圣像的皇后。在皇帝去世后,Theodora(狄奥多拉)皇后上台,而她本来始终是一个尊敬圣像的人,虽然原先不能公开表达。她替年轻的 Michael III(弥格尔/米迦勒三世)皇帝摄政,与新上任的宗主教 Methodius(美多丢斯)一同在 843 年的主教会议上恢复了尊敬圣像的权利。为了纪念这一事件,教会在四旬斋期第一个主日开始举行“正统信仰的伟大节日”(das grosse Fest der Orthodoxie)。这个节日以及对圣像的尊敬在东方教会都被遵守,一直到今天。

92.5 东方再次进行的破坏圣像运动导致与西方的谈判。因为 Michael II(弥格尔/米迦勒二世皇帝)想获得西方领导者的支持,他派遣一些使者到 Ludovicus Pius

(虔诚者路易皇帝)那里。因此,Ludovicus(路易)皇帝在获得 Eugenius II(尤金尼乌斯二世教宗)的批准之后于 825 年命令西欧的神学家们在 Paris(巴黎)的会议上谈论相关的问题。这个会议又重复了 Carolus Magnus(查理曼)的观点。Lyon(里昂)的总主教 Agobardus(阿格巴德,840 年去世)曾写书表达了这个立场(参见 PL 104)。仅仅一位主教,即 Turino(都灵)的主教 Claudius(克劳迪乌斯,约于 827 年去世)提倡一种过分的“灵性主义”(ueberspannter Spiritualismus),他完全反对任何圣像(参见他的 *Liber apologeticus*, PL 104),甚至命令教友们把各地教堂的十字架拿出去。然而,Orleans(奥尔良)的主教 Jonas(约纳斯,参见 PL 105)和 St. Denis(圣德尼隐修院)的爱尔兰隐修者 Dungal(顿伽勒,参见 PL 102)都写过一些反驳他的著作,而皇帝也批准他们这样做。

93

在 Photius(佛提乌斯)宗主教时代的动荡。

869/870 年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主教会议(第 8 届大公会议)

93.1 在 9 世纪上半叶,希腊教会中发生了一些严重的争论,而这些争论同时也是东、西方教会长期分裂的前奏。拜占庭的一位新主教引起这些动荡。自从 847 年以来,一位很虔诚的,但在政治上非常保守的宗主教即 Ignatius(伊格纳提乌斯)——他是 Michael I(弥格尔/米迦勒一世)的儿子并曾当过隐修者——当拜占庭的主教。他的情况相当难;他的政治对手是一些主教,但最大的对手是 Caesar Bardas(巴达斯),他是 Michael III(弥格尔/米迦勒三世,842 年,856 - 867 年)的叔叔并在 856 年后完全控制了他的侄子,因为在 856 年 Michael(弥格尔/米迦勒)被宣布为成年人,而他的母亲 Theodora(狄奥多拉)被迫离开政治舞台。在 858 年的主显节那一天, Ignatius(伊格纳提乌斯)主教公开地拒绝 Bardas(巴达斯)领受圣体,因为 Bardas(巴达斯)据说过着一种不道德的生活——这种谴责大概是没有根据的。由于这个事件并且因为他的政治立场, Ignatius(伊格纳提乌斯)主教于 858 年 11 月被迫辞职,而代替他被提名主教的人是 Photius(佛提乌斯)——他是 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的朋友,来自皇家贵族家庭,曾经担任过国务卿和皇家卫队的元首,又是当时最渊博的学者(参见 91.2)。Photius(佛提乌斯)本来是一个平

信徒,所以他在 5 天内接受了一切圣品,随后又被祝圣为主教;祝圣他的人是 Syracuse(西拉库斯)的总主教 Gregorius Asbesta(额我略/贵格利)——他曾被 Ignatius(伊格纳提乌斯)开除教籍——以及其他两位主教,他们大概是拥护 Ignatius(伊格纳提乌斯)的人。Ignatius(伊格纳提乌斯)本来完全奉献了自己,不要求教会中的地位,但很多隐修者都拥戴他;这些人也反驳 Photius(佛提乌斯)的政策,虽然 Photius(佛提乌斯)在祝圣典礼曾经向 Ignatius(伊格纳提乌斯)表示敬意。这些隐修者在 Smyrna(士麦纳)的总主教 Metrophanes(梅特若法内斯)的领导下聚集在 Irenenkirche(伊任内大教堂)并宣布 Photius(佛提乌斯)是宗主教职位的篡位者,所以他不能当主教,应将他开除教籍。因此,拥护了 Photius(佛提乌斯)的人在 859 年春天的一次主教会议上(在 Apostelkirche 宗徒/使徒大教堂中)宣布那些拥护 Ignatius(伊格纳提乌斯)的人被开除教籍,拥护他的主教被罢免,而如果 Ignatius(伊格纳提乌斯)自己想恢复自己的主教职,他也被开除教籍。因此,政治上的对立导致拜占庭教会中的严重分裂。

93.2 那时,Michael(弥格尔/米迦勒)皇帝邀请教宗派遣一些使者参与一个决定圣像问题的主教会议。同时,Photius(佛提乌斯)也通知教宗他现在当宗主教。那位有敏锐眼光的 Nicolaus I(尼苛劳/尼哥拉一世教宗,858 - 867 年,参见 87.3)不能忽略 Photius(佛提乌斯)任宗主教事件的疑问(提名一个平信徒,由 Gregorius 总主教祝圣——这位 Gregorius 的事在罗马尚未决定)。教宗派遣了两个使者到东方,要他们调查具体情况,同时要求东方皇帝归还那些由 Leo III(利奥三世)当时夺取的罗马财产和权利(参见 92.1)。教宗的使者跨越自己的权利——他们作出一个仅仅属于教宗的决定。他们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一次大的主教会议上确认了 Ignatius(伊格纳提乌斯)的辞职,但 Ignatius(伊格纳提乌斯)认为他被迫辞职,所以他并没有真正辞职,而不愿意承认这些使者为裁判员。属于 Ignatius(伊格纳提乌斯)派的人向罗马教宗报告这件事,而教宗在 863 年的一次罗马主教会议上宣布两个使者被撤职,Photius(佛提乌斯)的圣品都被宣布无效;如果他和他的拥护者不服从,他们将被开除教籍。另外,这次主教会议规定 Ignatius(伊格纳提乌斯)和他党派的人要恢复他们原有的地位;教宗希望, Ignatius(伊氏)将会听从罗马关于 Illyricum(伊吕利亚)宗主教区的要求。然而,罗马人的决定没有马上见效,因为东方朝廷保护了 Photius(佛提乌斯)。Michael(弥格尔/米迦勒)皇帝甚至严厉地要求教宗收回他的规定。Nicolaus(尼苛劳/尼哥拉)教宗很坦然地向皇

帝说明罗马教宗的特权,但他同时说,如果 Ignatius(伊格纳提乌斯)和 Photius(佛提乌斯)都派遣一些使者,他愿意再次在罗马谈论他们的情况,重新作决定。不久后(866年),保加利亚转向罗马教会(参见 83.3),而这种转变在拜占庭引起很大的不满,所以 Photius(佛提乌斯)开始公开攻击罗马。他在 867 年给其他三个东方宗主教写了一份 Encyclica(通谕),其中激烈地谴责了罗马派遣的传教士在保加利亚的活动,谴责西方教会在保加利亚的习俗:星期六守斋(参见第 1 卷,69.1),在四旬期第一周中允许信徒吃奶制品,司铎的独身生活(参见 60.6),谴责罗马教会不承认希腊司铎施行的坚振圣事。他也反对西方人关于圣神/圣灵由父“及由子”出发的说法,认为这是一种异端邪说,但他没有具体提到“Filioque”(“及由子”)这个词,而这个词当时还没有被采纳到罗马礼仪的《信经》当中(参见 90.2)。据说,Photius(佛提乌斯)也曾经说,皇帝将朝廷从罗马挪到东方也意味着教会的首席权也同样转移到君士坦丁堡——但更多理由暗示,这种说法并不来自 Photius(佛提乌斯)。这份《通谕》又邀请东方的宗主教们来参与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大规模主教会议,而这个会议的目标是审判教宗。这次会议举行在 867 年夏天,而皇家贵族人也出席会议。这次主教会议严厉谴责 Nicolaus(尼苛劳/尼哥拉)教宗为“持异端者以及主葡萄园的捣毁者”,罢免和开除他。这就意味着彻底的分裂。几乎所有的西欧人都支持教宗。一些法兰克神学家,比如 Paris(巴黎)的 Aeneas(艾内亚斯)和 Corbie(科尔比)的 Rathramnus(拉特兰努斯,参见 89.4)都曾经写过论文来反驳希腊人的攻击。

93.3 实际上,Photius(佛提乌斯)的胜利没有长期的影响。867 年秋天,原来的 Mitregent(“政权的分享者”)Basilius I(巴西略/马西流一世)先暗杀 Michael(弥格爾/米迦勒),后单独掌握政权(867-886 年)。政治上的转变也带来了教会上的转变,这是拜占庭历史上多次发生的事实。新皇帝登极几天之后,他就强迫了 Photius(佛提乌斯)退位,恢复了 Ignatius(伊格纳提乌斯)的职位,又恢复与罗马教宗的联系。Hadrianus II(哈德良二世教宗,867-872 年)在 869 年的罗马主教会议上作出了一个规定,而主教们在第 8 届大公会议上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869 年 10 月到 870 年 3 月),在教宗派来的三位特使的指导下接受了教宗的规定:Photius(佛提乌斯)被审判为“篡位者”和“新的 Dioscurus(狄奥斯库若斯)”(参见第 1 卷,55.2),并被开除教籍。他的随从也被开除,而被他祝圣的人被撤职为平信徒。然而,Photius(佛提乌斯)和他大部分的追随者都不愿意服从。当时,保加利亚人要求

再次进入拜占庭的宗主教联盟(Patriarchalverband),而在一个附加的会议上,主教们决定再一次接受保加利亚人,虽然教宗的使者提出抗议;这就意味着,罗马和拜占庭之间的张力更进一步加剧。罗马的 Johannes VIII(约翰内斯八世,872 - 882年)要求 Ignatius(伊格纳提乌斯)宗主教交出保加利亚,甚至用“罢免”和“开除”的可能性来威胁他,但宗主教没有回应教宗的要求。

93.4 后来 Ignatius(伊格纳提乌斯)和 Photius(佛提乌斯)和好了,而后者在被流放的地方也保持和他的拥护者的联系;他重新获得了皇帝的青睐,而皇帝请他教育他的儿子们。在 Ignatius(伊格纳提乌斯)去世后(877 年或 878 年),Photius(佛提乌斯)第二次当宗主教。现在大部分的人都尊敬他,东方的其他主教也承认他。因为教宗 Johannes VIII(约翰内斯八世)面对着穆斯林军的危险,他需要拜占庭的协助(参见 87.5),所以他想回应这种新的局面:教宗说他将会承认 Photius(佛提乌斯)为宗主教,但有一些条件:他必须在一个主教会议上忏悔他以前的行动;他必须放弃对保加利亚的管辖权,必须与 Ignatius(伊格纳提乌斯)派和好。教宗的使者们带着这些要求到东方去。然而,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879/880 年的主教会议上,Photius(佛提乌斯)说服了教宗的使者们。他并没有忏悔原先的行动——在教宗文献的希腊语译本中,人们忽略了关于“忏悔”的段落。Photius(佛提乌斯)几乎无条件地被承认为适当的宗主教,而 869/870 年的主教会议被宣布为无效(因此,希腊教会今天仍然认为,879/880 年的主教会议是“第 8 届大公会议”)。在最后两轮会议中,主教们重复了 Nicaeno - Constantinopolitanum Symbolum(尼西亚 - 君士坦丁堡《信经》),又说任何加上的或减略的词都是错误的,除非将来还得因新的异端改变某一条。关于保加利亚没有任何改动。因为拜占庭的管理一段时间比较松懈,保加利亚的君主就努力组织一个尽可能独立的“国教”(nationale Kirche)。虽然这一切对罗马教宗来说都很不利,但再没有出现新的分裂。Johannes VIII(约翰内斯八世)和他的继承人都承认 Photius(佛提乌斯)为宗主教,虽然他在 885/886 年写的 *Mystagogia Spiritus Sancti*(《圣神/圣灵的奥迹》)重新批评拉丁神学家关于“圣神/圣灵由圣父及圣子出发”的说法。有的历史学家曾经说,在 Formosus(福尔摩苏斯,891 - 896 年)的时代发生了所谓的“第二次教会分裂”,但从史料来看没有足够多的理由来坚持这种说法。Photius(佛提乌斯)宗主教正在他活动的顶峰时期又遇到了一个悲剧性的转变:原来当过他学生的 Leo VI(利奥六世皇帝,886 - 912 年)——号称“明智者”——在掌握政权后(由于政治问题和个人的反感)马上撤职

他原来的老师并让自己的弟弟——Stephanus (斯德望/司提反,他当时才 16 岁)——当宗主教。Photius(佛提乌斯)被送到一个隐修院,在那里于 892 年去世。

希腊人始终很尊敬他。自从第 10 世纪末,他甚至在一些官方的文献中被称为“宗徒/使徒般的普世性的老师”(didaskalos apostolikos oikoumenikos)或“圣者”。西方教会对于他的评价可以说是充满成见的,因为中世纪的人比较缺少历史学的辨别能力(Mangel an historischer Kritik)。西方人视他为一个典型的拜占庭人,他有拜占庭人的优点,更有他们的缺点,他出于个人的利益煽动了希腊人的优越感,使他们看不起西方的“野蛮人”和“异端人”,这样预备了东、西方教会的分裂,在分裂的灾难性过程中,他被视为最关键的人。然而,在最近几十年中,一些西方学者努力于恢复他的名声(Ehrenrettung),这些人不仅仅承认他是一个伟大的学者,而且也意识到,他个人有崇高的心态,并且愿意保护教会。

Leo VI(利奥六世)皇帝于 906 年第四次结婚了,但教会法和世俗的法律都禁止了“第四次”,这就引发了所谓的 Tetragamiestreit(“四次婚姻争论”)。当时的宗主教 Nicolaus Mysticus(尼苛劳/尼哥拉)——他是 Photius(佛提乌斯)的侄子——禁止皇帝进教堂,但他被撤职,而某一位 Euthymius(尤提米乌斯)被提名为宗主教;然而,Nicolaus(尼苛劳/尼哥拉)在 911 年能够恢复他的地位。虽然如此,Euthymius(尤提米乌斯)的追随者保持了分裂的状态,一直到 950 年后。

94

东、西方教会 1054 年的分裂

94.1 在 Photius(佛提乌斯)的动荡平息以后,希腊教会和拉丁教会之间的纽带仍然没有成为一个坚固的友谊联盟。双方彼此的异化已经太旧、太深了。东、西方人的语言不同,民族性格不同,教会组织制度和教会纪律标准不同,礼仪和神学有不同之处,所以东方和西方的教会再也无法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出了文化和教会方面的差异还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冲突:拜占庭原来统治了意大利中部和北部,但后来失去了对该地区的管辖权,教宗们转向法兰克人,教宗在原先属拜占庭的地区(Ravenna 拉文纳等)建立“教会国”,Carolus Magnus(查理曼)被加冕为“皇帝”,而在 Otto Magnus(大奥托)的时代,罗马帝国被恢复起来了——这一切加深了希腊人

对拉丁人的反感,使之成为无限度的憎恨。几个 Otto(奥托)皇帝曾经“以独裁者的态度”统治了罗马,并且在意大利南部削弱了拜占庭的影响力(参见 88.4-6),这在东方人的心中造成重大的伤痛,所以第 10 世纪的拜占庭人再没有渴望恢复与西方人的团结和友谊。希腊人认为,自己是最正统的信仰团体,所以他们在拉丁教会一些特殊表现中仅仅看到一种“脱离宗徒/使徒传统的错误”。因此,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潜在的教会分裂”(latent vorhandenes Schisma),而任何不幸事件就能使它转化为公开的和固定的分裂态度。

94.2 在 10 世纪末和 11 世纪初的年代确实已经发生了两个教会的分离;当时的君士坦丁堡宗主教是 Sergius(塞尔吉乌斯,999-1019 年)。当时,东方人在 Diptychon(在礼仪中被宣读的历代主教名单)中抹掉了教宗的名字。后来的 Eustathius(优斯塔提乌斯,1019-1025 年)再次因一些政治理由接近罗马;据说他请 Johannes XIX(约翰内斯十九世,参见 88.7)允许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教会“在自己的范围内”(in suo orbe)可以称它为“大公的”(oecumenicus),正如罗马教会对于整个基督宗教世界被称为“大公的”。不过——根据某些文献记载——西方教会中的“改革派”尖锐地反对这种要求。Eustathius(优斯塔提乌斯)第二个继承人是 Michael Cerularius(凯卢拉利乌斯,1043-1058 年),是一位有政治头脑的、充满抱负的、狡猾的人,他再没有约束自己的激情。因此,那种已有很长“潜伏期”的教会分裂好像是他引起的,潜在的分裂突然变成公开的现实。早在 1050 年,他谴责西方信徒为“异端”。根据他 1053 年发表的命令,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拉丁教堂和拉丁隐修院被关闭或没收。反对拉丁信徒的主要原因是这个:他们从 8 世纪末以来在礼仪中使用了无酵饼(azyma,参见 98.3),因此被骂为“无酵派”(azymites)。在进行宗主教的命令时,某一位 Sacellarius Constantinus(“管财者”君士坦丁)甚至宣布拉丁信徒的圣体(圣饼)并没有被祝圣,所以扔在地上用脚踏它。受了 Cerularius(凯卢拉利乌斯)的推动后,保加利亚的总主教 Leo de Achrida(阿克利达的利奥)也开始写一些攻击西方教会的文件:他向意大利南部 Apulia(阿普利亚,曾经属于拜占庭)地区 Trani(特兰尼)的主教 Johannes(约翰内斯)写了一封信:“向法兰克人的主教们以及向教宗本人”;他在信中说西方的主教们是“半个犹太人和半个外教人”,因为他们遵守犹太人关于无酵饼的规律,在四旬期遵守安息日守斋的原则,又吃带血的肉并在四旬期不唱“阿肋路亚/哈利路亚”。不久后,一位有威望的老隐修士 Nicetas Stethatos(尼克塔斯·斯特塔托斯)——他

来自君士坦丁堡的 Studios (斯图丢斯) 隐修院——除了无酵饼和周六守斋还特别谴责拉丁教会圣职人员的独身规律。当时的人似乎没有提到“及由子”的论点,但无酵饼的争论使东方和意大利南部陷入激烈的争吵和不安。

94.3 面对着这些控诉的西方教会并没有保持一种冷漠的态度。教宗 Leo IX (利奥九世, 1049 - 1054 年) 委任自己的秘书和顾问 Humbertus de Silva Candida (亨伯特枢机主教, 参见 89.6; 103.2) 去反驳这些谴责。这位枢机主教是一个有才华有学问的人(他学过希腊语), 又是一个兴奋的改革者, 但同时也是一位草率的神学家; 他对于争论的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在他的 *Dialogus* (《对话》, 1053 年秋天) 中, Humbertus (亨伯特) 反驳了希腊人的种种批评, 而这个回答是充满理智的。然而, 他同时攻击了东方教会的一些习惯, 比如司铎们的婚姻——这个习惯在 325 年的主教会议上被允许了, 但 Humbertus (亨伯特) 称之为“奸淫”和“Nicolaitism (尼苛劳/尼哥拉主义) 的异端”(参见 102.3)。他谴责希腊人, 说他们属于 Macedonius (马克多尼乌斯) 派, 因为他们从信经中拿掉了“及由子”一个词。他也几次以“开除教籍”来威胁他们。双方的冲突太深, 沟通似乎是不可能的。在 1054 年初, Constantinus IX Monomachus (君士坦丁九世皇帝, 1042 - 1054 年) 邀请罗马派遣一些使者到东方的首都来, 而教宗派三个人到东方去: Humbertus (亨伯特), 教宗的国务卿 Fredericus de Lothringia (腓特烈, 他就是后来的 Stephanus IX 斯德望/司提反九世教宗) 以及 Amalfi (阿马尔菲) 的总主教 Petrus (伯多禄/彼得)。Humbertus (亨伯特) 和 Nicetas Stethatos (尼克塔斯) 举行了一次辩论会, 而皇帝后来命令烧毁 Nicetas (尼克塔斯) 的论战文章, 但宗主教 Cerularius (凯卢拉利乌斯) 的态度很骄傲, 居高临下。他煽动群众反对拉丁教会的代表们, 又禁止他们在君士坦丁堡举行弥撒礼仪。在这样的条件下, 教宗的使者采取了最极端的措施: 他们认为 Leo (利奥) 教宗会完全同意他们决定——实际上, 教宗于 4 月 19 日早已去世了——并于 1054 年 7 月 16 日在“圣智慧教堂”的祭坛上在圣职人员和信徒会众面前放下了《禁令诏书》(Bannbulle); 这部《禁令诏书》是 Humbertus (亨伯特) 写的, 内容非常尖锐地谴责宗主教和他的拥戴者, 并且开除他们。罗马的代表们希望, Cerularius (凯卢拉利乌斯) 现在会开始谈判, 但这个想法没有实现; 最后皇帝还想缔造和平, 但也无效。罗马的代表们就离开了。在一次主教会议上, Cerularius (凯卢拉利乌斯) 重复了 Photius (佛提乌斯) 于 867 年宣布的宣言(参见 93.2) 并将拉丁教会的人开除教籍。Antiochia (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 的宗主教 Petrus (伯多禄/彼

得)认为,双方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而且恳切地请求了 Cerularius(凯卢拉利乌斯)再次恢复教会的合一。但是,这个深深令人感到遗憾的分裂继续存在,并由于第一次十字军运动的冲突成为一个固定的破裂。在第一次十字军运动后,希腊人似乎无法宽恕“法兰克人”。不久后,君士坦丁堡的先例也成为其他东方宗主教的标准,而一切通过希腊教会皈依的民族或与拜占庭有比较多教会关系的民族,比如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俄罗斯人和罗马尼亚人都被卷入这个教会分裂中,一直到今天,任何一个基督徒在内心上都会为此感到非常难受。

第四章 教会制度、礼仪、纪律和习俗 (以西方教会为主)。

受格尔曼/日耳曼影响的教会法。 教会改革的开始

导论和概括

格尔曼/日耳曼人的观念和社会机构在很多方面影响了教会的生活,但在法律和制度方面这个影响最深厚。在格尔曼/日耳曼人皈依基督信仰时,这种过程早已开始,而在8到11世纪的时候,这个影响达到一个高峰。一方面,法兰克人的人民法典(*Volksrecht der Ribuarischen Franken*,即所谓的*Lex Ribuarica*,约于600年)宣布“教会使用罗马法”(Ecclesia vivit lege Romana),而Carolus Magnus(查理曼)接受并在自己王国颁布了Hadrianus I(哈德良一世教宗)于774年交给他的法律文集——这部*Collectio Dionysio - Hadriana*(《狄奥尼修-哈德良法律文集》)是罗马的隐修士Dionysius Exiguus(狄奥尼修)增编的(参见第1卷65.4)。在Merovingi(梅洛温格)王朝中,国度严格控制教会(schroffes Landeskirchentum),但查理曼更多强调法兰克教会和罗马宗座的关系。虽然如此,国王仍然继续统治他国度中的教会。世俗的力量一方面保护了教会,但另一方面也监督和支配教会。因此,许多格尔曼/日耳曼人的思想和态度因素流入了罗马-基督宗教的法律范围,双方形成了一个无法解散的整体。这一点尤其涉及到地区的教区及其管理制度、教会的财产和赠予关系、对圣职及圣职人员收入的观念、教会在法庭中的代表、圣职人员的特权、作为宗教贵族的主教和隐修院院长们的政治地位、主教的任命权和提名方式、主教堂圣职人员团体和隐修院团体的阶级分配(有的院长是贵族,但修道者不是)、婚姻

法等等。格尔曼/日耳曼人的法律有一种基本的“社会性”特点,就是说它先考虑到团体的需要并认为这些需要是个人自由的限制。这种基本态度为教会法律发展提供一些良好的因素,但在另一方面,教会法和格尔曼人的法律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而这些差别容易引起纠纷和摩擦。古代基督宗教-罗马法尤其强调教会的独立性及自主权,以及教会圣职在公法上的普遍有效性。与此不同,格尔曼/日耳曼人的法律更多从具体物权的角度看待教会的圣职和收税权,这样更强调私法的因素和等级制度的因素——这就很容易忽略某圣职人员在灵修上的资格。与古代教会不同,中世纪的教会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庞大地区的地主,因此太多受物质经济和农业关系的牵连,这就造成一些困难。更有问题的是平信徒对创立和任命高低圣职的影响力(所谓“私有教堂”和“平信徒任命权”)。在11世纪的教会中,改革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因为教会的圈子意识到自己原来的任务是什么,他们追求独立性和教会生活的自主权;但因为世俗的力量绝对不愿意放弃现有的权利,两个权威的碰撞是无法避免的。

95

圣职人员和教区的管理制度

95.1 在法兰克国及北欧或东欧那里,主教区的范围远远超过古罗马帝国教区的范围。在意大利或小亚细亚,城区和教区基本上是一致的(在很多意大利地区后来也是这样的)。在Alpes(阿尔卑斯山脉)以北,乡间的堂区组织——它为教会生活的发展具有关键的作用——现在才被建立,而且在某些地区(如Westphalia威斯特伐利亚)进步很慢。在原来的,由archipresbyter(总铎,总本堂)管理的“大堂区”(Ur-oder Grosspfarreien)的地区,人们创立了新的堂区,而这些堂区有施洗权、收什一税权、举行葬礼权等。主教们在管理广大教区方面需要协助,所以他们一段时间使用了所谓的chorepiscopi(“乡间主教”),他们与古代教会的“乡间主教”(chorepiskopoi,参见第1卷62.1)仅仅在名字上是相同的。在传教时期中,那些没有固定位置、没有具体管理区的“巡逻主教”(Wander-oder Regionarbischöfe)暂时出现在某些地方;与“隐修士主教”或“院长主教”一样,他们具有主教的管辖权。那些“乡间主教”的任务是根据地方主教的指挥采访个别地区,教导圣职人员,落实

纪律,管理空位的教区。这些“乡间主教”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在850年前后开始有人反对他们,比如在845年在Meaux(摩斯)的主教会议上,以及在Pseudo-Isidorus(《伪伊西多尔教令集》,参见87.4)中。因此,“乡间主教”在各地消失,先在法国,后——在10世纪——在德国地区。在那些“非主教性的”任务(即管理任务和审判任务)方面,archidiaconi(总执事)来代替原来的“乡间主教”;在这个时期中,“总执事”经常是被祝圣的司铎,有时候也被称为“乡间主教”。在那些大的教区有好几个总执事。在一般的情况下,教会的“总执事区”的划分符合政治界的划分。这些“总执事区”又分为比较小的区域,称为archipresbyteratus或decanatus(亦称Landkapitel,“十堂区”)。在西法兰克地区,这种划分早在第9世纪完成,但在东部地区在11、12世纪才进行。

95.2 法兰克地区的圣职人员(除了主教们以外)都和以前一样(参见第1卷61.2)拥有世俗法庭的司法权。在罗马帝国中,圣职人员早已获得了privilegium fori(法庭的特权,即:只有教会法庭能审判圣职人员),而这个特权现在也慢慢地被介绍到法兰克地区。有助于这种发展的是格尔曼/日耳曼人的原则(“每一个人要根据自己身份的法律生活”)以及Pseudo-Isidorus(伪伊西多尔)多次提出的要求:只有圣职人员能够审判圣职人员。然而,只有在1073年后,圣职人员才获得了全面的和普遍的解放和承认。

一些规定禁止圣职人员随身带武器或参与战争,比如圣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斯,参见80.3)主持的742年的全国性主教会议(参见会议文献第2条)。然而,那个时代是一个粗暴的、好斗的时期,而一些圣职人员曾多次违背了这个禁令,在中世纪顶峰时期也是这样的。与此有关系的是这样的事实:教区和隐修院必须和世俗的单位一样提供一些战士;Carolus Magnus(查理曼)甚至要求主教们和隐修院的院长们亲自参与军队的远征。前面提到的742年的主教会议已经创立了一种“随军牧灵者”的制度(geregelte Militaerseelsorge)。这种牧灵工作的负责人首先是宫廷圣职,即所谓的capellani(“副本堂司铎”)——他们保存了圣Martinus de Tours(马尔丁)的cappa(祭披),因此得名(参见第1卷72.6)。最高的宫廷“副本堂”(Erzkaplan)一般都是一位主教。他的职位后来发展到Erzkanzler(“总秘书”,“首相”)的职位——他管理着国王的“文书处”;自从10世纪以来,这个职位是一个荣誉职位,都由Mainz(美因茨)总主教承担。

关于圣职人员在这个历史阶段中的独身制度,对于独身制的多次违背行为以

及 11 世纪的改革教宗们对于落实独身制的措施,参见 88.7; 102.3; 103。关于圣职人员的培养和教育,参见 89.1,3。

95.3 在早期的阶段中也有主教每年去视察 (*visitatio*) 的习惯,而在 680 年后,这个习惯再次被肯定[参见 742 年、769 年和 813 年的 *capitularia* (法兰克国王的法令),亦见 813 年 Arles (阿尔) 的主教会议]。在法兰克王国里,这种制度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因为 *Carolus Magnus* (查理曼) 规定,地方的伯爵 (*Gaugraf*) 应该陪同主教进行视察,这样保护、支持而且也监督主教。在 9 世纪,教会和政府要求人民参与:在每一个堂口选择一些品行端正的男人——一般是 7 个人——在堂口中查出那些应该被处理的罪行,这些男人要发誓将要告发违法行为。他们被称为 *testes synodales* (德语: *Sendzeugen*, *Sendschoeffen*), 而整个制度被称为 *synodus* (德语: *Send* 或 *Sendgericht*, “巡逻法庭”), 它模仿了“地方伯爵法庭” (*Grafengericht*) 或“初级裁判所” (*Ruegeverfahren*)。Pruem (普若姆) 的隐修院院长 Regino (瑞格诺/雷吉诺) 曾写过关于举行主教视察和“临时法庭”的详细指导 (参见 89.5)。在法兰克地区中,这种 *Send* (巡逻法庭) 在消除迷信习俗并执行基督宗教道德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后来还继续是公共秩序的重要支柱,而在一些地区以一种改变的形式一直维持到 20 世纪。

对教会生活很有影响的制度是教会的会议。教区会议 (*Dioezesansynoden*) 每年举行一次或两次,但教省会议就没有那么频繁了。在法兰克地区还有一些由国王召集的“全国主教会议” (*National - oder Reichssynoden*)。参与这些会议的人不仅仅是教会的领导者,也是世俗社会的领导人物,所以这些会议被称为 *concilia mixta* (“混合会议”), 其规定被宣布为国家的法律 (*capitularia* 《法令》)。这些会议结合“帝国议会” (*Reichstag*) 和“主教会议” (*Synode*), 又表示国度和教会的密切合作。

95.4 在 5 到 7 世纪的动荡中,圣职人员的团体生活 (参见第 1 卷, 60.2) 在各地被解散了 (除了在西班牙北部地区外), 但在 8 世纪,这种团体生活再一次被恢复起来。Metz (梅斯) 城的杰出主教 *Chrodegang* (赫洛德冈, 766 年去世) 约于 760 年为城里圣职人员写了某一个具体的生活规则 (这是根据圣本笃的《会规》编写的)。这种“规则”要求圣职人员共同在 *claustrum* (“隔离的地方”, “隐修院”) 居住和吃饭, 每天隆重地举行弥撒并念祈祷文 (*Chorgebet*), 每天聚集到一起并宣读《圣经》的一章 (拉丁语称 *capitulum*, 因此这个聚会的地方和团体也称为 *Kapitel*)。这种规

则并没有要求圣职人员完全放弃自己的财产；个人将自己的财产让给教堂，但他有用益权(Nutzniessung)。这种制度被称为 *Vita canonica* 或 *Vita communis*(圣职团)，而其中的圣职人员被称为 *canonicus / canonici*(“圣职团团员”)，这个名称也许来自团体的名单(*canon = matricula*)或来自那些要遵守的 *canones*(“规则”，就和隐修士的 *regula*“会规”类似)或来自他们定期要朗读的 *horae canonicae*(每日礼赞)。这种制度有良好的影响，因为它能够提高圣职人员的身份意识和义务感，同时也改进神学教育。*Carolus Magnus*(查理曼)很支持这种“圣职团”制度，所以不仅那些主教大堂形成这样的团体，而且比较大的堂区教堂——如果有比较多司铎——都形成这样的团体。因此，除了“主教大堂圣职团体”(所谓的 *ecclesiae in domo episcopi = Domkirche*，因此称 *Domkapitel, Domstifter*)之外还存在着“堂区圣职团”(即13世纪以来称为 *Kollegiatkirchen, Kollegiatstifter* 的团体)。主教大堂圣职团的元首是主教，而“堂区圣职团”的领导是“长上”(*praepositus, praelatus*，德语的 *Propst*)。与 *Ludovicus Pius*(路易)对隐修院的改革运动有关系的816年在 *Aachen*(亚琛)举行的主教会议(参见101.1)曾经为这些圣职团提出一些新的规定，又为类似的妇女团体(所谓的 *Chorfrauen* 或 *Canonissae*)作出一些规定。然而，在后来的动荡不安的时期中，圣职团的生活又衰退了。在9和10世纪中，这些圣职团分开了主教的财产和弟兄们的财产(*mensa episcopalis, mensa fratrum*)，又为后者规定一个固定的薪俸数目——这样就能够预防世俗化或为世俗目标必须提供服务的危险(*Reichsservitien* 等)。自从第9世纪以来这些“圣职团”也部分上开始放弃“共同居住”的原则。在1050年后又有一种复兴 *vita canonica*(“圣职团生活”)的运动(参见117.1)。

96

教产和“私有教堂”的制度

96.1 通过“赠予”、遗产和荒芜地区的开垦工作，教会的财产在法兰克地区逐渐增加，并在7世末大约包括整个法兰克领土的三分之一。然而，在那位武断的 *Carolus Martellus*(查理·马特, 714 - 741年)的时代，教会的财产被减少很多。因为属于他王家的财产(*Krongut*)不足以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骑士军队，为奖赏在战

争和政治上有贡献的人也不够用,所以他大量地施用教会或隐修院的财产,将这些财产的受益权交给他的封臣随从——这被称为 *in commendam* (德语的 *Kommende*, 即“委托物”)——或简直把一些教区或隐修院交给某些平信徒。他的儿子们 *Carolomannus* (卡洛曼) 和 *Pippinus* (丕平) 部分上纠正了这种“世俗化运动”(743 年和 745 年); 如果那些被交出的教产无法被归还, 现在的拥有者被要求向教会交纳一种“租赁费”, 因为这些财产是教会的 (*precariae* 借物)。 *Carolus Magnus* (查理曼) 在他的任期头十年中也曾施用教产和属于王家的财产一样, 而在 9 和 10 世纪也经常发生一些严重的损害教会财产的事件: 某些王侯或贵族人士侵略了教会的财产权。然而, 从整体来看, 教会的财产又增加了很多, 所以教会管理着很多资源, 这样能够完成它在社会上的种种任务。自从卡洛林王朝以来, 农产的十分之一 (“什一税” *decuma*, *tithe*, *Zehnte*) 也归于教会。这种“什一税”在古代教会也有 (参见第 1 卷 19.3), 而人们大约自愿地交出了这种税, 但在 585 年的 *Macon* (马松) 主教会议上, 主教们严肃地要求信徒交税 (会议文献第 5 条), 甚至说那些不交税的人将面临开除教籍的危险。 *Pippinus* (丕平) 于 765 年肯定这种要求, 而 *Carolus Magnus* (查理曼) 在 779 年的 *Heristal* (赫瑞斯塔尔) 的 *capitulare* (“法令”) 宣布“什一税”为国度的法律。几个主教会议 [794 年在 *Frankfurt* (法兰克福) 和 813 年在 *Mainz* (美因茨) 的会议] 都重新肯定这个规律。什一税确保了教会的经济基础; 在开始的时候, 这种收入完全归于各地的本堂, 但后来部分上 (四分之一) 也归于主教们。

96.2 根据格尔曼/日耳曼的传统概念, 一位圣职人员不能在法庭中出现, 因为他不能带武器 (参见 95.2)。因此, 各地的教堂和隐修院在法律纠纷中需要有世俗的代表人, 就是所谓的 *advocati* (“代理人”, “掌管人”, 德语: *Vogt*, 参见英语的 *advocate* 律师)。 *Carolus Magnus* (查理曼) 要求所有的教区和隐修院都有这样的“掌管人”。这个 *advocatus* (掌管人) 为交托给他的机构要发誓妥当地保护它, 如果需要他还得为它去比武 (参见 102.1); 他对外保护这个地区, 对于居民还有审判的权利 (先是“小事审判权”, 但从 9 世纪以来也是“大事的审判权”)。自从 9 世纪以来, “掌管人”的职位成为一个世袭的制度, 而这些“掌管”都有相当多的权利和收入, 所以贵族人士追求这个职位, 但对各地的教堂和修院来说, 掌管的制度在很多方面是一个负担及种种滥用的根源。

96.3 格尔曼/日耳曼人的法律意识给早期中世纪的教会组织打上了一个特殊的烙印, 就是所谓的 ***Eigenkirchenwesen*** (*ecclesia propria* 私有教堂制度)。这种制

度的根源是格尔曼/日耳曼人的文化,而且早在古代已经出现过(第1卷,62.2)——当时的格尔曼/日耳曼基督徒在罗马帝国中有“私有教堂”的个别现象。这种制度特别多出现在7世纪以后的法兰克王国,但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有。“私有教堂”的制度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富有的地主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一所教堂、小圣堂或一所隐修院以及规划一些地产交给这个教堂(或隐修院),那么这个地主认为这个教堂(隐修院)以及这个教堂的收入都是他自己的财产(*ecclesia propria* 私有的教堂)。他认为,教堂始终要有教堂的作用(不应该把它世俗化),但这座教堂和他的其他财产一样:地主可以出卖它,将它作为遗产,交换它或赠予它,可以随意雇用一个圣职人员或教会长上,可以按照“封地”(beneficium)的模式将教堂给予一个圣职人员,又可以撤他的职位,要求他为自己效劳,可以在圣职人员的死亡后再次收回这个财产(或部分上收回它,这个权利后来称为 *ius spolii*),可以在没有圣职人员的时候收取教堂的收入(后来称为 *ius regaliae*),可以为自己利用信徒的奉献品、什一税和弥撒献仪。如果一个平信徒获得了一个教堂或隐修院为“Kommende”(拥有受益权,参见上文96.1)或拥有其“掌管权”,也是类似的情况。不仅仅个别人(比如国王或贵族人士、主教)可以拥有“私有教堂”,而且教会机构——比如一所隐修院——也同样可以有“私有教堂”。在第8世纪,这个“私有教堂”制度已经非常盛行:“私有教堂”的数目远远比教区教堂的数目多。“私有教堂”制度是法兰克国的“国教会”制度的强大支持力量,而在传教时期中,这个制度帮助教会在乡间地区提供一些教堂。然而,古代基督宗教和罗马教会对“圣职”的基本概念是不同的:一位主教要为整个教区负责任,他要指定谁当本教区各职位上的牧灵者,他应该管理教区的全部财产。“私有教堂”的制度与传统的概念是针锋相对的,必然会引起很多误会。因此,Carolus Magnus(查理曼)和 Ludovicus Pius(虔诚者路易)早就想确保圣职人员在私有教堂中的地位,不让地主们随意摆布他们。他们作出这方面的规定:不能提名不自由的人当圣职,主教必须同意圣职人员的雇用和解雇,主教应该始终监督这些圣职人员。虽然曾有很多人提出抱怨,但“私有教堂”的制度仍然继续存在,而在罗马宗座比较软弱的时期,Eugenius II(尤金尼乌斯二世教宗)和 Leo IV(利奥四世教宗)在罗马的主教会议上(826年和853年)承认了这个制度,但 Nicolaus I(尼苛劳/尼哥拉一世教宗)却拒绝它。私有教堂在当时确实是根深蒂固的,因为它从小的教堂扩展到大的教堂,尤其扩展到教区,并将教区也卷入整个封建化的过程(参见97)。那些改革教宗们如 Nicolaus II(尼苛劳/尼哥拉二

世)、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和 Paschalis II(帕斯卡利斯二世)在“授权之争”禁止任何平信徒将圣职交给某人,但这个禁令一开始没能贯彻。在 1122 年的 Wormser Konkordat(沃尔姆斯协约,参见 105.6)中,国度和教会找到了关于“授权”的平衡协约;而在这个协约之后,教会法典[参见 Gratianus(格拉提安), Alexander III(亚历山大三世)等]规定,管理那些小的教堂的平信徒只有“保卫”(patronatus)和“建议候选人”(praesentatio)的权利,但主教必须亲自任命某一个圣职人员,这样才能够彻底取消小教堂的“私有教堂制度”。

97

高层圣职人员的政治地位以及君主对任命圣职人员的影响

97.1 由于在法兰克地区国度和教会之间的密切关系,高层圣职人员(称 Praelati,就是主教和隐修院院长们)早已获得了特殊的政治特权。自从第 7 世纪中叶,国王在政治的重大问题上请他们充当顾问或请他们为朝廷服务,所以他们有着与世俗贵族相等的地位。这种崇高的地位源自他们的神圣尊严,同时也因为他们受过的高级教育,并且大部分的主教本来就是贵族家庭出身的,而这些圣职人员也管理着很大的地区或财产(参见 96.1)。当时已经有个别的教堂或隐修院享受了 immunitas(免税特权和法庭上的特权)。教会的地主们让自己的管理人和官员们去向民众收税,而通过他的 Vogt(“掌管人”),圣职人员可以施行审判权,先是“小事的审判权”,而在 850 年后也拥有了“大事的审判权”(参见 96.2)。自从 9 世纪以来,似乎所有的法兰克王国内的教堂和比较大的隐修院都享受了 immunitas(免税免受审权)。另外,主教和院长们早就获得了另一些主权(Hoheitsrechte, regalia“王权”),比如开市权(Marktrecht),造币权(Muenzrecht)和关税自主权(Zollrecht)。国王也允许圣职人员享有“伯爵”(Grafenschaft)的地位及相关的权利。Carolus III(卡若卢斯三世)于 887 年首次授予 Langres(兰格)的主教这个权利,而 Henricus I(亨利一世)于 927 年授予 Toul(图勒)的主教这个尊位。在德国, Otto I(奥托一世)皇帝曾多次给主教们或隐修院院长们授予一些特权、地产或伯爵尊位,这样希望他们是王位的可靠支柱,因为那些贵族公爵经常是很自私的或不愿意服从的人[关于 Otto(奥托)的制度,参见 88.3]。教会的贵族人士——他们的封地不能是世

袭的——形成了与世俗贵族人士的抗衡力量；中世纪的德国国王主要都依赖于这些圣职人员贵族在经济和军事上的能力，才能够维持自己的王权。一直到13世纪，一些主教或隐修院院长充当宰相、部长、外交官（甚至还是将军）——这是非常自然的事，而这些教会人士一般都很杰出地完成了交给他们的任务。在德国地区，这些“圣职人员国度”（*geistliche Staaten*）的发展在第13世纪结束了：Fredericus II（腓特烈二世皇帝）于1220年颁布了他的“特权信”，而他的儿子 Henricus VII（亨利七世）也肯定这些（1231年，又于1232年由 Fredericus 腓特烈确认）。从此，德国的“国度主教”和“国度院长”（*Reichsbischoefe und Reichsaebte*）在他们的地区内成为完全有主权的“国主”（*Landesherren*），他们是帝国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基本上一直到1803年都是这样的。

97.2 上述的关系给教会带来了很大的好处。这样，教会能够更容易地、更全面地完成她的种种宗教任务、传教使命和文化工作，也能够更快一些克服某些阻力。但在另一方面，教会这种世俗的权力地位以及教会人士对政治的参与也带来了一些阴暗的因素。虽然部分的主教很出色地完成了他们双方面的任务——既当牧灵者又当君主（参见德国地区一些主教，88.3），但宫廷服务和政治活动使一些教会长上远离牧灵的任务，他们太多被卷入世俗的事务和政治目标；当时的教会长上都面临了这种危险，而且很多人没能抵抗住这些诱惑。他们不得不回应 Carolus Magnus（查理曼）的要求：主教和院长必须亲自率领他们提供的军队（参见95.2）。

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因素：高级圣职人员的地位越高，国王们当然越想影响这些主教和隐修院院长的选任。原来的选任秩序是这样的：圣职人员和信徒民众选择一个新的主教，而一个修院的隐修者选择他们的院长，但在 Merovingi（梅洛温格）王朝，这种秩序已经比较少被遵守（参见第1卷，60.3），所以经常由国王来提名和选任新的主教们。在921年，罗马的教宗 Johannes X（约翰内斯十世）给 Colonia（科隆）的总主教写信，其中说根据老传统（*prisca consuetudo*）只有国王能够交给某圣职人员一个教区的管理权。因此，主教堂的圣职人员有选择自己主教的权利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固有的权利；Ludovicus Pius（虔诚者路易）于818/819年规定这个权利普遍有效，但其他的统治者仅仅允许个别教区选自己的主教。地区性的差异也很大：那些靠近 Rhenus（莱茵河）的德国南部教区是很古老的、有威望的教区，他们能够保卫他们的主权，但在边缘地区的新创立的教区比较多受世俗力量的控制。无论如何，国王都为自己要求了“确认”新主教的权力。新主教的上任

礼以及与此有关系的种种主权 (regalia, temporalia, 见上 97. 1) 的授权礼仪自从第 11 世纪初被称为 investitura (授权仪式, 授职礼, 叙任)。根据格尔曼/日耳曼人的“封臣法律”(Lehensrecht) 形式, 从 10 世纪初以来, 这个礼仪一般包括这些项目: 国王象征性地交给新的长上主教权杖或隐修院院长的权杖, 还交给他主教的戒指。在主教或院长去世后, 这些宗教权威的象征都必须送回国王的宫廷。接受职权的人先必须向国君宣发忠信的誓言, 又得宣布 (commendatio) 自己是国王的“良臣”(homo, vassus)。在此之后, 他才可以被祝圣(为主教)。

平信徒的授权 (lay investiture / Laieninvestitur) 很明显地与圣职在本质上有冲突, 它会带来很多误会, 但中世纪的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并没有这样的感觉。根据这种“国王授权”的制度, 高级的教会职权看来都是国王的“私有教堂”(参见 96. 3)——国王靠自己的统治权能够支配教会, 甚至可能会引起这样的观点: 王权是教会权力的根源。另外, 当时的候选人的标准更多是政治和经济的因素, 而不是教会方面的资格。一些统治者, 比如 Carolus Martellus (查理·马特) 及一些后来的法兰克西部的国王曾经提名一些平信徒当主教或隐修院的院长 (参见 96. 1) 或者将教会的职位授予亲戚好友、无用的人、无资格的人, 甚至授予小男孩。在 10 世纪的法国, 很多教区已经成了世俗贵族的世袭产业, 这些贵族人士现在以“平信徒主教”的身份出现 (参见 88. 1)。在罗马的一些贵族在 10 和 11 世纪似乎以“私有教会”的眼光对待了罗马教宗的宗座。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地区的新主教任命过程中, simonia (“圣职买卖”) 的现象也曾多次出现 (参见 102. 3)。德国的皇帝 Conradus II (康拉德二世, 参见 88. 7) 和 Henricus IV (亨利四世, 参见 104. 3) 还以“圣职买卖”玷污了自己的名声。不过, 在符合教会传统的任命过程中, “圣职买卖”也很难完全被排除。然而, 在另一方面也应该提出这一点: 那些具有“协助教会”的情怀的国王们, 比如 Carolus Magnus (查理曼)、Otto I (奥托一世)、Henricus II (亨利二世)、Henricus III (亨利三世), 都毫不犹豫地施用了这种提名权——这是为教会的好处, 因为他们尽力选择了最好的人士。不过, 在教会中开始出现一种反对这种传统的运动——这完全是能够理解的, 而在 11 世纪的教会改革运动中, 这些改革者尤其针对了“平信徒授权”的作法, 他们想消除这种习惯。严肃地拥护了教会权利的人——比如 Humbertus de Silva Candida (亨伯特, 参见 102. 3) 枢机主教和 Nicolaus II (尼苛劳/尼哥拉二世) 教宗——在 1059 年的 Lateranus (拉特兰) 主教会议上 (参见 103. 5) 坚决要求消除一切平信徒的授权权利。在所谓的 Investiturstreit (授权之

争/叙任权之争)中,关于解放教会不受平信徒支配的搏斗便暴发了(参见 104)。

礼仪和领受圣体的习惯。基督宗教的艺术

98.1 在古代晚期的这段历史阶段(313 年到 680 年)中,在 *liturgia*(礼仪)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多样性(参见第 1 卷,67.2),但在中世纪的阶段中,人们寻求一种统一性和一致性。在东方的教会中,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礼仪逐渐成为普遍被接受的标准,又以 Cyrillus(济利禄/区利罗)和 Methodius(美多迪乌斯)使用的古斯拉夫语言为载体传播到各地的斯拉夫民族中(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俄罗斯人,参见 83.2)。这些“斯拉夫宗徒/使徒”自己施用的是罗马的礼仪(罗马礼),而在西方教会中,罗马的礼仪逐渐传播到各地。747 年在 Cloveshove(克罗斯胡夫)举行的主教会议规定,英国的教会团体都必须用罗马的礼仪(参见会议文献第 13 条)。对法兰克王国来说,Pippinus(丕平)对于 Stephanus II(斯德望/司提反二世教宗)的开放态度(参见 85.2)和 Carolus Magnus(查理曼)对罗马的重视起了重要的作用。查理曼曾经请教宗送给他一些礼仪方面的书,所以 Hadrianus(哈德良)教宗在 785/786 年寄给他 *Sacramentarium Gregorianum*(《额我略/贵格利圣礼书》)的一个提要(参见第 1 卷 67.3)。Alcuinus(阿尔库因)给这部礼仪书加上了一些来自 Gelasius(葛拉修斯)和高卢礼仪的文献。这种“罗马-法兰克”礼仪形式在 Alpes(阿尔卑斯山脉)以北成为当地人的传统,在 10 世纪甚至影响了罗马教会的一些礼仪改革。通过 Alexander II(亚历山大二世教宗)和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教宗)的努力,罗马教宗的弥撒经文传播到西班牙。原来的“西哥特-西班牙礼仪”或“摩扎拉伯礼仪”好像在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后完全消失(参见 84.2);大约于 1500 年,Ximenes(吉麦内兹)枢机主教才恢复了这种古老的礼仪(参见 158.6),所以一些教堂在 Toledo(托莱多)地区仍然施用这种礼仪,一直到今天。在 11 世纪,苏格兰的女王 Margarete(玛格丽特,1069 - 1093 年)欢迎罗马礼仪到她自己的国土来,而 Armagh(阿马格)的总主教 Malachias(马拉基亚,1148 年去世)在第 12 世纪规定,爱尔兰应该遵守罗马礼。Carolus Magnus(查理曼)、Nicolaus II(尼苛劳/尼哥拉二世教宗)等人曾经想在 Milano(米兰)推广罗马的礼

仪,但当地的人们坚持传统的 *Ritus Ambrosianus*(盎博罗修斯/安波罗修的礼仪)。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中世纪的时期,除了礼仪的“比喻-神秘”解释外似乎没有别的解释观点;这种解释的标准楷模著作是 Amalarius de Metz(梅斯的阿马拉留斯)的 *De ecclesiasticis officiis*(《论教会的圣职》,830/832年,参见 89.4)。几百年后, Mende(门德)的主教 Durandus(迪朗都斯,1296年去世)在其 *Rationale divinarum officiorum*(《种种礼仪概论》)总结了中世纪关于礼仪的全部知识。

98.2 教会礼仪的基本表现在整体上没有改变,就是说传统的习俗继续被遵守:人们定期地,在教会团体面前并且与教会团体一起举行礼仪。然而,自从第6世纪,在西方教会出现了所谓的 *Missa privata*(“私人弥撒”)——就是一个司铎自己举行弥撒,但至少要有一个辅祭参与(他代表信徒团体)。其中一个结果是,人们在教堂里建立了许多小的祭坛,为了同时举行很多“小弥撒”。另外,一些地区开始一天当中举行几台弥撒。一些主教会议——比如 932年在 Dingolfing(德国,丁构冯),950/954年在 Mainz(美因茨)的主教会议——规定,在四旬期和守斋的时日应该一天举行三台弥撒。个别圣职人员甚至愿意举行更多弥撒,所以 1022年的 Seligenstadt(色里根施塔德)主教会议规定,一天的弥撒次数不能超过三台。这些主教会议还得控制许多其他的——一部分上甚至是迷信的——恶习。

在中世纪早期,礼仪的服装得到全面的发展(参见第1卷,71.4)。原来的礼服似乎都是白色的,但从8、9世纪以来很多颜色被施用。今天普遍施用的五种颜色(白、红、绿、紫、黑)是 Pius V(比约五世)于1570年在他的 *Missale Romanum*(《罗马弥撒经本》)才正式规定的,但第一次被提到的是在 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1198-1216年)的著作 *De sacro altaris mysterio*(《论神圣祭坛的奥迹》)中。

98.3 在古代晚期,平信徒领受 *communio*(圣体/圣餐)的频率下降了(参见第1卷,67.5)。中世纪的西方教会要求信徒至少一年三次要领受圣体(在圣诞节、复活节和圣神降临节)。然而,在普通的信徒群众当中,这种规定很难执行,甚至在比较虔诚的人那里,对领受圣体的兴趣——在这个历史阶段中——也相对小(*das Interesse fuer die Eucharistie in dieser Periode verhaeltnismaessig gering*)。自从8世纪末,西方人用“无酵饼”(azyma)来举行弥撒,而这一点引起了希腊人的尖锐谴责,他们称拉丁信徒为 *azymites*(无酵饼派,参见 94.2)。为了尽量避免对圣体的侮辱,信徒们在这个时期中开始以小的薄饼(称 *hostia*, *oblata*)代替原来的面饼;出于同样的理由,信徒们再不用手接受圣体,而是把圣体直接送到嘴里。在希腊的教会

中,人们将圣体蘸在祝圣的(或没有祝圣的)葡萄酒中,并且用一个小勺子送到信徒的嘴中。这种方式在大部分东方礼仪仍然被施用一直到今天。这种方式也传到西方教会,在临终时领受圣体时被施用(所谓的 *communio intincta*“蘸的圣体”)一直到 13、14 世纪,而人们似乎都认为,虽然葡萄酒没有被祝圣,只要蘸入圣体,酒也成为耶稣圣血。

98.4 与古代基督宗教一样,感恩祭和礼仪的重要部分是 *praedicatio*(讲道,英语: *preaching*, 德语: *Predigt*)。中世纪的作者不断吩咐圣职人员要完成他们的任务:讲道和宣布上主的福音被视为严肃的工作。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圣职人员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所以对他们来说讲道比较困难;因此,某些人编写了一些“模范讲道集”,其中流传比较普遍的是 *Beda Venerabilis*(比德/贝达,参见 89.2)的文集和 *Paulus Diaconus*(“执事”保禄/保罗,参见 89.3)所编的 *Homiliarium*(《讲道集》)——这是回应 *Carolus Magnus*(查理曼)的要求完成的。这些《讲道集》是拉丁语写的,但讲道时当然用当地语言(德语、法语等)。有几个主教会议也明确规定要用本地语言讲道[参见 813 年在 *Remi*(兰斯)和 813 年在 *Mainz*(美因茨)的主教会议];有的主教会议要求翻译这些《讲道集》(如 813 年在 *Tours* 和 847 年在 *Mainz* 召开的会议)。在大部分的教会团体中,在主日和庆日很规律地都有人讲道,而在圣职人员或隐修者面前,讲道者通常用拉丁语讲。

98.5 与罗马礼仪一起,罗马的 *cantus*(圣乐,参见第 1 卷,67.6)也传到法兰克地区。*Carolus Magnus*(查理曼)请教宗送给他一些罗马的“歌手”(音乐家),并在 *Metz*(梅斯)和 *Soissons*(苏瓦松)创立了一些音乐学校。在圣 *Gallen*(伽伦)隐修院,修士们也努力培养和提高礼仪音乐的水平。原来的 *cantus Gregorianus*(额我略/贵格利圣乐)只是单声部的,但现在出现了多声部的歌曲;最早,两声部的音乐据说是 *Flandria*(佛兰德) *St. - Amand*(圣阿曼都斯)隐修院的修士 *Hucbaldus*(胡克巴德,930 年去世)提倡或发明的。另一方面的进步是 *Guido de Arezzo*(阿瑞佐的古多,约于 1050 年去世)介绍的用四条线的乐谱。13 世纪初的德国老师 (*magister Franko de Colonia* 科隆的法兰克)以音乐符号的形象 (*figura*) 来表达音的长短,这样发展了音值量 (*mensura, Zeitmass*) 的理论(所谓的 *Figural - oder Mensuralgesang*)。为了陪衬歌声,教会开始应用所谓的 *organum*(管风琴),在初期阶段中,这并不是一个很完备的乐器。也许教堂中用这个乐器是因为 *Pippinus Minor*(小丕平,在 757 年)和 *Carolus Magnus*(查理曼,在 812 年)从拜占庭那里获得了一些礼物,其中包括一

些乐器,而这些乐器被陈列在 Compiègne(孔皮恩)和 Aachen(亚琛)的教堂里。教堂用的 clocca(“钟”,亦称 signum, campana, nola)也许最早出现在 6 世纪的 Africa(阿富利加北部)。中世纪的学者 Walafrid Strabo(瓦拉夫瑞德)曾经说,“钟”来自 Campania(意大利的坎帕尼亚)的 Nola(挪拉)城(参见 *Liber de exordiis*, c. 8),但这种说法不能成立。一些来自爱尔兰和苏格兰的传教士在第 7 世纪将钟带到法兰克国,而在那里它迅速成为一个很受欢迎的基督宗教文化的组织部分。

98.6 在 Carolus Magnus(查理曼)的时代,文化普遍获得蓬勃发展,并且在基督宗教艺术方面也开始有了新的生命。在艺术中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格尔曼/日耳曼人以自己的方式接受并改造了古代基督宗教的罗马文化因素和东方的拜占庭因素。他们不但保留了传统的教堂建筑形式(即 basilica“长方形大殿”和 Zentralbau“圆形建筑”),而且也独立地发展这些形式,这样早在 8、9 世纪导致了早期罗马式建筑风格(更多参见 120.1)。圆形建筑的主要成就是 Carolus Magnus(查理曼)在 Aachen(亚琛)的宫殿圣堂,就是亚琛的 Muenster(大教堂),它也包括伟大统治者查理曼的墓;这个大教堂是由 Eginhardus(艾因哈德,参见 89.3)在 796-804 年间主持建立的,大概模仿意大利 Ravenna(拉文纳)的 San Vitale(圣维塔勒)教堂的风格。Eginhardus(艾因哈德)也设计了在 Michelstadt(米赫勒施塔德)附近的 Steinbach(施泰恩巴赫)和在 Seligenstadt(色里根施塔德)的大殿式教堂。一般来说,教堂内的墙壁上都有圣像;在这方面 Reichenau(赖兴瑙)隐修院的成就很杰出(描绘基督的奇迹,参见 Oberzell 的 St. Georgskirche, 第 10 世纪)。在金属雕塑方面, Hildesheim(希尔德斯海姆)的 Bernwardus(贝恩瓦德, 1022 年去世)主教占有特殊的地位[参见 Hildesheim 大教堂的青铜门和堂中的 Bernwardsaeule(贝恩瓦德柱子),这些都显示出《圣经》中的故事]。在卡洛林王朝和奥托王朝的时代,象牙雕刻艺术和手抄本(精致的《圣经》书本,福音书,包括彩色画图、书法等)都算为美妙的文化成就。

忏悔习惯和教会的处罚方式

99.1 古代那种“公开认罪,公开忏悔”的方式在早期中世纪仍然存在,所以那

些公开的、引起众人厌恶的严重罪行还是要在信徒团体面前公开承认的。然而,承担公开补赎不再取决于罪人的自由选择,而是成为法律上的惩罚:在年度的视察中,主教——他在“巡逻法庭”甚至依赖于世俗权威——强迫性地要求罪人接受补赎(参见 95.3)。那些不公开的和没有那么严重的罪行归于“私人忏悔”和“私人告解”(confessio privata)。这种“私人告解”现在成为西方教会的重要因素;它最早在希腊教会中出现,但在那里没有成为普遍的习惯(参见第 1 卷,68.2),后来传到凯尔特/凯尔特地区(爱尔兰/苏格兰)和盎格鲁-撒克逊地区——那些民族根本没有“公开认罪”的习惯。爱尔兰和英国地区的传教士们在欧洲大陆也努力介绍了“私人告解”,认为这是民众教育的良好工具。人们一般在领受圣体之前办告解(平均一年三次或更少,参见 98.3)。

人们为自己的罪所承担的“补赎善工”或“惩罚”主要是这些:守斋、施舍、接受流放或去陌生地区、朝圣、鞭笞自己、进入隐修院。早期有一个规定说,作补赎的人不能结婚,但 868 年的 Worms(沃尔姆斯)会议取缔了这种禁令(参见会议文献第 30 条)。尤其在 40 天的四旬期中要作补赎。根据普遍的习惯,Ash Wednesday(圣灰星期三)被视为承担补赎的日子,而(Holy Thursday)圣周的周四是赦免罪的日子。

99.2 为了估计和确定某人的补赎的大或小——主要是为了帮助听告解的司铎指导个人的补赎——在 6 和 7 世纪出现了所谓的 *libri poenitentiales*(《补赎手册》,德语: Bussbuecher),先出现在爱尔兰、苏格兰和英国,后来也出现在欧洲大陆。最古老的《补赎手册》是爱尔兰隐修士 Finianus(费尼阿努斯)在 6 世纪写的。一部影响深远的《补赎手册》是 Luxeuil(路修)的院长圣 Columbanus(高隆班/科伦巴,参见第 1 卷,72.8)编写的。最有名的《补赎手册》出自 Canterbury(坎特伯雷)总主教 Theodorus(特奥多尔,参见 89.2)之手,这部书大概是后人根据总主教口述的劝告和他的其他文献编写的。因为这些《手册》很多,内容有所差异,而且施用他们的人很机械式地引用其中的规律,所以造成一定的混乱和告解纪律的松懈。因此,在 9 世纪初,人们开始反对这些《补赎手册》。虽然无法完全放弃这些手册,在这段时期举行的主教会议和教宗们发表的文献更多强调原来的忏悔方式。当时他们也更强调希腊教会的 canones(教规),所以西方教会也开始将作补赎的人分类为几个“阶层”(所谓的 Stationenordnung“程度秩序”),这就等于是模仿古代东方基督宗教的制度(参见第 1 卷,24.4; 68.1);然而,这种作法仅仅维持了很短的时间。

99.3 在忏悔制度中另一项重要的革新也同样先出现在爱尔兰和英国(650年以后),后来也传到法兰克人的地区,就是所谓的 *redemptio* (= *redemptio*, *redemption*, 德语的 *Abloesung*, *Loskauf der Busse*, 即补赎的赎回)。这就意味着,那些教规所规定的严重惩罚(尤其是长期的守斋)被转化为一些“代替善工”(Ersatzwerke, “代替性补偿”, 比如祈祷和施舍)——这些补偿被认为有同等的价值,而且也比较容易实现。而且,那些富有的人或贵族人士为了更快地完成他们的补赎也请别人帮忙(甚至给予别人钱为了帮助他们进行“补赎”)。他们认为,如果为慈善工作或其他无私人利益的项目奉献一些钱,就能够“赎回”自己的补赎或补赎的一部分。那些《补赎手册》就规定了不同罪行的不同金额。这种习惯大概受了格尔曼/日耳曼人法律传统的影响,因为在这个传统中有这样的规定:一个杀害或伤害别人的人应该为此付出赔偿钱(所谓的 *Compositio* 或 *Wergeld*; 亦见《旧约·出埃及记》23章)。对公开补赎来讲,895年在 Tribur(特瑞布尔)召开的主教会议(文献第56条)最早承认这种“金钱赎回补赎”的方式。它在初期阶段中仅仅针对一些特殊的、具有理由的个案,也仅仅可以“赎回”补赎的很小部分,所以并没有太多妨碍补赎的严肃性。然而,滥用的危险仍然存在,尤其是在后来的发展阶段中,作补赎的人可以作选择:要么完成教规要求的补赎,要么请告解司铎转化补赎为善工。1048年在 Rouen(汝昂)举行的主教会议规定,不可以出于“贪婪”提高或降低补赎的标准。自从11、12世纪以来 *indulgentia*(大赦,英语 *indulgence*, 德语 *Ablass*, 参见119.4)逐渐代替了 *redemptio*(“赎回”)的方式。

99.4 一方面,忏悔的纪律放弃了古代的严格标准,另一方面,教会的惩罚权力(*Strafgewalt*)也越来越大。所谓的 *excommunicatio*(绝罚,开除教籍)意味着一个人被禁止参与教会的团体、礼仪和圣事,而这种禁令逐渐变成一种“完全脱离社会”的惩罚。在 Pippinus(丕平)时代(755年)举行的法兰克教会的主教会议早就规定,如果一个人和某一个被绝罚的人有来往,他自己也成为被绝罚的人,而如果一个人不接受教会的惩罚,国王应该流放他。另一种惩罚是 *interdictum*(禁罚),就是在某一个地方或地区要求停止(公开的)礼仪和教会的服务——这是一种更难受的惩罚。它的起源在6世纪,但作为一个正式的惩罚措施最早出现在第9世纪。一开始,“禁罚”等于是对于一个不合法地占据了某个教堂或教区的人的“绝罚”,但自从11世纪以来,“禁罚”也被独立地宣布,而自从12世纪以来,这种“禁罚”不仅仅针对一些教堂、教区或教省,而且也针对整个国度,这样成为教会政策中最强

有力的措施。然而,在内容上,这种措施的范围有所不同:某些“禁罚”禁止一切圣事和礼仪,但另一些“禁罚”是允许施洗、终傅和其他临终的圣事以及不公开的、安静的弥撒礼仪的(“闭门弥撒”)。早期的“禁罚”范围很严格(禁止一切圣事),但在后来的时期,教会允许一个比较宽松的范围。

100

节日和守斋日。对圣人及对圣髑的尊敬。朝圣

100.1 与古代基督宗教比起来,中世纪的庆节和教会节日更多。首先,中世纪的基督徒庆祝了所有的宗徒/使徒和福音书作者(“圣史”)的纪念日;这种习惯早在第7世纪已经存在,因为 Chrodegang(赫洛德冈)在他的“圣职团会规”(参见 95.4)中就提到了这些节日(会规第30章)。复活节和圣神/圣灵降临节的庆节在某方面受到一些限制,因为信徒们自从第10世纪以来仅仅庆祝了一周的头三四天(而在古代他们过了七天的庆节)。然而,这些固定的日子使得人们更有能力过好他们的庆节。一些新的普遍被遵守的教会节日是这些:12月28日(innocentium 无辜婴孩的节日),11月1日(omnium sanctorum 诸圣节),11月11日(圣 Martinus 马尔丁)。庆祝各地教堂的祝圣纪念日和教堂主保的节日也成为一种普遍的习俗,但这些节日当然是在不同的时日(参见下文,100.3)。另一些节日不是普遍的,但在很多地区被重视:5月3日(圣十字架被重新发现的纪念日),8月10日(圣 Laurentius 劳楞佐),9月29日[圣 Michael(弥格尔/米迦勒)天使]。在11月2日举行“追思一切亡者的节日”(commemoratio omnium fidelium defunctorum 有时候也称为 festum animarum 诸灵魂节)是根据9世纪出现的“诸圣节”形成的;Cluny(克吕尼)的院长 Odilo(欧迪罗,994-1048年)开始过这个节日,当时只限于 Cluny(克吕尼,参见 101.3)团体的范围,最初在10世纪。这个纪念日后来在别的地区也逐渐被接受,到了第15世纪已经成了一个相当普遍的节日。

100.2 与教会礼仪年的种种庆节同时形成的是 **ieiunium**(守斋)的规律。原来的“四旬期守斋期”仅仅包括36天,但在那时它被扩大到40天,因为它的开端成为四旬期第一主日的周三(称为 caput ieiunii“守斋之头”)。在这个星期三,信徒们早一些开始举行一个特殊的圣灰典礼(把“圣灰”洒在头上),所以将这一天称为 Ash

Wednesday(圣灰星期三);在 Benevento(贝内文托)的主教会议上(1091年),Urbanus II(乌尔巴努斯二世)教宗规定,整个教会都必须过这种圣灰礼仪。关于四旬期的这些规律大概早在6世纪形成在罗马,并与罗马礼一起传播到整个欧洲西部地区,除了 Milano(米兰)教会之外。同时出现了“四旬期之前的主日”,即 Septuagesima(“七旬主日”), Sexagesima(“六旬主日”), Quinquagesima(“五旬主日”)。在希腊教会中,在原来的七周上加上第八周,但在这一周仅仅禁止吃肉类。在四旬期不允许吃肉、鸡蛋和奶制品,包括在主日和周六,虽然这些日子原来不是守斋日,而在东方也是如此。在守斋期(四旬期),信徒们每天仅仅吃一次或者说在“第9个小时之前”(即在下午3点之前)不吃任何食品。同时,在四旬期禁止打猎、婚礼、夫妻性生活、娱乐活动、开庭审案。在教堂中,人们在11世纪后用所谓的“斋布”或“饥饿布”(Fasten - oder Hungertuch)来盖住祭坛或教堂前殿(Chor)。在罗马教会中有一个古老的习惯,就是在圣神降临节前,在9月和12月守斋一个星期(参见第1卷,69.7);这种习俗在6、7世纪也传播到其他的西欧地区。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教宗(大概于1078年)规定这方面的具体日期,而这些规定后来没有经过什么改动。第四周日期落到四旬期当中,这就完成一年中“四时的守斋”(ieiunium quatuor temporum, Quatemberfasten)。因为在这些守斋周中,教会举行了祝圣礼或交纳税务,在德国的人也称它为 Weihefasten(“祝圣斋期”)或 Fronfasten(“税务斋”)。

在一个庆节之前的晚上,人们也守斋(Vigilfasten),这本来是古代教会的习俗,但在中世纪的庆节更多,所以这种“前夕斋”也多,尤其是在宗徒/使徒的庆节之前。另外,在 Rogationstage(“恳求日”)的时期,人们也守斋(参见第1卷69.3)。

星期五在全年中都算为守小斋的日子,除非一个比较大的庆节落到星期五。自从11世纪以来,星期六也同样算为守斋日。

100.3 自从 Merovingi(梅洛温格)时代(约500年到750年),对 sancti(圣人/圣徒)——尤其是对圣母玛利亚、宗徒/使徒们和个别殉道者——的尊敬在各地都成为很流行的习俗。这些圣人/圣徒的纪念日和庆日增多了,他们的墓被装修,且有信徒们去他们的墓朝圣,正如他们经常到耶路撒冷的种种圣地去朝圣(peregrinatio, 英语 pilgrimage)一样。最著名的朝圣地之一是圣 Petrus(伯多禄/彼得)和圣 Paulus(保禄/保罗)在罗马的墓、圣 Jacobus(雅各伯)在西班牙的 Santiago de Compostela(圣蒂雅格)的墓以及圣 Martinus(马尔丁)在法国的 Tours(图尔)的

墓。另外,人们很努力地搜集或购买了一些 *reliquiae*(圣物、圣髑),就是圣人/圣徒的尸体或他们的骨灰或小块骨头或一些圣人/圣徒在生前或死后所触摸的东西(衣服、工具等)。圣物的出土过程(所谓的 *elevatio*)或圣物向新圣所的隆重迁移(称 *translatio*)或在某些固定日子的“示众”——这些都成为非常有吸引力的大众化节日。大部分的圣物来自意大利(罗马)、法国和东方地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的文化水平不高,对圣人和圣物的尊敬有时候跨出了应该的界限,一直到中世纪晚期还发生了一些不合理的事件。比如,人们太强调圣物的重要性,用它们进行买卖,制造虚假的圣物或奇怪的圣物,为了获得圣物甚至去抢夺他人的财产等等。在古代基督宗教开始这样的习惯:在祝圣一个新的教堂时,那些在祭坛下埋葬的殉道者(圣人)成了该教堂的保护圣人(*patronus*,亦称“主保”)。在早期中世纪“主保圣人”的习惯非常盛行,而通过这些“祝圣教堂通讯”可以研究欧洲各国的教会史和欧洲北部早期教会的历史,这些“教堂主保”提供重要的史料。有人曾经说,那些“主保”都代替原来的外教神明(格尔曼人或斯拉夫人的神明),比如圣 *Martinus*(马尔丁)代替原先的 *Wodan*(沃但神、天神),但这种说法是无法证明的。

关于圣人的文学得到蓬勃发展。一系列新的 *Martyrologia*(《殉道者名单录》)出现(参见第1卷,70.1),其中最重要的是圣 *Beda*(贝达/比德)于731年写的,执事 *Florus de Lyon*(里昂的弗罗汝斯)约于848年写的,*Ado de Vienne*(维恩的阿多)约于858年写的和 *St. Germain*(圣格尔曼,在巴黎附近)的 *Usuardus*(乌苏阿德)约在875年前写的《殉道者录集》。对于圣人/圣徒一生的描述一方面包含了很多完全属于传奇的因素(这是一些到处寻求奇迹的人虚构的故事),但也有一些非常杰出的并且有历史价值的传记,比如关于圣 *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Ansgarius*(安加略/安斯加尔)、*Bruno de Colonia*(科隆的布鲁诺)、*Ulricus de Augsburga*(奥格斯堡的乌尔里克)、*Bernwardus de Hildesheim*(希尔德斯海姆的贝恩瓦德)等等的传记。

关于谁可以承受一个“圣人/圣徒”的尊敬这个问题,在早期都是信徒群众(*vox populi*)的决定,或者说一个教区的主教允许他的信徒尊敬某人为“圣人”。在希腊教会中,这种作法一直到今天都存在。为了预防一些滥用,*Carolus Magnus*(查理曼)明确规定,“新的圣人”需要主教的批准。有时候,一个教省的主教会议决定这类问题,而一些边缘地区也向罗马申报他们地方的圣人,这样希望他们的圣人更被重视。教宗第一次隆重地宣布(或册封 *canonisatio*)一个圣人是 *Johannes XV*(约翰

内斯十五世)在 993 年在 Lateranum(拉特兰)主教会议上宣布 Ulricus de Augsburga(奥格斯堡的乌尔里克,973 年去世)为圣人/圣徒。在 1234 年, Gregorius IX(额我略/贵格利九世)规定,只有罗马的宗座可以决定谁是“圣人/圣徒”,而 1215 年第四次 Lateranum(拉特兰)会议规定,新发现的圣物能不能受尊敬也需要有教宗的批准(会议文献第 62 条)。

101

隐修院传统的衰落和恢复。Cluny(克吕尼)及其修会

101.1 隐修院的传统——尤其是 Benedictus(本笃)会的传统——在古代晚期和中世纪的早期阶段,为教会和基督宗教文化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格尔曼/日耳曼人的皈依、教养和文化教育在很大的程度上都归功于隐修院文化(参见第 1 卷,72.7,第 2 卷,89)。然而,在 7、8 世纪的法兰克王国中,隐修院文化在很多地区走向衰落。各修院的财富此时增多,这不但阻碍了隐修者的纪律,而且也唤起了世俗贵族和教会长上的贪心。隐修院的财产或权利经常遭受严重的侵略。Carolus Martellus(查理·马特,741 年去世)很随意地将许多隐修院交给了一些平信徒院长,他认为,自己创立的修院都是国王的“私人修院”(参见 96.1,3)。后来,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推动的改革主教会议(参见 80.3)带来了一些改善。自从 779 年,圣 Benedictus de Aniane(阿尼安的本笃)的改革也获得了美好的成就;他是一位属西哥特民族的伯爵的儿子,曾经是法国南部的 Aniane(阿尼安)隐修院的院长,后来在 Aachen(亚琛)附近的 Cornelimuenster(克尔内里闵斯特)当院长,于 821 年去世。他想落实隐修院的纪律的统一,想提高法兰克地区的隐修院的生活规律。后来,Ludovicus Pius(虔诚者路易)委任他监督整个法兰克国的隐修院。在 Benedictus(本笃)的指导下,816/817 年在 Aachen(亚琛)举行的全国隐修院院长的会议规定各地的修士都得遵守一种“改进的本笃会会规”(参见 817 年的 capitulare monasticum“隐修者的法令”)——其中强调隐修者必须脱离世俗的社会,并且都有体力劳动的义务。816 年在 Aachen(亚琛)召开的会议为那些在大堂或堂区生活的 canonici(“圣职团”,参见 95.4)提供了一个“团规”(它基本上模仿圣本笃的“会规”),又为那些 canonissae(“女士生活团体”)作了一些规定;这些妇女团体(亦称

Chorfrauen, sanctimoniales)以比较自由的生活方式住在一起,她们并没有放弃个人的财产,她们经常是一些贵族女士。自从第8世纪以来也存在着一些 *confraternitates*(祈祷弟兄会),它们的主要目标是共同纪念个别隐修院的成员(或已去世的恩人);这些祈祷会部分上一直存在到中世纪晚期。然而,在10世纪的普遍动荡状态中,各地的隐修院又遭受了很大的损失,经过诺曼人、穆斯林军和匈奴人的种种侵略,很多隐修院被破坏或遭受劫掠(参见99.1)。某些隐修院有这样的习惯:它们只接受了贵族人士进入修士的行列,这种习惯也导致一些问题。在法国地区,平信徒院长又变得比较多。正如 Soissons(苏瓦松)地区的 Trosly(托斯里)主教会议(909年)所抱怨的那样:这些平信徒院长们与他们的妻子、孩子、臣仆和猎狗一起居住在隐修院中,这样造成完全的世俗化情况;隐修士们可以随便离开修院,使他们逐渐走向世俗化。在德国地区的情况好一些,尤其在 Otto Magnus(奥托大帝)的时代,因为那些萨克森统治者(奥托)为隐修院的改革有所行动;那些在经济上缺少管理的修院也重新获得妥当的照顾。

101.2 古代基督宗教的绝大多数隐修者都是平信徒。与此不同,在9、10世纪的隐修院中有很多司铎,甚至多半的人都被祝圣为司铎。这些司铎除了牧灵工作以外首先投身于教育工作;他们创办了很多隐修院学校,其中有一些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参见89)。部分的修士也进行科学研究或编写书籍。这样就形成了两种隐修者的分化:司铎们进行精神上的工作,而那些平信徒(没有铎品)的修士主要完成体力工作;这些平信徒修士被称为 *laici monachi*(平信徒修士)、*fratres conversi*(成年皈依的弟兄)、*idioti*(思想单纯的人)或 *illiterati*(文盲)。在11世纪,隐修士分化为两个阶层——司铎修士(*Priestermoenche*, *Chormoenche*)和平信徒修士(*Laienmoenche*)——逐渐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尤其 Cluny(克吕尼)和 Hirsau(希尔骚)隐修院在组织 *conversi*(成年人修院者)方面有良好的贡献。在前面(参见第1卷,72.5)我们已经提到了另一个现象,就是所谓的 *inclusi*(“封闭的人”)——这些隐修者愿意一段时间或一生居住在一个很小的屋子里;在整个中世纪都有一些男人或妇女选择了这种隐修方式。

另一个重要的革新是所谓的 *exemptio*(*exemption* 豁免权)。451年的 Chalcedon(加采东/迦克墩/卡尔西顿)主教会议曾经规定每一个隐修院都必须受教区主教的监督(会议文献第4条,参见第1卷,72.4)。后来的主教会议,比如802年在 Aachen(亚琛)召开的会议还重复肯定了这种规定,但在9、10世纪,很多隐修院获

得了“豁免权”，这就意味着，它们不再属于当地主教的司法权下，不再受主教的惩罚，而直接属于罗马宗座的监督，这样能够预防那些经常发生的纠纷，而且有利于隐修院的自由发展。直接属于罗马监督的隐修院一般也必须向罗马纳税。在个别的情况下，这种特权早在第7世纪已经出现过，第一个先例是 Columbanus(高隆班/科伦巴)创立的 Bobbio(波比欧)隐修院(628年)。圣 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参见 80.2)创立的 Fulda(富尔达)隐修院于 751 年从 Zacharias(扎卡利亚斯)教宗那里获得了豁免权。在 10、11 世纪的隐修院改革的时期，豁免权变得越来越普及，因为 Cluny(克吕尼)及其联盟修院都获得了豁免权。12 世纪是“豁免权”的顶峰时期，在这个时代，一些修会部分上或全部获得了豁免权，就是说当地的主教再无法惩罚它们。在初期阶段，这种“豁免权”对很多隐修院有利，但在中世纪晚期，它成为种种恶习的根源，又阻碍了全面的改革。

与 *exemptio*(豁免权)有某些联系的是所谓的 *Libertas Romana*(“罗马自由权”或亦“罗马保护”)，它从 9、10 世纪出现。为了不遭受当地贵族或教会长上的压力和剥削，很多新兴的隐修院将自己交托于罗马宗座的保护，并每年向罗马纳税。这样，它们似乎成为教宗的“私有教堂”，它们“属于圣伯多禄/彼得的法律权利和财产”(in iure et proprietate beati Petri)。自从 11 世纪末，人们认为这种“罗马保护”等于完全不能受当地主教的管理或惩罚(即是“豁免权”)。

101.3 在教会和文化的种种衰落现象当中兴起了一个新的隐修院，而这个隐修院发起了一个在历史上很有影响力的隐修改革运动。法国南部的 Aquitania(阿奎塔尼亚)地区的一位公爵，Wilhelmus Pius(虔诚者威廉)于 910 年在法国勃艮第地区的 Macon(马松)附近的 Cluny(= Cluniacum, Clugny 克吕尼)创立了一所隐修院，并邀请 Berno de Beaume(贝尔诺)当第一任院长。同时，这位公爵要求他的隐修院不得受任何地方贵族或地方主教的控制，将它直接交给罗马来监督(参见上文关于 *exemptio*“豁免权”的论述)。从一开始，Cluny(克吕尼)的精神就非常好，它再一次恢复了古典的、严格的本笃会会规[包括 Benedictus de Aniane(阿尼安的本笃)所作的补充]，他们强调对院长的绝对服从、每天日课祈祷和礼仪的庄严端正，他们又保持严格克修纪律、缄默，也保持与世俗生活的隔绝。在另一方面，他们不太重视学术和著书。一系列的杰出院长——他们的任期有时候是很长的——都忠实地确保了本笃会的种种理想，他们是 Odo(欧多/奥多，927 - 942 年)，Aymard(艾马尔)，Majolus(马尤卢斯，954 - 994 年)，号称“Archangelus monachorum”(修士们的

总领天使)的 Odilo(欧迪罗,994 - 1048 年),Hugo Magnus(“大”胡格,1049 - 1109 年)。到了 10 世纪末,这个隐修院已经有 200 个隐修者,后来更多。因为自从 Odo(欧多/奥多)的时代以来,Cluny(克吕尼)的修士在别的地方也建立了一些新的隐修院或革新原来的修院团体,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修道联盟”,而 Cluny(克吕尼)的院长领导了这个“隐修院联盟”。在 Odilo(欧迪罗)的时期,这种联盟已经很明显,而在它的顶峰时期大约包括 2000(两千)所隐修院、小修院(prioratus)或独修者的小屋(cella)。Cluny(克吕尼)的隐修院改革运动不仅逐渐传播到全法国地区,而且也传到了意大利[罗马、Subiaco(苏比雅克)、Monte Cassino(卡西诺山)等],在那些既虔诚又能干的 Henricus II(亨利二世)和 Henricus III(亨利三世)皇帝的时代又传播到德国,也影响了西班牙和英国地区的教会。在 10 世纪,在 Lorraine(罗兰)地区的 Metz(梅斯)附近的 Gorze(格尔斯)和在 Liege(列日)附近的 Brogne(布罗内)隐修院中又形成了一些独立的改革的中心点。很多人给 Cluny(克吕尼)进行捐赠——这一点和该修院对亡者的纪念活动有关系,Cluny(克吕尼)特别为亡者祈祷或为他们举行礼仪(关于“追思亡者的节日”参见 100.1);因此,Cluny(克吕尼)变成了一个富裕的、强大的隐修院。Odilo(欧迪罗)院长在法国地区努力推动“上主和平”运动(参见 102.2)并且获得良好的效果,这一点又提高了隐修院的威望。然而,在 1150 年后,一些衰落和世俗化的迹象开始出现,经济上也不能保持以前的水平,所以那些新兴的修会(熙笃会和 Ordo Praemonstratensium 普雷蒙特会)取代了 Cluny(克吕尼)的领先地位。

Cluny(克吕尼)以及那些和它有联系的隐修院恢复了虔诚生活和严格纪律的榜样,对于教区圣职人员和平信徒们都有激励和提高素质的作用。这样,Cluny(克吕尼)的隐修院改革导致了 11、12 世纪的普遍教会改革运动。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和 Urbanus II(乌尔巴努斯二世)都曾经是 Cluny(克吕尼)的修道者! Cluny(克吕尼)的隐修者和历代教宗一起反抗教会中的恶习:圣职买卖、司铎的婚姻等。他们也肯定 Pseudo - Isidorus(伪伊西多尔,参见 87.4)的种种要求:平信徒不应该控制教会的财产,教宗的地位应该被提高。在“授权之争”中,那些受 Cluny(克吕尼)影响的德国隐修院(Hirsau 希尔骚及其联盟修院)是 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改革派的强有力支持者。因此,这次改革运动的目标在初期仅仅针对修院生活和教会内的问题,但在当时社会情况的影响下,该运动也转向一个教会政治的巨大问题:从平信徒的手中解放教会,即排除平信徒对教会的控制。

101.4 在意大利的隐修院中也有改进的趋势,部分上是受 Cluny(克吕尼)的灵感的影响,部分上是出于自己的努力。当时的人不仅仅恢复了传统的本笃会生活方式,同时也注意到了东方的“独修传统”(anachorete)。一位来自意大利南部 Calabria(卡拉布里亚)的希腊人 Nilus Minor(尼卢斯,1005 年去世)非常受尊敬,他曾经在好几个地方当隐修士和“独修者”,最后在 Frascati(弗拉斯卡提)创立了著名的 Grottaferrata(格若塔费拉塔)隐修院。圣 Romualdus(若姆阿尔德,1027 年去世)来自 Ravenna(拉文纳)的高级贵族,他曾经当 Otto III(奥托三世皇帝)的顾问和父亲般的朋友(参见 88.6)。他也同样认为,“独修”是隐修生活的高峰,所以他曾经在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建立了一些隐修院,最后在 1012 年在 Arezzo(阿瑞佐)附近的 Camaldoli(卡马尔多里)建立了一个“独修者群落”(Einsiedlerkolonie),而这个地方在 1100 年以前就发展成为 Camaldolensi(卡马尔多里)的修会。另一个新兴的修会也同样在本笃会会规的基础上结合了“团体修道”和“独修”的方式,就是 Vallombrosani(瓦伦布罗西)修会。大约在 1038 年,圣 Johannes Gualbertus(约翰内斯·古阿尔伯特,1073 年去世)在自己的家乡 Florentia(佛罗伦萨)附近在 Vallombrosa(瓦伦布罗撒)建立了一所隐修院,这个修院后来成为修会的母院。这两个修会都特别培养默观式的生活(vita contemplativa),并且在提高道德水平和争取教会权利方面也都有一些贡献。Romualdus(若姆阿尔德)的学生和他传记的作者就是 Petrus Damiani(伯多禄/彼得·达米阿尼,参见 89.6; 102.3),他先指导了 Fonte Avellana(阿维拉泉)的隐修院,后来成为枢机主教(参见 103.4);他继续传播了他的老师的严格精神、改革精神和忏悔精神;据说,通过他的影响,一些隐修院开始施用鞭子来培养一种真正的克修精神。

102

西欧教会民众和圣职人员的宗教生活和道德生活

102.1 在古代,皈依基督宗教的人主要是个别人,而吸引他们入教会的因素主要是精神性的价值。与此不同,种种格尔曼/日耳曼民族和斯拉夫民族的皈依意味着整个民族在他们的首领和贵族人士的引导下进入教会,而在这里发挥作用的因素包括一些外在情况、部落团体感、对首领的服从、物质上的利益、国度的压力,甚

至武力和威胁。因此,转向基督宗教的过程对很多人来说仅仅是外在的宗教的转换。这些人仍然生活在他们原来的异教传统中,他们对神的概念仍然是“魔术性的-鬼怪的”。另外,传教士们的宣讲的主要目标是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因此这种宣讲并没有介绍全部启示和宗教生活的种种表现。在传教时期后有道德生活水平的下降,这与古代文化的崩溃有关系,古代文化本身就失去了生命力,而基督宗教促进了这种崩溃。基督宗教文化的建立是一个逐渐的过程,那些民族需要慢慢地习惯基督宗教的思想和道德。一般群众在几百年以后才掌握了基督信仰的核心。在民间还有很长时间流传着一些迷信的、异教的观念和习俗,比如依靠护身符、施用魔术、吃魔药、用咒语、抽签算命(*sortilegium*)、相信有巫婆、魔术家和妖怪等。在卡洛林时代(约750-850年代),国度和教会共同抵抗了这种“巫婆信仰”;10世纪初的*Canon Episcopi*(《主教的教规》)特别警告人们不要崇拜恶鬼,不要怕巫婆。稍后,Regino de Pruem(普若姆的瑞格诺)和Burchardus de Worms(沃尔姆斯的布克哈德,参见89.5,6)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有这样的警告。这里也必须提到所谓的*ordalium*(或*Gottesurteile*，“神的裁判”)。这种习惯来自古代格尔曼/日耳曼民族的习俗;那些原始的民族认为,某些魔术可以表示一个人的力量,或相信通过某些特殊的表现,神会启示某人的罪。由于当时的法律文化还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所以那些新皈依基督宗教的格尔曼/日耳曼人很乐意地继续前人的作法:他用火、水、血的检验方式,他们抽签或在法庭中举行决斗——这是自由人通用的证明方式。除此之外他们还加上一些来自基督信仰的“神明裁判”形式:用被祝圣的食品、十字架或圣晚餐的考验。虽然个别人——比如Nicolaus I(尼苛劳/尼哥拉一世教宗,于867年),Stephanus V(斯德望/司提反五世教宗,于887年),Lyon(里昂)的总主教Agobardus(阿格巴德,参见92.5)——曾经反对这些迷信的表现说这是“试探天主/上帝”,但他们的劝告没有成效。当时的人甚至用教会的礼仪形式来装饰那些“神的裁判”:第9到12世纪的礼仪手册包含相当多降福经文,就是对于“神的裁判”所施用的物品的降福。为了这些仪式,人们也收了特殊的费用,而在“神的裁判”之前,他们一般都会举行一台弥撒。然而,在罗马的法律文集中没有出现这些“神的裁判”,而第11、12世纪的一些教宗也禁止教会法庭中采取“神的裁判”。不过一直到13世纪,那些“神的裁判”才开始消失,因为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在第四届拉特兰主教会议上(1215年)谴责这些裁判形式并禁止圣职人员们提供这方面的降福(会议文献第18条)。一些国王,比如Fredericus II(腓特烈二世皇帝)和法

国的 Ludovicus IX Sanctus(圣者路易)支持教会在这方面的改革。

102.2 除了迷信之外,这些新皈依的民族还有很多其他恶习:抢夺他人财产、报仇洗净血恨、残酷暴力、粗糙好色、贪吃酗酒,而种种战争和政治变动不断激励了这些恶习。控制这些粗壮的人的激情可不是容易完成的事。基督宗教本来提出来的是一些比较静态的美德(mehr passive Tugenden),比如谦逊、耐心、爱仇敌,但在这样的环境中,这些美德似乎无法传播出去。教会的婚姻法要求婚姻是不能解散的,这就遇到很多问题,只能逐渐实现。尤其那些贵族和王侯们多次严重地违背了婚姻的理想。在中世纪的时代,在很多地区仍然存在奴隶制度(参见第1卷,73.3),而奴隶买卖——尤其是战俘的买卖——似乎无法完全消除;然而,在基督宗教精神和经济进步的影响下,奴隶的可怜命运有一些改善。很多原来是奴隶或“半自由人”的人在中世纪成为“依附农”和“农奴”(Hoerige und Leibeigene);教会特别注意到这些人的权利并保护了他们。在古代已经有“在教堂或墓地的避难权”(Asylrecht,参见第1卷,73.3),而在中世纪,这种权利尤其被强调,这样也起到了一个控制暴力的作用。贵族家庭之间的种种世仇和争吵曾经导致很多人的死亡,所以那种“上主的和平”(Treuga Dei)制度更为重要;“上主的和平运动”首先推行在法国地区。其发起人又是教会的人士:通过 Cluny(克吕尼)的 Odilo(欧迪罗)院长(参见 101.3),法国南部和勃艮第的一些主教会议自从 1040 年规定,在基督受苦和复活的那些日子(就是从星期三晚上到星期一早上)以及在主要的庆节时期(降临期、四旬期、复活期和圣神/圣灵降临期)都不能动武;谁在这些时期作战争,谁就被绝罚。这种规定也在诺曼底地区、英国、西班牙和德国被遵守。在德国地区,Henricus III(亨利三世)皇帝尤其支持这方面的努力。因为需要发动第一次十字军运动,Urbanus II(乌尔巴努斯二世)教宗在 1095 年的 Clermont(克莱孟)主教会议宣布了“三年的上主和平”,而三个在拉特兰举行的主教会议(1123 年、1139 年、1179 年,就是第 9、10、11 届大公会议)都规定“上主的和平”为整个教会都有效。

通过忏悔和补赎的制度(参见 99),通过主教的视察和“巡逻法庭”(参见 95.3),通过圣职人员的不断宣讲和讲道(参见 98.4)以及通过其他的措施,人们种种恶习被控制,而且也有一些美好的效果。在很多地方可以看到道德水平上升和思想深化的迹象。基督宗教并没有镇压本地民族的美好因素——勇气、荣誉感、道德约束力、忠诚——而是包容了这些因素并提升它们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如果没有

基督信仰和基督宗教的道德价值,在早期中世纪的那些国度或一个共同的“德意志帝国”的形成都是不可能的。在充满动荡和暴力的时代,教会多次是唯一的避难所,她控制了贵族们的侵略和群众的无序,因为教会的权威是很大的、不容侵犯的。教会尤其保护了家庭和小孩子;在基督宗教以前的时代,人们虽不赞成,但允许堕胎、放弃婴儿、杀害小孩子等恶行,然而教会都严厉惩罚这些行为。教会也始终肯定妇女们的尊严、法律权利和独立性,虽然在中世纪的圣职人员或隐修院的圈子里也有很多讽刺女性的说法。教会要求一夫一妻制,教会强调婚姻的不可解散性,禁止人们与犹太人或异教徒结婚,又很严格地反对一切不洁的罪行。信徒群众非常尊敬教会提供的祝福仪式和降福仪式(benedictiones)——这些降福陪伴着人们的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从出生一直到葬礼。在这些礼仪和庆节中,很多格尔曼/日耳曼民族的传统习俗被保存了,因为教会很宽容对待了这些传统因素。当然,群众的一些迷信因素也潜伏在种种圣事、仪式、对圣人/圣徒和圣髑的尊敬中,但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些基督宗教仪式都有一个外教传统的根源。比如,不能说在民众受欢迎的圣人/圣徒都是一些转化的异教徒的神明(参见 100.3)。

另外,格尔曼/日耳曼人的法律受到基督宗教的影响和改造;反过来,格尔曼/日耳曼人对法律的理解也影响了教会的礼仪,而一些外教传统流入了教会的制度或教会法(参见上文 95 - 97)。值得注意的是,本地人的“陪葬品”习俗被转化为“为教会或穷人捐献”(所谓的 *Seelgeraete*, *Seelteil*)。古代的基督宗教已经禁止信徒放利贷(参见第 1 卷, 26.2),而在中世纪,一信徒和圣职人员都被要求遵守这个禁令。从整体来看,虽然早期中世纪的社会有很多缺陷,但也呈现出一些令人感到鼓舞的层面:根深蒂固的信仰、诚恳的忏悔意识、奉献自己的意愿以及施舍和帮助别人的理想。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明,教会是中世纪的伟大“教育家”。在中世纪,教会是第一个和最重要的文化力量。教会的教育工作结出了美好的果实:在世俗社会中出现了很多有崇高精神的男女人士,甚至圣人/圣徒,而在神圣的道路上也出现了很多杰出的主教、司铎、具有修养的隐修士和修女。无论如何,早期的中世纪是一个准备期和过渡时期,中世纪的高峰时期在教会文化方面结出的果实更是灿烂的。

102.3 对民众的宗教生活和道德素质来讲,非常重要的当然是圣职人员(*clerici*)的表现。但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呈现出圣职的不同情况。在一些充满战争的时期——比如在 *Carolus Martellus*(查理·马特)的时代、在 814 年后的时期和

在 10 世纪——圣职人员处于很不理想的状态中,尤其在意大利和法国地区。但在法兰克地区也出现一些新的道德力量,通过圣 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的牧灵工作,通过 Carolus Magnus(查理曼)的政治能力以及通过萨克森人的皇帝(奥托)的影响,这些道德因素获得支持和鼓励。尤其关于圣职独身的规律带来一些困难。在西方教会中,自从 4、5 世纪就有这种“独身规律”:五品以上的圣职人员(即六品 = 执事、司铎、主教)都不能结婚(参见第 1 卷,60.6)。西班牙的国王 Witiza(维提撒,700 - 710 年)为他的地区正式取缔了这个规律。在其他的地区,教会的长上多次提倡圣职人员的独身,但很多人违背了这个原则,不仅下层圣职,就连主教们也一样放弃了独身生活。1022 年在 Pavia(帕维亚)举行的主教会议(参见 88.7)指出,在 11 世纪初的意大利,教区圣职人员一般都结婚。在一段时间内,伦巴第(米兰)的教会认为,司铎的婚姻是 Ambrosius(盎博罗修斯)教会传统的特权。在 11 世纪,那位严厉的忏悔讲道者 Petrus Damiani(伯多禄/彼得·达米安尼,参见 89.6)曾经献给 Leo IX(利奥九世)一部书(1049 年的 *Liber Gomorrhianus*《哈摩辣/蛾摩拉书》),其中夸大地描述了意大利圣职人员在道德上的堕落与黑暗,他的一些夸大的说法令人感到恐怖。除了部分圣职人员结婚以外,另一个严重的弊病是圣职买卖(simonia),就是用金钱或其他的物质财富来得到某一个教会地位。在 10 世纪中,在圣职人员和平信徒中间,这都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所以 Verona(维罗纳)的主教 Rather(拉特尔,参见 89.5)称自己的时代为 aevum Simonis(“圣职买卖的时代”,亦见 97.2)。

然而,一次又一次出现了一些热切抵抗腐败现象的改革者,而在整个中世纪都能够听到要求改革的声音,这种“愿意改进”的呼吁从来没有沉默过。一个最有效的补救措施是“圣职团”(vita canonica)的制度(参见 95.4);然而,在 9 世纪末,这个制度再次衰退了。在英国也出现一位改革者:Canterbury(坎特伯雷)的总主教圣 Dunstan(邓斯坦,959 - 988 年任总主教),他很全面地并相当成功地进行提高教会纪律的运动(落实圣职独身制度、为教区司铎恢复圣职团生活、改革隐修院生活)。然而,在他去世后丹麦人骚扰该地区,所以社会又变得很混乱。最重要的是,恰恰在那些最需要改革的地区(法国和意大利)形成了一些宗教改革和恢复教会的焦点,尤其重要的改革基地是 Cluny(克吕尼)隐修院,该隐修院准备并促进了一个强有力的改革运动。自从 Clemens II(克雷孟二世,1046 年)以来,罗马宗座也再次坚决要求遵守教规(参见 103)。这些愿意进行改革的人士抵抗圣职人员的不贞洁生

活(他们称之为 Nicolaitismus(尼苛劳/尼哥拉派的异端),这是根据《默示录/启示录》Rev 2:6,14f 的说法),又反对了“Simon(西满/西门)的异端”(即圣职买卖,名称来自《宗徒大事录/使徒行传》Acts 8:5-24)。个别思想很彻底的改革者认为,一切“平信徒授权”仪式都是“圣职买卖”,无论有没有发生“行贿”的问题。当时最有才华,但也是最严格的教会人士之一,Humbertus de Silva Candida(亨伯特,参见 89.6; 94.3; 103.2),曾经于 1056 年或 1058 年编写了一篇纲领性的著作: *Libri tres adversus Simoniacos*(《反对圣职买卖》三卷),这部书代表当时改革派的态度。他尖锐地谴责司铎的婚姻和平信徒授权,要求主教的选择和任命必须符合教规,他甚至怀疑那些“西满/西门派”的祝圣礼仪的有效性。

关于意大利北部米兰地区一个群众性的改革运动——所谓的 Pataria(帕塔利亚)——请参见 103.6。

103

德国来的教宗。1073 年之前教宗对教会改革的影响

历代教宗:Clemens II(克雷孟/革利免二世,1046-1047年),Damasus II(达马苏斯二世,1048年),圣 Leo IX(利奥九世,1049-1054年),Victor II(维克托二世,1055-1057年),Stephanus IX(斯德望/司提反九世,1057-1058年),Benedictus X(本笃/本尼狄克十世,1058-1059年),Nicolaus II(尼苛劳/尼哥拉二世,1058-1061年),Alexander II(亚历山大二世,1061-1073年),Honorius II(霍诺利乌斯二世,1061-1071年)。

103.1 在 1046 年的圣诞节,德国的皇帝 Henricus III(亨利三世,参见 88.7)提名一个德国人当教宗,就是 Clemens II(克雷孟/革利免二世);这个事件意味着宗座历史上的新阶段,而且是一个比较好的阶段(Beginn einer besseren Zeit in der Geschichte des Papsttums)。那种从勃艮第的 Cluny(克吕尼)隐修院发起的教会改革运动已经获得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在这个时刻,改革的思想也进入了教会的中央权威(宗座),而那位很虔诚的皇帝也支持改革。Clemens(克雷孟/革利免)在一个罗马的主教会议上马上严格禁止任何形式的圣职买卖,而在他去世后(1047年10月),他的继承人都继续了他那种“清理工作”(Reinigungswerk)。因为罗马人交给

皇帝“世袭元首”(patricius)的尊位,所以他为将来的教宗也获得了提名权,因此后来的三个教宗也都是来自德国的人,而第四个(Stephanus IX 斯德望九世)也同样 是德国人——他们无例外地都是一些有资格的、品性庄严的人物;他们选择的名称也暗示他们愿意恢复古代宗座的伟大传统(参见 Clemens I 克雷孟一世, Damasus I 达马苏斯一世, Victor I 维克托一世)。一方面,这些来自德国的教宗们在恢复罗马教会的秩序和排除不良因素方面有很大的贡献,但在另一方面,他们都是通过皇帝提名的,这似乎意味着,罗马的宗座等于是德国国王的“私有教堂”——这种情况根本就无法长期存在。改革思想越强盛,罗马宗座就越要求独立性和自主权。

在 Clemens II (克雷孟/革利免二世) 去世后,皇帝提名的人是 Brixen/Bressanone (布里克森) 的 Poppo (珀波) 主教,他既虔诚又有学问,取名为 Damasus II (达马苏斯二世, 1048 年), 但 23 天后因患上流行病而去世。他当教宗时也面对了抵抗的力量, 因为原来被弹劾的 Benedictus IX (本笃/本尼狄克九世, 参见 88.7) 再次想恢复自己的地位, 并一直到他去世那一天(1055 年) 仍然坚持他的要求。

103.2 有深远意义和影响力的教宗是 Leo IX (良/利奥/莱奥九世, 1049 - 1054 年), 虽然他的任期仅维持 5 年。他原名为 Bruno (布鲁诺), 出生于 Alsatia (阿尔萨斯), 是 Colmar (科尔马尔) 附近的 Graf Hugo de Egisheim (胡格伯爵) 的儿子, 并与皇帝有亲戚关系。他全心推动了改革的思想, 其中一个例子是他接受了皇帝的提名, 但提出这样的条件: 罗马的圣职和罗马民众必须同意他当教宗, 而后来他确实获得他们的赞同。他不仅仅与 Cluny (克吕尼) 的 Hugo Magnus (大胡格院长) 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参见 101.3), 而且也从意大利以外的地区 (洛林、勃艮第) 聘任一些怀着同样态度的能干人士, 比如 Humbertus de Moyenmoutier (亨伯特, 参见 89.6; 94.3; 102.3) ——一位隐修士——提升他为 Silva Candida (希尔瓦·甘第达) 的枢机主教并请他充当宗座的顾问。他请 Liege (列日) 的总执事 (archidiaconus) Fredericus de Lothringia (洛林的腓特烈, 即后来的 Stephanus IX 斯德望教宗) 来罗马当教宗的秘书, 又邀请了那位年轻的隐修士 Hildebrand (希尔德布兰德, 后来的 Gregorius VII 教宗, 参见 88.7) ——他当时正在 Cluny (克吕尼) ——回到罗马来, 祝圣他为 subdiaconus (五品) 并委任他在罗马当罗马教廷财务总监, 又任命他为 St. Paulus (圣保禄/保罗) 隐修院的院长。教宗 Leo IX (良/利奥九世) 的主要目标是整顿教会、排除不良习惯、落实教规, 尤其恢复司铎和隐修士的传统理想以及实现教宗在教会中的主权。他一生以不懈息的热忱追求这些理想, 因此去各地整顿地方

教会(到意大利北部和南部、法国、德国),又在罗马举行了四个主教会议,并在 Pavia(意大利帕维亚)、Reims(法国兰斯)、Mainz(德国美因茨)、Vercelli(意大利维尔切利)、Salerno(萨莱诺)、Siponto(西庞托)、Mantua(曼托瓦)召开了主教会议。在教宗的指导下,这些主教会议宣布了一些严格反对圣职买卖和圣职婚姻的规定,并要求五品以上的一切圣职人员保持独身的贞洁。Leo(良/利奥)教宗也间接控制了德国地区的“私有教堂”制度,因为他扩大 *exemptio*(豁免权)和教宗对某些隐修院的直接管辖权的范围(参见 101.2)。在 Leo(良/利奥)以前的时期,罗马宗座的首席权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但通过他的榜样,罗马教宗再次获得了真正普世性的尊严和比较高的权威。同时,他和德国皇帝的关系非常好。

这位教宗对于拜占庭的政策和在意大利南部的介入不是太成功。由于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 Cerularius(凯卢拉利乌斯/克汝拉瑞乌斯)的激烈措施以及由于教宗使者的严格态度,长期潜在的东、西方教会的分裂于 1054 年显示出来了;在无效的谈判后,这种分裂成为长期的教会分裂(参见 94)。Leo(良/利奥)教宗在正式分裂的时刻已经去世了。意大利南部的情况也给他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他深信,唯独强化教会国的措施能够帮助他保持宗座的独立性,所以他向南方扩展教会国。Benevento(贝内文托)的公爵支持他(1051 年),所以 Henricus III(亨利三世)皇帝放弃了对于 Benevento(贝内文托)的主权,但他要求教宗放弃对于德国的 Bamberg(班贝格)隐修院和 Fulda(富尔达)隐修院的主权(1052 年)。但由于这个行动,教宗面临诺曼人(参见 81.4)的威胁——这些外来的强盗自从 1016 年开始在意大利半岛南部的一些地区定居,他们既战胜了希腊人,又对付了穆斯林军,并在 Neapolis(那不勒斯)附近建立了 Aversa(阿维撒)和 Apulia(阿普利亚)公国(Grafschaft“伯爵领地”)。Henricus III(亨利三世)皇帝承认这些地区为德意志帝国的 Lehen(fiefdom 采邑、封地),因此协助教宗抵抗诺曼人。然而,因为德国的协助不足,所以镇压诺曼人的战争导致了灾难性的结局:教宗的军队在 Apulia(阿普利亚)的 Civitate(切维塔特)被毁灭(1053 年 6 月)。Leo(良/利奥)教宗也落入诺曼人的手,并在 Benevento(贝内文托)入狱 9 个月。最终,他获得自由,后回到罗马,但不久后,于 1054 年 4 月 19 日去世;他是最高尚的教宗之一,也被尊封为圣人/圣徒。

103.3 罗马教宗的“长老团体”(presbyterium)发展到“枢机主教团”(collegium cardinalium),而在 11 世纪,这个“枢机团”开始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最早的

时期,大概所有的罗马司铎都属于这个团体,但后来(约在6世纪以后)只有25座称为 *titulus*(有特殊地位的)罗马教堂的本堂司铎(称为 *archipresbyter* 总铎,参见第1卷,20.1)才有资格参与这个团体。这25位司铎也被称为 *presbyteri cardinales*(枢机司铎,来自 *cardo* 户枢,后指核心的教堂;一位长期在某教堂任职的圣职人员也被称为 *incardinatus* 或 *cardinalis*)。除了他们以外还有所谓的 *diaconi cardinales*(枢机执事),他们在礼仪、财务管理和教会的指导方面协助了教宗;这些枢机执事是7位在罗马负责照顾穷人的执事(*diaconi regionarii* 地区执事),还有那些在教宗宫殿服务的 *diaconi palatini*(宫殿执事),另外还有(至少从732年以来)7名罗马教区的主教,即 *Ostia*(欧斯提亚)、*Porto*(波尔托)、*Albano*(阿尔巴诺)、*S. Rufina*(圣汝费纳,亦称 *Silva Candida*,后来于 *Porto* 合并)、*Sabina*(萨比纳)、*Tusculum - Frascati*(图斯库卢姆-弗拉斯卡提)和 *Praeneste - Palestrina*(帕雷斯提瑞纳)的主教。根据 *Stephanus III*(斯德望/司提反三世)于769年作的规定,后面这7位枢机主教必须每周轮流在 *Lateran*(拉特兰)教堂举行礼仪——*Lateran*(拉特兰)教堂就是教宗的主教座堂。在11世纪,枢机们的人数是53位:7名枢机主教,28名枢机司铎以及18名枢机执事。后来,枢机们的人数下降。这些枢机的地位本来就很重要,但通过1059年的规定(见下),唯独他们有权利选择新教宗,所以他们的威望更大。教宗的使者(*legati*)的候选人都出于这些枢机的圈子。

103.4 在 *Leo IX*(良/利奥)后,皇帝提名的人是这位教宗的秘书,即 *Eichstaett*(艾克施特德)的主教 *Gebhard*(格布哈德),他取名 **Victor II**(维克托二世,1055-1057年)。早在1056年10月,39岁的 *Henricus III*(亨利三世)在教宗的怀中去世了,他请教宗照顾他那6岁的儿子 *Henricus IV*(亨利四世)以及他的帝国。这位皇帝的去世对德国造成严重的损失。在 *Victor II*(维克托二世)去世后,一个新的教宗完全根据教规的秩序当选——由此可见改革派的影响。这位新教宗是上面提到的 *Fredericus de Lothringia*(洛林的腓特烈,亦见94.3),他曾当过 *Monte Cassino*(卡西诺山)隐修院的院长,现在取名 **Stephanus IX**(斯德望/司提反九世,1057-1058年)。当时在罗马当五品(*subdiaconus*)的 *Hildebrand*(希尔德布兰德)后来还是被派到德国并获得了皇后 *Agnes*(阿格内斯)对新教宗的同意。这位 *Stephanus*(斯德望)本来是 *Gottfried de Lothringia*(洛林的戈特弗里德)公爵的弟兄,而这个弟兄与 *Tuscia*(意大利中部,图斯基亚)的伯爵夫人 *Beatrice*(贝雅特里斯)结婚(1054年),所以在意大利中部和意大利北部获得了强大的地位,但他坚决反对德国国王。与

他的前任教宗一样,Stephanus IX(斯德望/司提反九世)也很热切地推动了整顿教会的工作并且将 Petrus Damiani(达米阿尼的伯多禄/彼得,参见 89.6; 101.4; 102.3)提升为 Ostia(欧斯提亚)的主教——这位本来在 Fonte Avellana(阿维拉纳泉)独修的人也是最有威信的“教会整顿者”之一,现在他任 Ostia(欧斯提亚)的主教,这样成为枢机团的主席。除了他以外,具有突出贡献的人物是 Hildebrand(希尔德布兰德)和那位充满激情的 Humbertus de Silva Candida(亨伯特,1061 年去世),后者当时发表了一个反对圣职买卖的改革文献(参见 102.3),其中提出很广泛的教会政治要求,他也是大部分教宗文献的作者,记载了从 Leo IX(利奥九世)一直到 Nicolaus II(尼苛劳/尼哥拉二世)之间的文献。

103.5 由于上述的准备,在 1058/1059 年发生了一个关键性的转变,就是罗马教廷(curia Romana)抵抗德国皇帝对教会的干涉,这等于是“授权之争”的前奏。Stephanus IX(斯德望/司提反九世)很早去世,而原来的 Benedictus IX(本笃/本尼狄克九世教宗,参见 88.7)的弟兄 Gregorius de Tusculo(额我略/贵格利)率领罗马贵族人以暴动的方式任命 Johannes de Velletri(维雷特瑞的约翰内斯)为 Benedictus X(本笃十世教宗,1058 - 1059 年)。然而,Stephanus IX(斯德望/司提反)教宗曾经规定,在 Hildebrand(希尔德布兰德)从德国回来之前不可以选新教宗。Hildebrand(希尔德布兰德)回到意大利并采取了一些巧妙的措施:他在 Siena(锡耶纳)聚集了罗马的枢机们并重新选任一个教宗(德国朝廷也同意这种作法)。因此,枢机们于 1058 年 12 月宣布 Florentia(佛罗伦萨)的主教 Gerardo(格尔哈德)为 Nicolaus II(尼苛劳/尼哥拉二世教宗,1058 - 1061 年);在 Benedictus(本笃)被驱逐之后,这位新教宗被普遍承认。在他的任期内发生了一些重大的改进,但他的顾问 Humbertus(亨伯特)和 Hildebrand(希尔德布兰德)在这方面起的作用比教宗的影响还要大。这些事的发生要求人们重新考虑到选任教宗的秩序。一方面,Nicolaus II(尼苛劳/尼哥拉)的选任过程很特殊,所以需要为他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另一方面需要尽可能排除罗马贵族及平信徒的干涉。因此,1059 年 4 月在 Lateran(拉特兰)举行的主教会议规定了一个“选择教宗的法令”(作者大概是 Humbertus 亨伯特),其中规定,只有罗马的枢机们有权利选教宗(那些枢机主教还有“提名候选人”的权利)。另外,教宗应该来自罗马圣职人员的行列,而选教宗的地点应该是罗马。其他的罗马圣职人员和罗马民众只有“赞同的权利”(他们没有说明,这种“赞同”是形式上的或是法律有效的)。另外,将来的 Henricus IV(亨利四世)皇帝以及他的继承人应

该获得“相称的尊敬”(debitus honor et reverentia)——这种说法相当模糊,但它大概意味着,在祝圣教宗之前皇帝有某种“赞同权”,正同在卡洛林和奥托王朝那样(参见 86.6; 88.4)。这种规定和以前 Henricus III(亨利三世)的作法形成很大的差别。罗马宗座再一次恢复了对教宗选任的独立权利,虽然德国国王仍然保留了某些特权。1059 年的“选任教宗的法令”也收录在 Gratianus(格拉提阿努斯)的《教会法典文集》中(参见第 1 章,第 XXIII 条)。

1059 年的主教会议还通过另一些有整顿教会作用的规定:那些不过独身生活的圣职面临绝罚的惩罚,而平信徒被禁止望他们的弥撒(第 3 条)。圣职人员应该过圣职团的生活(第 4 条,参见 95.4; 117.1)。圣职人员不能从平信徒的手中接受一个教堂,无论是免费的或需要付出代价的——这是对于“平信徒授权”的第一个禁令(第 6 条)。圣职买卖再次受到严格的谴责(第 8 条)。这个主教会议也再次谴责 Berengar(贝伦格尔)关于圣餐的理论(参见 90.6)。

因为罗马教宗的领导们预先意识到,关于罗马教宗选任的新规定将会引起德国人的不满,他们——Nicolaus II(尼苛劳/尼哥拉二世)和那位不久后(1059 年末)被提升为罗马教会的总执事的 Hildebrand(希尔德布兰德)——在别的地方寻找了政治上的支持。他们很明智地转向宗座原来的敌人,就是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在 1059 年夏天在 Apulia(阿普利亚)地区的 Melfi(梅尔费)举行的主教会议上,教宗将 Capua(卡普阿)地区封给 Aversa(阿维尔撒)的伯爵 Richardus(理查德),将 Apulia(阿普利亚)、Calabria(卡拉布利亚)和 Sicilia(西西里岛)封给 Robertus Guiscard(罗伯特)公爵——但当时的西西里岛仍然在穆斯林军的手中,诺曼的公爵必须先将它夺取。这两个诺曼领袖都向教宗宣发“领地封臣”的誓言,并同意每年交纳封地稅;他们也承诺将来要保卫罗马教宗,尤其要确保教宗选举的秩序和自由。这种条约表明,当时的人们认为,教宗对意大利南部地区都有主权,而这种主权的基础显然是 *Donatio Constantini*(《君士坦丁的赠予》,参见 85.3)以及 *Pseudo-Isidoriana*(《伪伊西多尔教令集》,参见 87.4——其中也包括《君士坦丁的赠予》)。自从 Leo IX(良/利奥九世)以来,这些文献在教宗的政策中获得了重要的地位。

103.6 另一个在罗马 Lateranus(拉特朗)举行的主教会议(1060 年春天)重新肯定了 1059 年关于教宗选举的规定。然而,这些规定和宗座与诺曼人的联结引起德国朝廷的愤怒,甚至导致德国与罗马关系的破裂。教宗派遣的使者 Stephanus(斯德望/司提反)根本不被允许进入宫廷。另外,德国国王的贵族顾问和一些主教

在 Worms(沃尔姆斯)开会并宣布教宗缺少合法性,所以他的法令无效。Nicolaus II(尼苛劳/尼哥拉二世)在 1061 年 7 月去世,当时的情况更紧张。罗马的一些贵族人士派遣了一个使团到德国,邀请德国国王提名一个新的教宗,但 Hildebrand(希尔德布兰德)同时在罗马组织枢机们选择 Anselmus de Lucca(安瑟伦)主教为 Alexander II(亚历山大二世,1061 - 1073 年),这样就完全排除了任何来自德国国王的影响。当时,Hildebrand(希尔德布兰德)已经成了教会改革派的灵魂人物和教廷政策的指导者。Alexander II(亚历山大二世)早一些当过 Milano(米兰)的 Pataria(帕塔瑞亚)运动的领袖,并十分引人注目。

来自 patta(旧布)和 pattari(流浪汉)的 Pataria(帕塔瑞亚运动)是一种群众性的运动;它在 1050 年后出现在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地区的城市,尤其在 Milano(米兰);该运动反对那些过奢侈生活的贵族们和与世俗贵族有联系的高层圣职人员。除这些民主和社会团结方面的要求以外,他们也要求落实那些禁止圣职买卖和禁止圣职婚姻的教规,因为伦巴第地区的圣职人员多次忽视教会在这方面的规定。在初期阶段,该运动的领袖是一些来自米兰的圣职人员,即 Arialduus(阿瑞阿尔都斯),Landulfus(兰都夫斯)和 Anselmus(安瑟伦,1057 年当 Lucca 卢卡的主教,1061 年当教宗)。在他们以后,Landulfus(兰都夫斯)的弟兄 Erlembaldus(艾尔兰巴德)——一位骑士——领导了这个运动。在 Stephanus IX(斯德望/司提反)的任期内,罗马宗座派遣了 Hildebrand(希尔德布兰德)到 Milano(米兰),他开始和 Pataria(帕塔瑞亚)达成共识(1057 年),这样支持这个运动,使它有力量给米兰高层圣职人员施加压力。当时的米兰总主教是 Wido(Guido 古多),他的立场不大坚定,所以在 Pataria(帕塔瑞亚)的影响下,他和大堂的圣职人员被迫接受罗马教廷的使者 Petrus Damiani(达米阿尼的伯多禄/彼得)的要求以及罗马宗座的要求(1059 年)。Pataria(帕塔瑞亚)后来的发展伴随着“授权之争”的过程,一直到 Erlembaldus(艾尔兰巴德)去世(1075 年)。

德国人没有承认 Alexander II(亚历山大二世)的选举;那位很年轻的 Henricus IV(亨利四世)王也是罗马教会的 patricius(主保),所以他认为他可以提名一个新的教宗,在 1061 年 10 月在 Basileia(巴塞尔)的帝国议会上,他们宣布 Parma(帕尔马)的主教 Cadalus(卡达卢斯)为教宗,取名 Honorius II(霍诺利乌斯二世,1061 - 1071 年)——他就是罗马贵族派和那些反对改革的伦巴第主教们所支持的人。这种“提名新教宗”的决定太仓促,德国的主教们不到一半支持它。两个教宗的对立

局面在罗马引起猛烈的战争,但 Tuscia(图斯基亚)的 Gottfried(戈特夫里德)镇压了双方的战争。这时(1062年4月),Colonia(科隆)的总主教 Anno(安诺)引起了一个政变,因为他从那位软弱的 Agnes(阿格内斯)皇后那里夺走了年轻的 Henricus IV(亨利四世),并自己掌握了政权;不久后,Bremen(不来梅)的总主教 Adalbertus(阿达伯特)——一位强大的领袖(参见 81.2)——要求他参与政权。从此以后,德国人关于教宗的观点经过转变:1062年10月的帝国议会派遣一个使者再次检查教宗的问题,而这个使者就承认了 Alexander II(亚历山大二世)。因为对立“教宗”仍然没有放弃他的权利,所以德国和意大利的主教们在 Mantua(曼托瓦)共同举行了一个主教会议(1064年圣神/圣灵降临节),而这个会议都支持 Alexander II(亚历山大二世)。然而,Cadalus(卡达卢斯)一直到死(1071年)都坚持他的立场,而且在意大利北部有一些人支持他,所以这次教会分裂于1071年才结束。

第二段

中世纪的全盛时期(1073年 - 1294年)

宗教生活和教会文化的兴旺发达。宗座权势的顶点

概 论

通过 Cluny(克吕尼)和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的整顿工作,大约在 11 世纪末开始了中世纪教会和中世纪文化的辉煌时期——它大约持续了 150 年之久(1100 年到 1250 年)。教会通过一些顽强的搏斗从世俗权力的控制下争取自己的权利,这样奠定了神圣权威的优先权(Vorrang des Sacerdotiums vor dem Imperium)。普世性的教会处于中央化和统一化的过程当中,它不再屈服于格爾曼/日耳曼人的“封地”和“私人教堂”法律,并且为自己的工作要求完全的自由。因此,罗马宗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权威性,无论是在教会内或在国际政治上。教会被视为奥古斯丁“上主之城”的具体表现,教会统治着私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她在高等文化的每一个层面中的领导地位也没有受到挑战。因为中世纪的教会在古代基督宗教的基础上恢复了教会的纪律,不仅教区司铎的水平被提高了,而且修会生活的崛起一次又一次创造了新的修道形式。在宗座的指导下基督宗教能够走向统一;西欧基督宗教的合一精神具有创造力和团结气概,在十字军运动、重大的传教活动、经院思想和神秘思想的光荣成就以及在罗马式和哥特式建筑物上得到表现。虽然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张力的弥合多次是艰巨且让人难受的,但基督信仰的精神已经成为普遍的群众心态(allgemeiner Volksgeist)——它照亮一切,激发一切。然而,在这个历史阶段的末期,社会经历了彻底的转变:两个最高的权威(教宗与皇帝)的长期的搏斗产生了这样的结果:皇帝的权威性被削弱,而宗座也跟着失去原有的崇高地位,西欧在文化上的合一性开始破裂,而“民族国度”的制度逐渐形成——这些民族国度都各自为政地寻求自己的利益(ihre Sonderinteressen)。

**第一部分 从额我略七世教宗到
切来斯提努斯三世教宗
(1073年 - 1198年)**

第一章 宗座和皇帝

104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教宗)及其改革工作。授权之争

104.1 在 Alexander II(亚历山大二世)去世后(1073年),罗马的信徒群众强烈要求选任那位大约 50 岁的总执事 Hildebrand(希尔德布兰德)为教宗,而罗马的枢机团确认了他们的选择。他长期以来为罗马教会提供了良好的服务(参见 103.2, 4-6)。这个人出生在属于罗马地区的 Tuscia(图斯基亚)的 Suana(苏阿纳),上任后取名为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1073-1085年)。他很可能通知了德国朝廷关于他当选的事,并获得了德国国王的赞同。在教会面临种种困难的时期,他是最理想的人选,具有“统治者的风度”(eine wahre Herrschernatur),有远见,有非常坚定的毅力和激昂的性格,同时愿意热忱地为上主和教会服务。他认为,自己一生的主要任务是“恢复正当的秩序”(Herstellung der “rechten Ordnung”),就是说尽可能建立“人间的天国”(Aufrichtung des “Reiches Gottes auf Erden”),即教会,而教会要受 Petrus(伯多禄/彼得)继承人和在基督的代表的指导,各种世俗的力量必须在一切涉及到基督宗教的问题上服从教宗。因此,这种“教宗统治全世界”(paepstliche Weltherrschaft)的观念在原则上有着宗教信仰的基础。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的行动的准则始终都是 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理念:iustitia et pax(正义与和平)。

首先,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继续推动前任几位教宗开始的教会整顿工作。在 1074 年 3 月和 1075 年 2 月在罗马的拉特兰教会举行的“四旬期主教会议”上,主教们重新肯定了 Leo IX(利奥九世)和 Nicolaus II(尼苛劳/尼哥拉二世,参见 103.2.5)对于“圣职买卖”和“圣职人员婚姻”的谴责,还特别规定那些不

过贞洁生活的圣职人员不能在教会中任职,而信徒们应该远离他们。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也委派了一些使者(legati,参见110.2d)来落实这些规定。他深信,婚姻与司铎职是两个无法调和的事情,所以需要简单地执行教会的古老教规。在推行独身制度方面,一些教会政治上的因素和动机——比如不让圣职人员遭受国度的影响和操作——可能也有一定的作用,但对他来说,这些只是次要的(in zweiter Linie)。

教宗反对“圣职人员婚姻”的措施在很多地方,尤其在法国和德国,引起了动荡和反弹。1074年在巴黎举行的主教会议称这种“独身法律”为“无法接受的”和“不合理的”。很多德国主教对这一规定的执行很懈怠。下层的圣职人员也在某些地方违背了这种要求。然而,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坚持自己的原则。1078年的罗马主教会议规定,如果一些主教接受某些圣职人员的贿赂,因而允许他们过婚姻生活,那么这些主教将面临被撤职的危险。虽然独身制度的法律没有马上被执行,也没有完全毫无例外地被执行,但从整体来看,它赢得了胜利。当然,在某些地区——比如波兰、西里西亚、摩拉维亚、丹麦和斯堪的纳维亚——这种过程一直维持到12、13世纪,而且在整个中世纪的时代也相当频繁地发生了一些违背原则的个案。Urbanus II(乌尔巴努斯二世教宗)也进一步禁止圣职人员的婚姻,因为他在1089年在意大利南部的Melfi(梅尔费)的主教会议上规定,结婚的五品修士(subdiaconus)将失去他的职位,而如果他不放弃婚姻生活,他的妻子将要当地主的奴仆。这种规定的前提是:祝圣为“大品圣职人员”——而正如Innocentius III(依诺森三世)于1207年所说,“五品”那时也算为“大品”——的婚姻不仅仅是不合法的,而且也是无效的。1135年在Pisa(比萨)的主教会议和1139年在Lateranus(拉特兰)的主教会议更清楚地表达了这种观念。在另一方面,希腊的教会依然容忍司铎们的婚姻(参见第1卷,60.6),但没有结婚的圣职人员却更被尊敬,而只有那些在被祝圣执事之前已经结婚的人被接受为一个堂区的牧灵者,这种习惯大概来自13世纪,先出现在俄罗斯地区。因为主教们都必须是独身的人,被选任主教的人物一般都是隐修者,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104.2 教宗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在针对教会内部圣职人员的问题的同时,他也坚定地反对平信徒授权的教会政策(参见97.2),这种政策符合当时那些支持改革的人(Reformfreunde)所提出的要求。对于独身制度的反感和贵族人士进行的圣职买卖显示出一点:当时教会最大的弱点之一是圣职人员被卷入世

俗的利益中,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平信徒对教会的统治,各地的王侯们委任高级圣职(主教)。当时,一切坚持教会利益的人都提出 *Libertas ecclesiae*(“教会的自由权利”)的口号,但这种要求就意味着主教们的选任必须符合教规,并且教会也能自由地处置自己的财产。Nicolaus II(尼苛劳/尼哥拉二世教宗)早于 1059 年已经很尖锐地谴责了格尔曼/日耳曼人的“私有教堂”制度,但没能革除平信徒授权的习惯。现在的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再一次全力以赴地为教会的权利奋斗,这并不是因为他渴望建立圣统制和巩固自己的权力而随意发动的一次争吵,而是因为他服从于自己的义务感并服从于一个无法回避的必然性。如果当时的“私有教堂”制度继续发挥着那种无所不在的影响,作为一种宗教性的机构的教会将要面临被消除的危险。因此,这个冲突既是悲剧性的,又是命中注定的;它所涉及到的不仅仅是“权力地位”,而且也是一些关于“正当的世界秩序”的良心要求(*grundlegende Forderungen des Gewissens “um die rechte Ordnung in der Welt”*)。

根据 Augustinus(奥古斯丁)、Gregorius Magnus(大额我略/贵格利)和 Nicolaus I(尼苛劳/尼哥拉一世)的思路,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进一步发展、澄清和整理他们的观点并在 27 个简短的原则中将这些观点表达出来——这就是所谓的 *Dictatus Papae*(《教宗敕令》)。这份文献包含在教宗的书信集(*Briefbuch*)中,应该视它为教宗亲笔写的文件。它大概在 1075 年的“四旬期主教会议”前几天形成,并指出这些原则的目标大概是提供新教会法典的基础或教会合一运动的基本原则。其中最核心的原则形容宗教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关系,同时也是宗教优先权的经典表达:第 8 条: *Quod solus [papa] possit uti imperialibus insigniis*[在所有的圣职人员当中只有教宗可以使用统治者(“皇帝”)的象征];第 9 条: *Quod solius papae pedes omnes principes deosculentur*(受一切国王亲吻的只有教宗的脚);第 12 条: *Quod illi liceat imperatores deponere*(他可以弹劾皇帝们);第 27 条: *Quod a fidelitate iniquorum subiectos potest absolvere*(他可以解除臣民对于暴君所发的服从之誓言)。另一些原则涉及到希腊教会,因为这个教会不久之前(1054 年)与西方教会分裂了(参见 94)。

104.3 引起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施行种种措施的因素主要是德意志王国的表现。在 1065 年,15 岁的 Henricus IV(亨利四世,1050 - 1106 年)被宣布为成年人。这位年轻君主有才华,也有精力,但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不是很成熟的人,而且缺少克己的能力。他的政策早已引起一些人的反感。Alexander II

(亚历山大二世教宗)曾经于 1073 年绝罚了他的一些顾问,因为他们对 Henricus (亨利)有不良的影响。反过来,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和德国国王的关系在初期阶段是相当友好的。比如,在萨克森起义的压力下(1073 - 1074 年), Henricus(亨利)表示愿意接受教宗的改革计划,他曾经向教宗写了一篇卑躬屈膝的文献,其中承认他犯了种种侵犯教会的罪,尤其是在圣职买卖方面,又说他将要改过迁善,并要服从教宗。然而,在 1075 年的四旬期主教会议上,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采取了一个影响力深远的措施:他除了禁止圣职买卖和圣职人员婚姻(参见上文 104.1)以外还禁止任何平信徒授予任何教会职位,尤其禁止德国国王给德国主教们授权。

这个措施的目标首先是为确保主教和隐修院院长是按照教规选举的秩序任命的。然而,这种规定远远超越“教规”的范围,它涉及到当时国度的利益,因为平信徒的授权符合着一个具有几百年历史的根深蒂固的法律习惯,并且在以前的时期中,罗马也曾经承认了这个习惯(参见 97.2)。因此,各地的君主们反对这条规定,尤其是德意志 - 意大利帝国中的贵族们。在德国地区,罗马法和格尔曼/日耳曼法律传统之间的碰撞特别强烈。自从 Otto(奥托)时代起了(从 950 年以来),德国的主教们也经常拥有高级的政治地位,所以德国政府如果想保持他的能动性和影响力都需要这些主教的合作,并且需要教会财产所提供的税和军力——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因此,教宗对平信徒授权的禁令似乎威胁了国王的地位本身。从当时的帝国法律来看,宗座的种种要求是一个深层的转变,所以教宗虽然可以说可以进行谈判,但教会和国度之间的冲突——一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

104.4 德国国王 Henricus IV(亨利四世)依靠着各地王侯的协助,在 Unstrut(翁斯特汝特河)附近的 Homburg(亨堡)打败了萨克森人的军队(1075 年 6 月)。现在他和以前不同,不愿意向教会让步。他认为谈判没有用,需要用事实改变情况,所以他擅自任命了几个意大利北部地区的主教,尤其提名一个新的米兰主教,虽然原来的主教尚未去世(米兰主教的影响很大),并且恢复与那些曾经被绝罚顾问的来往。教宗再次劝告他,说宗座愿意谈判,但同时口头上也说,如果皇帝不服从,他也面临绝罚和弹劾。现在,皇帝激动地公开攻击罗马教宗,他于 1076 年 1 月组织 Worms(沃尔姆斯)的主教会议,并让这 26 位主教宣布教宗“被罢免”。Henricus(亨利)自己发表了一部充满激情的宣言,其中称教宗为“不是教宗,而是虚伪的隐修士的 Hildebrand(希尔德布兰德)”,又以自己“Patricus Romanus(罗马主保)”的身份

命令 Gregorius (额我略/贵格利):“下台,下台,你这个永远被诅咒的人!”(descende, descende, per saecula damnande!)在伦巴第的 Piacenza(皮亚琴察)一个主教会议上,一些伦巴第主教也同意了皇帝这种史无前例的审判。

德国国王这个作法没有经过成熟的考虑,也是一个不合法的措施,所以谈判的可能性已经没有,随即暴发的是一场为德国和皇帝自己带来不幸的争吵。支持教宗的人不仅仅是那些有道德感或有高级教育的人士,而且也是一些具有势力的政治伙伴:强大的 Mathilda de Tuscia(玛蒂尔达)女伯爵(她始终忠于宗座并虔诚地爱戴 Gregorius)、米兰的 Pataria(帕塔瑞亚)运动(参见 103.6)以及——至少从 1080 年以来——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教宗马上回应皇帝的攻击,并在 1076 年 2 月 22 日以一种隆重祈祷的形式宣布 Henricus(亨利)被绝罚,禁止他施行政权,解除德国臣民的服从义务,又禁止德国人服从他。那些反对教宗的主教们一部分被撤职,一部分被绝罚,这样削弱了他们的抵抗力。整个基督宗教世界动荡不安,因为教会的元首弹劾一个国王是史无前例的行动。虽然一部分的人怀疑了绝罚的合法性,但教宗的处罚仍然有很大的效果。支持国王的党派支离破碎,萨克森人再次反叛。德国地区的诸侯们于 1076 年 10 月在 Tribur(特瑞布尔)聚集并决定,如果 Henricus(亨利)的绝罚问题不能在一年内解决,他们都要放弃对他的拥戴。他们规定,在 1077 年 2 月 2 日(圣母献耶稣于圣殿庆节)在 Augsburg(奥格斯堡)的帝国会议上,帝国的贵族们将要作出决定,而教宗必须亲自在那里出现,需要他当裁判者。国王的情况没有希望,所以,他现在表明要服从教宗并表示为了那些谴责教宗的话要作补赎。他在很少几个人的陪同下在冬天跨越了阿尔卑斯山脉,目的是获得教宗的宽恕,使教宗收回绝罚。已经在去德国的路途中的教宗就进入 Mathilda(玛蒂尔达)女伯爵在 Appenninus(亚平宁山脉)北端的 Canossa(卡诺撒)堡垒。在那里,教宗接待了皇帝。皇帝自愿地完成了教会规定的补赎,而 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教宗)收回了对他的绝罚(1077 年 1 月 28 日)。对皇帝来说这当然是一个胜利,虽然教宗仅仅恢复他的教籍,并没有恢复他的政权,因为关于将来政权的问题, Henricus(亨利)需要先和德国的诸侯们谈判,或者说他需要等待教宗后来的裁判。

当时,德国国王居留在 Canossa(卡诺撒)城堡的山脚下,并连续 3 天(1077 年 1 月 25 - 27 日)与他的陪同者一起出现在城堡的大门外——“光着脚并且身穿补赎者的服装”(discalceatus et laneis indutus, 见 Greg. Reg. IV, 12),他恳求教宗开门及解除绝罚的惩罚。当时, 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的顾问不仅有 Mathilda(玛

蒂尔达),而且也有 Henricus(亨利)的代父(教父)——Cluny(克吕尼)的院长 Hugo(胡格)。这些人都同情国王并为他求情,所以教宗在第四天让皇帝进门,收回对他的绝罚,并(按照当时的习惯)在举行弥撒时送给他圣体(圣餐)。那位不太可靠的历史记载者 Lambert von Hersfeld(兰伯特)因此说,这就是“神的裁判”。一方面,对国王个人来说,作这种补赎是一种屈辱,但从当时的人生观来看,作补赎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彻底损失了他的尊严,所以皇帝还可以再次掌握政权。从效果来看,说这是教宗的胜利不如说皇帝获得胜利,因为他确保了自己的皇帝地位,这样等于克服了他的对手们;但教宗放弃了一些重大的政治权柄,教宗在这一个时刻认定自己的“司祭”地位(宽恕罪),并牺牲了“政治家”的优势(er opferte den Staatsmann dem Priester)。无论如何,如果比较 Canossa(卡诺撒)1077年和在 Sutri(苏特瑞)1046年所发生的事(参见 88.7),可以明确看出皇帝的地位相对弱,而教宗的地位相对强。Henricus III(亨利三世)皇帝仍然很强调,国王和皇帝的尊严是神圣的——因为他是“圣王”,皇帝才能够对教会有保护的权利——但教会改革派的观点大量地削弱了国王的“神圣尊严”,而 Henricus IV(亨利四世)的补赎也意味着皇帝丧失了他的“神圣尊严”,所以这个事件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中世纪的“统治者概念的世俗化”(eine gewisse Saekularisierung der mittelalterlichen Herrscheridee)——这种世俗化在 Staufer(施陶费尔)王朝的皇帝那里更突出。

104.5 德国贵族们计划的 Augsburg(奥格斯堡)帝国议会没有实现。德国各地的王侯在 1077 年 3 月在 Forchheim(夫尔克海姆)聚集,他们不满意 Henricus(亨利)重新被接受进入教会,所以他们选择了他的姐夫 Rheinfelden(莱因费尔登)的 Rudolphus(鲁道夫)——Suabia(施瓦比亚)的公爵——当德国国王。他马上承诺将要服从教宗并将要确保主教们的选任符合教规。此时,内战就爆发了。教宗 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尽可能保持了中立态度,并且欢迎双方请他当裁判者。然而,这两个领导都回避了教宗的裁判。虽然谁都不能彻底打败对方。Henricus(亨利)最终还是占了上风,Suebia(施瓦比亚)遭受了可怕的毁灭,而且这个公国被交给 Staufen(施陶费尔)家族的 Friedrich(腓特烈)伯爵(1079 年)。Henricus(亨利)要求教宗承认他为皇帝,并绝罚 Rudolphus(鲁道夫),否则他将会推出一个“对立教宗”。因此,教宗似乎没有别的选择,他在 1080 年 3 月的四旬期会议上再次绝罚了 Henricus(亨利)并肯定 Rudolphus(鲁道夫)为德国国王。他再一次重复“平信徒授权”的禁令,违背的人将被绝罚。这个新的禁令现在也包括了小型的“封地”

(niedere Benefizien),而不仅仅是主教区。相反,Henricus(亨利)于1080年6月在意大利北部的Brixen/Bressanone(布里克森)会议上让一些拥戴他的主教再次弹劾教宗,并选立Ravenna(拉文纳)的总主教Wibert(维贝尔特)为“对立教宗”,名为Clemens III(克雷孟/革利免三世)——这个总主教既有学问,又有能力,但他于1075年已被撤职。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立即绝罚他。Henricus(亨利)的对手Rudolphus(鲁道夫)在1080年10月在Hohenmoelsen an der Elster(霍很某尔森)的交战中阵亡,而德国的贵族们选的Hermannus de Salm - Luxemburga(赫尔曼,1081-1088年)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继承人。Henricus(亨利)非常坚决地攻击他的对手,并于1081年春天将战争挪到意大利。他三次围攻罗马,但于1083年夏天才占据了Leostadt(利奥城)地区,又用希腊人的钱财进行贿赂,才能于1084年春天占据其他的罗马城区,但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仍然能在Castel Sant' Angelo(圣安杰罗城堡)坚持抵抗。当时有13个枢机放弃了合法的教宗并转向Clemens(克雷孟/革利免),使他在Lateranus(拉特兰)登上教宗的宝座。在1084年的复活节,这个对立教宗给Henricus(亨利)举行了一个加冕礼。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差一点就落入他敌人的手中,但那时教宗的封臣诺曼公爵Robertus Guiscard(罗伯特)率领一个很大的军队到达罗马,占领了罗马并强迫德国人离开。然而,他的军队没有纪律,他们劫掠了罗马,这样引起居民的不满,包括对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的不满,所以教宗被迫离开罗马。诺曼人将他护送到意大利南部的Salerno(萨莱诺),他在那里因各种工作和压力而疲惫不堪,于1085年5月25日去世。

写教宗传记的人是Paulus de Bernried(保禄/保罗),而他说, 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最后的话是: *Dilexi iustitiam et odivi iniquitatem* [conf. Ps 44:8], *propterea morior in exilio* (“我拥护正义,我厌恶不义,所以我在流放之地去世”)。他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他深信他的奋斗是为了一个正当的和神圣的价值。虽然从外表看来,他失败了,但他一生全力以赴地提倡的理想——教会的纯洁和自由权利——实际上正一步一步走向胜利。这些理想和理念统治着未来的时期;他播下了种子,而他的继承人得到了丰富的收获。通过他一任期的努力,宗座获得了很大的道德权威,又大量改善了法律和政治上的地位。毫无疑问,他是最伟大的中世纪的教宗之一,是一个愿意为理想奋斗的人,他提出了宗座的新概念,但他也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他曾经被称为“教会最坚定的保卫者”(acerrimus Ecclesiae

defensor), 而 Paulus V(保禄/保罗五世)宣布他为圣人/圣徒(1606年)。他也是第一个提出十字军思想的人:他曾经想率领一个很大的军队到东方,要解放主的墓并恢复与东方教会的合一(1074年)。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使中世纪的宗座转向世界政治(参见111)。他强调,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撒丁岛、科西加岛、阿拉贡(西班牙东北部)、波兰和匈牙利都是“属圣伯多禄/彼得的地区”,又认为他在某种意义上是英国、丹麦、俄罗斯和 Dalmatia(达尔马提亚)的封地主。

105

授权之争的发展和结束。1122年的 Worms(沃尔姆斯)协议

历代教宗:Victor III(维克托三世,1086 - 1087年);Clemens III(克雷孟/革利免三世,1080 - 1100年,对立教宗);Urbanus II(乌尔巴努斯二世,1088 - 1099年);Paschalis II(帕斯卡里斯二世,1099 - 1118年);Theodoricus(特欧多瑞克,1100 - 1102年,对立教宗),Albertus(阿尔伯特,1102年,对立教宗);Silvester IV(西尔维斯特四世,1105 - 1111年,对立教宗);Gelasius II(葛拉西乌斯二世,1118 - 1119年);Gregorius VIII(额我略/贵格利八世,1118 - 1121年,对立教宗);Calixtus II(卡里斯图斯二世,1119 - 1124年)。

105.1 在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去世后,“授权之争”和两个教宗的分裂状态并没有结束。虽然拥护 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的党派获得强化,但教廷的情况仍然很困难。罗马的大部分城民在1090年之前都支持对立教宗 Clemens III(克雷孟/革利免三世,1080 - 1100年),不仅仅德国地区的人拥护他,而且也有英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有一段时间也支持这个对立教宗。枢机们在11个月以后才能够选任 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的朋友 Monte Cassino(卡西诺山)隐修院的院长 Desiderius(德西德利乌斯)为教宗。他来自伦巴第贵族家庭,是一位温和的,愿意和好的人,取名为 Victor III(维克托三世,1086 - 1087年),但他不久后就去世了。又过了半年的时间,Ostia(欧斯提阿)的枢机主教 Odo(欧多/奥多)当选为教宗,取名为 Urbanus II(乌尔巴努斯二世,1088 - 1099年)。他本来是法国人,曾经当过 Cluny(克吕尼)修院的院长。在教会政策方面,他完全坚持 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的路线并坚决地反对平信徒授权,但他的方法和态度比较有弹

性。他亲自参与了意大利南部 Melfi(梅尔费)的主教会议(1089年)和法国 Clermont(克雷尔蒙)的主教会议(1095年)并在这些会议上重复了那些反对圣职买卖、圣职人员婚姻和平信徒授权的规定。Clermont(克雷尔蒙)的会议甚至禁止圣职人员向平信徒宣发一个“封臣的誓言”。这意味着 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派和皇帝派之间的冲突走向极点,同时也暗示出,罗马教廷已经有相当大的安全感。通过明智的外交政策,Urbanus(乌尔巴努斯)教宗强化了宗座在法国、西班牙和英国的影响力。他自己在 Clermont(克雷尔蒙)的主教会议上于1095年推动(实际上可以说“创造”)了第一个十字军运动(参见109.1),这也意味着宗座在西欧的社会上占有领导地位。第一个十字军运动基本上是法国人完成的,德国皇帝没有参与。

在 Urbanus II(乌尔巴努斯二世)的继任人 Paschalis II(帕斯卡里斯二世,1099-1118年)的任期内,Clemens III(克雷孟/革利免三世)去世了(1100年)——他的影响力几年以来已经完全崩溃了。虽然 Henricus IV(亨利四世)再没有参与“对立教宗”的运动,但那些拥护 Clemens(克雷孟/革利免)的人仍然选立了另一些“对立教宗”:Theodoricus(特欧多瑞克,1100-1102年)、Albertus(阿尔伯特,1102年)和 Silvester IV(西尔维斯特四世,1105-1111年);不过这些人似乎没有什么影响。

105.2 虽然如此,在德国支持 Henricus IV(亨利四世)的人与支持 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的人继续搏斗。人们的迷惑和困难非常大。双方写了很多论战性的著作,其中讨论那些迫切的问题并想影响公共舆论。虽然皇帝的情况比以前好一些——大多德国主教支持他——他也无法彻底克服他的对手。在德国南部,Hirsau(希尔骚)隐修院——其院长是 Wilhelmus(威廉,参见115.2)——是 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派的主要基地和教会改革的核心;一些来自 Hirsau(希尔骚)的修士们也在外面以巡逻讲道者的身份传播了罗马教廷的思想。Henricus(亨利)于1090-1097年第二次率军到意大利,在开始的时候在很多地方获得胜利,但 Tuscia(图斯基亚)的 Mathilda(玛蒂尔达)与那些反对皇帝的伦巴第人建立了一个联盟,而在7年的战争后,她仍然没有屈服于皇帝。她早在1080年已经写下了遗嘱,将自己的广大地产都赠给圣座,又于1089年通过 Urbanus II(乌尔巴努斯二世)的介绍与那位比她小25岁的巴伐利亚人 Welf V(威尔夫五世)公爵——他是皇帝的敌人巴伐利亚公爵 Welf IV(威尔夫四世)的儿子——结了婚。然而,这种政治婚姻于1095年被解散了。皇帝受到很大的打击,因为他自己的儿子 Conradus(康拉德,1101年去世)也于1093年反对他并转向 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的党派。然而,在

1100年后(在他的对立教宗去世了后),Henricus(亨利)至少在德国被普遍承认为国王。

105.3 从教会的角度来看,在 Sicilia(西西里岛)发生的事件也具有重大意义。Roger I(罗杰/若格爾一世,1061-1101年)是他的弟兄 Robertus Guiscard(罗伯特/若贝特)的封臣,他在30年的搏斗中从穆斯林军的手中夺回了西西里岛(1072年攻克了 Palermo 巴勒莫)。在那个海岛上,从8世纪以来有君士坦丁堡的教会主权(参见 92.1),但它现在消失,而罗马的司法权被恢复了。教宗 Urbanus II(乌尔巴努斯二世)看到诺曼伯爵在击退伊斯兰教及组织教会方面都有功劳,所以在1098年宣布他和他的合法继承人有教宗使者的地位,就是说他们可以代表那些将要派往西西里岛的教宗使者。然而,后来的西西里统治者们自从16世纪以来扩大了自己的权利(所谓的 Monarchia Sicula 西西里王国),这样一直到19世纪引起很多争论。

105.4 教宗 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和他的接班人在授权的问题上对德国采取强硬的态度,但对法国和英国比较谨慎,因为在那些地区中,授权的影响没有那么大。法国地区也受了 Cluny(克吕尼)改革运动的影响,所以拥护教会的人在法国最多。当然,法国的 Philippus I(菲利普一世,1060-1108年)有严重的缺点,而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曾经称他为 lupus rapax, tyrannus iniquus, Dei et religionis sanctae Ecclesiae inimicus(“贪婪的狼,不公道的暴君,上主的敌人和神圣教会的敌人” Reg. II, 32),因为他进行圣职买卖,又镇压教会;教宗威胁他说将要弹劾国王,又要以禁罚处罚整个法国教会,但这些都没有实现。在长期的谈判后, Philippus(菲利普)和法国的其他贵族人士在那位来自法国的教宗 Urbanus II(乌尔巴努斯二世)的影响下于1098年决定放弃传统的“戒指和权杖授权仪式”,但他们要求保留“赞同教宗选任”的权利。他们也说,如果新主教宣发忠于国王的誓言,他们将会交给他“世俗的权柄”(temporalia,比如造币权、收税权等,参见 97.1)。这种交换相当合理,而教会法律专家 Ivo de Chartres(伊夫)也赞成这种规定。别的地区也作出类似的规定。由于法国的国王 Philippus I(菲利普)与被他绑架的 Bertrada(贝尔特拉达)女士——她是 Fulco de Anjou(富尔科)伯爵的妻子——有一种非正式婚姻的关系,所以教宗 Urbanus II(乌尔巴努斯二世)于1095年在 Clermont(克雷蒙)的会议上绝罚了他,但他后来承诺要服从教会,所以在 Paschalis II(帕斯卡利斯二世教宗)的时代又被接受入教(1104年)。

在英国的情况就没有那么顺利了。诺曼底地区的王 Wilhelmus(威廉)在 1066 年在 Hastings(黑斯廷斯)的交战中战胜了最后一个盎格鲁-撒克逊王 Harald II(哈拉尔二世)。在 Alexander II(亚历山大二世)的赞同下, Wilhelmus(威廉)建立了诺曼人在英国的统治。虽然他继承了传统的授权习俗以及给教宗首长们“封地”,又很随意地干涉英国教会的内部事务,但他和教廷的关系基本上很好,因为他支持教会的改革,反对圣职买卖和圣职人员的婚姻,又排除了一些没有资格的圣职人员;在这些整顿运动方面, Canterbury(坎特伯雷)的总主教 Lanfrancus(兰弗朗克, 1070-1089 年, 参见 89.6)以及教宗派遣的使者们给他援助。然而, 他的儿子 Wilhelmus II Rufus(“红”的威廉, 1087-1100 年)是一个很粗暴的人, 他进行圣职买卖, 又侵占教会财产, 所以与教宗发生冲突。他患上了严重的疾病, 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忏悔了自己的行动, 但不久后又严厉地迫害了 Canterbury(坎特伯雷)的总主教 Anselmus(安瑟伦, 1093-1109 年, 参见 121.3)。这位总主教没有别的选择, 他必须离开英国并去 Urbanus II(乌尔巴努斯二世)那里避难(1097 年)。Wilhelmus(威廉)的弟弟和接班人 Henricus I Beauclerc(亨利一世, 1100-1035 年)对于教会比较有好感和正义感, 所以他马上召回那个遭流放的总主教。Anselmus(安瑟伦)总主教想回国, 但他拒绝向国王宣发封臣的誓, 这样也不能从国王的手得到他的总教区, 必须第二次离开英国(1103 年)。然而, 英国的“授权之争”很快被解决。教宗威胁 Henricus I(亨利一世)说将要绝罚他, 所以英国国王就于 1105 年和总主教签订了一个条约, 其中放弃为圣职人员“以戒指和权杖授权”。这样, Anselmus(安瑟伦)向国王宣发了封臣的誓言。虽然 Paschalis II(帕斯卡利斯二世教宗)不乐意接受这种作法, 但他还是容忍了。从此以后, 英国保持平安的局面。在 1164 年 Clarendon(克拉任墩)的国度议会上(参见 107.5)他们规定, 选举教会长上的地点应该是国王的宫廷小堂, 而国王也有批准选举结果的权利, 而且当选的圣职人员在被祝圣之前还必须宣发封臣和忠于国王的誓言。因此, 英国国王仍然能够继续影响圣职人员的提名和选任。因为英国离罗马很远而英国的国情很特殊, 这些“国教”因素越来越明显和突出(参见 107.5; 140.3)。

105.5 与德国帝国谈论授权的问题并能达成长期有效的协议是一件很艰难的事。双方的愤恨很大, 而双方的学者更多采用教会政策方面的精神性武器(小文章)来进行论战。最悲哀的德国国王是 Henricus IV(亨利四世), 因为他的第二个儿子 Henricus V(亨利五世, 1106-1125 年)和继承人在 1105 年出卖了他, 并强迫

他下台——在这个政变中 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派的人也与小亨利合作;不久后, Henricus IV(亨利四世)——他仍然处于被绝罚的状态中——在 1106 年夏天在 Liege/Luettich(列日)去世。新的统治者本来对教会显出一种卑躬屈膝的态度,但一旦牢固地掌握政权后,他就不顾一切地施行德国国王的传统权利。因为 Paschalis II(帕斯卡里斯二世教宗)以同样的决心在几个主教会议上禁止平信徒授权,双方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国王于 1110 年第一次去罗马,目的是在意大利恢复德国的统治并从教宗的手中获得皇帝的冠冕。在罗马圣伯多禄/彼得大堂附近的 S. Maria in Turri(圣玛利亚在塔中教堂,1111 年 2 月 4 日)以及在 Sutri(苏特瑞,1111 年 2 月 9 日)的条约中,主要的问题好像被解决了,因为双方都获得了自己应得的权利:Henricus(亨利)放弃了授权的权利并允许主教可以按照教规选任,但条件是这个:教宗必须命令德国的教会长上交出一切从德国国王得到的财产和权利,而如果一个德国主教不服从教宗的这种命令,他将被绝罚。将来的德国教会仅仅能接受什一税或一些私人的赠予。这种建议是很彻底的,很符合教宗的理想,但显然是无法施行的,因为这样的作法会动摇整个德国的宪法结构和经济结构。皇帝和教宗在加冕礼时(2 月 12 日)才公布了这些(原来保密的)条件要求,马上就引起在场的德国主教和贵族们的激烈反对。因此, Henricus(亨利)采取暴力方式来实现他的事业。教宗拒绝给他加冕,但皇帝逮捕了教宗和 13 位枢机主教,将他们关入圣 Petrus(伯多禄/彼得)教堂,并在 2 个月后强迫教宗签订一个新的条约(1111 年 4 月 11 日),其中允许德国用戒指和权杖进行授权礼,但允许教会自由地选任主教们。教宗 Pascalis II(帕斯卡里斯二世)也发誓说,他将不会因所发生的事谴责皇帝,尤其不会绝罚他。此后,教宗在 1111 年 4 月 13 日为皇帝举行了加冕礼。

教宗的让步是通过暴力方式取得的,而教宗仅仅出于“解放教会”的考虑(*pro Ecclesiae liberatione*)才同意皇帝的要求,所以这种协约没有长期的效果。在 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派的圈子里,这些事引起了愤怒;这些人甚至威胁说应该选任一个新的教宗。他们称这个协约(拉丁语称 *privilegium*)为“坏的协约”(拉丁语 *pravilegium*, 来自 *pravus* 腐败),而教宗在 1112 年的 Lateranus(拉特兰)会议上间接地收回它,因为他隆重地肯定了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和 Urbanus II(乌尔巴努斯二世)的种种原则和要求。在 1116 年的 Lateran(拉特兰)会议上,教宗明确收回了这个协约。在此之前, Vienne(维恩)的总主教 Guido(古多)于 1112 年就谴责了平信徒的授权为“异端”并宣布 Henricus V(亨利五世)为绝罚,

而教宗没有别的选择,他必须后来确认这些规定,但在另一方面,他没有与皇帝断交。甚至在一些在德国举行的主教会议上——Colonia(科隆)和 Goslar(格斯拉尔) 1115 年的会议——教宗的使者都绝罚了皇帝。世俗的王侯们和教会的长上在德国也开始反对他。在 1116 年, Henricus V(亨利五世)第二次到意大利去,想重新进行谈判,但 Paschalis(帕斯卡利斯)教宗回避他并逃到意大利南部。在他的接班人 Gelasius II(葛拉西乌斯二世, 1118 - 1119 年)的任期内,教宗和皇帝之间的张力变得正式的破裂。Gelasius(葛拉西乌斯)本来在 Monte Cassino(卡西诺山)隐修院中当过修者,后来任罗马总执事,他并没有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但仍然无法达成协议。教宗回避了率领军队的皇帝,逃到自己的家乡 Gaeta(格塔城)。因为双方进行的谈判没有效果,所以皇帝推出葡萄牙 Braga(巴格)的总主教 Mauritius(毛瑞提乌斯, 绰号 Burdinus 布迪努斯)为对立教宗,名为 Gregorius VIII(额我略/贵格利八世, 1118 - 1121 年),这样恢复了教会的分裂——但这种分裂遭到各方面的普遍反对。Gelasius(葛拉西乌斯)教宗绝罚了皇帝和对立教宗两个人并去了法国,不久后在 Cluny(克吕尼)去世。

105.6 教宗的代表在 Cluny(克吕尼)选任 Vienne(维恩)的总主教 Guido(古多)为教宗,取名 Calixtus II(卡里斯图斯二世, 1119 - 1124 年)。这位教宗愿意严格地保卫教会的传统权利,他来自 Burgundia(勃艮第)的王家贵族,与法国、英国和德国的王族都有亲戚关系。在他的任期内,教会更有可能达成一个比较好的协议。在那个时期,各方面的人士都渴望解决这个困惑人们的争论。人们都意识到,教宗和皇帝都必须让步并在中间达成某种协议。法国和英国的国王已经走出了一个可行的路线,为德国提供某种参照。另外,许多作者和教会法律专家——尤其是法国学者,比如那位杰出的 Ivo(伊夫),他是 Chartres(沙特)的主教,参见 105.4; 110.3——都写了很多讨论这些问题的文章。因此,人们开始区分“职位”和“与职位有关的教产”,又区分“授权”的宗教意义和世俗意义,就是说他们区分“通过戒指和权杖委托某一个教堂(教区)”以及“交给圣职人员某些世俗权利”(即所谓的 *regalia, investitura feudalis*, 比如造币权,收税权等)。人们不再否定国王具有后者的权利。另外,那些比较小的教产的给予(*niedere Benefizien*)不再被包括在“授权禁令”之内——这是 1119 年在 Remi(兰斯)举行的主教会议规定的,而“比较小的教产”的问题的决定被保留,让后人决定这些问题(参见 96.3)。

两个教宗的分裂不久后结束了。当 Calixtus(卡里斯图斯教宗)于 1120 年进入

罗马时,对立教宗 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被迫辞职,他受审判并被关入一个隐修院(1121年)。现在,Calixtus(卡里斯图斯)教宗派遣了三个枢机去德国当他的使者。他们代表教宗并在长期且艰难的谈判后,在1122年9月23日签订了所谓的 Wormser Konkordat (Concordate of Worms《沃尔姆斯协议》,亦称 Pactum Calixtinum),这个协议很符合德国地区的主教和隐修院院长的双重地位。人们以一份皇帝文献和一份教宗的文献隆重地表达了这次谈判的结果。此后,Henricus(亨利)皇帝的绝罚被收回,他放弃了用“戒指和权杖”举行主教们的授权礼并允许德国教会按照教规选任新的主教。从此以后,德国的 metropolita(宗主教)要为新主教举行“授权礼”。另一方面,教宗允许皇帝和皇帝的继承人参与新主教的选举过程,但决不可以用圣职买卖或暴力的方式;这就意味着,在选择主教时,皇帝可以在场,并且在不确定举行结果的情况中,皇帝有权利支持“比较好的候选人”(pars sanior),但他应该听德国宗主教和其他主教们的看法。国王将要通过世俗权力的象征(sceptrum 国王权杖)交给新主教那些世俗的权利(regalia 种种“王权”,如造币权等);在德国地区,这种“授予世俗权利”的礼仪将要在主教圣祝礼之前举行(这就意味着,皇帝仍然有权力排除一个他不喜欢的人),但在意大利和勃艮第地区,这种“授予世俗权利”的礼仪应该在祝圣后六个月以内举行,因为在那些地区中皇帝的利益不太重要。教会长上向国王宣发的“封臣誓言”还被保留,这就表达了主教们对国度的义务。

这样,几乎维持50年的“授权之争”似乎可以结束了,但其前提是双方需要明智地让步并且更合理地界定自己的权利范围。皇帝保留了部分的传统权利,但从整体来看,罗马教廷获得了胜利,因为旧形式的“平信徒授权”被取缔了,教会恢复了对于主教和院长的选举权,又能够掌握权力象征(戒指,权杖)并摆脱了世俗权力对教宗的操纵。在传统上,皇帝还有“确认新教宗的选举”的权利,但这种习惯现在当然根本没有人提到。根据这种发展趋势,罗马宗座的影响力将要获得更大的崛起。为了隆重地宣布这个 Wormser Konkordat(《沃尔姆斯协议》),教宗 Calixtus II(卡里斯图斯二世)于1123年在 Lateranus(拉特兰)举行了一个重要的主教会议——这是第9个普世性的主教会议,也是第1个在西部教会举行的“大公会议”(concilium oecumenicum);与古代的大公会议不同,这个会议的召开和指导只是罗马教宗的任务(参见110.2c)。另外,在这个会议上,主教们还宣布了很多纪律方面的教规来消除教会中的弊端,这些大部分都是对以前作过的规定的重新肯定。

圣 Bernardus(伯尔纳德)的时期。两个教宗的分裂和罗马共和国

历代教宗: Calixtus II(卡里斯图斯二世, 1119 - 1124 年); Honorius II(霍诺里乌斯二世, 1124 - 1130 年); Coelestinus II(切来斯提努斯二世, 1124 年); Innocens II(依诺森二世, 1130 - 1143 年); Anacletus II(阿纳克雷图斯二世, 对立教宗 1130 - 1138 年), Victor IV(维克托四世, 对立教宗 1138 年); Coelestinus II(切来斯提努斯二世, 1143 - 1144 年); Lucius II(卢修斯/路齐乌斯二世, 1144 - 1145 年); Eugenius III(尤金尼乌斯三世, 1145 - 1153 年); Anastasius IV(阿纳斯塔修斯四世 1153 - 1154 年)。

106.1 在授权之争的过程中,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的思想在德国地区也获得了比较多的支持。Henricus V(亨利五世)是最后一个来自 Salier(撒里尔)王朝的统治者, 而在他去世后(1125 年), 在教宗派的支持下, 德国王侯选择了 Sachsen(萨克森)的公爵 Lotharius de Supplinburg(洛塔尔)为德国国王: Lotharius III(洛塔尔三世, 1125 - 1137 年)。那些支持教宗的人立即要求更多权利: 他们说国王应该放弃他“临在于选举主教”的权利, 应该在教会的祝圣后才授予世俗的权利, 又以“忠信”的誓言代替“封臣”的誓言(Treueid statt Lehenseid)。虽然 Lotharius III(洛塔尔三世)在别的问题上回应了教会的要求, 但在这方面他没有改变; 因此, Wormser Konkordat(《沃尔姆斯协议》)的法律基础在后来的时期中基本上没有经历改变。这个新的国王毫不犹豫地派遣人到罗马, 请教宗确认他的王权, 正如以前(1077 年)的 Rudolphus de Rheinfelden(鲁道夫, 参见 104.5)也寻求了教宗的支持一样。Lotharius III(洛塔尔三世)的统治本来是强有力的, 但在他的任期内德国内部的冲突很强烈: Staufer(施陶费尔)王朝的对立导致了多年的内战; 国王的对手是 Suebia(施瓦比亚)的 Fredericus II(腓特烈二世)和他的弟兄 Conradus(康拉德, 1127 - 1135 年)——他被宣布为对立王。

106.2 当时, 罗马人选任 Ostia(欧思提亚)的枢机主教 Lambertus(兰伯特)为教宗, 改名为 Honorius II(霍诺里乌斯二世, 1124 - 1130 年)——他曾经在 Wormser Konkordat(《沃尔姆斯协议》)的谈判当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罗马的贵族家庭

Frangipani(夫让艺帕尼)支持他,所以那位早一些当选的枢机 Theobaldus(特欧巴尔德,或 Tedald,取名 Coelestinus II 切来斯提努斯二世)被迫下台。Honorius II(霍诺里乌斯二世)和 Lotharius III(洛塔尔三世)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教宗上台的时候,教会已经有被分裂的危险,而当他去世后,这种分裂成了现实。当时的枢机主教们担心,他们怕罗马的 Pierleoni(皮尔雷欧尼)家族将会推出自己家庭的候选人为教宗,所以他们预先争取 Frangipani(夫让艺帕尼)家族的支持并提早举行选举:16 位枢机——其中有大部分的枢机主教——很仓促地提名 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枢机为教宗,他取名 **Innocens II**(依诺森二世,1130 - 1143 年)。然而,其他的 14 位枢机(后来还有 10 个枢机加入他们的行列)几个小时后选择了 Pierleoni (= Petrus Leonis 皮尔雷欧尼)枢机为教宗,他取名 Anacletus II(阿纳克雷图斯二世,1130 - 1138 年)。后者是一个渊博的、有处世经验的人,他的祖先本来是犹太人,他们在罗马创办了一些银行,很有钱。Innocens(依诺森)是先当选的,而他的人格似乎更有尊严,但选择了 Anacletus(阿纳克雷图斯)的枢机人数更多,而他的选举过程更有秩序,没有那么仓促。因为皮尔雷欧尼家族进行贿赂,大部分的罗马人后来承认了 Anacletus(阿纳克雷图斯),而 Innocens(依诺森)被迫逃往法国。在那里他获得了法国隐修运动的强大支持。尤其重要是 Clairvaux(明谷)隐修院的院长圣 Bernardus(伯尔纳德,1115 - 1153 年)的支持——他是 12 世纪上半叶最有威望的宗教人物,在修会生活(参见 116.3)、克修学和神秘神学(参见 122.2)以及在教会政策各个领域中都有重要的影响。由于他的讲话,法国的主教在 Etampes(厄坦佩)的主教会议上(1130 年 9 月)接受了 Innocens II(依诺森二世)为教会的正当元首。不久后,德国人在 Wuerzburg(维尔茨堡)的主教会议上(1130 年 10 月)也作了同样的决定——在德国 Magdeburga(马格德布尔格)的总主教和 Premonstratenses(普雷蒙特会,参见 117.2)的创始人圣 Norbertus(诺尔伯特,1126 - 1134 年任主教),他也是 Lotharius(洛塔尔)王的顾问并支持 Innocens(依诺森)当教宗。英国的主教团于 1131 年表态,他们也同样支持 Innocens(依诺森)。Anacletus(阿纳克雷图斯)的支持者主要是诺曼人 Roger II(罗杰二世,1101 - 1154 年),他是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统治者,又是一个有灵感的政治家和组织者,通过巧妙的立法和管理技术,他在他的领域上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度(虽然居民来自各种各样的民族:希腊人、意大利人、穆斯林、诺曼人)。在 1130 年,作为 Sicilia(西西里岛)的封地主,教宗宣布他的“封臣”Roger(罗杰)为“王”并确认诺曼统治者当教宗使者的权

利(参见 105.3)。在他的第一个意大利远征时(1132 - 1133 年),Lotharius(洛塔尔)带领 Innocens(依诺森)到罗马城,而且使教宗为他举行加冕礼(1133 年 6 月 4 日),但这个礼仪必须在 Lateranus(拉特兰)教堂举行,因为 Anacletus(阿纳克雷图斯)仍然占据了 Civitas Leonis(利奥城)和 Petrus(伯多禄/彼得)大堂。在这个时刻,教宗也重新肯定了——虽然不是很乐意地——Wormser Konkordat(《沃尔姆斯协议》),也就是说他再次肯定国王有权利在祝圣之前交给新主教那些世俗权利。当时,人们还处理了另一个棘手的问题:Tuscia(图斯基亚)的女伯爵 Mathilda(玛蒂尔达,参见 104.4; 105.2)曾经将她的广大地产通过遗嘱赠给宗座(在 1080 年,后来又在 1112 年),但在她去世后(1115 年),Henricus V(亨利五世)曾经收回了这些地区,似乎是属于德国帝国的领土(封地)。现在,Lotharius(洛塔尔)皇帝承认了教宗对于这些地区的主权,但他又从教宗的手中接受了它们,只是每年要向教宗纳税。他将这些地区交给了他的女婿——巴伐利亚公爵的 Henricus Superbus(骄傲者亨利),而这个人又完全接受了教廷为“封地主”。由于这些事件,教廷的人视德国皇帝为宗座的“臣民”;比如在 Lateranus(拉特兰)宫殿中有一个壁画,上面描绘跪在教宗前面的皇帝,他向教宗伸出两个手,下面的铭文是:Rex ... homo fit papae, sumit quo dante coronam[“国王成了教宗的臣民(homo = vasallus),从教宗的手接受皇冠”]。后来,德国的 Fredericus I Barbarossa(红胡子腓特烈)皇帝于 1155 年要求罗马拿掉这幅画。

106.3 当他第二次去罗马时(1136 - 1137 年),Lotharius(洛塔尔)王率领军队走过诺曼人的地区,一直到 Bari(巴里)和 Salerno(萨莱诺),这样想夺回意大利南部地区,使之重新归于 Innocens(依诺森)教宗的管辖。皇帝于 1137 年 12 月在 Nordtirol(北提若尔,今天属奥地利)的 Breitenwang(布瑞登旺)去世,而意大利南部的 Roger(罗杰)再次占据了意大利南部地区。支持他的 Anacletus(阿纳克雷图斯)一直到他去世(1138 年)能够在罗马的 Civitas Leonis(利奥城)保持他的统治。他的家族 Pierleoni(皮尔雷欧尼)也推出了一个接班人,即 Victor IV(维克托尔四世),但这个人两个月以后就服从了 Innocens(依诺森)。意大利南部的诺曼公爵并没有放弃他的对抗,第二届 Lateranus(拉特兰)大会议(第 10 届大公会议)于 1139 年颁布了很多改革文献,又绝罚了诺曼那个公爵,但没有成效。几个月后,教宗 Innocens II(依诺森二世)率军对付他,但结果非常不利。如同以前的 Leo IX(良/利奥九世)教宗一样(参见 103.2),Innocens(依诺森)落入诺曼人的手;为了获得自

由,教宗不得不收回对 Roger(罗杰)的绝罚,必须再次承认他为王,又封给他 Apulia(阿普利亚)和 Sicilia(西西里岛)为采邑(1139年7月)。

106.4 两个教宗的分裂问题刚刚解决了,但在教会国内又出现了新的困难——一些意大利人向教宗的权威进行挑战,这种态度和欧洲其他地区形成了明显的差异。来自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地区有一些关于“共和国”和“自由”的思想传到罗马的中产阶级;这些理想和另一些思想结合到一起:罗马人怀疑古罗马帝国的伟大,同时又反对德国皇帝。当时有一个小城(Tivoli 提沃利)反抗罗马人,而罗马人征服了它,但教宗禁止罗马人毁灭 Tivoli(提沃利)城,这个事件引起教宗与罗马人的严重冲突。后来的两个教宗——Coelestinus II(切来斯提努斯二世,1143 - 1144年)和 Lucius II(卢修斯/路齐乌斯二世,1144 - 1145年)——他们的任期都很短(分别为5个月和11个月)——都无法恢复罗马的平静。相反,罗马人宣布再不愿意听从教宗,他们进行选举(1144年10月)并选任一个“元老院”和一个“主保”(Patricius)当这个新“共和国”的元首——他就是 Jordanus Pierleoni(约坦努斯·皮尔雷欧尼),即 Anacletus II(阿纳克雷图斯)的弟兄。Lucius II(卢修斯二世)教宗向德国发出呼吁,请皇帝来协助他,但那位新的德国国王 Conradus III(康拉德三世,1138 - 1152年)在德国地区面临太多对手,所以他从来没有想跨越 Alpes(阿尔卑斯山脉)到意大利去。Conradus III(康拉德三世)来自 Hohenstaufen(施陶费尔)的王朝,他曾经在 Lotharius(洛塔尔)当过“对立王”,并在 Lotharius(洛塔尔)去世后(在支持教宗党派的影响下)当选德国国王(他因此被称为“Pfaffenkoenig”——“司铎们之王”);他一生面对了巴伐利亚(Welfen 威尔夫派)和其他事情的重大压力。他无法解决德国内部的分离趋势,在外交方面也缺少固定的目标和持久性。因此,他也没有得到皇帝的冠冕。

106.5 皇帝那种强大权威的缺失在意大利有很不利的影响。那时在意大利出现了一位煽动群众的司铎——他属于 Augustinerchorherren(奥古斯丁圣职团)——就是 Brescia(布雷西亚)的 Arnoldus(阿诺德),而他的宣传活动更使意大利的情况加剧。他大概曾经在 Paris(巴黎)是那位具有怀疑精神的 Abaelardus(阿伯拉尔,参见 121.5)的学生。在自己的家乡意大利 Arnoldus(阿诺德)有很高的威望,因为他是一个严格的苦修者和提倡改革的讲道家。然而,他是一个迷醉于幻想的狂热者,又倾向于极端思想,所以他不仅仅谴责了教会内的贪婪和世俗化,而且也越来越激烈地反对世俗的统治者以及任何有财产的圣职人员。他宣布,如果高层和下

层的圣职人员愿意得救,那么他们就必须恢复宗徒/使徒们的贫穷,为自己的生活费只能够接受什一税和信徒们的施舍。1139年的 Lateranus(拉特兰)主教会议审判了他的主张并流放他,所以他在法国和瑞士流浪过几年,也曾经与圣 Bernardus(伯尔纳德)发生冲突,但在 Innocens II(依诺森二世)去世后又回到意大利,并于1147年成为罗马的“民主运动”的领袖。他像一个 tribunus plebis(“护民官”)那样统治了罗马城并通过他的演讲使听众兴奋地向往古罗马的伟大和荣耀,说他要恢复过去的伟大罗马。拥护他的人说 Donatio Constantini(《君士坦丁的赠予》,参见85.3)是“谎言”和“异端”的传说。由于这些动荡不安的因素, Lucius II(卢修斯二世)的接班人 Eugenius III(尤金尼乌斯三世教宗,1145-1153年)曾经两次和“罗马共和国”进行谈判,但最终还是被迫离开罗马,他任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罗马外渡过的,如在 Viterbo(罗马附近的维特尔博)、在法国、Trier(德国的特里尔)。他是一个熙笃会会士,曾经当过圣 Bernardus(伯尔纳德)的学生,是一位很虔诚的、怀着理想态度的人,但他的性格很柔弱。他与 Bernardus(伯尔纳德)一起宣扬第二个十字军运动(1147-48年),参加的人有法国和德国的国王,但结果还是很不好(参见109.2)。在其他方面,这位教宗没有提出一些关键性的决定,但通过不懈的外交工作,他能够进一步确保宗座的政治地位。Clairvaux(明谷)那位伟大的院长 Bernardus(伯尔纳德)当他的顾问并协助他,又给他写了一部值得注意的著作,即 *De consideratione*(《论沉思》,5卷,1152或1153年写成),这是一种宗教性的“理想君王”的著作(eine Art geistlichen Fuerstenspiegels)。它包括关于教宗种种义务的论述,但也包括关于教廷的一些弊病的坦白谴责——比如“向教廷申诉权”的过分扩大、“隐修院直接属教廷管辖”的过分扩大、虚荣心和追求名利的心、某些教廷官员和长上的统治欲和贪心。

法国和德国都没有协助教宗镇压那些反对他的罗马人。最终, Conradus(康拉德)的侄子和继承人 Fredericus I Barbarossa(红胡子腓特烈)在 Constantia(康斯坦茨)条约(1153年)中承诺他将要强迫罗马人接受教宗的统治,又要保卫教宗的政权不遭受诺曼人的侵犯。为此,教宗将要给皇帝加冕,而教廷将要协助皇帝对付帝国的种种敌人;然而,当 Barbarossa(红胡子)实现了他的诺言时, Eugenius(尤金尼乌斯)和他的接班人——那位年迈的 Anastasius IV(阿纳斯塔修斯四世,1153-1154年)——都早已不在人世了。

Fredericus I Barbarossa(红胡子腓特烈一世)皇帝与 Hadrianus IV
(哈德良四世)、Alexander III(亚历山大三世)的搏斗;
Henricus VI(亨利六世)与 Coelestinus III(切来斯提努斯三世)

历代教宗: Anastasius IV(阿纳斯塔修斯四世, 1153 - 1154 年); Hadrianus IV(哈德良四世, 1154 - 1159 年); Alexander III(亚历山大三世, 1159 - 1181 年); Victor IV(维克托四世, 对立教宗 1159 - 1164 年); Paschalis III(帕斯卡里斯三世, 对立教宗 1164 - 1168 年); Calixtus III(卡里斯图斯三世, 对立教宗 1168 - 1178 年); Innocentius III(依诺森三世, 对立教宗 1178 - 1180 年); Lucius III(卢修斯/路齐乌斯三世, 1181 - 1185 年); Urbanus III(乌尔巴努斯三世, 1185 - 1187 年); Gregorius VIII(额我略/贵格利八世, 1187 年); Clemens III(克雷孟/革利免三世, 1187 - 1191 年); Coelestinus III(切来斯提努斯三世, 1191 - 1198 年)。

107.1 Suabia(施瓦比亚)的公爵 Fredericus I Barbarossa(红胡子腓特烈一世, 德国王 1152 - 1190 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统治者, 在他的领导下的德国在当时具有最大的影响力, 且皇帝的地位具有了真正的世界意义。这位 Fredericus(腓特烈)王虽具有真诚的宗教信仰, 但他又喜爱世俗的生活, 所以他对圣 Bernardus(伯尔纳德)和圣 Norbertus(诺伯特)所推动的隐修生活没有兴趣, 虽然在他的时代有非常多人支持隐修会的运动或自己入隐修院。他对于皇帝地位的理想很高, 所以一方面想确保皇位的尊严(honor imperii)和独立性, 而在另一方面他和他所推崇的 Carolus Magnus(查理曼)一样想让德国的主教们拥护他(这样他能够统治德国教会)并且尽可能限制宗座在世俗事务上的影响。然而, 当时的教宗们愿意保持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所争取的特权, 即宗座对于皇帝的优先权, 所以基督宗教世界两个元首之间的摩擦是无法避免的。

早在精力饱满的 Hadrianus IV(哈德良四世, 1154 - 1159 年)教宗的任期内, 双方的观念和利益之间就发生了碰撞。Hadrianus(哈德良)的原名是 Nicolaus Breakspear(尼古拉斯·布瑞克斯佩尔), 他是历史上唯一的来自英国的教宗。当德国的 Fredericus(腓特烈)第一次去罗马时(1154 - 1155 年), 他一开始就拒绝为教

宗提供“牵马”和“提马镫”的传统服务(*officium stratoris et strepae*, 参见 111.4), 因为他担心人们会解释这种服务为“国王愿意当教宗的臣民”。然而, 当那些年龄比较大的王侯们劝他时, 他才同意完成传统的仪式。在 1155 年 6 月 18 日, 教宗为德国皇帝在圣 Petrus(伯多禄/彼得)大堂中举行加冕礼。在此之前, 罗马人曾经向德国国王说, 他们需要给他们 5000 斤白银, 才能够获得皇帝的冠冕; Fredericus(腓特烈)严厉地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并且逮捕了那个“圣职人员革命家”Arnoldus de Brescia(布雷西亚的阿诺德, 参见 106.5), 将他交给教宗的城官, 而这个城官处死 Arnoldus(阿诺德)后, 又烧毁他的尸体, 并将骨灰洒到 Tiberis(台伯河)中。

106.2 教宗希望皇帝能长期留在意大利, 但在加冕礼后, Fredericus Barbarossa(红胡子腓特烈)很快就返回德国, 他没有帮助教宗抵抗诺曼人, 没有兑现他在 Constantia(康斯坦茨)所作出的承诺(参见 106.5)。Hadrianus(哈德良)教宗没有别的选择, 因为诺曼人给他施加压力。他于 1156 年在 Benevento(贝内文托)和 Roger II(罗杰二世)的儿子 Wilhelmus I(威廉一世, 1154 - 1166 年)——他是 Neapolis - Sicilia(那不勒斯 - 西西里岛)的国王——签订了一个条约, 其中承认 Wilhelmus(威廉)为宗座的封臣。这个行动意味着教宗的政策转回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的时代——他当时依靠了诺曼人来抵抗德国皇帝。因此, Fredericus(腓特烈)皇帝当然对教宗的政策很反感。另一个事件也加剧了双方的张力, 丹麦的 Eskil de Lund(艾斯克尔)——一位热心支持 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派的人, 也是圣 Bernardus(伯尔纳德)的朋友——在从罗马回家的旅途中(在勃艮第地区)落入强盗的手, 人们求皇帝解救这个人, 但皇帝当时的反应不太积极。因此, 教宗写了一封提出抱怨的信——两个教廷使者(枢机)将这封信在 Besancon(贝桑松)的帝国议会上(1157 年 10 月)交给皇帝, 其中包含一些关于“conferre(转移)皇冠”和教宗将赠给皇帝“更大的 beneficia(采邑)”的模棱两可的词, 更引起皇帝和贵族们的不满。在 1156 年后, 皇帝的首相是 Rainaldus de Dassel(莱纳尔德, 1167 年去世), 一位有才能的圣职人员和政治家, 他深深地影响了皇帝的政策, 也要为此负责任。这个 Rainaldus(莱纳尔德)直接认为教宗的信意味着他视皇帝为“臣民”, 所以这封信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令皇帝和德国贵族更不愉快的是教廷使团的领导——Roland Bandinelli(班迪内利)枢机的态度, 这位枢机原来在 Bolonia(博洛尼亚)是一个很有名望的教会法学教授, 现在他任教宗的秘书。由于这些误会, 德国皇帝命令罗马的使者们离开德国领土。这些使者本来的计划是视察德国

各地的教会,但这种计划落空了。Fredericus(腓特烈)皇帝向教廷写了一封抱怨的信,而德国的主教们似乎都支持他。

罗马教廷与 Hadrianus(哈德良)教宗尽量想平息皇帝的愤怒,他们解释了那些有争议的词(*beneficium non est feudum, sed bonum factum; conferre = imponere*)。然而,双方之间的张力并没有减少,反而由于皇帝的缘故还加剧:当他第二次到意大利时(1158 - 1162 年),他征服了意大利北部最伟大的城市 Milano(米兰),并在 Piacenza(皮亚琴察)附近的 Roncaglia(润卡里亚)举行了一个帝国议会(1158 年 11 月)。他依靠 Bologna(博洛尼亚)的法学家——当时的人刚刚恢复了古罗马和拜占庭的法学研究——在帝国议会上宣布了皇帝的种种主权,但他太强调皇帝的权力,以致于取消了伦巴第各城市居民的自治能力,也取消了罗马教廷在政治上的能动性。这也意味着,皇帝在概念又进一步走向世俗化(参见 86.2,4; 104.4),而早期中世纪对皇帝的理解是“神圣的 - 神权的”(sakral - theokratisch)。这种宣言的政治后果相当大:那些拥有世俗权利的意大利主教需要和德国主教一样宣发一个“臣民誓言”,皇帝视教会国如同帝国地区一样,而且皇帝开始再一次收一些早就被取缔的税。除此之外,皇帝让德国的主教们完全为帝国服务。他积极地干涉德国或意大利新主教的选任,似乎等于这些主教是他提名的。在 Colonia(科隆),他让主教们选任 Rainaldus(莱纳尔德)为总主教(1159 年)。教宗反对这些干涉并提出抗议,但无效果。双方的信件来往越来越激烈,最后 Hadrianus(哈德良)教宗已经准备绝罚这个皇帝,但他突然于 1159 年 9 月 1 日在 Anagni(阿纳尼)去世。

107.3 新教宗的选举深受皇帝与教宗对立局面的影响,因此出现了两个派别。少部分支持皇帝的枢机(4 到 7 名枢机)选择 Monticelli(蒙提切利)的 Octavianus(欧克塔维阿努斯)枢机,他是一位来自 Tusculani(图斯库拉尼)贵族的人,取名为 Victor IV(维克托四世,1159 - 1164 年)。大部的枢机(大约 14 到 20 个人)则选择了另一个人,就是上面提到的 Rolandus(罗兰德)枢机,他取名 Alexander III(亚历山大三世,1159 - 1181 年)。后者的合法性显然更大,所以他很快就绝罚了 Victor(维克托)。然而,两个人当选这一事实,为皇帝提供了他所渴望的“可以干涉”的机会或借口。他明确说他要效法古代拜占庭皇帝和法兰克皇帝的先例,所以在意大利北部的 Pavia(帕维亚)在 1160 年 2 月召开了一个“大公的”主教会议来解决这次分裂。正如可以意料的那样,这次会议在 Rainald(莱纳尔德)的主持下宣布 Victor(维克托)——他亲自参加了这个会议——为合法的教宗并绝罚了“Rolandus

(罗兰德)秘书”及他的拥护者。Alexander(亚历山大教宗)从一开始就拒绝这个会议,他绝罚了皇帝和“对立教宗”并宣布 Fredericus(腓特烈)的臣民不需要继续服从他。这样,两个教宗的冲突不仅分裂了教会团体,而且导致皇帝与教宗之间的搏斗整整持续了17年。

在 Pavia(帕维亚)的主教会议具有政治倾向。虽然 Fredericus(腓特烈)尽力推广这个会议的结果为“普遍有效的”,但 Victor(维克托)仅仅在皇帝的势力范围内被承认,而且在这个范围内还有一些例外。比如,Salisburgum(萨尔茨堡)的总主教 Eberhardus(艾贝哈德)以及另一些德国地区的主教坚决反对 Victor(维克托);另外,Cistercium(熙笃)的修会也反对他。法国的 Ludovicus VII(路易七世)王和英国的 Henricus II(亨利二世)都担心德国的权力会影响整个欧洲,所以他们早在 Toulouse(图卢兹)的主教会议上(1160年秋天)就宣布他们支持 Alexander(亚历山大),而另一些国度也有同样的表态。皇帝无情地镇压了教宗在伦巴第地区的盟友,所以教宗无法在意大利待下去,他逃到法国,在那里生活了3年半(1162-1165年)。Fredericus(腓特烈)皇帝试图改变法国国王的态度,所以他在 Saone(索恩河)附近,在 Dijon(第戎)和 Dole(多勒)之间与法国国王见面(1162年8-9月),但国王没有回应皇帝的要求,其中一个原因是 Rainaldus(莱纳尔德)首相的态度太骄傲,他称德国以外的国王为 reguli(“小王们”,标准的说法是“reges”)。在 Victor(维克托)去世后,Rainaldus(莱纳尔德)马上推出了一个新的对立教宗,即 Crema(克瑞马)的 Guido(古多)枢机,他取名 Paschalis III(帕斯卡里斯三世,1164-1168年)。在1165年圣神/圣灵降临节在 Wuerzburg(维尔茨堡)举行的帝国议会上,在皇帝的压力下所有的世俗贵族和教会长上都发誓要“永远”谴责“分裂者”Rolandus(罗兰德),并要忠于 Paschalis(帕斯卡里斯)。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决定,它也带来了灾难,虽然当时的英国王也派遣一些使者并承认了 Paschalis(帕斯卡里斯)。当时的英国国王 Henricus II(亨利二世)与 Canterbury(坎特伯雷)的总主教 Thomas Becket(托马斯·贝克特,参见下文107.5)发生冲突,所以他反对 Alexander III(亚历山大三世)并愿意联合德国皇帝。然而,当时的英国主教们异口同声地反对了“对立教宗”,所以国王的政策只能是摇摆不定的。虽然皇帝采取了很严厉的措施——反对 Wuerzburg(维尔茨堡)誓言的人面临驱逐、财产被没收——但他仍然无法完全克服那些反对他的人。他在1165年12月底组织的宗教活动也没有达到他所希望的效果:他让 Colonia(科隆)的总主教 Rainaldus(莱纳尔德)隆重地挖掘

Carolus Magnus(查理曼)在Aachen(亚琛)的骨灰,将骨灰放入一个新的墓,并通过对立教宗 Paschalis(帕斯卡里斯)宣布查理曼为圣人/圣徒。

107.4 在意大利,皇帝的情况越来越危险。在1164年,意大利北部一些城市形成了Verona(维罗纳)的联盟(包括Verona维罗纳城,Vicenza维琴察城和Padua帕多瓦城),而Venetia(威尼斯)也支持他们;这个联盟很明显地反对皇帝。Alexander(亚历山大)能够在1165年10月回到罗马去。因此,Barbarossa(红胡子)皇帝的第四次意大利远征(1166-1168年)是直接针对罗马教宗。两个总主教率领了皇帝的军队:Colonia(科隆)的Rainaldus(莱纳尔德)和Mainz(美因茨)的Christianus(克瑞斯提亚努斯)主教,他们在Tusculum(图斯库卢姆)很光彩地战胜了罗马人的军队(1167年5月),此后很快占领了罗马城;Alexander(亚历山大)逃跑到南部的Benevento(贝内文托)。Fredericus(腓特烈)皇帝使自己的教宗登上圣伯多禄/彼得的宝座并让他再次为自己和他的妻子Beatrice de Burgundia(勃艮第的贝雅特丽斯)举行加冕礼。然而,灾难紧随着成功的顶峰:突然在罗马暴发的传染病(疟疾)夺走了“红胡子”军队中2000多个骑士的生命,一部分死在罗马,另一部分死在他们仓促回去的路途上。在当时因疾病去世的人中有很多贵族人士,比如皇帝的表弟Rotenbarga(若登堡)的Fredericus(腓特烈),他是Suabia(施瓦比亚)的公爵;巴伐利亚的年轻公爵Welf VII(威尔夫七世)、Rainaldus(莱纳尔德)总主教以及其他10个德国主教。这让皇帝的敌人感到安慰,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上主的审判。现在,Verona(维罗纳)的联盟成为“伦巴第联盟”,且已经包括22个城市。虽然如此,皇帝仍没有放弃他的政策并在Paschalis(帕斯卡里斯)死亡后又委任了一个对立教宗,即Calixtus III(卡里斯图斯三世,1168-1178年)。人们已经开始准备皇帝和教宗之间的和平谈判,但现在这些谈判又落空了。皇帝又依赖他的武力解决问题。然而,帝国中最强大的王侯——巴伐利亚和萨克森的公爵Henricus Leo(号称狮子的亨利)——很自私地拒绝服从皇帝的号召,所以皇帝的军队不如以前强大。德国人围攻了伦巴第的新堡垒——以教宗取名的“Alessandria”堡垒——,但无法攻克它。在Legnano(雷纳诺)的交战中(1176年5月29日)米兰的军队打败了Barbarossa(红胡子)的军队,所以他终于被迫与教廷恢复和平。双方的使者在Anagni(阿纳尼)进行初步的谈判,而皇帝与教宗最终在Venetia(威尼斯,1177年7月)签订了和平条约。现在这个“christianissimus imperator”(“完全有基督徒精神的皇帝”)的绝罚被收回,他也放弃对对立教宗的支持,承认Alexander III(亚历山

大三世)这位正确的教宗,为了表示尊敬又亲吻了他的脚(参见 111.4),并承诺他将还要还给罗马教会他先前夺取的地区和种种权利。皇帝与伦巴第人签订了一个维持 6 年的休战条约,而在 1183 年又签订了 Constantia(康斯坦茨)的和平条约。虽然 Fredericus(腓特烈)显然要屈服于教宗,但他在德国教会中仍然保持了原来的影响力。他原来指定的主教们和那些曾经拥护了反对教宗的人没有遭受什么惩罚。这一点和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的时代形成很明显的差别。

教宗 Alexander III(亚历山大三世)的坚韧、毅力和节制使他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在强大的皇帝面前维持了教宗的独立性。在 1178 年 3 月,Mainz(美因茨)总主教 Christianus(克瑞斯提安努斯)的军队将教宗护送到罗马。现在 Calixtus III(卡里斯图斯三世)也不得不承认他。罗马贵族们还推出了一个新的对立教宗——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1178 - 1180)——但这个人似乎没有什么影响。为了庆祝和巩固和平,教宗在 1178 年举行了“第 3 届 Lateranus(拉特兰)主教会议”,即第 11 届大公会议。这个会议宣布了许多规定,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条(名为 Licet de vitanda),因为这一条回应了 1159 年发生的事件并规定选举教宗的秩序:新教宗需要三分之二的枢机们的投票,否则他的选举是无效的。毫无疑问,Alexander III(亚历山大三世)教宗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教宗之一,他也进一步完善了教廷管理制度(参见 110)。然而,在 1179 年的会议结束后不久,罗马仍然很不安全,所以他必须离开罗马,1181 年在 Civita Castellana(基维塔·卡斯特拉纳)去世。

107.5 在 Alexander III(亚历山大三世)的任期内,英国的“国教制度”(Staats- und Nationalkirchentum)与教会发生严重的冲突。那位自信且粗暴的属 Anjou - Plantagenet(安茹 - 普兰塔杰内)王朝的 Henricus II(亨利二世,1154 - 1189 年)要尽可能减少英国圣职人员的权利和特权(尤其是“法庭的特权”privilegium fori),并且想要提高国王对教会的控制。他想规定一些澄清教宗和国王关系的原则,所以于 1164 年在 Clarendon(克拉润顿)的议会上要求主教们和贵族们承认 Wilhelmus(征服者威廉)1078 年的一些规定(所谓的 consuetudines avitae“古老的习惯”),并根据这些文献编写了 16 条约定。这些规定不仅仅包括关于选任主教的内容(参见 105.4),而且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取缔了圣职人员的法庭特权,禁止主教们向罗马申诉,要求主教们在去外国之前需要得到国王的批准,限制教会的种种惩罚等。当时在 Canterbury(坎特伯雷)任总主教的人是 Thomas Becket(托马斯·贝克特,1162 - 1170 年),他原来当过国王的首相,曾经是一个爱好宫廷生活的豪华与荣耀的朝

廷贵族,也是专制主义(Absolutismus,王权的绝对化)的支持者,但在1162年他被提升为主教,变成一个严格的克修者和教会权利的保卫者。Thomas Becket(托马斯·贝克特)长期反对Clarendon(克拉润顿)的规定,最后接受它,但他没有在文献上签名。教宗Alexander III(亚历山大三世)也同样谴责这些文献。因此,国王压迫了总主教,逼他离开英国;Becket(贝克特)去了法国,在那里和教宗见面(1164年)。六年后,总主教回国,但因为Henricus(亨利)王说了一句激动的话,四个诺曼骑士认为这是杀害总主教的命令,所以他们去了大教堂立即打死了总主教(1170年12月29日)。民众尊敬他为圣人,并且Alexander III(亚历山大三世)于1173年宣布他为圣人。因为根据当时的规定,所有的杀人犯都要被绝罚,国王在教宗的使者面前宣发了一个净化自己的誓,并且许诺他将放弃那些在他的任期内出现的为教会不利的习惯(1172年)。民众都纷纷不安,所以他到他对手的墓朝圣——当时Becket(贝克特)的墓已经是一个著名的朝圣地——并在那里公开地鞭打自己(表示作补赎;1174年)。这当然意味着教会在道义上的胜利,但实际上Clarendon(克拉润顿)的规定继续有效——这就等于英国的教会必须服从于国度的安排。英国当时(1171年)还占领了爱尔兰,以此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据说,Hadrianus IV(哈德良四世)教宗曾经允许Henricus II(亨利)这样做,但这是有争论的。

107.6 Alexander III(亚历山大三世)的几个接班人也同样需要面对罗马人的“共和国运动”和无法忍受的金钱方面的要求,所以他们也不能确定教宗在意大利的世俗权利。12世纪最后20年(在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以前的时期)呈现出这样的特征:无论是在意大利或在国际政治上,宗座的地位和权威性下降。那位已经很老的Lucius III(卢修斯/路齐乌斯三世,1181-1185年)教宗在罗马仅仅待了几天。Urbanus III(乌尔巴努斯三世,1185-87年)和Gregorius VIII(额我略/贵格利八世,1187年)的整个任期都在罗马以外度过;后者是一位杰出的教宗,有严格克修的精神,但上任8个星期后他就去世了。唯独Clemens III(克雷孟/革利免三世,1187-1191年)能够回罗马去,与罗马人签订了一种条约(1188年),这样结束了争论。他是一位很好的管理者,但身体健康欠佳。

在教宗的地位下降的时期,Staufer(施陶费尔)王朝的影响力却日渐上升。在Fredericus I(腓特烈一世)皇帝任期的最后几年,德国地区经历了很平安幸福的日子,虽然皇帝和教廷之间仍然存在一些摩擦。Barbarossa(红胡子皇帝)始终占领着Mathilda(玛蒂尔达)在意大利的领地(参见106.2),作为他在意大利中部的基

地。关于这些地区的主权,教宗和皇帝一直争论不休。另外,Trier(特里尔)总教区的圣职人员选新主教时呈现出“两个人当选”的局面,而皇帝支持 Dompropst Rudolphus de Wied(鲁道夫·得·维得),教宗则支持 Folmar(佛尔马尔),一位总执事。在 1184 年在 Verona(维罗纳)的主教会议上,皇帝和教宗 Lucius III(卢修斯/路齐乌斯三世,1181 - 1185 年)会谈,并且双方都怀着尊敬对方的开放态度,但关于上述的两个问题以及关于皇帝的儿子 Henricus VI(亨利六世)的加冕礼的问题,他们仍无法达成共识。虽然如此,他们共同作出了一些抵抗意大利北部地区异端运动的规定(参见 114.1,3)。

107.7 皇帝 Fredericus I Barbarossa(红胡子腓特烈)在意大利南部的政策再次给教宗带来了很大的压力。皇帝的儿子 Henricus VI(亨利六世)自 1169 年以来继任德国国王,而老皇帝安排他和 Roger II(罗杰二世)的女儿 Constantia(康斯坦基亚)订婚(1184 年)及结婚(1186 年),这样宣布他儿子为“意大利之王”(1186 年),因为意大利南部(Neapolis, Sicilia)的统治者 Wilhelmus II(威廉二世,1166 - 1189 年)没有孩子,而 Constantia(康斯坦基亚)是意大利南部王国的继承人(只是她比 Henricus VI 亨利六世大很多)。这个婚姻可算为 Staufer(施陶费尔)王朝扩展权力政策的巧妙成功吧!然而,从德国的特殊任务和利益来看,长期地结合德意志帝国和意大利南部——这必定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虽然教宗 Lucius III(卢修斯/路齐乌斯三世)一开始也知道并且同意这个婚姻,但这个结合只能导致皇帝和宗座之间的严重冲突,因为教宗在过去的时期都依赖于意大利南部的支持,现在他感觉到皇帝要从两方面包围他,这样他遭受很大的限制,而他在意大利南部的主权也处于困境中。因此,在 Urbanus III(乌尔巴努斯三世,1185 - 1187 年)的时代,这种冲突就明显表现出来了。他出生在米兰,这样基本上反对 Staufer(施陶费尔)王朝,他亲自祝圣了 Folmar(佛尔马尔)为 Trier(特里尔)的总主教并要求德国国王放弃 ius spolii 和 ius regalium(圣职人员去世后,教产归于国王的权利,参见 96.3)。因此, Fredericus(腓特烈)皇帝派遣了自己的儿子 Henricus(亨利,称他为“恺撒”)到意大利,使他毁灭或占据教会国的部分地区,并封锁了正在 Verona(维罗纳)的教宗。Urbanus(乌尔巴努斯)教宗差一点又绝罚了皇帝,但德国的主教们在这个冲突中都异口同声地支持了皇帝,所以教宗采取了比较缓和的政策。这位教宗的接班人怀着比较宽容的态度,这也是因为从耶路撒冷传来的消息——基督徒在 Hattin(哈廷)的失败和耶城 1187 年的沦陷(参见 109.2)——使他们感到悲伤。在 Trier(特

里尔)的总主教问题上,皇帝和教宗达成共识,举行新的选举(Gregorius VIII 额我略八世的贡献),而 Clemens III(克雷孟/革利免三世,1187-1191年)同意给 Henricus(亨利)举行加冕礼。这位教宗也为一个新的十字军运动作了热切的宣传。在 Mainz(美因茨)的帝国议会上(1188年),Barbarossa(红胡子皇帝)第二次亲自接受了十字军的十字架,他认为这次远征将是他一生荣耀的顶峰,但这位老英雄在1190年在旅途中去世(参见109.3)。

107.8 在 Clemens III(克雷孟/革利免三世)以后,那位已经85岁的 Hyacinthus(赫亚琴图斯)枢机登上 Petrus(伯多禄/彼得)的宝座,取名为 Coelestinus III(切来斯提努斯三世,1191-1198年),但在德国当国王的是那个才25岁的 Henricus VI(亨利六世,1190-1197年),他是最有才华的 Staufer(施陶费尔)人,他热烈地追求荣誉,坚定地掌握政权。因为教宗多次表示让步和宽容,冲突没有马上暴发。在1191年的复活节, Henricus(亨利)在罗马接受了皇帝的冠冕——这是教宗早就许诺的。皇帝不顾及他和教宗的条约,立即去意大利南部,因为 Wilhelmus II(威廉二世)于1189年11月突然去世,而 Henricus(亨利)的妻子 Constantia(康斯坦基亚)现在继承了诺曼人的王国。然而,本地人的党派已经宣布了 Tankred de Lecce(雷切的坦克瑞德)伯爵为国王(1190年1月)——他是 Constantia(康斯坦基亚)皇后(同母异父)的弟兄。Henricus IV(亨利六世)试图征服意大利南部,但第一次远征失败,因为在他的军队中在 Neapolis(那不勒斯)地区暴发了一场传染病(1191年)。教宗 Coelestinus(切来斯提努斯)于1192年6月正式将 Sicilia(西西里岛)、Apulia(阿普利亚)和 Capua(卡普阿)地区交给他的“封臣” Tankred(坦克瑞德)。在这个统治者去世后(1194年2月),皇帝才能够接受这些地区为自己的领土。皇帝在1194年的圣诞节被加冕为“西西里之王”。教宗不同意这种行动,也是因为 Henricus(亨利)皇帝拒绝向教宗宣发“臣民的誓言”。皇帝也很严厉地对待了他的敌人们,比如在1197年的“阴谋事件”中非常残酷地惩罚诺曼人的男爵们(Barone)。另外,皇帝几次干涉选任主教的事,干涉教会国的一些问题,又囚禁了英国国王 Richardus Coeur de Lion(狮心王理查德)——他是 Tankred(坦克瑞德)的联盟,也参加了十字军运动,在返回的途中被他的对手 Leopoldus de Austria(奥地利的利奥波德)逮捕。英国人给了很多赎金,而因为 Richardus(理查德)宣发了“臣民之誓”,所以皇帝释放了他(1194年2月)。在一段时间,教廷和皇帝之间的关系完全中断了,但教宗不敢采取更多措施。因为 Henricus(亨利)皇帝在 Bari(意大利南

部的巴里)接受了十字架表示愿意参加十字军(关于所谓的“1197年的德国十字军运动”,参见109.3),双方的关系得到一点改善。这位 Staufer(施陶费尔)皇帝的政治目标涉及到很遥远的地区,而且他几乎获得成功:他想以西西里岛为基地,在地中海东部扩展德国的统治,一直到叙利亚。他又要长期地结合意大利南部和德意志帝国,使该地区成为 Staufer(施陶费尔)王朝的世袭领土,而为了使他们支持这个目标,他曾经向德国贵族、德国主教和罗马教廷作出了很多许诺。实际上,他准备统治整个世界(Vorbereitungen zur Weltherrschaft),而这种统治必然地也会威胁宗座的独立性。然而,32岁的 Staufer(施陶费尔)皇帝在 Messina(梅西纳)去世(1197年9月28日)。几个月后,90多岁的教宗也逝世了。

第二章 基督宗教在欧洲东北部的传播。 与伊斯兰教的冲突

108

教会在欧洲东北部的传教工作和文化工作

108.1 在 10、11 世纪,基督宗教传播到 Elbe(易北河)地区的斯拉夫民族中(Elbslawen,所谓的 Wendes 温德人),但由于外教人的反叛,大部分的教堂又被毁灭了(参见 82.5)。在 12 世纪,基督宗教的人士又开始进行传教工作,而且和以前一样,不仅仅是纯粹宗教性的和精神的传教方式——通过传教士的讲道和无私牺牲,而且也包括邻近地区王侯们的战争,这就结合了宗教目标 and 政治目标。这样,在欧洲东北部也出现了十字军的精神,而这个精神与具有目的的殖民地政策结合(zielbewusste Kolonialpolitik)。这种政策的目标是:让德国移民居住在 Elbe(易北河)以东的地区和东海的沿海地区——当时有 Finnen(芬兰民族人)和 Letten(立陶宛民族人)居住在那些地区;让基督宗教文化传播到那些地区。这是一个巨大的目标,它需要国度和教会的合作。在这方面,新兴的修会,即 Cistercium(熙笃)会和 Premontre(普雷蒙特)会提供了不可估价的协助。它们在那些被征服的地区建立了很多隐修院和堂区,这样逐渐消除了外教人的习俗(Heidentum),并且一步一步地培养了真正的基督宗教精神,因为在开始的时候,这些部落仅仅在表面上皈依了信仰。

108.2 在居住于 Elbe(易北河)和 Oder(奥德河)中间的地区的 Wendes(温德人)那里,大约于 1105 年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因为属于 Obotriten(欧博特瑞特王朝)的 Henricus(亨利)王——他是那位被杀害的 Gottschalk(格特沙尔克)的儿子

(参见 82.5)——恢复了他父亲的王国。在 Lotharius III(洛塔尔三世)和 Stauffer(施陶费尔)统治者们的时代中, Otto(奥托)时期(10 世纪)的东方政策再次被视为帝国的重要任务。一位来自 Bremen(不来梅)的圣职人员(Domherr)——圣 Vicelinus(维切林)——曾经在 1126 - 1154 年间在东方的 Holsati(霍尔撒提人)和 Wagrii(瓦格瑞人)中传教,但效果不是很大。他的首要基地是在 Luebeck(吕贝克)西北地区的 Neumuenster(新明斯特)的 Chorherrenstift(圣职团会院)。

萨克林人于 1147 年举行了一个规模比较大的“温德人十字军运动”——圣 Bernardus(伯尔纳德)曾经支持这个运动,并说参与这个运动等于参与去耶路撒冷圣地的十字军运动,但它的标语是“让外邦人皈依还是死去”,所以效果不大,并且引起当地人的愤恨。最有影响的是后来 Brandenburg(勃兰登堡)的边疆伯爵 Albrecht Ursus(“大熊”阿尔布瑞希特)以及萨克森及巴伐利亚的公爵 Henricus Leo(“狮子”亨利)在 1150 - 1170 年间的政策,他们既用武力,又用和平的方式。因此,Obotriti(欧博特瑞特)王 Pribizlaw(布希比斯拉夫)接受了圣洗。一些来自低地德国地区的殖民者进入那些荒芜的地区,他们建立了教堂、隐修院,比如 Praemonstratenses(普雷蒙特会)的隐修院在 Leitzkau(莱茨考)和 Jerichow(耶瑞克),而 Cistercienses(熙笃会)的隐修院在 Doberan(斗贝兰)和 Lehnin(雷宁)。Bremen(不来梅)的总主教 Hartwig(哈特维格)和那位具有灵感的殖民者(genialer Kolonisor) Henricus Leo(“狮子”亨利)规定要那些曾经被毁灭的教区 Oldenburg(奥尔登堡)和 Mecklenburg(梅克伦堡)被迁移到别的地方,而 Ratzeburg(拉策堡)被重新建立。Oldenburg(奥尔登堡)教区大约于 1160 年被迁移到 Luebeck(吕贝克),Vicelinus(维切林)任主教(1149 - 1154 年)。Mecklenburg(梅克伦堡)约于 1160 年被迁移到 Schwerin(什未林)。丹麦的国王 Waldemar I(瓦德马尔一世)于 1168 年攻克了 Ruegen(吕根岛)的 Arcona(阿可纳)堡垒,这样在那里消除了异教徒的习俗:这个海岛被归入 Lund(伦德)总教区。大约于 1200 年, Wendes(温德人)地区的文化已经定型了:既是基督宗教的,又是格尔曼/日耳曼的。在这个时候,文化传播的重要支柱是那些乡间的堂区组织。

108.3 所谓的 Pomerania(波美拉尼亚)人是属于 Wendes(温德人)的一个部落。波兰的公爵 Boleslaw III(波列斯拉夫三世)于 1120 年征服他们之后,他们相当快并且以和平的方式接受了基督信仰。在签订的和平条约中,接受基督信仰是一个条件。Pomerania(波美拉尼亚)的公爵 Wratizlaw(瓦提斯拉夫)和他的妻子首先

接受了基督信仰。第一个去那个地区的传教士是某一位 Bernardus(伯尔纳德),他原来是西班牙人,后到意大利修道,曾经是主教。然而,他的传教工作完全失败了,因为他身着非常简陋的衣服,向那些相当富裕的民族宣布福音。此后,Boleslaw(波列斯拉夫)公爵请一个既明智的又有热忱的主教——Bamberg(班贝格)的 Otto(奥托,1102 - 1139 年)——他承担传教工作。20 个圣职人员陪同他到 Pomerania(波美拉尼亚),而他完全以“帝国的王侯”和“教宗的使者”的身份显示出自己的光荣地位(im vollen Glanze eines Reichsfuersten und paepstlichen Legaten erschien),这样获得了杰出的传教成果,并早在 12 世纪就被称为“波美拉尼亚的宗徒/使徒”。他于 1124 年入境,几个月内在许多危险和困难中大约为 22000(两万多)人施洗,并且组织了教会。在此后,反对派占了上风,但他于 1128 年进行第二次传教旅游活动,为更多的人施洗。他们于 1140 年在 Wollin(沃林)创立了一个教区,后来(1180 年之前)迁移到 Kammin(卡明)。教会在 Pomerania(波美拉尼亚)也同样建立很多隐修院,靠着它们的协助,当地的居民逐渐接受了格尔曼/日耳曼人的习俗(germanisiert)。

108.4 住在 Weichsel(= Wisla 维斯瓦河)和 Memel(Njemen 内门河)中间地区的 Prussi(普鲁士人)以及在 Livonia(里夫尼亚,里夫兰)在 Riga(里加)海湾地区的 Lives(里夫人)是没有接触过基督信仰的民族。在 10 - 12 世纪,一些传教士曾经克服了极大的困难在那些地区中进行了传教工作,但效果很小。在 Prussi(普鲁士人)地区传教的著名人物是圣 Adalbertus(= Wojtjeh 阿达尔伯特,参见 82.3),但他于 997 年被打死,为传教理想而殉道。另一个在那里传教的人,是 Bruno de Querfurt(魁尔夫特的布鲁诺),他也同样成了一个殉道者,他是一位萨克森伯爵的儿子,曾经是圣 Romualdus(若姆阿尔德,参见 101.4)的学生和朋友,而且他早一些在“黑匈牙利人”中(在黑海地区的匈牙利人和 Petschenegen 族那里)传过教。在 1009 年,他和 18 个朋友一起在 Johannsburg(约翰内斯堡)附近遭受斩首的酷刑。大约于 1180 年,随着一些 Luebeck(吕贝克)商人,一位奥古斯丁会圣职人员来到了 Livonia(里夫尼亚),就是来自 Holstein(霍尔斯坦)地区 Segeberg(色格贝格)隐修院的 Meinhard(梅因哈德)修士。他在 1184 年在 Duena(迪纳)河边的 Uexkuell(于克斯克尔)建立了一个教堂并于 1186 年被祝圣为主教,属于 Bremen(不来梅)总教区。然而,本地人的皈依过程非常慢,而外教文化的反基督宗教运动(eine heidnische Reaktion)再一次毁灭了一切。

瑞典的国王 Eric IX Sanctus(“圣者”埃里克)曾经在自己的国度北部介绍了基督信仰,并且也用瑞典的武力在芬兰推广基督宗教(1156 - 1157 年),然而,外教人的风俗一直到 13 世纪还相当流行。

为了建立 Estonia(爱沙尼亚)的教会,Lund(伦德)的总主教 Eskil(艾斯克爾)于 1170 年祝圣了一个法国修士——Fulco(夫尔科)——为主教。

在 12 世纪末之前的十字军运动。与欧洲伊斯兰教的冲突

109.1 所谓的 *crusades* / *Kreuzzuege*(“十字军运动”)是西欧基督宗教世界组织的一些大规模的军事性运动,其目标是夺回巴勒斯坦地区。这些运动是从那些在古代已经很受欢迎的“朝圣”活动(参见第 1 卷,70.5)发展出来的。另一个因素是反对“无信仰者”的“圣战”概念——这个概念来自第 10、11 世纪,但它在西班牙早就是一个现实(参见 109.5)。这些十字军运动的前提是一个“战士阶层”(即骑士)的形成,而教会使这些骑士的目标转向宗教性的任务。

虽然穆斯林军占领了以色列地区(637 年),但到圣城耶路撒冷等地的朝圣运动从来没有停止。然而,那个波斯 - 阿拉伯的 *Fatimida*(法蒂玛)王朝在 10 世纪(909 年)统治了埃及和巴勒斯坦,而在 1070 - 1071 年 *Seljuk*(塞尔柱)的突厥人占领了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他们是一个粗暴的民族——所以情况恶化。当地的基督徒遭受镇压和虐待,有的朝圣者被杀。在西方的世界里,人们认为这是对基督宗教的侮辱,所以拜占庭和欧洲的人越来越激烈地谈论“夺回圣地并在那里恢复基督徒的统治”这种想法。那位不怕冲突的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于 1074 年已经发表了鼓励十字军运动的呼吁(参见 104.5)。然而,由于“授权之争”,人们无法实现这个计划。20 年后,来自 *Cluny*(克吕尼)隐修院的 *Urbanus II*(乌尔巴努斯二世)教宗的呼吁反而非常成功。当时,东方的 *Alexius I Komnenus*(阿雷克休斯一世,1081 - 1118 年)皇帝于 1094 年从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那里向教宗写了一封信,请求教宗的协助,因为在小亚细亚地区的希腊军队面对穆斯林军越来越大的压力。教宗就在法国 *Auvergne*(奥维尔恩)的 *Clermont*(克雷蒙特)举行的主教会议上作讲演鼓励人们去参与十字军运动(1095 年 11 月,参见

105.1)。教宗的激情和当时人们的刻苦精神(asketische Stimmung der Zeit)引起一种兴奋和热忱;会议上的人都喊:Deus lo volt!(上主愿意这样!),而几千个人在肩上粘一个红色十字架来表示自己的决心。在接下来的那个月中,一些传播十字军思想的宣讲家去各地讲演,他们吸引了更多的愿意参与此运动的人。在这些宣讲者中比较重要的是 Peter de Amiens(阿米恩的伯多禄/彼得),他是一个独修者,曾经去过巴勒斯坦朝圣;根据后来的传说,他是十字军运动的真正发起人。那次“带有武器的朝圣运动”的参与者似乎都是法国人和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属于德国帝国地区的参与者只有说法语的 Lothringia(洛林)地区的人——Gottfridus de Bouillon(戈特夫里德)伯爵和他的弟兄 Balduinus(巴尔度因)和 Eustachius(欧斯塔克乌斯)率领他们。毫无疑问,大部分的参与者的主要动机是宗教性的热忱和兴奋,虽然也有世俗的因素:骑士对“伟大壮举”的渴望、冒险精神、经济困难、对战利品的希望。在整个运动的形成和组织方面,罗马宗座有重要的影响。教宗 Urbanus(乌尔巴努斯)规定那位具有骑士精神的 Adhemarus de Puy(阿德马尔)为十字军军队的领导并宣布这些参与十字军运动的人将获得“indulgentia”(大赦,参见 119.4),又通过三年的“神的和平”(参见 Treuga Dei, 101.2; 102.3)保护了他们个人的安全、他们的家庭和家乡的财产。

这些战士的主力部队在贵族们的领导下,在 1096 年夏天后沿着 Danubius(多瑙河)走向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然而,在 1096 年春天就有一些下层社会的群体(由农民和骑士形成),他们先在 Rhenu(莱茵河)地区残酷地杀害了犹太人,后来又在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地区似乎都因自己的无序而四分五裂。留下的小群体在 Petrus de Amiens(阿米恩的伯多禄/彼得)的率领下到达了小亚细亚,但在 Nicaea(尼西亚)地区遭受穆斯林军的攻击,似乎完全被消灭了。主力部队(大约 25000 个步兵和 4000 个骑士)到达了君士坦丁堡,而希腊的皇帝要求他们向他宣发“臣民誓”(Lehenseid)。他们在小亚细亚也面对了很大的抵抗力量,但他们在 Dorylaeum(斗瑞莱翁,1097 年 7 月)和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1098 年 6 月)的交战中获得了胜利。他们在 Edessa(埃德撒)和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建立了一些“西部欧洲的小王国”,当国王的人是 Balduinus de Bouillon(巴尔度因,即 Gottfridus 戈特夫里德的弟兄)以及诺曼人 Bohemund de Tarento(博赫孟,他是 Robertus Guiscard 罗伯特的儿子)。

十字军的军队在巴勒斯坦遇到了无数的困难(其中有几千个人去世),他们围

攻耶路撒冷城四个星期之久,并于1099年7月15日侵入圣城,又在城中残酷地杀害了很多人。后来,号称“圣墓的保卫者”Gottfridus de Bouillon(戈特夫里德)当耶路撒冷的君主。当时埃及人派遣了一个军队驱逐欧洲人,但Gottfridus(戈特夫里德)在Ascalon(阿斯卡伦)的交战中打败了他们。不久后,他就去世了(1100年7月)。他的继承人是他的弟兄Balduinus(巴尔度因),他从Edessa(埃德撒)迁都到耶城,当耶路撒冷的王(1100-1118年)。西方人在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以及在耶城建立了一些拉丁语的宗教区以及很多属于他们的教区。

这种运动算是成功了,但另一些别的活动却完全失败了,比如1101年由伦巴第人、德国人和法国人组成的十字军运动早在小亚细亚就被消灭了。依靠着新的西方来的军事力量和意大利城市(Venetia 威尼斯, Pisa 比萨, Genua 热那亚)的船队,在巴勒斯坦的十字军能够巩固他们的成果,并在叙利亚的Tripolis(提里波里斯)建立了第四个“十字军国”。在这些运动中,产生了一些新兴的骑士团,比如Johannites(约翰内斯骑士团,约于1100年创立)和Templars(圣殿骑士团,约于1119年创立),参见118.2-3。然而,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情况始终非常艰难。不仅仅穆斯林军有敌对的态度,而且希腊人也反对西方来的军队。除此之外,几个十字军小国的领导人物之间也不断有一些争吵。部分西方来的士兵们也和当地的居民结婚,他们的子孙被称为pullani(普拉尼),但这些人没有很高尚的理想,他们充满自私自利和无纪律的欲望。在这些情况下,基督徒们在东方争取的领土一步一步落敌人的手里,这是毫不令人感到奇怪的结果。Edessa(埃德撒)——最东边的小国——最早(1144年)归于穆斯林的领导者Sultan(苏丹)Imadeddin Zenki de Mosul et Haleb(伊马德丁·曾克艺)。

109.2 在欧洲西部的基督宗教世界中,Edessa(埃德撒)的沦陷引起了很大的恐惧。因此,他们早在1147年推动了“第二个十字军运动”,主要的推动者是Eugenius II(尤金尼乌斯二世教宗,参见106.5)以及圣Bernardus(伯尔纳德,参见116.3)。后者被委任在各地宣传十字军运动。他的口才以及一些被奇妙治好的病人(“奇迹”)赢得了无数的人。西欧的主要领导人物和他的臣民们都参与了这个运动:法国的Ludovicus VII(路易七世),他的妻子Eleonore(艾雷欧诺瑞)陪同了他;德国国王Conradus III(康拉德三世)——他很长时间拒绝参加,因为德国和意大利的政治情况不理想,但圣Bernardus(伯尔纳德)在1146年圣诞节在Speyer(施佩耶尔)大堂中说服了他;Suabia(施瓦比亚)的年轻公爵Fredericus Barbarossa(红

胡子腓特烈)——他是 Conradus(康拉德)的侄子——以及很多其他的德国南部的贵族人士都参加了。然而,十字军的伟大目标却完全落空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希腊人那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他们没有支持十字军。德国人和法国人的军队和第一次一样顺着 Danubius(多瑙河)往东迈进,从君士坦丁堡进入小亚细亚,但大部分的战士在小亚细亚死在突厥人(土耳其人)的攻击下或因疾病和疲惫困乏而去世。在一些坐船到达叙利亚的战士的协助下,那些朝圣旅途中的君主们于1148年率领一个军队围攻 Damascus(大马士革);然而,因为十字军人士彼此的冲突以及由于耶路撒冷居民没有提供良好的合作,这次运动没有结果。唯一值得注意的成果是一些德国低地和英国的十字军协助葡萄牙王 Alphonso I(阿尔)攻克了穆斯林人占领的 Lisboa(里斯本)城(1147年10月)。

第二次十字军运动的不幸结局在欧洲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和抱怨。圣 Bernardus(伯尔纳德)也受到尖锐的谴责,但他说,很多十字军的表现有罪,这就是失败的原因。另一方面,敌人的军队日渐逼近。Nureddin(努瑞丁)苏丹——他是 Zenki(曾克艺)的儿子——在1154年在 Damascus(大马士革)建立了他的军营。他在很多地方骚扰基督徒的小王国。在 Balduinus(巴尔度因)王去世后(1162年),耶路撒冷国的统治者都是一些无能的或太年轻的统治者(Almaricus I; Balduinus IV, Balduinus V),所以这个小国似乎无法坚持下去。在1171年苏丹 Saladin(撒拉丁)开始统治埃及,他于1174年也占领了 Damascus(大马士革),1183年又占领了 Mesopotamia(美索不达米亚)。他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他一生的目标是夺回耶路撒冷,因为耶城也是伊斯兰教的圣城。1187年7月4日在巴勒斯坦地区的 Hattin(哈丁)的交战中,他打败了基督徒军队,而这个事件是非常关键的:最优秀的基督徒军人被杀,耶城的国王 Guido de Lusignan(古多,1186-1194年)以及很多别的贵族人士成为俘虏。耶城于1187年10月投降。从此以后,西方人控制的地方只剩下很少几个有堡垒的城市(Tyrus 提罗斯, Tripolis 特瑞波里斯, Antiochia 安提阿)。

109.3 关于十字军失败的消息在西方再次引起很大的风浪。几个国家的人立即开始准备下一个运动。Gregorius VIII(额我略/贵格利八世,1187年)呼吁了基督教的世界,而 Clemens III(克雷孟/革利免三世,1187-1191年)也同样推动十字军运动。在法国和英国出现了一种新的税,即所谓的“撒拉丁什一税”。这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十字军运动;西方三个最强大的君主(德、英、法国)都支持它,这也是

最后一个有普遍性的十字军运动,可以说是整个运动的高峰。首先,那位已经 65 岁的 Fredericus I Barbarossa(红胡子腓特烈一世)皇帝在 1189 年 5 月从 Regensburg(雷根斯堡)出发,他率领了一个装备精良的军队大约有 2 万战士。虽然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都没对他们怀有敌意,但他们仍然安全地到达了小亚细亚,在 Iconium(伊科尼翁)获得胜利(1190 年 5 月),但他们在那个难通行的地区因食品不足和敌人的攻击遭受严重的损失。在 1190 年 6 月 10 日,皇帝在 Cilicia(基利基亚)山区的一条河的急流(Saleph = Kalykadnus 河)中淹死了,所以德国人的这次十字军运动似乎要完全失败。皇帝的儿子 Suabia(施瓦比亚)的公爵 Fredericus(腓特烈)继续率领剩下的几千人,将他们带到 Acco(= Ptolemais 阿克)的城外军营,因为那个重新获释放的 Guido(古多,原来耶路撒冷王)正在围攻 Acco(阿克)。在那里,德国骑士团(Deutschorden)被创立,参见 118.4。Fredericus(腓特烈)公爵在那里去世(1191 年初)。在 1191 年 4 月和 6 月,法国的 Philippus II Augustus(腓力二世王)和英国的 Richard I Coeur de Lion(狮心的理查德王)到达巴勒斯坦。他们在 Sicilia(西西里岛)过冬,而 Richard(理查德)王在路途中征服了 Cyprus(塞浦路斯岛)。现在,各国的十字军在 Acco(阿克)同心协力,并在两年围攻后终于在 1191 年 7 月攻克了 Acco(阿克)的坚固堡垒。为此他们作出了巨大的牺牲。Acco(阿克)和 Cyprus(塞浦路斯岛)的征服算是这次运动的唯一有影响的成就。因为 Jerusalem(耶城)的君王和 Tyrus(提罗斯)的君王不合作,而西方各地的朝圣王彼此之间也发生了一些摩擦,所以他们无法实现更伟大的目标。法国的国王和奥地利的公爵 Leopoldus V(利奥波德五世)怀着恼怒回去了,后者因为英国王曾经在一个战争中拿下了他的国旗,得罪了这个公爵——他后来在奥地利逮捕了英国王,这样进行报复(参见 107.8)。英国的 Richard Coeur de Lion(理查德)一直到 1192 年留在叙利亚,并且能够几次打败穆斯林军,但他从来没有完成解放耶路撒冷的计划。他个人的勇气很大,但他那种摇摆不定的性格,他的残暴和寻求风险的倾向也带来了许多麻烦。圣城耶路撒冷留在穆斯林人的手里。在离开的时候(1192 年 9 月)Richard(理查德)和 Saladin(撒拉丁)签订了一个条约,其中规定,基督徒们可以占领从 Jaffa(= Joppe,海法)到 Tyrus(提罗斯)的沿海地区,他们可以(不带武器地)到耶路撒冷朝圣,并且宣布三年的休战。这是最伟大的十字军运动的一些小小的结果,真可谓“事倍功半”。苏丹 Saladin(撒拉丁)是基督徒们的强大对手,但他也有崇高的精神,他于 1193 年去世,他的领域被分裂为两块,所以伊斯兰军的力量也被削弱

了。另外, Henricus VI(亨利六世)皇帝于1197年从 Apulia(阿普利亚)派遣了一个德国的十字军军队到叙利亚——当然,他这样做更多考虑到自己的地中海政策,而不是首先考虑到宗教问题。通过这个“德国人的十字军运动”,西方人还能向北扩展自己的领土,能够攻克 Beirut(贝鲁特)以及联结耶路撒冷、Tripolis(特瑞波里斯)和 Antiochia(安提阿)。然而,因为皇帝于1197年去世,十字军不得不提早回国。

109.4 根据头三个十字军运动,已经可以理解整个运动的性质和意义。这个运动的主要目标——在巴勒斯坦长期地建立基督徒的统治——并没有实现,但我们也不应该说,十字军只是一种错误的幻想以及几十万人的财产和生命力的无益浪费——18和19世纪的历史学家曾经下过这样的判断。当然,在十字军运动的过程中,纯粹的信仰和宗教热忱多次变得不重要,而一些物质性的考虑或政治性的目标更突出;然而,从整体来看,这些运动还是宗教精神的灿烂表现,而且它们还能表达另一个事实:当时的欧洲在教会上以及在文化上仍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很重要的是,西欧那时一直面临着伊斯兰教的威胁,而那些十字军的强有力攻击在几百年的时期内削弱了这个威胁,穆斯林军对地中海的控制被消除,而西班牙地区的解放被巩固——这个半岛能够一步一步地脱离伊斯兰教的控制(参见下文)。在精神与经济上,十字军对西方的影响更大:西欧人接触了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的世界,他们看到了一个在很多方面优越的文化——他们的眼界被扩宽,他们受了刺激。这些刺激不仅仅推动了贸易和种种生产方式,而且也表现在骑士传统、城市建设、艺术、技术和科学(地理学、医学、数学、哲学)、经济组织和国度的管理制度等方面。西欧各国在罗马教宗的领导下决定共同参与这个运动(由上而下的神圣统治的理念),所以宗座获得极大的威望和影响力。基督徒骑士的理想因信仰因素而被提升(参见那些宗教骑士团的创立,118),人民群众的信仰也受到鼓励(大赦、对圣髑的尊敬、拜苦路祈祷等等)。由于十字军运动,西欧人开始考虑在亚细亚或 Africa(阿富利加/非洲)进行传教工作,并为这些传教活动开拓了一条路(参见127.4,5)。这些都是一些良好的影响,但十字军运动也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因素,而这种因素后来也推动了一些转变,比如东方的异端向西方的传播(113.2),以及东方的奢侈生活、非道德态度以及怀疑主义思想(freigeistige Philosophie)、一种自信的、不接受教会领导的平信徒精神的崛起等因素在西欧的传播。

109.5 通过几次十字军运动,在欧洲南部和西部的穆斯林势力受到相当大的削弱,而那些原来属于基督宗教的地区可能更容易被征服。比如诺曼人早在11世

纪下半叶从阿拉伯人的手中夺回了 Sicilia(西西里岛,参见 105.3)。在西班牙几百年的战争过程中,穆斯林的统治分裂为几个 Emirates(艾米瑞特,约于 1031 年),这样就大大缩小了穆斯林的领土。这些战争可以视为十字军运动的先驱。教宗 Alexander II(亚历山大二世)于 1063 - 1064 年宣布,参与西班牙的运动的人可以获得“大赦”,因此就有很多法国的骑士参与。西班牙的国王 Alphonsus VI de Leon - Castilia(阿方索)于 1085 年再次获得了古老的西哥特首都 Toledo(托莱多)。这样形成了三个王国: Aragonia(阿拉贡)在东北地区, Leon - Castilia(莱昂 - 卡斯蒂利亚)在中部,以及 Portugal(葡萄牙)在西部。关于 Lissabon(里斯本)的攻克(1147 年),参见上文 109.2。在那些战争中,著名的国家英雄 Rodrigo Diaz de Vivar(若德瑞格/罗德里格,1099 年去世)——他被称为 Cid(“熙德”,从阿拉伯语 Sidhi = 主)和 Campeador(奋斗者)——的表现特别杰出,但他在某些情况下也为穆斯林统治者效劳。在一个关键的交战中——1212 年 6 月在 Navas de Tolosa(纳瓦斯得托罗撒)——Castilia(卡斯蒂利亚)的王 Alphonsus VIII(阿方索八世)很巧妙地战胜了 Almohad(阿尔摩哈)的 Khalif(哈里发)。在西班牙,那些骑士团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参见 118.5),而历代教宗也始终注意到西班牙,因为在那里始终有阿拉伯人的威胁。后来, Castilia(卡斯蒂利亚)的 Ferdinandus III(“圣者”斐迪南三世,1217 - 1252 年)征服了 Cordoba(科多瓦,1236 年)和 Sevilla(塞维利亚,1248 年),这样仅仅留给穆斯林西班牙南部的小王国 Granada(格拉纳达)。在 1492 年, Aragon(阿拉贡)的 Ferdinandus II(斐迪南二世)和 Castilia(卡斯蒂利亚)的 Isabella(依撒贝拉)共同从 Granada(格拉纳达)中驱逐了穆斯林。Aragon(阿拉贡)也变成一个庞大的国度,因为 Petrus III(伯多禄/彼得三世)王在 1282 年驱逐了法国人(参见 125.3),并且 Alphonsus V(阿方索五世)于 1442 年占领了 Neapolis(那不勒斯,参见 144.3)。自从 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参见 123.4)或从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参见 104.5)以来, Aragon(阿拉贡)的国王们都是宗座的“封臣”,但这些国王能够很明智地扩大他们对各种圣职的影响以及对教产的控制,这样在他们的领土上建立了一种“国教”制度(eine Art von National - und Staatskirche)。

第三章 教会的领导和管理制度。 种种异端及其镇压

110

宗座、罗马教廷和教会的统一管理。教会法典

110.1 在 1073 - 1198 年间(即是第 12 世纪),罗马宗座对西方教会的首席权获得了全面的发展。9 世纪的 Nicolaus I(尼苛劳/尼哥拉一世,参见 87.3)曾经想达到这个目标:让罗马的主教(教宗)在教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都有主动的影响和精神上的领导权——在第 12 世纪达到了这个目标。教宗成了整个教会的元首,也成为人间最高的立法者、裁判者和管理者,他对教会的一切成员,无论是圣职人员或平信徒,都拥有 plenitudo potestatis(充分的权力,权力的完满)。另外,宗座逐渐成为教会管理的中心,这一点符合那个时代的需要,虽然也造成一些不良后果。其著名 *Dictatus Papae*(《教宗敕令》)包含着 Gregorius VII(额我略/格利七世)的政策纲领(参见 104.2),而在其中他强调 Pseudo - Isidorus(伪伊西多尔,参见 87.4)的原则:任何一个地方教会的“重大问题”(causae maiores)必须让罗马教宗作决定(《教宗敕令》第 21 条)。他在 *Dictatus Papae*(《教宗敕令》)中还说,唯独教宗有权利被称为 episcopus universalis(“全世界的主教”,参见第 2 条),只有他能单独地(没有经过某一个主教会议的决定)撤销主教的职位、恢复主教的职位或由于重大的理由调动主教(第 3、5、13、25 条);他能为整个教会规定新的法律,能创立隐修院,能分开或合并某些教区(第 7 条),他能够通过他的使者主持各地的主教会议(第 4 条),能召开全球性的主教会议(第 16 条),能为任何地方教会祝圣圣职人员(第 14 条),能接受来自各地的申诉或申请(第 20 条);教宗的决定是可靠的和终

究性的(第18条),他可以审判一切人,但没有人可以审判他(第19条)——这一个原则在古代教会中已经算为教会的法律原则(参见 Gelasius I 葛拉西乌斯一世教宗,第1卷,64.1)。第12、13世纪的教宗们顺着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的路线完成了他们的立法工作和管理工作。教会和教会的法律在几百年中深受格尔曼/日耳曼文化的影响,但现在的学者开始恢复对罗马法的研究,而教会同时执行《教会法》,又多次编辑了一些庞大的《教会法集》。自从 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1198 - 1216年)以来,教会被视为一个普世性的、绝对的统治机构(universale absolute Monarchie,就是说教宗有绝对的主权)并被称为“真正的 Imperium Romanum(罗马帝国)”。然而,教宗的“世界大国”的根源并不是世俗的权力欲,而是宗教思想,因为当时的人认为教会代表“人间的上主之城”的理想,这是来自 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思想(参见 104.1)。

110.2 宗座的权力的提升以及教会的中央化有了如下的具体表现:

110.2a 教宗的称呼在几百年以来都是 Papa(爸爸,参见第1卷,64.2),但现在获得一种“排它性”的意义,就是说唯独罗马教宗可以被称为 Papa。教宗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宣布:Quod hoc unicum est nomen in mundo(“这个名称在世界上是独一的”,《教宗敕令》第11条)。根据这个名称,那些根据教规当选的教宗们由于圣 Petrus(伯多禄/彼得)的功劳都成为神圣的(第23条)。在所有的圣职人员当中,唯独教宗可以戴皇帝的象征(第8条)。自从11世纪以来,教宗在一些隆重的(非礼仪的)场合头上戴着一种特殊的、头盔式的帽子,即所谓的 Tiara(教宗冠,三重冠;亦称 regnum)。这个“教宗冠”在开始的时候只有一个或两个环(corona 环冠),但在 Bonifatius VIII(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八世)以后,它有三个“环冠”,因此被称为 triregnum(三重冠,亦译“三权冠”)。

110.2b 早在古代基督宗教有这样的概念:在教义方面,罗马教会为整个普世教会都有教导的权威性(Irenaeus 伊雷内/爱任纽的主张,见第1卷,21.2),并在信仰的问题上,罗马教会从来没有错(参见519年的 *Formula Hormisdæ*,第1卷,55.4),将来也不会错(680年的 Agatho 阿伽托教宗,参见第1卷,59.3)——这种信念现在成为更坚固的信仰。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说(《教宗敕令》):Quod Romana ecclesia nunquam erravit nec imperpetuum scriptura testante (Lk 22:32) errabit[“罗马教会从来没有错,将来也永远不会错,根据《圣经》的证据”(指《路加福音》22章32节)。]Thomas Aquinas(托马斯·阿奎纳)这位“经院哲学之王”后来

说出,教宗(Vicarius Christi 基督的代表)在教义上的不可错误性是一个定律: *ad solam auctoritatem Summi Pontificis pertinet nova editio symboli* [“只有教宗的权威可以宣布一个新的信条(信经)”, *Summa Theol.* 《神学大全》2, 2 q. 1 ad 10]。

教宗 Alexander III(亚历山大三世)于 1170 年规定,那些被尊敬为“圣人/圣徒”的人需要经过宗座的批准(*canonisatio* 册封过程)才可以宣布为“圣人”,而 1215 年的第 4 次 Lateranus(拉特兰)会议说,任何新发现的“圣髑”或“圣物”的尊敬也需要教宗的批准(会议文献第 62 条;参见 100.3)。自从 12 世纪以来,教宗们规定,一些非常重大的过犯的赦免权是保留给教宗的(*causa reservata* “保留案件”)。教宗的那些惩罚措施的一个小目录来自 13 世纪,这个小目录每年在圣周四(“最后晚餐”)被宣读(从 Honorius III 霍诺利乌斯或 Gregorius IX 额我略/贵格利九世以来)。这个目录后来被扩大。那些保留给教宗赦免的罪的补赎导致了一个特殊的罗马法庭的形成,就是所谓的“圣赦院”(Poenitentiarum Apostolica)。

110.2c 在早期的时候,皇帝们召开了那些“普世性的”主教会议(大公会议),但在中世纪,情况改变了,而这些大公会议在本质上就是教会的会议,所以唯独教宗召开了这些会议或宣布它们的结果。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说(《教宗敕令》第 16 条): *Quod nulla synodus absque praecepto eius [papae] debet generalis vocari* (“除非有他的[教宗的]命令,不可以召开任何大公主教会议”)。德国皇帝 Fredericus Barbarossa(红胡子腓特烈)在两个教宗分裂的时期企图恢复古代皇帝们的“召开会议”的权利(参见 1160 年在 Pavia 帕维亚的会议,参见 107.3),但皇帝的尝试没有成功。第 9 次(1123 年)、10 次(1139 年)、11 次(1179 年)和 12 次(1215 年)大公会议都是在罗马的 Lateranus(拉特兰)举行,第 13 次(1245 年)和第 14 次(1274 年)大公会议在 Lyon(里昂)举行。

110.2d 面对着越来越多的工作和事务,教宗开始利用逐渐增多的助手和公务员(管理人员),自从 11 世纪,这些管理人员的总体被称为 *Curia Romana*(罗马教廷)。属于罗马教廷的部门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宗座的 *cancellaria*(秘书处),它负责提供各种文件;宗座的 *camera*(财务部),它负责财务和管理问题;宗座的 *poenitentiarum*(圣赦院),提供大赦或豁免(参见 110.2b); *Rota Romana*(教廷法院),它从 13 世纪末以来负责教会的法案。在教宗的助手中最重要的是 *Cardinales*(枢机们,参见 103.3),他们的人数有所变化(11 世纪有 50 多位枢机,12、13 世纪只有 20 到 30 位枢机,甚至更少),但他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们逐渐成为罗马教会

和教宗的“元老院”(Rolle eines Senates der roemischen Kirche und des Papstes)。枢机团不仅仅在教宗去世后领导教会或选择新教宗(参见 103.5; 107.4),而且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教宗对教会的指导。那些重大的问题都在所谓的 *consistorium* (“商榷”,即教宗与枢机们的谈论)中被决定。另外,枢机团选择一些枢机当教宗的使者,自从 1050 年,尤其从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的时代,这些使者特别重要,他们被派往各地为了进行教会改革或完成一些教会政策任务。因为他们是教宗的代表并具有教宗的种种权力(*potestates*),所以这些“枢机使者”从 12 世纪末以来被称为 *legati a latere*(宗座使者)。在 *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的时代(1198 - 1216 年),为教宗政策服务的使者的影响力最大。因为这些使者的权力很大,他们可以突破或取消本地主教的法律权利,所以教会和国度都有人反对他们。自从 12 世纪,罗马的枢机们在威望和地位上都超过了一切其他的教会长上,包括总主教。这些枢机甚至想获得一种更独立的统治地位,即一种“与教宗一同执权”的权利(*Mitregierungsrecht*)。为了表现出他们的特殊地位,*Innocens IV*(依诺森四世)于 1245 年给予他们“红帽”,而 *Bonifatius VIII*(博尼法奇乌斯八世)或 *Paulus II*(保禄/保罗二世,1464 年?)允许他们穿“红衣”。自从 13 世纪以来,枢机团的主席是 *Ostia*(欧斯提亚)的枢机主教。

110.2e 部分由地方总主教或教区主教会议掌握的权利现在归于教宗,参见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的 *Dictatus Papae*(《教宗敕令》,3、4、5、7、13、21 条,参见 110.1)。早期的规律是,总主教检验并批准某一个主教的选择(参见 112.1),但从 14 世纪以来——很多当选的人提出这个愿望——教宗经常批准当选的主教们,而自从 15 世纪初,这就成为罗马教宗公认的权利(参见 1418 年的 *Concordatus Constantiae*《康斯坦茨协议》,第 2 条)。自从 9 世纪以来,总主教们必须在当选后 3 个月以内请求宗座寄给他们 *pallium*(白羊毛披肩带,参见第 1 卷,71.4),而从 11 世纪中叶,总主教们都必须亲自去罗马领受这个披肩带。教宗早就要求个别 *metropolita*(大主教、总主教)向他宣发“服从之誓”,但从 12 世纪初以来,这种服从誓就比较普遍了。*Gregorius IX*(额我略/贵格利九世)通过法律规定于 1234 年要求他们都宣发服从之誓。自从 *Paschalis II*(帕斯卡里斯二世,约于 1100 年),总主教们也必须发誓定期地来罗马,向教宗作报告(所谓 *visitatio liminum SS Apostolorum = ad limina*,述职报告,主教向教宗的述职)。在 15 世纪,教宗有批准每一个主教的权力,因此“服从之誓”和 *visitatio liminum*(“定期述职”)的义务也延

伸到每一个主教。

宗座也有权利接受来自各地的一些申诉(*appellationes*),教宗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早就强调过这个权利(《教宗敕令》第20条: *Quod nullus audeat condemnare apostolicam sedem appellantem*“没有人可以审判一个向宗座申诉的人”)。然而,“向罗马申诉”的案件在第12世纪非常多,其中也出现了一些滥用的情况,所以圣 Bernardus(伯尔纳德,参见 *De consideratione*《论沉思》,参见 106.5)和其他的教会人士曾经多次警告说,这种申诉的权利不能太过分扩大。

110.2f 因为教廷的任务和教廷工作人员的不断增多,所以教廷的收入也需要增加。教廷的收入主要有:1)所谓的 *census*(税收),就是教会国和罗马教会的其他地产的税收,以及那些直接属于教宗管辖(*exemptio*)的隐修院或教堂(参见 101.2)的税收,还有那些当教宗“封臣”地区或国度的利润(比如意大利南部、Sicilia 西西里岛、Aragon 阿拉贡、Corsica 科西嘉岛、Sardinia 撒丁岛和英国),以及所谓的 Peter's Pence(伯多禄/彼得的捐款),这是来自英国、波兰、匈牙利和斯坦的纳维亚诸国的一种税(参见 81.2; 82.4; 104.5; 123.4)。2)所谓的 *munera pallia*(总主教披带的税),以及 *servitia communia*(“共同服务的税”),就是每当教宗批准一个主教或院长时,他们必须交付第一年收入的三分之一。这种税来自一个很古老的习俗,就是那些在罗马被祝圣的主教们自愿地向教宗送了一些礼物。3)所谓的 *visitationes*(述职费),就是每当一位总主教(后来也包括主教)来罗马进行他的职务报告时所交的一种费(参见上文 110.e)。教宗 Nicolaus IV(尼苛劳/尼哥拉四世)在 1289 年宣布,那些主要的收入的一半归于枢机团,并且允许枢机们参与选任那些在几个教会国地区当管理人或收税员的人。毫无疑问,罗马教廷在那个时候的财务管理制度越来越完备,但这种“过分重视金钱”的倾向(*Fiskalismus*)也隐含着许多危险。这些缺点在当时已经很明显,而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也曾引起很多人的抱怨或讽刺。

110.2g 外地的教会团体还以另一种方式支持罗马的教会。因为那些教宗们充分地使用了他们拥有的 *plenitudo potestatis*(“完满的权力”),他们对别的教区的高级或下层圣职人员的选任都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在开始的时候(从 Innocens II 依诺森,1137 年),教宗们仅仅提出一些“请求”(*preces*),使当地教会注意到教廷的候选人,但不久后,他们的文献多有 *mandata*(“指示”或“命令”)的特征。在 13 世纪,教宗的至高管理权发展到一系列 *provisiones*(规定)、*postulationes*(要求)、

exspectantiae(指定候选人)、reservationes(保留权)等。在1265年,教宗Clemens IV(克雷孟/革利免四世)说,教宗有关于一切教会职位的 plenaria dispositio(全面的支配权,参见140.2)。在很多情况中,教廷直接管理种种职位的分配是合理的,并且有良好的后果,因为这样一些能干的圣职人员能获得应得的尊严和收获——如果没有教廷的干涉,他们不会有这种地位。但在另一方面,这种介入也造成一些弊病,始终令一些人感到不满意。英国人早在1245年在Lyon(里昂)的大公会议上(参见124.5)抱怨说,很多英国教会的职位是在意大利人的手中,而这样的抱怨在后来的时期中也多次被提出(参见135.3a; 140.3)。

110.3 教会权力的崛起和权力的统一过程也导致另一方面的需要:人们比以前更多强调或要求发展和编写整理 *ius canonicum*(教会法律,教会法典),教会法又能支持和巩固教会的权力。现在开始教会法的新阶段,其中有两个倾向,即:全面落实传统的教会法规,以及减少格尔曼/日耳曼法律在教会中的影响力。在“授权之争”时已经有一些教会人士推动或完成一些《教会法文集》,比如 Lucca(卢卡)的主教 Anselmus Minor(小安瑟伦,1086年去世),Deusdedit(德乌斯德迪特,约于1097年去世)枢机,Sutri(苏特瑞)的主教 Bonizo(波尼佐,约于1095年去世)以及 Chartres(沙特尔)的主教 Ivo(伊夫,约于1115年去世)。然而,他们的著作不能满足当时的需要,因为教会法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比较大的影响获得了 Bolonia(博洛尼亚)的法学研究,在那里工作的 *legista*(法学家) Irnerius(伊内利乌斯)于1084年创立了一个著名的“罗马法学校”。在那里,一位 Camaldolese(卡马尔多里会)隐修士——Gratianus(格拉提安)第一次用 *dialectica*(逻辑学)的方法(参见121.1)来讨论教会法律,将它视为一个与一般神学有差别的独立学科。大约在1140年后,他搜集和整理那些分散在各文献中的教会法规条,这就是他的著名 *Concordia (Concordantia?) discordantium canonum*(《不协调法规的协调》(或《不协调法规的索引》?)),后来一般都称 *Decretum Gratiani*(《格拉提安法令集》)。虽然这原来只是个人在教育中用的著作,但它的适用性很强,所以在那些 *decretistae*(法学家)和 *glossatores*(法律注释家)当中以及在教会法庭那里获得了很大的威望,并逐渐排挤了早期的《法令集》。这样,使 Gratianus(格拉提安)成为“教会法学之父”。然而,12、13世纪的教宗们又不断宣布了一些新的法律,这样还需要继续搜集和编写他们的种种法令。很多人曾经作过这方面的工作,但最权威性的是这些:Gregorius IX(额我略/贵格利九世)委任那位很有学问的道明会会士

Raimundus de Pennaforte(瑞孟多/赖孟多)编写一部教宗法令集[*Liber extra* (sc. *extra Decretum Gratiani*)亦称 *Decretales Gregorii* 共5卷,1234年写成;参见130.4]。另外 Bonifatius VIII(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八世)于1298年编写了 *Liber sextus* (《第六卷》)以及 Clemens V(克雷孟/革利免五世)于1314/1317年编写的所谓的 *Clementinae* = *Clementinae constitutiones* (《克雷孟/革利免法令集》)。除了这些官方的和正式的教会法典以外,还有 Johannes XXII(约翰内斯二十二世)于1317/1325年间编的 *Extravagantes* = *Extravagantes decretales* [《另编法令集》]以及后来的 *Extravagantes communes* (《共同另编法令集》),一直到1484年]。第一部印刷出版的版本是1500年的法国律师 Jean Chappius(沙皮乌)发行的,而这些印刷版本都结合了前面的5(或6)部《法令集》,这样形成了所谓的 *Corpus iuris canonici* [= CIC,《教会法典》,这从1580年(Gregorius XIII)以来是正式的名称]。这部法典包含教会和历代教宗对于教会法律的经典式概念,而从整体来看,“它具有统一性、技术上的完整性以及很奇妙的弹性与适应性”(U. Stutz的话)。

111

教会与国度的关系

111.1 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之间的关系,就是教会和国度、宗座和皇帝之间的关系,在几百年的历史中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自从4世纪以来,一些人曾经用“天与地”、“太阳和月亮”、“灵魂和身体”等比喻来说明这两个权力,这就意味着他们认为宗教的权力应该超越世俗的权力。中世纪的人多次引用了 Gelasius I(葛拉西乌斯一世教宗)于494年向东方的 Anastasius(阿纳斯塔修斯)皇帝写的诏书,教宗其中提出“两个权柄”的理论:上主通过这两个权柄统治世界,而其中的宗教权力是“更有分量的”。然而,宗教权的优先地位只是一种“伦理道德上的”估价,而不是“实际上有法律效果的”判断。实际上,这两个权柄被认为在自己的范围内都是独立的,而他们双方的合作被视为人类福利的前提条件(参见 Ambrosius 安波罗修斯, Augustinus 奥古斯丁等人的著作)。根据传统的说法,保护教会是皇帝的任务,但这又引起皇帝对教会内部事务的干涉,并且造成这样的局面:皇帝或多或少统治了教会。在东方的希腊教会中, Caesaropapismus (“政教合一”, “皇权凌驾在教权之

上”)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政治制度。在西欧,世俗权力的压力尤其表现在皇帝对新教宗的“批准权”——东哥特和拜占庭的统治者曾经施行过这种权利(参见第1卷,64.6),而后来的德国皇帝也施行这个权利,一直到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的时代(参见 86.6; 104.1)。Carolus Magnus(查理曼)对法兰克教会以及对宗座有统治者的地位(参见 86.2),历代的 Otto(奥托)皇帝影响了新教宗的选任(参见 88.5,6),而 Salier(撒里尔王朝)的 Henricus III(亨利三世,88.7; 103.1)更多地干涉了宗座的事。然而,Nicolaus I(尼苛劳/尼哥拉一世,858-867年)教宗是一个重要的例外,因为他坚决反对世俗权力对教务的干涉并相当成功地提出了教宗对各地的王侯及民族的“直接”管理权(参见 87.3)。然而,关键的转变与11世纪的改革运动有关系。当时, Augustinus(奥古斯丁)对于“人间天国”(“上主之城”)的说法以及对 Petrus(伯多禄/彼得)首席权的信仰(参见 85.2)受到广泛的支持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现在,人们不仅仅认为,教会在“自己的领域”中应该有自由权利,而且还认为,宗教的权威在高级文化生活的一切领域中都应该引导基督宗教的世界——这被视为正确的秩序,就是上主的旨意。在“授权之争”中,教宗摆脱了国度的控制,而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有意识地宣布,宗座凌驾于皇帝及一切其他世俗权力之上(参见 104.2)。这样,当时的教会希望能够保持正义的统治和世界在道德上的革新。如果不从这种宗教信仰的角度分析“世界统治权”,就无法全面理解这种思想。宗座在政治上的崛起并不是来自“篡位”或“暴力”,而是一种很自然的、有内在目的性的发展的结果。那些后人伪造的地位或文献,比如“君士坦丁的赠予”(参见 85.3)或“伪伊西多尔教令集”(参见 87.4)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从来不是最基本的或最关键的因素。

111.2 教宗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关于国度和教宗之间的关系的眼光曾经引起了很多争论。他认为,基督给予了圣 Petrus(伯多禄/彼得)及他的接班人一种无限的“结合和解开的权力”(参见《玛窦/马太福音》Mt 16:19)。他说,如果宗座能根据神权法律审判那些宗教性的问题(spiritualia),为什么就不能审判那些世俗的事呢(saecularia)?(参见 Reg. IV, 2; IV, 24; VII 14a VIII, 21)他认为,光荣的君王基督规定 Petrus(伯多禄/彼得)宗徒/使徒是世界各国的君主(principem super regna mundi constituit, Reg. 1, 63)。根据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的说法,宗教的权威直接来自上主,但世俗的权威的来源是人性的骄傲(illam superbia humana repperit, hanc divina pietas instituit, Reg. IV, 2),而且世俗

的权力被深深卷入到不义和罪恶中。然而, 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并不是说, 国度本身是魔鬼和罪恶的工程, 因为他在这里仅仅指那些外教国度或在基督宗教国度中那些不正义的统治者——他们仅仅看到自己的利益, 他们不寻求上主的事务。另外, 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也说, apostolica potestas(宗座的权力)和 regia potestas(王权)都是上主分配的, 它们要像太阳和月亮那样管理世界[给英国的 Wilhelmus(威廉)王的信, 1080年, Reg VII, 25]。在授权之争中, 这位教宗也始终追求了两个权力的合作, 这样使人类受益。然而,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认为, 教宗是最高的牧者和裁判者, 所以他也有权力绝罚那些不正义的君主们——被开除教籍的国王似乎无法维持他的统治(参见 99.4)——而教宗认为, 可以弹劾他们, 解开他们臣民的服从义务, 并将他们的统治权和财产交给别的统治者(参见 Dict. 12, 27; 参见 104.2)。他的观点大概是一种“教会对世俗事务的直接权力”(potestas directa ecclesiae in temporalia), 而不仅仅是一种“间接的权力”或一种“来自罪的考虑”(ratione peccati)的权力——这都是 13 世纪以来的教会法学家用的术语。无论如何, 靠着所谓的 *Donatio Constantini*(《君士坦丁的赠予》, 参见 85.3)后来有几个教宗要求这样的“直接权力”, 就是 Gregorius IX(额我略/贵格利九世)和 Innocens IV(依诺森四世)——他们面对了 Fredericus II(腓特烈二世)皇帝的压力, 以及 Bonifatius VIII(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八世)在他于 1302 年发表的 *Unam sanctam*(《唯一至圣》)诏书——他与法国的 Philippus(菲利普)王进行过搏斗(参见 137.3)。

111.3 教宗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准备的新教会政策——可以称它为 Hierokratie(“神权制度”)或 Kirchenstaatshoheit(“教会在国度中的主权”)——在 12、13 世纪中获得新的发展, 而一些很杰出的教宗(他们也是教会法学家)在理论和实践中相当成功地坚持了这个观点, 就是 Alexander III(亚历山大三世), 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 Gregorius IX(额我略/贵格利九世), Innocens IV(依诺森四世)和 Bonifatius VIII(博尼法奇乌斯八世)。除了以前关于宗座和皇帝的比喻, 现在的人更喜欢用“两把剑的比喻”, 这是一个来自圣 Bernardus(伯尔纳德)的比喻: 教会拥有两把剑, 即宗教的和世俗的权力(根据《路加福音》Lk 22: 38 的解释)。第一把剑是教会自己掌握的, 但第二把剑是皇帝们和王侯们根据教会的指导和意愿发挥作用的。最后, 那些太强调教廷权力的人认为, 世俗的权力都来自宗教的权柄, 皇帝的王权等于是教宗的封臣的权柄, 皇帝仅仅是教宗的委员或臣民

(vicarius, officialis, vasallus)。这些在中世纪高峰时期或多或少实践出来的观念交给教宗一个巨大的政治权力,真是一种“世界性的大权”。当然,也有一些人反对这种权柄,因为除了 papalistae(教宗派)或 Guelphi(归尔甫派)以外,还有那种认为教宗和皇帝是平等的,皇帝的权力是独立的 Ghibellini(吉伯林派,参见 139.2)。然而,教宗在政治上的主权在很多地区都被承认,而西欧人大多都很尊敬教宗的权威性。通过这种权威,教宗完成了这个任务:结合各种民族,使他们接受基督信仰的种种价值,保护他们不受某种自私的统治者的剥削。教会和宗座主权所包含的种种危险也在那个时期中显示出来。因为教宗的“神权统治”(paepstliche Hierokratie)并不属于教会的本质特征——它受了当时历史的影响,所以在中世纪高峰时期的“普世主义”(Universalismus)开始解体时,它也让步于另一些观点。

111.4 教宗对于世俗王侯们的优先权的象征性表现是 osculatio pedum(亲脚)和 officium marscalci sive stratoris et strepae(牵马的服务和拿马镫的服务)。在早期,第一种仪式(亲脚)也曾是其他的主教接受的敬礼,但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的《教宗敕令》说(第9条): Quod solius papae pedes omnes principes deosculentur(“只有教宗的脚一切君主们可以亲吻”)。在 1155 年, Fredericus(腓特烈一世)在 Sutri(苏特瑞)拒绝了给教宗提供“牵马的服务”——这种服务是 Pippinus(丕平)于 754 年向 Stephanus I(斯德望/斯提反一世)所完成的。1155 年,皇帝的态度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参见 107.1)。就宗座与德国国王(德国皇帝)的关系而言,自从 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以来,人们的普遍观点是, Leo III(利奥三世)曾经从希腊皇帝那里转移了皇权,将它交给法兰克人(参见 86.5)。因此,教宗也要求“检验和批准”德国国王的选举,并在皇帝缺位时代替皇帝管理在意大利的帝国地区。有的人甚至认为,德国选帝侯的选举权是教廷给予的权利,随时都可以收回来。在加冕礼之前,德国皇帝必须给罗马教会宣发一种“保护誓言”(这就是“加冕誓”),也必须宣发“忠于教宗,保卫教宗”的誓(iuramentum fidelitatis, securitatis)。根据所谓的 Donatio Constantini(《君士坦丁的赠予》,参见 85.3)以及根据 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在 1198 年对于德国“两个国王当选”的介入(参见 123.3),第 13 世纪的领先教会法学家们都认为,皇帝的“忠于教宗誓言”应该算为一种“封臣”的誓,而 Clemens V(克雷孟/革利免五世)就 Henricus VII(亨利七世)等人的誓言明确说,这是“封臣”的誓言[参见他 1314 年的 Bulla(诏书) Romani Principes; Corpus iur. can. c. un. in Clem. de iureiur. II, 9]。自从 13 世纪以来,

个别的神学家和教会法学家甚至太过分地称呼教宗为“quodammodo Deus”(“在某种意义上神”)或称“Dominus Deus noster Papa”(“教宗,我们的主和神”);在第5次 Lateranus(拉特兰)会议(1512年)上,Julius II(尤利乌斯二世)曾经被称为“alter Deus in terris”(“人间的另一个神”)。然而,中世纪的人有时候也用 Deus(“神”)来称呼皇帝。

教区管理制度及其机构

112.1 在12世纪,主教获得了更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意义,而在德意志帝国中的大部分教会长上都成为完全的“地域王侯”(vollkommene Territorialfuersten,就是说在他们的领土上拥有很多世俗权利,比如造币权,收税权等,参见 97.1; 124.1)。同时,主教们在教会上的权力减少了,这不仅是由于教宗权威的上升(参见 110),也有别的原因。当时,Domkapitel(主教大堂圣职团)的影响增长——这些圣职团的成员是那些长期在大堂任职的圣职人员,而在11、12世纪的普遍改革运动中,部分的大堂圣职团再次根据以前的老传统恢复了团体生活(参见 117.1)。这些有固定团体生活规律的圣职团被称为 canonici regulares(有团规的圣职团),但大部分的圣职还是那些没有“团规”的 canonici saeculares(教区圣职人员)。当时,“大堂圣职人员”的尊严很大,比如一些德国国王和皇帝,甚至某些教宗都在某些德国大堂或罗马大堂当了——短期或长期的——大堂圣职团的团员。

1122年的 Wormser Konkordat(《沃尔姆斯协议》)恢复了按照教规的主教选举制度,所以平信徒和其他的圣职人员都被排除,而主教的选择权属于大堂的圣职人员。1215年的拉特兰大会议已经认为,这个改革过程已经结束了(第24条)。(关于教宗从14、15世纪以来对地方主教选择的批准,参见 110.2e。)另外,大堂的圣职人员成为主教的唯一顾问。他们在教区的管理方面也获得了一些权力,正如罗马的枢机们一样(参见 110.2d)。因此在一些重大的事务上,主教需要征取他们的“同意”(consensus),或至少得听听他们的看法(consilium)。在主教去世后,这些圣职人员可以指导教区。自从第13世纪初,将要当选的主教有时候和将要选他的人签订了一些规定,即所谓的 Wahlkapitulationen(选择约定),其中限制了自己的权

利范围或一部分的收入让给那些“大堂圣职”。在很多“大堂圣职团”那里,接受新的人的前提是这个人的贵族出身;因为主教们的世俗权利越多,教区的收入也越多,贵族们就越想进入这些圣职团。当然,大部分的主教和隐修院的院长也都来自贵族的圈子里。这种现象对于教会生活在很多情况中造成了损失。

112.2 因为主教们——尤其在德国地区——因自己教区非常辽阔,又因其他事务忙,所以无法完成他们的职务,那些 archidiaconi(总执事,参见 95.1)——他们大多是“大堂圣职团”的成员——的服务范围也就扩大了。他们原来只是主教的助手,但后来开始有了司法权,并以主教的名义决定一些事。他们举办了一些“巡逻法庭”(Send),进行视察,管理堂区的圣职人员并在争论中充当裁判者。自从 12 世纪末,他们的职权又被限制。主教们开始为他们的法庭和管理制度组织一些委员和管理员,即所谓的 officialis(职员)或 vicarii generalis(英语的 vicar general,教区长,副主教)——他们是主教的代表和顾问,他们在教区中工作,而人们可以在总执事的法庭中向他们申诉。这样,总执事的地位失去了影响力。最后,Trento(特伦托)会议取消了总执事的司法权,只留下一点权力,这样总执事的职位在大部分的教区中也就消失了。

112.3 为了在主教礼仪中有一些助手,主教们为他们那些信徒众多的地区创造了所谓的 Weihbischoefe(辅理主教)和 Titularbischoefe(“名义主教”)。当时,穆斯林军侵略了东方地区和西班牙,而后来蒙古人占领了东欧地区(127.4),而在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巴尔干地区很多主教被驱逐出境,他们去了别的地区,但在他们去世后,人们还继续祝圣了他们的接班人,这样想保持对于该地区的主权,希望能够恢复那些失去的地区。这些主教被称为 episcopi in partibus infidelium(= episcopi i. p. i.,即“在无信徒地区的主教”),他们只有主教的祝圣和名义,但没有教区和实际的职位,所以这些主教进入了一些比较大的教区,在那里帮助了当地的主教。自从 13 世纪末,德国很多教区都长期存在这样的“名义主教”。

113

广大群众异端的出现。清洁派及有关的异端派别

113.1 在早期中世纪(692 - 1073 年)的时期,在西欧出现的异端只是个别现

象,而且也仅限于一些比较小的神学家的圈子内(参见 90)。然而,第 12 世纪是一个充满宗教热火和投入精神(an religioeser Glut und Einsatzbereitschaft so reichen Periode)的时代,所以出现了一些大规模的反对教会的群众运动,它们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传布到欧洲的广大地区。这些异端部分上是从古老的诺斯替派或摩尼教发展出来的,部分上是一些新的教派,这些教派的根源是一些过分的改革要求,或来自一些缺少规律的思辨妄想和情绪化的倾向(aus zuegelloser Spekulation und Schwarmgeisterei)。这些在群众中很受欢迎的教派的出现证明了一点:虽然教会的种种外在制度很发达很辉煌,但也存在着一些相当大的缺点和弱点(参见 136.1)。当时也已经有了一些严肃的人提出某些导致教派形成的不良因素——这些因素违背了福音的标准:宗教生活的外在化,教会的财富,奢侈豪华,很多圣职人员的世俗化和不忠于职责,一种很有能动性和民主意识的城民——尤其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城市中,而且这些城民通过十字军运动接触了东方人的自由主义哲学和伦理道德上的放纵态度。在 12 世纪下半叶,在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情况已经威胁到了整个教会文化,这样推动了教会和国度共同采取了非常强烈的抵抗方式。

113.2 影响最大的教派是 Cathari(清洁派),他们的名字来自希腊语的 katharoi(“那干净的人”)。他们好像和巴尔干的 Pauliciani(保利基阿尼)和 Bogomili(波格米勒派,参见 91.3)的“新摩尼教”倾向有联系。通过商人和十字军,这些教派传播到西方,并在那里与那些潜在的古老摩尼教和其他反对教会的因素结合。这个教派的来源大概是欧洲东南地区,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的名称认出:他们自称是 Cathari(清洁派),而那些反对他们的人称他们为 Bulgari(保加利亚人)、Bougres、Concorezenses、Publicani、Popelicani;意大利人称他们 Gazzari、Manichaei、Patareni。这个危险的异端在个别地方早在 11 世纪就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出现,但在 1100 年后才有了大规模的影响。它扩散到整个中欧地区,但它的主要基地是那些文化上比较发达的地区,尤其在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法国的清洁派的核心是 Tarn(塔恩河)边的 Albi(阿尔比)城,因此他们也被称为 Albigenses(阿尔比派)。这些法国清洁派人形成了一些组织完备的秘密教会,在他们的教义中,二元论世界观和对公教会的敌意获得了最尖锐的表达。

虽然清洁派分裂为几个分支,而这些分支之间没有联系,但他们的基本观念都是一样的:二元论(肯定一个永远善的和—一个永远恶的原则);轻视物质和物质生活;否认自由意志和肉身的复活;要求严格的刻苦;基督论上的“幻象论”

(docetism)。他们憎恨并摒弃一切外在的教会制度,即司铎制度、圣统制、诸圣事、祭坛、十字架、对圣像和圣髑的尊敬,他们反对誓言、战争、死刑和世俗的权威。这个教派的核心是所谓的“完人”(perfecti, bonhommes, 亦称 apostoli 宗徒/使徒),他们人数不多,愿意通过极端贫困的生活和通过各地周游和讲道革新教会。对他们来说,婚姻等于是支持物质生活,所以被禁止,他们也不能有任何财产,并且不可以吃肉(但可以吃鱼)。这些“完人”当中有一些主教和执事,也许也曾经有一个“清洁派教宗”(Nicetas 尼克塔斯)。加入“完人”圈子的人必须经历长期的考验(“慕道期”),然后他们接受“圣神/圣灵的洗礼”(亦称“安慰”,即 Consolatio),这是清洁派唯一承认的“圣事”。通过“完人”的覆手礼,一个人接受这种“圣神/圣灵的洗礼”,同时又接受 Paternoster(天主经/主祷文)为恒定的祈祷。如果一个“完人”犯了重罪(违背上列的规定),他们再次施行这种“圣事”,恢复他的“完人”状态。

他们大部分的“平信徒”(credentes, 亦被称为 auditores“听道人”)在外表上与大公教会保持联系,他们仅仅承诺一点:他们在临终时将要接受那个赖以得救的“安慰”圣事,这成了他们的一个许诺(convenenza)。他们不需要遵守那些严格的道德规律。虽然有人曾经控诉清洁派的人没有道德规律,但这些控诉好像是没有根据的。然而另一个事实令人感到担忧:有的“完人”——尤其是那些在重病的情况下接受了圣神/圣灵洗礼的人——愿意绝食死掉(所谓的 endura“坚持”)或被自己的亲戚杀害,这都是因为这些“完人”不愿意违背他们的严格规律。

113.3 另一些教派团体和清洁派多少有一些关系。比如一位荷兰平信徒——名为 Tanchelm(= Tanchelin 坦赫林)——曾经于12世纪初激烈地攻击了教会的圣职人员,说他们的圣事无效。他宣布自己是上主的儿子,公开地与一个圣母像“结婚”。在1151年,一位司铎打死了他。他在 Antwerp(安特卫普)及荷兰地区的其他城市都有一批拥护者,但圣 Norbertus(诺伯特,参见117.2)和他的修士很成功地使这些人皈依正统的教会。

来自 Britannia(布列塔尼)地区的 Eudon de Stella(欧登,或称 Eon 欧恩)传播了一些“末日”的思想,并说自己是“世界的审判者”:他认为 per eum qui venturus est iudicare vivos et mortuos(“将要来审判生者死者”)中的 eum(“他”)就是指他自己(而不是指基督)。1148年在 Remi(兰斯)召开的主教会议以“精神病患者”对待了这个人并将他关进一所隐修院。他不久后去世。他的一些坚定的追随者被烧死。

在法国的东南地区, Petrobrusiani(伯多布汝西阿尼)的影响更大一些。他们的

创始人是 Petrus de Bruys(布汝西的伯多禄/彼得),他是一位司铎,他曾经 20 年之久激烈反对小孩子的洗礼、感恩祭中的圣体/圣餐、弥撒礼、教堂楼房、对苦像的尊敬等等。在乡下的民众当中,他获得了很多支持者,但在 1132 年或 1133 年的圣周五他想举行一个“焚烧十字架”运动并在 Arles(阿尔勒)附近的 St. Gilles(圣基尔)准备了一大堆木柴;然而,当地的民众很愤怒,在这个木柴垛上烧死了他。他有很多支持者也接受了一些清洁派的思想因素,其中最有影响的拥护者是 Henricus de Le Mans(亨利,也错误地被称为 Henricus de Lausanne),他原来是一位本笃会会士(也许在 Cluny 克吕尼修道的人?)及 Le Mans(勒芒)的大堂讲道士,他一直到 1145 年在法国的 Provence(普罗旺斯,法国南部)和 Gascogne(加斯科涅,法国西南地区)煽动了群众反对教会和圣职人员,因此圣 Bernardus(伯尔纳德)也通过某些宣传方式反对他。1139 年的拉特兰会议的文献(第 23 条)也反对了这些 Petrobrusiani(伯多布汝西阿尼)和 Henricus(亨利)的随从。

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小的教派是 Passagi(帕撒格),他们要求人们按字面意遵守 Moses(梅瑟/摩西)的法律/律法(但他们不要求举行牺牲动物的礼仪)。他们否认了基督的神性,又和 Waldenses(瓦尔多派)一样反对“外在的教会”。一位很渊博的神学家和巴黎大学的老师,伦巴第人 Praepositinus(普瑞波西提努斯)——他后来在 Mainz(美因茨)当 scholasticus(老师)——曾经在 1180 年到 1200 年间在他们中间进行传教工作,想赢得他们重返正规的教导。

114

瓦尔多派。12 世纪末之前对它的镇压

114.1 中世纪教会的权力地位和它的财富曾经多次成为一些相当严重的弊端的根源,而那些异端人士反对教会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些:权力腐败,财产过多。因此,一些很虔诚的人怀着崇高的理想,他们想恢复耶稣和早期教会的贫穷生活的精神,他们愿意通言词和生活榜样教化人民群众。比如 Robertus de Arbrissel(阿比色的罗伯特,参见 116. 2b)、Xanten(克桑滕)的 Norbertus(诺伯特,参见 117. 2)和 Franciscus de Assisi(阿西西的方济各,参见 129)及其友人很忠于教会,但同时也培养了 paupertas apostolica(“宗徒/使徒们的神贫”)和 praedicatio itineraria(“巡回传

教”)的理想。这些人和教会没有发生冲突。在初期阶段,Waldenses(瓦尔多派)的创始人与他们很相似,他所创立的教派仅仅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开始反对教会,最后成为一个异端者的运动。该教派的人甚至从中世纪晚期以来都传播了一些传奇说:他们的教派是由宗徒/使徒们(Paulus 保禄/保罗, Jacobus 雅各伯/雅各等人)创立的,又说是在 Constantinus Magnus(君士坦丁大帝)的时代创立的——与“君士坦丁皇帝向罗马教会的赠予说”(参见 85.3)是互相对立的,但这些说法都不能成立,虽然 Waldenses(瓦尔多派)的人一直到今天还坚持这样的说法。他们的创始人是一位富裕的商人,即 Lyon(里昂)的(名为 Petrus 伯多禄的?)Waldes(瓦尔多)先生。他曾经阅读《圣经》,深受感动,因此让两个圣职人员将《圣经》译成 Provence(普罗旺斯)语(即一种意大利语和法语混合的语言)。他还因阅读圣 Alexius(阿雷克修斯)的传说被感动,因此要放弃世俗的生活,将自己的地产交给妻子,将其他财富在 1176 年的饥荒时期送给穷人。一些怀着同样心情的男女跟随着他。他们就根据《福音书》的教导(参见《玛窦/马太福音》Mt 10: 5ff 和《路加福音》Lk 10: 1ff)开始两个两个地巡回传道,作忏悔布道,身穿简朴的服装,过着宗徒/使徒们的贫穷生活。这个运动不久后传播到远处,也影响了伦巴第(米兰)地区的 Humiliati(卑微派)——他们是一个平信徒的弟兄会,大部的成员是一些生产布的工人,他们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修会(参见 117.3b)。这样,Waldo(瓦尔多)的随从有了一定的发展,他们也被称为“Lyon(里昂)的穷人”或 Leonistae(“来自里昂的人”)或称为 Sabbatati(“撒巴塔提”或 Insabbatati“因撒巴塔提”),因为他们穿着木头制的鞋子(所谓的 sabots)。然而,因为他们没有获得教会官方的许可就进行传教,并且谴责了一些圣职人员在道德上的缺点,所以 Lyon(里昂)的总主教禁止他们公开地宣讲,并将他们驱逐出境。因此,Waldo(瓦尔多)向 Alexander III(亚历山大三世)教宗写信,并亲自在第三届拉特兰主教会议上出现(1179 年)。教宗规定,他们需要教会的许可,才可以公开地讲道。他们一开始接受了教会权威的规定,但不久后又依赖于《宗徒大事录/使徒行传》Acts 5: 29 的记载(“应该服从上主”)而反对教宗的决定,所以 Lucius III(卢修斯三世)教宗于 1184 年在 Verona(维罗纳)的主教会议上(参见 107.6)不仅仅绝罚了清洁派、Passagi(帕撒格)派和 Arnoldus(阿尔诺德)派,而且也绝罚了那些“卑微派或里昂的穷人”(即“瓦尔多派”)。现在,瓦尔多派的“弟兄”和“姐妹”必须隐退,他们暗地里聚集了一些随从(所谓的 amici“朋友”或 credentes“信者”),就是一些在生活费方面支持他们的“在世信徒”,因为他们自

己要当“完人”(perfecti),所以他们放弃了体力劳动,完全投入巡回传教工作和牧灵工作中。他们宣发三个圣愿,就是“神贫”、“贞洁”和“服从长上”的圣愿,因为他们要服从那些“上主拣选的”Waldo(瓦尔多)以及他所祝圣的主教、司铎和执事。他自己被称为 praepositus et pontifex omnium(一切人的长上和大司祭)。他们将《圣经》翻译成各地的语言并热忱地劝勉人们阅读《圣经》,宣布它为绝对的标准和法律准则。在后来的过程中,尤其意大利地区的瓦尔多派更进一步离开了公教会,因为他们——大概受了清洁派的影响——放弃了关于“炼狱”的教导、为亡者的祈祷、为亡者举行的弥撒、对圣人/圣徒的尊敬、大赦、誓言、服兵役、及死刑。他们仅仅承认圣洗圣事、圣体(圣餐)圣事和告解圣事。

114.2 这种 Waldenses(瓦尔多教派)组织的统一性没能维持很长时间。因为伦巴第(意大利北部地区)的瓦尔多派也要求祝圣自己的长上——虽然 Waldes(瓦尔多)不同意他们的要求——并且继续坚持他们的“工人组织”以及他们那种收入很高的职业(织布工),所以大约在1210年发生了法国地区和意大利地区瓦尔多派的破裂,而在创始人去世(1217年)之后,这个分裂继续存在。在法国的瓦尔多派(所谓的“家族联盟”,主要限于 Languedoc, Provence 和 Dauphine 的法国南部地区)虽然有自己的特殊教导,但仍然保持与大公教会的联系,甚至也参与公教会的礼仪。与此不同,意大利的瓦尔多派越来越激烈地反对公教会,因为他们宣布公教会司铎的圣事无效,并且开始自己组织他们的礼仪。这种伦巴第(意大利)分支拥有很大的生命力和能动性。通过偷偷地传播,他们不仅仅传入法国东南部的 Savoy(萨瓦)和意大利北部的 Piemonte(皮埃蒙特),而且也影响了德国东南地区以及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南部;他们的支持者也相当多。宗教裁判所一直到中世纪末期都需要处理他们;很多瓦尔多派人士受火刑,但部分的人通过和平方式皈依了正道(参见 132.1:所谓的“公教的穷人运动”,“和好的伦巴第人”)。在15世纪,在波希米亚的瓦尔多派人与 Hus(胡斯)派人及“波希米亚兄弟”(参见 148.6)融合了。在16世纪,法国南部地区的瓦尔多派加入了 Calvin(加尔文)派,这样终于离开了罗马公教会。在 Savoy(萨瓦)的公爵 Victor Amadeus II(维克托·阿马德乌斯二世)支持“对立宗教改革”运动,因此大约有2500个瓦尔多派人士移民到德国,大部的人进入了 Wuerttemberg(符腾堡)公国,在那里形成了9个独立的瓦尔多派区,它们于1821/1823年才和当地的路德宗教会结合。今天仍然有23000个瓦尔多派信徒,大多在意大利。

114.3 教会从一开始就抵抗了当时的种种异端,尤其是清洁派的异端,而因为那些“和平的手段”(即劝告和教导)在很多地方没有效果,所以教会也请世俗权力协助她,又使用了很严格的惩罚。当时的人认为,这是教会的自我保卫,是正当的、必要的作法,只有这样做才能够保卫信仰的统一和基督宗教的社会秩序,因为异端不断攻击和威胁了这个秩序。古代的基督徒皇帝,尤其是 Theodosius Magnus(特奥多西大帝)和 Justinianus(尤斯廷尼安)曾经用“没收财产”和“流放”的惩罚来控制异端人士和分裂教会的人,甚至以死刑处罚那些“叛国者”。早期中世纪的“巡回法庭”(Sendgericht, 参见 95.3)也惩罚宗教罪行,但他们用一些宗教性的惩罚来处理异端人士,比如绝罚、鞭策或在隐修院中作补赎。然而,在 11、12 世纪的时代,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地区的教派运动非常强盛,所以意大利和法国南部的人用“没收财产”、“入狱”(immuratio)、“打烙印”或“驱逐出境”的惩罚,而法国北部和德国地区使用的惩罚已经包括死刑(上吊或火刑),尤其平信徒要求这些死刑处罚。一些有高地位的圣职人员,比如圣 Bernardus(伯尔纳德)和 Gerhoh de Reichersberg(格尔霍)曾经反对用暴力方式(比如参见 Bernardus 的 Sermo in Cant. 66 n12:“fides suadenda est, non imponenda 信仰要劝勉,不要强约束定”),但这些温和人士的声音似乎没有影响力。在第 12 世纪有几个主教会议说国君有责任惩罚异端人士,因为当时的清洁派和瓦尔多派的人越来越多。最关键的事件发生于 1184 年,当时国度和教会在 Verona(维罗纳)的主教会议上共同决定要绝罚或驱逐异端人士。当时,德国的 Fredericus Barbarossa(红胡子腓特烈)皇帝和 Lucius III(卢修斯三世)教宗宣布(参见 107.6):异端人士、他们的支持者和保卫者都将遭受绝罚(或丧失德国公民的权利,“Reichsacht”),并且要求各地的主教每年一次或两次亲自(或通过代表人物)去那些可疑的乡镇,要查清异端人士,而世俗的官员们必须根据教会的要求惩罚有罪的人。Aragon(阿拉贡)的国王 Petrus II(伯多禄/彼得二世)于 1197 年宣布了很严厉的镇压异端者的敕令,当时已经宣布异端者将受火刑。然而, Inquisitio(宗教裁判所)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却是 13 世纪的事了(参见 132)。

第四章 宗教生活和教会生活。 教会艺术、教育和科学

115

隐修生活的崛起。Hirsau(希尔骚)修院及其影响

115.1 在 12 世纪,克修和隐修生活都获得了一个人们没有预料的崛起,修道运动的影响力和扩张范围都超过了以前任何时代。12 和 13 世纪确实算为中世纪隐修传统最旺盛的时期。当时很多人愿意进入隐修院,所以形成了很多新的团体,它们同时也成为庞大组织机构的核心。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教会的改革运动的成功,而且当时的人都有很强烈的宗教情怀(der starke religioese Geist)。因此隐修传统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早期中世纪的阶段,并且对整个教会的意义也更大。在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的时代,Cluny(克吕尼)的隐修院群体(参见 101.3)始终是改革运动和教会摆脱国度控制运动的主要支撑。Cluny(克吕尼)的高峰时期和国际影响力的顶点是 Hugo Magnus(大胡格)院长的时代(1049 - 1109 年)。然而,自从 12 世纪以来,由于这些隐修院的财富较大,所以纪律松懈了,而那些新兴的修会——Cistercian(熙笃)会和 Premontre(普雷蒙特)会——获得了领先地位,他们吸引了很多男人和女人进入隐修院。这些修会也愿意为宗座服从,就是说他们在完成教会的牧灵工作、道德工作以及教会政策方面是一些很宝贵的协助者。Premontre(普雷蒙特)修会和一切有“会规”的大堂圣职团体都很有意识地向向了牧灵工作,这算是一个新的现象,因为 Benedictus(本笃)修会及它的分支的主要目标首先是通过修院中的祈祷和工作要“圣化自己”。

当时在文化上最发达的地区是法国,而教会改革最有影响的地方也是法国,所

以很多新兴的隐修团体也出现在法国,这是符合当时的宗教情况和政治环境的。这些隐修院首先模仿了本笃会的会规,这样成为该古老修会的分支。那些有会规的圣职团——他们用的是所谓的“圣 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会规”——带来了——一个新的因素,因为他们和熙笃会一样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集团”,但又受统一的领导(der Zug der Zeit nach korporativer Zusammenfassung zu grossen Verbaenden unter einheitlicher Leitung)——这一个因素在本笃会那里没有,至少在早期的时候没有。当然,那些骑士团更强调这一个特征——它们与朝圣者一起走到圣地(巴勒斯坦),在十字军时代形成。这些骑士团的慈善目标(照顾病人和朝圣者)及军事目标更迫切需要一个中央领导秩序和“单一领导者”的管理制度。

115.2 早在 11 世纪,在 Suabia(施瓦比亚)地区出现了一个本笃会隐修院,——它对德国南部地区的影响可以与 Cluny(克吕尼)在勃艮第地区的影响加以比较——就是黑森林地区 Calw(卡尔维)附近的 Hirsau(希尔骚)隐修院。在卡洛林时期(第 8 世纪)早就有了一个小教堂和一个隐修屋,但该地方后来没有得到发展。在 11 世纪,Leo IX(良/利奥九世)教宗鼓励自己的侄子 Adalbert de Calw(阿德伯特)伯爵恢复那个地方,所以在 1059/1065 年有一些来自(瑞士)Einsiedeln(艾恩西德尔恩)——也是一个“改革修院”——的隐修者来建立 Hirsau(希尔骚)修院。第二任院长 Wilhelmus Beatus(威廉,1071 - 1091 年)来自 Regensburg(雷根斯堡)的 St. Emmeram(圣艾梅兰)隐修院,他是一位具有热忱、毅力和才华的人。他亲自从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那里获得了一个保护文件(参见 101.2),这样没有遭受当地地主的干扰。他介绍了 Cluny(克吕尼)的修道制度,仔细规定一切修道生活的习俗和惯例(1079 年)。Cluny(克吕尼)隐修院已经有了一个管理那些“平信徒修士”的机构(fratres conversi,参见 101.2),他们完成了那些重大的需要体力劳动的项目,而 Hirsau(希尔骚)进一步地发展了这个制度,又创立了一种“第三会”,就是在世俗社会中的一些男人或妇女也可以加入一种“修道协会”,但不必出家进入隐修院。在建立教堂方面,Hirsau(希尔骚)的修士也有良好的贡献,他们以早期罗马式建筑风格建立了好几个教堂。Wilhelmus(威廉)自己建立了著名的 St. Peter - und Paulsmuenster(圣伯多禄圣保禄修院)。以 Hirsau(希尔骚)为母修院,他们创立了 22 个新的隐修院(最有名的是 Blaubeuren, Zwiefalten 和 St. Georgen),并恢复或改革了 68 所已有的修院团体。Hirsau(希尔骚)的会规(所谓的 Consuetudines Hirsaugienses)传播到很远的地区,比如到(奥地利南部的)Steiermark

(施蒂利亚),到 Sachsen(萨克森)和 Thuringia(图林根)地区。Cluny(克吕尼)当时形成了一个真正的“修会”,但 Hirsau(希尔骚)没有获得对于它改革的修院的“管理权”,所以也没有形成一个“修会”。在授权之争中,Hirsau(希尔骚)的院长 Wilhelmus(威廉)曾经是 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派的坚定支持者,而他的隐修院成为西南德国地区教会改革运动的重要基地之一。对立国王 Rudolphus de Suabia(鲁道夫)在 1077 年的圣神降临节时期在那里居住。Hirsau(希尔骚)的隐修者在很多地方讲道来反对当时的对立教宗 Wibert - Clemens III(克雷孟/革利免三世,参见 105.2)。这些修士的刻苦精神也感动了很多。Wilhelmus(威廉)院长的一个学生 Gebhardus de Zaehringen(格布哈德)登上了 Constantia(康斯坦茨)的主教座(1084 - 1110 年)。Hirsau(希尔骚)的旺盛时期一直维持到 12 世纪中叶,自那以后开始了经济和纪律上的衰落。

116

加都西会、熙笃会和其他的遵守本笃会规的修会

116.1 那个称为 **Carthusiani**(加都西会)的修会的最初形式是一个小小的团体:那位曾经在 Remi(兰斯)当大堂老师(Domscholasticus)的圣 Bruno de Colonia(科隆的布鲁诺)于 1084 年在 Grenoble(格勒诺布尔,法国东南部)附近的山谷 La Chartreuse(加都西)创立了一个小团体,当时只有 6 个隐修者。圣 Bruno(布鲁诺)一直反对 Remi(兰斯)的总主教 Manasse(马纳色)的舞弊和买卖活动——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于 1080 年罢免并绝罚了这个总主教——这一切事情推动了 Bruno(布鲁诺)追求一个退隐的安静生活。他的修会的特征是“严格忏悔”(strenger Bussorden),它和 Camaldoleses(卡马尔多里会,参见 101.4)一样结合了独修生活和团体生活。它的基础还是本笃会的会规,但有一些更严格的规定。Urbanus II(乌尔巴努斯二世)教宗于 1089 年要求 Bruno(布鲁诺)去罗马当教宗的顾问,所以这个圣人在 1091 年在意大利南部的 Calabria(卡拉布里亚)的 La Torre(拉托瑞)建立了第二个隐修院(1091 年),并在那里去世(1101 年)。母修院第五位院长 Guigo(古依格,1137 年去世)是一个有崇高精神的人和“默观”的大师(著有 *Meditationes*《默想集》),他写下他们的会规。他们的规戒是保持缄默(说话的机

会很少),完全不吃肉类,除了祈祷以外还得工作(主要是在果园种地和抄写书籍)。Carthusiani(加都西会)会士的衣服是白的,隐修者居住的小屋(*cella*)是一些小房子,靠着隐修院的围墙,彼此之间有一点距离,每一个小屋周围有一个花园。由于它的严格要求,这个修会的传播很慢。在高峰期(14世纪)Carthusiani(加都西会)总共有180个会院,其中有12所修女院,因为早在12世纪形成了一个修女部。这个修会可以感到很自豪,因为它曾经是文化的开拓者,在灵修神学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而在几百年的历史过程中,他都不需要做进一步的改革。在法国革命后,他们的母修院被占领,但在1940年,隐修者们能再次居住在这个古老的修院当中。

116.2 同样以圣Benedictus(本笃)会规为蓝图而建立的小型的新兴修会——它们建立在11、12世纪——还有这些:

116.2a 第一个是Grandmont(格兰德蒙)的修会,会祖是圣Stephanus de Thiers(斯德望/司提反),他曾经在Limoges(里摩日)附近的Muret(慕瑞)地区于1076年建立了一个隐修院。在他去世后,隐修者们迁居到附近的Grandmont(格兰德蒙),修会因此地而得名。会规要求过非常朴素的生活。这个修会在法国地区有相当多会院,也传到英国。然而,早在12世纪出现了一些纠纷,因为平信徒修士和司铎修道者关于隐修院的管理制度有不同的看法。

116.2b 那位杰出的忏悔讲道者和巡回传教士Robertus de Arbrissel(罗伯特,1117年去世)于1100/1101年在Angers(安杰)附近的Fontevrault(冯特沃,=Fons Ebraldi厄巴德泉)建立了Fontevrault(冯特沃)修会。修道者是那些被称为pauperes Christi(基督的穷人)的男女,而他们的会规是本笃会规的改写版本。这个修会的特点是严格的补赎以及男修院和女修院的共同管理制度,Fontevrault(冯特沃)的女院长同时也是男修院的领导——这种“修女管理修士”的规定是为了表示对圣母的尊敬,参见《若望/约翰福音》Jn 19:26f的记载。和Grandmont(格兰德蒙)的修会一样,Fontevrault(冯特沃)会也在法国革命中被消灭。

116.2c 德国的Schottenmoenche(苏格兰会)是本笃会的分支,其根源是爱尔兰人Marianus Scottus(斯格托)于1075年和两个朋友在Regensburg(雷根斯堡)附近建立的Weih St. Peter(维·圣伯多禄/彼得)隐修院。然而,后来的主要修院是1090年在Regensburg(雷根斯堡)附近建立的St. Jacobus(圣雅各伯)隐修院,它又成为别的修院的母院。他们的修会一共有12所隐修院,在学术方面有杰出的贡献。自从14世纪以来,一些德国修士接管了爱尔兰人建立的修院,但在Erfurt(爱

尔福特)和 Regensburg(雷根斯堡)继续有一些爱尔兰或苏格兰的修道者,一直到 19 世纪。

116.3 熙笃会(Ordo Cisterciensis = OCist)的创始人应该是一个本笃会院长,即 Robertus de Molesme(罗伯特),他本来在 Langres(兰格)教区指导一个修院,但不满意于修士们的态度,所以于 1098 年率领 20 个修士在 Dijon(第戎)附近的 Citeaux(= Cistercium 熙笃)的荒凉地区建立了一所改革隐修院。他的初衷是恢复本笃会会规的纯正性和严格标准。然而,修士们不久后作出了一些改变,所以这个新团体称之为本笃会的分支不如称它为一个独立的修会。在 Robertus(罗伯特)的继承人 Albericus(阿尔伯里克,1099 - 1109 年)的时代,修士们放弃了原来的黑色本笃会会服,穿上了一个白色或灰色的,没有经过染色的羊毛布的会服(因此他们被称为 monachi albi, monachi grisei“白修士”)。Citeaux(熙笃)第三任院长 Stephan Harding(哈丁,1109 - 1134 年)是一位出生在英国的人,他编写了修会的会规,即所谓的 *Charta caritatis*(《仁慈宪章》,1119 年);这个《会规》要求极端的贫穷和朴素,连在教堂内都要求简朴(比如不可以有石头建立的塔楼,教堂内不可以有装饰品或豪华的布置,圣物也必须很简单)。另外,他们强调体力劳动的必要,还拒绝了“豁免权”(exemptio),这样他们还属于本地主教的管辖,至少在开始是这样的。Cluny(克吕尼)的修院拥有一些属于他“本有的”教堂以及来自它们的收入(什一税等,参见 96.3),但 Citeaux(熙笃)故意地放弃了这些,也没有租出自己的地产,仅靠自己的平信徒修士(conversi,参见 101.2)来自自己在那里种地;这些平信徒修士现在和“司铎修士”有更清楚的区别。

然而,Citeaux(熙笃)隐修院的严格苦修精神并没有吸引很多人加入他们的行列。这个修院已经面临关闭的危险,但圣 Bernardus(伯尔纳德)突然创造了一个很大的转变。他被称为 12 世纪最伟大的精神领袖(der groesste Geistesmann des 12. Jahrhunderts),又被称为熙笃会的“第二创始人”。他给熙笃会带来自己的特征,而他们有时候也被称为 Bernhardiner(伯尔纳德会会士)。Bernardus(伯尔纳德)约于 1090 年出生于 Burgundia(勃艮第)的高级贵族,早就表现出非凡的才华、优雅风度、纯洁的信仰和对修道生活的热切渴望。在 1112 年的复活节,他和 30 名勃艮第贵族人士一起——其中有他的四位弟兄和一位叔叔,都是因 Bernardus(伯尔纳德)劝勉而修道的人——敲开了 Citeaux(熙笃)修院的门。现在这个修道院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几年以内,他们必须建立四个新的会院,就是 La Ferte(拉费

特)、Pontigny(彭提尼)、Clairvaux(明谷)和 Morimond(摩瑞蒙)。从此以后,这些修院和 Citeaux(熙笃)一起形成了整个修会的“五所母院”(lineae)。在 Clairvaux(= Clara vallis 明谷)修院, Bernardus(伯尔纳德)自己任院长(当时才 25 岁)并明智且坚强地指导这个团体 38 年之久,一直到他去世那一天(1153 年 8 月 20 日)。Alexander III(亚历山大三世教宗)于 1174 年宣布他为教会的圣人/圣徒。他的工作和讲道也深深地影响了教会发展(参见 106.2,5; 109.2; 113.3; 118.3; 121.5; 122.2)。首先,圣 Bernardus(伯尔纳德)有严格克己和苦修(mortificatio)以及隐退的精神,他很热切地投入默观的种种奥秘中,这样他也成为中世纪基督神秘灵修(Christusmystik)的奠基人。然而,当时的需要多次强迫他离开修院并且公开地说话。这样,他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对于一系列重大事务甚至有关键性的影响:在两个教宗的分裂(Anacletus II 阿纳克雷图斯二世和 Innocens II 依诺森二世)中他缔造和平;面对着一些过分的要求(Arnoldus de Brescia 阿诺德,参见 106.5),他主张真正的教会改革;在神学错误(Abaelardus 阿伯拉德)和异端(Petrobrusiani 伯多布汝西阿尼)面前,他保卫了纯正的信仰;他曾经宣讲十字军运动和忏悔,也当过教宗们(尤其是 Eugenius III 尤金尼乌斯三世)、主教们和国君们的顾问;有人曾说他“几十年当了欧洲的统治者,只是头上没有戴冠冕”。然而,在这一切活动中,他所追求的并不是教会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而是天国在人间的精神力量,而这个精神力量需要信仰的种种因素的自由发挥(geistige Herrschaft des Reiches Gottes durch die freie Entfaltung der Kraefte des Glaubens)。这位 Bernardus(伯尔纳德)曾经坦诚地谴责了罗马教廷的一些弊病,也警告了某些圣职人员的圈子,劝他们不要继续走世俗化的路线。

116.4 由于圣 Bernardus(伯尔纳德)的影响,Ordo Cisterciensis(熙笃会)在 12 世纪成为整个基督宗教世界最有威望的修会。它迅速传播到欧洲各地,尤其在法国和德国地区。单独 Clairvaux(明谷)修院在 1153 年之前就成为 68 个新的修院的母修院。在 Bernardus(伯尔纳德)去世的时候(1153 年)已经有 300 多所熙笃会会院,而到 1300 年大约有 700 所男修院。那些与男修院有关系的女修院的数目大概更多,虽然 1228 年的熙笃会大会已经规定不可以再接受女修院或创立修女院。一切熙笃会的教堂都奉献给圣母玛利亚。熙笃会也是第一个具有一个名副其实的“修会制度”的修会(就是一个组织许多会院的具体制度)。第一个会规 Charta Caritatis(1119 年)已经规定,母院的院长必须每年去他的“子院”进行视察。另外,

所有的院长都必须每年在 Citeaux (熙笃) 的母院中聚会一次开一个“大会”(capitulum generale)。母修院是“总会长”的居所,它拥有最高的监督和立法权威性。这种制度后来也成为很多别的近现代的修会的楷模。熙笃会在开拓荒芜地区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他们的修院经常建立在那些尚未开发的地区当中。他们培养了教会的新建筑风格,并在很多地区传播了基督宗教的文化,比如在德国的东北地区(参见 108)。他们的隐修院成为德国殖民者在斯拉夫地区中的基地,并且在很多地区成为农业技术、畜牧业知识和手工业的楷模企业。

117

有会规的圣职团。圣 Norbertus(诺伯特)和普雷蒙特会。

灵医会和平信徒的种种联会

117.1 第 12 世纪的宗教精神和刻苦精神的动力也对教区圣职人员有一定的影响,推动他们去恢复共同的祈祷生活(或说“共同的生活规律”kanonisches Leben)——在卡洛林时期,那些比较大的教堂(所谓的 Kollegiatskirchen,有圣职人员团体的教堂)曾经都有这样的圣职团,但这些团体后来又走向衰落(参见 95.4)。在 Nicolaus II(尼苛劳二世)的时期于 1059 年在罗马召开的拉特兰主教会议(参见 103.5)以及在 Alexander II(亚历山大二世)的时期于 1063 年举行的拉特兰主教会议都劝勉司铎、执事和五品人员,应该共同分享收入、住所和食品,应该过一种“宗徒/使徒式的生活”,就是说“共同的生活”。因为教会改革的主要推动者都支持这种呼吁,比如 Hildebrand - Gregor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和 Petrus Damiani(伯多禄·达米阿尼,参见 89.6)、Lucca(卢卡)的 Anselmus(安瑟伦)和 Chartres(沙特尔)的 Ivo(伊夫,参见 110.3)以及(在今天奥地利地区的)Reichersberg(瑞克斯贝格)的 Propst(院长)Gerhoh(格尔霍,1169 年去世)——一位具有威望的教会政治思想家和具有想象力的神学作者,所以教宗们的劝勉在很多地方被实行。很多大堂和“圣职团教堂”都在 11、12 世纪采取了一个共同的生活“会规”,这样就有了两种教区圣职人员:所谓的 canonici saeculares(“世俗的”教区司铎)和 canonici regulares(或称 Chorherren,即“具有会规的”圣职人员)。最普遍被接受的“会规”是根据圣 Augustinus(奥古斯丁)写的会规。据说这个会规是他写的,但实际上是第 7、8 世纪

的人根据他的著作(尤其是根据第 211 封信,就是向 Hippo 的修女团体写的信)编写的。接受这种会规的圣职人员被称为 Augustiner - Chorherren(奥古斯丁 - 圣职团)。这些团体在开始的时候彼此之间没有联系,但在后来的时期中,很多新的团体被建立,而一些旧的被革新,这样就形成了一系列的“奥古斯丁圣职团的联盟”(congregationes),而部分的“联盟”包括了一百个或更多的团体。这些团体在提高圣职人员和信徒的素质及提高群众文化方面有很大的贡献,虽然他们也许还没有非常系统地转向牧灵工作。

117.2 最大的并且最有影响力的奥古斯丁圣职团联盟是 **Premontre**(普雷蒙特)的联盟,他们亦称 Norbertines(诺伯特会)。因为这个联合会传播得很广,它和一种正式的修会有类似的意义,与熙笃会似乎是一样重要的。他们的创始人是圣 Norbertus(诺伯特,1134 年去世)。他是一位 Xanten(克桑滕)地区伯爵的儿子,先在 Henricus V(亨利五世)时当了圣职人员和宫廷司铎,但突然(于 1115 年)想放弃一切世俗的事务,所以他先在 Rhenus(莱茵)下游地区和法国地区当巡回传教士,并于 1120 年在 Laon(拉昂)附近的 Premontre(普雷蒙特,亦称 Praemonstratum)森林中创立了一个模范隐修院,指导了一批过着严格克修生活的圣职人员——这个隐修院就成为他的修会的摇篮。他们的会规基本上是 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会规,但 Citeaux(熙笃会)的规则以及 Cluny(克吕尼)和 Hirsau(希尔骚)的 consuetudines(生活规条)也影响了他的会规。与那些早期的修会团体不同, Premontre(普雷蒙特)会的人从一开始就认为,讲道和牧灵工作是他们的重要任务之一。通过 Lotharius III(洛塔尔三世)皇帝的支持, Norbertus(诺伯特)于 1126 年成为 Magdeburga(马格德堡)的总主教,即全国最有影响力的教会领导者之一(参见 106.2)。现在他使自己的修会走向 Elbe(易北)以东的地区,即 Brandenburg(勃兰登堡)、Pomerania(波美拉尼亚)和 Mecklenburg(梅克林堡),而这些团体和熙笃会的团体一样,他们对斯拉夫人的皈依和教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参见 108.2)。圣 Norbertus(诺伯特)也接受了一些妇女加入修会(所谓的 Praemonstratenserinnen,即普雷蒙特修女会),但她们的数量迅速增加,所以修会的指导人士在 12 世纪已经采取了措施来控制修女的数量,他们还限制那些“男女并行隐修院”(Doppelkloster,参见 116.2b),虽然他们的初期阶段曾经鼓励这种“在男院旁边有女院”的方式。除了这些普雷蒙特修女团体以外还存在着其他的女士祈祷团体(所谓的 canonicæ, canonissæ regulares)——他们根据奥古斯丁会规也形成了一些“联盟”,

而在很多本笃会的修女院中,修道生活的精神似乎完全消失,这个修女院成为培养贵族女士们的形式化的教育机构。

除了 Premontre(普雷蒙特)会以外,最重要的奥古斯丁会还有这些:A)罗马 Lateranus(拉特兰)的圣职团联盟;B)在法国南部 Avignon(阿维尼翁)由圣 Rufus(儒夫斯)创立的团体联盟;C)1114年在耶路撒冷建立的“圣墓圣职团”;D)巴黎 St. Victor(圣维克托)隐修院的圣职团联盟,它是巴黎大堂学校的老师 Wilhelmus de Champeaux(威廉,参见 121.4)于1108年创立的,后形成了一所著名的神学学校,其中培养了一些杰出的人士,如 Hugo de St. Victor(胡格)和 Richard de St. Victor(理查德,参见 121.6;122.3);E)1140年由圣 Gilbertus(格尔夫贝特) de Sempringham 创立的团体(称为 Gilbertines),他们只限于英国,有男女并修的修院,类似于 Fontevrault(冯特沃,参见 116.2b);F)所谓的“十字架圣职”(Kreuzherren,拉丁语 Cruciferi, Crucigeri, Ordo Sancti Crucis“圣十字架会”),这就是好几个圣职团联盟,其中有那些今天仍然存在的在比利时与荷兰的十字架会,1211年由 Liege(列日)的圣职人员 Theodorus de Celles(特欧多尔)在 Huy(胡依)城附近创立的照顾病人和传教工作的团体;还有在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地区的“红星十字架会”(Stelliferi, Kreuzherren mit dem roten Stern),他们于1234年是从一个“医疗弟兄会”发展出来的,而 Ottocarus I(奥托卡尔一世)王的女儿,真福 Agnes de Bohemia(阿格内斯)特别支持这个圣职团——她修道47年之久,当 Clara(克拉拉)修女会的修女,于1282年在 Praga(布拉格)去世。

117.3 除了这些遵守 Augustinus(奥古斯丁)会规的修会以外,在12世纪还出现了几个比较小的照顾病人的兄弟会(所谓的 Spitalorden 医护会)或一些有类似目标的协会:

117.3a 宗教的医护会包括所谓的 Antoniter(安托尼会,或 Hospitaliter vom hl. Antonius 圣安托尼的医疗会),这是平信徒修士的协会,1095年由法国 Dauphine(道凤省)的贵族人士 Gaston(伽斯滕)和他的儿子 Guerin(古艾林)在 St. Didier de la Mothe(圣迪碟)创立,因为 Guerin(古艾林)曾经患过麦角病(ergotisms)但又恢复健康,所以他们怀着感恩的心建立了这个医务会。“安托尼会”于1297年被转化为一个“有会规圣职团”的协会,他们在全欧洲有很多会院,在德国被称为 Tönniesherren(托尼会)。

法国南部 Montpellier(蒙彼列埃)的 Guido(古多)约于1180年在自己的城市建

立了 **Hospitalitas de Spiritu Sancto**(圣神/圣灵医务会,亦称“鸽子会”),不久后也传到别的城市。在罗马,教宗 **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于 1204 年委任他们照顾一所很著名的医院,即 **S. Maria in Sassia**(= **S. Spirito in Saxonia** 萨克森圣神会医院)。

另一个改变了奥古斯丁会规的修会是所谓的 **Trinitarians**(圣三会,全名:**Ordo SS. Trinitatis de redemptione captivorum** 赎回俘虏的神圣三位一体修会)。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从穆斯林军的手中解放那些当奴隶或被俘虏的基督徒,并且照顾病人。他们创立于 1198 年,创始人是圣 **Johannes de Matha**(约翰内斯,1213 年去世)以及圣 **Felix de Valois**(菲理克斯,1212 年去世)。这个修会的会院主要在法国和西班牙,他们穿着白衣,胸前有一个红蓝的十字架。

117.3b 在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尤其在米兰地区有 **Humiliati**(卑微会),他们原来是由一些工人(纺织厂中的工人,织布工)组织起来的虔诚协会。在 12 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冲突和争论中,他们由于经济和宗教的原因组织成一个弟兄会。他们中有很多人后来转向 **Waldenses**(瓦尔多派),并于 1184 年因 **Lucius III**(卢修斯三世)的规定被绝罚(参见 114.1)。然而,那些没有转入瓦尔多派的人于 1201 年被承认为一个正式的修会,其中分为三个层次:1)有会规的圣职团和女士祈祷团;2)住在隐修院的弟兄和姐妹;3)生活在世俗社会中的男女会员(所谓的 **Tertiarii**“第三会人士”),他们就继续原来的弟兄会的传统。一直到 1246 年,他们的修会才开始有一个总会长来领导他们。

117.3c 所谓的 **Fratres pontis**(= **Fratres de ponte** 桥兄弟会,——近代的人又给他们起名 **Fratres pontifices**)是一个平信徒会的联盟。他们形成于 11、12 世纪的法国南部,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建立或修筑一些桥——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受尊敬的、建立社会公益的工作;他们也给旅客创办招待所。**Lucius III**(卢修斯三世教宗,1181-1185 年)和 **Clemens III**(克雷孟/革利免三世,1187-1191 年)保护了他们。最有名的地方团体是 **Fratres pontis Avenionensis**(阿维尼翁桥弟兄会),他们自从 1177 年以来建立了 **Avignon**(阿维尼翁)的 **Rhone**(罗纳河)的大桥。那时,他们的领导是一个原来当牧童的人,即 **Benezet**(= 本笃 **Benedictus**),但他的接班人是一个正式的修会(**ordo**,1187 年)的会长。这个修会一直存在到 15 世纪,有人说 **Pius II**(比约二世)于 1459 年取缔了他们,但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证据。

117.3d 在 11 世纪的教会改革的宗教热忱的影响下,很多人愿意过“宗徒/使徒的生活”,无论是正统的或异端的讲道者,他们当时都鼓励人们过这样的生活,结

果很多妇女也开始组织起来,就是所谓的 *Beguinae* (贝居因会,亦称 *Begginæ, mulieres religiosae*)。她们一开始还没有修会的圣愿(*vota*),只是形成了一些祈祷会,在一个“师傅”的指导下居住在一些小的或比较大的“贝居因院子”里——在今天的比利时和荷兰大约还有十几个这样的“院子”。这些妇女的工作是祈祷、手工业、照顾病人、为穷人举行葬礼、教育女孩子。关于这个妇女团体的起源及她们名称的来源有很多理论。根据第 15 世纪的传说,是由 Pippinus (老丕平) 的女儿 *Begga* (贝格, 694 年去世) 创立的,但这是不可能的。当时在 *Liege* (列日) 的讲道家 *Lambert le Begue* (兰伯特, 1177 年) 也不是他们的创立人。另一些人说,他们的名称来自法国南部的 *Albigenses* (*Al - bigen - ses* 阿尔比格), 因为其中有“*bigen*”一词;但也许这个名称来自她们穿的灰色(没有经染色的布 = *bege, beige*) 的服装。“贝居因会”最早在 *Brabant* (布拉班特) 南部的 *Nivelles* (尼维尔) 出现,大约在 12 世纪末,而且大概与 *Maria de Oignies* (欧涅斯的玛利亚, 1213 年去世) 有关系。从那里,这个新的生活方式——虽然遇到很多方面(包括圣职人员)的批评——传到 *Liege* (列日) 及比利时、荷兰与德国的其他城市。那些曾经在 *Premontre* (普雷蒙特) 会或 *Citeaux* (熙笃) 会修过道但后来没有被接受入会的女士们一批一批地进入了“贝居因”的会院(所谓的 *Klausen, Sammlungen*)。教宗 *Gregorius IX* (额我略/贵格利九世) 于 1233 年给她们写了一封承认她们的信,这样她们有了一定的保障。然而,其中有一些妇女受“自由思想弟兄”的影响,不少人接受了那些“泛神论 - 寂静主义思想”(参见 131. 2d), 所以整个团体遭受了宗教裁判所的审查,而 1311 年的大公会议(在 *Vienne* 维恩) 取缔了她们的团体。然而, *Johannes XXII* (约翰内斯二十二世) 再次允许那些有正统信仰的妇女过团体生活并进行慈善工作。部分的 *Beguines* (贝居因) 团体加入圣 *Franciscus* (方济各) 或 *Dominicus* (多明我) 的“第三会”。

那些相似 *Beguines* (贝居因会) 的男人团体被称为 *Begardi* (贝哈尔德会, 亦称 *Begini*), 他们约于 1220 年出现在荷兰地区。他们的工作是照顾病人和埋葬穷人。他们的团体也传到很多地方,但没有妇女“贝居因会”团体那么多人。不久后,他们也被怀疑受异端的影响,所以在 1500 年前就消失了。

骑士团

118.1 宗教精神的新奇创造是隐修者和骑士的结合,它在十字军运动的时代出现,就是所谓的“骑士团”(拉丁语称 *ordo equitum*, *ordo militum* 等)。他们的目标是陪同那些去巴勒斯坦的朝圣者,保护他们不遭受强盗的袭击,照顾其中的病人,保卫圣地的事业并抵抗伊斯兰教。在一些骑士团里(比如“圣殿骑士团”),军事目的一开始就很清楚,而其他的骑士团后来也都比较多强调这个目的。这些骑士团的贡献在于提高了骑士的理想,给予他们一个宗教的目标,为这些人的雄心和抱负(*Tatendrang*)提供一些崇高的目标。骑士团的制度是一种严格的中央制度(*streng zentralistisch*):他们的领导被称为 *Grossmeister* [“大会长”,在 *Ordo Hospitalis*(医院骑士团)和 *Templarii*(圣殿骑士团)那里]或 *Hochmeister* [“高会长”,在 *Ordo Teutonicus*(条顿骑士团)那里],他掌握大权,只有总会可以限制他的权力。每一个骑士团中有不同的会省(按国籍或语言划分),每一个会省又分为区域(*Prioratus*)和地方团体(*Commenda*, *Komturei*)。

118.2 第一个骑士团名为 *Ordo Militiae Sancti Johannis Baptistae Hospitalis Hierosolytani*,简称为 *Johanniter* 或 *Hospitaliter* 或 *Malteser*(英语名称 *Hospitaller* 医院骑士团)。他们的起源是一个小的医院:一些来自意大利 *Amalfi*(阿马尔费)的商人约于 1050 年为那些去巴勒斯坦的朝圣者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一所医院,将它奉献给圣洗者若翰(*Johannes Baptista*)。因为西方的十字军于 1099 年攻克了耶路撒冷,这个医院的意义更加重大。当时任大会长的 *Gerardus*(格拉德,约于 1120 年去世)扩大了这个团体并制定了新的组织制度,而他的接班人 *Raimundus de Puy*(瑞孟多/赖孟多,1120 - 1160 年)为骑士团编写了一个会规。他们在东方和西方都建立了很多新的会院和医院,这些医院在当时来说确实是非常典范式的医疗机构。当时的教宗们和各地的王侯都支持他们,所以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以及拥有很多财产。也许加入这个骑士团的人从一开始除了军事服务也要进行医疗服务。无论如何,军事服务的任务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在 1137 年后),所以修会的宗教意义和慈善工作的范围越来越小。同时,这个骑士团的成员分为两类:持武器的骑

士——他们的地位在团体中比较高,以及那些进行服务的弟兄(所谓的 Servites“服务者”)——他们在医院中服务。除了这些以外,该修会也有一些负责宗教生活的司铎。“医院骑士团”的骑士在家里穿一件戴着白色十字的黑色外套,但在出兵时穿一件戴着白色十字的红色外套。

118.3 最古老的名副其实的“骑士团”是 **Templarii**(圣殿骑士团,即 *Milites templi* 或 *Equites templarii*, 英语称 *Templars*), 他们约于 1119 年在耶路撒冷成立。当时有 8 位法国骑士在 Hugo de Payens(胡格)的领导下形成了一个团体。除了传统的三个圣愿(神贫、贞洁和服从圣愿)外,他们还宣发第四个圣愿,就是“用武器来保护和陪同那些去耶路撒冷朝圣者”。他们的名字与“圣殿”有关系,因为耶城的 Balduinus II(巴尔都因二世)王让他们住在城内一个王宫,而当时的人想,这个王宫建立在 Solomon(撒罗满/所罗门)的圣殿的位置。在开始的时候这个团体很穷,但后来经历了一种辉煌的崛起,这尤其归功于圣 Bernardus(伯尔纳德)的支持和推动。他也帮助人们在 Troyes(特洛耶)的主教会议上(1128 年)编写了这个骑士团的会规。Bernardus(伯尔纳德)曾经写了一篇赞扬这个骑士团的著作: *De laude novae militiae ad milites Templi*(《赞美圣殿骑士团的新服务》)。在 1139 年, Innocens II(依诺森二世)教宗宣布这个团体不属于当地主教的管辖(exemptio),又给予他们一些特权,所以这个骑士团逐渐获得了很多财产,他们成为最富有的骑士团,尤其在法国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在巴黎的会院(“圣殿”)似乎成了欧洲金融界的核心。除了那些贵族骑士以外,他们的成员也包括一些来自市民阶层的弟兄(负责军事或家务)以及一些圣职人员(负责宗教生活)。他们的会服是一件白色的外衣,上面画一个红色的十字。和“医院骑士团”一样,“圣殿骑士团”也很热切地投身于保卫巴勒斯坦各地的圣地,但在后来的时期,他们片面地寻求了自己的利益,这样也制造了纷争,多次违背了基督宗教的目标。

118.4 第三个大的骑士团是 Ordo Teutonicus(条顿骑士团,亦称 Deutschorden, Marienritter, Ordo S. Mariae Theutonicorum, 英语称 Teutonic Knights)。在第三个十字军运动中(参见 109.3),人们在 Acco(阿克)的军营那里创立了这个团体。当时,一些来自 Bremen(不来梅)和 Luebeck(吕贝克)的德国商人以及 Suabia(施瓦比亚)的公爵 Fredericus(腓特烈)为了照顾病人于 1189-1190 年推动建立了一个“医院弟兄会”。早在 1198 年,这个团体发展成为“德意志骑士团”(即“条顿骑士团”),他们和那些比较早的骑士团一样为自己规定了两个目标:医疗服务和军事服

务。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于1199年批准了这个修会。他们的会服是一件戴着黑色十字的白衣。不久后,这些骑士在德国也建立了一些会院,而 Fredericus II(腓特烈二世)也支持他们。因此,他们很明显变成了一个“德国的”骑士团,而“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的人士来自罗曼语地区,它们后来有国际特征,但法国人的影响比较大。在“条顿骑士团”的杰出“会长”Hermann de Salza(赫尔曼,1210-1239年)的领导下,这个团体也接受了新的任务:他们先在 Siebenbuergen(= Transsilvania 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地区)抵抗了 Cumani(库马尼),这个外教民族(1211年),并于1226年开始征服和教化 Prussia(普鲁士)地区的外教人民。这种军事-传教-殖民任务的规模很大,而条顿骑士团也很成功地完成了这个任务,这曾经被称为“广义上的十字军运动”(参见127.2)。这个地区的主教多来自条顿团体的圣职人员。在巴勒斯坦沦陷后,这个骑士团的基地转向 Venetia(威尼斯,1291年),不久后(1309年)转向 Nogat(诺格特河)边的 Marienburg(玛利亚堡,今天的波兰地区)。

118.5 在西班牙抵抗穆斯林军的奋斗(参见109.5),在1150年到1170年间导致另一些骑士团的兴起,但他们仅限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地区。他们帮助居民们摆脱了穆斯林军的镇压,在这方面具有贡献。它们的特征是“更限于国度”,“更结合与教会”的,这方面超过“医院骑士团”或“圣殿骑士团”。这些骑士团是 Calatrava(卡拉特拉瓦)的团体、Alcantara(阿尔坎塔拉)的团体、Evora(厄沃拉,或 Aviz 阿维斯)的团体,圣 Michael(弥格尔/米迦勒)天使的骑士团——他们按照 Cistercium(熙笃)会的会规生活,以及 Santiago de Compostela(圣蒂雅格)的骑士团,它后来与一个大堂圣职团合并。

119

圣事、礼仪、祈祷和节庆

119.1 在古代基督宗教以及早期中世纪的时代,所谓的 sacramentum(圣事)一般指任何神秘的、神圣的事物、教导或仪式。自从11世纪以来,处于发展中的神学界努力于更具体地澄清“圣事”的概念,这尤其受 Berengarius(贝伦格尔)关于“圣餐”的争论(参见90.6)的影响和启发。这样,他们说“圣事是一个由基督命令的有

意义的象征,它引起信徒的内在圣化”。与此有关,圣事的数目越来越清楚。自从12世纪以来,东方的希腊教会和西方的拉丁教会都认定“七项圣事”。在拉丁教会中最早的文献在这方面是来自 Gilbert de la Porree(格尔贝特)的学派的 *Sententiae Divinitatis*(《神圣的定律》,约于1147/1148年), Petrus Lombardus(伦巴第的伯多禄/彼得,去世于1160年)以及 *Decretum Gratianum*(《格拉提安教会法令集》)的几个注释者的文献(参见110.3)。

119.2 在感恩祭(eucharistia, 耶稣圣体)的管理方面发生一些变化。自从12世纪以来,平信徒仅仅接受圣体(圣饼),没有和以前一样兼领圣血。同时,只有成年人才能领受圣体,小孩子必须达到“辨别年龄”(7到14岁,或10到12岁)才能领。在传统上,那些新领洗的孩子同时也接受了耶稣圣体,但这个传统在12世纪一般都结束了。这些新的作法的目标是保护圣体不受侮辱。同时,人们也愿意尽可能尊敬和崇拜圣体。在1196年和1208年间召开的巴黎主教会议上,主教们规定在祝圣圣体后必须高举圣饼(所谓的 *elevatio*“举起”),这样一切人都有机会看到圣体和朝拜圣体。这种“带来救恩的观看”(参见 *visio beatifica*“荣福直观”)在中世纪的灵修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观看圣体,观看圣髑或其他圣物为中世纪的人带来了更深的宗教感情与体验。自从11世纪能发现这样的习惯:当圣体被送到病人时,人们在圣体前跪下朝拜。第13世纪的主教会议曾多次作过这样的规定。教宗 Gregorius X(额我略/贵格利十世,1271-1276年)也要求信徒在弥撒中跪下,从祝圣圣体时一直到领受圣体时,除非是在圣诞期和复活期。

对于圣体的崇拜的提高并不意味着人们更多次的领受了圣体。在一般的民众那里,多次领圣体的习惯早就被放弃了(参见98.3)。在11到13世纪,连那些相当虔诚的信徒或隐修者一般在一年内仅仅3次到6次领受了圣体。为了临终病人的需要,人们早就保存了一些圣体,但自从11世纪以来,信徒们在教堂中还保存了更多被祝圣的圣体。1215年在罗马举行的第4届拉特兰主教会议规定(参见第21条),每一个达到“辨别年龄”的信徒必须至少一年一次向自己的本堂神父宣告自己的罪(办告解),并且至少在复活节要虔诚地接受圣体圣事。

司铎举行弥撒的频率也降低了。上面提到的1215年的会议抱怨说,有的高层或低层的圣职人员一年内仅仅举行弥撒四五次。另一些司铎一天内几次举行弥撒(参见98.2),但第13世纪的主教会议反对这种作法。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在葬礼、圣诞节或复活节可以举行两台弥撒。1239年在 Tarragona(塔拉格纳,西班牙)

举行的主教会议规定,只有在圣诞节可以允许两台弥撒。这种规定逐渐成为普遍被遵守的习惯。另一个普遍的习惯是举行“干弥撒”(Missa sicca),就是仅仅朗读弥撒经文,但不祝圣面饼和葡萄酒,所以没有奉献礼、祝圣圣体礼和送圣体礼仪。这种作法自从12世纪一直到17世纪都有,而Trento(特伦托)的会议也没有禁止它。

关于中世纪的礼仪服装的颜色的象征意义和礼仪的神秘意义,参见98.1,2。

教会早就在Berengarius(贝伦格尔,参见90.2)的争论中确定了圣体圣血在本质上的变化,而这种教导现在获得了一个适当的概念,就是transsubstantiatio(“体变”)。好像Autun(奥顿)的主教Stephanus(斯德望/司提反,1140年去世)第一次用了这个词,但在12世纪下半叶有很多神学家和法学家都引用了它,而在第4届拉特兰会议(1215年)上,教会正式肯定了这个神学术语(会议文献第1条)。

119.3 基督徒们一般的祈祷经文一直到12世纪末都是Paternoster(《天主经/主祷文》)和Credo(宗徒/使徒式的《信经》,参见86.1关于Carolus Magnus查理曼的规定)。现在人们加上了Ave Maria(《圣母经》)。这个祷文一开始只是天使和圣Elisabeth(依撒伯尔/伊丽莎白)向玛利亚的问候(见《路加福音》Lk 1:28; 1:42)。在1250年后——也许由于Urbanus IV(乌尔巴努斯四世)教宗的命令(?)——人们也加上了“耶稣基督,阿们”,而自从15世纪,人们又加上了“求善终”的祈求(即:“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今天和我们临终时……”)。这种祈祷今天用的形式第一次出现在一个Carthusian(加都西会)会士的日课中(1563年),但“圣母经”在17世纪中叶才变成比较普遍的。

对于圣母的尊敬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而那种著名的Salve Regina(“母后,万福”)在这方面也有一定的影响。它出现于11世纪末,曾经是一个普遍被唱的祷文或赞美诗(参与第一次十字军运动的朝圣者唱它,西班牙海岸地区的水手也唱它)。这首赞美诗的作者一般都认为是Reichenau(赖兴瑙)的Hermannus Contractus(赫尔曼,1054年去世,参见89.6),但一些法国学者更多认为作者是第一个十字军运动的教宗使者Adhemar de Puy(阿德马尔,参见109.1)。将“母后,万福”用为夜祷的结束经文的习惯最早来自Dominicani(道明会)自从1221年以来的作法。

119.4 由于所谓的redemptiones(赎回),就是说通过祈祷、施舍等可能以“赎回”自己的补赎和忏悔(参见99.3),古代严格补赎纪律早在中世纪初期阶段就松懈了一些。现在出现了indulgentia(德语的Ablass,大赦),这就更缓和了忏悔的严格

标准。“大赦”逐渐代替了“赎回”的作法。大赦与早期的作法有关联,但大概不是从“赎回”发展出来的。这两种习惯在一段时期内并存。Indulgentia(大赦)指一种在告解圣事以外的赦免,就是宽赦一切或一部分的“罪罚”(Suendenstrafen)——人们本来要在人间或在地狱中忍受这些罪罚——但“大赦”的前提是“罪责”(Suendenschuld)已经被消除。这了获得这种“大赦”人们需要行善功(比如祈祷、守斋、施舍等)。自从11世纪,一些主教(首先在法国南部和西班牙北部)开始利用某些机会宣布这样的“大赦”,比如当某人建立一座教堂、隐修院、医院时,或在祝圣新教堂时,如果信徒参与弥撒或作奉献。领受“大赦”的人在开始的时候不多,后来,在12世纪有的主教也为了支持或推动公益工作给予了这种“大赦”,比如当人建立一座桥或开拓一条路或盖一个围墙或进行一些殖民地工作时。十字军运动深深地影响了“大赦”的传统。Alexander II(亚历山大二世)教宗早于1065年宣布,那些在西班牙勇敢地抵抗穆斯林军的人可以获得一切罪罚的全面“大赦”(参见109.5),而Urbanus II(乌尔巴努斯二世)在Clermont(克莱孟特)的会议上(1095年)为那些参与第一次十字军运动的人作了同样的许诺(参见109.5)。

很多人模仿了这种作法。比如,有的主教说,参与十字军运动去圣地可以获得“大赦”,但如果参与一些征服外教民族的远征(比如去克服普鲁士人、立陶宛人、蒙古人)或去镇压异端人士(清洁派,瓦尔多派等),甚至去攻击圣座的政治敌人——为了这一切也可以获得同样多的“大赦”。如果不能亲自参加就可以派遣一个代替自己的人或给一批钱也行。很多文献证明,这种“大赦”不仅仅针对教会规定的罪罚,而且人们也认为这种“大赦”具有超然的影响力,他在上帝面前有特殊意义。第12、13世纪的神学家也为这种说法提供很多理由和根据,而经院思想的高峰期[最早也许是Hugo de St. Cher(胡格),在1230年?],思想家们还提出关于“教会宝库”(thesaurus ecclesiae)的论说,就是说,基督和圣人/圣徒们的功德很大,而大赦的力量就来自这种“宝库”。教会则是这个“宝库”的管理者。另外,那个时候的神学家也已经提到这样的可能性:以“为他人祈祷的方式”(per modum suffragii)可以为亡者求得“大赦”,使亡者获益。毫无疑问,这些“大赦”完成了很多美好的事;信徒们意识到了罪恶的严重性,也促进人们为自己的罪作补赎,鼓励了人们接受圣事,激励博爱和慈善活动的精神,又推动了许多优美教堂的建立或公用的建筑物的建设。然而,“大赦”的数量和范围越来越多,所以也出现了滥用和误用的情况,这些弊端在13世纪以后越来越多,而那些有严肃信仰的人也诚心地批评

了这些现象。

119.5 因为那些“代替品”增多了,传统的“公开补赎”(比如穿苦衣等)变得越来越稀罕。人们私下进行补赎。巴黎的神学家 Petrus de Poitiers(普瓦捷的伯多禄/彼得,1205 年去世)观察到,在有的地方这种公开的补赎完全消失了。然而,在一般的情况下,它仍然存在,与那种“巡回法庭”的传统(参见 95.3)有联系,它在整个中世纪是教会的一个保持纪律的方法,在某些地区它一直到 19 世纪仍继续存在。对于补赎的具体内容和告解圣事的管理具有影响力的是 13 世纪以来的庞大“个案手册”(casuistic manuale)或“告解大全”(Beichtsummen),它们代替了原来的“告解手册”(参见 99.2)。最著名的手册是 Raimundus de Pennaforte(瑞孟多/赖孟多)的 *Summa de casibus*(亦称 *Summa de paenitentia*《忏悔大全》参见 110.3; 130.4)和 Johannes de Freiburg(约翰内斯,1314 年去世)的 *Summa confessorum*(《认罪大全》,约于 1295 年由 Berthold de Freiburg OP(贝尔托德)译成德语,有广泛的影响。

如上所述,为了管理私人的告解,1215 年的拉特兰大会议宣布了个规定,要求每一个信徒至少一年一次办“私人告解”。当代的神学也更清楚地说明这个圣事的特征。Gregorius Magnus(大额我略/贵格利)早就认为,告解圣事的核心因素是 *conversio mentis*(思想的转化,或 *contritio* 忏悔)、*confessio*(宣告)和 *satisfactio*(补赎)。自从第 11 世纪形成这样的习惯:在补赎还没有完成时,司铎就宣布“赦罪”。在 12 世纪之前,在整个基督教当中,“赦罪”的说法仍然是 *deprecativus*(“祈求式的”),就是说它是一种祈祷,但在 12 世纪中,它变成了一个 *indicative*(“审判式的”、“宣布式的”,即 *Ego te absolvo*“我宣布你无罪”),而在 1250 年后,这种新的形式很快就代替了以前的说法。

在教会中曾经有一些平信徒当牧灵者,在希腊教会一直到 13 世纪,而在俄罗斯一直到今天都有一些平信徒隐修士(所谓的 *starci, pneumatikoi*)充当“告解神父”或“牧灵者”(参见第 1 卷,68.1)。在 8 世纪以后的西方教会有这样的习惯:如果无法和一位司铎接触,人们就找一个执事或有小品的人,并且向他宣告自己的罪,而他也为罪的赦免作一个祈祷。这种“平信徒告解”大概来自思想的转变:当人们施用那些“补赎手册”时,他们更多注意到“补赎”,但后来他们更重视“宣布”和“忏悔心态”的赦罪能力(所谓的 *Kontritionismus* 忏悔主义)。这种作法被称为“平信徒告解”,虽然这不是完全对的;然而,12 世纪一直到 13 世纪中期有一些领先的神学家都认为,在严重的罪恶的情况中这种告解在临终时是一种义务。Albertus Magnus

(大阿尔伯特)甚至认为,它具有一种圣事般的效果,这来自“信仰与爱的合一”(ex unitate fidei et caritatis)。Thomas de Aquino(托马斯)称它为 quodammodo sacramentalis(“在某种意义上是圣事”)。然而,Duns Scotus(邓斯)和他的学派认为,告解圣事的本质在于司铎的赦免,所以他们谴责“平信徒告解”。实际上,它一直到16世纪还存在。

119.6 教会在12世纪有很多庆节和节日,甚至有人开始因此提出抱怨。除了主日以外,一年有40个节日。1222年在Oxford(牛津)举行的主教会甚至提到53个节日,还有21个“半节日”。一些新的普遍被接受的(或至少非常广泛的)节日是“举高圣十字架”的节日(9月14日);圣Nicolaus(尼苛劳/尼哥拉,12月6日)和圣母无染原罪(参见133.7)。除了这些以外,每一个教省或教区都有自己的特殊节日。

因为教会的礼仪——尤其在那些大的节日——有一些“戏剧特征”(dramatisch aufgebaut,就是说有不同“角色”的“对话”或“主角”的移动等等),所以这些赞美诗和“对经”发展成11世纪的“宗教话剧”(geistliche Schauspiele, Mysteria“神圣话剧”),先是复活节的话剧、苦难表演以及圣诞节的表演。不久后,所有的与耶稣有关的节日都有了一些话剧,还有那些最受欢迎的圣人/圣徒们,还有一些“教导性的”或“末日的”表演(关于亚当、先知们、反基督、世界审判的表演,关于聪明的和愚蠢的妇女的表演等)。最早的表现是在教堂中,演员都是圣职人员和隐修院的学生,他们穿着教会的衣服并用拉丁语进行表演。毫无疑问,这些表演为提高民众素质有良好的贡献。自从第12、13世纪以来,本地的语言和一些世俗的和幽默的因素进入了“神圣的表演”,这样它们成为真正的“民众表演”,演员是平信徒,表演场所是教堂前面的广场、空地、墓地、市场等。这些表演都很受欢迎,部分上一直到今天还继续演出。它们的旺盛期是第15世纪。

119.7 不太令人感到鼓舞的是另一些表演,就是那些模仿教会圣职人员的讽刺性表演,比如在所谓的Narrenfest(拉丁语:festum fatuorum,愚人节,1月1日)和“驴节”(圣枝主日)。在那些表演中,一些圣职人员讽刺了自己生活中的弊病。这些表演显示出中世纪的一个倾向,就是经常要讽刺圣职人员和隐修士,但这些表演说明,人们(和教会)容忍相当多的讽刺。一些主教会议和教宗们都反对那些举行在教堂内的讽刺表演,但没有效果。这种“愚人节”大概是古罗马的Saturnalia(萨图努斯节)的余波,它在法国特别普遍,但在西班牙和德国西部也有,它一直维持到

17 世纪,而“驴节”的寿命甚至更长。自从 15 世纪,司铎们在复活节的讲道中说一些笑话或可笑的故事,而听众应该以“复活节的笑声”(risus paschalis)回应这些笑话(笑声表示内心的解放,也是复活的意思)。这种习俗在巴伐利亚和奥地利地区保存到 19 世纪初。

120

教会艺术。罗马式建筑风格及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开始

120.1 如上所述(参见 98.6),古代教会用的“大殿式建筑风格”在早期中世纪也占有主导地位。从卡洛林和奥托的艺术风格发展出来的是所谓的 **Romanischer Stil**(罗马式建筑风格)——人们从 19 世纪以来这样称呼它,因为他们说这个风格与罗曼语言(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等)的形成过程是平行的。然而,在这种风格中,格尔曼/日耳曼的因素更多一些,而且它在那些中欧或北欧地区获得了最成熟的和最丰富的表达。最早的罗马式的建筑物在伦巴第地区(第 8、9 世纪)。在西欧,这种风格的主要代表是本笃会的隐修士。从整体来看,“大殿”仍然是标准,但也有一些重要的创新:

首先,在 Apsis(半圆形前殿)和 Langhaus(长殿)之间,他们插入了 Chor(中殿)——它是正方形的或长方形的;圣职人员(或隐修院的修士)祈祷的地方都在这里。如果这样的教堂还有翼殿,它就形成一个“拉丁式的”十字架。有的教堂甚至有两个“中殿”,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另外,中殿高一点,如果在它下面有一个 confessio(圣人的墓),而这个墓经常被扩大——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下层堂(crypta,参见第 1 卷,71.3),在那里可能有好几个圣人/圣徒的骨灰。这种地下堂在卡洛林时期已经相当普遍。另外,在古代的独立塔楼在罗马式风格那些很有机地被纳入主楼,有时候不只是一个塔楼,而是 4 个甚至 6 个,这样带给教堂一种特殊的气氛,似乎像一座堡垒。通过一些装饰拱、竖线条和柱子,原来没有任何装饰的墙壁现在获得了一些新的格式,而在横线脚经常能发现一些半圆形的或其他的花纹。拱中经常也有一些小雕像(见下)。自从 11 世纪,木制的平顶被放弃,以石头的拱顶取而代之——在古代以及在东方早就有这种拱顶。早期罗马式风格用的是 Tonnengewölbe(筒形穹顶),后来也用 Kreuzgewölbe(交叉穹窿)。因此,原来的

柱子太细,需要更后的墩。罗马式风格的另一种发明是所谓的 Wuerfelkapitell(骰子形柱头)。早期的窗子很小,后来大一些,似乎上面都是圆形的。门楼或穹窿都和窗口一样呈现出圆形,因此人们曾经称这个风格为 Rundbogenstil(“圆形穹顶风格”,“圆拱式”)。

120.2 皇帝、主教和隐修院的院长都支持这种罗马式建筑风格,它的旺盛时期大约在 1080 年到 1200 年之间。这些罗马式建筑很清楚地展现出当时的情况:宗教的理想主义被强化,教会的改革有进步,整个文化水平上升,尤其在德国。在这方面,Cluny(克吕尼)、Hirsau(希尔骚)和 Cistercium(熙笃)的隐修院有重大的影响和贡献(参见 115. 2; 116. 3, 4)。在德国地区,罗马式风格的最重要建筑物是 Speyer(施佩耶尔)的大堂[1030 - 1097 年间建设,Salier(撒里尔)王朝及后来皇帝们的墓在这里],Mainz(美因茨)大堂,Worms(沃尔姆斯)大堂,Trier(特里尔)大堂, Maria - Laach(玛利亚 - 拉克)的隐修院教堂,法国 Clermont(克雷蒙特)的大堂, Toulouse(图卢兹)地区的 St. Sernin(= Saturninus 圣塞宁)教堂,意大利 Modena(莫德纳)教堂,Parma(帕尔马)教堂和 Pisa(比萨)大堂。

一些新的因素逐渐融入这传统——它们都表达了一种新的生活意识:尖拱、棱纹式穹窿、拱扶垛以及多角形的前殿。这些因素开始改变罗马式的建筑,首先在法国。在德国,这个时代(1190 - 1250 年)的主要代表建筑是 Bamberg(班贝格)和 Limburg(林堡)。在法国地区,早在 12 世纪形成了所谓的 Gotischer Stil(哥特式)。这个名字来自 16 世纪的意大利艺术理论家(尤其是 Giorgio Vasari 瓦萨里),他们用“哥特人”风格表示这是“北方的野蛮民族的风格”。这个风格的发祥地是法国北部,更准确说是 Isle de France(法兰西岛)和 Picardie(皮卡迪),最老的文物是巴黎的 St. Denis(圣德尼)教堂,这是那位相当有影响的政治家和隐修院院长 Suger(徐格,1151 年去世)大约于 1140 年建立的一座教堂。这种早期哥特式迅速发展 to 很辉煌的程度,比如巴黎的圣母院大堂,Sens(桑斯)和 Laon(拉昂)的哥特式大堂都还是在 12 世纪建立的。英国也很早就接受了这个新的风格,比如 Canterbury(坎特伯雷)的大教堂始建于 1177 年。英国的哥特式在法国的基础上后来获得了一种有英国特征的发展。

120.3 就室内的改变而言,人们开始——尤其在隐修院的教堂中——分开“中殿”和“长殿”,也用一个高的屏幕或栏杆,有一点像希腊人的 iconostasis(圣像屏障,参见第 1 卷,71. 3)。在这个栏杆上面或旁边,他们放置一个读经台,就像古代

的读经台一样。人们就在那里宣读经文、唱圣歌或讲道,这样它被称为 Lettner(从 lectorium 读经台)或 Doxal(从 doxologia 即所唱的礼仪经文)。这种金属作的(经常是很高级的铁艺)“屏障”在中世纪以后的时期中仍然保存。当那些托钵修会于 13 世纪很热心地向群众讲道时,人们将讲道台挪向长殿。讲道台的名字是 Kanzel(来自以前中殿前的 cancelli,即栏杆)。

从古代继承过来的 Ziboriumsaltar(帐篷式的祭坛华盖,参见第 1 卷,71.3)在 12 世纪仍然存在。然而,自从 9 世纪,在祭坛的后面出现了一种小建设物(墙),称为 Retable = retrotabula, retabulum(后牌),在其中陈列种种圣物或圣髑的盒子。这个小墙开始时不高,但自从哥特式的高峰期以来,它成为一个很大的建筑物,有雕塑品和画像(双翼祭坛或圣画祭坛)。除了中心的祭坛以外(称为 Hauptaltar, Hochaltar),现在开始有几个旁边安置的“旁祭坛”(参见 98.2)。

120.4 在头 1000 年,在基督宗教的教堂中很少有雕塑品,这仍然来自对于外教人神像的反感(参见 98.6)。然而,自从 12 世纪,人们克服了早期的雕塑技术的问题并创造了一些可观的作品,用这些美化柱头、门顶、讲道台、施洗池和读讲台。仍然属于 13 世纪的作品可以在德国的 Wechselburg(委克塞堡)、Halberstadt(哈贝施塔德)、Freiberg(弗瑞贝格)、Bamberg(班贝格) Strassburg(施特拉斯堡)、Naumburg(瑙姆堡)看到。

罗马式的教堂的墙面很大,为画家提供了良好的绘画机会。绘画风格从拜占庭的严肃和严格风格向表达自由和较多感情过渡,在 12、13 世纪已经达到某种高峰。在手抄本细密画技术(Buchmalerei)方面也有很多优秀的并保存良好的作品。

在整个中世纪内,教会雕塑和绘画的目标主要是“振奋精神和提供教育”(erbaulicher - didaktischer Zweck)。几乎所有的作品是以宗教为目标的,都有象征意义。艺术家们特别注意到救恩历史的主要事项。其他的题材是社会上或世俗历史中的人,特别是圣人或创立隐修院的人,他们的画像呈现出一些宗教情怀或虔诚心灵的榜样

121

经院思想的形成及在 12 世纪的发展。共相之争

121.1 在早期中世纪,神学著作似乎都限于编写传统文献的“文选”、“摘录”或

“文集”，很少有独立研究的因素。然而，这些编写工作也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自从11世纪末以来，随着当时的宗教崛起的广泛传播和文化的提升，从这些早期的初步尝试形成了一个基本上是新的和有原创性的思想生活，其中有很多方向，但也保持了统一性，这就是所谓的 *Scholastik*（经院派，亦译“士林派”，本来的意思是“学院里的科学”*Schulwissenschaft*）。“经院”这个名称表明，这种新的科学是从哲学/神学教育工作的需要而发展出来的，并首先要为学校中的教育而服务。在内容上，它继续了所谓的“第11世纪的逻辑学派”及其对手的传统 [参见 Fulbertus de Chartres（夫尔贝特）、Berengar（贝伦格尔）、Lanfrancus（兰弗朗克）等，参见 89.6]，但现在也涉及到更早一些人的著作，即 Augustinus（奥古斯丁）、Boethius（波伊提乌斯/鲍埃蒂）、Johannes de Damascus（大马士革的约翰内斯）、Johannes Scotus Eriugena（艾利基纳）。

“经院”思想的目标和任务是建立一个令人们在各方面感到满意的哲学-神学性的世界观，就是一个统一的世界观，在其中有信仰与知识、理性和启示，都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其组成因素和推动力是 *auctoritas*（权威性，就是 *fides* 信仰）与 *ratio*（理性），而它的表现方式是 *lectio*（讲课）和 *disputatio*（辩论）。它在方法方面特别注重逻辑性和系统性（*Dialektik und Systematik*）：它以严格的逻辑性分析一切教会的教导，且解释它们，并反驳一切可以想到的反对意见，从此说明这些传统的信仰命题的合理性。最后，人们还组合这些思想结果，形成了一些统一的教导结构（所谓的 *sententiae*“诸命题”或 *summa*“大全”）。这些“大全”著作的目标非常清楚，具有圆满的完整性和严肃性，所以有人曾经将这些巨著与哥特式的大教堂加以比较，这种比较也是相当合适的。在经院思想中，人们很重视和培养哲学思考，因为哲学能够帮助人们从理性的角度来理解信仰的内容。如果称哲学为 *ancilla theologiae*（“神学的仆人”，但在后期才以尖锐的语气提出来的），这并不贬低哲学在目标和方法的独立性，也不损坏哲学本身的价值。实际上，哲学更多是神学的“朋友”或“协助者”，而不是神学的“仆人”或“奴隶”。毫无疑问，经院思想也有某些局限性：它多次太强调“权威性的证明”，片面地强调思辨性的思考，而忽略了批判性的历史研究和实验性的自然科学。然而，从20世纪初以来的勤奋研究工作表明，经院思想在整体上令人感到敬佩：它创造了一些思想方法和达到一些结果，这些影响了思想史几百年之久，今天仍然有价值。

121.2 早期经院思想（1070 - 1200 年）的主要地区是法国，当时是在教会和文

化方面最发达的欧洲国度。德国的大堂学校和隐修院学校很犹豫地开放自己,很慢才接受这些新因素,但后来也很热切地研究了它们。早期经院思想的特征仍然是 *platonisch - augustinisch* (柏拉图 - 奥古斯丁) 式的,这一点影响了人们关于所谓的 *universalia* (“共相”,即普遍的概念) 的思想,因为这些“共相”的存在和客观有效性有逻辑学、认识论和基本哲学(“形而上学”)中都有核心的意义。当时的人都投入于讨论“共相”的问题,在经院哲学的初期阶段中就引起了一个富有意义的争论。有的学者——所谓的“极端实在论者”(*realistae*)——和 *Plato* (柏拉图) 一样认为,“共相”是一个“实体”(*res*),这些共相是具体事物的“原型”(*idea, eidos*),它们存在于神的理性和人的思想中(因此,这些人的标语是: *universalia ante rem* “共相在事物之前”)。另一些人——所谓的 *nominalistae* 或 *conceptualistae* (唯名论者)——认为,只有个别事物有真实的存在,而那些综合性的概念仅仅是一些话语或名称(*nomina, voces, conceptus* ,所以他们的标语是 *universalia post rem* “共相在事物之后”,“共相只是人从具体事物归纳出来的”)。*Roscelinus* (洛色林,参见 121.4) 是后一派的主要代表,但人们很快意识到,这是一种对信仰构成危险的新教导,所以“实在论”派(初期时还是“柏拉图式的实在论”)排挤了这种思想倾向。在经院哲学的高峰期(13世纪),温和“实在论”占有主导地位,这就与 *Aristoteles* (亚里士多德) 一样认为,“共相”在具体事物内,并能够从这里——通过体验、感官直觉和抽象归纳——进入人心(即 *universalia in re* “事物中的共相”)。

121.3 被称为“经院思想之父”的人是 *Anselmus Cantuariensis* (坎特伯雷的安瑟伦)。他来自(意大利北部) *Piemont* (彼埃蒙特区) 的 *Aosta* (奥斯塔) 的伦巴第贵族家庭,后来当隐修者,曾在 *Normandy* (诺曼底) 的著名 *Bec* (贝基) 隐修院当老师和院长,最后当 *Lanfrancus* (兰弗朗克,参见 89.6) 的接班人,成为 *Canterbury* (坎特伯雷) 的总主教和英国的 *Primas* (首席主教,1093 - 1109年)。在这个重要位置上,他是一位杰出的牧者,在授权之争中很坚定地保卫了 *Gregorius* (额我略/贵格利) 的种种原则。他被流放过两次(参见 105.4)。*Anselmus* (安瑟伦) 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力量,又是一位“作祈祷的”神学家,具有神秘主义的深度和热忱,这一点可以从他的 *Orationes sive Meditationes* (《祈祷或沉思》) 中看出。他很重视人的理性,但远离任何“理性主义”。他的思想是以 *Plato* (柏拉图) 和 *Augustinus* (奥古斯丁) 为导向,他用一种逻辑学和思辨思考的方法来讨论最核心的信仰问题,这样给经院思想开拓了一条路。他认为,经院思想的方法原则是这些: *Fides quaerit intellectum* (“信仰寻

求理解”)和 *Neque enim quaero intelligere ut credam, sed credo ut intelligam* (“我不寻求理解为了达到信仰,但我信为了获得全面的理解”)。他认为,如果一个有坚定信仰的人不愿意努力追求用理性来掌握所相信的内容,那就是一种懒惰。他在神学和哲学上的美名来自三个著作:在 *Monologion*(《独白篇》)中,他先根据宇宙论证上帝存在,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发挥关于三位一体的神的教导;在 *Proslogion*(《对话篇》)中,他谈论对于神的体验和对话的可能性并提出所谓的 *ontologischen Gottesbeweis*(“本体论的证明”,即根据本体论证明神的存在),其中描述神为 *ens perfectissimum, quo maius cogitari non potest*(最完美的存在,无法想出一个更伟大的)。这就引起了与 Marmoutier(马慕捷)的 Gaunilo(高尼罗)修士的争论,这位修士写了一部 *Liber pro insipiente*(《写给愚妄的人的书》,参见《圣咏/诗篇》Ps 13:1),而 Anselmus(安瑟伦)的回应是 *Liber apologeticus*(《辩护书》)。然而,最重要的是他另一个著作,即 *Cur Deus homo*(《为什么神降生成人?》)。在早期中世纪,人们根据教父们的思想认为,基督必须从魔鬼的控制下“赎回”(redemptio)堕落的人类,但 Anselmus(安瑟伦)说,救世主的降生成人是因为人类的罪恶得罪了神,所以基督的降生成人与受苦是一种作出 *satisfactio*(赔偿)的渠道(所谓的 *Satisfaktionstheorie*)。这种说法比早期的解释更有尊严和深度(*wuerdiger und tiefer*)。第13世纪的伟大经院思想家大多都接受并发展 Anselmus(安瑟伦)这种理论,所以它成为公教神学传统中的公共精神财富。

121.4 另一些属于 Anselmus(安瑟伦)时代的老师对于经院思想的方法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贡献,他们主要是这些人:Anselmus de Laon(拉昂的安瑟伦,1117年去世),他是 Anselmus Cantuarensis(坎特伯雷的安瑟伦)的学生,写过一种神学命题集(*Sententiae*)。这位“拉昂的安瑟伦”的一位学生是 *Wilhelmus de Champeaux*(威廉,1121年去世),曾经在巴黎的大堂学校任教。*Wilhelmus*(威廉)在巴黎的 *St. Victor*(圣维克托)建立了一个著名的圣职人员团体以及一所学校(参见117.2);他后来(于1113年)成为 *Chalons sur Marne*(沙伦)的主教,他是圣 *Bernardus*(伯尔纳德)的朋友,在“共相之争”中,他是“极端实在论”的主要代表。在法国 *Compiègne*(孔比耶恩)当 *canonicus*(圣职人员)的 *Roscelinus*(洛色林,约于1125年去世)也是一个重要的学者。Anselmus de Laon(安瑟伦)和 *Wilhelmus*(威廉)第一次编写了一些 *Sentenzenwerke*(“格言论文集”)作为他们教学成果的著作,这就是一些系统地论述神学思想的著作,它们的根据都是教父们和历代主教会议的教导和格言(称

sententiae, auctoritates“格言”、“权威性教导”),但仍然缺少紧凑的阐述和清楚的结构。Roscelinus(洛色林)是一位“唯名论者”(Nominalist, Konzeptualist)。因为他在教会教导方面施用了这种思维方式,他在三位一体方面走向“三神论”的解释(tritheismus,即在神内有三个“本体”;这种思想早在6世纪获得类似的表达,参见Johannes Philoponus,第1卷,55.5)。因此,Roscelinus(洛色林)受到严厉的谴责,主要是Anselmus Cantuarensis(坎特伯雷的安瑟伦)的批评,1092年在Soissons(苏瓦松)召开的主教会议强迫Roscelinus(洛色林)收回他的主张。这就意味着,“唯名论”在两百年以后的时期没有被传播。

121.5 第12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是Petrus Abaelard(阿伯拉尔,1079-1142年),他在神学方面也有一定的影响力;他曾是Roscelinus(洛色林)和Wilhelmus de Champeaux(威廉)的学生。他一生的命运包含一些浪漫的和悲剧性的因素,他曾经写过一种自传(*Historia calamitatum*《种种灾难史》),其中也有一些虚荣和自我吹嘘的因素(nicht ohne eitle Selbstbespiegelung)。他曾经在巴黎当过一个倍受敬仰的老师,与他的学生、情人和妻子Heloise(埃洛伊兹)有了一个不幸的、短暂的爱情关系。Heloise(埃洛伊兹)是圣职团人士Fulbertus(夫尔贝图斯)的侄女,他反对两个人的关系,并严重地侮辱了Abaelard(阿伯拉尔),所以这位思想家后来进入了St. Denis(圣德尼斯)隐修院。不久后,他又在一个名为Paracletum(“圣神/圣灵”)的隐修院教书,让Heloise(埃洛伊兹)指导这个修女院,自己在Bretagne(不列塔尼地区)的St. Gildas(圣格尔达斯)当院长。然而,他在那里也没有长期的工作。他后半生是在不安静的巡回和种种神学论战中度过的。这位Abaelard(阿伯拉尔)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思想敏锐的人,具有辨别精神,他是一个逻辑学大师。他的积极贡献很多:他进一步地发展和介绍了所谓的dialectical method(逻辑学方法)和辩论技术——其目的是concordare discordantia(结合那些矛盾的因素)。他也强调要重新学习和尊敬古代的哲学家(Plato 柏拉图和Aristoteles 亚里士多德),这些都影响了后来的经院思想。他是一位很会激发人思考的老师和作者。他建立的学校完成了几部“神学命题文集”(Sentenzenwerke)。在“共相”的问题上,他很巧妙地调和了双方的矛盾,成为“温和实在论”的创始人。在神学方面,他与Anselmus(安瑟伦)不同,因为Anselmus(安氏)从信仰出发,但Abaelardus(阿伯拉尔)认为,系统的怀疑是通往真理的路(dubitando enim ad inquisitionem venimus, inquirendo veritatem percipimus“我们通过怀疑来到研究,通过研究才理解真理”)。他要求先得考查那

些将要相信的东西 (*nec credi potest aliquid, nisi primitus intellectum*“没有首先被理解的东西也不能被相信”)。他当然不是一个理性主义者或不可知论者,而是一个有信仰的神学家——他和他的学生也首次在现代意义上用了 *theologia* (神学) 这个术语——但他在几个地方使信仰和知识之间的区分变得很模糊;他也倾向于一些太大胆的或悖论性的说法,所以曾多次引起人们的反对。他的早期神学著作是 *Theologia Summi Boni* (《至善的神学》),但其中一部分 (*De unitate et trinitate divina* 《论神的合一与圣三》) 在 1121 年被 Soissons (苏瓦松) 的主教会议谴责,因为据说有 Sabellianismus (形态主义,参见第 1 卷,32.6) 的倾向;在《论神的合一与圣三》中,Abaelard (阿伯拉尔) 想通过理性证据来说明基督信仰的基本信条。

他的其他著作是: *Theologia christiana* (《基督宗教神学》未完成), *Theologia scholarium* (亦错误的称 *Introductio in Theologiam* 《神学导论》), *Sic et non* (《是与非》),这部著作的目标是调和那些矛盾的教父格言) 以及 *Scito te ipsum* (《认识你自己》),即一部具有主观主义倾向的伦理学著作)。圣 Bernardus (伯尔纳德) 不太公平地看待了 Abaelard (阿伯拉尔),所以他推动人们从这些著作中抽出 19 条格言,而这些命题在 1141 年在 Sens (森) 的主教会议上被谴责为“异端”。教宗 Innocens II (依诺森二世) 也肯定了这个判断并命令 Abaelard (阿伯拉尔) 保持永远的沉默。Abaelard (阿伯拉尔) 服从于教会的声音,与教会和好,不久后去世。

另一位思想家由于他的“圣三论”不太成功而被注意,就是 **Gilbert de la Porree** (= Gilbert Porretanus 格尔贝特),他曾经在 Chartres (沙特尔) 和 Paris (巴黎) 当老师,1142 年成为 Poitiers (普瓦捷) 的主教(1154 年去世),也是一位杰出的逻辑学家 (*Dialektiker*)。他曾经给 Boethius (波伊提乌斯) 的神学著作写过注解,其中说,在“神”和“神性”之间、“神的三个位格”和“他们的属性”之间有“实体上的差别”,这样他似乎主张一种“三神论” (*Tritheismus*),又创造了一种“四神论” (*Quaternitaet*)。因此,人们在 Reims (兰斯) 于 1148 年的主教会议以后都讨论过他的主张。所以他必须收回自己的说法,但没有被要求宣发一种相反的誓。他的学派 (所谓的 *Gilbertini* 或 *Porretani*) 在 12 世纪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121.6 整个 12 世纪最崇高 (*abgeklarteste*) 的神学家——他同时是逻辑学家和神秘神学家——是 **Hugo de St. Victor** (胡格,1096 - 1141 年)。他大概来自德国 Harz (哈兹) 地区的 Blankenburg (布朗肯堡) 伯爵家庭,后来成为巴黎的 St. Victor (圣维克托) 隐修院学校的校长。他的尊称是 *alter Augustinus* (“第二个奥古斯

丁”),这就表明他的基本方向和重要性。在他的著作中最重要的是 *Didascali[c]on* (《教导手册》),这是一种世俗和神学知识的百科全书和方法论著作。还有 *De sacramentis [= mysteriis] christianae fidei*(《论基督信仰的种种奥秘》,2卷),其中很深刻地和系统地阐述了整个神学的各个领域。关于作为神秘神学家的 Hugo(胡格),请见 122.3。以前的人认为,他也编写了 1140 - 1145 年间形成的 *Summa sententiarum*(《格言大全》),但今天的学者否定了这种说法,这部广泛流传的著作大概是 Lucca(卢卡)的主教 Magister Odo (= Otto)(奥托,1146 年)写的,他是一位支持 Petrus Lombardus(伦巴第人伯多禄/彼得)的人。

英国人 Robert Pulleyn (= Pullus)(普莱因)——圣 Bernardus(伯尔纳德)的朋友——也曾经编写了一部《神学格言集》(8卷);他曾在 Oxford(牛津)和巴黎任教,后来当罗马教会的枢机和罗马教廷的秘书(1146 年去世)。然而,在这类的著作中,最伟大的还算 Petrus Lombardus(伦巴第人伯多禄/彼得)写的 *Libri IV Sententiarum*(《四部语录》,约于 1150 年完成),他来自意大利的 Novara(诺瓦拉),曾在巴黎大堂任教,后来还当几个月的巴黎主教(1159 - 1160 年)。这部书依靠古代的教父学和当时的神学家的成果(尤其是 Hugo de St. Victor 胡格的著作及上面的 *Summa sententiarum*(《格言大全》),在方法上深受了 Abaelard(阿伯拉尔)的 *Sic et non*(《是与否》) - 思想的影响,很巧妙地总结了整个神学的核心知识。第一部谈论三位一体的天主/上帝;第二部讨论创造和宇宙;第三部论及降生成人的奥迹、救恩和种种美德;第四部讨论诸圣事和终末的事。在开始的时候这部著作遇到一些批评,但后来如此被重视,以至于在 16 世纪仍然被用为神学教科书。无数的人为它写过注解,而在 14 世纪它甚至被译成希腊语。受了 Lombardus(伦巴第人伯多禄)的影响,Gandulphus de Bolonia(甘都尔夫斯)也同样于 1160 - 1170 年间编写了一部在教义学和教会法学方面有影响的《格言集》。

还应该提到一个著作累累、读者众多的人,就是 Honorius Augustodunensis(霍诺利乌斯),他生活在 12 世纪上半叶,但关于他的生活似乎没有很清楚的信息。有人说他曾经在 Regensburg(雷根斯堡)当隐修士,另一些人记载他曾在 Canterbury(坎特伯雷)修道。他的著作以编著和通俗传播的方式包罗当时代的全部知识:*Elucidarium*(《澄清》,基督宗教教义,以逻辑学方式写的)、*Summa totius*(《万物大全》,一部世界史)、*Cognitio vitae*[《认识生活》,即根据 Anselmus Cantuarensis(安瑟伦)谈论认识神的问题]、*Imago Mundi*(《世界图像》,即地理学、地质学、天文学等

的百科全书)、*Speculum ecclesiae*(《教会之镜》,一部讲道手册)、*Gemma animae*(《灵魂的宝石》,一部礼仪学著作)、*Sacramentarium*(《论诸圣事》)、*De luminaribus ecclesiae*(《教会的星星》,一部基督宗教文学史著作)以及 *Clavis physicae*(《物理学钥匙》,一部自然科学著作),作者深受 Johannes Scotus Eriugena(埃利基纳)的影响。这位作者的世界观是基督宗教的柏拉图主义(christlicher Platonismus)。

122

12 世纪的神秘思想

122.1 经院思想用敏锐的思想、仔细的讨论和逻辑学的方法来掌握信仰的全部内容,但在中世纪(中世纪高峰时期和晚期)还存在着另一个重要的思想传统,就是那种充满感情的神秘思想(Mystik),它也曾经被称为 *theologia affectiva*(情感神学)或 *theologia contemplativa*(默观神学)。这就是关于“与神结合”的生活的知识,从古代就被描述为具有 *purgatio*(净化)、*illuminatio*(照亮)和 *unio*(合一)的阶段,而他的顶点就是 *contemplatio*(默观, *Akt der Beschauung*)。这种思辨性的神秘神学(*spekulative Mystik*)所研究和表达的是那些有神恩的灵魂们的种种神秘体验以及这些人对神圣事物的直观性认识。对中世纪的神秘神学最有影响的是那位“新柏拉图主义基督徒”Pseudo - Dionysius Areopagita(伪狄奥尼修斯,参见第1卷,77.1);Johannes Scotus Eriugena(埃利基纳)和其他人将他的著作译成拉丁语。另一个很有影响的人是圣 Augustinus(奥古斯丁)。有人曾经认为,这种神秘神学与经院思想有冲突,但这是不对的;两种思维传统可说是“手拉手地”,它们双管齐下地推动了西欧思想的发展。神秘神学是经院思想的补充。最伟大的经院思想家,比如 Hugo de St. Victor(胡格)、Albertus Magnus(大阿尔伯特)、Thomas Aquino(托马斯)和 Bonaventura(波纳文都拉),也都是些神秘神学家。在传统的 Benedictus(本笃)会和12、13世纪的新兴修会中,神秘神学在理论和实践中获得了热心的培养。

122.2 在 Anselmus Cantuarensis(坎特伯雷的安瑟伦)那里已经有了一种神秘思想的倾向(参见121.3)。然而,中世纪神秘思想的真正“父亲”和导师只能说是圣 Bernardus(伯尔纳德,参见116.3),他的荣称是 Doctor mellifluus(“流蜜博士”),他的信仰最深、最活泼,他是“12世纪的宗教天才”(德国学者 Harnack 哈纳克,

1850 - 1930 年)。他的神秘思想的理论性和思辨性不强,但更多有实践性和伦理道德倾向,似乎可以说它完全是意志力和感情 (*ganz Wille und Affekt*);他说: *in tantum cognoscitur Deus, in quantum amatur* (“人们爱慕神多少就认识神到那个程度”)。这种灵修学的核心是默想受苦的基督 (*haec mea sublimior interim philosophia, scire Jesum et hunc crucifixum*“现在这就是我那种更高深的哲学:认识耶稣及他的十字架”)。以具有感染力的热忱, Bernardus (伯尔纳德)说出灵魂与基督那种“新郎和新娘的关系”。 Bernardus (伯尔纳德)大概是整个中世纪最伟大的讲道家。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是: *De consideratione libri V* (《论沉思》, 参见 106.5), *De diligendo Deo* (《论爱上主》, 一篇小论文) 以及关于《旧约·雅歌》的 86 篇 *Homiliae* (《讲道稿》); 那些著名的赞美歌 *Jesu dulcis memoria* (《想到耶稣多甜蜜》) 和 *Salve caput cruentatum* (《受苦的基督, 我问候你》) 都来自 Bernardus (伯尔纳德) 的思想传统。他的朋友和传记者是 Wilhelmus de St. Thierry (威廉, 他先是本笃会士, 后加入熙笃会, 1149 年去世), 他的著作也同样充满内心的感情与安慰, 这些因素多来自古希腊的教父那里。那位曾经当本笃会院院长的 Rupertus de Deutz (儒佩特, 1135 年去世) 写了一些从比喻和神秘角度解释《圣经》的注解, 其中也多次插入一些属“历史哲学”的观点, 并在他的教义性著作中表现出神秘倾向和内心的感情的抒发。

122.3 在巴黎的 St. Victor (圣维克托) 学派那里, 思辨性的神秘神学获得了最佳的发展。Hugo de St. Victor (胡格, 参见 121.6) 在这个领域中也成功地进行了研究。他的同会会士 Richard de St. Victor (理查德, 1173 年去世), 一位出生在苏格兰的人, 曾经被称为 *magnus contemplator* (伟大的默观者)。他是“默想的理论家”, 具有深远的影响 (主要著作: *Benjamin minor*, *Benjamin maior* 《小本雅明》、《大本雅明》)。他首次发挥了关于依赖圣洗的恩典的 *Gottesgeburt* (“神在人内的诞生”, 表示人与神的结合) 的神秘教导, 在这种论述当中, Pseudo - Dionysios (伪狄奥尼修斯) 的“无边无际思想” (*Unendlichkeitsmystik*) 和 Bernhardus (伯尔纳德) 对基督的感情形成了一个具有秩序的整体。在 Richard de St. Victor (理查德) 和 13 世纪的方济各会灵修传统 (比如 Bonaventura 波纳文都拉) 之间的重要中介环节是一位奥古斯丁圣职团的团员, 即 Thomas Gallus (托马斯·伽卢斯), 他原来在巴黎 (St. Victor 圣维克托), 后来在 Vercelli (维切利) 的 Andreas (安德烈) 隐修院当院长, 1246 年去世; 他写过对《旧约·雅歌》的注解, 又写了 Pseudo - Dionysius (伪狄奥尼

修斯)著作的 *Extractio*(《提要》)和 *Explanatio*(《说明》),这两部著作都很受欢迎。

122.4 在德国的修女院早在 12 世纪就已经有了神秘主义的思想。圣 Hildegardis(希尔德加德,1098 - 1179 年)结合了崇高的思想和行动,她曾是 Bingen(宾根)附近的 Rupertsberg(儒佩特贝格)的本笃会修女院的院长。她来自 Rheinhessen(莱因赫森)的古老贵族家庭,在童年时期已经有“神视”(visionær begabt)。她不仅仅在隐修院的安静房间里工作,而且也在很远的巡回路线上在很多农村、城市和隐修院为圣职人员、修士和平信徒的道德素质的提高而努力奋斗。她曾经和一些主教、院长、公爵和国王有信件来往,很多人寻求她的建议或劝告。她在几个 Visionen(“神视”)中看到救恩的历史——这些“神视”令人联想到 Ezechiel(《厄则克尔/以西结书》)或《默示录/启示录》中的描述。在她的书中,她叙述了这些神秘的体验: *Liber Scivias* (= *Sci vias lucis*《知道路》), *Liber vitae meritorum*(《诸功劳之书》)和 *Liber divinorum operum*(《神功之书》)。在 1148 年,圣 Bernardus(伯尔纳德)曾经在 Eugenius III(尤金尼乌斯三世,参见 106.5)教宗那里推荐了她的 *Scivias*(《知道路》),要求教宗肯定这个修女及她的著作。她还有“德国第一个女自然科学家和女医生”的美名,因为她写了这方面的著作(*Physica*《物理学》, *Causae et curae*《诸病因和治疗》)。

与 Hildegardis(希尔德加德)同时代的修女(也是她的朋友)是圣 Elisabeth de Schoenau(伊丽沙白,1164 年去世),她在 Hessen - Nassau(赫森 - 纳骚)指导一座本笃会隐修院;她的神秘体验很多,而她的弟兄 Ecbertus de Schoenau(厄克贝特)——他曾是 St. Victor(圣维克托)学派的人,后来在 Schoenau(德国叙骚)当院长——写下了她所叙述的“神视”: *Visiones*(《诸神视》共 3 卷)以及 *Liber viarum Dei*(《论上主的种种路》,1 卷)。因为她还有关于圣 Ursula(乌苏拉)及所谓的“11000 贞女殉道”的著作(*Revelationes*《启示》),后来的人夸大了这个传奇的故事(参见第 1 卷, 16.4)。

**第二部分 从依诺森三世到切来斯提
努斯五世(1198年 - 1294年)。
宗座和教会文化的辉煌时期**

第一章 宗座和世俗力量。

十字军运动的结束和传教工作

123

宗座权势在 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的顶峰时期。

第 12 届大公会议(1215 年)

123.1 德国皇帝 Henricus VI(亨利六世)于 1197 年去世,这一个事件的发生解除了对罗马宗座的威胁,否则教宗将会因 Staufer(施陶费尔)皇朝的强大势力遭受非常大的压力(参见 107.8)。由于多年的“抢夺皇位斗争”,使德意志帝国陷于分裂和严重的混乱中(见下),但在同样的时期,罗马宗座经历了一次很大的崛起。在那位年老衰弱的 Coelestinus III(切来斯提努斯三世)教宗后,最年轻的(37 岁)和最有精力的枢机主教当选,这就是才华横溢的 Lotharius de Segni(塞尼的洛塔尔),即 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1198 - 1216 年)。他大概是整个中世纪最伟大的教宗。他之所以能够走向成功的顶点一方面是由于他的能力,但另一方面是受到当时的时代条件的推动。他来自 Campagna(罗马附近的坎帕纳地区)的伯爵家庭,曾经在巴黎和 Bolonia(博洛尼亚)获得了优良的神学教育和法学培训。他于 1190 年被提名为枢机,这样有机会认识罗马教廷的种种任务;他也曾经写过一些克修学方面的著作(asketische Traktate),比如 *De contemptu mundi*(《蔑视世界》)和 *De sacro altaris mysterio*(《论圣祭坛的奥迹》)。当教宗时,他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领导能力、远见和不懈的努力,又有正义感和自尊心。当时的人称赞他,说他是 *stupor mundi*(“令世界的人感到惊奇”)或 *lux mundi*(“世界的光”)。他完成了“教宗兼国王”的制度(Papstkoenigtum),他很成功地为宗座要求了一些教会在政治上的特权,就是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在他的 *Dictatus Papae*(《教宗敕令》)中所提出的那些要求(参见 104.2; 111.1,2)。Innocens(依诺森)并没有在内容上增加这些要求,仅仅将它们系统化,又为它们提供了神学和教会法方面的根据。他深信,教会在原则上应该掌握两个权柄:宗教的“剑”和世俗的“剑”(即权力,参见 111.3),但教会将世俗的权柄交给那些王侯们。因此,这位教宗认为,他应该活出一种“理想的世界统治”(eine Art idealer Weltherrschaft),比如他可以在国与国之间,君主和君主之间进行裁判,他可以审判国王和皇帝。他认为,宗座和皇帝之间的关系像太阳和月亮一样(教宗是“太阳”,皇帝是“月亮”),并于 1199 年向东方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写信说,主基督不仅仅交给 Petrus(伯多禄/彼得)宗徒(及他的接班人)教会的管理权,而且也交给了他整个地球的管理权。他的活动也确实跨越了一切国度,这可以从他的法令和书信中看出。

123.2 教宗 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尤其致力于恢复宗座在罗马及教会国中的统治——在 12 世纪的岁月里,罗马居民的独立运动和 Staufer(施陶费尔)的皇帝们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教宗的权力。教宗认为,罗马教宗在领土上的独立性是教会自由的主要前提条件(er sah in der territorialen Unabhaengigkeit des Papsttums eine Hauptbedingung der kirchlichen Freiheit)。他也达到了这个目标,虽然需要经历一些战争。原来代表皇帝的罗马市长(praefectus urbis)被迫服从于教宗,而人民选择的 senator(元首)被迫下台。原来的 Pentapolis(五城地区,参见 85.2)——它以 Mark Ancona(安科纳领地)的名义成了“帝国地区”——再次被归入教会国,而 Spoleto(斯波勒托)公国也加入了教会国。德国人的影响在各处被驱逐。这样,意大利人的爱国精神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而 Innocens(依诺森)也支持这种爱国感情。

同时,Innocens(依诺森)还照顾教会在意大利南部的“封地国度”(Lehensreich,即教宗有主权的“领土”),因为德国人的统治在那里崩溃了。在 1198 年,他为皇后 Constantia(康斯坦提亚)和她的小儿子 Fredericus II Roger(腓特烈二世,1194 年出生)写了一封“封地信”[正如 Henricus VI(亨利六世)在他的遗嘱中要求的那样]并限制 Sicilia(西西里国)对于教会的种种主权(参见 105.3)。因为皇后不久后就去世了(1198 年 11 月),教宗根据她的遗嘱——教宗就是这块地的“大地主”(Oberlehensherr)——照顾和培养这个小王子,又在他还未成年人之前(1208 年之前),代替小王子统治了这个国度,又以无私的方式保卫了王子的遗

产。

123.3 德国的诸侯们在 1198 年的选举中选出了两个德国国王——这种灾难性的事件给教宗带来了一种特殊的优势。大部分的德国诸侯们先选择了 Suabia(施瓦比亚)的公爵 Philippus(菲利普),他是 Fredericus Barbarossa(红胡子腓特烈)最小的儿子。然而,Rhenus(莱茵河)下游地区的王侯们后来推出了 Henricus Leo(狮子亨利)的儿子 Otto de Brunswic(奥托)——他是英国 Richard Coeur de Lion(狮心的理查德)的侄子,而从英国王那里获得了法国的 Poitou(普瓦图)为“封地”(采邑)。这两个党派——即 Suabia(施瓦比亚)的 Staufer(施陶费尔)派和 Bavaria(巴伐利亚)的 Welfen(威尔夫)派——之间的冲突引起了毁灭性的内战。Welfen(威尔夫)派请教宗承认他们的国王,但教宗希望德国的王侯自己能够达成协议,所以他等了三年,但是他也并没有隐瞒教廷对 Staufer(施陶费尔)王朝的传统反感。实际上,自从 1196 年以来,Philippus(菲利普)因为侵略了教会国的权利就被绝罚了。根据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的精神,Innocens(依诺森)在两个文献中——1200 年末的 *Deliberatio*(《备忘录》)以及 1202 年的著名 *Decretale Venerabilem*(《法令》)——宣布了这样的要求:教宗“在原则上并且终究性地”(principaliter et finaliter)可以检察和确认德国王侯们选的德国国王和将来的皇帝,尤其在两个王相互争夺政权的情况下。教宗可以这样做,因为他也曾经在历史上将希腊人的皇权转移给德国人(参见 86.5)。在 1201 年的春天,教宗决定支持 Otto(奥托)——他现在完全服从教宗并在很多问题上向教宗让步。但这个选择也不太好,因为这个 Welfen(威尔夫)派的国王的性格骄傲并且粗暴。教宗的支持也没有太大的效果,因为 Philippus(菲利普)继续肯定自己的权利,虽然他再一次被绝罚。他的政治影响甚至在 1204 年以后越来越大[1205 年 1 月他在 Aachen(亚琛)被加冕为德国国王],所以教宗也接近他,收回了绝罚,但这个 Staufer(施陶费尔)王突然于 1208 年 6 月 21 日被暗杀——这是 Otto de Wittelsbach(魏特斯巴克的奥托)伯爵(Pfalzgraf)个人的报复。现在德国的贵族们迅速地承认了 Otto IV(奥托四世,1208 - 1215 年)。而且,他与被暗杀者的最大女儿 Beatrix(贝阿特瑞克斯)结婚。1209 年 3 月他在 Speyer(施佩尔)重复了原来作的承诺,比如他承认教宗对于教会国所作的“地区回归”,也承认教宗对 Sicilia(西西里)国的主权,放弃了皇帝对教产的“收回权”和主教去世后的“收税权”(ius spoli, regalia, 参见 96.3)。他又放弃了 Wormser Konkordat(《沃尔姆斯协约》)规定“国王临在于主教举行”的权利(参见

105.6)又允许圣职人员向罗马教廷申诉。然而,他不愿意兑现他的承诺:他于1209年夏天去罗马时,完全和以前的 Staufer(施陶费尔)皇帝们一样强调帝国在意大利的种种权利。教宗于1209年10月4日给他举行加冕礼,但这个新皇帝马上率军到意大利,要征服 Fredericus(腓特烈)的遗产,即 Sicilia(西西里)。现在,教宗后悔他对 Otto(奥托)的支持,所以他于1210年11月宣布对 Otto(奥托)的绝罚。因此,几个德国君主放弃了这个 Welfen(威尔夫)王,并于1211年秋天宣布了 Fredericus(腓特烈)为德国国王——这个小孩子(他被称 Kind von Apulien“意大利南部的孩子”)已于1196年已当选为德国国王。教宗 Innocens(依诺森)虽然很担心,但现在他必须让他培养的小国王去德国。离开之前,年轻的 Fredericus(腓特烈)王必须向教宗宣誓承认教宗是 Sicilia(西西里)的封地主。因为教宗也不愿意德国国王同时是意大利南部的统治者,所以他早就让人们给 Fredericus(腓特烈)那个1岁的儿子 Henricus(亨利)举行了加冕礼,将他宣布为西西里王。年轻的 Staufer(施陶费尔)王克服了在德国的种种困难,并获得了各地公爵的拥护,在1212年12月已经在 Mainz(美因茨)被加冕为德国王。在 Eger(厄格尔)的诏书(Goldbulle von Eger,1213年7月)中,他在各地诸侯的赞同下向教宗作出很多承诺,实际上就是前面 Otto IV(奥托)所作的许诺。在 Fredericus(腓特烈)和 Otto(奥托)两个人的冲突中,英国和法国之间的搏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Fredericus(腓特烈)是法国的联盟,而 Otto(奥托)当然支持他的亲戚 John Lackland(约翰),即英国的王。在法国 Lille(里尔)附近的 Bouvines(不维恩)的交战中(1214年7月),法国的 Philipp II Augustus(菲利普二世)战胜了 Otto(奥托)。Otto(奥托)只能保留在萨克森地区的老家族的地区,再没有别的影响力。他忏悔他的罪,教宗收回他的绝罚,而他于1208年已经去世。他的对手 Fredericus II(腓特烈二世,1215-1250年)在1215年再一次被加冕为德国国王,这次是在“正当的地方”Aachen(亚琛)举行的。

123.4 教宗 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也必须在英国介入并调和一个严重的冲突。当时的国王 Johannes Lackland(失土王约翰内斯,1199-1216年)是 Richard Coeur de Lion(狮心王理查德)的弟兄和接班人,但他是一个粗暴的、狡猾的统治者。教宗建议那位极受尊敬的英国神学家 Stephaus Langton(兰顿)当主教,所以他于1207年被祝圣为 Canterbury(坎特伯雷)的总主教,但国王没有承认他。因为国王不理睬教宗的一切劝告,所以教宗宣布全国受 interdictum(禁罚,即不可以公开

举行礼仪)的处罚(1208年)。因为国王还继续多次侵犯教会和圣职人员的权利,所以他被绝罚(1209年),并于1212年被弹劾。教宗命令法国的 Philippus II(菲利普)王——他对于 Johannes(约翰内斯)在欧洲大陆管理的地区拥有主权——落实弹劾的命令。现在(1213年5月)英国的国王屈服于教会的要求,他为那些受损失的圣职人员和教堂提供了赔偿,又希望教宗将来也会支持英国,所以他宣布英国和爱尔兰是教宗的“封地”(采邑),而英国的国王要每年送给罗马宗座 1000 马克白银的“封地税”。然而,英国的贵族们和英国教会的长上看到国王的地位很弱,所以他们起来了,要求国王签订 *Magna Charta libertatum*(《英国大宪章》,1215年6月),其中要求国王在很多方面让步或放弃自己的权利——这成为英国自由主义宪法传统的基础。当时,Langton(兰顿)总主教领导了教会的主教们参与这个运动,因为他们需要确保主教选举的自由。这个《大宪章》又引起了新的问题,因为国王觉得其中的要求太多,所以他劝教宗帮助他,而教宗宣布这个宪章无效,因为它侵犯教会的一些权利。然而,Johannes(约翰内斯)王的儿子和继承人 Henricus III(亨利三世,1216-1272年)又肯定了这个“自由权利的保障书”,并且他逐渐联合了英国的各个派别。

除了英国以外,Aragon(阿拉贡)、葡萄牙和保加利亚也都承认教宗的主权(即承认教宗为“封地主”)。Aragon(阿拉贡)的国王 Petrus II(伯多禄/彼得二世)其中怀着这样的考虑:他要教宗取消国王和 Maria de Montpellier(蒙彼列埃的玛利亚)的婚姻。然而,他的计划失败了,因为教宗绝不放弃婚姻法的原则。教宗保卫了教会的原则,另一些国王在这方面也遇到困难,比如 Leon(西班牙西北部的莱昂)的王 Alphonsus IX(阿方索九世)和法国的 Philippus II Augustus(菲利普二世奥古斯都,1180-1223年)。后者原来和一位丹麦公主(Ingeborg 英格伯格)结婚,但不久后离弃了他的妻子,又在1196年与德国的女伯爵 Agnes de Merano(阿格内斯)——她是 Silesia(西里西亚)的圣 Hedwigis(赫德维)的姐妹——结婚。但教宗于1200年向法国宣布 *interdictum*(“禁罚”),所以国王 Philippus(菲利普)承诺,他愿意再次接受原来的配偶 Ingeborg(英格伯格),承认她为妻子和王后。然而,Agnes(阿格内斯)于1201年去世,而国王又想设法完成他的离婚,但都是无效的;在1213年他终于实现了他的承诺,再次接受了 Ingeborg(英格伯格)。

123.5 这位伟大的教宗也注意到东方的问题。他推动了第4次十字军运动,而西方人在1204年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个“拉丁帝国和拉丁

宗教区”，虽然这仅仅是短暂的成就，但教宗因此获得更大的荣耀（参见 126. 2；125. 1）。面对着法国南部的 Cathari（清洁派）的危险局面，教宗于 1208 年命令人们在那里镇压这个教派（参 132. 1）。当然，更重要的是另一个事件：方济各会和道明会在同样的时期被成立（参见 129. 1；130. 1）——它们宣布要回归于宗徒/使徒们的贫穷和巡回讲道（*praedicatio itineraria*），这些新修会的精神能够积极地对付异端和教会内的其他缺陷，同时为宗座培训了一些纪律严格的传教队伍。

在这位教宗的任期中，他完成了很多伟大的事务，而到晚年他又于 1215 年在罗马的 Lateranus（拉特兰）举行了一个主教会议，这是第 12 届大公会议，也是整个中世纪规模最大的教会大会。有 1200 多名主教和院长参加，而似乎所有的基督徒国王都派遣一些使者参加。这个大会议规定了一些改革法令，要提高教会内部的纪律和抵抗各种异端，又准备发动一个新的十字军运动。会议文献第 13 条禁止创立新的修会（参见 128. 1），而第 21 条要求信徒们每年需要办告解（和好圣事）一次，在每年的复活节必须领受圣体（参见 119. 2）。

124

教宗们与 Fredericus II（腓特烈二世）的搏斗。

最后的 Staufer（施陶费尔）

历代教宗：Honorius III（霍诺利乌斯三世，1216 - 1227 年），Gregorius IX（额我略/贵格利九世，1227 - 1241 年），Coelestinus IV（切来斯提努斯四世，1241 年），Innocens IV（依诺森四世，1243 - 1254 年），Alexander IV（亚历山大四世，1254 - 1261 年），Urbanus IV（乌尔巴努斯四世，1261 - 1264 年），Clemens IV（克雷孟/革利免四世，1265 - 1268 年）。

124. 1 教宗们无法长期保持在 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时代所达到的政治权力。那位 Staufer（施陶费尔）王 **Fredericus II**（腓特烈二世，1215 - 1250 年）不久后就成为教宗们的极危险的对手。这位年轻君主才华横溢，受过多方面的教育。他对于自然科学和哲学都有兴趣，并于 1224 年创立了 Neapolis（那不勒斯）大学（参见 134. 1）。他也是一位非凡的政治家和领导者，一位具有最强大的自尊心的统治者，又有不懈的工作能力。他对于宗教和教会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毫无疑问，他

没有坚定的信仰和深切的宗教热忱。根据一些阿拉伯语的文献记载,他甚至说过一些讽刺或嘲笑宗教和道德的话(关于教会对他的谴责,参见下文 124.4)。他很自由地和犹太人与伊斯兰教徒来往,又在道德上似乎不受什么约束——这些态度在他当时代引起严肃的谴责。然而,某些同时代的人曾经称他为“伊壁鸠鲁主义者”(比如历史学家 Salimbene 萨林贝内,1221 - 1290 年,或 Dante 但丁),而近代的人曾经称他为“怀疑论者”或“思想无规律的人”(Freigeist),比如 Kantorowicz(坎托若维兹)——但这些说法都有一点太过分。Fredericus II(腓特烈二世)为帝国所宣布的正式法令表明他是一个基督徒皇帝,虽然我们也必须承认,他对“皇帝”的理解是一种世俗化的概念,又吸收了许多古代罗马皇帝的因素,比如他让人们称呼他是 divus(神圣的)、sanctus(圣者)、salvator(拯救者)、vicarius Christi(基督的代表)、imago Dei(上主的肖像)或 cooperator Dei(上主的同工)等。然而,他也是 Cistercienses(熙笃会)的朋友的支持者,并与 Ordo Teutonicus(条顿骑士团)的杰出会长 Hermannus de Salza(赫尔曼,参见 127.2)有友好关系。他以最严峻的法令镇压着异端人士(参见 132.2),并在临终时还表明,他愿意支持教会。他与罗马教廷的冲突是因为他长期延迟“参与十字军誓言”的兑现并在政治上与教廷有相反的利益,但他在原则上并不反对罗马教宗。

从他的教育和性格来看,Fredericus(腓特烈)更多是意大利人,而不是德国人,他代表着 Sicilia(西西里岛)的拉丁 - 阿拉伯混合文化以及当地的“平信徒精神”(Laiengeist)——他不再会很拘谨地遵守中世纪世界观的一切规律。也许可以说,这个皇帝是“文艺复兴的先驱者”(Kampers 语),但说他是“宝座上第一个现代的人”(der erste moderne Mensch auf dem Thron, Burckhardt 语)似乎不是很恰当的说法。他的权力核心在意大利南部,他似乎不太重视德国,并在 1220 - 1250 年间大部的时间他都在意大利南部,只有两次在德国待了一些时间。他于 1220 年在 Frankfurt(法兰克福)给自己 9 岁的儿子 Henricus (VII)(亨利七世)举行加冕礼,宣布他为德国王——这个儿子早已经被加冕为 Sicilia(西西里)王,而教宗本来反对他同时也当德国国王,所以 Fredericus(腓特烈)在 1220 年必须给予德国的教会会长许多权利,比如让他们在自己领土上具有“主权”(domini terrae,参见 97.1)。然而,结果是德国中央权力被削弱,这一点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发展。因为 9 岁的 Henricus(亨利)无法掌握政权,Fredericus(腓特烈)规定 Colonia(科隆)那位能干的总主教 Engelbertus(恩格尔伯特)要替小王管理国务,但这位(被称为

Fuerstenmeister 大王的师傅)主教于 1225 年因贵族叛乱被杀。

124.2 教宗 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的接班人是那位已年老的 Cencius Savelli(撒维利)枢机,他的态度很宽容,也是个很有耐心的人,取名为 **Honorius III**(霍诺利乌斯三世,1216 - 1227 年)。虽然刚才提到的 Henricus(亨利)被提升为德国国王,但教宗没有反对——Fredericus(腓特烈)曾经向 Innocens III(依诺森)承诺, Henricus(亨利)的权力范围应该限制于 Sicilia(西西里)王国,并视这个王国为教宗给予的“采邑”(教廷尽可能要阻碍 Sicilia 国和德意志帝国的长期联结)。在 1220 年 11 月 22 日, Honorius(霍诺利乌斯)教宗给 Fredericus(腓特烈)举行加冕礼。教宗希望,如果给他加冕,这位 Stauffer(施陶费尔)皇帝肯定会完成他许诺的十字军运动——他早在 1215 年当德国王时宣发了这个许愿,现在(1220 年)又重复了他的承诺。然而,皇帝忙于整理西西里的事务,一次又一次地拖后了远征,而那位好心的教宗也允许他一次次的推迟。最终,教宗愿意采取一个比较坚定的态度,在 Monte Cassino(卡西诺山)附近的 San Germano(三·杰马诺)签订的协约(1225 年 7 月)中,教宗要求皇帝最晚在 1227 年 8 月要开始他的十字军远征,否则马上被绝罚。但在这个新的期限——这已经是第 9 个期限——到来之前, Honorius(霍诺利乌斯)就去世了。

124.3 在这之后登上教廷宝座的人是 Ugolino de Ostia(乌格里诺),取名为 Gregorius IX(额我略/贵格利九世,1227 - 1241 年),他很热切地支持了方济各会的发展(参见 129.2)。这个教宗的性格和他的前任教宗很不一样:他意志坚强、充满激情,愿意全力以赴地维持教宗的主权,他和他的叔叔 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一样是一个能干的法学家(关于 **Decretales Gregorii IX**《额我略/贵格利九世法令集》参见 110.3),同时他的宗教感情也很丰富,总而言之,他也是一位很重要的教宗。在 1227 年, Fredericus II(腓特烈二世)擅自又取消了定于 1227 年 9 月开始的十字军远征(详细见 126.3),而根据有关的约定, Gregorius IX(额我略/贵格利)马上宣布了对他的绝罚。结果导致了皇帝和教宗之间的长期冲突。 Fredericus(腓特烈)煽动了罗马居民的叛乱,所以教宗被迫离开罗马。皇帝的军队侵略了教会国,而教宗的军队(与他们的伦巴第同盟一起)侵略了 Apulia(阿普利亚,意大利南部)。皇帝在 1228 年仍然去了巴勒斯坦,回来后(1229 年 6 月)很轻易地从意大利南部的地区驱逐了教宗的雇用兵(首次称为 *clave signati*, *clavigeri*, 即“钥匙兵”)。通过 Hermann de Salza(赫尔曼)的中介,双方在 1230 年夏天在 San Germano - Ceprano

(三·杰曼-切普拉诺)签订了一个和平条约。皇帝的绝罚被收回,但他要向教廷提供赔偿,并在 Sicilia(西西里)王国要承认教会的种种权利。

124.4 他们的和平维持了几年。Fredericus(腓特烈)皇帝投身于他帝国的整理工作。他大量地提高了 Sicilia(西西里)王国的水平,在那里创立了一个有中央管理制度的、组织严密的、以专制制度领导的公务员国度(Beamtenstaat)——这和传统的封建制度比较起来是一个全新的管理制度(译者注:在欧洲是“全新的”,但在中国早就有)。在德国,他镇压了他儿子 Henricus(亨利七世)的叛变(1235年)并转向那些与他有联盟的伦巴第城市。他愿意对付他们的独立运动,想恢复德国皇帝在意大利的帝国地区的种种权利。在 Bergamo(贝加莫)附近的 Cortenuova(克特诺瓦)的交战后(1237年),伦巴第联盟完全被消灭,他们都愿意和皇帝签订一个和平条约,但皇帝要求无条件的服从,所以意大利人就反对皇帝。不久后,教宗也再次成了皇帝的敌人,因为这个独裁式的皇帝又侵犯了教会的权利。他让自己的儿子 Enzo(恩基欧)与 Sardinia(撒丁岛)的女继承人结婚——但撒丁岛算为教宗的领地(或“封地”)。皇帝又马上宣布自己的儿子为 Sardinia(撒丁岛)之王。看到这种“旁若无人”的作法,教宗相信,Fredericus(腓特烈)皇帝要占领罗马,使之成为帝国的首都,最终剥夺教宗的一切权利,使教宗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影响力的傀儡。因此,教宗决定坚决抵抗皇帝,并于1239年的圣枝主日第二次绝罚他。皇帝认为这种绝罚等于是教宗向他“宣战”,所以发动了双方最激烈的冲突,它比 Fredericus Barbarossa(红胡子腓特烈)的冲突更辛辣,更尖锐。悲哀的事实是,双方受了很大的损失,因为最优秀人才的精力全都投入其中。皇帝的秘书处和宗座的秘书处都创造了很多激烈的文件来强烈地控诉对方:皇帝被称为《默示录/启示录》中的“野兽”、“反基督的先驱”和“无信仰的人”,据说他曾经称 Moses(梅瑟/摩西)、基督和穆罕默德为“世界上三个大骗子”(但无法证明这是否真是皇帝的话)。教宗被称为“扰乱和平的人”、“法利塞人”,他和伦巴第的异端人有关系,甚至被称为“大毒龙”和“末世的反基督”。除了言词的交战以外还有武力的交锋。Fredericus(腓特烈)占领教会国的部分地区, 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引起威尼斯人攻击 Apulia(阿普利亚),并通过他的使者 Albertus de Behaim(阿尔伯特)——他原是 Passau(帕骚)的总执事——推动德国的诸侯拥立一个对立王,但这种尝试没有很大的成果,因为大部分的世俗和教会领导都拥护了皇帝。皇帝本来要求为自己的辩护举行一个大公会议,而不久后(1241年)教宗也想在罗马召开这样的会议,但皇帝此

时又阻挠这个会议。在 1241 年 5 月,皇帝的舰队在 Elba(厄尔巴岛)那里打败了 Genoa(热那亚/格努阿)的海军,同时逮捕了 100 多名主教(其中有 3 位枢机主教)——他们原来都要去罗马开会。Fredericus(腓特烈)已经率军到罗马(他在罗马城内早就准备一些拥护他的人)——但年老的教宗 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在此时刻发烧患病而去世(1241 年 8 月 22 日)。教会的情况很惨,也是因为蒙古人在同样的年代侵略了东欧地区,很严重地打击了在那里的几个国度(参见 127.4)。

在 Gregorius IX(额我略/贵格利九世)逝世后,教廷与皇帝之间的冲突停顿一会。新选的教宗是一位年老的米兰人,取名 Coelestinus IV(切来斯提努斯四世),他 17 天后就去世(1241 年 11 月)。在他的选举过程中,枢机们第一次完全和外面的世界隔绝了(所谓的 conclave“封闭选举方式”,参见 125.1)。本来三分之二的枢机们已经选上了一位法国道明会会士,即 Humbertus de Romans(亨伯特,他后来当道明会总会长),但罗马的元首 Matthaues Orsini(欧西尼)和罗马居民反对他,所以他必须让位于 Coelestinus(切来斯提努斯)。

124.5 在 Coelestinus IV(切来斯提努斯四世)逝世后,宗座的空位时期长达 20 个月,因为找一个合适的接班人很难。最终他们选择了一位来自 Genua(热那亚)的枢机——Sinibald Fieschi(弗耶西),他取名为 Innocens IV(依诺森四世,1243 - 1254 年),他和 Gregorius IX(额我略/贵格利九世)一样是一位杰出的法学家、圆通的外交家,有决心和毅力,但他没有宗教的热火。当时的人希望他能恢复和平,因为他的家族是一个对皇帝怀着好感的贵族家庭。不久后,他也确实拟订了一个和平条约(1244 年 3 月)。然而,双方互相怀疑,而在最敏感的问题上——伦巴第的问题——他们无法达成共识。Fredericus(腓特烈)皇帝想亲自与教宗会谈,但教宗很害怕皇帝并且于 1244 年夏天逃到法国的 Lyon(里昂)——这个城市当时仅仅名义上属于德意志帝国。教宗在那里居住了 6 年半(1244 - 1251 年)。他也在 Lyon(里昂)召开了一个主教会议,算为第 13 届大公会议,但参与的主教绝大多数的人是法国和西班牙的主教和长上。教宗自己在开幕典礼时作了一个演讲,其中论述基督宗教的“五伤”:高层和低层圣职人员的种种缺点;耶路撒冷再次的沦陷(1244 年,参见 126.4),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皇帝”的危险状态;蒙古人的侵入,以及皇帝对于教宗的压迫。最后的问题成了他们谈论的核心话题。对于 Fredericus(腓特烈)的控诉包括几点:他发几次的虚誓[违背了将 Sicilia(西西

里)当封地的誓言,违背了皇帝的誓];他被怀疑有异端的倾向;他犯下亵渎罪[因为在 Elba(厄尔巴)逮捕了那些主教们];他在 Sicilia(西西里)国镇压教会的自由。皇帝的代表 Thaddaeus de Suessa(塔德乌斯)很巧妙地替皇帝辩论,并向未来的教宗及一个“真正大公性的”会议提出申诉,但在第三个公开的会场中(1245年7月17日),皇帝在一切问题上被宣布有罪,他再一次被绝罚,失去了一切荣誉和地位,而且这个会议还禁止人们服从他,要求德国的诸侯们重新选择一个皇帝。

124.6 这样,教宗完全和皇帝断交了,并且全力以赴地想推翻皇帝。然而, Fredericus(腓特烈)根本不想服从于教宗。他说,他始终受教宗的攻击,一直当一个铁砧,但现在他要反击,要成为一个“锤子”。他向各地的国王和君主写了一些尖锐的信,其中宣布自己被弹劾的决定极不公平,又提出了 Arnoldus de Brescia(布雷西来的阿诺德)的标语:“教会不应该跨出宗教的范围,圣职人员应该恢复宗徒/使徒时代的贫穷和朴素。”和以前的 Gregorius IX(额我略/贵格利九世)一样, Innocens(依诺森)教宗也根据“君士坦丁的赠予”的理论(参见 85.3)提出教会手里那“两把剑”的观点,这样又强调教会在世俗的事务上也凌驾于皇权之上(参见 112.2, 3)。在这样的矛盾中,双方无法沟通。虽然法国的 Ludovicus IX Sanctus(路易九世)为了完成他的十字军计划(参见 126.4)而曾经在双方之间进行调和,但没有效果。教宗使人们反对皇帝,说反对皇帝的功劳和去巴勒斯坦朝圣的功劳一样大。他利用一切宗教性的惩罚来反对皇帝。德国地区原来没有受这种冲突的牵连,但现在也被卷入进去。部分的君主,尤其三个 Rhenus(莱茵河)地区的总主教(即 Mainz 美因茨、Colonia 科隆和 Trier 特里尔的选帝侯)服从教宗的命令并于 1246 年拥立了一位雄心勃勃的伯爵——Henricus Raspe de Thuringia(图林根的亨利),当德国人的王,但这个被讽刺为 rex clericorum(德语 Pfaffenkoenig,即“和尚王”)不久后去世。此后他们又拥立了一位年轻的伯爵——Wilhelmus de Hollandia(荷兰的威廉,1247-1256年)——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属于德意志地区的君主。这两个对立王没有很多拥护者。他们在 Suabia(施瓦比亚)和 Rhenus(莱茵)地区攻击 Fredericus(腓特烈)的儿子 Conradus IV(康拉德四世),但这种战争没有具体的结果。属于帝国的种种城市大多都拥护了 Staufer(施陶费尔)王朝。在意大利,皇帝的地位基本上没有动摇,虽然个别的地区反对他。皇帝的敌人——尤其是圣职人员和托钵会的会士——遭受了残酷的镇压。两个派别——即 Guelphi(归尔甫派,即教宗派)和 Ghibellini(吉伯林派,即皇帝派)——的激烈混战使意大利北部陷入

越来越严重的分裂,所以居民们深深地渴望和平。比如,皇帝的女婿 Ezzelino da Romano(厄泽利诺,1259年去世)曾经在 Vicenza(维琴撒)、Padua(帕多瓦)和 Treviso(特瑞维索)地区履行了一种非常恐怖的统治。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中, Fredericus(腓特烈)皇帝于1250年12月13日在 Apulia(意大利南部,阿普利亚)的 Fiorentino(费欧润提诺)因患痼疾而去世。在临终时,他的朋友,Palermo(巴勒莫)的总主教 Berardus(贝拉德)收回了对他的绝罚。这位皇帝埋葬在他父母的墓旁边(在 Palermo 巴勒莫的大堂中)。在德国的传说中,这个皇帝后来成为一个神秘的“将来还要再次来临的皇帝”(heimlicher Zukunftskaiser)。

124.7 这个冲突在 Fredericus(腓特烈)去世后还继续存在,但 Suabia(施瓦比亚)的皇朝快走到头了。教宗 Innocens IV(依诺森)于1251年从 Lyon(里昂)回到意大利的 Perugia(佩鲁贾);他坚决反对承认任何 Staufer(施陶费尔)王为德国国王或皇帝。他绝罚了 Fredericus(腓特烈)的接班人 **Conradus IV**(康拉德,1250 - 1254年)并要求德国人反抗他。Conradus IV(康拉德四世)于1252年初率军到意大利,要接管他在那里的遗产——当时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兄 Manfredus(曼弗雷德,他是 Tarentum 塔润托的君主)替他管理意大利南部。当时,教宗很坚决反对皇帝并向英国的王子 Edmundus(埃德蒙)提供了 Sicilia(西西里亚)的王权,但这位英国的王子没有来征服那块地。Conradus(康拉德)早于1254年5月去世,年仅26岁。他的小儿子 Conradinus(康拉丁,1252年出生)无法执政,所以 Manfredus(曼弗雷德)替他管理意大利南部的事务,这样维持了 Staufer(施陶费尔)王朝。新教宗 **Alexander IV**(亚历山大四世,1254 - 1261年)虽然在态度上比较温和,但他也没有改变罗马教廷那种反 Staufer(施陶费尔)的政策。在 Wilhelmus de Hollandia(荷兰的威廉)去世后(1256年),德国的国君们又选了两个对立的人:Colonia(科隆)的派是由七位“选帝侯”(Kurfuersten)领导的——这七位“选帝侯”当时初次以独有选择国王的权利的人出现;他们当时接受了英国人的贿赂并选择英国的 Richard de Cornwallis(理查德),他是英国国王 Henricus III(亨利三世)的弟兄。他两个派别是以 Trier(特里尔)的中心的,他们选择西班牙的 Alphonsus de Castilia(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他是 Philippus de Suabia(施瓦比亚的菲利普)的孙子。实际上,德意志帝国没有元首(造成所谓的 Interregnum“空位时期”,1256 - 1273年),因为 Alphonsus(阿方索)从来没有去德国,而 Richard(理查德)虽然在 Aachen(亚琛)被加冕为王,但他只有几次来德国很短的时间。这两个外国人对德国都没有造成比

较大的影响。所谓的“帝国的理想”的思想逐渐失去了号召力，所以德国就不可挽回地分裂为一系列的独立的地区，它们彼此之间始终有冲突。到处有迷惑、动荡的状态，法律上没有保障。德国的教会的秩序和纪律也受了影响。

在意大利的 Manfredus(曼弗雷德)遭受教宗的绝罚(1257年)，但他不懈地奋斗，而且获得很多人的拥戴，所以 Sicilia(西西里)国的贵族们主动地要求他当王；他于1258年在 Palermo(巴勒莫)被加冕为王，但这一个行动违背了他对于他的侄子 Conradinus(康拉丁)的义务。他依赖于 Ghibellini(皇帝派)的支持并逐渐扩展他在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权势范围。他也占领了部分的教会国地区。当时的新教宗是 Urbanus IV(乌尔巴努斯四世，1261 - 1264年)，是一位法国人，他原来当过 Jerusalem(耶路撒冷)的宗主教。他找到了反抗皇帝的一个很有效的办法：他使教廷的政策转向法国。他提名6个新的来自法国的枢机主教，又于1263年邀请法国的 Carolus de Anjou(查理·安茹)——他是 Ludovicus IX Sanctus(圣王路易九世)的弟兄——当 Neapolis(那不勒斯)和 Sicilia(西西里)王国的国王。虽然他的亲戚劝他不要接受这个荣誉，但 Carolus(查理)仍然接受了教宗的邀请并被罗马人选为罗马的 Senator(元老)。在教宗 Clemens IV(克雷孟/革利免四世，1265 - 1268年)——他也是法国人，原来任 Narbonne(纳本)的总主教——的时期，意大利南部的命运被决定。Carolus de Anjou(查理)率军来意大利(1265年)，接受了 Sicilia(西西里)国为“采邑”(封地)，而教宗使五位枢机给他加冕，宣布他为意大利南部的国王(1266年1月)。他在 Benevento(贝内文托)的交战中(1266年2月)打败了 Manfredus(曼弗雷德)——他的对手，但他自己也阵亡。在1267年秋天，意大利的 Ghibellini(皇帝派)迫切地请求那位15岁的 Conradinus(康拉丁)来意大利——他当时是“施瓦比亚的公爵，耶路撒冷和西西里之王”。教宗也同样绝罚他和他的拥护者。虽然他在开始的时候能够克服他的敌人，但1268年8月23日在 Scurcola - Tagliacozzo(斯库克拉-塔里亚科佐)的交战决定了他的命运：他的军队遭受沉重的打击，他自己在逃跑的过程中被出卖，被逮捕。通过一个虚假的“法庭”，Carolus(查理)审判他为“叛逆者”并在 Neapolis(那不勒斯)斩首了他和十个贵族人士(1268年10月29日)。教宗没有批准这个残酷的刑罚，但他也没有采取反对措施。

124.8 这位 Conradinus(康拉丁)的逝世意味着德国的 Hohenstaufen(= Staufer 施陶费尔)王朝的灭亡——它曾经是德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皇朝。皇帝们在初期具

有优良贡献,但最后他们的目标太大,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所以在很大的程度上自己给自己招来祸害。他们的雄心是在意大利南部建立自己的国度,但这种乌托邦式的计划与教宗对意大利南部的主权有冲突。德国皇帝想长期地结合 Sicilia(西西里)国和德国,但这种尝试引起教廷的坚决反对,又使教廷依赖于一个新兴的大国——法国。当时的德国皇帝们忽略了德国在北方的需要,所以对原来的帝国的理想造成很大的损失。皇帝权威的光荣和普世性消失了,但与它有关系的宗座传统(das Papsttum,教宗的权威)也在长期的搏斗中失去了权威性和影响力。整个基督宗教世界失去了很多宗教价值和道德价值。

125

从 Gregorius X(额我略/贵格利十世)到 Coelestinus V(切来斯提努斯五世)的历代教宗(1271 - 1294 年)

历代教宗:圣 Gregorius X(额我略/贵格利十世,1271 - 1276 年);Innocens V(依诺森五世,1276 年);Hadrianus V(哈德良五世,1276 年);Johannes XXI(约翰内斯二十一世,1276 - 1277 年);Nicolaus III(尼苛劳/尼哥拉三世,1277 - 1280 年);Martinus IV(马尔提努斯四世,1281 - 1285 年);Honorius IV(霍诺利乌斯四世,1285 - 1287 年);Nicolaus IV(尼苛劳/尼哥拉四世,1288 - 1292 年);圣 Coelestinus V(切来斯提努斯五世,1294 年)。

125.1 由于德意志帝国的衰弱,法国此时成了欧洲最强大的国度,而法国的关键人物是 Ludovicus IX Sanctus(圣者路易九世,1226 - 1270 年)。从那时起,欧洲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越来越明显。法国在意大利的政策的最重要代表就是 Carolus I de Anjou(安茹王朝的查理一世),他是 Neapolis(那不勒斯)和 Sicilia(西西里)之王(1265 - 1285 年),又是罗马的“元老”和 Tuscia(图斯基亚)的摄政王。然而,教宗们却很少因这个“保护者”和“封臣”感到安慰。Clemens IV(克雷孟/革利免四世)早就抱怨说,他是一个暴君,毫无羞愧地侵犯教会的权利。Carolus(查理)也懂得在枢机团中笼络一些拥护者——在枢机团中,关于 Staufer(施陶费尔)皇帝的争论也制造了两个派别。因此,当 Clemens IV(克雷孟/革利免四世)去世后(1268 年 11 月),枢机们似乎需要 3 年的时间才达成“三分之二的人”的共识。当时他们选一

位来自意大利 Piacenza (皮亚琴察) 的总执事 Theobaldo Visconti (维斯肯提), 他取名 **Gregorius X** (额我略/贵格利十世, 1271 - 1276 年)。他有一个坦然的性格, 完全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看问题。他的努力和工作主要针对三个项目: 帮助处于极大危险的圣地 (巴勒斯坦); 与希腊教会完成合一的可能性, 以及教会内的改革。希腊人于 1261 年恢复了对君士坦丁堡的统治, 而那个“拉丁皇帝” Balduinus II (巴尔度因二世) 被迫下台。那时的征服者 Michael VIII Palaeologus (弥格尔/米迦勒八世, 1261 - 1281 年) 皇帝向罗马教宗提出“重新合一”的可能性 (1263 年), 因为他害怕来自西方的危险: 法国人在几十年的时间内都想再次征服东方的帝国。为了谈论“合一”和其他问题, 教宗早于 1272 年筹备了在 Lyon (里昂) 的主教会议 (第 14 次大公会议), 并于 1274 年 5 月到 6 月举行了这个重要会议。他们决定要为耶路撒冷和圣地的恢复奉献教会的一切收入的十分之一, 但后来再没有形成任何比较大规模的军事运动 (参见 126.5)。这次主教会议也完成了与希腊人的合一, 虽然希腊的圣职人员和希腊百姓对于拉丁人怀着很大的反感, 甚至憎恨。东方的皇帝似乎需要用暴力来对待部分圣职人员的抵抗。在和希腊使团谈判方面, 那位既有学问又有深切信仰的枢机主教 Bonaventura (波纳文都拉, 参见 135.2d) 有很大的贡献。希腊人接受了《信经》中的 Filioque (“及由圣子”), 又承认罗马教宗的首席权, 并允许了当地主教们向罗马的申诉。然而, 希腊教会可以原封不动地保持自己的礼仪和自己的习俗。这个会议也注意到改革的问题, 并宣布一系列的教规来提高纪律 [参见道明会总会长 Humbertus de Romans (亨伯特) 的备忘录, 136.3]。

其中一个规定针对选择教宗的过程, 因为当时需要缩短选教宗的时间, 这样才能避免长期的空位现象。会议文献第 2 条 (Ubi periculum) 规定, 1241 年已经被采用的“封闭式的选举” (conclave, 参见 124.4) 将来是选择教宗的固定规则 (即: 所有的枢机要在一个共同的会议室中与外界隔绝, 而他们的食物要逐渐减少, 这样促使他们早一点作决定)。后来有几个教宗再次取消了这个规定, 但 Coelestinus V (切来斯提努斯五世) 于 1294 年再次恢复了这种秩序。Clemens VI (克雷孟/革利免六世) 于 1351 年宣布了一个比较缓和的选举模式。在这一切选举模式中, 人们好像也参考了意大利各城市的选举秩序和道明会的选举制度。

在 Richard de Cornwallis (理查德) 去世后 (1272 年), 教宗催促了七个德国“选帝侯” (Kurfuersten) 选举一个新的德国王, 所以他们提名一位很杰出的伯爵: Rudolphus de Habsburg (鲁道夫, 1273 - 1291 年) 当德国王。这样他们就结束了“没

有皇帝的可怕时期”(Schiller 席勒语)。Rudolphus(鲁道夫)向教宗报告自己当选的事,而教宗以这样的言词承认他的地位:Te regem Romanorum nominamus[“我(们)称你为罗马人之王”]。在此之前(1274年),Rudolphus(鲁道夫)通过一些使者恢复了 Otto IV(奥托四世)和 Fredericus II(腓特烈二世)向罗马教会所作的一切许诺(参见 123.3),又明确说他放弃意大利南部的一切地区,在那里让 Carolus de Anjou(安茹的查理)当王。虽然教宗愿意为 Rudolphus(鲁道夫)举行加冕礼,而这位国王也有计划去罗马,但他后来没能实现这个计划。以前的“皇帝的辉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教宗 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和那位对教会有着良好态度的君主的关系非常融洽,只是教宗不久后也去世。

125.2 在 Gregorius X(额我略/贵格利十世)后出现了一些任期不长的教宗: Innocens V(依诺森五世,1276年),Hadrianus V(哈德良五世,1276年)和 Johannes XXI(约翰内斯二十一世,1276-1277年)。后者的原名是 Petrus Hispanus(西班牙的伯多禄/彼得,参见 135.3f),他本来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和医学教授。此后,一位来自意大利的 Orsini(欧西尼)家族的人士当选教宗,取名 **Nicolaus III**(尼苛劳/尼哥拉三世,1277-1280年),他是一个强有力的,也有贡献的领导,但更多注意到世俗的权力,比较忽略了宗教的深度。遗憾的是,他也太多照顾自己的家人(所谓的 Nepotismus“重用亲戚”,参见 Dante 但丁的 *Commedia, Inferno*《神曲·地狱篇》19:69)。他在强化和扩大教会国方面很成功,因为在很长的谈判后,他不但恢复了 Ancona(安科纳)地区(参见 123.2),而且也获得了 Romagna(罗曼纳)地区,就是原来的 Ravenna(拉文纳)周围的地区。Rudolphus(鲁道夫)王在德国的诸侯的同意下正式宣布要将这个地区还给宗座(1278/79年)。他又强迫 Neapolis(那不勒斯)的暴君 Carolus I de Anjou(安茹的查理王)放弃对 Tuscia(图斯基亚)地区的控制,因为该地区只是 Clemens IV(克雷孟/革利免四世)委托给他的,也要求 Carolus(查理)放弃“罗马元老”(Senator)的尊位。根据一个历史记载者(Tolomeo = Ptolemaeus de Lucca 托勒牧,1326年去世)的文献,Nicolaus(尼苛劳/尼哥拉)教宗曾经和 Rudolphus de Habsburg(鲁道夫)谈论了这样的可能性:将德意志帝国分裂为四个王国:德国(当一个世袭王国),Arelate(阿瑞拉特,即 Burgundia 勃艮第),Lombardia(伦巴第)和 Tuscia(图斯基亚);然而,这种消息的可信性一直被争论。

125.3 当时的迹象表明,希腊教会和拉丁教会之间的合一如果仅仅是政治策略,而不是信念,它就没有生命力。那些曾经达成共识的因素不久后就消失了。教

宗 Nicolaus III(尼苛劳/尼哥拉三世)要求希腊人不仅要承认“Filioque 及由子”为正确的信仰,而且也必须在他们的《信经》中插入这一条;这一点令 Michael(弥格尔/米迦勒)皇帝感到很无奈。下一任教宗, Martinus IV(马尔提努斯四世, 1281 - 1285 年)是一位法国人(原名 Simon de Brion),原先当过 Ludovicus IX(路易九世)的宰相,他完全受 Carolus de Anjou(查理)的影响,又让这个国王再次当罗马人的 Senator(“元老”)。Neapolis(那不勒斯)国的 Carolus(查理)王当时筹备攻击拜占庭的战争,而教宗在当任后不久就绝罚东方的皇帝 Michael(弥格尔/米迦勒),这样做完全符合 Carolus(查理)的需要。原来, Michael(弥格尔/米迦勒)皇帝是一个“缔造合一的皇帝”(Unionskaiser),但这个教宗认为,皇帝的行动是一种诡计,他是“分裂的保护者和异端的支持者”,所以绝罚他。当然,东方的皇帝也就中断与罗马的关系。他现在占优势,因为他在 Belgrade(贝尔格莱德)附近打败了 Carolus de Anjou(安茹的查理)的军队(1282 年)。在他去世后,他的儿子 Andronicus(安德洛尼可, 1282 - 1328 年)马上恢复了与西方教会的分裂和对立状态。那些曾经支持合一的希腊圣职人员受惩罚,而那位具有学问的宗主教 Johannes Veccus (= Bekkos)(约翰内斯·维克斯)——他深信教会合一可能的并支持合一的努力——被迫让位于一位反对合一的宗主教——Josephus(若瑟/约瑟夫);这位 Josephus(若瑟/约瑟夫)宗主教曾经在 Lyon(里昂)的会议后被迫下台。现在, Johannes Veccus(约翰内斯·维克斯)被流放。

教宗遭受很大的打击,因为 Sicilia(西西里)居民在所谓的 Sicilian Vespers(1282 年月日复活节星期一的“西西里晚祷”,即西西里人屠杀法国人的事件)成功地推翻了法国的暴政,所以教宗的朋友 Carolus(查理)王和法国的影响力都被削弱。那些起义者选择了 Petrus III de Aragon(阿拉贡的伯多禄/彼得三世)当王——他是 Manfredus(曼弗雷德)女儿 Constantia(君士坦提亚)的丈夫,而在他被处死之前, Conradinus(康拉丁)曾经将自己的权利转让给他。虽然 Martinus(马尔提努斯)教宗利用他的一切手段要保持 Carolus(查理)在 Sicilia(西西里岛)的政权——他绝罚 Petrus(伯多禄/彼得),对于这个海岛宣布“禁罚”,呼吁人们反对这些起义者等——,但法国人无法再次恢复在那里的政权。那些来自西班牙的统治者——Petrus III(伯多禄三世, 1282 - 1286 年),他的儿子 Jacobus II(雅各伯二世, 1286 - 1291 年)和 Fredericus III(腓特烈三世, 1296 - 1337 年)——能够长期巩固自己在海岛上的政权(虽然有多年的“禁罚”),而 Anjou(安茹)家族的政权只限于

Neapolis(那不勒斯)地区。

在 Martinus(马尔提努斯)教宗后有 **Honorius IV**(霍诺利乌斯四世,1285 - 1287年),他和 **Honorius III**(霍诺利乌斯三世)一样来自罗马的 Savelli(撒维利)家族。此后有 **Nicolaus IV**(尼苛劳/尼哥拉四世,1288 - 1292年),他是第一个当教宗的方济各会会士,他原是他修会的总会长。他与 Colonna(科罗纳)家族维持很密切的关系——他们当时与 Orsini(欧尔西尼)家族一样想争夺罗马的领导权。在他的任期内,西方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圣地”)的统治结束了(参见 126.5)——西方人在圣地最后的堡垒 Acco - Ptolemais(阿克)落入敌人的手(1291年)。

125.4 在 Nicolaus IV(尼苛劳/尼哥拉四世)去世后(1292年),宗座空位的时期又比较长,因为枢机们分裂为两个派:支持 Orsini(欧尔西尼)的人和 Colonna(科罗纳)的人。另外,意大利南部的 Carolus(查理)王的儿子和继承人 Carolus II de Neapoli(查理二世,1285 - 1309年)企图影响枢机们的选举。在两年三个月后,枢机们才提出一个新的教宗的名字,这是在整个教宗历史上的奇特的选举。当时有一些人说——当然他们也怀着一些自私的考虑——,在那么多“法学家教宗”之后应该有一个远离政治的、热切推行改革的、表现虔诚的教宗,他将可以全力以赴地推动教会内部的革新。还有一个因素影响了那次选举:在教宗和皇帝的冲突时期,意大利陷入一种混乱的状态,而在这种无序的情况中出现了“天使教宗”或“福音式的教宗”(Papa angelicus, Papa evangelicus)的想法——尤其那些拥护了 Joachim de Flore(约亚敬,参见 131.1)的人喜欢这种思想。11位枢机终于在1294年7月5日选定了某一位 Petrus(伯多禄/彼得)当教宗——他在意大利的 Abruzzi(阿布鲁齐山脉)的 Murrone(慕若内)创立了一个隐修会(所谓的 Murroniti 或 Coelestini)。这位隐修者勉强地接受了枢机们的选择,取名 **Coelestinus V**(切来斯提努斯五世),但他的任期没有超过5个月(从1294年的7月到12月)。人们很快发现,这位缺乏神学知识的人太天真,他不谙世事,不懂经济和政治,所以从任何方面来看,他无法完成教宗的种种任务。不久后,他就依赖于一些怀着自私谋略的顾问,也依赖于 Carolus II(查理二世)王;他回应查理王的要求,就离开罗马,将教廷迁到意大利南部的 Neapolis(那不勒斯)。他提名一些主教当枢机主教,但这又受了法国政策的影响。然而,这位教宗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在良心上感觉到不平安,所以于1294年12月13日在枢机团面前自由地、没有受强迫地放下了教宗的尊位并且回到他所喜欢的隐修生活那里去了。他的这个举动引起了很多当代人及后人

的注目和争论,有的人赞扬他(比如 Petrarca 彼特拉卡),有的人批评他(比如 Dante 但丁)。他的接班人是 Bonifatius VIII[博尼法奇乌斯八世,原来的 Gaetani(格塔尼)枢机,参见 137. 2, 4],而那些坚决反对他的人说,在当教宗之前的 Benedictus Gaetani(格塔尼)枢机虽然没有引起 Coelestinus(切来斯提努斯)教宗的辞职思想,但他还是很支持他辞职,所以那些人说,那位“天使教宗”的辞职是无效的,因为他被迫下台。Bonifatius VIII(博尼法奇乌斯八世)想,有人可能会利用这位辞职的教宗并且创造一个分裂状态,所以他将 Coelestinus(切来斯提努斯)关入在 Anagni(阿纳尼)附近的 Fumone(傅莫内)堡垒,一直到他的死亡(1296年)。根据 Philippus IV(“美男子”菲利普)的愿望,Clemens V(克雷孟/革利免五世)教宗于1313年宣布那位“天使教宗”为圣人/圣徒。

126

在 13 世纪进行的十字军运动及其结果

126.1 在 13 世纪初,十字军运动仍然有相当大的号召力。几个教宗(尤其是 Innocens III 依诺森三世)都尽力推动一些新的“远征”运动,又愿意利用教宗的资(比如通过新的“十字军什一税”)来资助这些运动。然而,那个时代的十字军运动不再和以前一样是西方基督宗教界的共同项目(或至少大部分人的共同努力),而更多是某些个别的君主或民族的行动——这个现象很明确地表现出一点:欧洲基督宗教界中间的团结已经大量地衰弱了。那些十字军运动的首要目标本来应该是恢复对圣地(巴勒斯坦地区)的统治,但是它们似乎都没有完成这个目标。一个例外是 Fredericus II(腓特烈二世)于 1228 年的运动,但这更多是一个外交活动,而不是一项军事壮举。那些“远征”从 13 世纪开始就离开了原来的目标而转向了一些新的目标,即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1203 年),埃及(1218 年和 1248 年)以及 Tunis(突尼斯,1270 年),那些十字骑士根本没有到达巴勒斯坦。在 13 世纪的岁月里,对于“恢复圣地”的兴趣和热忱也逐渐下降,有的人已经开始怀疑胜利的可能性,甚至怀疑这种运动是不是上主喜悦的事。在这样的条件下,西方人失去了耶路撒冷(1244 年)及其他的圣地要点都是一个无法阻挡的发展趋势。在当时的欧洲,可能唯一的真心愿意奉献自己的君主是法国的 Ludovicus Sanctus(“圣者”路

易)王,但他的两个十字军运动(1248年和1270年)也都失败了,所以其他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基地也都落入了穆斯林军的手里。“十字军的光荣时期”以及“伟大英雄的时代”确实过去了,虽然十字军的思想仍然存在着一段时间。

126.2 第四个十字军运动(它似乎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十字军运动)是由 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教宗推动的。这位精力饱满的教宗在上任后不久就开始鼓励人们参与十字军运动,又要求圣职人员提供一些资助,就是他们收入的四分之一。当时的十字军士兵主要是法国人,他们的领导是 Piemont(皮埃蒙)的 Montferrat(蒙费拉)的 Bonifaz(波尼法修)伯爵。他们的计划是用 Venetia(威尼斯)的船只先征服埃及,但威尼斯的 Doge(总督) Enrico Dandolo(但达罗)很聪明,他先利用这个军队,使他们占领 Dalmatia(达尔马提亚,原来南斯拉夫地区)的 Zara(撒拉城,1202年)。从那里他们转向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虽然教宗禁止他们去那里。他们去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目标是协助那位被迫下台的 Isaac II Angeius(依撒克二世,1185-1195年)皇帝及他的儿子 Alexius IV(阿雷克修斯四世)——他们是 Suabia(施瓦比亚)王 Philippus(菲利普)的岳父和内弟。十字军于1203年7月侵入城内并恢复了依撒克皇帝和他儿子的政权,但不久后,在他们中间发生一些纠纷。在1204年,那些西方来的士兵第二次攻克了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这次他们造成很大的损失,毁灭了无数的文物或古老的楼房。他们建立了一种新的“拉丁的帝国”(称为 Romania 罗马尼亚),并立 Flandria(比利时,佛兰德)的 Balduin(巴尔度因)伯爵为皇帝。然而,被征服的很多地区归于 Venetia(威尼斯)。罗马教宗 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无它选择,他必须承认所发生的事。教宗希望希腊教会能够与罗马教会合一,但他的愿望没有实现,虽然西方人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个拉丁的宗教区和一个丰富的(需要很多人员的)圣统制。然而,希腊人对西方人怀着反感,他们大多数的人不愿意服从。拜占庭的皇帝们在 Nicaea(尼西亚)和 Trapezunt(特拉佩松)避难,但于1261年再次恢复了对沦陷的首都的统治(参见125.1)。

当时的人仍然深深地受“十字军运动”理想的影响,这一点可以从1212年发生的奇异的“童子十字军”的现象看出。那时,几千个孩子很兴奋地聚集到一起,在法国有一个叫 Stephanus(斯德望/司提反)的牧童领导他们,而在德国有那个10岁的 Nicolaus de Colonia(科隆的尼哥劳/尼哥拉)来率领他们。虽然有很多人(尤其是圣职人员)劝告他们不要走,但他们仍然往南方去。他们想,那些骑士军队不能完成

的事,上主会通过一些小孩子完成!他们的运动的结局很悲惨。法国的孩子部分在地中海乘船遇难,另一部分落入一些奴隶商的手。德国的孩子大多在跨越 Alps (阿尔卑斯山脉)时就死了,他们本来想去 Genua(热那亚),但只有几个孩子达到了 Brindisi(布林德西),而在那里的人劝他们回国。

虽然有那么多挫折,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教宗没有放弃他的宏伟目标。1213年他又呼吁整个基督宗教世界抵抗伊斯兰教。第4届拉特兰大会议规定,这次十字军运动的时间应该是1217年。圣职人员都要为此在三年内奉献收入的二十分之一,教宗和枢机们要奉献他们收入的十分之一。他下任教宗 Honorius III(霍诺利乌斯三世)的任期内(1217年),一批一批的军人去东方,比如来自 Rhenus(莱茵河)下游地区的人,来自 Frisia(弗里西亚)地区的人,匈牙利的 Andreas II(安德列二世)王和奥地利的 Leopoldus VII(利奥波德七世)公爵。他们到了 Syria(叙利亚)的 Acco(阿克)堡垒,但在那里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值得一提的改变。一次去埃及的远征(1218-1221年间)仅仅在开始时比较成功,最后失败了。参与那个“埃及远征”活动的人大多都是德国人,他们的领导者是耶路撒冷的名义王 Johannes de Briene(布里耶内的约翰内斯),以及教宗的使者 Pelagius(佩拉格乌斯)。这个运动有时候被称为“第五次十字军运动”。在1219年11月他们攻克了埃及的 Damiette(达米耶特),这是 Nilus(尼罗河)的关键堡垒。然而,十字军很不小心地进入内地,而埃及人打开了尼罗河的堤坝,所以那些外地人面临了被全都消灭的危险。他们必须向埃及的 Sultan(苏丹)Malik el Kamil(马里克·尔·卡米尔)求和,后来迅速地离开了埃及(1221年8月)。

126.3 这一切努力都没有成功,所以人们希望 Fredericus II(腓特烈二世)皇帝将会兑现他在1215年作的承诺(他再一次于1220年重复了去东方的承诺)。Honorius III(霍诺利乌斯三世)教宗多次提醒皇帝,他一次又一次推迟远征的开始,虽然耶路撒冷的国王 Johannes(约翰内斯,见上)的女儿 Isabella(依撒贝拉,亦称 Jolante)是他的妻子(1223年订婚,1225年结婚),所以去东方也为他自己有好处。他终于和教宗在 San Germano(三格尔马诺)的条约(1225年)规定最后的(第九个!)出发期限:1227年8月(参见124.2)。当时就有一大群十字军在 Brindisi(布林德西)聚集,但很多人因夏天的传染病去世,其中有 Thuringia(图林根)的伯爵,他是圣 Elisabeth(依撒伯尔/伊丽莎白)的丈夫。Fredericus II(腓特烈)皇帝自己也患病,但他仍然于9月9日起程。因为他的身体情况越来越不好,他三天后在

Otranto(欧特朗托)登陆休息。教廷后来(1239年)说,他仅仅以“患病”找一个回避十字军运动的借口,他今天无法证明这个病的真或假。那位性格急躁的 Gregorius IX(额我略/贵格利九世)教宗——他是温和的 Honorius(霍诺利乌斯)的接班人——现在以严格态度处理问题并宣布对皇帝的绝罚。当意大利的教宗派和皇帝派正在打仗时,皇帝于1228年夏天率领一个很小的船队(40只船舶)到叙利亚。他的外交技巧和与穆斯林的良好关系完成了一个小的突破:他能够与埃及的苏丹 el Kamil(卡米尔)签订一个条约(在 Jaffa,1229年2月),其中规定让基督徒们再次统治耶路撒冷城(但不包括 Omar 的清真寺)、Bethlehem(白冷城/伯利恒)、Nazareth(拿撒勒)和其他的城市与堡垒,尤其那些在朝圣路(从 Acco 阿克到耶路撒冷)上的城市。然而, Fredericus(腓特烈)皇帝必须承诺协助 Sultan(苏丹),与他一起抵抗他的敌人,并且必须让给他叙利亚北部。这种让步在西方世界中引起了一些不无理由的批评。当时的休战期按规定要维持10年半。德国的 Fredericus(腓特烈)在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那里给自己加冕,当耶路撒冷的王(1229年3月),但当地的宗主教 Gerold(格若德)对圣城宣布了“禁罚”(interdictum)。不久后,皇帝回到 Apulia(阿普利亚)去了(参见124.3)。

126.4 那位 Fredericus(腓特烈)皇帝的成就只保持了15年之久。当巴勒斯坦地区的“法兰克人”不小心地与 Damascus(大马士革)的穆斯林人建立一个盟约来对付埃及的苏丹 Ejub(埃乌布)时,这个苏丹呼唤了来自中亚地区的 Chowaresmi(克瓦瑞斯米人),他们是一个骑马的暴躁的民族。他们于1244年8月24日征服和毁灭了耶路撒冷,从此以后,西方人再没有统治圣城。中亚的民族和埃及人共同在 Gaza(加沙)打败并消灭了基督徒们的军队(1244年10月18日),只有 Joppe(约佩)、Acco(阿克)和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仍然属于西方人。

这个灾难在西方那里使人们感到震惊和悲伤。1245年在 Lyon(里昂)举行的大公会议(参见124.5)呼吁人们参与十字军运动,又决定要求圣职人员在三年的时期提供他们收入的二十分之一。然而,皇帝 Fredericus II(腓特烈)和教宗 Innocens IV(依诺森四世)之间的冲突没有停止,而反对十字军运动的情绪越来越强,所以根本不能再次推动一个国际性的、大规模的运动。只有一个怀着理想的强大统治者再一次愿意奉献他的一切力量来完成这个神圣的任务,就是法国的 Ludovicus IX Sanctus(圣者路易九世,1226-1270年)。他推动和完成第6次和第7次十字军运动。第一个远征(1248年)的路线是经过 Cyprus(塞浦路斯)到埃及。

国王率领的军队相当强大,而他们于1249年6月攻克了Damiette(达米耶特),但后来的遭遇比1221年更恶劣(参见126.2)。当他们迈向Cairo(开罗)时,Ludovicus(路易)和他的军队被围,他们都被逮捕(1250年4月)。因此,法国国王没有别的选择,他必须交出Damiette(达米耶特),还得赔偿80万“拜占庭元”,才能够赎回自己和那些幸存的骑士。虽然他一直到1254年待在巴勒斯坦并解放了很多基督徒俘虏,但法国没有派遣援军,所以他也无法完成更大的事。当时(1251年)有一些无秩序的暴民聚集并口头上也支持十字军(所谓的Pastorellen = pastoreaux,“牧人运动”),但他们因自己的无序自然瓦解分散了。

126.5 在东方的基督徒不久后又失去了一块地。来自Genua(热那亚)和Venetia(威尼斯)的商人都都不和睦,再加上圣殿骑士团和约翰骑士团不能合作,所以他们的事业当然也无法发展。那位统治了埃及和叙利亚的苏丹Bibars(比巴尔,1260-1277年)于1268年征服了Joppe(约佩)和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因此,法国的国王Ludovicus(路易)于1270年再一次推动了一次十字军运动,首先要去Tunisia(突尼斯),因为他希望在那里的穆斯林统治者(Emir)愿意和他的民族接受圣洗,然后与西方人一起去攻击埃及,但这只是一个幻想。这种在Africa(阿富利加)北部的活动也符合了Ludovicus(路易)的弟兄Carolus de Anjou(安茹的查理)的利益,因为他成为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新统治者(参见124.7)。但在Carthago(迦太基)的军营中爆发了一场传染病,很多人死了,其中也有Ludovicus(路易)本人(1270年8月25日)。整个基督宗教界都为他的逝世感到悲伤。此时,Carolus de Anjou(查理)也到了军营,而在他的率领下,他们先获得了一些军事成就,后来签订和平条约。突尼斯的统治者被迫提供一些赔偿,又要向西西里交纳比以前更高的税。这就是一切十字军运动的末尾。对Gregorius X(额我略/贵格利十世)来说,拯救圣地是他的愿望——在他被选为教宗时,他正在Acco(阿克)朝圣。所以1274年在Lyon(里昂)举行的大公会议(参见125.1)又决定要再一次为东方的基督徒募捐6年之久,没有任何君主或民族愿意再一次花更多精力去协助东方的基督徒。他们只能靠自己,所以不久后失去了巴勒斯坦的最后堡垒。1289年3月,Tripolis(提里波里斯)沦陷,1291年5月他们失去了Acco(阿克),那是基督徒们的最后保障。此后,西方人主动地放弃了Tyros(提罗)、Sidon(西顿)和Beirut(贝鲁特)。虽然教宗们后来还有几次愿意解放圣地,而在1313年仍然有很多英国和法国的贵族和骑士承诺将要去巴勒斯坦朝圣,但他们没有兑现他们的诺

言。

基督宗教在欧洲东北部、亚洲和阿富利加/非洲的传播

127.1 在 13 世纪,在东海(= Balticum 波罗的海)周围各国中的传教过程继续进行,一部分采用和平手段,也有一部分采用了战争方式,而这种传教工作已经达到某种终点。在宣讲信仰和文化工作方面,最有贡献的团体是熙笃会,还有像道明会和方济各会这样新兴的修会。历代的教宗——其中最领先的是 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也都很热切地推动欧洲东北部和亚洲的传教工作,他们继续担任了整个传教事业的最高指挥。

在 Livonia(里夫尼亚,关于那里的初期传教工作参见 108.4),一位具有骑士精神的 Bremen(不来梅)圣职人员,Albertus de Buxhoevden(阿尔伯特)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他于 1199 年被祝圣为 Livonia(里夫尼亚)人的主教,于 1200 年在教宗 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的支持下与一个十字军军队一起进入那个地区,并在 1201 年在 Duena(杜纳河)的河口建立 Riga(里加)城(今天的首都),在那里建立了他的主教府。他于 1202 年创立了一个骑士团(Fratres militiae Christi“基督的士兵弟兄”,他们的会规模仿“圣殿骑士团”的会规),而且从德国继续有一批一批的十字军来到那里,所以这位主教不仅仅能够保持德国人对 Livonia(里夫尼亚)的统治,而且还征服了 Estonia(爱沙尼亚)的部分地区、Sembgallen(森伽伦)、Kurland(库尔兰)和 Oesel(厄色尔岛),并引导其居民接受基督信仰。在 1225 年,德国的 Henricus VII(亨利七世)皇帝宣布,Riga(里加)和 Dorpat(多尔帕特)的主教是德国皇帝的封臣,他们是德国的诸侯,他们的地区是德皇给予的领地(采邑)。这位 Albertus(阿尔伯特,1229 年去世)是中世纪德国最后一个伟大的传教主教,他结合宗教热忱、精力和组织能力,在 30 年的努力工作中大量地支持了基督宗教和德国文化的传播。在 1255 年,教宗 Alexander IV(亚历山大四世)确认 Riga(里加)为总教区,而 Riga(里加)的总主教的管辖范围包括上述的地区以及 Prussia(普鲁士,见下)。

127.2 居住在 Weichsel(= Wisla 维斯拉河,在今天波兰中部)以东的 Prussia

(普鲁士)民族仍然是完全外教的民族,他们顽强地抵抗基督信仰的传入(参见 108.4)。大约在 1209 年有一位熙笃会的传教士 Christianus(克瑞斯提安,可能来自 Oliva)在他们那里进行传教工作;教宗 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派遣了他并于 1215 年祝圣他为传教主教。他一开始有一些成就,但外教人的抵抗似乎完全消灭了他工作的成果,而当时派遣的十字军军队也没有什么成就。波兰公爵 Conrad de Masovia(康拉德)的公国也是在那个地区附近,他经常受 Prussia(普鲁士)部落的骚扰和侵略,所以他和 Christianus(克瑞斯提安)主教一起于 1226 年呼吁那个新兴的 Ordo Teutonicus(条顿骑士团,参见 118.4)来协助他们。条顿骑士团的大会长(Hochmeister)当时是 Hermannus de Salza(赫尔曼,1210 - 1239 年),一位具有才华和贡献的教会长上和政治家,他在 Fredericus II(腓特烈二世)皇帝的保护下以及在 Gregorius IX(额我略/贵格利九世)的许可下承担起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在长达 50 多年的搏斗中(1230 - 1283 年),条顿骑士团能够一步一步征服和开拓 Prussia(普鲁士)地区。在 1237 年他们与 Livonia(里夫尼亚)的 Fratres militiae Christi(“基督士兵弟兄会”)结合,这样获得新的力量。他们的目标是军事性的和殖民性的——德国农民进入那些无人居住的地区——但他们也没有忽略传教工作,这主要是道明会的贡献。教宗 Innocens IV(依诺森四世)于 1243 年委任他的使者 Modena(莫德纳)的主教 Wilhelmus(威廉)在那里建立几个新的教区:Kulm(库尔姆)、Pomesanien(波梅撒尼亚)、Ermland(艾姆兰德)和 Samland(撒姆兰德),它们不久后归于 Riga(里加)的总教区。条顿骑士团所占领的新地区的三分之二可以自己占据,但三分之一要交给当地的主教。这样,在 Prussia(普鲁士)地区形成了一个“条顿骑士团国度”(Deutschordensstaat),其“大会长”也是一个在德意志帝国被承认的王侯。这个国度为基督宗教文化和道德在东方的传播具有很大的贡献。“大会长”(Hochmeister)的基地自从 1309 年以来是 Marienburg(= Malbork 玛利亚堡)这个堡垒。在 14 世纪,这个“修会国度”经历了它的旺盛时期和权势的顶点,但到 14 世纪末,内部的纷争、纪律的松懈、对臣民的镇压和与波兰人及立陶宛人的持续交战导致条顿骑士团的衰落;在 1410 年在 Tannenberg(塔能贝格)的交战中,条顿骑士在他们的“大会长”Ulricus de Jungingen(乌尔里克)的率领下遭受了严重的打击。

127.3 最后认识基督的东欧民族是那些和 Prussia(普鲁士)人有亲戚关系的 Lithuania(立陶宛)人,他们的居住地区是从东海一直到 Pripet(普瑞佩特河)。由于 Ordo Teutonicus(条顿骑士团)的劝勉,他们的大公 Mindowe(明多维)于 1250 年接

受了基督信仰,而教宗 Innocens IV(依诺森四世)因此使人宣布他为立陶宛之王。教宗也为立陶宛祝圣一个主教(1253年),但 Mindowe(明多维)大公据说后来又放弃了基督信仰。十字架的宗教在100多年后才获得胜利。当时,立陶宛大公国的 Jagiello(亚盖沃)大公于1386年愿意在 Cracovia(克拉科夫)领洗,因为他要和波兰的王后 Hedwig(赫德维格)结婚。这样,基督信仰成为他的国教,而所有的臣民开始转向基督信仰,当然在初期阶段只是表面上的转变。Vilnius(维尔诺)城成为主教座。Jagiello(亚盖沃,1386-1434年)获得一个新的名字(Wladislaus II)并统治了这个合并的大国:“立陶宛-波兰”。他也于1410年在 Tannenberg(塔能贝格)的交战中打败了条顿骑士团。

127.4 在13世纪,欧洲人又开始注意到在亚洲的传教任务,这部分是由于十字军运动引起的,但更多是因蒙古人(或称 Tatares 鞑靼人)在1223年开始侵略东欧地区,在那里造成恐怖的毁灭,他们的入侵在 Silesia(西里西亚)的 Liegnitz(利格尼茨)交战后(1241年)才停止。波斯的 Nestoriani(奈斯多略/涅斯多留/聂斯托利)教派(在华亦称“景教”)曾经在亚洲传教几百年并且获得良好的成果(参见第1卷,42.5; 54.5)。这个教派在印度和中国地区都有一系列的传教点,但蒙古人的毁灭性征服也给这些传教点造成严重的打击。Nestoriani(景教)的人在第11世纪影响了 Turkmen(土库曼)民族的 Kerait(克瑞特)部落的王侯接受基督信仰——这个王侯是中国帝国的臣民,有“王汗”的称号,而他的部落都接受了信仰。欧洲人后来(在1145年后)关于这个王侯有很多美妙的传说,称他为“Prester John”(即“大司祭-王约翰内斯”)。Innocens IV(依诺森四世)教宗和法国的 Ludovicus Sanctus(圣人路易)——他当时也正在准备他的第一个十字军运动(参见126.4)——多次派遣了一些方济各会会士和道明会会士做为使者和传教士到蒙古人那里,当时的蒙古人部分上转向伊斯兰教,部分上转向一种奇怪的多宗教混合的信仰。两个方济各会会士很勇敢地到达蒙古大汗在 Karakorum(和林,今天在外蒙)的王宫,就是 Johannes de Piano di Carpine(约翰内斯·柏朗嘉宾)——他是一位来自 Abruzzi(阿布鲁齐)的意大利人,于1245年到1247年去东方,以及来自 Flandria(佛兰德,比利时)的 Wilhelmus de Rubruk(鲁布鲁克的威廉),他于1253年到1255年到东方去。他们也留下了一些宝贵的报告和游记,其中描述他们的旅程,从民族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报告都非常重要。一些来自 Venetia(威尼斯)商人家庭 Polo(波罗)的人,尤其是 Marco Polo(马克·波罗)也提供了一些关系东方(中国)的报告。然而,这

些使者和商人没有进行正式的传教工作。第一个很成功的传教士是一位来自意大利南部 Apulia(阿普利亚)的 Johannes Montecorvino(约翰内斯·孟高维诺)。这位 Johannes(约翰内斯·孟高维诺)于 1294 年到达中国的首都 Cambaluc - Peking(汗八路 - 北京),并且在那里成功地和景教徒和外教人(佛教徒)当中工作,一直到他去世那一年(1328 年)。另一些方济各会会士也协助了他,比如 Colonia(科隆)的 Arnoldus(阿尔诺德)和 Odoricus de Pordenone(和理德,1286 - 1331 年)。他们在北京和其他地方建立了一些教堂和教会团体。教宗 Clemens I(克雷孟/革利免一世)于 1307 年提名 Johannes(约翰内斯·孟高维诺)为总主教,又派遣七位方济各会传教士(他们将要当副主教协助他),但其中只有三个人到达了目的地。这些传教成果令人感到鼓舞,但遗憾的是,蒙古人的朝代被推翻了(1368 年),而新的朝代是明代,它对一切外来的因素怀着敌意,所以基督宗教在华的传教努力遇到挫折。

127.5 关于圣地的搏斗也促使人们在叙利亚和 Africa(阿富利加)北部的穆斯林居民中间进行传教工作,但这些努力似乎都毫无结果。圣 Francis de Assisio(亚西西的方济各/法兰西斯)亲自在 Damiette(达米耶特)的十字军运动(1219 年,参见 126.2)与埃及的苏丹 el Kamil(卡米尔)进行对话,但也是徒劳的。这位圣人派遣了五个会士到 Morocco(摩洛哥),而他们在那里殉道(1220 年),这就是他们所渴望的。另一些人也有同样的命运。道明会也很热切地参与传教工作,曾经派遣人到西亚地区和 Africa(阿富利加)的北部地区。在道明会内部还形成了一个专门负责近东和远东地区的传教团体,就是 Societas Peregrinantium pro Christo(“为基督去国外协会”),他们不仅仅要进行传教,而且也愿意推动教会的合一。该团体一直存在到 16 世纪。在 Tunisia(突尼斯)还有一位很有学问的方济各会第三会会士,即 Raimundus Lullus(卢尔,参见 135.3e),他最后殉道,被砸死(1316 年)。他已经更多强调用精神性的传教方式,而不用战争的方式;他曾经在 Mallorca(马略卡岛)为方济各会建立了一所传教学院。他自己懂得阿拉伯语,同时他也劝勉欧洲的学者在那些主要的大学建立一些“东方语系”(学习希腊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叙利亚语),并于 1312 年在 Vienne(维恩)召开的大公会议上也影响了主教们通过这方面的文献(参见 138.4)。然而,伊斯兰教的宗教法规很严格地禁止在伊斯兰教国度中的任何基督信仰传播,所以在那里的传教士仅仅能照顾当地的基督徒或基督徒俘虏,不能向伊斯兰教徒宣教。在巴勒斯坦地区,西方人的统治于 1291 年后消失了,方济各会在 1336 年才能够再一次进入那地区。当时,Neapolis(那不勒斯)的

国王 Robertus(罗伯特)和他的妻子 Sanzia(三基亚)与苏丹签订了一个条约,其中规定,方济各会可以在耶路撒冷照顾所谓的 Coenaculum(“晚餐室”)和两座教堂,又允许他们在圣墓的教堂中举行弥撒。从那个时候以来,方济各会就开始保护那些朝圣地点。

第二章 新兴的修会。教会生活。 教会指导下的学术和教育

128

托钵修会概论,其制度以及与教区圣职人员的关系

128. 1 和 11 世纪一样,第 12 世纪在修会生活上有着很大的创造力。因此,修会生活对于整个教会的意义和影响力也比以前大多了。这些修会的多样性在 12 世纪的开始就引起了某种困惑,所以第 4 次拉特兰会议(1215 年)和 Lyon(里昂)在 1274 年的会议都禁止了新修会的创立。虽然如此,当时就出现了两个大的托钵修会(Franciscani 方济各会和 Dominicani 道明会),这就证明当时的克修精神是多么的强烈,而这些新兴的团体多么符合时代的需要。这两个修会在整个公教(天主教)中算为最美丽的火花;他们和那些相似他们的新兴团体和组织形成了一个新的修会类型。这是因为那些托钵修会不仅仅要求成员本人过一个严格贫穷的生活,而且也要求隐修院应该是很贫穷的,只有那些最需要的物品。会士的生活费部分来自他们的体力劳动,部分来自信徒们送给他们的施舍品(要么是自由奉献的,要么是乞求的,正如他们的名字“托钵会”所说的);他们又愿意尽力为那些养活他们的信徒服务,给他们讲道或为他们作牧灵工作(听告解)。因此,他们不像古代的隐修会那样居住在一些偏僻的地区,在山区或深谷,而一般都生活在城内,又特别依赖于一个新兴的阶级,即城民中的中产阶级。古老的隐修会都有“固定在一处”(stabilitas)的圣愿,都要脱离世俗的世界,但这些托钵会生活和工作在世界之中。在当时的社会中,大部分的圣职人员已经太多受现世财富和享受的牵连,而异端邪说的传播带来了很大的危险,但这些新兴的修会人士再次恢复了“跟随基督的真正

理想”，这样在世俗化的基督宗教社会中成为真正改革的主要载体，带来了许多福利。当时的清洁派、瓦尔多派、Arnoldus de Brescia（布雷西亚的阿诺德）和 Fredericus II（腓特烈二世）皇帝都强烈地要求圣职人员要回到宗徒/使徒时代的贫穷那里去——当时的教会正处于政权和财富的顶峰状态——而这些新的修会证明了这一点：在教会内也可以合法地实现这些人所要求的理想，不会造成教会的分裂。这些新兴的修会非常热切地投入于多被忽略的牧灵工作，他们也缓和了贫富不均造成的社会冲突（当时“货币经济”刚刚开始影响人们的生活）。这些新的修会也协助了罗马教宗，他很容易可以派遣他们反抗某些地区的异端或在外教地区和穆斯林地区进行传教工作，又可以使他们完成一些教会改革或教会政治方面的目标。在神学方面，这些修会也获得了很多辉煌的成就。根据他们的目标，这些修会的会规和制度是一个中央式的组织，他们要集中他们的力量：他们的领导是一个总会长（方济各会称他为 *minister generalis*，道明会称他为 *magister generalis*），下一层的长上是各地（各国）的“省会长”，因为这些修会分为几个地区（“省”）。他们会定期地聚会，举行他们的“大会”，在这个会议上他们规定一些对整个修会有效的规律；方济各会每三年开一个大会，道明会在开始是每一年，但后来频率少了一些。

128.2 那些托钵修会的另一个特点是“第三会”，就是说，除了男修会（“第一会”）和女修会（“第二会”）以外，他们还有一个平信徒组织。“第三会”的早期形式是那些平信徒的“弟兄会”，它们自从 11 世纪末与本笃会或其他修会有关联或是从一些“行会”发展出来的（参见 115.2；117.3d）。第三会的发达形式来自 Assisi（亚西西）的圣 Franciscus（方济各/法兰西斯，参见 129.2）；其目标是为那些无法入隐修院的结婚的男女平信徒提供一种“代替方式”。这些人继续生活在世俗的世界中，他们保留了家庭生活、财产和工作，但他们遵守某一些规律并在“第一会”的指导下作某些祈祷、善功、补赎或博爱的工作（因此他们也被称为“补赎弟兄”或“补赎姐妹” *Fratres / Sorores poenitentiae*）。自从 13 世纪末以来，在“第三会”中也有一些不结婚的平信徒，他们放弃了个人的财产并在一些团体中生活（如同在隐修院一样）；后来他们成为一些正式的“修会”（所谓的 *regulierte Tertiaren* “有会规的第三会”）。很多 *Beguines*（贝居因，参见 117.3f）团体也接受了一个“第三会”的会规。尤其附属于方济各会的第三会影响了很多家庭过着一种“跟随基督的生活”，所以有的学者（比如 Harnack 哈纳克）称这些现象为“平信徒世界的隐修化”（*Monachisierung der Laienwelt*）。第三会早就产生了很多伟大的基督徒，比如圣

Elisabeth de Thuringia(图林根的伊丽莎白,1231年去世),她是匈牙利王 Andreas II(安德烈二世)的女儿,Ludovicus de Thuringia(图林根的路易,1227年去世,参见126.3)的妻子,她一生都愿意根据福音书的理想牺牲自己,为穷人和病人进行很多慈善工作;她成了德国民众最喜欢的圣人/圣徒之一,而 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九世)于1235年将她宣布为教会圣人。另一个杰出的属于“第三会”的平信徒是法国的国王 Ludovicus IX Sanctus(圣者路易九世,1270年去世),他虽然登上了宝座,但过着一个刻苦者的生活,是一个基督徒统治者中的模范人物,最后在十字军运动中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参见126.4,5)。教宗 Bonifatius VIII(博尼法奇乌斯八世)于1297年将他列入圣品(参见137.2)。

很多平信徒在临终时愿意申请进入隐修会,或愿意在隐修院内有自己的墓,这样他们至少在死亡中分享隐修院生活的种种降福。由此可见,托钵会对信徒的影响确实很大。在另一方面,托钵会会士越来越多参与了牧灵工作,他们不属于当地主教的管辖,而历代的教宗给予他们很多特权。这些因素在整个中世纪都引起了很多激烈的冲突,因为教区的圣职人员反对他们。

那些托钵会早已获得了宗座的种种特权,尤其通过 Gregorius IX(额我略/贵格利九世),而在1281年,教宗 Martinus IV(马尔提努斯四世)通过一个诏书普遍地给予他们一个新的权利:如果自己的会长和高级的教会会长上同意,会士们可以在各地讲道或听告解。这个规定不仅仅突破了“堂区界线”(就是说在某一个堂区只能有一个负责人,就是本堂神父),而且也减少了教区司铎们的收入。由于很多来自法国和德国的抱怨,教宗 Bonifatius VIII(博尼法奇乌斯八世)于1300年发表了一个法令(*Super cathedram*《在宝座之上》法令),其中规定托钵会会士可以在他们自己的教堂和在公共场所自由讲道(如果主教或他的司铎在那里不进行讲道),但在本堂的教堂中需要本堂神父的许可。另外,不是所有的会士都能“听告解”,而只有那些“最合适的人”,并且他们需要主教或教宗的批准。教宗还规定,所有的信徒都可以自由地选择在托钵会的教堂中举行他们的葬礼,但那时必须向本堂提供费用的四分之一(*Quarta funeralium* 葬礼费的四分之一)。然而,托钵会和教区圣职人员之间的纠纷还继续存在,因为双方不满足于教宗的决定,都想减少对方的权利。中世纪晚期的教宗们也必须介入于这些争论。直到 Trento(特伦托/特利腾)的大会议才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

圣 Franciscus de Assisio(方济各/法兰西斯)及方济各会

129.1 最早的和最有影响的托钵会是 Minoritae(小兄弟会)或 Franciscani(方济各会)的修会。他们的创始人是圣 Franciscus(方济各/法兰西斯),他在意大利中部的 Umbria(翁布里亚)地区的 Assisi(亚西西)出生(1181年或1182年),是富商 Peter Bernardone(贝纳多内)的儿子(他的洗名是 Johannes 约翰内斯)。这位青年享受人生并且有了“当骑士贵族”的美梦,但后来因疾病和其他的折磨(1206-1207年)经历了内心上的变化,先过了一个隐修者的祈祷和刻苦生活,又为一些穷人和麻风病人服务,或在自己家乡重建一些没有人照顾的小圣堂。他的父亲因儿子这种奇异的表现发怒并在 Assisi(亚西西)的主教面前收回 Franciscus(方济各/法兰西斯)的继承权。三年后,在1209年2月24日,Franciscus(方济各/法兰西斯)在他最喜欢的教堂——S. Maria de Angelis(“天使母后”)或 Portiuncula(“小块教堂”)——中听到关于“宗徒/使徒被派遣”的福音(参见《玛窦/马太福音》Mt 10:7下),突然很清楚地认出了自己的圣召,就是以“宗徒/使徒们的神贫和巡回讲道”的生活方式跟随基督,正如在他以前早已有人选择了这条路(参见114.1)。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与 Franciscus(方济各/法兰西斯)一起走。他们穿着当地的穷人的衣服,就是一个麻布做的带着风帽的长衣,用一条绳子作为腰带。这些被称为 Viri paenitentiales(“补赎的弟兄”)或 Fratres minores(“小兄弟会”)需要一个会规,所以 Franciscus(方济各/法兰西斯)用福音中的一些话给他们一个很简短的会规(没有被保存)。他请求教宗确认这个会规,而 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于1209年或1210年比较犹豫地口头上批准了这个新兴的团体,也允许他们做一些简单的讲道(忏悔和纪律方面的讲道)。这个兄弟会的成员人数迅速增长。这些“小兄弟”一对一对地出去,在意大利各地和其他的国度都有惊人的成就,在无数的人中唤起了新的宗教生活。Franciscus(方济各/法兰西斯)还想于1214年去 Morocco(摩洛哥),要在穆斯林地区中传教,但他仅仅来到西班牙。1219/1220年他去埃及为了使当地的苏丹皈依基督,但毫无成果(参见127.5)。

129.2 不久后,Franciscus(方济各/法兰西斯)的运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共

鸣,促使“第二会”和“第三会”的形成。修女会是一个严格封闭的隐修会。在1212年 Franciscus(方济各/法兰西斯)帮助了一个贵族女士 Clara de Assisio(克拉拉/加拉)在 St. Damiano(圣达米阿诺)的小圣堂那里建立了这种严格的女修会(称为 *pauperes Dominae de S. Damiano* 或 *Damianistae* 或 *Clarissae* 加拉会)。如上所述(参见 128.2),第三会是平信徒的协会,他们很自由地与“第一会”保持联系,同样也追求基督徒的完美生活。在1221年,支持 Franciscus(方济各/法兰西斯)的 Ugolino de Ostia(乌格里诺)枢机主教[就是后来的 Gregorius IX(额我略/贵格利九世),参见 124.3]帮助了 Franciscus(方济各/法兰西斯)为“第三会”编写一个会规。这位 Ugolino(乌格里诺)枢机具有影响力,而他也协助进一步组织第一会和第二会。在1223年, Honorius III(霍诺利乌斯三世)教宗在一个诏书中正式批准了“小兄弟会”的会规(它已经经过两次的修改)。这种“平信徒讲道会”(fromme Laienpredigerverein)——圣 Franciscus(方济各/法兰西斯)自己都没有领受司铎品,他只是一位六品(执事)——成为一个具有固定秩序的修会,它要广泛地为教会服务并在很多方面符合当代的需要和教廷的要求,但不一定都符合创始人的愿望,因为每当现实的要求影响或软化原来的理想时,他都感到很痛苦。因此,他在1221年后不再指挥他的团体,将它交给 Elias de Cortona(厄里亚斯),使他当“总代理人”。在晚年, Franciscus(方济各/法兰西斯)在身体和精神上受了很多苦,并于1224年9月4日在 Tuscia(图斯基亚)的 Alverna(阿勒维尔纳)山上在一次 *visio*(神视)中获得了耶稣的五伤。他还写了一个奇妙的赞美歌,就是“太阳兄弟之歌”(在一切受造物中赞美创世主),最后在1226年10月3日的傍晚在 Portiuncula(“小块教堂”)去世。写他传记的 Thomas de Celano(托马斯·杰拉诺)说:“他歌唱着迎接了死亡。”教宗 Gregorius IX(额我略/贵格利九世)于1228年7月16日已经宣布他为教会的圣人/圣徒。Assisi(亚西西)的 Franciscus(方济各/法兰西斯)是整个中世纪最崇高的人士之一,他是“一切隐修士中最充满博爱的,也是最可爱的”(Harnack 哈纳克语)。他也是十字军时代最纯洁的花朵,历代的人都敬佩他态度的简朴和单纯、他爱基督的力量、他对于穷困和博爱的无保留的投入、他对大自然的深切感情以及那种围拢着 *poverello d' Assisi*(亚西西的穷人)和 *ioculator Domini*(主的演员)的浪漫气氛。有的近代学者曾经说, Franciscus(方济各/法兰西斯)是一种现代的主观主义和“无信条的感情宗教”(dogmenlose Gefuehlsreligion)的先驱者(这是 Renan 和 Sabatier 等人的理论),但这类的说法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毫无疑问,

Franciscus(方济各/法兰西斯)无条件地支持教会,教会的信仰、教会的圣统制以及教会的习俗。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世纪的公教信徒(schlechthin ein mittelalterlicher katholischer Mensch),而不是近代那种宗教上的个人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关于他领受耶稣五伤(stigmatisatio,即在某人的手、脚和肋膀出现类似于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五个伤口)的事件应该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比较普遍被知道的这类现象。他自己尽力想保密这事,不让别人发现。在近代有一些学者很怀疑这事的历史性,但因为那些早期的和可靠的证人(比如两个 Elias 弟兄,Leo 弟兄,Thomas de Celano 托马斯·杰拉诺,Gregorius IX 额我略/贵格利九世教宗,Alexander IV 亚历山大四世教宗等)都有这方面的记载,所以它今天普遍被肯定为历史事实。关于 Alverna(阿勒维尔纳)山上所发生的“接受五伤事件”的时间有不同的看法(也许是1224年,也许只是临终时?)。引起争论的是对于这个事件的解释:一个真正的奇迹(相当多的理由可以肯定这个可能性)?一种自我暗示(Autosuggestion)或在超拔的状态中伤害自己?或由于苦修的渴望而伤害自己?一些人也曾经说,整个故事是一个骗局(Betrugshypothese),但这种假设今天完全被放弃了。

所谓的 Portiuncula - indulgentia(“小块教堂”的大赦)是一种特殊的大赦。如果一个信徒在8月2日去那个教堂,能够(在教会规定的条件下)获得一个大赦。根据一些传说(尤其是方济各会会士 Bartholi 巴托里大约于1325年写的 *Tractatus de indulgentia S. Mariae de Portiuncula*《论圣玛利亚小块教堂的大赦》),圣 Franciscus(方济各/法兰西斯)在一个 visio(神视)中见到了基督,而耶稣亲自允许了这种大赦;据说,教宗 Honorius III(霍诺利乌斯三世)于1216年确认了这个大赦。但实际上,最早的关于该大赦的存在的证据来自1270年和1280年。这种“大赦的传说”大概与圣 Franciscus(方济各/法兰西斯)没有关系,其中的一些理由是:那些记载 Franciscus(方济各)传记的早期作者没有提到它;方济各/法兰西斯本人很反对从教宗那里为修会获得一些特权;1215年的拉特兰会议为了反对太多和太大的“大赦”已经作了一些规定(第62条);而当时的教宗们也确实反对了太多的“大赦”,尤其是 Honorius III(霍诺利乌斯三世)。这个大赦的真正来源不明确;那些比较严格的方济各会会士(Spirituales)也不会支持它。

129.3 方济各会非常迅速地传播到各地,似乎达到欧洲每一个地区。在1282年在 Strasbourg(斯特拉斯堡)举行的大会上,方济各会已经有1583个团体在34个

会省。“小兄弟会”在1217年进入法国,1221年到了德国地区(第一个团体建立在Augsburg 奥斯堡);一位在巴黎受教育的神学家,Caesarius de Speyer(切撒留斯),建立了第一个团体;实际上,他们早几年愿意进入德国,但由于不熟悉语言和本地的习俗,他们被怀疑是一些异端的传播者。通过不懈的牧灵工作和传教工作,这个修会确实有非常大的贡献,因为它帮助恢复真正的宗教信仰,弥补教会内的缺陷。他们的创始人不愿意会士们进行学术研究,但不久后,方济各会的会士也热切地投入于各大学的神学研究,并在那里克服了教区圣职人员的抵抗(参见134.2),也创造了伟大的成就(参见135.2)。然而,在修会内部存在着一个长期的冲突,令很多人感到痛苦。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冲突早在创始人还活的时候表现出来了,而在他去世后,“神贫”的问题引起了一些棘手的争论。

引起这场争论的人主要是那位在商务和世俗任务方面很有能力的Elias de Cortona(科托纳的厄里亚斯),他在Franciscus(方济各/法兰西斯)后当总会长。他在几个地方改变了会规的一些太严格的规定,为修会获得了教宗的种种特权,又在Assisi(亚西西)建立了一个富丽堂皇的大教堂(Basilica San Francesco in Assisio“亚西西圣方济各大殿”),而且他还支持学术研究和会士们的学习精神。那些比较严格地遵守原来会规的会士因此反对他。他们按字面来解释会规和创始人的遗嘱:他的遗嘱再一次要求会士们完全放弃任何财产,禁止他们接受任何特权。这些严格派的人是Franciscus(方济各/法兰西斯)最早的朋友,比如Leo(利奥)弟兄和Caesarius de Speyer(切撒留斯)弟兄。另一些会士支持一种“中间的路线”,比如那位来自葡萄牙Lissabon(里斯本)的著名讲道家圣Antonius de Padua(帕多瓦的安托尼乌斯,1231年去世)——他也是Il Santo(《圣人》)的传奇中的一位行奇迹的人。在这种关于神贫的争论的过程中,Elias(厄里亚斯)被罢免(1239年);他投入于Fredericus II(腓特烈二世)的派别,所以Gregorius IX(额我略/贵格利九世)绝罚他并从修会中开除他(他于1253年去世,在此之前与教会和好了)。虽然如此,Elias(厄里亚斯)的基本政策在修会中占了上风。只有那位既明智又温和的Bonaventura(波纳文都拉,参见135.2d)能够在他的总会长任期内(1257-1274年)稍微调节和结合这两个派别,因为他区分两个标准:创始人的崇高理想(它没有约束力),以及教宗所批准的会规(它有约束力)。然而,在他去世后,原来的争论变得更激烈。严格派被称为Spirituales(灵性派),他们是保守的,倾向于严格主义和熙笃会院长Joachim de Fiore(约亚敬,参见131.1)那些“末世论性的”幻想。与他

们对立的是所谓的 *communitas* (“大团体”)或 *ministri*(仆人)的派别,他们的思想比较开放。教宗 *Nicolaus III*(尼苛劳/尼哥拉三世)为了让双方和好发表了一个法令(*Exiit qui seminat*《播种的出去》,1279年)。那位于1294年被选为教宗的 *Coelestinus V*(切来斯提努斯五世)认为,那些最极端的和严格的人士应该离开方济各会并且进入他自己创立的 *Coelestini - Eremiti*(切来斯丁独修会,参见125.4),但双方的冲突仍然继续存在,并且在14世纪变得更厉害(参见151.1)。

130

道明会及其他托钵修会

130.1 与方济各会同时形成的是第二个大的托钵修会,即 *Ordo Fratrum Praedicatorum* (“讲道兄弟会”)或 *Dominicani*(道明会)。它被建立是因为一些西班牙司铎很愿意在法国南部的清洁派或阿尔比派那些进行传教(参见113.2; 132.1)。圣 *Dominicus*(道明/多明我)约于1170年出生在 *Castilia*(卡斯蒂里亚)的 *Caleruega*(卡勒汝厄加),后来当 *Osma*(欧斯玛)的圣职团的 *canonicus*(成员),他获得了良好的神学教育,也有宗徒/使徒的传教精神。他和他的主教 *Diego*(*Didacus*迪达克)一起从1206年到1215年推动了在法国清洁派中的传教。他们首先在 *Pyrenaei*(比利牛斯山脉)的山脚下在 *Prouille*(普儒艺)建立了一个传教站,又创立了一个平信徒妇女协会,其目标是支持传教、接待那些皈依的清洁派妇女以及教育那些处于危险中的孩子。在1215年,*Dominicus*(圣道明)在 *Toulouse*(图卢兹)为当地的教区创办了一个“讲道会”——这个“讲道会”的成员要获得全面的神学培训,要过克修的生活,这样要为众人的灵性生活服务,尤其通过 *sancta praedicatio* (“神圣的宣讲/讲道”),就是要教育群众懂得教会的信仰内容,这样可以在异端的攻击下保卫教会。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修会从一开始就有很明确的目标,这和方济各会不同;实际上,在思想的敏锐、教育和技巧能力方面,圣 *Dominicus*(道明)超过圣 *Franciscus*(方济各/法兰西斯),但在宗教感情的热火和人格的独特性方面(*Originalitaet der Persoenlichkeit*),他不如 *Franciscus*(方济各/法兰西斯)。道明会带来一个新的因素:一个修会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为天主/上帝圣言服务”(即“讲道”),这一点确实改变了修会的概念。教宗 *Honorius III*(霍诺利乌斯三世)于

1216年承认了这个讲道会为一个遵守 Augustinus(奥古斯丁)会规的圣职团。早在1217年, Dominicus(道明)派遣他的讲道弟兄到各地去讲道,而罗马教廷也批准这个行动。1220年在 Bolonia(博洛尼亚)召开的第一个修会大会宣布,道明会是一个“托钵会”,而会士们必须放弃固定的财产和固定的收入(这大概效法方济各会的先例)。在这方面,道明会比方济各会更多保持和早期修会(熙笃会,普雷蒙特会)的联系,也没有那么严格强调神贫的义务,所以从整体来看,道明会中没有那么激烈的关于贫穷生活的内讧(参见129.3)。后来有一系列的修会效法了道明会的会规。Dominicus(道明)早于1221年8月6日在 Bolonia(博洛尼亚)去世,而 Gregorius IX(额我略/贵格利九世)于1234年册封他为圣人。第二任总会长是一个德国人,真福 Jordanus de Saxonia(约达努斯,1222-1237年),他曾经在巴黎读书,具有吸引力的人格和杰出的组织能力,他也规定了修会的会规。在他的领导下,道明会传播到很多地区,从苏格兰到叙利亚,似乎和方济各会有一样大的影响。这个修会在讲道、牧灵工作、外方传教和抵抗异端方面都有良好的成就——Gregorius IX(额我略/贵格利九世)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交给他们“宗教裁判所”的管理权(参见132.3)。道明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司铎修会”,所以它从一开始就强调神学的系统教育和神学研究的工作。道明会的会士早在1218年就进入了巴黎和博洛尼亚的大学,并在经院思想的高峰时期造就了一些杰出的神学家和哲学家(参见135.2)。在他们当中也有很多神秘神学思想家,尤其在14世纪的德国(参见146)以及在他们的修会,即 Dominicanae Sorores(道明修女会)中——这个修女会的主要会院在 Prouille(普儒艺,1217年创立)和在罗马的 San Sisto(三西斯托,1220年或1221年创立)。在德国的道明会修女的会院甚至比男修会的会院还要多。他们修会的会服是白羊毛作的。这些“讲道弟兄”也很早和一个平信徒协会有关系,就是所谓的 Militia Christi(“基督的士兵团”),他们维修和保卫教会的财产。这个平信徒会在13世纪末发展成“第三会”,就是所谓的“圣道明的补赎弟兄姐妹会”——它也传播很广,后来成为一个有会规的隐修会(ein Klosterorden regulierter Tertiaren)。

根据一些传说,圣道明发明了“玫瑰经”的祈祷方式,关于这种说法请参见133.7。

在罗马的 San Sisto(三西斯托)修女院的会规在1232年也成为 Magdalena(玛达肋纳/抹大拉)修女会所遵守的会规(她们在德国获得蓬勃的发展,也被称为“白

修女会”或“补赎会”)。这个修会是 Rudolphus de Hildesheim(希尔德斯海姆的鲁道夫)于1226/1227年创立的,而他受了那位杰出的枢机和教宗使者、熙笃会的总会长 Conradus de Urach(乌瑞克的康拉德)的推动。正如它的名字 Magdalena(玛达肋纳/抹大拉)所说,这个修女会的成员是一些皈依的罪妇或妓女小姐。

130.2 比这两个大的托钵会更早的是 Carmelitae(加尔默罗会,亦称“圣衣会”,全名 Ordo Fratrum B. Mariae Virginis de Monte Carmelo)。他们的发起人是一个十字军朝圣者,来自 Calabria(意大利卡拉布里亚)的 Bertholdus(贝尔托德,1195年去世)。他于1156年与十个朋友一起在 Carmelus(加尔默罗)山上在所谓的“Elias(厄里亚/以利亚)的山洞”那里住下,他们当隐修者。耶路撒冷的宗主教 Albertus(阿尔伯特)为这个小团体规定了一个很严格的默观式的(streng beschaulich)生活方式和会规(也许于1210年?),而 Honorius III(霍诺利乌斯三世)教宗于1226年确认这个会规。这个修会的成员长期说自己的来源是 Elias(厄里亚/以利亚)的先知派或独修传统,但这种传说没有历史根据。那位属于 Bollandistae(波兰迪斯塔历史学派)的 Daniel Papebroch(帕佩布若克,1668年后)的研究曾经动摇了这个传奇的可信度,但在不久以后有人开始激烈讨论这个问题。后来,伊斯兰教给那些在巴勒斯坦修道的人一些压力,所以他们在1238年后迁移到 Cyprus(塞浦路斯)、Sicilia(西西里岛)、法国和英国,当时他们也成为一个“托钵会”,又从“独修”的方式转向“团体修道”或一种“独修与团体混合的”方式。他们在西方第一个总会长是英国人 Simon Stock(斯托克,1242-1265年)。Innocens IV(依诺森四世)教宗于1247年为这个修会稍微放松了他们的严格规定,因为在他们的新居住地的气候比较冷,并将他们列入“托钵会”的行列。他们的会衣是棕色的。这个修会也经历快速的发展和增长,而自从15世纪(1452年后)也有一个修女会。这个修会很受欢迎,其中一些原因是他们重视对圣母的敬礼,以及关于 scapulare(圣衣)的传说。

所谓的 scapulare(斯卡普拉,圣衣)是一种披肩衣服,而本笃会、道明会和其他的修会也用它;在14世纪以前的加尔默罗会并没有太重视“圣衣”。早在1280年有一些弟兄会附属于加尔默罗会,但这些弟兄会在16世纪以前没有什么“要穿圣衣”的规定。大概在14世纪出现一个传说,即真福 Simon Stock(斯托克)在1251年7月16日有一个 vision(神视),而在这个神视中,圣母交给了他一件“圣衣”,并说谁穿着圣衣去世,谁就有得救的保障。另外,据说教宗 Johannes XXII(约翰内斯二十二世)于1322年发表一个诏书(Sabbatina = Bulla Sabbatina),其中说所有的忠

信的加尔默罗会会士和附属的弟兄会的会士能够在去世后“不久”(subito)或“在下一个星期六”(sabbato,这是另一种读法)脱离炼狱。然而,关于这个“诏书”的资料都是1461年后的资料,在此之前没有什么证据。关于Simon Stock(斯托克)的“圣衣神视”的最早期资料来自1348年。自从16世纪以来有一些教宗在他们的文件中肯定了这种“Privilegium Sabbatinum”(“周六的特权”)以及它包含的大赦,他们也允许信徒们相信那些与“圣衣”的关的承诺。

130.3 在12和13世纪形成了很多遵守Augustinus(奥古斯丁)会规的隐修会,尤其在意大利;这些隐修会被合并为后来的Ordo Sancti Augustini(Hermits of St. Augustine 奥古斯丁会)。早期的小团体主要有来自Siena(锡耶纳)附近的Maleval(马勒瓦尔)的圣Wilhelmus(威廉)于1156年创立的Wilhelmiti(威廉会);还有那位来自意大利Mantua(曼托瓦)的真福Johannes Bonus(约翰内斯·博努斯)于1217年创立的Jamboniti(杨博尼会)。然而,“杨博尼会”的会服和方济各会的会服很相似,而两个会的会士都出去收人的施舍品[所谓的terminare,因为他们在某些termini(领域)内向人要饭],所以出现了一些冲突。因此,Innocens IV(依诺森四世)于1243年规定要合并所有的在Toscana(图斯卡纳)生活的隐修者,而Alexander IV(亚历山大四世)于1256年规定要合并所有的其他的隐修者,这样为这些比较小的团体成立了一个共同的修会,即“圣奥古斯丁隐修者会”(Ordo Sancti Augustini),他们有时候被称为“奥斯定会”,但必须和那些Augustiner - Chorherren(用奥古斯丁会规的圣职团,参见117)区分。这个隐修会在某些国度中(包括德国)获得了相当蓬勃的发展,他们在中世纪晚期在研究奥古斯丁思想方面有杰出的贡献。

130.4 另一个修会是Mercedarii(慈母会,全名Ordo B. Mariae Virginis de mercede redemptionis captivorum,亦称Nolasccii 诺拉斯克会),它是于1222年在西班牙的Barcelona(巴塞罗纳)成立的,创始人是圣Petrus Nolascus(伯多禄·诺拉斯克,1256年去世)和圣Raimundus de Penaforte(瑞孟多,1275年去世,他曾在1238 - 1240年当道明会的总会长,是一位很有学问的教会法学家和伦理学家,参见110.3; 119.5)。这两个人创立了“慈母会”这个平信徒协会,其目标是解放一些落入穆斯林手里的基督徒奴隶[这就和Trinitarii(圣三会)很相似,参见117.3a]。他们的基本规律也是来自奥古斯丁的会规。在1233年或1234年,Aragon(阿拉贡)的国王Jacobus I(雅各伯一世)协助这个修会,使之成为一个有圣职人员的骑士会,而教宗

Gregorius IX(额我略/贵格利九世)于1235年批准这个新的修会。它在西班牙和意大利获得良好的发展;因为教宗 Johannes XXII(约翰内斯二十二世)于1318年规定,只有一个司铎能够当总会长,所以那些骑士们脱离了修会,而这个修会成为一些纯粹的圣职人员团体,又成为一个托钵会。他们早在13世纪有一个“第三会”,其中大部分的会员是妇女,他们于16世纪成立了“第二会”,就是“慈母会修女会”,教宗 Pius V(比约五世)于1568年批准了这个修会。

130.5 在意大利 Florentia(佛罗伦萨)曾经有7位很虔诚的商人和贵族人士,他们建立了一个赞美圣母的弟兄会,而在1233年,他们的弟兄会变成了所谓的 **Serviti**(圣仆会,全称为 *Servi Beatae Mariae Virginis* 圣母之仆会)。他们特别尊敬圣母,尤其是痛苦的圣母,于1240年接受了 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会规,1255年获得了教宗 Alexander IV(亚历山大四世)的批准。这个修会传到意大利各地、德国、波兰和匈牙利。Martinus V(马尔提努斯五世)于1424年宣布它是一个托钵会。第五任“圣仆会”的总会长是圣 Philippus Benitius(= Benizzi 贝尼基,1285年去世),他创立了他们的女修会分支(*Servae Mariae* 圣母女仆会)。他们也有一个生活在隐修院中的“第三会”,她们被称为 **Mantellati**(曼特拉提)并主要进行医疗服务;她们的创始人是圣 Juliana Falconieri(尤利安纳,1341年去世),一位来自 Florentia(佛罗伦萨)的贵族女士。

131

在12、13世纪出现的异端

131.1 在中世纪高峰时期中的旺盛宗教生活中,大约在13世纪中叶的方济各会中出现了—个相当危险的狂热的运动。同时, Averroes(阿威罗伊)的思想和国家概念的世俗化削弱了中世纪的“合一”理想(*Einheitsgedanken*),而这些思想因素逐渐也在平信徒中被传播,到处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中一个提供了新奇观念的人是 **Joachim de Flore**(= Joachim de Fiore, 约亚敬,1202年去世)。Joachim(约亚敬)是一位热爱教会的人,一位有威望的苦修者和一种熙笃会改革分支(所谓 *Ordo Florentis*)的创始人。然而,他的思想不是很谨慎的,所以他与以前的 Gilbertus de la Porree(格尔贝特,参见121.5)一样陷入了 *Tritheismus*(三神论)的错误思想。第四

届拉特兰大会议(1215年)谴责了他的著作 *De unitate Trinitatis* (《论三位一体的合一》,这部著作没有被保存)。他的另一些著作造成更不好的影响,因为他在其中谈论世界历史、教会史的发展以及自己对未来的“末世性-改革性的”期待。他的三部著作是: *Concordia Novi et Veteris Testamenti* (《新旧约的一致性》)、*Expositio in Apocalypsim* (《默示录/启示录解读》)和 *Psalterium decem chordarum* (《十条弦的圣咏集/诗篇》)。这些著作都包含一些充满想象力的数字神秘主义思想以及对《圣经》的“比喻性解释”,作者甚至宣布,不久后“圣神/圣灵”的末世性时代就会到来,而这个新的时期也会带来世俗化的教会的彻底改革。

在 Joachim (约亚敬)之前,历史学家们都以基督为核心来阐述他们的世界史,但他的历史哲学的关键概念是“三位一体”。因此,他区分三个救恩的时代(称之为 *status* 状态):第一个是“圣父”的时期,就是基督宗教以前的“文字和法律的时期”、“肉身的时期”,“结婚的人和平信徒的时期”;第二个时代是“圣子”的时代和基督宗教的时代;他根据《玛窦/马太福音》Mt 1:17 算出 42 代,每一代 30 年,共 1260 年;这个时期是“精神”和“肉体”之间的时代,就是圣职人员的时期;最后(在 1260 年后),第三个时代是“圣神/圣灵”的时代,这是隐修者的时期;一个新的隐修会(所谓的 *Ordo iustorum* “义人的修会”)将会宣讲那种 *Evangelium aeternum* (“永恒的福音”,参见《默示录/启示录》Rev 14:6),这就是对两个“约”(《新约》和《旧约》)的深入领会(所谓的 *intelligentia spiritualis* “灵性的领悟”),而在那个新的时代,一个完美的“精神性的教会”将会代替当时的“腐败的肉身教会”。

这样的说法与传统思想对“上主之城”(*civitas Dei*)的解释是针锋相对的。这种思想的“灵性主义”也太强烈,所以它对传统的“教会概念”和“圣统制概念”是一种相对化或削弱。然而,当时有很多人处于困境当中,所以他们很欢迎这类思想;尤其方济各会的严格派——称为 *Spirituales* (“灵性派”,参见 129.3)——的人很支持它。小兄弟会的总会长 Johannes de Parma (帕尔马的约翰内斯,1247-1257年)也提倡这样的思想。方济各会会士 Gerardus de Borgo San Donnino (格拉德)于 1254 年出版了他的 *Introductorius in Evangelium aeternam* (《永恒福音导论》),其中说 Joachim (约亚敬)那三部著作就是“永恒的福音”,又说,圣方济各是上主派来的新立法者和新先知,又认为,方济各会的灵性派 (*Spirituales*) 是 Joachim (约亚敬)所预报的“终末性的新修会”。马上有很多人激烈地反驳这书。教宗任命一个委员会在 Anagni (阿纳尼)研究这部著作,此后 Alexander IV (亚历山大四世)于 1255 年谴责

了这部书,判处 Gerardus(格拉德)一生不得离开隐修院。在 Arles(阿尔)召开的教省主教会议(1263年)也谴责了 Joachim(约亚敬)的著作。虽然如此,Joachim(约亚敬)的运动并没有被镇压,所以在中世纪晚期仍有相当多的人都怀着这样的思想:教会要经过革新,而教会在社会上的外在权力必须消失——这些思想又与一些政治目标掺合在一起。

与这样的因素结合的是一些很古怪的宗教行为,比如那些 flagellantes(“鞭答派”,亦称 flagellarii, flagellatores),他们在 1260/1261 年后形成了一些走到各地的群体,他们从意大利的 Perugia(佩鲁贾)出发,传到意大利中部和北部一直到德国,所以官方的教会被迫采取措施。

当那位“天使教宗”Coelestinus V(切来斯提努斯五世)于 1294 年被拥立为教宗时,Joachim(约亚敬)的概念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参见 125.4)。不久后,教宗 Bonifatius VIII(博尼法奇乌斯八世)的随身医生 Arnaldus de Villanova(阿纳德,1311 年去世),一位平信徒神学家,也传播了 Joachim(约亚敬)的种种观点,他后来也对 Clemens V(克雷孟/革利免五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方济各会中也出现了很多具有才华,但又不稳重的人物,他们的著作多引起争论;渊博的 Petrus Johannis Olivi(伯多禄/彼得·约翰内斯·欧利维,1298 年去世)是一个敏锐的、具有原创性的作者(见其 *Postilla in Apocalypsim*《关于〈默示录/启示录〉的解释》, *Quaestiones de perfectione evangelica*《论福音中的完美》,对 *Sententiae* 的注解等),他在方济各会的“神贫争论”中是“灵性派”的领导人,而他在去世以后还遭受了严厉的谴责[1312 年在 Vienne(维恩)的大公会议谴责了他的三个观点,尤其反驳了他关于灵魂和肉身的说法;教宗 Johannes XXII 约翰内斯二十二世在 1317 年或 1318 年使人毁坏他的墓]。那个著名的诗人 Jacopone da Todi(雅各布尼,1306 年去世)原来是一位律师,后来他写了一些非常虔诚的“赞美诗”(Laude),但他也曾经写过一些辛辣的讽刺 Bonifatius VIII(博尼法奇乌斯八世)的文章,因此被绝罚和关进监狱。另一个作者是 Angelus de Clareno(安格鲁斯,1337 年去世),他曾经写过方济各会“神贫争论”的历史。那位属严格苦修派的 Ubertinus de Casale(乌贝提努斯,约于 1328 年去世)的主要著作是 *Arbor vitae crucifixae Jesu*(《被钉十架耶稣的生命树》,1305 年),其中有很多 Joachim(约亚敬)式的梦想以及对 Bonifatius VIII(博尼法奇乌斯八世)的谴责。这个作者后来也反对 Johannes XXII(约翰内斯二十二世)。在中世纪晚期,这种“灵性教会”也成为名副其实的“教派”(sect),比如在 Fraticelli

(弗拉提切利, 参见 151.1), Apostolici(宗徒派)那里或在其他的中世纪晚期教派当中。

131.2 除了早期的危险教派, 比如 Cathari(清洁派, 亦称 Albigenses) 和 Waldenses(瓦尔多派, 参见 113, 114) 以外, 在第 13 世纪的教会内还有另一些造成不安因素的异端人物和教派——教会的宗教裁判所很激烈地镇压了这些教派, 甚至部分上施用武力来反对它们(参见 132)。

131.2a 曾经是巴黎著名的神学老师——Amalricus de Bena(阿马尔里克, 1206 年或 1207 年去世) 根据 Johannes Scotus Eriugena(艾利基纳, 参见 89.4) 的思想进一步说, 创造主和受造世界是一样的; 他从泛神论的角度解释“信徒是基督奥体上的肢体”。他的追随者, 所谓的 Amalricani(阿马尔里克人) 说神三次“降生成人”, 第一次是圣父在 Abraham(亚巴郎/亚伯拉罕) 内的“降生”, 圣子在基督内的降生, 以及圣神/圣灵在每一个信徒中的“降生”。他们否认各种圣事和教会的种种组织制度, 他们称教宗为“反基督”, 并在道德生活上不接受任何约束。这个教派在 1209 年在巴黎被发现。一个主教会议于 1210 年谴责他们, 而他们的领袖人物——他们的“先知”Wilhelmus(威廉), 一位金匠, 以及许多有学问的圣职人员——受惩罚, 部分的人被烧死, 部分的成员被关进监狱。在 1212 年, Amiens(亚眠) 的 Magister Godinus(格迪努斯) 也被烧死。1215 年的拉特兰主教会议再一次谴责这个异端的教派。

关于神、世界和灵魂的泛神论思想也能够在 David de Dinant(达味/大卫, 1215 年后去世) 那里发现, 他是巴黎的哲学教授。他属于 Aristoteles(亚里士多德) 派, 纯粹从逻辑学来看问题, 并且有意识地继承了古代的泛神论; 他也不担心他的新教导会走入物质主义。1210 年的巴黎主教会议规定, 他的著作 *Quaternuli*(《四方面》, 大概就是 *Liber de tomis sive de divisionibus*《论界线或区分》) 应该被烧毁。

早在 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 1216 年去世) 的时代, 在 Strasbourg(斯特拉斯堡) 出现了 Ortlieb(欧尔特里布) 及他的随从的异端, 但他们更多提出了一些理性主义的观点。对他们来说, 世界是永恒的, 耶稣只是 Joseph(若瑟/约瑟) 和 Maria 玛利亚/马利亚) 的儿子。他们为自己规定了严肃的苦修补赎并谴责结婚的人。

131.2b 所谓的 Luciferiani(路齐弗尔派)——即“撒殢(魔鬼)的崇拜者”——据说在他们的聚会中进行各种可恶的事。他们显然是从清洁派演变出来的, 因为清洁派相信一个善的力量和一个恶的力量。这种“魔鬼教”在很多国度都有一些团

体。1227年后,第一个在德国镇压他们的宗教裁判所人员是 Conradus de Marburg (康拉德),他是圣 Elisabeth de Thuringia(圣依撒伯尔/伊丽沙白,参见 128.2)的神师,是一位太严格的人。教宗 Gregorius IX(额我略/贵格利九世)于 1231 年交给了他相当广泛的特权,使他在德国镇压各种邪教。然而,他和他的助手们(Dorso 多尔索和 Johannes 约翰内斯)用一种很狂热的,部分上是违法的手段,陷害了很多人,引起民众的普遍不满意,而一些骑士于 1233 年在 Marburg(马尔堡)附近打死了 Conradus(康拉德)。虽然这种凶杀案也被处理,但结果仍然是这样的:在一段时间内,在德国地区对于异端的镇压比较松懈,不如在罗曼国度(意大利、法国、西班牙)那么严厉。

131.2c 在 13 世纪的 30 年代,德国北部的 **Stedinger**(斯特丁格,亦称 Stadingi = Gestadebewohner,即海岸居民)民族——一个爱好自由的弗里西亚部落——也为自由的独立奋斗。他们的属于 Bremen(不来梅)的总主教 Gerhard II(格尔合德二世)的管辖——他是一位居高临下的人。Stedinger(斯特丁格)人拒绝向他缴纳什一税,又于 1229 年打败了一个入侵他们地区的军队。因此,1230 年在 Bremen(不来梅)召开的主教会议宣布他们是异端人,并且绝罚他们。这一点好像是错误的,因为他们被控诉“召恶灵”、算命、用蜡像、毁灭教堂、侮辱圣体等,但这一切部分是古代外教人迷信的余波,部分上是他们独立战争的结果。在他们的情况中,宗教的奋斗和政治上的战争被混到一起,这是很不幸的,而效果很大:在 1232 年,皇帝 Fredericus II(腓特烈二世)宣布他们不受法律保护(Reichsacht),所以教宗 Gregorius IX(额我略/贵格利九世)于 1232 年到 1234 年间派遣一些十字军军团到他们那里。在 Altenesch(阿尔特恩厄施)的交战中(1234 年 5 月 27 日),这些勇敢的农民遭受了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131.2d 在 1250 年后,泛神论-寂静主义的神秘主义的追随者在施瓦比亚地区、Rhenus(莱茵河)的城市(比如 Strasbourg 斯特拉斯堡, Basilea 巴塞尔, Colonia 科隆),后来又在瑞士、荷兰及意大利出现,他们被称为“自由精神的弟兄(姐妹)”或“新精神的人”。他们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教派,而是一些彼此没有太多关联的团体。他们与 Amalricani(阿马尔里克派)大概也没有关系。这派的信徒认为,人的精神和肉身是完全自由的;他们认为,一个与上主结合的人不能够再犯罪,无论他作什么,而对他来说,祈祷和圣事没有用,甚至是有害的。因为这些异端者的宣传影响了一些 Beguines(贝居因)和 Begarden(贝格尔德)团体(参见 117.3f),他们

破坏了这些妇女团体的名声。在后来的时期，“贝居因”这个名字似乎等于“异端人士”。教会的神学家和神秘神学家，比如 Albertus Magnus(大阿尔伯特), Tauler(陶勒尔), Seuse(= Suso 苏索), Ruysbroeck(鲁斯布鲁克), Gerson(杰尔松)和 Nider(尼德尔)都曾经反驳了这些异端者。一直到中世纪末，宗教裁判所也曾经忙于对付这些异端。与那些“自由精神的弟兄”的关系的是所谓的 Illuminati(“照亮的”，亦称 Alumbrados)，他们在 15 到 17 世纪在西班牙活动。他们有神秘信仰的外貌，但也许参与某些罪行。

131.2e 那些称为 **Apostolici**(宗徒/使徒会，或“宗徒/使徒兄弟会”)的团体的创始人是 Gerardus Segarelli(色格瑞里)，他来自意大利的 Parma(帕尔玛)，本来想入方济各会，但被拒绝。因此，他和另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想恢复“宗徒/使徒生活”，就是过穷苦的生活，又进行巡回讲道。因为这些团体造成一些混乱，教宗 Honorius IV(霍诺利乌斯四世)于 1286 年和教宗 Nicolaus IV(尼苛劳四世)于 1290 年严厉禁止这个“假宗徒/使徒团体”。宗教裁判所于 1294 年审判 Gerardus Segarelli(色格瑞里)为无期徒刑，但因为他表现不好，1300 年被烧死。然而，他的接班人是 Fra Dolcino(多基诺)，他在 1300 年后更严厉地谴责教会，公开写文章骂教会为《默示录/启示录》中的“巴比伦”并预言教会在不久的将来会受到惩罚。最后，他和他的随从在 Vercelli(维切利)的一座山上建立了一个堡垒，以此为基地他去各地劫掠，但在 1307 年一个十字军军队打败了他的军团，所以他和他的妻子 Margareta(马格瑞达)被烧死。

132

与异端的搏斗。

镇压 Albigenses(阿尔比派)的战争和宗教裁判所的形成

132.1 在 13 世纪初，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清洁派(Cathari 或 Albigenses 阿尔比派)和瓦尔多派的影响很大，所以抵抗这些异端教派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任务。和以前一样，教会多次施用教导、劝勉、警告和惩罚的种种手段。为了重新赢得在意大利北部转入瓦尔多派的信徒，教宗 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在米兰组织了 Humiliati(卑微兄弟会，参见 117.3d)为一种修会，又于 1208 年创立了“公教穷人”的协会，1210 年又创立了“和好的伦巴第人”的协会；然而，这两个协会不久后

就解体了；但它们的精神和目标后来在方济各会和道明会这些托钵会的理想中获得更全面的发展。

在法国南部的 Albigenses(阿尔比派)在贵族们的保护下增加为一个庞大的力量；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当地圣职人员不够努力。部分的城民支持阿尔比派。自从1198年以来,教宗 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多次派遣了一些熙笃会会士以“教宗的使者”(legati)的身份去法国南部,但这些使者没能改进情况。当时的异端人士说教会发财了,他们谴责圣职人员的奢侈生活,而教宗的使者的奢华行为不能平息 Albigenses(阿尔比派)对教会的控诉。甚至圣 Dominicus(道明,参见 130.1)那种完全投入的服务也没有达成比较大的效果。教宗 Innocens(依诺森)在1207年呼吁法国国王 Philippus II Augustus(菲利普二世)以及其他的法国贵族人士用武力去镇压在 Toulouse(图卢兹)地区的阿尔比派异端。教宗的使者 Petrus de Castelnau(伯多禄/彼得)于1208年1月被杀死,所以教宗宣布应该用一个十字军运动来对付阿尔比派以及他们的强有力保护者,Toulouse(图卢兹)的伯爵 Raimundus VI(瑞孟德/赖孟德六世)。教宗组织了一个相当大规模的军队,其中大部分的人是法国北部的人。这就是“阿尔比战争”(1209 - 1229年)的开始,其军事领导是 Simon de Montfort(西满/西门的孟福特),而教会的领导是 Citeaux(熙笃)的院长 Arnoldus(阿诺德)。教会的人和异端的人都想很残酷地消灭对方(比如在 Beziers 贝济耶 1209年发生一次大屠杀)。这次战争也继续了很长时间,部分原因是 Simon(西满/西门)和其他贵族人士的自私自利。最终,Paris(巴黎)的和平条约(1229年)结束了这个战争,但似乎整个法国南部都遭受了破坏,而这个异端的力量被大大削弱。只有很小的清洁派团体能够继续存在,虽然后来的宗教裁判所也镇压了他们,但他们仍然暗地里活动了一段时间。

132.2 与 Albigenses(阿尔比派)的镇压有密切关系的发展是所谓的 **Inquisitio**(宗教裁判所/异端裁判所)的形成,这是一个教会机构,其目标是查寻(inquirere)异端人士和惩罚他们。如上所述(参见 114.3),中世纪对异端人士在法院中的审判来自古代那些基督徒皇帝,他们宣布了一些反对异端人和教会分裂者的法律。另外,在 Stauffer(施陶费尔)皇帝的时代(大约 1150 - 1250年)罗马的法律获得了一种“文艺复兴”(Renaissance des roemischen Rechts),而这一点也促进了宗教裁判所的形成。在12世纪的岁月里,教会和国度达成共识,要共同抵抗那个越来越严重的危险。在一些国度里(在法国北部、德国、西班牙),国君已经采取死刑的措施

来对付那些顽固不化的异端人士，一般是烧死他们，因为他们认为异端等于是和“施魔术”一样严重的罪。根据 1184 年在 Verona(维罗纳)的主教会议的先例(参见 114.3)，法国南部的主教会议——比如 Avignon(阿维尼翁)1209 年的会议和 Montpellier(蒙彼列埃)1215 年的主教会议——规定，每一个主教有义务通过一个司铎和一些可靠的平信徒在一切堂区中查清和指控其中的异端人士，又要交给他们世俗的权威为了惩罚他们。1215 年在拉特兰召开的第 12 次大公会议批准和补充这些规定(参见第 3 条)，又威胁那些不愿意在自己地区扫除异端的贵族人士：不保护正统信仰的伯爵将被绝罚，一年后被弹劾，他们也将失去自己的领土。德国的 Fredericus II(腓特烈二世)皇帝在宗教的问题上本来有很宽容的态度，但他于 1220 年用加冕礼的机会发表了一个敕令，其中规定世俗的力量应该帮助教会控制异端。他规定，那些被教会绝罚的人也不能享受帝国法律的保护(所谓的 Reichsacht)，又在几个法令中规定，异端人士“应该接受的惩罚”是火刑(1224 年为伦巴第，1231 年为西西里亚，1232 年为德国)。在阿尔比派战争后，1229 年在 Toulouse(图卢兹)召开的主教会议规定(参见第 1 条到 18 条)，查清和惩罚异端人的手续要简化。

在 Toulouse(图卢兹)的会议一方面重复了以前的规定，但一些新的规定也值得注意：那些被发现的异端人士、他们的支持者和保护者都应该遭受 *animadversio debita*(“应该的惩罚”，即烧死；参见第 1 条)。谁有意识地庇护异端人士，将失去一切财产并要受适当的体罚(第 4 条)。在哪个房子找到了一个异端人，该房子就应该被拆除，财产被没收(第 6 条)。为了预防不义的审判，只允许主教或他委派的人作出审判(第 8 条)。那些表示忏悔的异端人可以保存生命，但他们必须接受重大的补赎：他们再不能任职当官，必须从此以后在衣服上缝上两个十字架作为记号(第 10 条)。谁如果仅仅因为害怕死而放弃异端邪说，应该关进监狱(第 11 条)；这一般都意味着无期徒刑(称为 *carcer perpetuus* 或 *immuratio*)。那些先放弃异端，后又重新肯定它的人一般都被烧死。(值得注意的是，异端人士的审判都经过一种法律手续，和中国的“文字狱”不同。)

132.3 在教廷方面，Gregorius IX(额我略/贵格利九世)通过 1231 年的一次法令有计划地组织了宗教裁判所，其中也坚持火刑和其他的惩罚。宗教裁判所的法律程序基本上和谋反罪案的程序是一样的。教宗好像也参考了当时 Sicilia(西西里国)和意大利北部的刑法标准。因为教宗认为一些当地的主教在落实种种规定方面不太认真，所以 Gregorius IX(额我略/贵格利九世)于 1231 年和 1232 年将“宗

教裁判所”似乎全部都交给托钵会(尤其道明会)管理,从此以后,这些托钵会的特殊任务也是宗教裁判所方面的工作。教宗委派的那些会士具有某些特权(所谓的“教宗的裁判员”),他们并没有完全取代当地主教的法院程序,但仍然削弱了主教们的权力。很遗憾的是,教宗 Innocens IV(依诺森四世)于 1252 年规定,这些宗教裁判员可以在法院中施用古罗马法的拷打方式(*tortura* 虐待)来获得一些证据——在第 9 世纪,Nicolaus I(尼苛劳/尼哥拉一世)于 866 年曾经禁止了这种方式,说它违反人间的法律和神的法律(参见 *Responsa ad consulta Bulgarorum*《回答保加利亚人的规定》,第 86 条)。宗教裁判所的主要活动范围是那些“罗曼国家”(即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并且逐渐扩大所针对的现象:除了异端以外,他们还查清和惩罚亵渎行为(*sacrilegium*)、冒犯圣者(*blasphemia*)、不道德行为(*sodomia*)、魔术、巫婆的活动、炼丹术或改变事物的魔力(*alchemia*)等等(关于所谓 15 世纪的“西班牙裁判所”,请参见 150.3)。然而,无论是在法国或意大利,宗教裁判所没能完全消除一切异端。在德国地区,那位 Conradus de Marburg(马尔堡的康拉德)的狂热表现导致了他被暗杀(1233 年,参见 131.2b),所以宗教裁判所的活动在德国有一段时间几乎没有。

这种 *Inquisitio*(宗教裁判所)的机构对中世纪教会来说是一种重大的负担(*eine starke Belastung*)。毫无疑问,从一开始这个制度就呈现出一些严重的缺陷,尤其是控诉异端人和证人的保密规定,不允许被告有辩护律师,“异端”的概念被过分扩大了,拷打(虐待)的方式以及残酷的死刑。虽然那些被审判的人根据传统的 *Ecclesia non sinit sanguinem*(“教会不希望见到罪人的死亡”)原则被交给世俗的权威来施行死刑,但教会仍然为这些人的惩罚要承担责任。当然,如果要公平地对待宗教裁判所,必须从当代历史背景来看它,而不能从现代的标准来看它。中世纪是“信仰合一”的时代(*die Zeit der Glaubenseinheit*),所以中世纪的人认为,基督信仰是最高的价值,而放弃这个信仰是最大的叛逆和犯罪。当时的教会和国度有最亲密的关联,所以双方更顺理成章地认为,它们有权利和义务以任何方式镇压异端活动,并且可以施用当时司法制度的残忍手段,因为人们相信,那些异端教派,尤其是清洁派(*Cathari*, 参见 113.2)危害着国家的体制和社会秩序的基础。因此,当时代的神学家们也似乎都肯定了宗教裁判所的方式。比如,Thomas Aquinas(托马斯·阿奎那)一方面认为,不可以强迫犹太人和外教人接受信仰(*nullo modo sunt ad fidem compellendi... quia credere voluntatis est*“不该以任何方式强迫他们相信,因为信仰

应该是自愿的”),但他又说,那些曾经放弃了基督信仰的人遭受死刑是正当的(参见 *Summa theol.*《神学大全》, 2, 2 q. 10 ad 8, 11, ad 3)。同样,德国 13 世纪的民法文献(Volksrechte, 比如 *Sachsenspiegel*, *Schwabenspiegel*)也认同这些异端人士的死刑。当时代的人都普遍怀着这种“不宽容”的态度,而后来的人也很难走出这种观点,比如在中世纪以后仍然有残酷地镇压其他信仰的事件。在新教世界也曾经有这样的现象(比如在德国、法国、瑞士和英国),而一些宗教改革者——尤其是 Calvin(加尔文)——也认为,对放弃信仰的人采取严格惩罚(死刑等)是合理的。后来的欧洲人一步一步开始宽容地对待其他的信仰,但这先需要经历基督宗教世界的大规模分裂、启蒙时代的“容忍”思想以及现代国度的兴起。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只是某一个时代的现象,它并不是教会纪律的核心因素,也根本不属于天主教的信仰。比如,1917 年的《天主教法典》已经有这样的话: *Ad amplectendam fidem catholicam nemo invitus cogatur*(不应该强迫任何人违背自己的意愿而接受天主教信仰,参见 *Cod. iur. can.* 第 1351 条)。

133

圣事、礼仪、民间信仰和教会艺术

133.1 在圣洗(baptismus)方面,在西方教会的某些地区早就习惯于施用那种“注水”(而不是“全身浸水”)的方式,而在第 13 世纪,这种方式相当普遍。虽然如此,Albertus Magnus(大阿尔伯特)和 Thomas Aquinas(托马斯)仍然说,“浸水”(immersio)的施洗方式还是 *usus communior et laudabilior*(“比如普遍的并且比较可取的方式”)。一直到 17 和 18 世纪,罗马教会全面都施用了“注水”的方式,但希腊的教会一直到今天仍然保持“浸水”的作法,而英国的安立甘教会和一些新教的教派部分上也继续坚持这种习俗。传统的“施洗日期”(即复活节和圣神/圣灵降临节)自从 13 世纪以来似乎完全被放弃了,虽然一些人曾多次提出劝勉说应该恢复传统的日期。在 14 世纪召开的主教会议仅仅规定孩子们“在出生后不久”要受圣洗。

133.2 关于感恩祭礼仪、领受圣体和忏悔纪律方面的改变,请参见 119. 2, 5。在“大赦”(indulgentiae,赦罪罚)方面已经出现了某些不良现象(参见 119. 4)。第

4 届拉特兰会议(1215 年,会议文献第 62 条)禁止主教们给予太多的或期限太长的(超过一年的)“大赦”,以免“削弱补赎的意义”。1215 年的会议也通过一些规定预防那些 *quaestores eleemosynarum*(“收大赦奉献者”)的某些不良行为——这些“收奉献者”当时宣布,如果有人帮助建立教堂、医院或其他有助于公益的机构,可以获得“大赦”。另一个大的改变是这个:教宗 *Innocens IV*(依诺森四世,1243 - 1254 年)有时候允许某些虔诚的修道人一个“大赦”(即赦免一切罪罚),虽然这些人没有参与十字军运动——在此之前的传统看法是,只有那些十字军可以获得“大赦”。关于所谓的 *Portiuncula*(波提翁库拉)大赦,参见 129.2。自从 *Nicolaus IV*(尼苛劳/尼哥拉四世,1288 - 1292 年)以来,教宗给予的大赦的次数增多了。那些“收奉献者”的行为有时候不恰当,而一些严肃的人物,比如 *Albertus Magnus*(大阿尔伯特)、*Bertholdus de Regensburg*(雷根斯堡的贝尔托德)与 *Humbertus de Romans*(亨伯特,参见 136.3)也曾经多次提出了这方面的批评。各地的教区会议和教省的主教会议都曾经反对这些不良表现。

133.3 在 12 和 13 世纪的 *praedicatio*(讲道/布道,参见 98.4)走上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因为教会的改革、十字军运动、抵抗异端的工作以及那些新兴的修会都提供了很多思想上的刺激。经院思想为讲道的技术提供了更严格的训练,这样形成那种有修辞学水平的、内容结构精美的以及有逻辑表达的 *sermo*(“道理”)。尤其那些托钵修会培养了“向民众的讲道”(Volkspredigt)的能力。那时最有名的讲道家是圣 *Bernardus*(伯尔纳德,他被称为 *mellifluus*“流蜜的”,参见 116.3; 122.2), 圣 *Antonius de Padua*(帕多瓦的安托尼,参见 129.3), 圣 *Bonaventura*(波纳文都拉,参见 135.2d), *Bertholdus de Regensburg*(贝尔托德,1272 年去世)以及 *David de Augsburg*(达味/大卫,1272 年去世);最后 4 个人都是方济各会会士。在整个中世纪的德国,*Bertholdus*(贝尔托德)大概算为最伟大的群众讲道家和民间传教士。他多次巡回各地,曾经去了德国南部、瑞士、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等,在各地获得无比的成就。他的出口成章,充满激情和同情地描述人生的光辉和堕落,描绘和谴责各个社会阶层的罪行,热切要求人们在道德上的改进。他的大部道理保存着拉丁文的稿子,但他经常用德语来讲道。他的忠实朋友和伴侣 *David*(达味/大卫)写过一个(拉丁语的)“初学生教导”以及一些德语写的灵修文章,它们具有吸引力;根据一般的说法,这位 *David*(达味/大卫)也曾经是 *inquisitor*(宗教裁判员)。

133.4 当时最重要的新节日是 *Festum Sanctissimi Corporis Christi*(圣体节,德语

称 Fronleichnamfest)。在 Liege(列日)附近的 Mont - Cornillon(克尼翁山)隐修院中修道的奥古斯丁会修女真福 Juliana(尤利安纳,1258 年去世)的一些神视(visiones)引起了对这个节日的重视,它最初只限于 Liege(列日)教区(1246 年)。教宗 Urbanus IV(乌尔巴努斯四世)——他早期在 Liege(列日)当过总执事——于 1264 年宣布这个节日为全教会的节日:“为了摧毁异端人的不忠和愚蠢”。他规定该节日要在圣神/圣灵降临节后第二个星期四(即圣三节后的星期四)举行。当时最伟大的神学家,圣 Thomas Aquinas(托马斯·阿奎那)编写了该节日的祈祷经文和那些优美的赞美诗。然而,教宗 Urbanus(乌尔巴努斯)不久后去世,而他的规定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 Clemens V(克雷孟/革利免五世)大约在 1314 年必须再一次重申这个规定。个别教堂当时已经举行了一个 processio theophorica(“带圣体的游行”),比如在 Colonia(科隆)早在 1279 年以前就有这种习惯,但这种圣体游行在 14 世纪才成为普遍的习俗,成为该节日的典型表现。

133.5 在充满宗教情怀的 13 世纪中,所谓的 *pietas popularis*(民众的信仰表现,德语称 *Volksfroemigkeit*)深受托钵修会的影响,所以更强调细节、个人和情感(Zug zum Individuellen, Persoenlichen und Gefuehlsmaessigen);比如,人们开始尊敬耶稣的受苦受难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那种“神秘思想”(mystica,参见 122)更多影响了人们对于“完美”的追求,尤其在各地的隐修院中。德国的 Eisleben(艾斯莱本)附近的 Helfta(赫尔弗塔)的熙笃会修女院在 13 世纪下半叶成为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地点,而一些 Thuringia(图林根)贵族妇女都去那里学习。在那里有好几个修女用圆通的拉丁语写出她们的灵修体验,比如那位具有想象力的 Mechtildis de Hackeborn(梅希特尔德,1299 年去世,著有 *Liber specialis gratiae*《特恩之书》)以及充满热切爱慕的 Gertrudis Magna(大格尔特儒德,1302 年去世,著有 *Legatus divinae pietatis*《神爱的使者》);这些修女的灵感很多来自教会的礼仪。那位具男人气魄的 Beguine(贝居因)女士 Mechtildis de Magdeburga(梅希特尔德,约于 1285 年去世)原来受了道明会会士的指导,她于 1270 年来到 Helfta(赫尔弗塔)的修女院,并以形象化的德语描述了天主对她的启示和神视(著作 *Fliessendes Licht der Gottheit*《如波的神光》)。一位与她们可以媲美的意大利女神秘神学家是真福 Angela de Foligno(安格拉,1309 年去世)。她于 1285 年脱离了世俗的生活,成为圣方济各会第三会的成员并过着一个严格苦修的生活,紧紧跟着基督。她的神师记载了天主对她的启示和神视。

133.6 正如在中世纪的早期阶段,在中世纪全盛时期对圣人/圣徒和圣物/圣髑的尊敬也很普遍(参见 100.3)。通过那些十字军运动(尤其是第4个十字军运动,即1204年对君士坦丁堡的劫掠,参见126.2)有一大批圣物(*reliquiae*)被带到西欧,其中也有很多是可疑的东西或假造的“圣物”。遗憾的是,教会有时候没有足够强烈抵抗这方面的滥用(比如圣物买卖和圣物的盗窃)。在这些圣物中,基督的“殓布”或“汗巾”(sacra sindon, sacrum sudarium, 英语称 holy shroud; 参见《玛窦/马太福音》Mt 27:59 和《若望/约翰福音》Jn 20:6f)是最贵重的。据说,40多个地方都保存着这个“圣布”,但没有一个地方的“殓布”能够被证明是真实的,包括在意大利 Turino(都灵)保存的 Sacra Sindone(圣布),比如教宗 Clemens VII(克雷孟七世)于1390年1月6日发表的诏书说,上面的图是人画的。

在法国南部的 Cadouin(卡者因)的一座熙笃会教堂800年以来保存着一个“基督的汗巾”(sudarium Christi),据说是第一个十字军运动的领导 Adhemar de Puy(阿德马尔,参见109.1)于1098年在 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发现的。根据一位熙笃会会士于1644年写的报告,这张布已经完成了2000多个奇迹,其中使60个人复活!然而,20世纪的仔细研究的结果显示,这个布是阿拉伯人作的,因为织入了一些祝福穆罕默德的话,又祝福了 Emir Moustā Ali(穆斯塔·阿里)——这个人曾经是埃及的统治者(1094-1101年)。

关于圣人/圣徒的文学(所谓 Hagiographie)在中世纪全盛时期和中世纪晚期经历了一个繁荣的阶段。那些“圣人故事”(圣徒传奇,即 *legenda*)是民众最喜欢阅读的书。这些圣人故事的特点是对于神的深厚信赖以及强烈的刻苦精神,但也有“轻信”和“求奇迹”的因素。圣人故事的最杰出的搜集者和编写者是熙笃会会士 Caesarius de Heisterbach(切撒留斯,约于1240年去世,著有 *Dialogus miraculorum*《谈奇迹》、*Libri VIII miraculorum*《奇迹之书》),曾经宣讲十字军的奥古斯丁圣职团团员和枢机 Jacobus de Vitry(雅各伯,1240年去世,著有 *Sermones*《讲道书》, *Exempla*《榜样》);道明会会士 Thomas de Chantimpre(托马斯,约于1270年去世,著有 *Bonum universale de apibus*《蜜蜂的公益理念》等)以及意大利的道明会会士 Jacobus de Voragine(= Varagine 即 Savona 萨沃纳附近的 Varazze 的雅各伯),他后来当 Genua(热那亚)的总主教(1298年去世)。这位 Jacobus(雅各伯)写的 *Legenda sanctorum*(《诸圣人列传》)后来成为非常受欢迎的书,不久被称为 *Legenda aurea*(《金传》)。虽然这部著作也有一定的缺陷,但对于民众的宗教教育起了重要的作

用,对于那些研究中世纪社会学和文化史的人也具有很大的价值。

133.7 对于圣母 **Maria**(玛利亚)的尊敬在 12、13 世纪都特别受重视,无论是在那些新兴的修会或在民间。经院思想为这种信仰的表现提供了一个理论的基础,称之为 *cultus hyperduliae*(“超级敬礼”,因为只有神可以 *adorare*“朝拜”)。讲道者和民间的诗歌为这个“可爱的婢女”和“天上母后”编织了一个充满感情的敬爱的光环。拜占庭的教会自从第 8 世纪庆祝了“圣母无染原罪”的节日(12 月 8 日),而这个节日在 11 和 12 世纪也传到了很多英国和法国地区,但一些人仍然反对这个节日,比如圣 **Bernardus**(伯尔纳德,参见他向里昂的圣职团写的信 *Ep. 174 ad Canonicos Lugdunenses*)。在 13 世纪,这节日获得进一步的推广,方济各会于 1263 年也接受了它。

关于那些与圣母有关的经文(如 *Salve Regina*“母后,万福”和 *Ave Maria*“圣母经”),请参见 119.3。在中世纪还有另一个祈祷方式逐渐形成,就是所谓的 *Rosarium*(玫瑰经,全名为 *Rosarium Beatae Mariae Virginis*)。在中世纪早期有一位道明会会士,即 **Alanus de Rupe**(= **Alanus de la Roche** 阿拉努斯,1475 年去世)说,圣 **Dominicus**(道明)是玫瑰经的发明者和第一个推动者,但这种说法不能成立。实际上,这个祈祷方式是从 12 世纪到 16 世纪的几百年中逐渐形成的。在基督宗教传统中,那些修道人或虔诚的信徒会每天念《圣咏集/诗篇》中的 150 篇圣咏,有时候分为三个阶段:早上念 50 篇,中午 50 篇,晚上 50 篇。后来,一些熙笃会、道明会及第三会中的虔诚人士开始用一个“珠绳”(所谓的 *Paternoster*)念 50 篇、100 篇或 150 篇“天主经/主祷文”或“圣母经”,或轮流念“天主经”和“圣母经”。在 14、15 世纪,他们又加上了对于耶稣和玛利亚生活中的一些“奥迹”的默想(即 50 到 150 个“奥迹”),这成为一个新的和重要的因素。今天的“玫瑰经”形式(即 5 个“天主经”和每次加 10 个“圣母经”以及 5 个“奥迹”)来自 16 世纪末的时代。

圣母的朝圣地很多,而其中很著名的是意大利的 **Loreto**(洛雷托),它在 13 世纪末成为一个朝圣地。据说,当基督徒们在圣地的统治崩溃时(即 1291 年,参见 126.5),神圣家庭在 **Nazareth**(拿撒勒)的房子(所谓的 **Santa Casa**)被一些天使迁移到 **Dalmatia**(达尔马提亚)的 **Tersatto**(特尔撒托),后来又移动到 **Recanati**(瑞卡纳提),最后于 1295 年来到 **Ancona**(安科纳)附近的 **Loreto**(洛雷托)。然而,关于这个故事的第一个报告出现在 170 年以后写的报告中(**Teramanus de Loreto** 约于 1465-1473 年间写的),而这个报告完全有中世纪的“传奇”特点。一位方济各会会士

Prosper Viaud(维奥)于1908年在Nazareth(拿撒勒)的“领报教堂”进行的考古学研究表明:意大利Loreto(洛雷托)的“圣家”不可能是曾经的Nazareth(拿撒勒)的老房子。根据十字军时代的游记报告,在Nazareth(拿撒勒)的圣地仅仅是一个山洞(“领报洞”),而且在山洞前面也没有房子。如果真有这样的小房子,阿拉伯人大概在他们侵入巴勒斯坦时也会拆除它。在1291年以后的游记报告也没有提到在Nazareth(拿撒勒)的圣地发生了什么变化。根据一个1193年的文献,在Loreto(洛雷托)确实有一个ecclesia Sanctae Mariae in fundo Laureti(圣母堂),而这个小教堂在14世纪初也是一个比较繁荣的朝圣地,但在1507年之前,没有任何教宗文献称它为“领报教堂”(比如Johannes XXII约翰内斯二十二世的文件没有提到这些)。教宗Julius II(尤利乌斯二世)于1507年发表的诏书称这个教堂为“圣母领报教堂”,但他又加上一句ut pie creditum et fama est(“这是虔诚人的信仰和传统的说法”)。也许这个传说和14世纪对这个教堂的称呼有关系,因为当时的人称该教堂为Domus S. Mariae de Laureto,而“Domus”可以指“地方”或“家庭”。另外,教堂中的圣母画像来自Dalmatia(达尔马提亚)的Tersatto(特尔撒托),也和传说的故事有关系。

13.8 第13世纪的教会建筑风格是成熟的Gothica(=Gotica,哥特)风格,而这个风格在Alpes(阿尔卑斯山脉)以北一直到15世纪末,在德国甚至一直到16世纪都占有主导地位。这个建筑风格在中世纪全盛时期的种种文化壮举中是一个特别优美的高峰,因为从古希腊的神殿以来,哥特的建筑物中算为古今最完美的成就之一。这个风格就是经院思想(参见121.1)以及神秘神学的风格,也是一个“真正公教的和普世性的建筑风格”,它的特点是对物质资料的高度掌握和物质的精神化(Beherrschung und Vergeistigung des Stofflichen),结构的严格规律和完整性,对于高尚者的追求和对于神的沉思。在哥特式的发祥地(法国,参见120.2),13世纪的哥特式形成了一些堂皇的大教堂,比如在Chartres(沙特尔),Remi(兰斯),Amiens(亚眠)以及圣者Ludovicus(路易)王在巴黎的宫殿教堂(La Sainte Chapelle)。在英国,哥特式有自己的特点,比如在Salisbury(萨里斯堡)的大教堂那里,以及在别的教堂。哥特式很慢才进入德国地区,并在法国的基础上(opus francigenum“法兰克人的工程”)获得了一种独立的发展,其中有“求高度”的因素值得注意。早期的哥特风格的教堂有严肃和简朴的精神,比如Marburg(马尔堡)的Elisabethkirche(圣依伯尔堂,1235-1383年间建立),以及在Trier(特里尔)的Liebfrauenkirche(圣母堂,

1242 - 1257 年间建立,这是一个哥特式的圆形建筑)。不久后,德国人在 Rhenus (莱茵河)及其他的地区建立了一些堂皇的大型教堂,而在这些教堂的建筑和装饰方面,教会主教、世俗贵族、隐修院、圣职团、各城市的城民、行会和各弟兄会争先恐后地奉献自己的能力和资源。最庄严的德国中世纪建筑物就是 Colonia(科隆)的大教堂(1248 年由 Conradus de Hochstaden 总主教开始的,1322 年完成前殿,1842 年到 1880 年间完成了长殿和两个高塔),还有 Strasbourg(斯特拉斯堡)的大堂, Freiburg(弗雷堡)的大教堂(这两个教堂还是在罗曼时代开始建立的), Halberstadt(哈贝施塔德), Regensburg(雷根斯堡)的大堂, Oppenheim(欧本海姆)的 Katharinenkirche(加大里纳教堂)以及 Luebeck(吕贝克)的 Marienkirche(圣母堂,一个砖制教堂)。在 13 世纪,哥特风格也传到意大利,并在 Siena(锡耶纳)、Orvieto(奥尔韦托)和 Florentia(佛罗伦萨)的大堂以及在很多托钵会的教堂得到良好的体现。然而,南方的风格和北方的风格不一样:意大利的哥特式房子强调宽度,不求高度,它们没有那么多支柱和扶垛,它们有独立的高塔等。

和罗马风格的“墙式建筑”不同,哥特式的建筑主要是依靠“柱子”的风格。因为这些柱子完全可以支撑上层建筑,墙似乎只有指出界线和填补的作用。在古代的巴西利卡和罗马式风格那里,整个房子的趋势是“宽度”,而在哥特式的趋势是“高度”。那些高的尖塔最清楚表达这一点,它们的顶峰是一个“花形的十字架”(Kreuzblume)。哥特式的结构性因素是尖形穹顶,加肋十字拱(Kreuzrippengewölbe),以及扶垛的体系(柱子和墙垛),这些扶垛能够承受拱顶的侧面压力。因为施用“尖形穹顶”,教堂左右的旁殿中的穹顶的数目和主殿一样,但在罗马式那里,旁殿中两个穹顶等于主殿中的一个。有时候,旁殿的高度和主殿一样(所谓的 Hallenkirche 大厅教堂)。这种“大厅教堂”风格在德国比较多,而在法国地区比较多能够见到前殿周围的许多小殿(Kapellenkranz)。原来的 Apsis(圆形前殿)在哥特式那里再不是圆形的,而是一个多角形。

133.9 与建筑有关系的雕塑艺术获得很多发展的机会,因为哥特式的教堂得到了丰富的装饰。人们喜欢用画像、塑像和浮雕来美化讲道台、施洗盆、祭坛(参见 120.3)、前殿的椅子、门、外墙以及柱子。这些雕塑品表达《圣经》中的故事、比喻式的拟人的价值或救恩史中的景象,从“创造世界”一直到“世界的审判”。在法国地区,哥特式的雕塑技术很快达到一个高峰。在德国,这些雕塑品在初期阶段与罗马式的风格是分不开的(参见 120.4),但也有很杰出的作品,比如在 Bamberg(班贝

格)和 Naumburg(瑙姆堡)的大堂,以及在 Muenster(明斯特)和 Strasbourg(斯特拉斯堡)的大堂。在意大利的美术在同样的时期内已获得了重大的发展,这是因为他们很认真研究大自然,又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古代的风格。这种转变的发动人是 Niccolo Pisano(尼克罗·皮撒诺,约 1206-1280 年)和他的儿子 Giovanni Pisano(乔瓦尼·皮撒诺,1250-1328 年),前者创造了 Pisa(比萨)的施洗堂以及 Siena(锡耶纳)大堂中的讲道台,后者在 Pistoia(皮斯托亚)的大堂中创造了一个讲道台。

在意大利地区,方济各会的运动为教会的艺术带来了新的因素。在此,绘画的艺术也首次获得了比较独立的生活。比如,那位来自 Florentia(佛罗伦萨)的 Cimabue(契马布埃,1240-1302 年)脱离了拜占庭模式的羁绊,使他所画的人像再一次有更多灵性和活力(参见他在 Assisi 圣方济各堂的墙画)。因为北方的哥特式教堂的墙面不大,绘画的艺术没有那么多发展的机会。然而,人们更多培养了一种最早出现在 9 世纪的艺术:玻璃画在法国和德国很快结出了一些美丽的成果。

134

大学的兴起及其影响

134.1 在中世纪全盛时期中,高等教育似乎完全属于教会的指导和监督,如同在以前的时期一样。在早期的阶段,教育的种种形式基本上也是一样的(参见 89.1)。然而,随着文化和知识追求的普遍提高,教育制度也经历了一些改变。因为以前的隐修院学校、大教堂学校和圣职团的学校在很多地方没有获得良好的发展,一些(不属于隐修会或圣职团的)学者独立地选择了“当教师”为自己一生的职责,尤其在 Paris(巴黎)和 Bolonia(博洛尼亚)是这样的。这些教师非常能干,而且他们施用新的逻辑学方法(die neue dialektische Methode)来处理哲学和神学问题(在巴黎)以及罗马法和教会法(在博洛尼亚,参见 89.6; 110.3; 121.1)。因此,很多学生来向这些老师求教,他们这样推动了学术和教育的一次新的崛起。这些“自由的学校”在开始的阶段没有规律,也没有稳定性,但大约在 1200 年前后它们完成了一个关键的发展并形成一些高等的学府,首先在巴黎的 Seine(塞纳河)的岛上,在 Notre Dame(圣母院)大堂的地区。这种发展意味着,一些新型的最高级的和普遍的教育机构形成了。主要的学科是:神学、法学、医学,而这些学科的共同基础和

“预备课程”是哲学,即所谓的 *artes* (或 *artes liberales* “自由学科”,即语文、修辞学、逻辑学、数学、几何、天文学、音乐)。这些学科的老师形成一个“协会”,为了确保他们的利益,创立了自己的“制度规章”以及获得了国度和教会的认可,又获得很多重要的特权(个人安全、自治权、自由的法院、免税的权利、颁发学位的权利,而上课的圣职人员可以暂时离开自己的教区)。这些高等学府在中世纪通常被称为 *studium generale* (“普遍学院”),与那些只包括个别学科的 *studium particulare* (“局部学校”)有区别。在 14 世纪末,人们才开始称这些学校为 *universitas* (大学),因为它们包含一切学科(*universitas literarum* “各学科的大一体”)——这种称呼最早出现在德国。在早期,*universitas* (“大学”)这个称呼指老师们的协会(所谓的 *facultates*)或来自各国的学生组织(所谓的 *nationes*)或一个大学的老师和学生共同形成的综合性组织(所谓的 *universitas magistrorum et scholarium*)。

和巴黎大学一样,在 *Bolonia* (博洛尼亚)和 *Oxford* (牛津)的大学也是自发地形成的(*ex consuetudine* “根据自由的传统”),而且大约是在同样的时期形成的。在 13 世纪还出现了很多别的地方的大学,但它们大部分是 *ex privilegio* (出于规定)建立的,就是说某一个教宗、皇帝或国君创立它们并给予老师和学生们所需要的特权。比如 *Gregorius IX* (额我略/贵格利九世)于 1229 年创立了 *Toulouse* (图卢兹)大学,*Innocens IV* (依诺森四世)在 1244/45 年在罗马教廷创立了一个 *studium generale* (“普遍学院”),*Fredericus II* (腓特烈二世)皇帝于 1224 年创立了 *Neapolis* (那不勒斯)的大学,*Castilia* (卡斯蒂利亚)的 *Ferdinandus III* (斐迪南三世)于 1243 年创立了 *Salamanca* (萨拉曼卡)大学。在 1400 年以前,欧洲已经有 44 所大学,其中有 31 所拥有教宗的认可书,而 21 所大学完全是教宗独立创立的,它们没有皇帝或国君的认可书。第 13 世纪所有的欧洲大学都属于罗曼国家(除了英国的大学外)。德国和其他的北欧国家在 14 世纪才创办了一些大学(参见 145.1)。毫无疑问,中世纪的大学都有浓厚的教会色彩:教宗被视为教导和教育的最高监督者,只有在他的批准后,大学才能够成立并能够颁发所谓的 *facultas ubique docendi* (“在各处任教的资格”,“教师证”)。在一切课程当中,神学具有主导地位。大部分的老师是圣职人员,他们的收入是教会提供的,而中世纪的大学集体地和非常隆重地庆祝了他们的主保的节日。

134.2 中世纪的大学是由基督徒的团体精神创立的,它们的基础是一个共同的世界观,而他们的影响力是普遍的。它们是高级文化的最优美表现之一,而它们

也表明另一个事实：在当时的精神生活方面，教会的统治地位仍然没有被动摇。最有威望的大学是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这两所大学的制度规章成为许多别的大学的模范。Bolonia(博洛尼亚)的法学学校自从11世纪以来在全世界上都享受崇高的声誉(参见 Bononia docet“博洛尼亚说”这样的成语)。很多德国学生也在博洛尼亚学习法律。Paris(巴黎)主要是“哲学家和神学家之城”。在巴黎大学的学生中，学习 artes(七个“自由学科”)的学生占多数；他们被分为四个民族：法国人、Picardes(法国北部、荷兰人)、诺曼人以及英国人(德国人和其他的北欧人包括在“英国人”内)。根据一些资料，1300年的巴黎大学有2万到3万个学生，但这个数字肯定是夸大的。这些研究的最高指导者一直到13世纪末都是 Notre Dame(圣母院大堂)的主教(bischoefliche Kanzler, Scholastikus)。两个大的托钵修会早在1218年和1220年在巴黎建立了他们的团体的学校，并派遣一些会士在大学中任教，这些人士也获得了教授的资格(道明会于1229年，方济各会于1231年)。这些会士培养了最杰出的大学人才(参见135)，而巴黎大学在国际范围上的吸引力在很大的程度来自这些修会会士。部分的教区司铎在 Wilhelmus de Saint - Amour(威廉)的领导下在1252年后激烈地反对在大学任教的修会会士，Wilhelmus(威廉)写了一篇尖锐的文章(*De periculis novissimorum temporum*《论近代的危险》，1255年)，而在1269年和1270年又有一些巴黎大学的教师在 Gerhardus de Abbeville(格尔哈德)和 Nicolaus de Lisieux(尼古拉斯)的指导下谴责了在大学任教的托钵会士，但他们仍然能够在大学扎根，Thomas Aquinas(托马斯)和 Bonaventura(波纳文都拉)等人巧妙地替他们辩护，而 Alexander IV(亚历山大四世)也保护他们。从13到15世纪，巴黎大学(简称“studium”)除了罗马宗座(sacerdotium)和德国皇帝(imperium)以外似乎成为欧洲第三个超级权力，在政治上也曾经几次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人们创立了一些学生协会(所谓的 Burse, collegium, alumnatus, convictum)为了支持那些穷的学生或保护学生不遭受坏影响。最重要的学生会是 Robertus de Sorbon(罗伯特)于1257年在巴黎创立的学生院——Robertus(罗伯特)是 Ludovicus Sanctus(圣者路易)的宫廷司铎，而他的学生会后来被称为 Sorbonne(索邦学院)。这个学生会的影响非常大，所以自从16世纪以来，整个巴黎大学的神学院被称为“索邦”。在巴黎的修会团体一般都有自己的学院，而在这些学院中也有人讲课。

经院思想的兴旺时期

135.1 在 12 世纪的岁月中,经院思想传统逐渐获得更大的影响力,而在 13 世纪进入了它的兴旺时期。这种进步和提升主要和大学的兴起有关系,也和托钵会在学术领域中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参见 134.2)。一个尤其重要的因素是新的非常有价值的知识资料的输入,因为在此之前西欧的基督徒思想家和哲学家仅仅认识 Aristoteles(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主要是通过 Boethius(波伊提乌斯,参见第 1 卷,78.2)的翻译和注释本。自从 13 世纪下半叶,他们也逐渐接触到——主要通过穆斯林的西班牙地区——那位希腊天才(亚里士多德)的其他著作,即物理学、形而上学、心理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的著作,最早不是以纯粹的形式,因为那些拉丁语的翻译本和穆斯林或犹太学者的注解本也带来了一些理性主义或泛神论的观念——大部分的拉丁译本是根据阿拉伯语翻译的,而 Segovia(塞格维亚)的总执事 Dominicus Gundissalinus(多米尼库斯)在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这些理性主义和泛神论的观念,一个在巴黎召开的教省主教会议(1210 年)禁止学者们在大学中讲述 Aristoteles(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科学著作和形而上学著作,而教宗的使者 Robertus de Curcon(罗伯特)于 1215 年再一次重复这个禁令;Gregorius IX(额我略/贵格利九世)和 Urbanus IV(乌尔巴努斯四世)也重新肯定这个禁令。实际上,13 世纪初的巴黎教授 Amalricus de Bena(阿马尔里克)和 David de Dinant(达味/大卫,参见 131.2a)的反教会主张已经充分地揭露出大学环境中隐藏着什么危险。虽然有那么多阻碍因素,但亚里士多德的文献还是能够一步一步地成为主流思想,这是因为在学术的教学中,他的著作非常有用。正如 Gregorius IX(额我略/贵格利九世)所要求的那样,人们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排除了那些不符合信仰的主张,又开始提供一些更好的,直接根据希腊文来的译本。在这方面很有贡献的人是 Flandria(佛兰德,比利时)的道明会会士 Wilhelmus de Moerbeke(威廉,1286 年去世),他回应了 Thomas Aquinas(托马斯)的劝勉开始翻译这些文献,后来又当 Corinthus(格林多/哥林多)的总主教。通过 Albertus Magnus(大阿尔伯特)和 Thomas(托马斯)的思想工作,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受到净化和一种有基督信仰特征

的解释,这样 Aristoteles(亚里士多德)成为经院思想的标准和权威,他就是“经院思想的哲学家”,而一种温和的、有亚里士多德特征的 realismus(实在论,即理念是一种实在)成为第13世纪的主流世界观——这一点不仅仅对哲学和神学,而且也对物理学、自然科学和政治思想非常重要。那种更古老的、建立在 Augustinus(奥古斯丁)和 Platon(柏拉图)的基础上的思想(参见121.2)走向衰弱,但在方济各会那里,很多人仍然支持它,而个别的道明会会士也继续拥护它。在英国(Oxford 牛津)那里,一种比较自由的风气在一段时间内占了上风,它特别注重自然哲学和种种自然科学。不同的学派和思想体系之间的冲突和争论——尤其是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奥古斯丁主义之间的争论——相当活跃并对于当时的科学进步非常重要。然而,阿拉伯的理性主义和泛神论的危险仍然存在,比如当时有一些人传播了所谓的“拉丁语的阿威洛伊主义”(lateinischer Averroismus)。这种思想的创始人是一位穆斯林哲学家——Averroes(= Ibn Roshd 阿威洛伊,1126-1198年),而受他影响的巴黎大学著名教授 Siger de Brabant(希格尔,1282年去世)——Dante(但丁)在《神曲》(Paradiso X, 136)赞美他为“永恒的光明”——以及他的同事 Boetius de Dacia(丹麦或瑞典来的波伊提乌斯)提出了一些与基督信仰无法调和的主张:就是关于世界的形成、人的灵魂、自由意志的特殊观点。有人曾经说,这些学者也已经提出了关于哲学和神学的“双重真理”的灾难性观点,但这一点是不确定的。巴黎的主教 Stephanus Tempier(坦皮耶)于1270年谴责了这些人的13个命题,于1277年又谴责了他们的219条主张。此后,Siger(希格尔)好像放弃了自己的特殊主张,回归到比较正统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中。然而,Averroes(阿威洛伊)的思想因素潜移默化地继续影响了哲学,后来在法国和意大利也有一定的影响(参见139.2; 155.3)。

135.2 在经院思想的高峰时期,学术进步的主要载体是一些属于新创立的托钵会的人,即方济各会和道明会会士。主要的思想工作是在巴黎完成的(参见134.2)。各国的思想家都参与了这些工作:法国人、意大利人、英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德国人在开始的时候比较反对“用逻辑学来谈论信仰的种种奥迹”的作法,但在13世纪却出现了一位一流的思想家:Albertus Magnus(大阿尔伯特)。经院思想兴旺时期的“四个伟大的博士”一半是方济各会会士,另一半是道明会会士,从国籍来分是两个意大利人,一个德国人,一个英国人。

135.2a 那位出生在美国的 Alexander de Hales(亚历山大,1245年去世)是巴黎大学的著名老师,大约在1230年或1231年加入方济各会,自从14世纪有 Doctor

irrefragibilis(“不可辩驳的博士”)的美称。他的主要著作是一部未完成的 *Summa theologica*(《神学大全》,亦称 *Summa universae theologiae*),分为四个部分,但其中的部分文章也许不是他写的。这部巨著在本质上仍然与圣 Anselmus(安瑟伦)和 Victor(维克托)学派的 Augustinismus(奥古斯丁主义)有关系,但它首次利用整个 Aristoteles(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 Abaelard(阿伯拉尔)及 Petrus Lombardus(伦巴第人伯多禄/彼得)的逻辑学方法来讨论信仰,用哲学的方法为信仰提供理论基础。

135.2b 圣 Albertus Magnus(大阿尔伯特)来自一个 Suabia(施瓦比亚)的骑士贵族(也许是 Bollstaedt 的贵族),于 1193 年在 Danubius(多瑙河)边的 Lauingen(劳因根)城出生。他曾经在 Padua(帕多瓦)和 Colonia(科隆)读书,大概于 1223 年在 Padua(帕多瓦)接受了道明会的会衣(即入会),后来在几个道明会的学校任教,尤其在 Colonia(科隆),在那里(于 1248 年)创立道明会的 studium generale(“学院”,“大学”),后来在巴黎大学任教,成为道明会德国会省的会长,1260 年(1262 年)被祝圣为 Regensburg(雷根斯堡)的主教,奉 Urbanus IV(乌尔巴努斯四世)的命,在德国和波希米亚推动人们参加十字军运动(1263 - 1264 年),最后又在 Colonia(科隆)任教,一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天(1280 年 11 月 15 日)。他的著作覆盖着非常广泛的领域。他首先写了一些解释《圣经》的书(其中最成功的是对《路加福音》的解释),但他没有利用当时很普遍的“比喻式——神秘式的”解释(参见 145.5),而是根据字面上的意义进行说明。他为 Aristoteles(亚里士多德)和 Pseudo - Dionysius Areopagita(伪狄奥尼修)的著作写了注解,解释了 Petrus Lombardus(伦巴第人伯多禄)的 *Sententiae*(《神学命题》),又编写了一部 *Summa de creaturis*(《创造物大全》)、一部 *Summa theologiae*(《神学大全》,未完成),一部 *De mineralibus*(《论矿石》),一部 *De vegetabilibus et plantis*(《论植物》)和 *De animalibus*(《论动物》)等著作。这些书也包含一些很独立的观察和发现,尤其在生物学和植物学方面。在所有的经院思想家当中,Albertus(阿尔伯特)在哲学、神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是最渊博的学者。当时代的历史学家称他为 *Philosophorum maximus*(“最伟大的哲学家”),而他的得意门生 Ulricus Engelberti(乌尔里克,1277 年去世)——他在 Strasbourg(斯特拉斯堡)当道明会会士并自己也写过一个巨大的 *Summa de bono*(《美善大全》)和对诸命题的注解——曾经称 Albertus(阿尔伯特)为 *nostri temporis stupor et miraculum*(“我们这个时代受敬仰的人和奇迹”)。后人给他的尊称是 *Doctor universalis*(“百科博士”)。教宗 Pius X(比约十世)于 1931 年宣布他为教会的圣

人/圣徒和圣师(Doctor ecclesiae)。中世纪的基督宗教教育制度从亚里士多德那里获得一个新的方向,而这种转变曾经被称为“学术创新精神的勇敢成就”。这种转变的推动者主要是 Albertus Magnus(大阿尔伯特)。然而,在他那里也有 Platon(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和 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传统。他的影响是长期的,他的思想形成一个学派,而他的著作不仅仅影响了德国人的思想,而且也对整个西欧的思想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35.2c 圣 Thomas Aquinas(托马斯·阿奎那)于 1226 年或 1227 年出生在意大利南部 Neapolis(那不勒斯)的 Roccasecca(若卡色卡),他属于古老的 Aquino(阿奎诺)伯爵的家庭,而这个家族又和德国的 Stauffer(施陶费尔)皇家有一些亲戚关系。在童年时期,他被送到附近的 Monte Cassino(卡西诺山)的本笃会隐修院受教育,后来入 Neapolis(那不勒斯)大学,在那里获得人文学教育和哲学培训,又在那里加入了道明会,后来一生忠于他的“修道”选择,虽然他的家人反对他的决定。在德国的 Colonia(科隆)他当 Albertus Magnus(大阿尔伯特)的学生进修学习(1248 - 1252 年),后来开始任教,并成为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大学教授,主要在巴黎、罗马和那不勒斯教书。他于 1274 年 3 月 7 日去世于意大利 Neapolis(那不勒斯)附近的 Fossanuova(弗萨诺瓦)熙笃会隐修院——他当时正要去参与 Lyon(里昂)的主教会议——年仅 48 岁。Johannes XXII(约翰内斯二十二世)教宗宣布他为圣人/圣徒(1323 年),Pius V(比约五世)于 1567 年提升他为教会圣师,而 Leo XIII(良/利奥十三世)于 1880 年宣布他为公教(天主教)各个学院的主保。1917 年的《天主教法典》(第 1366,2 条)规定,哲学和神学的研究应该指向“天使博士(托马斯)的思想、教导和原则”(ad Angelici Doctoris rationem, doctrinam et principia)。Albertus(阿尔伯特)开始的伟大工程是建立一种基督宗教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而 Thomas(托马斯)在内容和方法上都非常成功地推进了这个事业。他的老师也许更渊博一些,创造力大一些,但 Thomas(托马斯)在思想的清晰度和反思的敏锐度方面超过 Albertus(阿尔伯特)。Thomas(托马斯)的神学思想很有深度,也很彻底,又形成很大的体系。他在结合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奥古斯丁主义方面是最有才华的人士,为中世纪的神学提供了最完美的阐述,为当时的公教(天主教)世界观提供了最全面的、最有深度的理论基础。因此,他正当地被称为“经院思想之王”。同时,他一生保持了一种不受污染的纯洁性和内心的深切信仰。自从 15 世纪以来,人们称他为 Doctor angelicus(天使博士),但在此之前,他的另一个尊称是 Doctor communis(公

共博士),这就表示他普遍被承认为教导的权威,他的著作也经常引用。他的主要著作是 *Summa contra gentiles*(《反驳外邦大全》,1259 - 1264 年),这是一部针对阿拉伯哲学写的护教学的手册(原稿仍然在梵蒂冈保存,见 Cod. Vat. 9850),以及 *Summa theologiae*(《神学大全》,1266 - 1273 年形成,分为三部分,未完成;17 世纪 50 年代被译成汉语,书名为《超性学要》)。这部著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一部杰出的著作,是作者一生努力的顶峰,并在思想的成熟和思路的一致性方面超越中世纪的一切其他的“大全”。另外——与 Albertus(阿尔伯特)一样——Thomas(托马斯)也写了对于 Aristoteles(亚里士多德)、Pseudo - Dionysius(伪狄奥尼修)著作的注解,解释了 *Sententiae*(《神学命题》),又编写了 *Quaestiones quodlibetales*(《某些论题》)和 *Quaestiones disputatae*(《被争论的命题》)来阐述关于一些神学问题、圣经学问题或灵修学问题的看法。虽然一些人也曾经反对他的观点,但他的教导不久后成为一个大的传统,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托马斯学派”(thomistische Schule)。道明会早在 1278 年要求自己的会士拥护他们修会最伟大的神学家的思想路线,而在他的修会以外,托马斯的威望逐渐升高,支持他观点的人也越来越多。在 Augustinus(奥古斯丁)以后,再没有另一个神学家如此深入地影响了和激活了公教(天主教)的神学。

135. 2d 圣 Thomas(托马斯)的朋友是圣 Bonaventura(波纳文都拉,原名 Johannes Fidanza),于 1221 年在意大利 Tuscania(图斯卡尼)的 Bagnorea(巴格诺瑞亚)出生,他是方济各会会士,在著作的深度和数量方面无法和 Thomas(托马斯)相比,但他也是一个拥有崇高心灵的人。他曾经是 Alexander de Hales(亚历山大)的学生并曾在本会学校及巴黎大学任教。他和 Thomas(托马斯·阿奎那)一起替托钵会会士的学术工作辩护,致力于反驳教区司铎们的攻击(参见 134. 2)。他曾经是方济各会的总会长(1257 - 1274 年),他是一位杰出的指导者,具有卓越的贡献(参见 129. 3),并似乎被视为方济各会的“第二个创始人”。教宗 Gregorius X(额我略/贵格利十世)于 1273 年提名他为 Albano(阿尔巴诺)的枢机主教。他在 1274 年 7 月 15 日去世,正是 Lyon(里昂)大会议的时候——他曾在会议上积极地与希腊教会的代表们进行了对话。Bonaventura(波纳文都拉)被视为“早期方济各派”的主要代表,这个学派更看重 Plato(柏拉图)和 Augustinus(奥古斯丁),超过 Aristoteles(亚里士多德)。Bonaventura(波纳文都拉)是一个思辨性的神学家,有深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尊称是 Doctor seraphicus“炽爱天使博士”)。他的主要著作是一个关于

神学命题的注解书,以及一部信理学的提要:*Breviloquium*(《简言》)、对《圣经》的注解、一些讲道稿、一些灵修学或神秘神学的论文(比如 *Itinerarium mentis ad Deum*《心灵迈向上主的路程》,*Soliloquium*《独语》等)——这些著作都充满宗教信仰的热忱。

135.3 除了经院思想全盛时期的领先人物以外,第13世纪还产生了一系列的其他的学者,他们在教会神学上和在欧洲思想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上面我们已经提到了方济各会会士 *Petrus Johannis Olivi*(欧利维,1298年去世,参见131.1);另一些值得注意的学者是这些:

135.3a 来自英国的 **Robertus Grosseteste**(格劳斯泰特,1175-1253年)曾经是 Oxford(牛津)大学的一位著名教授,与方济各会人士有友好的关系,后成为 Lincoln(林肯)的主教(1235-1253年),他是一位很热切的牧灵者和教会改革的推动者。他于1250年去找 *Innocens IV*(依诺森四世)教宗,很坦白地反对罗马教廷要求更多税(参见163.3)。他的哲学著作很多,主要站在奥古斯丁-安瑟伦的基础上,他和一些其他的英国人一样很清楚地呈现出向实证论的倾向。他认为,数学和试验应该是自然哲学的基础(这也许是他最早提出来的),并为历法的改革提出一些新观点(参见其 *Computus*《计算》)。他懂希腊语并将 *Aristoteles*(亚里士多德)、*Ignatius de Antiochia*(依纳爵/伊格纳丢)、*Pseudo-Dionysius*(伪狄奥尼修)和 *Johannes Damascenus*(大马士革的约翰内斯)的著作译成拉丁语。

135.3b 法国国王 *Ludovicus Sanctus*(圣者路易)的儿子们的老师是一位法国道明会会士,即 **Vincentius de Beauvais**(文森特,1264年去世),他的巨著 *Speculum maius*(=*Speculum triplex*《大镜》)是整个中世纪最大的百科全书,在18世纪才被超越。这部著作分为三部:*Speculum naturale*(《大自然之镜》)、*Speculum doctrinale*(《教导之镜》)和 *Speculum historiale*(《历史之镜》);后来的学者又加上了一部 *Speculum morale*(《伦理学之镜》),第一次于1484年在 *Venetia*(威尼斯)印刷。这部百科全书很巧妙地总结了当时的全部知识,也包括一些批判性的观察。*Vincentius*(文森特)也是一个杰出的教育家(参见他 *De eruditione filiorum nobilium*《贵族子女的教育》)。

135.3c 被称为 *Doctor solemnus*(隆重博士)的 *Henricus de Gent*(亨利,1293年去世)曾经在 *Tournai*(图尔乃)当圣职团团员和总执事,1277年到1293年在巴黎大学当神学教授。他是最早的来自教区圣职人员的大思想家之一。他确信奥古斯丁

主义的保守派并在 15 篇 *Quodlibeta* (即 *Quaestiones de quolibet*《论题》) 以及在他的 *Summa theologica* (《神学大全》) 中反驳圣 Thomas Aquinas (托马斯·阿奎那) 和 Averroes (阿威洛伊) 派的“革新”。

135.3d 前面提到的 Grosseteste (格劳斯泰特) 的学生是 Roger Bacon (罗杰尔·培根, 1214 - 1294 年), 他是英国人, 方济各会会士, 曾经在巴黎和牛津当老师, 但由于某些过于极端的说法和对于当时教学制度的批评引起争论和多人的反击, 与自己修会的会长们也有冲突, 所以他的工作遭受阻挠, 最后他被关进一所隐修院一段时间。毫无疑问, 他是一位有想象力的、敏锐的思想家和渊博的学者 (尊称是 Doctor mirabilis “可钦博士”), 他在知识和独立的自然科学观察方面走在时代的前面, 他甚至已经预先有一些关于汽车和飞机的灵感。他自己掌握古希腊语、古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 也强调语言的研究和语文学研究对解释《圣经》的重要影响。他认为, 想推动在伊斯兰教地区的传教活动必须先学习语言。他说, 仅仅肯定传统的权威是不够的, 必须自己独立地进行考察和考验。他认为, 不应该太多使用思辨的方法, 而在哲学和神学中也应该多施用“归纳”和“实证”的方法。他针对《圣经》的拉丁语版本 (《通俗译本》) 的改进提出一些建议, 思考过修历法的问题。

135.3e 那位来自西班牙的 Mallorca (马尤卡岛) 的 Raimundus Lullus (= Ramon Lul 瑞孟德·路尔, 1235 - 1316 年) 原来是一位骑士和宫廷贵族人士, 但他于 1365 年经历了一个皈依, 成为方济各会第三会会士, 并在剩余的岁月中投入于学习研究; 他想反驳阿拉伯人的泛神论哲学, 推动了在穆斯林地区的传教活动 (参见 127.5)。他有几次在巴黎反对了拉丁语的阿威洛伊主义 (参见 135.1), 并向 Bonifatius VIII (博尼法奇乌斯八世)、Clemens V (克雷孟/革利免五世) 和 Vienne (维恩) 的主教会议 (1311 - 1312 年) 写了一些发动十字军运动的书信。在 Tunis (图尼斯), 他于 1316 年被砸死, 成为一个殉道者。Lullus (路尔) 是一位经院思想家和神秘思想家, 他的基本倾向是方济各会的奥古斯丁主义。他的著作是用 Catalania (卡塔拉尼亚) 语、拉丁语和阿拉伯语写的, 共有 300 部 (!)。这些著作覆盖着很广泛的领域, 也包括一些诗。尤其特殊的著作是他的 *Ars generalis* (“普遍的知识”), 他曾经在很多书中谈论这种“知识” (最后的是在他的 *Ars magna et ultima*《伟大的和终有性的知识》), 这种“路尔知识”后来也获得很多追随者。作者认为, 一切基督宗教的信条可以证明, 而在这个基础上, 他提出一系列的最高的原则和思想规律, 如果掌握这些规律, 一切学科的知识都能够很容易理解, 这样也能够为基督信仰作

辩护或提出一些证明。这种“知识体系”在文艺复兴时代已经被重视(比如参见 Nicolaus Cusanus 或 Giordano Bruno),并且对年轻的 Leibniz(莱布尼茨)也有影响。自从 19 世纪末,这位学者的家乡 Catalonia(卡塔拉尼亚)的学者再次研究这个伟人的方方面面。

135.3f 出生在葡萄牙 Lisboa(里斯本)的 **Petrus (Juliani) Hispanus**(西班牙的伯多禄/彼得)是一位熟悉哲学和兴趣广泛的学者,最后他荣登罗马宗座。他先在巴黎大学当哲学教授,后来在意大利的 Siena(锡耶纳)当医学教授,1272 年当 Braga(贝拉格,葡萄牙北部)的总主教,1273 年提升为枢机,成为 Gregorius X(额我略/贵格利十世)的随身医生,1276-1277 年当选教宗,取名 Johannes XXI(约翰内斯二十一世,1277 年 5 月 20 日因事故去世,参见 125.2)。除了一些医学著作,关于亚里士多德心理学的讨论(*Liber de anima*《论灵魂之书》)和对 Aristoteles(亚里士多德)及 Pseudo-Dionysius(伪狄奥尼修)的注解以外,他还于 1240 年编写了一部非常流行的逻辑学教科书,即 *Summulae logicales*(《逻辑学大全》,后来多次被印行,被解释,甚至被译成希腊语)。这部书亦称 *Logica modernorum*(《现代派的逻辑学》),它在哲学系(“自由学科系”)的教育制度中普遍被利用为教科书,而它关于术语的性质的创造性讨论(*de proprietate terminorum*)对于唯名论(*nominalismus*,参见 145.3)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影响,尤其在德国各地的大学中。

136

宗教生活和道德生活。教会和文化

136.1 教会文化在中世纪的兴旺时期应该是 1150 年到 1250 年这一时期,而在这个时期内的教会生活和早期的中世纪一样,呈现出很多矛盾的现象。硬的和软的因素,善和恶在很多地方是同时存在的或相辅相成的。我们能看到最纯粹的责任感和最崇高的宗教热忱,但也会发现漠不关心、冷淡,甚至怀疑主义。一些人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或进行各种刻苦和苦修,但另一些人却陷入无节制的物质享受中。某些文献表现出一种内心的、温和的灵修生活,但又存在着粗心、野心、无道德或阴森的狂热。当时,人们的意志力拥有很大的空间,无论是在善或在恶方面,而中世纪那些没有经过驯服的自然冲动很容易跨出神圣秩序的界限。毫无疑问,在

第12、13世纪的基督徒社会制度中也存在着很多“裂缝”，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争论；很多残酷的战争和家族之间的敌意；世俗权力和神圣权力之间的战争以及毫不犹豫地利用宗教性的武器来追求政治目标；外教传统的思想和习俗仍然存在（尤其在北欧和东欧地区）；贵族人的宫廷文化和文学的败坏（尤其在法国南部）；一种具有开放思想的平信徒阶层的崛起，这些平信徒有意识地脱离了教会的指导；一些部分上有无政府论倾向的异端团体，而这些异端人士面对了武力镇压。

因此，我们绝对不能片面地美化中世纪为“基督宗教的理想时期”，但同时也不应该夸大地描述中世纪的缺陷，因为中世纪全盛时期的亮点也有，而且这些优点甚至比阴暗面更多更大。在中世纪的全盛时期，基督宗教的精神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超过历史上任何其他时代。基督信仰渗透整个公共生活、私人生活、政治和社会生活、学术生活和艺术，并在各个领域唤起了种种新的创造力。人们在“自然”和“超自然”之间创造了一种优美的和谐状态，甚至在理论上，而且在很多方面这个和谐也包括实践的领域。教会和世俗权力在自己的机构中具有代表性和一致性。中世纪的秩序感(der Ordo - Gedanke)和与神的关系支配着个别事物彼此的关系和个别人对于整体的态度。在各种民族的生活中还存在着一种普遍精神和团体精神(Universalismus und Gemeinschaftssinn)。西欧的所有民族都感觉到他们在最高的宗教权威和世俗权威的指导下形成一个“基督宗教的共同体”(ein Corpus Christianum)。人们普遍有一种“乐意相信”和在信仰和道德问题上“愿意服从教会的权威”的态度，虽然有个别的例外，这种普遍的态度是不可争辩的。这种信仰精神产生了很多崇高的文化成就，比如在学术和思想方面(经院思想、神秘主义、大学)或在文学和艺术方面。第13世纪可以称为圣人和英雄的世纪，伟大诗人、思想家和艺术家的时代。比如像 Franciscus de Assisio(圣方济各/法兰西斯)、Dominicus(圣道明)、Albertus Magnus(大阿尔伯特)、Thomas Aquinas(托马斯·阿奎那)、Bonaventura(波纳文都拉)、法国的国王 Ludovicus IX Sanctus(路易九世)和他的母亲 Blanca(布兰卡,1252年去世)、Elisabeth de Thuringia(依撒伯尔/伊丽沙白,参见128.2)、Silesia(西里西亚)的女公爵 Hedwigis(赫德维格,1243年去世)、Gertrudis Magna(大格尔图德)、Mechtildis de Hackeborn(梅希尔特,参见133.5)等伟大的人物——他们只是少数几个例子——无论在什么时代都应该受到尊重和敬重。然而，这些伟大的人物并不是孤立的现象，他们都有一群一群效法他们的男女

学生。

136.2 第 12、13 世纪在“爱神”和“爱人”方面呈现出非常丰富的美丽果实。无论是罗马式的或哥特式的大教堂都表明了这一点,因为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参与了这些教堂的建设(参见 133.8)——这些大堂一直到今天都见证了中世纪的人对于信仰的热忱。人们建立了无数的慈善机构来帮助那些受苦的人:医院、穷人院、孤儿院、客栈、麻风病院等。对于穷人和受苦者的爱促进那些人奉献钱建立一些慈善机构,而在一些地方这种投资的效力仍然存在。教会推动的施舍在很多地方帮助了穷人;教会宣布的“大赦”(参见 119.4)一次又一次地鼓励人们施舍。当时的医疗工作,对穷人和病人的照顾似乎全都是教会肩负的。很多修会团体或弟兄会(参见 117.3; 118)特别投入于这种慈善工作。

在中世纪全盛时期,基督宗教的精神已经成为民间的精神,而各民族的新兴文学传统(法国的法语文学、德国和意大利的文学)都表明了这一点。不仅仅圣职人员的文学作品,而且骑士阶层或平信徒的文学风格也同样转向一些永恒的原则或理想。宗教信仰为各种文学形式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比如:“圣杯”(grail = 最后晚餐的圣杯)、圣母歌(赞美玛利亚之歌)、传奇、圣歌、教会歌曲、宗教话剧等。因为人们的信仰更热切,他们的感情生活也有更大的深度和丰富的表现,这就对文学创造和理解文学作品的能力有直接的利益。在中世纪全盛时期的结束有意大利最伟大的诗人,他也是世界文学最早的大师之一,即 Dante Alighieri(但丁)。他 1265 年出生在 Florentia(佛罗伦萨),被驱逐很多年,后来在 Ravenna(拉文纳)去世(1321 年)。他的名著是 *Commedia*(后来称 *Divina Commedia*《神曲》),1307 - 1321 年成书,在书中他描述一种精神性的旅程,就是去地狱(inferno)、炼狱(purgatorio)和天堂(paradiso)的“神视”(visio),指导诗人的是 Vergilius(维吉尔),最后是他年轻时候崇拜的 Beatrice(贝亚特瑞斯)女士。在这个著作中,Dante(但丁)用一种非常个人化的但仍然有普遍意义的方式来阐述中世纪世界观最深的问题。《神曲》于是一个诗化的“大全”,它和经院思想家们的“大全”站在同一个平台上,它也依靠着托马斯哲学和神学的体系,但有个别的因素(宇宙论、关于理性的理论、光学)也受了奥古斯丁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

大约在 Dante(但丁)的时代,一位德国(来自 Hessen 赫森)的圣职人员写了一个德语的《圣经》史诗(名为 *Die Erloesung*《救恩史》),篇幅当然比《神曲》小多了。这部著作概括了整个救恩史,从人的创造一直到世界审判,也同样表明德语文学对

于基督信仰的承受。

136.3 教会生活和宗教生活无法在整个 13 世纪都维持其高水平。早在 1250 年有一些不良发展趋势的迹象。教宗和 Staufer(施陶费尔) 皇朝之间的搏斗对公共社会的整个秩序都有不好的影响。皇帝的地位再没有以前的崇高权威和普遍意义,而罗马的宗座的权威性也衰退了。法国这种“民族-国度”(nation-state) 逐渐变得强大并开始政治上控制罗马宗座。西欧各个民族大家庭的关联越来越松散。人们开始更重视世俗的世界,平信徒们想限制教会的影响,在这个运动起重要作用的人是 Fredericus II(腓特烈二世) 皇帝和他的圈子,其影响也比较广泛。比如,当时出现了一些尖锐批评或讽刺圣职人员和隐修士的文献和讽刺诗,但在早期这样的文章非常罕见。那位隐修院长 Joachim de Fiore(约亚敬,参见 131.1) 所传播的“未来的精神性教会”的想法在他的部分拥护者内心中创造了一种“革命”思想。很多古老修会的隐修院似乎放弃了原来的目标,而那些新兴的修会也不久后放弃了初期的严格性和热忱。主教们和大堂的圣职人员大部分来自贵族家庭,他们在很多地方过着一个相当世俗化的生活(参见 112.1)。很多堂区圣职人员和下层圣职人员在经济上不能独立,他们依赖于他们的长上,也没有受到比较好的职业训练(参见 89.1),甚至有时候缺少基本的道德规律。因此,教宗 Innocens IV(依诺森四世)在 1245 年在 Lyon(里昂)召开的主教会议上说(参见 124.5),上层和下层圣职人员的罪是教会“五伤”之一,也是最痛苦的问题。教宗 Gregorius X(额我略/贵格利十世)在第二个普遍的 Lyon(里昂)主教会议上说,很多教会长上的恶习导致了全世界的败坏(参见 125.1)。

在英国 Lincoln(林肯)城任主教的 Grosseteste(格劳斯泰特,参见 135.3a)曾经在 1250 年在一个著名的讲演——*De corruptelis ecclesiae*《论教会的腐败问题》——表达了对教会生活的担忧。当时,Grosseteste(格劳斯泰特)在 Lyon(里昂)向教宗 Innocens IV(依诺森四世)很坦诚地提出关于那些种种“免税规定”、“津贴”和“募捐”运动(参见 110.2g)的批评,但他的批评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在 1274 年在 Lyon(里昂)举行的主教会议上,原先当过道明会总会长的 Humbertus de Romans(亨伯特,参见 124.4; 125.1)提交了一个 Gregorius X(额我略/贵格利十世)教宗委托他写的改革文献(*Opus tripartitum*《三部书》),其中批评宗座空位的时期太长,教会节日太多(参见 119.6),教会长上的虚荣心和教育的缺乏,部分堂区司铎的生活不相称,他们的无知,圣职人员对于“应该居住在教堂”的原则的忽略,以及那些收奉献

人员的不良表现(参见 133. 2)。来自同样时期的改革文献(所谓的 *Collectio de scandalis ecclesiae*《教会丑闻集》)——这大概是法国方济各会会士 Gilbertus de Tournai(格尔贝特)写的——很悲观地描述了当时教会的情况。那位来自德国南部 Passau(帕骚)的司铎和宗教裁判所人员(所谓的 Passauer Anonymus)大约在 1260 年在他的 *De occasionibus errorum haereticorum*(《论异端错误的来源》)中特别批评人们在管理圣事方面的滥用现象,对于伪造的圣物的崇拜,太多次和太快宣布某人被“绝罚”以及部分圣职人员的贪财。巴黎的神学家 Gottfried de Fontaines(戈特夫里德,1306 年去世)——他是 Henricus de Ghent(亨利,参见 135. 3c)的学生——也尖锐地谴责当时代教会的一些情况:主教们更多投入于政治事务或致力于保卫教会的财产和权利,但他们不注意他们羊群的精神性需要——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有人问他:教宗应该是一个优秀的法学家还是一个良好的神学家,而在他的 *Quodlibeta*(《某些问题》)中,Gottfried(戈特夫里德)说,一个神学家比一个法学家更好。

第三段

中世纪的晚期(1294年 - 1517年)

教会和宗教生活的衰微,宗座权力的衰退。改革的要求。
信仰分裂的预兆

概 论

第 14 世纪的开始意味着“中世纪秋季”的开始,就是说在普遍的社会和教会历史上发生一个关键的转折。西欧的基本社会因素和种种秩序原则逐渐解体,而另一些组织和原则取而代之。在政治生活中,“民族国度”和“地区性”的理念与原来的“普遍共同体”形成对比,而在宗教生活中,个体的个人努力与团体的约束和传统精神形成一种对立。各个欧洲民族的独立化和平信徒化(Laisierung)一步一步地取消了圣职人员在政治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中世纪全盛时期的世界观是一种一致的、封闭的世界观,但现在有很多人感觉到不安和种种原则的动摇,尤其在知识圈子当中是这样的。虽然教会仍然是第一个和最强大的文化力量,但人们现在不再认为,国度和文化与教会都有最密切的关系。教会生活本身显然也处于一种可疑的危险和转变的状态中。一方面,一种内心的、崇高的神秘思想仍然吸引着一些人并且带给他们幸福,但另一方面有一些人陷入了一种太强烈的个人主义并越来越尖锐地谴责传统的教会教导和教会的制度。在这个新阶段的开始,法国严重地打击了罗马宗座对于世界统治的要求,并在长达 70 年的 Avignon(阿维尼翁)流亡时期,受到更多法国政权的压力。皇帝的制度(德国皇帝)本身也失去了普遍的特征,因为各地的民族国度都追求独立的发展,所以皇帝也无法协助教宗。一方面存在着许多“国家教会”或“政府控制教会”的思想,但在另一方面又有罗马教廷的一些夸大的要求和理想。罗马主教“的主席权”思想被削弱,这是因为某些人很严肃地想改变教会的制度为一种“民主制度”,但更多是因为西欧 40 年的教会分裂(1378-1417 年)的种种争论和冲突为罗马教宗的权威造成很大的损失,更为整个基督宗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在圣职人员、隐修会和平信徒中的缺陷和弊病越来越多,而要求教会“在头部和肢体的改革”的号召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热切渴望。这个要求在中世纪晚期随时都被提出来了。但虽然某些人作出种种努力,某些主教会议愿意推动改革,但这些问题并没有被解决。自从第 14 世纪开始,一些批评性

的和主观主义的世界观体系渗透和危害了教会的科学(神学研究);尤其 Nominalismus(唯名论)分裂了信仰和知识之间的和谐。Wycliffe(威克里夫)和 Hus(胡斯)的异端性运动影响了全英国和波希米亚。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运动最早出现在意大利,而这些运动后来传遍欧洲。它们提出了新的教育目标和生活理想,更强调个人主义和平信徒的因素,并或多或少反对教会传统所指导的教育和文化。虽然教廷有强烈的世俗化倾向,但在那些罗曼国度(意大利、西班牙、法国)中,教会的结构基本上没有受到严重的损坏,而在很多地方形成了一种未来改革的种子。与此不同,在德国有某些特殊的因素碰到一起,这样逐渐准备了一个灾难性的分裂,这个分裂将会终止西欧教会的合一。

第一章 13 世纪末到 15 世纪中期的宗座。 改革问题和大公会议至上主义

137

教宗 Bonifatius VIII(博尼法奇乌斯八世)与法国的冲突

历代教宗: Bonifatius VIII(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八世, 1294 - 1303 年);
Benedictus XI(本笃/本尼狄克十一世, 1303 - 1304 年)

137.1 在那位“天使教宗”Coelestinus V(切来斯提努斯五世)自愿地辞职后(参见 125.4), 枢机们在一天内就选出了教宗, 就是那位最能干的枢机主教 Benedictus Gaetani(格塔尼), 他取名为 Bonifatius VIII(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八世, 1294 - 1303 年)。他的任期意味着教宗史上的转折点, 因为从他开始, 罗马宗座进入了衰弱的时期。Bonifatius VIII(博尼法奇乌斯八世)是一个壮年人, 很有精力和意志力, 有统治的才干, 又是一位有学问的教会法学家(参见 110.3)。然而在另一方面, 他的宗教信仰情感不是很深, 他的性格严厉暴躁, 他不太会顾及别人, 想用武力来推行自己的观点, 他的决定和行动太突然和不冷静, 有贪财的问题, 又多次重用自己的亲戚。他的表现和表达方式导致很多人对他怀有反感和敌意。同时, 那个时代已经和以前不同, 他仍然在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和 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的意义上要求对全世界的领导权, 但 13 世纪末的人已经不能接受这样的要求。

137.2 不久后, 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教宗和法国发生了冲突, 但当时的法国是最强大的和最统一的国度。当时正是法国和英国的战争时期, 而教宗想在双方中间充当调停者, 因为他想利用这些国家的精力来组织一个新的十

字军运动,但双方都拒绝他的要求。教会法早规定圣职人员不需要向世俗国君纳税,但这两个国度都因战争的缘故向圣职人员要求资助并收税。因此,教宗于1296年写了一篇语气不太礼貌的诏书(名为 *Clericis laicos*《圣职人员向平信徒……》),其中禁止圣职人员(如果没有教宗的许可)向平信徒(包括国君和公务员)交纳任何税。平信徒不可以从教会财产要求任何利益,谁违背这个规定,谁就遭受绝罚。然而,英国(Eduardus I 爱德华,1272-1307年)和法国都没有遵守这个规定。法国的 **Philippus IV**(“美男子”菲利普,1285-1314年)甚至采取了一些反对教宗的措施,因为他禁止从法国带走白银和其他的财宝,又从法国驱逐了外国人,就是教廷的收税员(参见 110.2f)以及那些负责教廷财务的意大利银行人员。此后,教宗宣布他的诏书不影响圣职人员对封地主的义务,又允许圣职人员“主动地”给国王送一些礼物。如果有人“很客气地要求”也可以给予这些礼物,而且如果国王处于急需的情况下,他可以不用询问宗座就能征税。这样,教宗似乎完全收回了原来的禁令,而教廷和法国的关系又恢复了,至少在外表上是这样的。为了表达双方的和平,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教宗于1297年将 Ludovicus IX(路易九世)宣布为圣人(参见 126.4,5; 128.2)——这个法国国王就是 **Philippus**(菲利普)的祖父。

与法国的冲突结束了,但教宗 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那时又与一个庞大的罗马家族(Colonna 科罗纳家族)发生了长期的争吵。两位枢机(Jacobus 雅各伯和 Petrus 伯多禄/彼得)属于这个家族,而教宗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得罪了他们。因为教宗也干涉了他们的一个遗产问题,所以他们对他更加怨恨。更灾难性的因素是这样的:Colonna(科罗纳)家族和 Fredericus III de Sicilia(腓特烈三世)国王有关系,他来自 Aragon(阿拉贡)王朝(125.3),而 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虽然先反对他且绝罚了他(1296年),但后来仍然不得不承认他(1302年)。Colonna(科罗纳)家族也和意大利的皇帝派(Ghibellines)有一些秘密的联系。一件无耻的行动使这个冲突爆发:Romagna(罗曼纳)地区的伯爵 Stephan Colonna(斯特凡努斯·科罗纳)于1297年5月抢夺了宗座的财宝。教宗要求这两个枢机在他的法院中受审判并要求 Colonna(科罗纳)家族交出他们的堡垒,但这个家族并没有顺从教宗,而是公开地反对他。他们写了一些公开的控诉书,其中否定教宗的选举的正当性,说 Coelestinus V(切来斯提努斯五世)没有正式退位,向一个大公主教会议申诉,又要求重新选教宗。方济各会的“灵性派”(参见 129.3; 151.1)和 Joachim de Fiore(约

亚敬,参见 131.1)支持这个家族。教宗 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在一个诏书中宣布,Colonna(科罗纳)将丧失一切地位和财产,呼吁人们镇压他们,并毁灭了他们的主要基地 Palestrina(帕勒斯特瑞纳,1298年)。Gaetani(格塔尼)家族的人(即教宗的亲戚)侵占了 Colonna(科罗纳)人的财产,而这个被镇压的家族的成员逃到国外,尤其逃到法国,他们从那里传播各种反对教宗的思想。

137.3 对于法国来说,教宗的权威已经衰弱了,但对于德国地区来讲,教宗的权威仍然起了很大的作用。Rudolphus de Habsburg(鲁道夫)皇帝的继承人是 Adolphus de Nassau(阿多夫,1292-1298年),而奥地利的 Albrecht I(阿尔布瑞克特一世,1298-1308年)起来反对他;在这样的情况下,Bonifatius VIII(博尼法奇乌斯八世)教宗和以前的 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教宗一样有机会在德国皇帝选择的争论中充当裁判者。在 Goellheim(格勒海姆)交战后(1298年),Albrecht(阿尔布瑞克特)被普遍承认为德国国王,他请求教宗肯定他,而教宗最终也确认他,所以他派遣一些代表,于1303年向教宗宣发了一个誓,其中承诺将要服从教宗、保护教宗和确保教宗的安全。1300年,Bonifatius VIII(博尼法奇乌斯八世)教宗在罗马庆祝了第一次大的“百年大赦”(Jubilaumsablass,参见 152.2),这就吸引了无数的朝圣者去罗马。这些大规模的活动仍然显示出教宗的崇高地位和威望,但不久后,教宗又和法国发生冲突,而这次的失败比第一个政治性挫折更严重。“美男子”王 Philippus(菲利普)于1301年逮捕了 Pamiers(帕米尔)的主教 Bernhardus de Saisset(伯尔纳德·塞色),因为这个人说话方面不谨慎。国王唆使人控告这个主教并在法院中准备审判他。教宗不仅要求国王马上释放这个主教,而且也采取了一些反对国王的措施。他恢复了以前的“禁止纳税”的命令,又召集一些法国主教、神学家和法学家于1302年11月1日来罗马开一个主教会,因为他想和他们谈论“确保教会的自由,改变国王态度和法国制度以及消除当时的极端弊病”。教宗在1301年12月5日还发表了 *Ausculat fili charissime*(《可爱的儿子,聆听!》)诏书,其中要求国王亲自去罗马受审,因为他镇压了圣职人员,而他的统治是一个独裁者的统治。实际上,法国国王的统治确实有很多缺陷,而一些有 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性格的中世纪教宗会感觉到,他应该来审判这样的国王。然而,法国在一段时间很重视自己的力量和祖国的伟大,所以它们要尽力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而 Philippus(菲利普)也是一位很冷静地打算盘的人,他不怕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他认为国王的权力是无所不包的和完全独立的,而且他也善于拉拢法国人民和圣职

人员,使他们大多人都支持国王的立场。一些杰出的顾问和法学家(*legistae*)支持他,他们根据罗马法的精神提出一个独立的国度和一个不依赖教会的王权制度。这些人在宣读 *Ausculta* (《可爱的儿子,聆听!》)后,马上烧毁了它,而国王的秘书 Peter Flotte(弗罗特)撰写了一个伪造的“诏书”,题为 *Deum time* (《敬畏神》),其以严厉的语气说,国王甚至在世俗的问题上也要服从于教宗。另外,法国人又伪造一个“回信”(据说是国王向教宗的“回信”),向很多地方的人传播这种侮辱教宗的“回信”(*Sciat maxima tua fatuitas, in temporalibus nos alicui non subesse*……“你是最愚蠢的人,你应该知道国王在世俗的事务上不需要服从任何人……”)。这种宣传有很大的效果,因为法国人的爱国情绪被激动起来。在1302年的巴黎的“国度代表会”(有贵族、圣职人员和城民的代表)支持国王的立场并向罗马写了一封抗议信。国王 Philippus(菲利普)禁止人们去参与罗马的主教会议。在这样的条件下,罗马的枢机们表示一种比较温和的立场认为,教会在世俗的事务上只有“间接的权威性”(*potestas indirecta ecclesiae in temporalia*, 参见 111.2)。但这种缓和似乎不能代表教宗的立场,因为他继续用很严厉的话语在法国国王面前肯定自己的立场,又说他将要罢免国王。参与罗马的主教会议仍然有40位法国教会的领导人物(他们违背了国王的禁令去了罗马),而在这次主教会议上,教宗于1302年11月18日宣布了一个著名的诏书: *Unam sanctam* (《唯一至圣》),开头是: *Unam sanctam ecclesiam catholicam et ipsam apostolicam urgente fide credere cogimur et tenere*“我们必须热忱地相信和坚守唯一神圣的、从宗徒/使徒传下来的教会”)。这部诏书等于是教宗的统治或“教宗在教会和国家政治上的权威性”的典型文献——自从 Gregorius VII(额我略/贵格利七世)和 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以来,这种“教宗的崇高权威性”形成了(参见 104.2; 111.3),而 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用很严厉的言词来肯定这个立场。

这个 *Unam sanctam* (《唯一至圣》)诏书记载于教会法规文集中(参见 *Corpus iuris canonici* c. 1, *Extravag. comm.* I, 8)。它基本上符合当时的教会法律教导并根据一些来自 Innocens III(依诺森三世)、圣 Bernardus(伯尔纳德)、Hugo de St. Victor(圣维克托的胡格)、Thomas Aquinas(托马斯·阿奎那)和 Aegidius Romanus(艾吉丢,参见 139.2; 145.4b)的语句提出这样的立场:只存在一个神圣的、大公的和宗徒/使徒传下来的教会;在教会以外,人们无法得救。教会只有一个身体和一个元首,就是基督和他的代表人。教会掌握着两把剑,就是精神性的和世俗的权

柄。教会自己施用精神性的剑。国君和骑士们必须为了教会的利益,并且“按照教会的指挥和许可”(ad nutum et patientiam sacerdotis)施用世俗的权力。没有任何人可以审判教宗。如果世俗的权力表现不好,精神性的权力应该“整顿”(instituere)世俗的权力。两个权力必须有这样的关系,才能符合天主的圣意。如果有别的态度就必然会导致摩尼教的二元论(两个原则的对立)。这部诏书最的一句话隆重地总结前面的论述:Porro subesse Romano pontifici omni humanae creaturae declaramus, dicimus et definimus, omnino esse de necessitate salutis“我们向一切人宣布、指出和规定,必须服从罗马教宗,才能够得救。”很多人曾经讨论过这句话;它本身没有包含什么新的因素。这句话只在宗教生活中强调教宗的首席权,在这个意义上也有信条上的特征。但如果 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想扩张教宗的权力到世俗的范围上——他的意思很可能就是这些——那么这种要求仅仅有历史性的效力(只在当时的历史有意义),而不是一个永恒的信条。

137.4 法国国王 Philippus(菲利普)受到很大的刺激,从此以后很坚定地推动一些推翻教宗的活动。在1303年6月,一个在巴黎召开的会议针对教宗提出了非常严重的控诉。这个会议显然受到一些 Colonna(科罗纳)家族人士的影响,参与的人是一些主教和男爵,但国王也在场。这些人说 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教宗是一个持异端的人、亵渎神的人、圣职买卖者,他的生活不道德,他进行魔术,又暗杀了前任教宗等等,因此他不可能是教会的正式首长。这些人还要求召开一个大公会议来审判教宗。他们这些控诉是十分过分的,甚至部分上是可笑的。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在夏季居住地 Anagni(阿纳尼)召集了枢机们并在他们面前马上发誓说这一切控诉都是虚构的。他说在9月8日的圣母节将要宣布法国国王 Philippus(菲利普)被绝罚。然而,在9月7日,法国的宰相 Wilhelmus de Nogaret(诺加雷)和那位心怀报复渴望的 Sciarra (= Jacobus) Colonna(科罗纳)一起和一群雇佣兵在 Anagni(阿纳尼)攻击和逮捕了教宗。他们想强迫他退位,但他愤怒地拒绝了这种要求,同时也保持了自己的尊严。第三天,Anagni(阿纳尼)的居民们解放了教宗,使他安全地返回罗马。然而,这几天的动荡不安为那位早已患病的教宗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几个星期后这位教宗便逝世了(1303年10月11日)。在他的任期内,罗马宗座遭受了很大的打击,这似乎是一个无法弥补的创伤。他的继承人 **Benedictus XI**(本笃/本尼狄克十一世,1303-1304年)原来当过道明会的总会长。他是一个温和的、爱好和平的人,他肯定了 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的原则,但在

作法上做了调整。他认为,自己代表的那位是“本来要怜悯和宽容人的[基督]”(cuius est proprium misereri et parcere),所以他收回了对 Colonna(科罗纳)的部分禁令,收回 Philippus(菲利普)的绝罚,又收回前任教宗针对国度要作的种种判断。同时他绝罚 Anagni(阿纳尼)的突击者。这位 Benedictus(本笃/本尼狄克)教宗离开动荡不安的罗马去 Perugia(佩鲁贾),但不久后在那里去世。法国的 Philippus(菲利普)王始终没有放弃他的愤恨,他不愿意和宗座和好,所以下一任教宗依然需要面对 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教宗引起的争论的不良后果。

一些学者曾经认为,反对 Bonifatius VIII(博尼法奇乌斯八世)的部分控诉有一定的根据,比如说他是一个异端者,因为当 Benedictus Gaetani(格塔尼)在巴黎当学生时,他曾经受了 Siger de Brabant(希格尔)的 Averroismus(阿威罗伊主义)或其他哲学家的影响(参见 135. 1)。根据这种泛神论和理性主义的思想,教宗后来据说曾经表达了一些怀疑灵魂不死,怀疑死人复活,怀疑圣体圣事的观点。然而另一些研究证明,这种假设是不能成立的。针对教宗的控诉资料似乎完全来自那些对教宗怀着敌意的人,就是 Colonna(科罗纳)家族的人和拥护 Philippus(菲利普)王的人。这些控诉基本上都是谣言、传说和缺少证据的诬告。教宗的敌人会利用“异端人”的武力来反对教宗是可以想象的,因为根据当时的神学教导(参见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ae* II, 2 q. 39a. 3)和第 13 世纪的教会法学家的说法,一个持异端的人无法当教宗。然而, Bonifatius VIII(博尼法奇乌斯八世)在其任期中写的文献都表明,他是一个持正统信仰的教宗。他是一个急性的人,所以说假话也不符合他的基本态度。Dante(但丁)也没有说他是一个持异端的人,虽然但丁在别的方面尖锐地批评这位教宗并将他放到地狱中,因为他是一个 Simonista(“圣职买卖者”,参见《神曲》Div. Comm., *Inferno* XIX, 53ff; XXVII, 85ff)。上述控诉的基础可能是一些不谨慎的话(所谓的 *diabolicae*“骂人的话”,正如 Aragonia 阿拉贡的使者所报告的)——他大概确实经常说了一些不圆通的话。也许他的精神状态不完全健康。

教宗 Clemens V(克雷孟五世)与教廷向阿维尼翁的迁移。

圣殿骑士团的消失

138.1 因为枢机团分裂为亲法国派和亲意大利(亲 Bonifatius 博尼法奇乌斯)两派,所以 1304 年在 Perugia(佩鲁贾)举行的教宗选举在 11 个月以后才有结果。这个结果意味着法国派的胜利,他们推动 Bordeaux(波尔多)总主教 Bertrand de Got(贝特兰特)当教宗,他取名 **Clemens V**(克雷孟/革利免五世,1305 - 1314 年)。在 Bonifatius VIII(博尼法奇乌斯八世)和法国的搏斗当中,他采取了一种中间路线,与法国国王 Philippus(菲利普)也维持了良好的关系。他在 Lyon(里昂)被加冕为教宗。Clemens(克雷孟/革利免)多次向枢机们说他将来要去罗马,但他始终没有兑现这个诺言。当然,意大利教会国当时的不安和分裂对他也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自从 1309 年,教宗固定居住在法国南部的 Avignon(阿维尼翁),这块地当时是德国帝国的封地,交给了 Neapolis(那不勒斯)的 Anjou(安茹)王朝管理。这种行动完全符合了法国国王的愿望,而那位虚弱的、似乎都患病的教宗越来越多受到法国国王的控制。他大概不打算长期留在法国,不想把教廷的所在地从罗马挪到 Avignon(阿维尼翁),比如教宗的财宝继续留在意大利的 Assisi(亚西西)。然而,实际上这位 Clemens V(克雷孟/革利免五世)教宗开始了一个让人悲哀的时代,因为在他以后的 6 位教宗——他们都是法国人——也继续居住在 Avignon(阿维尼翁)。第 14 世纪的人已经称这 70 年的时期(从 1309 年或 1305 年到 1376 年)为“教会在巴比伦流亡的时期”。这种改变的后果很大:罗马和意大利的教会国陷入很严重的混乱状态。教宗们自己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法国政治的工具,这一点损害了教宗在基督宗教世界中的权威性,又造成教宗和德国之间的隔阂。另外,恰恰在 Avignon(阿维尼翁)的流亡时期,教廷的收税制度和任命制度呈现出一种不健康的发展,因为那些原来来自教会国的收入被中断或减少很多,同时教宗的宫廷生活豪华,教廷公务员众多,教宗们的军事活动也不断增多,因为他们想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教廷规定一些新的税务(“intercalar”税和 annates“年税”),赠送给捐款者某些权利,又为枢机们和其他教廷人员找另一些收入或教产税等(参见 140)。

138.2 那位 Clemens V(克雷孟/革利免五世)教宗的任务很艰巨,但他无法处理这些重大的问题。他的政治立场太软弱,他在很大的程度上向那位不顾一切的法国国王 Philippus(菲利普)让步,深受国王的影响。在枢机团中,法国的枢机们占多数,比如在第一任命新枢机的时候,10个新枢机中就有9个法国人。Clemens(克雷孟/革利免)也重用自己的亲戚。在 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的问题上,他作出了最大的让步。他完全恢复了 Colonna(科罗纳)家族的权利,取消了 *Clericis laicos*(《圣职人员向平信徒》)的诏书,又通过一个简书(breve)取消了 *Unam sanctam*(《唯一至圣》)诏书对法国的效力,因此正式承认法国在政治上的独立性,法国在政治上不需要服从教廷(1306年)。但 Philippus(菲利普)王的报复心理尚未感到满足,他进一步要求教廷审判 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在他的压力下,他们已经开始听取一些证人的话,但教宗于1311年结束了这个棘手的事,说这个问题属于他本人的法院;然而,教宗的代价很大:圣殿骑士团被放弃(参见下文,138.3)。最后,教宗甚至宣布国王对于 Anagni(阿纳尼)的突击事件不负任何责任,国王只是一个有 *bonus zelus*(“良好热忱”)的人,而当 Nogaret(诺加雷)说自己是无辜时,他的绝罚也被收回。虽然在1312年在法国 Vienne(维恩)召开的主教会议(一个大公会议)上还有人提出“博尼法奇乌斯是异端人”的控诉,但这个控告被放弃,因为它没有根据。

虽然法国的国王当时很渴望当德国之王和罗马-德意志帝国的皇帝,但德国的 Kurfuersten(“选帝侯们”)在 Albrecht I(阿尔布瑞克特)于1308年被暗杀后选择了 Luxemburg(卢森堡)的伯爵 Henricus(亨利)为德国国王,名为 **Henricus VII**(亨利七世,1308-1313年)。意大利的爱国者——其中有 Dante(但丁,见他的 *De Monarchia*《帝制论》)——很希望他能够平息当时意大利各党派的激烈争斗,所以他们以欢呼声欢迎这位“和平之王”。这位心怀崇高理想的统治者于1310年去了罗马,并在1312年6月29日在罗马的拉特兰教堂通过三个教宗委派的枢机被加冕为皇帝。Neapolis(那不勒斯)的国王 Robertus(罗伯特,1309-1343年)——他是教会国的总督和罗马的 senator(元老),是教宗的封臣和德意志帝国的封臣——当时他的军队占领了罗马,所以皇帝认为需要反对他(1313年),这就造成皇帝和教宗之间的冲突,因为教宗的政治接近法国。皇帝和 Neapolis(那不勒斯)的战争尚未暴发时,皇帝在1313年8月突然在 Siena(锡耶纳)附近的 Buonconvento(布翁孔文托)去世,他的墓在 Pisa(比萨)的大教堂。

138.3 在 Clemens V(克雷孟/革利免五世)的任期内还发生另一个令人悲哀的事件,就是 Templari(圣殿骑士团)的没落——这不仅仅在修会史上,也在整个教会政治史上有重大的影响。法国的国王 Philippus(菲利普)要为这件事承担主要的责任。他以嫉妒的眼光窥伺着这个修会的权力和独立地位,又渴望得到他们的丰富财产——这些财产多在法国境地(参见 118.3),所以国王就决定要毁灭这个修会。法国南部的 Esqui de Floyran(得·费然)——据说他曾经当过圣殿团的骑士——的秘密控诉(1305 年)为国王提供了他所需要的借口,施用教会信仰最有利的武器对付了这个骑士团。这些控诉是太可恶的:据说,那些将要进入骑士团的人必须向十字架(苦像)吐唾沫,脚踏十字架,又要崇拜一个偶像(被称为“Bafomet 巴佛梅特”)以及做一些淫秽的事。法国国王不断给教宗压力,所以教宗最终说他将会认真地检察所谓的“factum templariorum”(圣殿骑士团的事件)。这时,国王——表面上是在教宗的同意下,实际上是擅自的行动——于 1307 年 10 月 13 日下令逮捕法国所有的骑士团人士(大约 2000 人),首先是他们的总团长 Jacobus de Molay(摩莱)。国王同时也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又呼吁其他的国王效法他的措施。国王的公务员以及那些完全听从国王的宗教裁判所人员审问了那些骑士团人士,通过拷打等方式强迫他们“承认”各种“罪行”。圣殿骑士团的总团长在精神上完全崩溃了(也许他也受了虐待和折磨)并要求他的部下也承认他们的“罪”。

Philippus(菲利普)王始终用“调查 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的异端”这样的武器来威胁教宗,而教宗本身就比较软弱,所以这个事件的结果是可以预料的。虽然 Clemens(克雷孟/革利免)在开始的时候还向国王提出抗议,说国王侵犯宗座的权利,又要求国王交出被逮捕的骑士和他们的财产,但在 1307 年 11 月以后,教宗由于那些骑士的“表白”感到害怕,所以他自己命令别的地区的国君们逮捕圣殿骑士团的成员,规定他们的财产应该归于教会。他自己在 1308 年夏天审问 72 个——国王 Philippus(菲利普)送给他的——圣殿团的骑士。他又叫三个枢机在 Chinon(基农)审问圣殿团的总团长。他越来越相信这个骑士团的“罪”,又一次命令教会有关机构要重新而且普遍地检察圣殿骑士团的人,并且可以施用拷打的方式。如果一个骑士再一次收回他原先的“供词”,他被称为“顽固的异端人”,就会被烧死。比如,在 1310 年 5 月 12 日就有 54 位圣殿骑士团成员一起在巴黎被烧死。另一些人在监狱中或因拷打去世。

138.4 教宗 Clemens(克雷孟/革利免)早在 1308 年就预定将来要在 Vienne(维

恩)举行一个普遍的主教会议(第15次大公会议,1311年10月到1312年5月)。这个会议的主题是:对 Bonifatius VIII(博尼法奇乌斯八世)的控诉、圣殿骑士团的法案、圣地的急需(十字军运动的需要)和教会改革的迫切需要。这个主教会议于1312年宣布,关于 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的问题已经可以告终(参见上文138.2)。在十字军运动方面,他们规定仅仅要收6年的税,而法国和英国的国王们作出一些不很确定的承诺(参见126.5)。尤其 Mende(门得)的主教 Wilhelmus Durandus(=Duranti 杜兰者)很坚决要求教会内部的改革,而这个主教会议也热烈谈论相关的问题,但只有一部分的改革文献是这次会议宣布的,其他的文献在后来的 *Constitutiones Clementinae*(《克雷孟教规集》,1314年)和 Johannes XXII(约翰内斯二十二世)的法律文集(1317年)中被发表(参见110.3)。关于方济各会的“神贫争论”,参见151.1,关于反对 Petrus Johannis Olivi(欧利维)的决定,参见131.1,关于 Begines(贝居因)妇女组织的问题,参见117.3d,而关于在大学教东方语言的问题,请参见127.5。那次会的主要精神力还是投入到圣殿骑士团的问题上。法案的文件被宣读后,大部分的主教认为,这个骑士团并不应该受审判,而应该聆听他们自己的声音。虽然如此,教宗顺从了法国人——法国国王也在场——的压力,以 *Vox in excelso*(《在高处的声音》)的诏书(1312年3月22日)取消了这个骑士团,虽然不是以终极性的“审判”(non per modum definitivae sententiae),而是以一种“管理规定”(per modum provisionis seu ordinationis apostolicae)的形式。该骑士团的财产被交给 Johanniter(=Hospitaller 医院骑士团),在西班牙,他们的财产归于其他的骑士团,而在葡萄牙,他们的财产归于那个新创立的(1318年)“基督团”(Militia Jesu Christi)。实际上,各地的国君都接受了圣殿骑士团的大部分财产,尤其是法国的国王。法国的 Philippus(菲利普)甚至忽视教宗的权利并亲自审判了几个骑士团的高级领导。一种随着国王首肯的圣职团审判这些人为无期徒刑,但诺曼底的区长和副区长收回了他们原先作的“承认”并说他们的骑士团是无辜的,所以他们被烧死(1314年3月11日),和几百个其他的骑士兵一样蒙受不白之冤。

虽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一直有一些学者认为,骑士团基本上有罪,但今天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再没有什么争论了:那些谴责整个骑士团或大部分成员的控诉是不能证明的。虽然圣殿骑士团在14世纪初可能没有早期的高尚理想,但也并没有任何表明普遍腐败或道德上放纵的迹象。在那些法国以外的国度中,没有人控告圣殿团的骑士。在西班牙地区(Aragon 阿拉贡,Barcelona 巴塞罗纳)和在 Cyprus

(塞浦路斯)的有关检察都证明骑士团是无罪的。那些因拷打虐待或通过精神性压力而获得的“承认”和“表白”都没有说服力,和后来的“巫婆法案”中的“承认”一样都不能证明任何事。

139

教宗们与 Ludovicus Bavarus(巴伐利亚人路易)的搏斗。

教廷回归罗马

历代教宗:Clemens V(克雷孟/革利免五世,1305 - 1314年);Johannes XXII(约翰内斯二十二世,1316 - 1334年);Nicolaus V(尼苛劳/尼哥拉五世,对立教宗,1328 - 1330年);Benedictus XII(本笃/本尼狄克十二世,1334 - 1342年);Clemens VI(克雷孟/革利免六世,1342 - 1352年);Innocens VI(依诺森六世,1352 - 1362年);真福 Urbanus V(乌尔巴努斯五世,1362 - 1370年);Gregorius XI(额我略/贵格利十一世,1370 - 1378年)。

139.1 在 Clemens V(克雷孟/革利免五世)去世后,在 Avignon(阿维尼翁)的枢机团仍然分裂为意大利派和法国派,所以他们需要两年多的时间才选出了新的教宗。最后,枢机们在法国的影响下于 1316 年 8 月在 Lyon(里昂)选立了那位已 70 多岁的 Jacobus Duese(= de Osa),他来自 Cahors(卡获),原来当过 Carolus II de Neapolis(那不勒斯王查理二世)的宰相,现在取名为 Johannes XXII(约翰内斯二十二世,1316 - 1334 年)。他是所有在 Avignon(阿维尼翁)任职的教宗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他受过良好的神学教育,有目标和工作精神,尤其关心宗座的管理制度和财政(参见 140)。他不懈地活动,始终关注教会的需要,个人生活简单、节约、俭朴。然而,在他的教会政策方面,他过于坚硬,缺少灵活性,而且太多重视法国的利益。因为大部分选他的人都希望,教宗会继续居住在 Avignon(阿维尼翁),这个位于 Rhone(罗纳河)的城市成为宗座的长期住所。在 Johannes(约翰内斯)任期内的大部分时间一直和德国皇帝发生冲突。在 Henricus VII(亨利七世)去世后,德国的诸侯们又选了两个国王。大部分的“选帝侯”拥护巴伐利亚的 Ludovicus(路易),他被称为 Ludovicus IV(路易四世,1314 - 1347 年),但 Habsburg(哈布斯堡)派的人推出了 Rudolphus de Habsburg(哈布斯堡的鲁道夫)的孙子 Fredericus(腓特烈,1314

年)。Ludovicus(路易)请教宗给他举行加冕礼,而 Fredericus(腓特烈)请教宗承认他的王位,而教宗在开始的时候保持中立的态度。在 Muehldorf(姆尔多夫)的交战(1322年)中,Ludovicus(路易)获得胜利,但教宗仍然没有承认他为正式的德国皇帝。德意志帝国在意大利地区的管理问题使双方的冲突暴发。根据13世纪教廷的理论——这些观点通过 Clemens V(克雷孟/革利免五世)被写入官方的法典——Johannes(约翰内斯)在皇位空缺时要求替皇帝管理帝国在意大利的地区。然而德国皇帝不同意这种要求,因为如果同意就间接会削弱帝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关系。教宗 Johannes(约翰内斯)没有采取一些有缓和作用的措施,反而“在没有皇帝的条件下”(vacante imperio)再次肯定 Clemens V(克雷孟/革利免五世)于1314年的决定:那位被 Henricus VII(亨利七世)驱逐的 Robertus de Neapolis(罗伯特,参见138.2)被任命为意大利中北部帝国地区的管理者(1317年)。Ludovicus(路易)于1323年春天派遣他的代理人 Berthold von Neiffen(贝尔托德)伯爵到意大利北部,他以武力支持意大利的 Ghibellines(皇帝派),所以教宗激烈抵抗他——虽然一些枢机不同意教宗这样做——并说皇帝应该三个月以内放弃他的政权,否则教宗会绝罚他,且宗座将会决定德国政权的事(1323年10月)。教宗 Johannes(约翰内斯)这种行动显然受了法国政治的影响。因此,Ludovicus(路易)于1323年12月在 Nuremberg(纽伦堡)向教宗的要求提出抗议。然而,他不仅仅要保护自己,而且反过来攻击教宗和宗座这个机构。教宗说皇帝支持一些异端人士,而皇帝却说教宗也和异端人士有关系,所以教宗于1324年3月23日绝罚皇帝并禁止臣民们服从皇帝。在 Frankfurt(法兰克福)附近的 Sachsenhausen(萨克森好森),皇帝于1324年5月提出申诉,同时重复他的攻击,说教宗因为反对那些严格的方济各会的人(参见151.1)在形式上是一个异端人士,所以他已不是正规的教宗;他是帝国的敌人和教会秩序的破坏者。Ludovicus(路易)再一次呼吁教会的人召开一个大公会议,这个会议应该讨论 Johannes(约翰内斯)教宗的正统性。

139.2 这样,争吵和攻击代替了和平谈判——中世纪皇帝和宗座最后一次的大规模的交锋。这个争论与11世纪的 Salier(撒里尔王)和12、13世纪的 Hohenstaufen(施陶费尔王)时的争论一样激烈,真到 Ludovicus(路易)死亡才结束了这个冲突。这一点令人感到遗憾,因为 Ludovicus(路易)王早在1325年与他的对手奥地利的 Fredericus(腓特烈)达成一种协议,这样结束了关于德国王位的争论。教宗一步一步加重了这位巴伐利亚王的惩罚和审判:他否定他当德国国王,他

宣布那些拥护他的人被绝罚,宣布禁罚(*interdictum*)。正如在 Bonifatius(博尼法奇乌斯)和 Philippus(菲利普)王的冲突时一样,很多人现在也发表一些激昂地谈论国度和教会关系的文章或论战文章。这些文章显示出非常严峻的矛盾。支持 Ludovicus(路易)的人包括方济各会“灵性派”(即“严格派”)——他们因为“神贫”的问题与教宗有冲突并且鼓励国王采取更强烈的措施。他们的领导是总会长 Michaelis de Cesena(弥格尔)以及他的同会会士 Bonagratia(博纳格拉提亚)和 Wilhelmus de Occam(奥康的威廉),他们于 1328 年从 Avignon(阿维尼翁)逃到 Ludovicus(路易)的宫廷。Occam(奥康)是当代最有影响的神学家之一,他的 *Dialogus de imperatorum et pontificum potestate*(《论诸皇帝和教宗的权力》,1338/1343 年)和其他的论文表明,他不仅仅是主张“国度统治教会”(Staatskirchentum)的先驱者,而且也在谈论中提出这样的命题:教宗的首席权不是一个必要的、由基督规定的制度。两个巴黎的哲学教授走得比他更远一些,他们是 Marsilius de Padua(马尔西留,1342 年或 1343 年在 Munich 慕尼黑去世)以及 Johannes de Jandun(约翰内斯),他们也曾经在 Ludovicus(路易)的宫廷中工作。他们的世界观是一种有自然主义倾向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明确的 Nominalismus(唯名论)以及一些 Averroismus(阿威罗伊主义)的怀疑主义因素(参见 135.1)。他们共同写了(或者说 Marsilius 马尔西留是唯一的作者)一个革命性的纲领性的文章,即 *Defensor pacis*(《保卫和平者》,1324 年)。这部著作非常激烈地攻击教宗并提出一种新的国度理论和教会理论——这意味着他们已经完全脱离了中世纪思想和当时的教会制度,这就是后来宗教改革时代的明显前奏。

在《保卫和平者》中,作者主张平信徒的权力和民主的原则有主导地位。根据这个文章,一切政治权力都来自人民的主权以及人民所选的代表,即君主。基督徒的团体是教会权力的载体,教会最高的权威是世俗权威召开的大公会议,而平信徒也参与这些会议。圣职人员的地位(*sacerdotium*)是社会的部分和社会上的职务(*pars et officium civitatis*),而教会在任何方面都要接受国度的领导。国度监督和控制教会,教会本身没有立法权或审判权,它应该没有财产,仅仅受限于纯粹精神性的领域。教宗的首席权仅仅是一种荣誉称呼,它并不来自于神的规定。这部著作甚至怀疑罗马教宗可能不是 Petrus(伯多禄)的继承人,因为《圣经》没有直接地表述伯多禄为罗马的主教,而《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泉源。为此教宗 Johannes XXII(约翰内斯二十二世)在 1327 年的诏书中宣布,《保卫和平者》的 5 个句子是异端

并说这篇文章的作者是 Fili Belial(“魔王之子”),将他们绝罚。巴黎大学也谴责其中的一些话。从整体来看,这些开放的作者的观点在当时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远远走在他们时代的前面,但几百年后,这些观点发挥了一种分裂人们的作用。大部分的作者当时还保卫了教廷或教宗的立场或寻找一种中介的路线。在这方面,两位奥古斯丁会会士, Aegidius Romanus(艾吉丢,著有 *De ecclesiastica sive de summi pontificis potestate*《教会或教宗的权威性》,1302年,这是最重要的这方面的著作,大概也是 *Unam sanctam*《唯一至圣》诏书的基础)以及 Jacobus de Viterbo(雅各伯,著有 *De regimine christiano*《基督徒的统治》,1301/1302年)扩展了教宗的权力,使之覆盖一切精神性的和世俗的领域。另一些作者更进一步发展这些思想,比如意大利的奥古斯丁会会士 Augustinus Triumphus de Ancona(安科纳的奥古斯丁)约于1322年献给 Johannes XXII(约翰内斯二十二世)他的 *Summa de potestate ecclesiastica*(《教会权利大全》),西班牙的方济各会会士 Johannes Alvarus Pelagius(阿尔瓦鲁斯)在他的 *De statu et planctu ecclesiae*(《教会的现状和悲哀》,约于1332年)中也尖锐地批评教会中的不良现象,而意大利的方济各会会士 Wilhelmus de Sarzano(撒匝诺)在其 *De potestate summi pontificis*(《教宗的权力》)和 *De excellentia principatus*(《论首席权的优点》)中强教宗的权威性。这些作者认为,宗座是人间一切权威的泉源,而教宗对于世俗的事务也有不受限制的管理权。皇帝和其他的国君都是教宗的臣民。

另一些学者保持中间的路线,他们认为国度的世俗权力在自己的范围内是独立的。有这种主张的人是巴黎的道明会会士 Johannes Quidort(约翰内斯),他的著作是 *De potestate regia et papali*(《论国君和教宗的权力》,1302年),来自奥地利 Admont(阿德孟)的本笃会会士 Engelbertus(恩格伯尔特,著有 *De ortu, progressu et fine Romani imperii*《罗马帝国的开始、发展和目标》,约于1308年),伟大的诗人 Dante Alighieri(但丁,参见136.2;138.2)在他的 *De Monarchia*(《帝制论》,3卷,1310年或1312年?),以及稍后一些的 Lupoldus de Bebenburg(鲁波德),他是 Bamberg(班贝格)的主教,在1340年写的 *Tractatus de iuribus regni et imperii*(《论国度和帝国的法律》)虽然很坦白地支持 Rense(任色)的条约(参见下文139.4),但在别的方面热爱教会和宗座。那位著作累累的作者 Conradus de Megenberg(康拉德,1374年在 Regensburg 雷根斯堡去世)在他的诗 *Planctus ecclesiae in Germaniam*(《教会向德国的抱怨》)提出一些严肃的警告,又在他的文章 *Oeconomica*(《管家的

技术》)中攻击 *Defensor pacis*(《保卫和平者》)的观点。

139.3 因为意大利的亲皇派(*Ghibellines*)请他来,Ludovicus Bavarus(路易)于1327年去意大利为了获得皇帝的荣耀。Marsilius de Padua(马尔西留)陪同他。这时候,Avignon(阿维尼翁)的教廷更加加重对他的种种惩罚,最后他被剥夺一切地位,甚至被宣布为失去自己家族历代的封地 Bavaria(巴伐利亚)。在1328年1月17日,这个德国王违背着一切传统,让当时的罗马市长 Sciarra Colonna(科罗纳),这位平信徒,“以罗马人民的名义”在圣伯多禄/彼得大堂给他举行加冕礼。后来他宣布 Johannes(约翰内斯)教宗“由于异端和其他的恶行”必须下台,同时拥立意大利的方济各会会士 Petrus de Corvara(伯多禄/彼得)当教宗,名为 Nicolaus V(尼苛劳/尼哥拉五世,1328-1330年);这样,教宗和国王之间的和好似乎成为不可能的事。然而,拥护这位对立教宗的人非常少,所以他在两年后表示他要服从 Johannes(约翰内斯)。Johannes(约翰内斯)早在1328年初呼吁人们组织一个抵抗 Ludovicus(路易)的十字军运动。因此,皇帝在意大利的政策失败了,但他在德国的地位仍然没有动摇。大部分的君主和百姓,尤其那些属于帝国的城民,都支持皇帝,虽然教会如此严厉地惩罚了他。德国的主教和圣职人员分裂为两派。在 Fredericus(腓特烈)于1330年去世后,Ludovicus(路易)愿意和教宗和好,但教宗始终要求皇帝放弃他的政权,而在这一点上,皇帝无法同意。那位90岁高龄的老教宗还激起了一个神学争论,因此为自己造成一些麻烦。他在1331年后的几次讲道中提出这样的观点:义人的灵魂,包括玛利亚和宗徒/使徒们的灵魂们在世界审判后才能见到上主(visio beatifica 荣福直观)。这种说法引起广泛的反对。巴黎大学和部分的枢机们都反对教宗的观点,所以他在临终时收回了他的特殊说法。Johannes(约翰内斯)教宗也于1329年审判道明会会士和神秘神学家 Meister Eckhart(艾克哈特,参见146.2)。

根据一篇于1332年或1334年的“诏书草稿”(名为 *Ne praetereat* 或 *Quia in futurorum eventibus*),教宗 Johannes(约翰内斯)想长期分裂德国帝国和意大利(伦巴第)。不过,这个文献只是在 Robertus de Neapolis(罗伯特)的秘书室写的草案,没有被宣布为正式的诏书。实际上,这就是教宗的计划,因为他曾经邀请法国 Philippus VI(菲利普六世)当伦巴第人的王。

因为这位教宗很节俭,又很会管理钱财,所以他留下的教廷宝库拥有很多钱,但不是 Florentia(佛罗伦萨)的历史学家 Giovanni Villani(维拉尼)所说的2500万金

币,而仅仅是75万金币——这是一些可靠的文献的数字——所以也不能说他是一个贪财的人。

139.4 下任教宗 **Benedictus XII**(本笃/本尼狄克十二世,1334 - 1342 年)原来是一位熙笃会隐修士。他建立了 **Avignon**(阿维尼翁)教廷的堡垒式宫殿(这个宫殿今天仍然存在)——这就说明教廷已经感觉到那里是他们的“家乡”。这位教宗是一个爱好和平和教会改革的人,所以他更愿意与 **Ludovicus**(路易)达成协议。然而,法国的利益成为一个阻碍,因为法国的 **Philippus VI**(菲利普六世,1328 - 1350 年)和 **Robertus de Neapolis**(罗伯特)担心教宗和皇帝之间的和平会削弱他们的影响,甚至会导致教宗回到意大利去。这些阴谋在德国引起了很大的反感。德国的主教们在一封信中要求教宗必须与 **Ludovicus**(路易)皇帝和好。那些(七个)选帝侯形成了一个联盟并宣誓,他们都会拥护帝国的荣誉和种种权利。他们于1338年7月16日在 **Rense**(Rhens.任色)声明说,根据古老的传统和权利,大部分的选帝侯所选立的德国王不需要教宗的确认或委任,他可以马上获得国王的尊严和地位,可以立即管理帝国的种种财产和权利。在1338年8月6日,**Ludovicus**(路易)皇帝宣布一个法律(名为 **Licet iuris**),其中肯定了 **Rense**(任色)的规定并加上说,皇帝的尊严和权力直接来自上主,而那位当选的德国王依靠这种选举就是真正的国王,而且也应该被视为罗马人的皇帝。教宗的权力仅仅是举行加冕礼。在一个声明中,**Ludovicus**(路易)又宣布一切针对他的惩罚是无效的,禁罚(**interdictum**)是无意义的,但这又引起了很多混乱和良心上的困惑。几年后(1341年),皇帝又和教廷进行和平谈判,而法国的 **Philippus VI**(菲利普六世)亲自当中介人(因为他现在需要一个反对英国的同盟)。然而,教廷和巴黎国王的关系在那个时期很不好,所以这些谈判都没有成果。另外,**Ludovicus**(路易)想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所以他采取一个引起很多朋友的反感的措施(因为他严重地违背了基督宗教婚姻的原则):他使自己的儿子 **Brandenburg**(布兰登堡)的伯爵 **Ludovicus**(路易)和 **Tirol**(蒂若勒)的女伯爵 **Margareta Maultasch**(马格瑞塔)结婚——但这两个人本来就是亲戚,而这位女伯爵的丈夫是 **Johannes Henricus de Bohemia**(波希米亚的约翰内斯·亨利),所以皇帝必须先宣布第一个婚姻是无效的(1342年)。皇帝敢这样做都是因为他的顾问 **Marsilius**(马尔西留)和 **Occam**(奥康)支持他。

139.5 下任教宗是 **Clemens VI**(克雷孟/革利免六世,1342 - 1352 年),在他的任期内人们再次努力恢复和平。**Clemens**(克雷孟)来自法国南部,他很明智,又有

学问,是一位著名的讲道者,但他也注重豪华的表现和世俗的荣耀,多使自己的亲戚发财或升职,又完全听从法国国王的政治要求。在1348年他从 Neapolis(那不勒斯)的 Johanna I(约翰纳一世)女王那里以8万金币购买了 Avignon(阿维尼翁)城和郊区;因此,这些地区(以及 Venaissin 维乃辛伯爵领地)后来属于教会国,一直到法国革命(1789年)。Clemens(克雷孟/革利免)向 Ludovicus(路易)提出非常重大的要求,所以德国帝国各阶层的代表们(Reichsstaende,即教会的代表如主教,以及世俗的代表如公爵、伯爵等)也拒绝了这些要求(1344年9月)。然而,他们仅仅要确保帝国的权利,并没有保护皇帝本人。教宗现在又一次(而且非常严厉地)绝罚皇帝,并要求选帝侯们选立一个新的皇帝(1346年4月)。选帝侯也回应了这个要求,因为德国的情况在各方面很混乱,大家都渴望和平。教宗宣布的 interdictum(禁罚)已经持续20年之久,所以人们对于教会和圣职人员的敬意被削弱,他们对教宗怀有一种不信任感或漠视他,因为他们认为教宗受法国的控制。德国人民在宗教和道德上处于一种“粗野化”(Verwilderung)的状态,当时有虔诚信仰的人多想逃到 mystica(神秘主义,参见146)那里,而那些反对教会的教派也越来越多。在很多教区有两个主教,一个属教宗派,一个属皇帝派。很多修会团体也被分裂。Ludovicus(路易)皇帝因他最近的行动并因他那种摇摆不定的态度在很多圈子里引起人们的不满。因此,在那7位选帝侯中就有5位说他们不再支持皇帝,他们于1346年7月在 Rense(任斯)选立来自 Luxemburg(卢森堡)的 Carolus(卡尔)为德皇。他是 Moravia(摩拉维亚)的伯爵,是 Bohemia(波希米亚)王 Johannes(约翰内斯)的儿子和 Henricus VII(亨利七世)的孙子。他现在被选定为德国国王。Ludovicus Bavarus(巴伐利亚人路易)突然于1347年10月中风去世,所以在德国没有暴发内战。因为他的继承人 Guenther von Schwarzburg(贡特尔)——德国的 Wittelsbacher(维特斯巴赫)党派支持他——放弃政权(1349年5月),一个月后去世,这个新的国王 Carolus IV(卡尔四世)就没有什么政治对手了。他和以前的一些德国国王一样被称 rex clericorum(德语 Pfaffenkoenig,“司铎们的国王”,教会拥立的国王),因为他被迫向教廷提供很多权利,但他也懂得确保帝国和德国各公国的权利,甚至在教会面前他也适当地和明智地肯定帝国的权利。对他来说,基督信仰不是表面上的,而是内心的真情。也许可以说,他在中世纪晚期几百年中是最伟大的德国统治者,一直到 Maximilianus I(马克西米连一世,1493-1519年)。他有政治上的能力,受过杰出的教育,支持科学、艺术和人文主义(参见155.3),于1348

年就在 Praga(布拉格)建立德国地区第一所大学。通过他的努力,Praga(布拉格)于 1344 年被提升为总教区。然而,他任期的开始出现了一些恐怖的现象,因为“黑死病”(鼠疫)造成很大的损失(1348 - 1350 年),这又带来了犹太人的迫害和那些“鞭笞派”(flagellantes)的运动(参见 150.1; 152.3)。

在 Avignon(阿维尼翁)的新教宗是 Innocens VI(依诺森六世,1352 - 1362 年),他是一位爱好和平的并严格遵守道德规律的人,但他也有一些“重用亲戚”(nepotismus)的倾向。他的选举很特殊,因为枢机团首次在选举过程中提出一个 Wahlkapitulation(关于选择后的承诺),这样要限制未来教宗的权力范围(但 Innocens 在当选后宣布这些承诺是无效的)。这个迹象也表明另一点:枢机团愿意在教宗旁边(甚至在教宗的“对面”)拥有一个独立的地位(参见 110.2d),自从 Avignon(阿维尼翁)流亡以来,这个倾向越来越严重。

在 1355 年的复活节,Carolus IV(卡尔四世)从 Ostia(欧斯提亚)的枢机主教的手中在罗马接受了皇帝的冠冕,但他并没有开始整理意大利的混乱情况。符合他和意大利人的契约,他在加冕礼后马上回到德国去。他在 1356 年 1 月在 Nuremberg(纽伦堡)发表了所谓的 Bulla aurea(德语:Goldene Bulle《黄金敕令》),其中规定选皇帝的秩序,因为他要排除像上次选帝那样的争论。根据他的敕令,七个选帝侯中多数的人投谁的票,谁就是德国国王,而这个选举有效。教宗 Johannes XXII(约翰内斯二十二世)还如此强烈地要求了教宗有这个选择的“批准权”,但 Carolus(卡尔)在他的敕令中“悄悄地”绕过这个问题,没有提到它。

139.6 教宗们在 Avignon(阿维尼翁)的流亡时期已经维持了很长的时期,对意大利和教会国都有不良的影响。在很多地方出现了一些暴君,他们摆脱了教宗的统治。罗马陷入了一种无政府状态。Colonna(科罗纳)家族,Orsini(欧尔西尼)和其他的派别之间的强烈搏斗不断震撼罗马城。贵族们被推翻后,那位 Cola di Rienzo(科拉·里恩佐)——原名 Nicolaus(尼科拉),葡萄酒商 Laurentius(劳楞佐)之子——,一位城市律师以“民众官”(tribunus plebis)抢夺政权(1347 年)。他是人文主义的热烈爱好者,是 Petrarca(彼特拉克)的朋友,又传播了 Joachim de Fiore(约亚敬,参见 131.1)的思想,认为“圣神/圣灵的时代会带来宗教上的复兴”。他说他是一个新的“奥古斯都”(即古罗马皇帝),要建立罗马为他的基地,将要统治意大利,进而恢复世界的秩序,但这位情绪化的煽动者(schwaermerische Demagog)在 7 个月后被推翻。罗马的动荡并没有结束。新的“民众官”Francesco Baroncelli(巴润

切利)于1353年被迫下台,而Rienzo(里恩佐)同年再一次,以senator(“元首”)的身份当罗马的市长——教宗Innocens VI(依诺森六世)也同意他这样做。然而,他的统治有独裁者的色彩,所以他在一次人民起义中被打死(1354年)。很幸运的事实是,当时已经有那位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非常有能力的枢机特使Aegidius Albornoz(阿尔波诺斯)在意大利活动,他出生在西班牙,后来两次被派到意大利(1353-1357年和1358-1367年),逐渐巩固了教宗在教会国的统治,这样他被称为“教会国第二个创始者”。他颁布的法典(*Constitutiones Aegidianae*《艾吉丢的宪法》)甚至一直到1816年都是有效的(只经过一些不重要的修改)。

这位Albornoz(阿尔波诺斯)枢机的成就是准备了教宗回归罗马的基础,而这种回归比任何军事上的措施都更重要。除了法国人以外,整个基督宗教世界都普遍认为,教宗离开罗马是一件不自然的事和一种灾难。然而,那位原先在Marseille(马赛)的St. Victor(圣维克托)隐修院当院长的Urbanus V(乌尔巴努斯五世,1362-1370年)才开始严肃地推动回归罗马的事。在Avignon(阿维尼翁)任职的教宗中,他是最好的教宗,很虔诚,认真推动教会改革,慷慨支持研究和教学工作,他被尊敬为教会的“真福”(beatus)。那时最具有威望的人士似乎都要求他迁教廷到罗马,比如Carolus IV(卡尔四世)皇帝——他于1365年去Avignon(阿维尼翁)访问;诗人Petrarca(彼特拉克)代表着意大利的爱国主义者并于1366年以“罗马寡妇”的名义向教宗写了一封感人的信。北方(瑞典)的伟大神秘神学家圣Birgitta(=Briget, Brigida 布里吉特,参见151.3d)在1350年的“大禧年”后定居在罗马,在那里过着隐修者的苦修生活;她以热烈的愤慨批评教廷的Avignon(阿维尼翁)的种种缺点。虽然巴黎政府和法国的枢机们请教宗留下,Urbanus(乌尔巴努斯)还是于1367年离开了Rhone(罗纳河)边的豪华城市,并于1367年10月进入了罗马——所有的支持教会或支持意大利爱国运动的人都为此感到欣慰。Carolus IV(卡尔四世)皇帝率领一个相当大的军队,于1368年第二次来到意大利去拜访教宗,但他只满足于教宗对他那种名义上的肯定,并没有着手在四分五裂的意大利缔造和平。因此,Urbanus(乌尔巴努斯)无法处理罗马的种种问题,他听从法国枢机们的劝勉,没有听从Birgitta(布里吉特)的警告,于1370年秋天又回到Avignon(阿维尼翁),不久后在那里去世。教宗们在意大利的世俗权力再一次陷入了很严重的危险中。法国使者的严格管理方式在很多地方引起意大利人的反感。因此,那个强大的Florentia(佛罗伦萨)共和国利用了人们的情绪来煽动他们反对教宗。在

Avignon(阿维尼翁)的新教宗 Gregorius XI(额我略/贵格利十一世,1370 - 1378年)——Clemens VI(克雷孟/革利免六世)的侄子和一位能干的律师——认为,他应该施用最严厉的措施来镇压这次暴动。他于1378年3月用绝罚和禁罚(interdictum)来惩罚 Florentia(佛罗伦萨),并派遣一些来自 Britania(不列塔尼)的士兵到意大利。这些士兵的表现很不好,所以意大利人的愤怒和反感更大。在这个时刻出现一个有特殊意义的妇女充当双方之间的中介人——圣 Catharina de Siena(锡耶纳的加大利纳,1347 - 1380年)。她是一个染衣工人 Benincasa(贝宁卡萨)的第23个孩子,17岁时进入了圣道明的修会(道明修女会),并通过她的忏悔精神、慈善工作、神视(visiones)、灵魂超拔体验(ecstasis)以及通过她的著作(*Dialogo*《对话》和400封很古典的信)在社会上有非常大的威望。在当时的困境中,她似乎是一个由神派来的先知,用激昂的意志力和男人般的力量来改进社会和政治上的问题。为了缔造和平的缘故,她亲自去 Avignon(阿维尼翁)与 Gregorius XI(额我略/贵格利十一世)会谈。当然, Florentia(佛罗伦萨)的居民很自私,所以他们在两年以后才愿意和教宗和好,但 Catharina(加大利纳)的最迫切要求被实现:教廷早在1376年的秋天开始回到罗马去,并于1377年完成了这个迁移过程。从此以后,罗马教宗的居住地不再是 Lateranus(拉特兰),而是 Vaticanus(梵蒂冈)。当然,罗马和意大利的政治情况仍然非常混乱,所以 Gregorius XI(额我略/贵格利十一世)据说还考虑过要回到法国去。他是最后的来自法国的教宗,在他任职的晚期,他需要反对一个危险的异端运动,就是 Wycliffe(威克里夫)在英国教会引起的动荡(参见147)。

140

宗座的税务制度和任职权

140.1 教会的管理制度在教廷的中央化,宗座的财务管理和税务管理制度,以及对于外来的利益管理权在14世纪都发展到很高的水平,所以更深地影响了教会生活其他方面。因为教会国的收入部分上没有交到教廷,教宗在 Avignon(阿维尼翁)面对的种种限制(参见138.1),以及西欧教会在分裂时期的困境(参见141.2)导致这样的情况:教宗们尽力使用原来的税收或开拓新的资金来源。因此,教廷成

为全欧洲最有钱的机构,但对教会的名声以及对种种宗教任务的投入有很不好的影响。最高的宗座财务机构是 Camera Apostolica(教廷财务院),它在 14 世纪获得充分的发展。收入的来源主要是和以前一样(参见 110.2):即 census(税),就是教会国的收入,“Peter's pence”(圣伯多禄/彼得税),那些封地国的税,那些“免当地税”(exemptus)教堂或隐修院的税,总主教们的 pallium(白披肩带)税,主教们来罗马采访(visitatio liminum)的费用,那些 servitia communia(教宗批准新主教或新院长的费用,在 15 世纪也被称 annates)。这些收入的一半归于教宗,一半归枢机们(参见 110.2f)。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一些比较新的收入,即 spolia(原来归于地主们的主教遗产,参见 96.3; 107.7; 123.3)——这时候的教宗们经常要求这些遗产,以及 procurationes(即人们向主教、教宗使者或教廷视察员提供的钱或农产品),自从 Bonifatius VIII(博尼法奇乌斯八世),这些税部分上也归于教廷。除此之外还有“办事处”的费用,就是在办一些豁免、特权或教宗的特恩表现时交的费用,或一些特殊的税收,比如原先为十字军运动收的税(参见 109.3; 126),现在为反对 Hus(胡斯)、反对土耳其人或抵抗宗座敌人的“什一税”和种种资助。在 Avignon(阿维尼翁)时代,教宗财务制度方面的重大改变是所谓的 intercalaris(一些空位财产的收入)以及所谓的 annalia, annatae(年度税,新上任圣职人员在第一年要交的税)的征收。

Clemens V(克雷孟/革利免五世,1305 - 1314 年)开始为教廷要求那些空位的教会财产的收入(fructus medii temporis“空位收益权”)。这种税在开始的时候在时间和地点都有限,但在 Johannes XXII(约翰内斯二十二世,1316 - 1334 年)的时代成为普遍的。另外,在 Clemens V(克雷孟/革利免五世)的时代也开始有上述“年度税”的习惯,就是每当教廷委任一个圣职人员时要提供第一年的收入(fructus primi anni“第一年的收益权”)。这些 annatae(年度税)在 Johannes XXII(约翰内斯二十二世)的任期内更受到重视,为那些主教区和“豁免”的隐修院是收入的十分之一,但为其他的教会财产是第一年收入的一半(medii fructus“一半的收益权”)。后来的 Bonifatius IX(博尼法奇乌斯九世,1389 - 1404 年)规定,所有的由教宗委任的教会职位都需要交 medii fructus(一半税,1392 年的规定),所以这种税后来称为 Annatae Bonifatianae(博尼法奇乌斯的年度税)。

140.2 教廷财务主义的提升与另一个现象有关系:教宗任职的权利范围大量扩大化。12、13 世纪的教宗们已经影响了其他教区的职位任命过程,比如教廷提供了一些 exspectantiae(预先规定),provisiones(= mandata de providendo 提供职位)

或 *reservations*(预先保留某个职位)。因此,在个别地区已经有人抱怨(参见 110. 2g; 135. 3a; 136. 3),但这方面的发展是无法阻挡的。尤其那些“预先保留”的作法很普遍。

通过 1265 年的 *Licet ecclesiarum*(《教会可以》)敕令,Clemens IV(克雷孟/革利免四世)根据一个“老习惯”规定,所有在教廷去世的教会领导的职位(所谓的 *beneficia apud curiam vacantia*)的任命权都归于宗座。同时,他规定教宗关于一切教会职位都有“无限制的处置权”(*plenaria dispositio*)。Bonifatius VIII(博尼法奇乌斯八世)于 1298 年扩大这个范围,他说只要那些人在一个离罗马两天路的地方去世,他们的职位还归于教廷的管理。在开始的时候,这些规定仅仅指比较小的职位,但从 Clemens V(克雷孟/革利免五世)以来,这也包括教区和隐修院。另外, Johannes XXII(约翰内斯二十二世)又扩展“保留”的范围,使当时的人已经感觉到奇怪。他规定,所有的曾经与宗座发生任何关系的职位(比如通过罢免、转任、升职、替换、放弃的选择等)或由于枢机或教廷人员去世的空缺职位——这些都由教宗重新调任。这样,教廷选任的职位大大增多了,而这些职位也都有交“年度税”的义务。当 Johannes XXII(约翰内斯二十二世)与 Ludovicus Bavarus(巴伐利亚人路易)进行搏斗时,他很系统地利用这种规定来尽力反对支持皇帝的主教们渗透德国的教会。Benedictus XII(本笃/本尼狄克十二世)在 1335 年的诏书 *Ad regimen*(《为了管理》)中总结并增多了这些规定,而后来的教宗们的办事规则又加强了这些规定的内容。在 14 和 15 世纪经常受批评的现象是所谓的 *cumulus beneficiorum*(一人任多职位)以及那种很普遍的 *commende*(转让制度,参见 96. 1),就是说某一个产业被转让给某一个圣职人员,但他并没有完成与此有关的牧灵任务,只让别的司铎进行牧灵工作,仅仅给予他一点点钱。Johannes XXII(约翰内斯二十二世)禁止圣职人员有两个与牧灵工作有关的职位,但枢机们和国君的儿子们不包括在这个禁令之内;其理由是:枢机们为全世界教会服务,这就意味着他们也为个别教会服务,而国王的儿子们应该有一种特权。在 Avignon(阿维尼翁)的流亡时期中,枢机们和教廷的工作人员经常获得更多的职位,因为他们的开支比较大。在教会大分裂的时候,这样的现象更多,因为每一个教宗都利用了“任职权”这一工具来扩大自己的拥护者的圈子或削弱对方的力量。

140.3 教廷的税务政策和职位政策虽然没有受到原则上的批评,但在实际的操作中确实多次引起圣职人员和平信徒的不满、反对,甚至抵抗。人们感觉到教会

的税收太大,更是因为征收的方式多次利用痛苦的惩罚(免职、绝罚、禁罚)。这种作法的后果是人们的宗教感情越来越弱,他们不再看重教会的惩罚。自从14世纪以来,教廷直接介入外地职位的任职问题,这就避免了原来的任职秩序和当地人的选举权利,阻碍了教区的管理并引起了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因此,这些有问题的任职案经常导致在罗马教廷最高的法院(Rota Romana)的昂贵法案。很多时候,教廷任命了一些外国人(多为意大利人),但他们仅仅派遣了自己的代理人,而代理人的收入不高。另一个非常恶劣的现象是这个:一些“猎职位者”(即追求教会职位的人)从各地来到教廷(到 Avignon 阿维尼翁或罗马),而且在宗座的财务制度中发生了一些欺骗、勒索或贿赂案。

虽然有这一切问题和弊病,教廷的要求在相当长的时间都没有受到抵抗。最早提出抗议的人是英国人,他们自从12世纪以来已经形成了一种“国度教会”(Staats- und Nationalkirchentum,即政府统治境内的教会,参见107.5)。在1339年开始英国和法国之间的“百年战争”,而英国人感觉到法国控制教廷,所以他们想尽可能排除教廷对英国教会的影响。英国国会于1343年、1351年(反对provisiones“提供职位”)和1353年(Praemunire“预防”法令)宣布一些规定,其中严格禁止教宗对于英国的职位的任职,又禁止将一些诏书、法案或“预先保留职位”带到英国或向英国以外的法院提出申诉。由于Wycliffe(威克里夫,参见147),英国的“反对罗马运动”变得很激烈和危险。法国人很轻易地模仿了英国的先例,因为自从Philippe le Bel(美男子菲利普,1285-1314年)以来,法国人的爱国心和“让Ecclesia Gallicana(高卢教会)独立于罗马”的倾向很强烈。自从15世纪初法国人多次宣布了一些“高卢人的自由权利”(1407年,1408年,1418年),就是在任职和收税方面的权利,并于1438年通过Bourges(布尔日)的*Sanctio pragmatica*(“国事诏书”)提升这些规定为国家法律(参见144.2)。这就意味着,“国教制度”(Staatskirchentum,“国度统治教会”)形成了一个正式的体系。在西班牙的教会制度也越来越多受国家的统治,尤其在大分裂的时期(参见109.5)。那些在Constantia(康斯坦茨)和Basilea(巴塞尔)召开的改革会议(参见142.4;143.2)都试图改变教会的任职制度和税收制度,但效果不大。教廷和德国地区教会于1448年在*Concordatum Vindobonense*(《维也纳政教协议》)作的规定没有令人们感到满意,这些规定却经常导致误会和敌意。

西方教会的大分裂到 Pisa(比萨)主教会议(1378 - 1409 年)。

大公会议至上主义

历代教宗:1)在罗马:Urbanus VI(乌尔巴努斯六世,1378 - 1389 年);Bonifatius IX(博尼法奇乌斯九世,1389 - 1404 年);Innocens VII(依诺森七世,1404 - 1406 年);Gregorius XII(额我略/贵格利十二世,1406 - 1415 年);2)在 Avignon(阿维尼翁):Clemens VII(克雷孟/革利免七世,1378 - 1394 年);Benedictus XIII(本笃/本尼狄克十三世,1394 - 1423 年);3)在 Pisa(比萨):Alexander V(亚历山大五世,1409 - 1410 年),Johannes XXIII(约翰内斯二十三世,1410 - 1415 年)。

141.1 教宗 Gregorius XI(额我略/贵格利十一世)在 1378 年 3 月 27 日去世,他留下了一个忧虑忡忡的枢机团。他们必须在 75 年后第一次在罗马选立一个教宗,所以选举过程不完全正规。因为多数枢机仍然是法国人(16 位枢机中有 11 位法国人),人们预测下一任教宗还是一个法国人。然而罗马民众很强烈要求一个罗马人(或至少一个意大利人)当教宗。面对着街头上游行的罗马群众的压力,枢机们在第一天(1378 年 4 月 8 日)的早上就很快选择了一个意大利人;因为他们不愿意选择一个枢机,所以他们选立 Bari(巴里)的总主教 Bartholomaeus Prignano(布瑞格纳诺),他是一位在 Neapolis(那不勒斯)出生的人,后来取名 Urbanus VI(乌尔巴努斯六世,1378 - 1389 年)。(在教会历史上,他是最后一个不是从枢机团中选出的教宗。)在枢机们还没有公布他们选举的结果时,罗马的暴民已经闯入枢机们开会的楼房。在这样的混乱状态中,枢机们既困惑又害怕,他们指定 Francesco Tibaldeschi(提巴德西)枢机为新教宗,而罗马人马上给他举行教宗的尊荣仪式,同时枢机们逃走了。不久后,这种错误被揭露,而罗马人也接受了 Urbanus(乌尔巴努斯),他在第二天(1378 年 4 月 9 日)隆重登上伯多禄的宝座,并于复活节(4 月 18 日)被加冕为教宗。枢机们参与这些礼仪,向新教宗求降福,又参与他的发言会。因此他们在一个没有恐惧的时期承认这个教宗,所以后来没有权利说这次选举是无效的(虽然在选择教宗的时期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压力)。因此,Urbanus VI(乌尔巴努斯六世)应该被视为正当的教宗,而他的继承人也是正当的教宗的继承人。

141.2 遗憾的是,由于人们对 Urbanus VI(乌尔巴努斯六世)有很大的期待,但这位教宗并没有令人们感到满足。他愿意进行一些改革,但似乎太有热忱,而他那种“旁若无人”的自信使很多人反对他。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很危险的表现,因为教会在制度上的危机需要一个特别节制的、谨慎的态度(圣 Catharina de Siena 加大利纳曾经提醒教宗在这方面要注意)。枢机们近年以来都习惯了自己有比较独立的政策路线(参见 139.5),而他们没有那么谦虚,所以他们无法接受新教宗的性格;尤其是法国的枢机们(所谓的 ultramontani“大山以北的人”)仅仅看到法国的利益和政治目标。最终有 13 个法国枢机放弃了 Urbanus(乌尔巴努斯)教宗,他们在 1378 年 8 月 9 日在 Anagni(阿纳尼)宣布,教宗的选举受了外在压力,所以是无效的。他们还在同年 9 月 20 日在 Neapolis(那不勒斯)地区的 Fondi(冯迪)在 Neapolis(那不勒斯)的统治者 Johanna I(约翰纳一世)和法国的统治者 Carolus V(查理五世)的保护下又选立了一个教宗,就是 Geneva(日内瓦)的枢机主教 Robertus(罗伯特),他本来是法国国王的表哥,取名 Clemens VII(克雷孟/革利免七世,1378-1394 年)。这就显然表明,宗座会再一次接受法国的统治和影响。这种行动是可怕的,而且它的后果也是不可预计的。Clemens VII(克雷孟/革利免七世)是一个有世俗化倾向的、爱好豪华表现的主教。虽然 Urbanus VI(乌尔巴努斯六世)尖锐地攻击他,他仍能够保持他的影响力。他率领一个军队到罗马但遭失败(1379 年 4 月),此后定居在 Avignon(阿维尼翁,1379 年 6 月),在那里形成“第二个教廷”,这样就有了两个教宗和两个教廷,一个在罗马,一个在阿维尼翁。整个公教会分裂为两个派别,即拥护 Urbanus(乌尔巴努斯)的人和拥护 Clemens(克雷孟/革利免)的人。基督那个“无缝的长衣”(参见《若望/约翰福音》Jn 19:23)被撕裂。拥戴 Clemens VII(克雷孟/革利免七世)的人包括法国、Neapolis(那不勒斯)、Savoy(萨沃伊)、西班牙和葡萄牙地区的国度(那些国度在开始的时候愿意保持中立)、Sicilia(西西里)、Scotia(苏格兰)以及一些在德国西南部的小国;支持 Urbanus(乌尔巴努斯)的统治者和地区包括德国的国王 Carolus IV(卡尔四世)皇帝和他的儿子和继承人 Wenceslaus(文策尔,1378-1400 年)、意大利中部和北部、英国、匈牙利、德国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Urbanus(乌尔巴努斯)教宗宣布 Clemens(克雷孟/革利免)是一个侵略者并绝罚他和他的拥护者,而 Clemens(克雷孟/革利免)用同样的措施来反击他的对手,所以在名义上似乎所有的基督徒都被绝罚了!

这种情况被称为“西部教会的大分裂”(the Great Occidental Schism),它似乎维

持40年之久(1378年到1417年),引起了大公教会的无数痛苦和悲剧,为罗马宗座和教会生活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公共舆论陷入了无法澄清的困惑。甚至一些有非常坚定精神或崇高理想的人物开始怀疑哪一个是正确的教宗。比如,圣Catharina de Siena(锡耶纳的加大利纳)用她全部精力和热忱来说服人们肯定Urbanus VI(乌尔巴努斯六世)为正确的教宗;她称那些放弃他的枢机们为“愚蠢的人”和“撒谎者”,甚至说他们是“以人的形象出现的魔鬼”。与此同时,西班牙的重要忏悔讲道者和道明会会士Vincentius Ferrer(文森特·费瑞尔,参见150.2)似乎在这分裂的40年的时间都很热烈拥护了Avignon(阿维尼翁)教宗的事业。对他来说,罗马派的拥护者是“魔鬼所引诱的人”和“异端者”。但是,不仅仅宗座的名声遭受影响,对于罗马主教首席权的必然性的信仰也动摇了。一些人提出可疑的观点,比如他们区分“普遍的大公教会”(唯独它是不可错误的,确实拥有救恩的渠道),以及“罗马教会”(它也许会走错路,可能有异端因素,甚至有一天会终止)。巴黎大学的著名老师和校长Nicolaus de Clemanges(尼苛劳/尼哥拉,约于1437年去世)曾经说(参见他1415年向Constantia会议写的Epistula 112): in sola potest muliercula per gratiam manere Ecclesia“通过恩惠(真正的)教会也能够在一个不忠实的妇女中存在”(指罗马教会;William de Occam 奥康也曾经提出了类似的说法)。在英国,Wycliffe(威克里夫)的异端性运动早在分裂的开始就怀疑了宗座的必要性和有形的教会(参见147)。两个教廷的开支、两个教宗的政治行动以及他们在意大利的战争又需要很多钱,这就更加重了基督徒的税务压力(参见140.1)。另外,关于教宗地位的争论延伸到各地的教区,因为两个教宗都想提名一些拥护他们的人,这样加强自己的影响力。结果是纪律的放松和腐败。甚至一些修会团体也分裂为两派,比如Cistercienses(熙笃会)、Carthusiani(加尔都会)、Franciscani(方济各会)、Dominicani(道明会)和Carmelitae(加尔默罗会,参见151.1)。教会的权威性被削弱的同时,国度对教会事务的影响却逐渐增加,因为教宗们想赢得各地国君的爱戴,所以他们向这些国君让步。

141.3 不久后人们开始想方设法解决这种无法忍受的情况。首先,神学家们提出了一些看法,而在这方面,巴黎大学——在当时算为“第三个超级力量”(参见134.2)——具有领导地位。在分裂的开始,两位德国的巴黎大学教授Henricus(=Heinrich) de Langenstein(亨利·半根斯泰恩,副校长,见其*Epistula pacis*《和平之信》,1379年,和*Epistula concilii pacis*《和平大会信》,1381年)以及Conradus de

Gelnhausen(康拉德·格恩好森, 见其 *Epistula brevis*《短信》, 1379 年, 和 *Epistula concordiae*《和睦之信》, 1380 年) 建议, 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古代教会的王道”, 就是召开一个普世性的主教会议, 这个会议应该超过教宗的权威, 应该是一个不可错误的会议。巴黎大学也支持他们这种说法(1381 年)。这种观点就是所谓的 **konziliare Theorie**(大公会议理论), 它此后长期统治人们的思想并在一些庞大的教会聚会中被实现。影响了这种思想的因素是 Aristoteles(亚里士多德)和 Thomas(托马斯)对“人民主权”(Volkssouveraenitaet)的看法, 尤其是 Wilhelmus de Occam(奥康)和 Marsilius de Padua(马尔西留)那种“有民主精神的教会观”(参见 139.2)。根据这种思想, 教会的权力充分地处于信徒的民众, 而不处于一个单独的领导人身上。这种看法很严格违背着当时有效的教会法律, 因为它将会取消教宗的司法权。巴黎大学的教授在提出他们观点时说, 这种理论仅仅是一种“权宜措施”(Epikeia, 例外), 只是为了解决教会的分裂。但另一个更激烈的人进一步追求教会制度的改变, 使“一个人的领导”成为“宪法的领导”。这就必然引起了很强硬的搏斗, 也不会令人感到奇怪。在开始的时候, 那些教授的建议还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 因为当时的人还没有感觉到这种分裂的痛苦。在后来的时期他们认真地想解决问题, 因为在几年后, 这种分裂确实越演变情况越恶劣。

引起重大困惑的是 Urbanus VI(乌尔巴努斯六世)针对 Neapolis(那不勒斯)的 Johanna I(约翰纳一世, 1343 - 1382 年)女王的战争。教宗绝罚她并弹劾她, 又将那不勒斯的王权交给她的表哥 Carolus de Durazzo(查理, 1381 年), 他属于 Anjou(安茹)王朝的匈牙利分支。女王 Johanna(约翰纳)没有儿子, 所以她——在 Clemens VII(克雷孟七世)的同意下——接受了法国国王 Carolus V(查理五世)的弟兄 Ludovicus de Anjou(安茹的路易)为自己的儿子(1380 年)。据说, 这个女王甚至试图派人去毒害 Urbanus(乌尔巴努斯)教宗(1381 年)。Carolus de Durazzo(查理)抢夺了 Neapolis(那不勒斯)的政权并叫人在监狱中勒死 Johanna(约翰纳)女王。法国来的 Ludovicus(路易)率领的军队在意大利南部似乎全军覆灭。不久后, Urbanus(乌尔巴努斯)教宗又和 Carolus(查理)不和睦, 绝罚他并弹劾他。六位枢机(好像是在 Carolus 查理的首肯下)决定要逮捕那位顽固的、似乎陷入病态或精神不正常的教宗, 他们要为他找一个监护人(1385 年)。然而, 枢机们的阴谋被揭露, 他们被逮捕、受虐待, 而其中有 5 个人被处以死刑。他这种残酷的严格态度损坏了 Urbanus(乌尔巴努斯)的名声, 所以当他在 1389 年 10 月去世时很多人感觉到如释

重担。

在 Avignon(阿维尼翁)的人希望,枢机们现在会承认 Clemens VII(克雷孟/革利免七世),但早在两个星期后,罗马的枢机们选定 Bonifatius IX(博尼法奇乌斯九世,1389 - 1404 年)为教宗。他是一个出生在 Neapolis(那不勒斯)的人,并且承认 Carolus de Durazzo(查理)的儿子和继承人 Ladislaus(拉迪斯劳,1386 - 1414 年)为 Neapolis(那不勒斯)的国王(1390 年),又很有力地支持他,所以他能够克服 Ludovicus II de Anjou(路易二世,即去世的 Ludovicus I 的儿子)。这位教宗也有“重用亲戚”的倾向,但更令人感觉到不满意的是他再一次提高了教会的税收(参见 *Annatae Bonifatianae*, 140. 1)。他利用“大赦”来增加他的收入(参见 152. 2),也是引起怨恨的事。大概在 Bonifatius IX(博尼法奇乌斯九世)的任期内,罗马教会开始另一个可疑的习惯,就是将部分的教廷职位卖给人。这位教宗不太重视教会合一的问题;他意识到,自己的立场本来是比较有理的,所以他根本不想让步。巴黎大学当时又一次激烈讨论这个迫切的问题。大学于 1394 年 6 月向法国国王建议了三个解决问题的方案:1)两个教宗的退位(所谓的 *via concessionis* 让步之路),以及双方的枢机团共同选定一个新的教宗;2)让一个裁判团作出决定(*via compromissi* 调节决定之路);3)让一个大公会议作决定(*via concilii* 大公会议的道路)。

在 Clemens VII(克雷孟/革利免七世)去世后,Avignon(阿维尼翁)有很多人说最好不要再选一个教宗,但仍然有一位西班牙的枢机, Petrus de Luna(伯多禄/彼得)被选为 Benedictus XIII(本笃/本尼狄克十三世,1394 - 1417 年或 1423 年)。他是一个强硬的人,有精力和才华,道德生活良好,是教会法学的杰出专家和老师。Clemens VII(克雷孟七世)曾经使他几次当使者。他也很重视教会合一的问题,并当他和其他的枢机们开始选教宗时,他也发誓说将来要努力推动教会的合一,如果多数枢机有这样的要求,他会为了合一的缘故退位。由于这个诺言,法国政府、巴黎大学和法国的教廷不久后开始进行热烈的对话。但是, Benedictus(本笃/本尼狄克)现在不愿意再提到“退位”的事;他很有信心地强调自己地位的尊严。后来,法国、西班牙的 Navarra(纳瓦拉)和 Castilia(卡斯蒂里亚)都于 1398 年收回对于他的服从(所谓的 *via subtractionis*“收回之路”)。除了 5 个枢机以外,其他的枢机都放弃了他;法国的军队在 Avignon(阿维尼翁)的宫殿堡垒围攻他,后来逮捕他四年之久(1399 年 - 1403 年),但这一切都不能使他服从。法国和西班牙各国收回对于他的服从,但这又导致一些混乱现象,尤其是在任职制度方面,所以教会和世俗社

会的领导者于1403年5月在巴黎举行了一个很大的会议,其中决定要再次肯定Benedictus(本笃/本尼狄克)的地位。在此之前,他能够从他在Avignon(阿维尼翁)的监狱中逃跑。现在他的立场比较灵活,并于1404年派遣使者到罗马,他建议两个教宗要在一个安全的地方面对面谈论教会的合一(所谓的*via conventionis seu discussionis*“合约或会谈的道路”)。如果他们无法达成共识,要接受一个裁判团的决定。然而,罗马拒绝这个建议(提出这个建议的人大概也没有十分诚恳的态度)。再加上,Bonifatius IX(博尼法奇乌斯九世)几天后去世,而他的继承人是Innocens VII(依诺森八世,1404-1406年)。这个教宗(类似于Benedictus XIII本笃)与其他的枢机们一起发誓说,将来要采取一切行动为了结束教会分裂,如果有需要,自己也要退位。然而,在罗马暴发的混乱使一切其他的问题变得不重要。情况非常无奈,尤其因为在德国那个迷恋打猎与喝酒的Wenceslaus(文策老)王在1400年被弹劾,而一位选帝侯——Ruprecht von der Pfalz(儒普瑞克特,1400-1410年)——被提名为德国国王。Bonifatius IX(博尼法奇乌斯九世)于1403年承认他为罗马人的王,这就意味着除了教会的分裂还有一个政治上的分裂。

值得提到的是Wenceslaus(文策老)与Praga(布拉格)的总主教Johannes de Jenenstein(约翰内斯)的争论,因为这个冲突导致教区副主教Johan de Pomuk(=Nepomuk)(约翰内斯)的殉道。这个急性的统治者下令在Praga(布拉格)逮捕那位杰出的牧灵者(Johan Nepomuk),使他遭受残酷的酷刑,将他投到Moldava(摩尔达瓦河),使他淹死(1393年3月20日)。民众因这种大逆不道感到愤恨。贵族们逮捕了Wenceslaus(文策老)王一段时间(1394年5月到8月)。这位Johannes Nepomuk(约翰内斯)于1729年被列为教会的圣人/圣徒。关于他死刑的原因没有很多资料。根据最早的史料,他保卫了教会的权利,而国王想在波希米亚建立一个新的教区。只有在后来的文献中(Thomas Ebendorfer, 1449年)出现另一个问题:国王强迫这个圣人交出女王告解秘密的事。

141.4 这个教会分裂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所以人们都想结束它。在罗马当选的新教宗是Gregorius XII(额我略/贵格利十二世,1406-1415年),一位很有学问的老年人(原名是Angelo Corrario枢机,他来自Venetia威尼斯的贵族家庭)。他在当选之前要作出更严格的许诺,必须表示将要追求教会合一的愿望。当选后,他也马上与Benedictus XIII(本笃/本尼狄克十三世)联系并为那个重要的合一事业表示热忱。Benedictus XIII(本笃十三世)几个月以来居住在Marseille(马赛),而1407

年4月的“马赛条约”规定,两个教宗在1407年9月底将要在Genua(热那亚)以西的Savona(萨沃纳,意大利和法国交界地区)会谈,并要谈论两个人共同退位的事。很多地方的人已经怀着希望说,这个分裂将会结束,但他们的条约没有被实现,因为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原有的兴奋情绪突然变了,变成相反的态度。一些贪钱的亲戚以及Neapolis(那不勒斯)的Ladislaus(拉迪斯劳)王影响了他——这个国王认为教会的合一会对他造成危险。因此, 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仅仅走到Lucca(卢卡)。虽然Benedictus XIII(本笃/本尼狄克)不仅仅走到Savona(萨沃纳),而且一直走到La Spezia(拉斯佩齐亚)附近的Porto Venere(波托·维纳瑞),但他也不愿意继续走。因此,教会的合一再次成为一个无法实现的事。但是,那时又发生了一件影响十分不好的事情。大部分的罗马枢机对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教宗怀有反感,因为他没有兑现他的诺言,而且因为他提名了四位新的主教(其中有他的两个亲戚)——这也违背他当选前的诺言。因此,大部分的枢机们宣布他们不再支持教宗。在同样的时期(1408年5月),法国再一次离开了Benedictus XIII(本笃/本尼狄克),法国国王宣布“中立”以及“坚持高卢教会的自由权利”(参见140.3)。现在13个来自意大利和法国枢机团的枢机在1408年6月在Livorno(里沃诺)聚集开会并决定在1409年3月25日将要在意大利的Pisa(比萨)召开一个大公会议,在会议上要谈论教会的和平方案。枢机们也愿意让两个教宗参与这个会议,但他们各自召开了自己的会,Benedictus(本笃/本尼狄克)在Pyrenaeus(比利牛斯山)脚下的Perpignan(佩皮南,1408年/1409年),而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在Friaul(傅瑞奥尔)的Cividale(齐维达尔,1409年)。两个教宗的会议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参与的人少。反过来,从各地有很多主教来参与Pisa(比萨)的大会议(从1409年3月到7月):24位枢机主教,众多主教,很多神学博士和教会法学博士以及似乎所有的西欧国家的代表们都参与了这次大会议(那位被迫退位的德国国王Wenceslaus文策老的一位代表也参加)。在这个会议上,多数的人支持“会议理论”(conciliarism)。几年以来,巴黎大学的三个伟大校长和神学家都传播了这种理论:Petrus d' Ailly(阿伊,1420年去世),Johannes Gerson(杰尔松,1429年去世),Nicolaus de Clemanges(克勒曼,1437年去世);因此,“会议理论”似乎已成为普遍被接受的观点。(实际上,这三个巴黎校长只有d' Ailly阿伊参与了Pisa比萨的会议。)这个会议实现了会议理论:会议宣布,它的召开符合教规并是一个普遍的大会议——虽然这违背了传统的秩序。会议的人也不顾及Ruprecht(儒普瑞

克特)王的代表的抗议。会议宣布(1409年6月5日)两个被邀请的但没有来到的教宗都是“公认的分裂者和异端者”,因为他们违背了一个信条(“唯一的教会”)并且发过虚誓。他们规定,该会议必须完成教会“在头部和肢体”(in capite et membris)的改革,才可以解散。他们重新开始选教宗并于1409年6月26日宣布米兰的总主教 Petrus Philargi 为教宗,他本来是一个来自 Candia(堪迪亚)的希腊人,取名为 Alexander V(亚历山大五世,1409-1410年)。他以前在巴黎大学当过一个很有威望的教授(参见 145.4a)。当然,教会改革的巨大任务不能这样快就完成。因为很多主教离开了会议,他们决定三年后再要举行一个主教会议,而在这三年内,人们必须在一些教区的会议上或修会会议上讨论那些最迫切的问题。

142

1414 - 1418 年 Constantia(康斯坦茨)的大会议

历代教宗:在罗马:Gregorius XII(额我略/贵格利十二世,1406-1415年); Martinus V(马尔提努斯五世,1417-1431年);在阿维尼翁:Benedictus XIII(本笃/本尼狄克十三世,1394-1423年);Clemens VIII(克雷孟/革利免八世,1423-1429年);Benedictus XIV(本笃/本尼狄克十四世,1423年);在比萨:Johannes XXIII(约翰内斯二十三世,1410-1415年)。

142.1 虽然 Pisa(比萨)的大会议拥立了一位新教宗,即 Alexander V(亚历山大五世),但这个举动并不能结束当时的混乱局面。教会依然没有获得统一,反而从“可诅咒的两面分裂”走向一种“可诅咒的三面分裂”,因为其他的教宗们,无论是 Avignon(阿维尼翁)的或罗马的教宗,都不愿意接受会议的规定。虽然 Alexander V(亚历山大五世)此后居住在 Bolonia(博洛尼亚),而大部分的基督徒(比如法国、英国和大部分的德国主教)承认他是不正规的教宗,但德国的国王 Ruprecht(儒普瑞克特)和 Neapolis(那不勒斯)的 Ladislaus(拉迪斯劳)王以及意大利中部大部分的领导者都忠于 Gregorius XII(额我略/贵格利十二世)。在西班牙地区和苏格兰, Benedictus XIII(本笃/本尼狄克十三世)能够继续维持他的影响。Alexander V(亚历山大五世)教宗不久后去世,但这种悲哀的状态没有结束,因为拥护 Pisa(比萨)教宗的地区获得在一个新的教宗,就是 Balthasar Cossa(克萨)枢机,他取名

Johannes XXIII(约翰内斯二十三世,1410 - 1415 年)。他具有杰出的能力,但他的思想完全是属于世俗世界的,他有虚荣心,不怕施用武力,很贪婪,更多是一个军事家和政治家,他忽略了牧灵工作。他对教会改革没有兴趣,所以他 1412/1413 年在罗马召开的主教会会议(所谓的“猫头鹰会议”)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成就。很多人要求举行一个很大的合一会议,比如那位罗马教廷员工和教会大分裂的历史学家 Dietrich de Niem(迪特瑞克,他来自 Westphalia 的 Nieheim),他于 1410 年发表了一篇彻底地合一与改革文章(*De modo uniendi ac reformandi ecclesiam in concilio universali*《论大公会议如何能统一与改革教会》)。他受了 Occam(奥康)和 Marsilius(马尔西留)的影响,认为一个大公会议的权威比教宗更高,又要求罗马皇帝——他是基督宗教第一个君主,又是教会的保护者——召开一个大公会议并用武力强迫那些彼此有冲突的教宗们。在 Ruprecht(儒普瑞克特)去世后, Sigmund de Luxemburg(卢森堡的西格蒙德,1410 - 1437 年)——他是匈牙利之王,也是 Wenceslaus(文策老)的弟兄——也真愿意改善教会的困境。当时的压力也确实非常大:法国的国王 Carolus VI(查理六世,1380 - 1422 年)于 1392 年发疯了,精神不正常,所以法国处于种种派别混战的状态,同时又有与英国的百年战争,在 Bohemia(波希米亚)地区的教宗革命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参见 148.1,2),而在 Balkan(巴尔干)半岛的土耳其人征服了部分的地区,他们威胁了匈牙利,于 1396 年在保加利亚的 Nicopolis(尼克波里斯)打败了 Sigmund(西格蒙德)王。最严重的灾难当然是教会的分裂。Sigmund(西格蒙德)王想克服教会分裂,所以他很热心地,又很圆通地推动有关的人士在德国地区举行一个大公会议。因为 Johannes XXIII(约翰内斯二十三世)遭受了 Neapolis(那不勒斯)的 Ladislaus(拉迪斯劳)王的压力,于 1413 年被迫离开罗马,所以他必须接受德国国王的支持,也不得不同意他的要求。教宗于 1413 年底在伦巴第地区的 Lodi(罗迪)与皇帝会谈并同意要在 1414 年 11 月 1 日在德国南部的 Constantia(康斯坦茨)召开一个大规模的主教会会议。

142.2 的确,1414 - 1418 年在 Constantia(康斯坦茨)召开的会议——第 16 次大公会议——在整个教会历史上是最杰出的主教会议之一,它等于是整个基督宗教欧洲世界的大会议,参与的人包括教会的领导和世俗领导。除了教会的长上(29 名枢机、3 名宗主教、33 名总主教、300 多名主教和隐修院院长)以外还有许多下层圣职人员和平信徒参加,其中包括很多德国君主和公爵,尤其是 Sigmund(西格蒙德)皇帝(自从 1414 年圣诞节以来)以及外国的使者——很多民族的代表在

Constantia(康斯坦茨)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国际会议。教宗 Johannes XXIII(约翰内斯二十三世)早在 10 月底与很多意大利随从来到 Constantia(康斯坦茨)。该会议的大会都在城市的大教堂中举行。会议需要处理三个大问题:1)结束教会的分裂(*causa unionis* 合一问题);2)抵抗 Wycliffe(威克里夫)和 Hus(胡斯)的主张并保护正确的信仰(*causa fidei* 信仰问题);3)教会的改革(*causa reformationis* 改革问题)。然而,他们能够真正解决的问题仅仅是第一个难题。

教宗 Johannes(约翰内斯)来到 Constantia(康斯坦茨),因为他希望这个会议将会确认和肯定他的尊严;他也确实接受了一个被承认的教宗的待遇。然而,不久后这个会议提出这样的要求:三个教宗们应该接受同等的待遇,三个教宗都应该退位,包括 Johannes(约翰内斯)在内。会议上的意大利人比较多,而为了改变这种偏向,会议于 1415 年 2 月 7 日宣布,投票的秩序要改变:不再要根据人数算,而是要根据 *nationes*(民族)算——这符合当时的大学投票制度——就是说将来要根据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英国(1416 年后加上西班牙)这四(五)个民族来投票。那些枢机们首先必须在自己的“民族”中说明自己的立场;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枢机们是 Peter d' Ailly(阿伊)、Wilhelmus Fillastre(费亚斯特)、Francesco Zabarella(撒巴瑞拉)。在各民族的讨论中,不仅那些教会长上,而且各大堂圣职团、大学的代表、神学博士、教会法学博士以及各君主的代表都有投票权。因此,这个会议获得一种很显然的民主因素,对谈判的进展也具有重要的影响。Pisa(比萨)教宗的地位很快就被削弱了。一些人提交了一篇很全面地控诉 Johannes(约翰内斯)的告状,一些人也说,在他辞职后,他不再被选为教宗。在这样的情况下,Johannes(约翰内斯)采取一种无希望的措施:他在 1415 年 3 月 20 日晚上悄悄地从 Constantia(康斯坦茨)逃走;支持他的人是 Austria(奥地利)的公爵 Fredericus(腓特烈),他在那天举行一个比武竞赛为了分散人们的注意力。Johannes(约翰内斯)的目标是解散这个会议,而他的逃亡确实引起了很大的困惑和动荡。然而,一些人非常努力地继续这个会议,他们能够保持参与者的合一;这些人主要是 Sigmund(西格蒙德)皇帝,巴黎大学的校长 Johannes Gerson(杰尔松),Cambrai(康布雷)的主教 Peter d' Ailly(阿伊)枢机(参见 145.4a)。在这些人的领导下,会议在第 3 次和 5 次的大会中(1415 年 3 月 26 日和 4 月 6 日)通过一些规定来预防 Johannes(约翰内斯)的某些措施,而这些规定似乎称“会议理论”为教会的正式教导。他们宣布,该会议是在圣神/圣灵的精神内合法召开的大公会议,而这个会议代表整个大公教会;这个会议的权力

直接来自基督,而在信仰、教会合一及教会改革的问题上,任何人(包括教宗在内)必须服从会议的决定,否则他就要受惩罚。虽然 Johannes(约翰内斯)和另一些长上离开了会议,但会议并不因此而解散,而且继续保持它的合法性及权威性。在结束教会分裂及完成教会改革之前,该会议不能被解散,也不能被迁移到别处,除非会议的人同意这样做。

这些 *decreta Constantiae*(康斯坦茨的规定)意味着,大公会议的权威性凌驾于教宗之上——这就违背着教会的基本制度,也违背着中世纪的法律制度。如果说这些规定只是一种“紧急理论”,只是在这一个特殊的情况下有效,就可以从历史背景的角度作出比较容忍的评价。在当时的困惑和混乱的情况下,这些规定看来是唯一的出路,所以这个会议甚至 *pro hic et nunc*(为了此时此地)规定自己有统治宗座的权力。然而,一些比较激进的“会议理论”的代表人物后来认为,这些规定等于是一个可以针对任何时代和任何情况的教导,甚至要给这些规定一种“信理”的地位——这一点当然是一种灾难和严重困惑的泉源。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 *Constantia*(康斯坦茨)会议的规定,因为 10 位留在那里的枢机没有表达己意的机会,而他们大部分的人也反对这些规定。当时没有很多人马上强烈反对这些规定,这仅仅是出现当时的紧急情况。

142.3 然而, Johannes(约翰内斯)逃到 *Breisach am Rhein*(布瑞撒克),在那里他被捕,被押送到 *Constantia*(康斯坦茨)附近,而人们马上开始起诉他,最后审判了他。在第 12 次大会中(1415 年 5 月 29 日),他被宣布为辞职:“因为他想通过逃跑延续教会的分裂,由于他的圣职买卖以及因为他那种不良的生活方式。”他在德国 *Mannheim*(曼海姆)附近的一个堡垒中被关押四年,此后有人交出重大的赎金,他才被释放,成为 *Tusculum - Frascati*(图斯库卢姆 - 弗拉斯卡提)的枢机主教,但不久后(1419 年)去世。罗马的教宗 *Gregorius XII*(额我略/贵格利十二世)——他已经 90 岁——通过他的使者在第 14 次大会(1415 年 7 月 4 日)中宣布他将要辞职;在此之前,他向大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们必须以他的名义再一次召开这个会议,而 *Constantia*(康斯坦茨)会议也确实这样做了,但这大概并不意味着大会承认自己原来的“不合法性”或因此就决定了那一个教宗是正当的教宗。不久后, *Gregorius*(额我略/贵格利)教宗也去世(1417 年 10 月),当时他是 *Porto*(波尔托)的枢机主教。现在只剩下了 *Benedictus XIII*(本笃/本尼狄克十三世)。 *Sigmund*(西格蒙德)皇帝亲自去在他的居住地(比利牛斯山脚下的 *Perpignan* 佩皮尼昂)会见他并劝他

下台。然而,这个顽固不化的老人非常坚定地拒绝了皇帝的要求。无论如何,西班牙各地的君主们在 Narbonne (纳博讷) 条约中 (1415 年 12 月) 同意放弃对 Benedictus XIII (本笃/本尼狄克十三世) 的拥护。从此以后,西班牙人在大公会议上形成了“第五个民族”。那位很有影响的西班牙讲道家 Vincentius Ferrer (菲雷, 参见 141. 2) 最终 (1416 年) 也放弃了他多年的支持者 (即 Benedictus 本笃)。Constantia (康斯坦茨) 大会指控他并在第 37 次大会中 (1417 年 7 月 26 日) 宣布,他是一个“不遵守誓言的、分裂的和异端的人”,因此被罢免。虽然如此,这位老人继续坚持自己的权力并在 Valencia (巴伦西亚) 附近的 Peniscola (佩尼斯克拉) 圣殿骑士团的堡垒 (称之为“Arca Noe 诺亚方舟”) 中维持他的统治,一直到他去世那一天 (1423 年 5 月 23 日)。

在 Benedictus (本笃/本尼狄克) 逝世后,这个教会分裂再一次被延长,因为他的枢机们又于 1423 年拥立某一个来自 Valencia (巴伦西亚) 的 Aegidius Munoz (穆诺斯) 为 Clemens VIII (克雷孟/革利免八世),甚至选择了第二个对立教宗 Benedictus XIV (本笃/本尼狄克十四世)。然而,后者没有任何影响,而支持 Clemens (克雷孟/革利免) 的人也很少。他于 1429 年退位。Aragon (阿拉贡) 的国王 Alphonsus V (阿方索五世) 仍然默认了这种教会内的反对力量,以此实现他自己的自私目标和政治目的。

在 Constantia (康斯坦茨) 召开的会议需要选择一个新的教宗,但在此之前发生一些长期的争论,因为德国人和 Sigmund (西格蒙德) 不无理由地要求,先应该讨论教会内部的改革 (关于第 39 次大会的改革文献,参见下文)。会议的气氛很激烈。最后德国人放弃了他们的要求,因为第 40 次大会 (1417 年 10 月 30 日) 宣布一个规定,其中说教宗有义务在散会之前与各民族的代表们一起完成教会的改革 (包括关于“教宗和罗马教廷 in capite et curia Romana”的改革)。同时,会议上的人都同意,选择新教宗的人除了 23 个枢机主教以外还应该包括 5 个“民族”的 6 个代表 (共 23 + 30 个代表)。枢机们和这些代表们在 Constantia (康斯坦茨) 的 Kaufhaus (商会院) 中举行会议,并于 1417 年 11 月 11 日异口同声地宣布 Odo Colonna (克罗纳) 枢机为 Martinus V (马尔提努斯五世) 教宗 (1417 - 1431 年)。这一个时刻为教会很重要,因为在他内教会又获得了一位普遍被承认的并且有尊严和权威性的元首,他从此指导了大公会议。

142.4 “教会合一”的问题得到相当顺利的解决,但另外两个问题没有获得良

好的处理。为了保持信仰的纯正性,会议审判了 Wycliffe(威克里夫)和 Hus(胡斯)的异端教导并烧死后者与他的朋友 Hieronymus de Praga(热罗尼莫/哲罗姆,1415年和1416年),但这种行动在 Bohemia(波希米亚)引起了一个灾难性的后果(参见148)。参与会议的人中有一些人希望教会能妥善地面对改革的问题,而有的人高谈一些理想,但实际上这次会议没有很全面地处理改革问题。人们关于“改革”的内容和方法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很难达成共识,很多人的看法也非常模糊。不幸的是,只有少数几个教会长上愿意以身作则,愿意为了改革的缘故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除此之外,各民族的利益和政治利益之间的冲突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障碍。那个“改革委员会”的建议不够彻底,因此大会的规定更加没有突破性。很多参与者仅仅要限制宗座的权利和罗马教廷的税收,但他们不愿意推动教会的全面改革。只有在1417年这些问题被深入讨论,但遗憾的是, Martinus(马尔提努斯)教宗也并没有很热心地推动这种改革。

在1417年10月9日,会议在第39次大会中宣布五个普遍性的改革文献——各民族都在这些改革方面达成共识。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个法令(称 *Frequens*《多次》),根据这个文献,教会将来应该多次举行一些普遍的大公会议,下一个要在5年后,再下一个在7年后,此后每10年要有一个大公会议。其他的规定预防一个新的教会分裂,要求新当选的教宗要宣布信经,禁止“保留职位”的作法和“主教遗产归教廷”的作法(参见140.1)等。1418年3月21日第43次大会通过了其他的7份改革文献;这些文献仅仅收回分裂以来的“豁免规定”(exemptiones,1),回收一些不合法地被合并的教会职位(2),要求教宗放弃收空位教产的利润(3),禁止和惩罚“圣职买卖”(4),要求教产的所有者都必须被祝圣(司铎)或至少有“小品”,并收回这方面的豁免(5),限制教廷什一税的权利和取消其他教会领导收什一税的权利(6),恢复关于圣职人员服装和发型(发圈 tonsura)的规定,并禁止他们穿世俗化的衣服(7)。

教宗 Martinus V(马尔提努斯五世)又在1418年4月到7月之间和那三个“民族”(nationes)——即德国民族,罗曼民族(包括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英国民族——签订了一系列改革规定,这些条约首次被称为 concordata(政教协定)。其内容主要是枢机团的组织、教宗的任职权和收税权、圣职买卖、绝罚和大赦(其数字受限制)。这些协定的种种规定是不足够的,并且有效期只是5年(除了与英国签的协定外)。

在 1418 年 4 月 22 日,教宗 Martinus(马尔提努斯)在第 45 次大会中隆重地宣布结束 Constantia(康斯坦茨)的大会议。他没有正式肯定这个主教会议的整体或关于信仰问题所讨论的内容。然而,他的接班人 Eugenius IV(尤金尼乌斯四世)于 1446 年宣布,他承认和尊敬 Constantia(康斯坦茨)的大主教会议,如果其中所作的规定不损害罗马宗座的权利、尊严和首席权。

143

1431 - 1437 年 Basileia(巴塞尔)的改革主教会议。教宗与会议的搏斗

历代教宗: Martinus V(马尔提努斯五世,1417 - 1431 年); Clemens VIII(克雷孟/革利免,对立教宗,1423 - 1429 年); Benedictus XIV(本笃/本尼狄克十四世,对立教宗,1423 年); Eugenius IV(尤金尼乌斯四世,1431 - 1447 年)。

143.1 教宗 Martinus V(马尔提努斯五世)于 1420 年 9 月底才可以隆重地搬到罗马。他致力于恢复或至少提高罗马教廷的尊严和威望。他能够再次建立罗马和教会国的秩序,在这方面他确实有功劳,但在另一方面他过多使自己的家族(Colonna 科罗纳)得利,而且他推动的教会的改革也不能够彻底实现。他反对 Hus(胡斯)派在波希米亚引起的革命,但效果不大(参见 148.4)。Constantia(康斯坦茨)会议本来规定,5 年后还需要召开一个大公会议(参见 142.4),而教会的人普遍对这个会议怀着很大的希望,但教宗对将来应该召开的大公会议没有太大的兴趣;这是因为前几届主教会议似乎要贬低宗座的地位,而关于“大会理论”的持续宣传都使教宗很担心;教宗的忧虑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他于 1423 年 4 月 23 日在 Pavia(帕维亚)召开了一个主教会议,但由于一种鼠疫似的传染病于 6 月被迁移到 Siena(锡耶纳)。参与这次主教会议的人不多,它在 1424 年春天结束,但连一个改革文献都没有通过。参与者规定下次会议要在 1431 年在 Basileia(巴塞尔)举行。Martinus(马尔提努斯)教宗还提名那位很能干的 Cesarini(切撒瑞尼)枢机为该会议的主席,但指导后来的发展的人就是他的接班人,即是来自 Venetia(威尼斯)的 Gabriele Condulmer(孔都梅尔)枢机,即 Eugenius IV(尤金尼乌斯四世,1431 - 1447 年)——他是一位道德纪律严格的、热心的人,但在世俗的事务方面他没有很多经验(原来他是一位奥古斯丁隐修会会士)。在 Basileia(巴塞尔)召开的主教会

议——这是第 17 次的大公会议——的前景从一开始就非常不好。它原来要于 1431 年 3 月开幕,但延迟到 7 月才开始,参与者也不多。参加会议的人向罗马写了一些夸大的报告,其中叙述 Basileia(巴塞尔)城和周围地区的危险情况,又写了一些怀疑该会议的观点,再加上, Martinus V(马尔提努斯五世)早于 1430 年计划和希腊人一起要在一个意大利城市举行一个“教会合一会议”。这一切因素导致 Eugenius(尤金尼乌斯)教宗过于仓促决定:他通过 1431 年 12 月 18 日的诏书解散了该会议并规定于 1433 年夏天将要在 Bolonia(博洛尼亚)召开下次会议。然而,在 Basileia(巴塞尔)的人士于 1431 年 12 月 14 日举行了第一次隆重的大会,其中决定该会议的任务是三方面的:消除异端(Hus 胡斯的主张),在基督宗教国度中缔造和平,以及教会的改革。会议的参与者听到了罗马的命令,但他们不愿意在工作还没有开始之前就散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会议的主席 Cesarini(切撒瑞尼)枢机也同样请教宗收回他的“取缔命令”,否则会有教会分裂的危险。实际上,这个会议继续召开,而 Sigmund(西格蒙德)和其他的世俗领导支持它。Basileia(巴塞尔)的会议于 1432 年 2 月 14 日在第 2 次正式大会中宣布自己为大公会议并重新肯定 Constantia(康斯坦茨)会议关于会议对于教宗的优先权(参见 142.2),甚至说教宗和枢机们必须 3 个月以内到 Basileia(巴塞尔)来参与会议,否则要受审判。在 1432 年秋天,该会议为自己规定一些开会程序原则,而这些原则比 Constantia(康斯坦茨)会议的规定更民主。他们组织了 4 个 deputationes(委员会)来讨论各种问题,而在这些“委员会”中,很多下层圣职人员和隐修者——尤其是神学博士和法学博士们——获得了投票权。属于 Hus(胡斯)派的人于 1433 年出现在 Basileia(巴塞尔)会议(参见 148.5),而与他们的讨论有良好的进展——这一点大大地提高了会议的威望。Sigmund(西格蒙德)皇帝很热切地推动会议与教宗的和好过程,所以教宗最后还是承认了 Basileia(巴塞尔)会议。他在 1433 年的圣神/圣灵降临节(5 月 31 日)在罗马给 Sigmund(西格蒙德)举行加冕礼,正式宣布他为皇帝,并于 1433 年 12 月 15 日在 *Dudum sacrum*(《久已圣者》)诏书中接受了 Basileia(巴塞尔)会议的规定和要求。当时的教宗遭受的压力很大,因为 Milano(米兰)的公爵 Philippus Maria Visconti(维斯孔提)、Colonna(科罗纳)和 Savelli(撒维里)家族给教会国和罗马教廷很大的压力。

143.2 因此,罗马教廷与 Basileia(巴塞尔)会议的冲突至少在外表上被解决,而该会议在后几个月中通过好几个有用的改革文献,其中反对圣职人员的婚姻、反

对圣职买卖、反对轻易宣布 *interdictum* (禁罚)、反对在教堂或教堂院子中表演一些不合适的戏剧或世俗化的庆节。他们又限制了“绝罚”的法律后果,并要求礼拜(弥撒)和日课要相称地(隆重地)举行。然而,会议片面地规定要进行 *reformatio in capite* (教会头部的改革),因此创造新的冲突。他们规定要取消 *annatae* (年度税,参见 140.1)、*pallium* (总主教的披肩带)的经费、各种教廷办公费以及一切不包括在教会公法中的“保留规定”(reservations),要求教宗选举的重新组织以及限制枢机团的人数为 24 个人——这些规定在罗马教廷引起强烈的反感。最后,“合一大会”的问题导致了公开的分裂:大部分的会议人士希望,这个“东、西方教会合一会议”将会在 *Basileia* (巴塞尔)、*Avignon* (阿维尼翁)或 *Savoy* (萨伏伊,即意大利和法国交界)地区举行——法国人士显然想恢复“法国教宗”的现象,但少数的人宣布,这个会议应该在意大利地区举行(1437 年 5 月)。教宗 *Eugenius* (尤金尼乌斯)肯定后者的要求,但 *Basileia* (巴塞尔)的人因此要求教宗在法院中受审。当时,教宗通过 *Doctoris gentium* (《万民之博士》,1437 年 9 月 18 日)诏书规定这次大公会议必须迁移到意大利的 *Ferrara* (费拉拉),因为他已经和希腊的皇帝约定这个会议场所。在 *Basileia* (巴塞尔)会议上有一些人愿意接受教宗的规定,而参与会议的人进行了一些讨论,但部分的人不愿意服从,所以那些忠于教宗的人离开 *Basileia* (巴塞尔)去意大利继续召开“合一会议”,其中有会议的主席 *Cesarini* (切撒瑞尼)枢机和一位渊博的德国人文主义者 *Nicolaus Cusanus* (库萨的尼哥劳/尼哥拉,参见 145.4c),他是 *Confluenta* (*Koblenz* 科布伦茨)的圣职团团长,热心地支持会议理论和教会改革(参见他的 *De concordantia catholica*《论教会合一》,1433 年)。留在 *Basileia* (巴塞尔)的过激派(他们是多数的人)却继续开了他们的会议,但他们的结局并不光彩。

144

1438 - 1442 年 *Ferrara - Florentia* (费拉拉 - 佛罗伦萨)的合一主教会议。

教宗分裂与国家 - 教会协约

144.1 在 1438 年 1 月 8 日于意大利的 *Ferrara* (费拉拉)召开的大公主教会会议——当时参与的人并不很多——的目标是结合希腊教会和拉丁教会;它被视为

Basileia(巴塞尔)会议的正式“续会”,与 Basileia(巴塞尔)会议一起形成第 17 次大公会议。自从 1438 年 1 月底,教宗 Eugenius IV(尤金尼乌斯四世)亲自参与该会议。所讨论的问题首先是结束 Basileia(巴塞尔)会议的事以及准备东、西方教会的合一问题。在 1438 年 3 月有很多希腊教会的代表来到会议地点(大约 700 个代表),率领他们的是 Johannes VIII Palaeologus(约翰内斯八世,1425 - 1448 年)皇帝、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 Josephus(若瑟/约瑟夫斯)以及 Nicaea(尼西亚)的渊博 metropolita(总主教)Bessarion(贝萨里翁,参见 155.1),他是教会合一的热心推动者,1439 年被提升为枢机,在会议后还留在意大利。东方其他的宗主教都派遣了一些代表。代表俄罗斯教会的人士是 Kiovia(基夫)的 metropolita(总主教)Isidorus(伊西多尔),他充满热忱地、无私地推动教会的合一。实际上,会议上的谈判非常难。会议有几次似乎被解散。只有一个因素使希腊的代表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谈判桌去——他们非常害怕突厥人(土耳其人),因为他们已经征服了 Balkan(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现在威胁了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而希腊人相信,与西方人的和好也许是逃脱没落的最后救命方法。Johannes VIII(约翰内斯八世)皇帝对于这个会议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他要求希腊人不可以讨论教导方面的差异,而在开始的阶段,东方的主教们也听从皇帝的建议。后来,他们终于谈论信经中的 Filioque(“及由子”,圣神/圣灵从圣父“及圣子”共发,参见 49.3; 90.2; 93.2),但先谈论“在信经中加上一些文字”的权利。在 1439 年初,该会议被迁移到 Florentia(佛罗伦萨),因为该城市愿意给教宗提供一些经费——希腊人代表很多,所以需要很大的经费。在那里,希腊人终于面对教导方面的问题,而在很长的反抗后,他们所有的人都接受了西方教会关于“圣神/圣灵由圣父及圣子共发”的教导。只有一个激烈的反驳者和拉丁人的顽固对手没有接受这个信条,就是 Ephesus(厄弗所/以弗所)的总主教 Eugenicus(尤金尼库斯)。在这些谈判中特别有功劳的人是 Camaldolenses(卡马尔多里会)的总会长 Ambrosius Traversari(特拉维撒里),他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人们很快在其他有差异的观点方面达成共识:在 purgatorium(炼狱)方面,在 visio beatifica(荣福直观)的开始方面(“去世以后”还是“末日审判以后”),在感恩祭可不可以用“无酵饼”,在弥撒经文中的 epiclesis(祝圣祷词,参见第 1 卷,67.3),以及在罗马教会的首席权方面。希腊教会的代表们在那种“合一文献”*Laetentur coeli*(《高天欢乐吧》)上签名,而教宗于 1439 年 7 月 6 日正式宣布该文献。因此,该会议的主要任务被完成。这个会议的成就对于宗座威

望的巩固有相当大的帮助。

在希腊人离开了以后, Florentia(佛罗伦萨)的会议继续进行,这部分上是因为 Basileia(巴塞尔)的会议也继续召开,部分上是因为还需要解决另一些合一问题。在 1439 年 11 月 22 日,那些原来属于“基督一性论”(monophysitismus)的亚美尼亚教会人正式与罗马教会合一了(合一文献在信理学上是很重要的,名为 *Decretum pro Armenis*《给亚美尼亚人的法令》)。那些同样属于“基督一性论”的 Jacobiti(雅各伯教会)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于 1442 年 2 月与罗马教会合一。在 1442 年年底,教宗规定这个会议应该迁移到罗马的 Lateranus(拉特兰)。教宗自己于 1443 年 9 月回到罗马去(他原来因一些叛乱于 1434 年被迫离开罗马)。在“永恒之城”中,另一些教会团体签订了“合一文献”:叙利亚东部的雅各伯教会(就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教会)于 1444 年 9 月与罗马教会合一,部分的 Chaldaei(卡尔德教会,就是 Nestorius 奈斯多留/涅斯多略/聂斯托利派)和 Cyprus(塞浦路斯)海岛上的 Maroniti(马若尼特教会,即 monotheleti 基督一志论者)于 1445 年 8 月接受与罗马教会的合一。

144.2 同时,在 Basileia(巴塞尔)的会议却一步一步走上教会分裂的路线。参与这个会议的人主要是一些博士和下层圣职人员,大约 300 个人。他们的主席现在是 Arles(阿尔)的总主教 Ludovicus d' Aleman(路易,1450 年去世),他是唯一的继续支持 Basileia(巴塞尔)人的枢机,同时也是一个有虚荣心和 Eugenius IV(尤金尼乌斯四世)的顽强敌人。这个会议先控诉教宗,并于 1438 年 1 月宣布教宗被撤职,因此教宗绝罚了参与会议的人。在 Basileia(巴塞尔)的人的过激态度并没有获得很多支持者,因为基督徒们仍然记得了上次分裂的悲哀后果,所以似乎没有人支持一个新的分裂。一些国君,比如英国和 Castilia(卡斯蒂利亚)的国王直接反对那个会议。西欧的强大国度试图从中得利或至少愿意扮演一种中介者的角色。法国的 Carolus VII(查理七世,1422 - 1461 年)在 1438 年 5、6 月在 Bourges(布尔日)召开了一个法国圣职人员的大会议,而该会议接受了 23 个来自 Basileia(巴塞尔)的改革法令(只做一些轻微的改动),包括“大会理论”、限制教廷的“年度税”权和“保留圣职”权,以及禁止圣职人员向罗马的申诉等。这些规定在 1438 年 7 月 4 日被正式宣布为法国的法律,就是所谓的 *Pragmatica Sanctio de Bourges*(《布尔日的国事诏书》)。这些规定形成了 Gallicanismus(高卢主义)的主要基础,就是“法国政治控制法国教会”思想的基础,而这种倾向在后来的几百年中很有影响。法国人想

预防宗座的“侵扰”，所以他们还虚构编纂了一部据说是 Ludovicus IX Sanctus(路易九世)于1269年宣布的，内容类似的“国事诏书”。关于 Eugenius IV(尤金尼乌斯四世)与 Basilea(巴塞尔)的冲突，Bourges(布尔日)的主教们规定，他们将要为两方面的人效劳。

德国人于1438年3月在 Frankfurt(法兰克福)的帝国议会上选择奥地利的能干公爵 Albrecht(阿尔布瑞克特)——他是 Sigmund(西格蒙德)的女婿，因此继承了匈牙利和波希米亚——为德国国王，名为 Albrecht II(阿尔布瑞克特二世，1438 - 1439年)。在这个场合，从各地聚集的 Kurfuersten(选帝侯)宣布他们在教会内的冲突方面要保持中立。然而，他们也模仿了法国的先例，并于1439年3月在 Mainz(美因茨)的帝国议会上发表了所谓的 *Instrumentum acceptationis*(《接受文献》)，其中接受了很多 Basilea(巴塞尔)会议的文献，所以实际上放弃了他们的中立立场。

144.3 虽然很多人曾经愿意在双方之间寻找一种谈判的方式，但教宗和会议之间的冲突仍然没有被调节。Basilea(巴塞尔)人在1439年5月宣布说大公会议的权威凌驾于教宗之上，教宗既不能解散大公会议，也不能延迟它或迁移它，而且这等于是 *veritates fidei catholicae*(公教信仰的真理)。他们甚至很无礼地弹劾了教宗，说他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异端者和教会分裂者”，因为他反对这些真理(1439年6月)。因为他们想宣布他们的观点为教会的“信条”，教会绝罚他们，称他们为“异端人士”。此后，Basilea(巴塞尔)的人拥立一个对立教宗，于1439年11月5日选择了一个鳏夫，就是 Savoy(萨伏伊)的公爵 Amadeus VIII(阿马德乌斯八世)，他生活在 Genfersee(日内瓦湖)边的 Ripaille(瑞派)，在那里创立了一个骑士团(St. Mauritius 毛里策骑士团)并任这个团体的会长。这个人很有钱并与欧洲的贵族有很多亲戚关系，自称为 Felix V(菲理克斯五世，1439 - 1449年)，但只有 Savoy(萨伏伊)、瑞士和一些德国君主支持这个“教宗”。其他的地区越来越多转向 Eugenius(尤金尼乌斯)，比如法国马上支持罗马的 Eugenius(尤金尼乌斯)，Aragon(阿拉贡)和苏格兰于1443年也同样宣布支持他。当时，Aragon(阿拉贡)和 Sicilia(西西里)的国王是 Alphonsus V(阿方索)，他精力充沛，自从1420年当了自己无继承人的 Johanna II de Neapolis(约翰纳二世女王，1435年去世)的义子，并于1442年打败了他的对手 Rene de Anjou(安茹的勒内)——他也想当意大利南部的王——而教宗于1443年承认他为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合法国王。

德国人首先再次肯定了他们的中立性，他们试图进行谈判，但他们逐渐也转向

Eugenius(尤金尼乌斯)教宗。在这方面有贡献的人是教宗的使者 Nicolaus Cusanus(库萨的尼苛劳/尼哥拉,参见 143.2)和来自 Sarzana 的 Thomas Parentucelli(帕任图切利,即后来的 Nicolaus V 尼苛劳/尼哥拉五世教宗),以及皇帝的秘书,即来自 Siena(锡耶纳)的 Enea Silvio de Piccolomini(皮科罗米尼,即后来的 Pius II 比约二世)——他不久之前仍然是 Basileia(巴塞尔)派的人,甚至当过对立教宗 Felix(菲理克斯)的秘书。促使德国各地诸侯接受 Eugenius(尤金尼乌斯)的人是奥地利 Habsburg(哈布斯堡)王朝的 **Fredericus III**(腓特烈三世)皇帝(1440-1493年),他的政策在别的方面太松懈无为,但在这一点上,他具有一定的贡献。当他去 Basileia(巴塞尔)采访时(1442年11月),Felix V(菲理克斯)想把自己的女儿 Margareta(马加瑞塔)嫁给他,而她会带来很多的嫁妆,但皇帝拒绝了他。在 1445 年,Fredericus(腓特烈)逐渐接近 Eugenius(尤金尼乌斯)教宗,并最终承认他。教宗对皇帝许诺将来要给他举行加冕礼,在教会职位的提名权上向皇帝让步,又提供了一些经济利益。其他的德国君主逐渐跟随皇帝的榜样。虽然 1446 年 3 月在 Frankfurt(法兰克福)的帝国议会仍然一半反对一半支持教宗 Eugenius(尤金尼乌斯),因为他撤职了 Colonia(科隆)和 Trier(特里尔)的总主教——这是因为他们曾经支持 Basileia(巴塞尔)会议,但在下次的帝国议会上(1446 年 9 月),两个选帝侯(Mainz 美因茨和 Brandenburg 勃兰登堡的公爵)和两个主教宣布他们支持 Eugenius(尤金尼乌斯)——这是 Enea Silvio Piccolomini(皮科罗米尼)的圆通外交技巧的效果。德国的君主们派遣一些使者到罗马,而在长期的谈判后,他们与教会签订了一个“暂且的条约”,称为 *Concordata principum*(《君主们的协定》),其内容结果表现在 Eugenius(尤金尼乌斯)教宗的 4 部诏书(1447 年 2 月 5 日和 7 日)中。这些诏书的主要内容是:将来要在德国地区举行一个新的大公会议,两个被撤职的德国主教的地位被恢复,Basileia(巴塞尔)会议的改革文献根据 *Instrumentum acceptationis*(《接受文献》,即 1439 年帝国议会的文献)被接受,而在“中立时期”中在德国进行的教会法案和教产的分配都有效。此后,德国的使者以他们各自主人的名义向那位已经患重病的教宗宣发服从的誓词。教宗 Eugenius(尤金尼乌斯)在一个秘密的保留文献(称为 *Salvatorium*《拯救(灵魂的)文献》)中声明,如果这种种让步和规定违背传统的教导或侵犯罗马宗座的权利和权威,他要收回它们。不久后,他去世了(1447 年 2 月 23 日)。

144.4 他的接班人 **Nicolaus V**(尼苛劳/尼哥拉五世,1447-1455 年)还得继续

完成这个艰难的工程,需要消除教会分裂的痕迹。他先前是充当教宗的使者,现在以教宗的身份表示同样的智慧和节制,所以获得了良好的成就。在1447年7月在Aschaffenburg(阿沙芬堡)的帝国议会上,人们进行一些准备性的谈判,而根据这些谈判,Fredericus III(腓特烈三世)皇帝于1448年2月17日签订了 *Concordatum Vindobonense* (《维也纳政教协定》),这是一个重要的文献,首先只是皇帝“以全德国的名义”(pro natione Alamannica“替德国民族”)签订的,但德国各地的君主们逐渐都接受了它。这个协定基本上肯定Constantia(康斯坦茨)1418年的政教协定关于教宗任职权的种种规定(参见142.4),但在另一方面教廷因为接受了Basileia(巴塞尔)法令受了一定的损失,而因此本协定为教廷提供一定的弥补。这个《维也纳政教协定》的有效性一直到1803年的“大世俗化”运动。

这部 *Concordatum Vindobonense* (《维也纳政教协定》)的具体规定是这些:1)如果一个主教(或其他教会长上)在罗马或在罗马附近去世(in curia 或 apud sedem apostolicam),这个职位的任命权“保留”(reservatio,参见140.2)给宗座。2)各教区主教和隐修院院长的任命属于本地教会的选举,当然这些选举要符合教规,而选举结果必须向罗马宗座报告,罗马宗座得批准它(参见110.2e)。但如果某一个地区的选举没有被及时报告,或某一个教区的选举不符合教规,或如果某个有效的选举由于明显的理由和枢机团的建议被怀疑——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宗可以任命一个更好的候选人当主教或院长(所谓的 provisio“照顾”)。3)教宗任命那些在单数月(1月,3月,5月)落入空位状态的大堂职位和圣职团职位,除非是比较高的职位(但在Nicolaus V尼苛劳五世的“肯定诏书”中,这些“高级职位”也包括在内,而实际上的作法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教宗任命所有的圣职)。4)教廷只从那些处于空位状态的主教堂和男隐修院收一种 servitium(服务税,最多一年一次,参见110.2f),但不再收原来的 fructus primi anni(= annata,年度税)。然而,从那些罗马教廷所分配的教会职位那里(如果超过24个金币),教廷还继续收 annata(年度税)或 medii fructus(即第一年收入的一半),这根据一贯的作法。

在德国和罗马宗座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和异化的状态,而 *Concordatum Vindobonense* (《维也纳政教协定》)结束了这种危险的张力。然而,它也无法很全面地弥补教会遭受的损失,也不能充分地回应德国人的要求,因为该协定没有提到真正的改革。不久后,某些论点也引起了争论。比如,德国的圣职人员对于教宗的任职权的规定以及那种“引起憎恨的年税”的恢复怀着反感。因为德国在政治上四

分五裂,并且皇帝的权利也被削弱,所以无法达到更高的水平。然而,对于 Basileia(巴塞尔)的“小型会议”来说,这个协定等于是致命的冲击。它几年以来仅仅有一种“影子式的”存在,自从 1443 年以后再没有召开过正式的会议。Fredericus(腓特烈)皇帝于 1448 年命令要从帝国城市 Basileia(巴塞尔)驱逐这个会议人士,所以他们搬到属于 Felix V(菲理克斯五世)地区的 Lausanne(洛桑)城(1448 年 6 月)。在 1449 年 4 月,这位对立教宗主动地退位(他于 1451 年去世)。他也是历史上最后一个“对立教宗”。此后,这个主教会议——为了至少在表面上保持自己的权威性——举行选举并拥立一个教宗:“被称为 Nicolaus V(尼苛劳五世)的 Thomas de Sarzana”(这就是 1447 年在罗马正式当教宗的人)。此后他们宣布该会议解散。

144.5 这种发展意味着,conciliarismus(会议主义)为教会组织制度带来的严重危险基本上被克服了,而罗马宗座的权威性再一次获得了巩固。然而,罗马宗座在名声和影响力受到了一些损失,因为在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地区,“国度办教会”的倾向(Nationalkirchliche Stroemung)已经越来越强大,而在德国有类似的倾向。为了赢得德国地区各个君主的支持,罗马教廷需要与他们进行特殊的谈判,其中作出一些超过《维也纳政教协定》的让步,这样为各地君主对当地教会的权力提供一些基础(参见 158.3)。人们在感觉上尚未感到满意;相反,人们相当普遍地对教会的情况感到不满。在当时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问题:罗马教廷是否能够自己认同改革的呼吁,是否能够认出问题所在并通过一些持续有效的措施解决这些困难。如果罗马教宗不能解决这个任务,当时的危机必然会走向恶化并成为巨大的难题。

第二章 教会的神学和宗教生活

145

哲学和神学。经院思想的衰退。对《圣经》的研究

145.1 西欧 14、15 世纪的学术生活仍然非常活跃。仅仅从许多新大学的创立便可以看出这一点。德国的大学现在才被建立：首先是 Praga（布拉格）大学，由 Carolus IV（查理四世）皇帝于 1348 年创立。Carolus（查理）的女婿，奥地利的公爵 Rudolphus IV（鲁道夫四世）于 1365 年创立 Vindobona（Vienna 维也纳）大学；Carolus（查理）的朋友，Ruprecht I von der Pfalz（儒波瑞克特）于 1368 年创立了 Heidelberg（海德尔堡）大学，接着有 Colonia（科隆）大学（1388 年），Erfurt（爱尔福特）大学（1392 年），而在 1400 年后创办的大学包括 Wuerzburg（维尔茨堡）、Leipzig（莱比锡）、Freiburg（弗莱堡）、Basel（巴塞尔）、Tuebingen（蒂宾根）、Mainz（美因茨）等等。在 1517 年前，在德国地区就有 16 所大学。在德国的精神生活中，这些大学都有领导地位。人们似乎都努力追求知识，但在科学知识的进步方面，情况没有太理想。虽然当时也出现了很多具有才华的和认真工作的学者，也有一些人开始进行独立的研究，这样为思想界带来新的充满创造力的因素，但从整个来看，经院哲学的创造力已经开始衰弱、衰退。因为很多人没有独立的创见，他们仅仅传下“名师”的教导顽固地保卫这些大师的观点。他们忽略了对教父著作和对《圣经》的研究，同时太强调逻辑学和辩解方法。很多人仅仅钻牛角尖，在一些没有创造力的问题上浪费很大的精神。同时，他们的语言水平也逐渐下降，表达方式越来越放松。由于“唯名论”的复兴，整个 14、15 世纪的神学都面对了一个严重的危机。当时的 Humanismus（人文主义）是一个充满青春精力的运动，它用一种尖锐的、甚至多次充满憎恨的批评来谴责晚期的经院思想——晚期的经院思想是一个比较僵化的体

系。人文主义运动改变了欧洲人对知识追求的方向,这样一步一步地使欧洲的教育离开教会的影响力。

145.2 在高峰经院思想和晚期经院思想的分水岭时期中出现了一位天才式的方济各会会士, Johannes **Duns Scotus**(邓斯·司各脱),他有了很多学生和追随者,这样成为方济各会第二个(“年轻的”)思想派的创立者,这个学派也被称为 Scotistae(“司各脱派”)。这个学者 1265 年或 1266 年生于苏格兰南部的 Littledean(小丁),其父亲是 Ninian Duns(尼尼安·邓斯);他于 1279 年加入方济各会,曾经在巴黎、牛津和剑桥大学学习和任教,成为一个著名的老师,最后(1307 年后)在自己修会的大学在 Colonia(科隆)任教,1308 年 11 月 8 日去世。方济各会的人尊敬他为“真福”。他的寿命不很长,但他写了很多著作,十分令人感到敬佩(著有 *Opus Oxoniense = Ordinatio*《牛津文献》,即对 Petrus Lombardus 的命题的解释, *Reportata Parisiensia*《巴黎文献》, *Quaestiones quodlibetales*《各种问题》, *Quaestiones in Metaphysicam*《形而上学诸问题》,他的著作部分上没有很好的保存)。这位 Duns Scotus(邓斯·司各脱)的思想非常敏锐,所以后人给他 doctor subtilis(精微博士)的尊称。一些近代的学者曾经误解他那种繁杂的术语体系,他们认为他已经是一个怀疑主义者或理性主义者或宣布了一种新的——接近于现代的批判主义或理想主义(Kritizismus und Idealismus)——思想。然而,实际上他仍然是一个真正属于中世纪的思想家,他与前面的高峰期经院思想家一样都有很 positive(肯定)的态度,他在“共相”的问题上也同样支持“实在论”(但其中有一种奥古斯丁主义倾向)。然而,Scotus(司各脱)更多意识到理性认识的局限性,他从各方面来分析和批评圣 Thomas Aquinas(托马斯·阿奎那)的体系,都是为了用一个新的体系代替它。Thomas(托马斯)认为,理性是最高的,但 Scotus(司各脱)说,人的意志力有首要的地位(voluntarismus 意志主义)。他也从这方面来设定对神的概念。他认为,神学应该是一种实践性的学科,其目标是博爱。在“成义”的过程中,他更强调人性的因素,超过 Thomas(托马斯)派。Thomas(托马斯)派的人以及一些早期的方济各会人士,比如 Alexander de Hales(亚历山大)和 Bonaventura(波纳文都拉),都否认圣母 Maria(玛利亚)的“不染原罪”,但 Duns Scotus(邓斯·司各脱)从各方面为此提供论点并最后获得胜利(关于“圣母不染原罪”的节日,参见 133.7; 152.4)。不久后,Scotus(司各脱)的教导在方济各会中获得崇高的地位,似乎等于 Thomas(托马斯)在道明会中的地位。从此,托马斯派和司各脱派形成一种明确的对立和抵抗局

面。这种冲突的影响在 16 世纪和近代思想中都能看到。

关于“无染原罪”的教导的差异在 15 世纪引起了道明会和方济各会之间非常激烈的争论,所以 Sixtus IV(西克斯图斯四世)——他自己也是方济各会会士——于 1483 年禁止双方彼此诋毁对方为“异端者”。在 16 世纪初的 Bern(伯尔尼)发生一件悲哀的事:四个道明会会士被控诉发起了一些欺骗性的“圣母显现”或“奇妙显现”,但这些都是反对方济各会关于“无染原罪”的教导的骗局。这四个人被投到监狱中,在受拷打后他们“承认罪”,并由一个法院(其中有三个主教)宣布为有罪,于 1509 年 5 月 31 日被烧死。然而,根据后来的文献研究,真正的囚犯是一个名声欠佳的平信徒,名为 Hans Jetzer(耶策尔)。那些道明会会士仅仅轻易地相信 Jetzer(耶策尔)组织的演戏,认为这是真正的奇迹并夸夸其谈地到处宣传这些事。方济各会会士 Thomas Murner(穆尔内)又发行一些传单,其中传播这些人的“罪行”。

145.3 第三个在中世纪晚期很有影响的学派是由英国方济各会会士 Wilhelmus Occam(奥康,约 1295 - 1349 年)创立的思想学派,它反对和抵抗其他两个学派。他的拥护者称 Occam(奥康)为 Doctor invincibilis(常胜博士)或 Venerabilis Inceptor(“可敬的启发者”)——后面的名称指这位学者在学术过程中受阻,因为他和教廷有争论,所以他在牛津大学仅仅受得了 baccalaureatus(学士学位),没有获得 magisterium(硕士学位)。他还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有口才的辩论者,引起众人注目,但于 1324 年被怀疑传播一些有异端的教导,所以被邀请去 Avignon(阿维尼翁)的教廷。他被审问,也被拘留四年,后来从那里逃走,去 Pisa(比萨),在 Ludovicus Bavarus(巴伐利亚人路易)那里寻求庇护(1328 年 5 月),但因此被绝罚和罢免。自从 1330 年,他在 Munich(慕尼黑)工作,在论战的时期支持和保卫皇帝,提出“国家办教会”的理论,传播一些反对教会的圣统制的思想(参见 139.2),并在方济各会的神贫争论当中(参见 151.1)反对 Johannes XXII(约翰内斯二十二世)。也许他在去世之前(他 1349 年在 Munich 慕尼黑去世)与教会和自己的修会和好了,但这一点也不确定。他的主要著作是对于 Aristoteles(亚里士多德)、Porphyrius(波斐里乌斯)的逻辑学著作的注解,他对 *Sententiae*(《诸命题》)也写过解释,又写了 *Centiloquium theologicum*(《神学百论》)和 *Quodlibeta*(《杂论》,即一些谈论教会政治的著作,参见 139.2)。Occam(奥康)的思想非常敏锐,他的逻辑学分析能力很强。

Occam(奥康)是 nominalismus(亦称 terminismus 唯名论)的真正恢复者(参见 121.2,4),因为他自己称 Petrus Hispanus(西班牙人伯多禄/彼得,参见 135.3f)那种普遍被施用的逻辑学教科书(所谓的“现代逻辑学”logica moderna)中的“共相”(或普遍概念)为 termini(名称)。虽然一位法国的方济各会会士 Petrus Aureoli(光环的伯多禄,他在巴黎教神学,后来当 Aix 的总主教,1322 年去世)已经早一些在他的《解释诸命题》中提出了一些具有强烈“唯名论”倾向的看法,但只有通过 Occam(奥康)的著作,唯名论在中世纪晚期的思想界中才获得传播,后来获得领先地位。Occam(奥康)的认识论的基本线索是一种怀疑论和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根据 Occam(奥康)的说法,“共相”(普遍的理念)在灵魂以外没有什么真实的存在。这些“共相”只是个别事物的“图象”(conceptus mentis 心灵的概念),它们仅仅是某一种无法认识的“客观存在”的代表,它们只是思想过程中的工具。根据这种说法,高峰时期的经院思想所建立的和谐状态(信仰与知识之间的和谐)被毁灭了,而作为科学的神学就再没有基础了。对 Occam(奥康)来说,理性思考不能掌握信仰的教导,因为信仰是“非理性的”(irrationalis);人们需要以“信仰上的服从”接受信仰的真理,而那些“论证神的存在”的证明仅仅被认为有一定的“概率”。Occam(奥康)否认一切绝对的价值,他认为道德规律不建立在神的本质(=“善”)上,而仅仅建立在神的意志(voluntas Dei)上,这样他夸大神的 potentia absoluta(全能),使之走向“任意性”(Willkuer)。他根据 Pelagius(白拉奇/伯拉纠)的思想抽空恩宠论。当然,Occam(奥康)的部分学生仅仅以缓和的形式提出这些理论。因为他们的新观点倾向于经验主义(empirismus),对自然科学研究有促进作用。

145.4 虽然 Occam(奥康)主义对神学有灾难性的影响,但它仍然表达了那种新的世界观和人们的自我意识,所以很多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在 14、15 世纪欢迎它。恰恰那些最有热忱和最有影响力的大学老师和学者拥护了它,比如在 Oxford(牛津)、Paris(巴黎)、Vienna(维也纳)、Erfurt(爱尔福特)、Heidelberg(海德堡)、Basel(巴塞尔)、Freiburg(弗莱堡)、Tuebingen(蒂宾根)。“两种道路”的争论,就是 via moderna(现代的路线,即唯名论)和 via antiqua(古代的路线,即共相论)之间的争论充满了整个中世纪晚期。这两个派别的人也被称为 nominales(“唯名者”,或 terministae, conceptistae“概念论者”)以及 reales(实在论者)。唯名论很严格地区分了“理性”和“启示”,这样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准备了 16 世纪的宗教革新。Luther(路德)是 Occam(奥康)和奥康学派的继承人(他曾说过 sum Occamicae

factionis“我属奥康派”),参见下文关于 Gabriel Biel(比尔)的介绍。然而,经院思想的保守派别并没有消失无遗,他们分裂为几个派别(托马斯主义者、司各脱派、奥古斯丁派、折中主义者),并在 15 世纪的岁月里再一次恢复力量(参见下文 145.4b)。

尤其值得提到的学者是这些:

145.4a **Nominalistae**(唯名论者)。原来有很多学者认为,道明会会士 Durandus de St. Pourcain(杜朗迪)是一个唯名论者——他曾经在巴黎和 Avignon(阿维尼翁)教神学,后来当 Le Puy 和 Meaux 的主教(1334 年去世)——他被称为 doctor modernus(现代博士)或 doctor resolutissimus(最果断的博士)。因为他的《注解》(1308 年 - 1312 年)的观点很反对托马斯,所以他的修会采取一些措施反对他,但在“共相”(普遍概念)的问题上,他既不是“实在论者”,又不是“唯名论者”,但他思想的基础是 Plato(柏拉图)和 Augustinus(奥古斯丁)。

与他不同,另一些巴黎教授确实是很明显的“唯名论者”,比如意大利的奥古斯丁会会士 Gregorius de Rimini(额我略/贵格利,他的尊称是 Doctor authenticus 真实博士,1358 年去世),他在晚年任职自己修会的总会长;法国人 Johannes Buridanus(布里但,他 1327 年和 1348 年当巴黎大学校长,约于 1358 年去世);德国人 Albertus Saxonius(阿尔伯特),他于 1353 年当巴黎大学校长,1365 年当维也纳大学第一任校长,不久后又 被祝圣为 Halberstadt(哈尔贝斯塔德)的主教(1390 年去世)——他特别认真地推动自然科学研究,尤其是物理学和天文学;德国人 Marsilius de Inghen(马尔西留,他来自 Geldern 地区,1367 年和 1371 年任巴黎大学校长,1386 年当 Heidelberg 海德堡大学第一任校长,1396 年去世)——他曾经编写过很多逻辑学的教科书;另一个人物是前面提到的教会政治思想家 Henricus(Heinbuch) de Langenstein(亨利,来自 Hessen 赫森地区),他 1368 - 1383 年在巴黎教神学,后来 到维也纳,1397 年去世——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学者,其著作涉及到哲学、自然科学、天文学、圣经诠释学、信理学、教会政治学和灵修学。

希腊人 Petrus Philargi(斐拉基,他来自 Crete 岛的 Candia)也是一个唯名论者,他后来在巴黎当一个著名的神学家,曾经写过一部《诸命题的解释》。他后来当选为 Milano(米兰)的总主教,后 晋升枢机,并在 Pisa(比萨)的大会议上于 1409 年被选为教宗(Alexander V 亚历山大五世,参见 141.4),但一年后去世。

另一个学者是 Petrus d' Ailly(阿伊,1350 - 1420 年),他曾经在巴黎大学当教

授和校长(1389年),后来任 Cambrai(康伯瑞)的总主教(1396年),当枢机(1411年);他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唯名论者,教会改革的先锋者,并在 Pisa(比萨)和 Constantia(康斯坦茨)会议上是“会议论”的主要代表之一(参见 141.4; 142.2)。

那位被尊敬为 Doctor christianissimus(“最像基督博士”)的 Johannes Gerson(杰尔松,1363-1429年)是一位有高尚精神的神学家,他推动改革,是巴黎大学的著名教授,在 d'Ailly(阿伊)以后当巴黎大学校长(1395年),也是支持“会议理论”的代表人物,并在 Constantia(康斯坦茨)的会议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参见 141.4; 142.2)。虽然这位学者有许多神学著作,但他的目标更多是实践性的和牧灵方面的。他首先要引导人们过一个真正符合基督的生活,因此也特别重视讲道学和教理知识的教导(参见他的《三部书》Opus tripartitum,参见 153.2)。他是一个温和的唯名论者,愿意调节哲学和神学、形式派(formalistae,即 Scotistae 司各脱派)以及 terministae(唯名论者)之间的差异,又想结合 mystica(神秘主义)和经院思想——他很重视神秘主义,根据传统的思想[尤其是 Victor(维克托)派和 Bonaventura 波纳文都拉]来理解神秘主义。他坚决反对那些 Begardes(贝格哈德)和“自由精神的弟兄”的虚假神秘思想(参见 117.3f; 131,2d),但因此也不公平地怀疑了 Johannes Ruysbroek(鲁斯布鲁克,参见 146.5)。他对后人的影响很大。

在中世纪晚期, via moderna(现代路线,即唯名论)的最著名代表是来自 Speyer(施佩耶尔)的 Gabriel Biel(比尔),他在 Tuebingen(蒂宾根)大学任教——这所大学是 Wuerttemberg(维滕伯格)的伯爵 Eberhard im Bart(艾伯哈德)与 Sixtus IV(西克斯图斯四世)教宗一起于 1477 年创办的。Biel(比尔)是一个受尊敬的司铎,他热切地推动教会的改革,先在 Mainz(美因茨)当大堂讲道师和副主教,后来(1468年)加入了“共同生活弟兄会”(参见 151.3a),于 1477 年被召叫到 Urach(乌瑞克)的圣职团团体,而 65 岁时(1484 年)开始在 Tuebingen(蒂宾根)任教,在那里获得很大的成就和名誉。他还当蒂宾根附近的 St. Peter(圣伯多禄)弟兄会的会长,于 1495 年去世。他的 *Collectorium super quattuor libros sententiarum*(《关于“四书”命题的论集》)被他的学生 Wendelin Steinbach(施泰因巴赫)完成,而 Biel(比尔)被称为“中世纪最后的 sententiarium(命题专家)”。这部著作是一个文集,它巧妙地总结了 Occam(奥康)的教导,又尽量删除其中最危险的部分。Biel(比尔)在当时[包括在 Trento(特伦托)会议上]被视为 Doctor catholicus(公教博士)。对于中世纪晚期的神学研究,它具有长期的影响; Luther(路德)也曾经在 Erfurt(爱尔福特)和

Wittenberg(维滕贝格)属于 Gabrielistae(加贝尔派,比尔派)。Biel(比尔)的著作还包括他的讲道稿、一部很受欢迎的对于弥撒经文的解释、以及一篇关于通货理论的分析。

145.4b **Realistae**(实在论者)。在15世纪初,被称为 Thomistarum princeps(托马斯派之王)的法国道明会会士 Johannes Capreolus(约翰内斯)是一位特别杰出的学者,他曾经写过一部解释和保卫托马斯神学思想的经典著作: *Defensiones theologiae Thomae Aquinatis*(《托马斯·阿奎那神学的辩护》)。与他有类似思想的人是 Florentia(佛罗伦萨)的杰出总主教 Antoninus(安托尼努斯,1459年去世,1523年宣布为圣人/圣徒),他的 *Summa theologica*(《神学大全》)很完美地论述了托马斯的伦理教导和社会教导(关于他的《世界史》参见第1卷,4.3)。

在第15世纪的德国,Colonia(科隆)大学是 via antiqua(传统路线)的基地。除了那些真正的托马斯主义者以外,科隆大学还有 Albertistae(阿尔伯特)派的人(如同早期在巴黎一样)——这些学者支持 Albertus Magnus(大阿尔伯特)的主张。在科隆读书的人还包括那位来自比利时的 Ryckel 的 Dionysius(狄奥尼修斯,1471年去世),他在 Roermond(瑞尔蒙)当 Carthusii(加都西会)会士,是一位有名的经院思想家和神秘学家,被尊敬为 Doctor mysticus(超拔博士)。他曾经在1451年和1452年陪同 Nicolaus Cusanus(尼苛劳/尼哥拉)去德国各地视察,并编写了许多著作(大部分是文集),其中依据 Thomas(托马斯)和 Albertus(阿尔伯特)的观点谈论整个神学的种种领域。

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有一个人特别热心地推动托马斯主义的恢复,就是来自 Gaeta(卡耶塔)的道明会会士 Thomas de Vio(托马斯,被称为 Thomas Cajetanus,卡耶但,1469-1534年)。他在不同的道明会学校任教,1507年后在罗马,1508年任道明会总会长,也参与了第5届 Lateranus(拉特兰)会议(参见157.6)。他于1517年当枢机。他的工作在教会政治方面很有影响,这已经属于宗教改革的时期(参见第3卷,160.1)。Cajetanus(卡耶但)是一位杰出的 Aristoteles(亚里士多德)专家和托马斯专家,他曾经被称为“第二个托马斯”,他写过关于托马斯著作的最后注解,所以1882年的16卷《托马斯全集》中也加上了他的注解。他也是一位重要的圣经诠释家、伦理学家、教会法律学家和社会伦理专家。

除了托马斯派和司各脱派以外,在中世纪晚期的思想界中还有一个 Augustinismus(奥古斯丁论)的派别,它在16世纪的 Trento(特伦托)会议上也有影

响。它的创始人是一个奥古斯丁会会士 **Aegidius Romanus** (艾吉丢,也许属于 Colonna 家族?),他曾经是圣 Thomas(托马斯)的学生,在巴黎任教,后来当他修会的总会长和 Bourges(布尔日)的总主教,1316 年去世。他在很多学术领域中都有成就,被称为 *Doctor fundatissimus* (“至稳定博士”)。他的教导建立在 Thomas(托马斯)的基础上,但他后来更多转向 Plato(柏拉图)和 Augustinus(奥古斯丁)的思想传统,就是早期方济各学派(参见 135.1,2d)的思想;他的主张早于 1287 年被宣布为奥古斯丁会拥护的教导。关于他的教会政治观点,参见 139.2。

一位来自 Alsatia(阿尔萨斯)的奥古斯丁会会士,Thomas de Strasbourg(托马斯)也支持 Aegidius(艾吉丢)的主张,他曾经在 Strasbourg(施特拉斯堡)和巴黎当过神学教授,1345 年任总会长,1357 年去世。他编写了一部良好的《诸命题注解》。

一位严格的奥古斯丁派的人士是 **Thomas de Bradwardin**(布拉德瓦丁),他被称为 *doctor profundus*(精深博士),出生在英国,曾在牛津任教,后来当 Eduardus III(爱德华三世)的告解神师,被提名为 Canterbury(坎特伯雷)总主教,但同年(1349 年)在伦敦因黑死病去世。他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和有才华的神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是 *De causa Dei adversus Pelagium*(《论上主和白拉奇/伯拉纠的问题》),其中尖锐地批评了经院思想中的恩宠论。他对于 Wycliffe(威克里夫)和改革者(Calvinus 加尔文)都有影响。

在德国的 Tuebingen(蒂宾根)大学除了唯名论以外当然也有别的学派的人。那些支持经院传统的实在论的人提出这样的标语:*Nos imus ad res, de terminis non curamus*(我们直接走向实物,我们不担心概念)。其中重要的人物是 Johannes Heynlin de Stein bei Pforzheim(海恩林),他于 1478 年当大学校长,是 Tuebingen(蒂宾根)圣职团的讲道师,此前还当过巴黎大学校长(1469 年),自从 1487 年在 Basel(巴塞尔)当 Carthusii(加尔都斯会)会士,1496 年去世。他也是一个很成功的民众讲道家和推动教会改革的人。另外还有 Conradus Summenhart(苏门哈特),他来自 Calw(卡尔),1502 年因黑死病去世,他 4 次当过 Tuebingen(蒂宾根)大学的校长,是 Duns Scotus(邓斯·司各脱)的追随者,又写了很多伦理神学和经济学方面的著作。

145.4c 两个属于 15 世纪的学者(一位西班牙人和一位德国人)已经开始走向一种比较自由的和现代的思想路线,虽然他们仍然站在经院思想的基础上。他们也都和神秘主义有关系。第一个是 Raimundus de Sabunde(= Sabieude,瑞孟多),

他曾经在 Toulouse(图卢兹)当医生和哲学家(约于 1450 年去世)。他的著作 *Liber naturae sive creaturarum*(《自然或诸受造物的书》,后来的版本称之为 *Theologia naturalis*《自然神学》)作出一个很奇特的尝试:他要根据理性和根据大自然(“自然之书”)证明基督信仰的种种教导。他的这种思想大概也受他的同乡 Raimundus Lullus(卢尔,参见 135.3e)的影响。

来自 Mosella(摩泽尔河)边的 Cues(库斯)的 Nicolaus Cusanus(库萨的尼苛劳,1401 - 1464 年)是一位船工的儿子,他本来姓 Criffitz = Krebs。他在 Deventer(德文特尔)的“共同生活弟兄会”中受教育,后来去了几所大学学习,由于他的才华和努力成为一个非常渊博的学者,他是人文主义者、哲学家、数学家、自然科学家、神学家和神秘学家,同时投身于当时的社会生活,推动教会的改革,在充满动荡的时代关心罗马宗座,又是一个有爱国精神的德国人,真是中世纪晚期最杰出的伟大人物之一。他在 Confluenta(Koblenz 科布伦茨)当圣职团团长,而 Trier(特里尔)的总主教派遣他去参与 Basilea(巴塞尔)的改革会议,在会议上也有重要的影响[1433 年参与和 Hus(胡斯)派人物的谈判,参见 148.5]。他口头上和书面上都支持大公会议的权威性应该超过教宗的权威性(参见 *De concordantia catholica*《公教的合一》,1433 年;*De auctoritate presidendi in concilio generali*《大公会议的主席权》),但当这个大公会议开始分裂时(1437 年),他转向 Eugenius IV(尤金尼乌斯四世)教宗(参见 143.2)。他在一个使团中去东方,与君士坦丁堡的皇帝进行谈判,又在 1441 - 1447 年间当教宗的使者,在德国的帝国议会和君主义会上(参见 144.3)很成功地使德国和教廷走向和好。教宗 Nicolaus V(尼苛劳/尼哥拉五世)于 1448 年提名他为枢机,1450 年任命他为 Bressanone/Brixen(布里森)的主教,他于 1451 年和 1452 年以宗座特使的身份去德国及荷兰,在各地宣布大禧年的特赦和对付土耳其人的十字军运动,但同时也推动教区司铎和修会人士的改革(参见 156.1)。因为 Tirol(蒂若尔)的 Sigmund(西格蒙德)公爵很激烈反对他,所以 Nicolaus(尼苛劳)自从 1460 年生活在罗马。Pius II(比约二世)教宗请他写一个很大的改革计划为了提高教会的纪律。他于 1464 年 8 月 12 日在 Todi(托迪)去世(他的墓在罗马的 S. Pietro in Vincoli 教堂)。他在 Cues(库斯)创办的医院一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其中的图书馆很有名。

Nicolaus Cusanus(尼苛劳/尼哥拉)掌握了当时的全部知识(虽然他的希腊语不太好)。他是近代哲学的先驱者之一。虽然他的思想在很多方面还属于中世纪,

但他已经比较多转向了现代的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这样确实可以称他为“近代的引路人”。他是一个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离开那些陈旧的思维方式并寻求新知识的新方法。他的主要思想是在一个更高的“合一”中结合各种矛盾,就是所谓的 *coincidentia oppositorum*(对立相合,就是神)。当时的经院思想很自豪地强调自己的学问,但他的主要著作 *De docta ignorantia*(《论学识的无知》)强调人的知识的局限性,并且根据 Platon(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主义(Pseudodionysius 伪狄奥尼修, Eckhart 艾克哈特)说,走向神的渠道是“观看”和“爱慕”。他的思辨在概念术语上虽然有一些缺陷,但很渊博、都充满尊敬的态度和真诚的虔信。一位 Heidelberg(海德尔堡)的神学家, Johannes Wenck de Herrenberg(约翰内斯)曾经说他的思想不正统,而 Nicolaus(尼苛劳)写了一部替自己辩护的著作(*Apologia doctae ignorantiae*《辩护有学识的无知》),因此后来有很多德国南部的本笃会隐修院谈论神秘主义的本质是什么。Nicolaus(尼苛劳)的思想不可以被称为“泛神论”。只有在后来的时期,那位意大利的自由主义者 Giordano Bruno(布鲁诺,他是道明会会士,1600年2月17日被烧死)从一个泛神论的角度进一步发展了 Nicolaus(尼苛劳)的思想。Nicolaus(尼苛劳)也具有辨别的能力,比如他认为 Donatio Constantini(《君士坦丁的赠予》)不是一个真实的文献(参见 85.3),他还怀疑了 Pseudo-Isidorus(伪伊西多尔)的其他文献(参见 87.4),又反对对于圣髑的滥用,反对当时人对“奇迹”的追求。通过他的数学研究和天文学研究,催促了教会修改历法(*Reparatio Kalendarii*《修历》,1435年以及在 Basileia 巴塞尔会议上,1437年)。他写过很多讲道稿,这也证明他在牧灵神学方面的热忱。

145.5 在整个中世纪,人们都清楚地意识到,《圣经》对神学研究和牧灵工作都有最深远的重要性,他们也始终在圣经研究方面投入很多精力。在早期的阶段,他们仅仅写了一些有注脚的版本(*Glossierung*, 参见 Walahfried Strabo 瓦拉夫里德, 89.4, 以及 Anselmus de Laon 安瑟伦, 121.4), 或编写一些 *catenae*(串珠圣经本)。后来的学者开始写一些真正的注解,又利用经院思想的逻辑性和系统性来整理《圣经》的内容和思想。那些伟大的经院思想家也大部分都写过一些《圣经》的阐述著作,但其中比较少有独立的成就。中世纪各种学校中的教学工作在信理学(教义学)和伦理神学一般都是根据《圣经》文献而讲的。在另一方面,有的人在中世纪已经说,由于过多的思辨性的论述,《圣经》的地位被降低。无论如何,对于《圣经》的解释方法不很完善。根据传统的说法,人们都区分《圣经》有4方面的意义,最基本的是

字面上的(或称“历史上的”)意义,而《圣经》记载的象征意义又可以分为3个层面:比喻意义,道德上的意义及神秘的意义。人们用这个拉丁语的格言来表达这四种意义: *Littera gesta docet, quid credas allegoria, moralis quid agas, quo tendas anagogia*. (文字指出历史事件,其寓意告诉你应当相信的内容,道德意义指导你的行为,而神秘意义启示未来的事。)比如,《圣经》中“以色列人过红海”是历史上的事件,但也代表“上主救人”的奇迹,又告诉人们要“勇往直前”,而脱离埃及的过程又可以象征“走入天国”的过程。然而,在中世纪的圣经学中,人们经常太多注意到象征意义,而忽略了历史意义。一位方济各会会士在这方面获得了一定的突破,就是来自 Normandia(诺曼底)的 Nicolaus de Lyra(尼苛劳/尼哥拉,1349年去世),他曾在巴黎当教授并被尊敬为 *Doctor planus et utilis*(明白和有用博士)。他的基本原则是:对《圣经》的解释都必须从字面意义出发,而在他的巨著 *Postilla*(《圣经文学研究集》,5卷)中解释了全部《圣经》,后来他又加上了35卷 *Moralitates*(《道德解释》),其中论述那些寓意和神秘的解释。这位 Nicolaus(尼苛劳/尼哥拉)甚至也学过一点古希伯来语。在某些大学中,欧洲的学者也建立了一些“东方语系”(参见 Vienne 维恩主教会会议,1312年,127.5),而“人文主义”的崛起也为圣经学带来了一些有利的条件。

Postilla 这个名字一般被理解为 *post illa verba textus*(“此话语后的文献”),但有的学者认为,它的意思来自 *postea*(“边注”,“脚注”)。这位 Nicolaus de Lyra(尼苛劳/尼哥拉)的著作在各方面却很受赞扬,而在1500年之前,它已经被出版了20次,第一次在罗马(1471年)。这些版本一般也包括另一些学者的附加文献,比如 Burgos(西班牙布尔格斯)的主教 Paulus(保禄/保罗,他是一位皈依的犹太学者,1435年去世)的注解(称 *Additiones*),或那位德国方济各会会士 Matthias Doering(德林格,1469年去世)写的 *Defensorium Postillae*(《圣经文学研究集的辩护》)。Luther(马丁·路德)也参考了 Nicolaus de Lyra(尼苛劳·德·里拉)的著作,从中学习一些知识,这一点可以从一个流行的格言看出: *Si Lyra non lyrasset, Lutherus non saltasset*(“如果里拉没有唱歌,路德无法跳舞”)。15世纪中的另一些圣经学家是 Alphonsus Tostatus(托斯塔图斯,1455年去世),他是西班牙 Salamanca(萨拉曼卡)的教授,也是 Avila(阿维拉)的主教,还有 Dionysius de Ryckel(狄奥尼修斯)和 Thomas Cajetanus(托马斯·卡耶但,关于这两个人物,请参见上文145.4b)。关于拉丁本《圣经》和各国语言译本在民众的传播,请见153.2。

《圣经》的拉丁语译本(所谓的 *Vulgata*) 在一些手抄本中呈现出一些错误,所以中世纪的学者想恢复一个完整的版本,他们早在 12 世纪建立所谓的 *correctoria* (“纠正处”),其中一个重要的推动者是道明会会士 Hugo de St. Cher(胡格,1264 年去世),他后来当枢机。这位学者不仅仅编写了对弥撒礼仪的解释,而且也编著了第一部《圣经索引》,而他对于《圣经》的解释很受欢迎。今天用的《圣经》的章节分化来自巴黎神学家 Stephanus Langton(兰顿,1228 年去世,参见 123.4),他后来当 Canterbury(坎特伯雷)的总主教,也写过两部《神学大全》,及一些关于《圣经》的解释。在 16 世纪初,那位对西班牙教会很有贡献的 Toledo(托莱多)总主教 Francisco Ximenes(吉麦内兹,参见 158.6)枢机用自己的钱在 Alcala(阿尔卡拉,旧名是 Complutum)印刷了所谓的 *Polyglotta Complutensis*(《多语排版圣经》),它包含希伯来文、希腊文(LXX《七十贤士本》)和拉丁本(*Vulgata*《通俗译本》)的文字(共 6 卷,1514 年 - 1517 年排编,但 1520 年才发行)。同时,著名的人文主义者 Erasmus Roterodamus(伊拉斯谟)在 Basileia(巴塞尔)的 Johannes Frobenius(弗罗本)的印刷厂中于 1516 年出版了《圣经·新约》的希腊语版本,后来(在 1519 年到 1535 年间)又印刷了 4 个修订版本。在 14 和 15 世纪已经有一些《圣经》学家注意到或努力研究《旧约》的希伯来语原文,其中最突出的人物是德国 Suabia(施瓦比亚)的人文主义者 Johann Reuchlin(瑞克林,参见 155.2)。

146

神秘神学家和“神之友”;以德国为主

146.1 在中世纪晚期的阶段中,经院思想逐渐走向衰落,而教会的生活在很多方面有外在化或世俗化的表现,但在同样的时期内,神秘神学,无论是实践上的或理论上的神秘神学都结出最优美的花朵,它获得了更独立的地位和更全面的意义,超过以前的任何时期。神秘主义是欧洲各民族的共同文化遗产,也是中世纪献给基督宗教的最杰出的礼物之一。在这神秘神学方面,一些虔诚的妇女有特别大的影响,比如在意大利有三个伟大的 Catharina(加大利纳):Catharina de Siena(锡耶纳的加大利纳,参见 139.6),Catharina de Bologna(博洛尼亚的加大利纳,1463 年去世),以及 Catharina de Genua(热那亚的加大利纳),她来自著名的 Fieschi 家族,于

1510 年去世。在瑞典有圣 Birgitta(布里吉特,参见 139.6; 151.3d),在英国有一个 reclusa(封闭在小屋内生活的隐修者)Juliana de Norwich(尤利安纳,约于 1413 年去世)。在德国地区,神秘神学的影响也特别强,在 14 世纪上半叶深深地吸引了圣职人员、隐修院的人甚至平信徒的圈子。德国人的性格比较内向,有深切的感受和宗教思想的创造力,所以成为神秘神学的良好土壤。当时的困惑也很多:教宗们在 Avignon(阿维尼翁)的流亡,教宗和皇帝之间的冲突,很多人被绝罚,曾经有维持 20 年的“禁罚”(interdictum),发生地震、洪水和鼠疫——这一切推动了很多完全死于世俗的世界,在内心的深处将自己交给上主。那些托钵修会的兴起和他们那种更亲切的牧灵工作更促进了神秘神学,其中很有影响的因素是一些非常有学问的道明会会士在德国南部的道明会修女院中讲道或当神师。这种灵修运动从隐修院那里传播到一些教区司铎和城市中的部分居民中,尤其是在 Rhenus(莱茵河)地区,从 Basilea(巴塞尔)到 Colonia(科隆)。这种灵修是圣 Thomas Aquinas(托马斯·阿奎那)关于上主的知识和洞见,而这些道明会会士强调其中的神秘因素,要求人“成全”和“成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来自 Augustinus(奥古斯丁)、Proclus(普洛克鲁斯)、Pseudodionysius(伪狄奥尼修)的新柏拉图主义的传统——通过圣 Albertus Magnus(阿尔伯特)和他的学生,这个新柏拉图主义传统也在德国西南地区扎下了根。在这里,关于上主、三位一体和基督的高深思辨和反省与虔诚的心态成为一个和谐的神秘神学的整体。有人称这个神秘神学传统为“德意志的”,因为其代表人物广泛地使用德语写他们的讲道稿、文章、书信、编年记或诗,他们甚至培养了德语这个语言,使它成为表达哲学和神学思想的有用工具。这些作者描述灵魂沉醉于神,又在神内获得无比的喜乐。德国的神秘传统不能说是与经院思想对立的,也不能称这些神秘神学家为“宗教改革的先驱者”——他们的基础和根源是天主教以及对教会的关爱。根据《若望/约翰福音》Jn 15:14 的记载,这些愿意过神秘生活的人自称为“神的朋友”。他们形成了一种松散的联合会,彼此有信件来往,他们要鼓励对方,这样共同抵抗当时的无序和道德生活的流失。因此,德国的神秘主义成为激励宗教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力量,它也在很多方面启发和影响了宗教艺术。

146.2 在 13 世纪末,在德国的修女院比较有名气的神秘讲道家是道明会会长和神学教授 Theodoricus de Vriberg(= Dietrich de Freiberg,迪特瑞克,约 1320 年去世)。然而,他写的著作仅仅保存一些拉丁语的、具有新柏拉图主义色彩的、关于形

而上学和自然哲学的论文(比如 *De iride*《论彩虹》,包括光学的杰出理论)。在 Theodoricus(Dietrich 迪特瑞克)后出现了三位著名的道明会会士神秘神学家: Eckhart(艾克哈特)、Tauler(陶勒)和 Suso(= Seuse 苏索)。德国思辨性神秘神学家的最重要代表是 **Meister Eckhart**(艾克哈特),他来自 Thuringia(图林根)的骑士家族,1260 年出生在 Gotha(哥达)附近的 Hochheim(霍赫海姆)。他在巴黎获得 magister(= 德语的 Meister,即“硕士”、“教师”)或神学博士学位(1302 年),后来在道明会 Saxonia(萨克森)地区当会长,又在巴黎任教(1311 - 1313 年),在 Strasbourg(斯特拉斯堡),最后在 Colonia(科隆)的修会大学任教。在他的拉丁语著作——它们于 1880 年才被发现,就是 *Opus tripartitum*(《三部书》,包括哲学论文、教义论文、对《旧约》和《若望/约翰福音》的比喻性解释以及讲道稿),以及来自巴黎时期的 *Quaestiones*(《论题》)——Eckhart(艾克哈特)以老师的身份说话,在那里他首先是经院思想家,并且是一个支持托马斯的学者。然而,他在天主论/上帝论和灵魂论的一些关键观点中改变他们修会(道明会)的传统教导,使这个思想转向新柏拉图主义。Eckhart(艾克哈特)所接受的宗教哲学因素不仅仅来自 Augustinus(奥古斯丁)、Proclus(普罗克洛斯)和 Thomas Aquinas(托马斯·阿奎那),而也包括阿拉伯人 Avicenna(阿维森纳,1037 年去世)和犹太哲学家 Moses Maimonides(迈蒙尼德,1204 年去世)。Eckhart(艾克哈特)的真正意义和他的威望不建立在他的拉丁语著作之上,而是来自于他的德语讲道稿和论文,这些都是一些他给道明会修女或“上主之朋友”作的讲演。Eckhart(艾克哈特)不是一个书呆子,而是一个解释生活的人,他能够用具有感染力的德语来表达传统的思想,用充满创造力的德语诗来说出一些宗教信仰的基本真理。他是一个有独特才华的 Theosoph(神智学家),是一位具有最高深精神力的神秘神学家和一个伟大的 Gesinnungsethiker(情怀伦理学家)。他以扣人心弦的语气谈论灵魂的“火花”(scintilla animae, Fuenklein der Seele),谈论“灵魂的深渊”(abditum mentis, Seelengrund),在那里人可以直接看到上主,而义人的 Gottesgeburt(“神的诞生”,“神内诞生”)发生。对他来说,“沉入于神”和“与神合一”虽然不是“本质上的合一”,也不能说“人成为神”,但他的思辨性说法是充满动力和无限的理想主义,所以他太过分地寻找一些新的词和夸大的表达方式,所以他在相当的程度上抹杀了神和受造物之间的差异,因此引起争论。然而,Eckhart(艾克哈特)并不是一个现代化的、反对启示的主观主义的代言人,他根本不想建立一个“新的、格尔曼/日尔曼民族的宗教”。他在意识和愿望上都站在中

世纪公教的传统中,始终对教会保持忠诚的心。然而,他的教导可以很容易从一个泛神论 - 寂静主义的角度来理解 (in pantheistisch - quietistischem Sinne missverstanden),这就会引起误解,而在历史上就发生过这种误解。反对他的人 在 1326 年在 Colonia(科隆)的总主教法院那里控诉了 Eckhart(艾克哈特),说他传播一些异端。他写了一篇替自己辩护的论文,向教宗提出申诉,并于 1327 年 2 月 13 日公开宣布,如果在自己著作中证明有一些错误的因素,他将愿意收回这些说法。他甚至亲自去 Avignon(阿维尼翁),在教廷法院中为自己进行辩护。然而,在教廷的决定之前,他于 1327 年去世,大概在 Colonia(科隆)。在长期的研究后,教宗 Johannes XXII(约翰内斯二十二世)于 1329 年 3 月 27 日谴责他著作中 29 条命题,其中称 17 条为“异端的”,称 11 条为“大胆大的,被怀疑有异端的”,但教宗没有谴责 Eckhart(艾克哈特)本人。

146.3 这位 Meister Eckhart(艾克哈特)在 20 世纪也是一个多次被讨论的人士,他对德国的思想界发挥了很深的和长期的影响。很多人都称他们思想的根源,比如那些“无拘束的人”,就是那些持异端的 Begardi(贝格迪人)或“自由思想的弟兄”,他们走入了泛神论和寂静主义的误区(参见 117.3d; 131.2d),但另一些非常严格遵守教会规矩的人也热烈拥戴他的教导。他的主要学生是 Tauler(陶勒)和 Suso(苏索),两个都是道明会会士。来自 Strasbourg(斯特拉斯堡)的 Johannes Tauler(陶勒,1361 年去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自己家乡的“上主之朋友”群体中活动,但一段时间也在巴黎和 Basileia(巴塞尔)待过。后来的人说,在 interdictum(禁罚)的时期(1325 - 1346 年),他曾经反对过教宗,但这是一个来自政治宣传的谣言。他的神秘神学的基础也同样是托马斯主义。然而,Tauler(陶勒)更多注意到伦理学和牧灵的需要,超过思辨性的和教导性的。他很谨慎地回避一切危险的说法,并尖锐地谴责任何虚假神秘主义的无序或放纵。他是整个中世纪最伟大的讲道家之一,有节制和深度,不拘泥于小的争论,充满精神力量和内心热火,所以他在任何时代都被尊敬。因为 Martin Luther(马丁·路德)很喜欢读他的书,后来的新教人士也多看他的书。

那位被列入真福品的 Henricus Suso(= Heinrich Seuse 苏索,1366 年去世)出生在 Suabia(施瓦比亚)地区,他本来属于骑士阶层,似乎一直是 Constantia(康斯坦茨)城的讲道会的会员,但在 Eckhart(艾克哈特)受控诉时,他也失去了他的教师职位,后来去 Ulm(乌尔姆),在那里有他的墓。他具有想象力和旺盛的感情,可以说

在精神生活上他是圣 Bernardus(伯尔纳德)和 Franciscus de Assisio(方济各/法兰西斯)的亲戚,他一生要作为“永恒智慧的仆人”,这样他的生活成为“爱主”的伟大史诗。他曾经严厉地折磨自己的肉身,愿意进行苦修,后来成为上主种种恩典的神师,成为一个“歌颂爱神的散文诗人”。他这样描述神秘神学的目标和任务: Ein gelassener Mensch muss entbildet werden von der Kreatur, gebildet werden mit Christus und ueberbildet in der Gottheit(“一个自由的人必须受培养,他需要逐渐脱离自然,与基督一同成长,又要在神内获得超越性的形象”)。Suso(苏索)的德语著作是他的自传(近代的研究说只有一部分是他写的),那部 *Buechlein der Wahrheit*(《真理之书》)——他讨论神秘神学的思辨性问题,深受 Eckhart(艾克哈特)的影响,那部广泛流传的 *Buechlein der ewigen Weisheit*《永恒智慧之书》(作者自己写过一个拉丁语版本,即 *Horologium Sapientiae*),以及他的灵修书信——这一切著作都是中世纪宗教文学的珍珠,也是德语形成过程上的宝藏。

与这种道明会的灵修(尤其与 Eckhart 艾克哈特和 Tauler 陶勒)有关系的著作是一个很著名的小书,就是 *Vom vollkommenen Leben*(《论完美的生活》),但更有名的是这部书的另一些书名,即 *Der Frankfurter*(《法兰克福人》)或 *Deutsche Theologie*(或 *Theologia Deutsch*《德国神学》)。这部书是一个姓名不明的司铎写的,他曾经在 Frankfurt(法兰克福)的 Sachsenhausen(萨克森豪森)的 Deutschherrenhaus(条顿会团体)中当神父,书的形成时期大概是 15 世纪初。后来, Luther(路德)于 1516 年和 1518 年首次在 Wittenberg(维滕堡)印刷这部小书,这样使很多新教圈子都热切地阅读它。

146.4 在“上主之朋友”运动方面,一位教区司铎也有贡献,就是 Henricus de Noerdlingen(= Heinrich 亨利,1350 年后去世),他是一位道明会修女——具有神秘神恩的 Margareta Ebner(玛格瑞塔·厄布内尔,1351 年去世)——的神师; Henricus(亨利)写给 Margareta(玛格瑞塔)的信以及她写下的 visiones(神视)是重要的资料,使我们理解那些“上主之朋友”运动的思想。除此之外,第 14、15 世纪的神秘神学的支持者包括这些人物: Hermannus de Fritzlar(赫尔曼,他是一位平信徒,曾经写过一个圣人传记,1343 年或 1349 年), Ludolphus de Saxonia(萨克森的鲁多夫,1378 年去世),他编写了一部很流行的 *Vita Christi*(《基督传》); 方济各会会士 Otto de Passau(奥托,1386 年后去世)曾经写了一部 *Die 24 Alten oder der goldene Thron*(《24 位长老或金座》),以及 Marquard(= Markus) de Lindau(玛卡德,1392 年去世,他写

过很多灵修学和神秘神学论文和讲道稿)。那位受 Tauler(陶勒)思想影响的被称为 Engelberger Prediger(恩格伯格讲道家)的 Bartholomaeus Fridauer(弗瑞刀尔)在瑞士的 Stans 活动(约于 15 世纪初);一位本笃会会士, Johannes de Kastle(约翰内斯),于 15 世纪初写过很多思想深奥的拉丁语灵修学著作,其中包括原来被归于 Albertus Magnus(大阿尔伯特)的 *De adhaerendo Deo*(《论信赖上主》)。很值得注意的还有 Johannes Nider de Isny(尼德尔,1438 年去世),他是一位道明会会士,并在自己修会的改革方面很有贡献,著有 *Formicarius*(《论蚂蚁》), *Die 24 goldenen Harfen*(《24 个金琴》), *geistliche Briefe*(《灵修书信》)等。来自 Westphalia(西法里亚)地区的 Johannes Veghe(维格,1504 年去世)是一个具有感情的,但也受过人文主义教育的修士(著有讲道稿和灵修性的论文)。

在德国西南地区的一系列的道明会修女会院中有很多文化水平和灵修水平很高的修女,她们写了很多优秀的神秘神学著作,其中表达她们的殷切祈祷精神以及一些超拔经验、神视和启示。这方面的传记和历史资料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也很有趣。保存这样文献的道明会修女院是这此: Colmar 附近的 Unterlinden 修院(在那里有 Catharina de Gebweiler 修女), Freiburg 附近的 Adelhausen 修院, Wintherthur 附近的 Toess 修院[有 Elsbeth Stigel 修女,她是 Suso(苏索)的精神知己], Diessenhofen 附近的 Katharinenthal 修女院, Zuerich 附近的 Oetenbach 修院, Nuereberg 附近的 Engeltal 修院(有 Christine Ebner, Adelheid Langmann 修女), Haigerloch 附近的 Kirchberg 修院, Esslingen 附近的 Weil (Wiler)修院。也有一些方济各会修女写过这样的神秘神学著作,比如真福 Luitgard de Wittichen(1348 年去世);真福 Elsbeth Achler(亦称 die gute Beth,来自 Waldsee),她曾在 Reute 入了第三修会,真是与基督一同受苦的人(1420 年去世,1766 年被宣布真福),以及她的学生 Ursula Haider(1498 年去世)——她是 Villingen(维林根)加拉修女会的院长。一位曾经过了幸福的社会生活和婚姻生活的妇女,真福 Dorothea de Montau(多若德亚)——她是普鲁士的主保——后来也修道,1394 年在 Marienwerder(玛利亚维德)的大教堂边去世,因为她在那里当一个 *reclusa*(在封闭小屋修道的人)。那位圣隐修者 Nicolaus de Fluehe(尼苛劳/尼哥拉,1487 年去世)也属于“上主之朋友”运动,他也是一个真正的神秘主义者,来自瑞士的 Sachseln(萨克斯尔),在当地民众中很受尊敬,因为他是一个缔造和平的人。

在德国的神秘主义运动中,一个平信徒有很特殊的地位,就是 Rulman(=

Hieronymus) Merswin(梅尔斯温,1382年去世),他来自 Strasbourg(斯特拉斯堡),曾经是一个富有的商人和银行家,请求 Tauler(陶勒)当他的神师,并于1371年在 Strasbourg(斯特拉斯堡)创立了所谓的 Johanniterhaus zum Gruenenwoerth(约翰尼特家院)作为那些“上主之朋友”的家园。他自己也在晚年生活在那里两年。他的著作 *Buch von den neun Felsen*(《九岩石之书》)描述灵魂上升的过程;虽然他施用神秘主义者的语言和比喻,他自己没有很多创造力,仅仅重复 Eckhart(艾克哈特)和 Tauler(陶勒)的话,但他以耀眼的语调形容教会的腐败,又以纠缠不休的劝告想推动教会的改革。与这位 Merswin(梅尔斯温)有密切关系的是所谓的 grosser Gottesfreund vom Oberland(伟大的上主之友)——据说他是一个神秘弟兄会的元首,他们在 Alsatia(阿尔萨斯)南部和瑞士北部都有很多成员,这个“伟大的上主之友”虽然只是平信徒,但他使某一个著名的神学家转向真正的内心的灵修生活(这是 *Meisterbuch*《大师之书》的内容)。据说,他写了16部神秘思想的著作,还有一些书信,然而这些著作与 Merswin(梅尔斯温)的书一样没有深度,而且他将“上主之朋友”赞扬为“基督宗教唯一的支柱,同时贬低那些有学问的神学家和那些不正规的司铎们。然而,近代的学者 Denifle(德尼弗勒,1844-1905年)证明,“伟大上主之友”只是一个虚构的人,“他的”著作是别人写的。这种“虔诚欺骗”的发起人大概是 Merswin(梅尔斯温),而协助他的是 Nicolaus de Loewen(尼苛劳)——一位 Johanniter(约翰内斯司铎)。通过这个“伟大上主之友”的形象和一些著作,Merswin(梅尔斯温)想提高自己的形象和巩固他创立的“上主之朋友的家园”。

146.5 在 Rhenus(莱茵河)下游地区以及在荷兰地区(当时的荷兰地区仍然属于德意志帝国)也同样出现了很杰出的神秘神学家。在比利时最有威望的“上主之朋友”是真福 Johannes Ruysbroeck(鲁伊斯布鲁克,1293-1381年),他被称为“奇妙者”(der Wunderbare),曾经长期在 Bruxelles(布鲁塞尔)的 St. Gudulakirche(圣古都拉教堂)作牧灵工作,深深感觉到当时的精神需要,因此约于1343年在 Groenendael(“青谷”)的偏僻地区创立了一个“穷司铎的祈祷会”,本来想在这个团体中表达出自己的改革思想,但后来接受了奥古斯丁会的会规(1349年)。Ruysbroeck(鲁伊斯布鲁克)当这个团体的第一位院长。他是一个伟大的“瞻仰上主的人”(Gottschauer),而他的思想包括“从神秘的道路,经过活动的道路,达到观看天主的道路”这样的过程。他写过12篇美妙的比利时语的灵修论文,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有这样的书名:“灵性婚姻的美丽”。他的教导尤其受了 Pseudo-

Dionysius(伪狄奥尼修斯)和 St. Victor(维克托)学派人的影响,也许也受了 Eckhart(艾克哈特)的影响。虽然 Ruysbroeck(鲁伊斯布鲁克)很坚定地反对异端者的神秘思想,但后来(1402年)还是有一位伟人控诉他为“泛神论者”,就是著名的巴黎大学校长 Joh. Gerson(杰尔松,——他自己也写过一些很有价值的神秘主义文献,参见 145.4a)。然而,Ruysbroeck(鲁伊斯布鲁克)曾经影响了另一些荷兰地区的神秘思想家,比如被称为 doctor ecstaticus(超拔博士)的 Dionysius Ryckel(狄奥尼修斯,参见 145.4b)以及方济各会会士 Heinrich Herp(赫尔普,亦称 Harphius,1477年去世,著有 *Theologia mystica*《神秘神学》, *Spiegel der Volcomenheit*《完善之镜》以及其他的神秘神学著作),而在 1402年后,这学者很有效地替自己的老师 Ruysbroeck(鲁伊斯布鲁克)进行辩护。

在荷兰出现的“新灵修”(devotio moderna)与那些“共同生活弟兄会”有关系(参见 151.3a)——他们的创始人 Gerhard Groote(格劳特)本来就是 Ruysbroeck(鲁伊斯布鲁克)的朋友。他们的灵修思想本来比较简单和朴素,但这个弟兄会在克修和神秘思想领域中也产生一系列的杰出的作者,比如 Gerhard Zerbolt von Zuetphen(泽尔伯特,1398年去世),Gerlach Peters(佩特尔斯,1411年去世),Heinrich Mande(曼德,1431年去世),Johannes Mombaer(蒙巴尔,亦称 Mauburnus,1501年去世,他写了一个很流行的默想书,即: *Rosetum exercitiorum spiritualium*《灵修神操花园》)。他们最著名的代表是真福 Thomas Hemerken de Kempis(= Thomas a Kempis 托马斯·肯璧斯,1380-1471年),他在 Zwolle(泽沃勒)附近的 Agnetenberg(阿格内特山)当奥古斯丁会会士,一生编写或抄写很多书。他是内心祈祷的大师,在追求完善的道路上,他是最可靠的导师之一。他写过很多辐射着生活经验的著作,比如 *Soliloquium animae*(《灵魂的独语》), *De tribus tabernaculis*(《三个帐篷》), *Hortulus rosarum*(《玫瑰花小园》), *Vallis liliorum*(《百合花之山谷》)等。他大概也是 *De imitatione Christi*(《师主篇/效法基督》4卷)的作者(而不仅仅是其编者或改写者)——这部书似乎是无与伦比的,约于 1420年形成,在《圣经》以外是被翻版及翻译最多的著作,它成为在整个基督宗教界最受欢迎的书之一。第 1、2、3卷讨论基督徒和修道人的完美生活,第 4卷有关于朝拜圣体的内容。在这部著作中,中世纪晚期的成熟生活体验和对基督的敬拜受到了最有说服力的表达。

自从 17 世纪以来,关于谁是 *De imitatione Christi*(《师主篇》)的作者这个问题发生一长期的争论和论战,尤其是在本笃会、奥古斯丁会和耶稣会之间的争论。有

人曾经说, Johannes Gerson(杰尔松)是该书的作者,但这个观点肯定是错误的。另一些学者曾经说, Gerhard Groote(格劳特)或 Johannes von Schoonhoven(斯孔霍芬)是其作者,但另一些文献(比如 1438 年来自 Cambrai 的文献, Joh. Busch 于 1464 年写的《编年记》, 参见 151. 3a)明确说, Thomas a Kempis(托马斯)是该书的作者。

147

宗教改革的前驱。Wiclif(威克里夫)及其在英国的影响

147. 1 在 14、15 世纪的欧洲社会中,教会的纪律水平的下降,教会大分裂的不幸时期以及一种彻底的宗教改革的缺少这类因素都有利于大规模的异端运动的形成。这些运动的创始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宗教改革之前的改革者”,或更好称为“宗教改革的前驱”,因为他们在一些基本的观点上与 16 世纪的宗教改革者有相同的看法,比如他们片面地突出《圣经》为信仰的来源,他们放弃教会的传统和教会的圣统制,他们强调“爱国因素”并反对普世性的罗马教会。早一些, Marsilius de Padua(马西留斯)和 Wilhelmus Occam(奥康)已经提出了一些新的原则——这些原则跨出了教会传统的框架,具有革命性的影响(参见 139. 2; 145. 3)。然而,最著名的“改革前驱”之一是英国人 John Wycliffe(= Wiclif, 威克里夫, 约 1320 - 1384 年),他来自盎格鲁-撒克逊贵族家庭,在 Oxford(牛津)大学是一个很有威望的哲学和神学教师,并任职于收入很高的王家堂区 Lutterworth(路特沃斯)。他深受 Thomas de Bradwardine(布拉德瓦丁, 参见 145. 4b)及奥古斯丁学派的影响,但他自己的思想并不是很一致,也缺乏严密的和逻辑,而具有很多主观主义的、不逻辑的因素,又呈现出一种片面的灵性主义(einseitiger Spiritualismus)。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在英国已经存在着一种“国家办教会”或“政教合一”的倾向(参见 107. 5; 140. 3),而这种根深蒂固的“国度凌驾于教会之上”的思想为 Wycliffe(威克里夫)的政治活动和改革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教宗 Urbanus V(乌尔巴努斯五世)所要求的“封地税”已经没有交给教廷 33 年之久,而在 Eduardus III(爱德华三世, 1327 - 1377 年)的统治内,英国国会正式宣布放弃这种税(1366 年)。那位爱国者 Wycliffe(威克里夫)认同英国人针对教廷提出的种种谴责和措施,而他自己的主张导致他和教会的组织结构及传统的信条形成尖锐的对立。自从 1376 年以来,他在

伦敦的讲道词并在一些著作中(比如 *De divino dominio*《神圣的权力》, *De civili dominio*《社会权力》, *De decem praeceptis*《十个诫命》)提出这样的说法:对教会来说,人间的权力和世俗的财产必然会导致腐败,教会的财产不符合基督和宗徒/使徒的教导。教会必须是穷困的教会,最好应该让国度没收教会的财产,使之成为国有的产业,而国度应该为圣职人员提供生活费。他认为,征收 *annatae*(年度税,参见 140.1)和大赦税都应该说是“圣职买卖”。他特别反对各地隐修院的财产,甚至反对隐修生活本身。他称修会为 *secta*(“教派”,“邪教”)。

147.2 这位学者的看法在民间很受欢迎,贵族们和王家也很支持他的说法。当时英国和法国的战争为英国带来了许多不幸和灾难,所以一种“全面的充公”运动对政府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考虑。虽然英国的修会团体向罗马写了一些报告,而教宗 Gregorius XI(额我略/贵格利十一世)也于 1377 年 5 月谴责了 Wycliffe(威克里夫)的 18 个命题为错误的、威胁教会和社会的,但在英国的影响并不大。Canterbury(坎特伯雷)的总主教进行调查后,于 1378 年 3 月仅仅警告了 Wycliffe(威克里夫)一次,因为他害怕王宫和民众。在 1378 年 9 月,教会的大分裂暴发了,而 Wycliffe(威克里夫)不仅攻击了 Clemens VII(克雷孟七世),而且也抨击 Urbanus VI(乌尔巴努斯六世)和宗座本身,并在一些很尖锐的文献中(*De ecclesia*《论教会》, *De potestate papae*《教宗的权力》)说,教会不是圣统制和平信徒的大团体,而是那些“预定的人”的无形团体。他认为,除非上主先“绝罚”一个人,否则某一个教宗或主教的绝罚是无效的。根据他的主张,基督才是真正的教宗,而每一个“被召选的人”都在上主面前是一个真正的司祭。在一些晚期的著作中,他甚至称宗座为“反基督”的机构。他放弃教会的传统,并认为唯独《圣经》是信仰的唯一基础和标准,《圣经》是“上主的法律/律法”,所以它对世俗的统治也是最终的标准(参见他的 *De veritate sacrae scripturae*《论圣经的真理》)。为了给所有的人阅读《圣经》的机会,他还根据拉丁语的 *Vulgata*(《通俗本》)组织人将《圣经》译成英语,而《新约》大概是由他自己翻译的。他的拥护者很敬佩他,称他为 *doctor evangelicus*(福音博士)。在感恩祭的理论方面,他放弃了“体变说”(transsubstantiatio)——这一点引起很大的争论和震荡——并认为,在祝圣后的面饼和葡萄酒仍然是面饼和葡萄酒(所谓的 *remanentia*,参见他的 *De eucharistia tractatus maior*《论感恩祭》)。他说,信徒们仅仅以精神性的方式接受基督的圣体和圣血。他说,私人告解只是晚期的发明,而司铎们的独身制是不道德的、有害的。他反对“大赦”、对圣人/圣徒的尊敬、

对圣髑和圣像的尊敬,反对朝圣活动和为亡者举行的弥撒,又根据《玛窦/马太福音》10章的榜样派遣一些“穷困的司铎”(poor priests,后来他也派遣平信徒)两个两个地出去,向民众宣布“上主的法律”。英国的公教徒称这些讲道者是 Lollardi(罗拉迪,即“撒野草者”,从 lolium 野草)。那些革新者的讲道带来很多刺激,所以与其他因素一起导致了 1381 年的灾难性农民叛乱。由于这些可怕的混乱,于 1382 年 5 月在伦敦举行的主教会议(所谓的“地震会议”)谴责了 Wycliffe(威克里夫)的 24 个主张,认为 14 个主张是异端,10 个观点是错误的。他在牛津大学工作的朋友们被迫回收他们的主张或被绝罚。他自己一直到去世的时候(1384 年)生活在 Lutterworth(路特沃斯)堂区,没有受干扰,还继续发表了一些尖锐的文章,部分是英语的,部分是拉丁语的。他的主要著作之一 *Triologus*(《三部书》)就是在那个时期写的,他其中总结了自己的教导师体系。在他逝世后,他的思想进一步渗透了整个社会。只有在那属于 Lancaster(兰开斯特)王朝的 Henricus IV(亨利四世,1399 - 1413 年)的统治下,教会和政府才开始共同镇压这个新的主张。根据 1400 年的国会文献 *De haeretico comburendo*(《论异端人士的烧死》),英国开始有宗教裁判所(在此之前,英国地区似乎没有这个机构)。一些顽固不化的 Lollardi(罗拉迪)人被烧死,但 Wycliffe(威克里夫)的思想在暗地里继续存在,为 16 世纪的宗教革新作了准备。这个运动直接影响了波希米亚的运动,因为部分的 Wycliffe(威克里夫)派人士逃到那里。当 Constantia(康斯坦茨)会议于 1415 年谴责 Hus(胡斯)的主张时,顺便也审判了 Wycliffe(威克里夫)的 45 条主张(参见 148.3)。他的遗体于 1427 年从 Lutterworth(路特沃斯)的墓中被挖出并被烧毁。在英国,从神学的角度反驳 Wycliffe(威克里夫)的人也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人是一位 Carmelita(加尔默罗会会士),即 Thomas Netter(内特,1431 年去世),他在他的主要著作 *Doctrinale antiquitatum fidei ecclesiae catholicae*(《大公教会信仰古代文献集》,1415 年 - 1429 年)中根据深入的《圣经》研究和可靠的文献基础否定了 Wycliffe(威克里夫)的种种主张。

Hus(胡斯)及波希米亚的教会改革与社会改革

148.1 在波希米亚地区,Wycliffe(威克里夫)那些反对教会的教导找到了很有

利的社会条件。在那里还存在一些早期的教派的残余团体,尤其是 Cathari(清洁派)和 Waldenses(瓦尔多派,被称为 Winkeler“角落人”)的人,他们私下活动。一般的民众没有受到良好的宗教教育,圣职人员在多方面受了世俗化的影响;比如,他们忽略了“必须居住在自己教区”的规定,忽略了各种牧灵任务,没有遵守独身原则,而教会的长上(波希米亚的主教多是德国人)过着一个引起批评和抱怨的生活。一些人在波希米亚也针对宗座和圣统制采取一种很自信的、独立的态度。在另一方面,一些人也愿意诚心地推动一些改革。这种改革的支持者主要是奥古斯丁会圣职团的成员和一些 Carthusii(加尔都西会会士),这些人的灵修与荷兰的 devotio moderna(现代灵修,参见 151.3a)很相似。然而,这些改革的努力没有影响广大群众。在 1350 年后,一些改革讲道家非常尖锐地抨击波希米亚教会的问题,但他们始终没有离开公教会的共同基础。这些人是奥古斯丁会会士 Conradus de Waldhausen(康拉德,1369 年去世),以及 Praga(布拉格)圣职团的成员 Milic de Kremsier(米里基,1373 年去世)和 Mathias de Janow(玛迪亚,1394 年去世)。然而,在教导方面远远超过他们的人是 Jan Hus(= Johannes Huss 约翰内斯·胡斯),他在布拉格大学当哲学教师(1396 年),并在当地的 Bethlehems-kapelle(白冷城/伯利恒教堂)当一个讲道师(1402 年)。他来自平民家庭,通过个人的努力一步一步地获得了比较高的地位,个人生活很廉洁,纪律严格,具有良好的口才,有自信心和情感化的倾向。他意识到波希米亚人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开始反抗德国的影响,而他热烈地支持自己民族的奋斗。他不仅仅激烈抨击教会的缺陷和圣职人员的罪行,而且似乎也完全接受了 Wycliffe(威克里夫)的教导。布拉格大学和牛津大学本来就有很多来往,而在 1382 年,英国的 Richard II(理查德二世)和波希米亚王 Wenzeslaus(文策老)的妹妹 Anna de Luxemburg(亚纳)结婚,所以英国和波希米亚的关系更密切,而 Wycliffe(威克里夫)的主张很早就已传到波希米亚。Hus(胡斯)的观点也完全依赖于 Wycliffe(威克里夫)的主张,只是在感恩祭理论方面,他保持“体变”(“本体上的变化”)的传统观点。Hus(胡斯)认为,讲道比任何圣事都重要,又说圣事的效力取决于施行圣事人的圣德(这一点和 Wycliffe 威克里夫不同)。虽然如此,Hus(胡斯)始终说他从来没有离开大公教会的正统信仰。

148.2 虽然他的主张不符合真理和正义的原则,但 Hus(胡斯)依然很勇敢地 and 热切地宣传了 Wycliffe(威克里夫)的教导;不久后,他也遇到抵抗和反驳。Carolus IV(查理四世)于 1348 年在 Praga(布拉格)建立的大学——大部分的教师

当时仍然是德国人——于1403年谴责了Wycliffe(威克里夫)的45条命题,其中包括伦敦会议谴责的24条(参见147.2)。虽然如此,Hus(胡斯)的宣传在波希米亚人中的煽动活动继续进行,对Wenceslaus(文策老)王也有所影响。他于1409年彻底地改变了布拉格大学的校规:原来的投票制度是每一个民族(萨克森人、巴伐利亚人、波兰人和波希米亚人)都有一票,现在三票属于波希米亚人,一票属于外地人。德国人的反对是无效的。当时大约有1000个教师和学生一起离开了布拉格大学并在Leipzig(莱比锡)建立了莱比锡大学(1409-1410年)。布拉格的总主教Sbinko(斯宾克)想控制这个运动,所以他下令烧毁Wycliffe(威克里夫)的部分著作,禁止人们在教堂以外讲道,又绝罚了Hus(胡斯)和他的朋友(1410年),并于1411年对于Praga(布拉格)宣布了interdictum(“禁罚”)的禁令。然而,这些措施的效果并不大。当时,Pisa(比萨)的教宗Johannes XXIII(约翰内斯二十三世)需要抵抗Neapolis(那不勒斯)王Ladislaus(拉迪斯劳,参见142.1),所以他在波希米亚也宣布了一个“十字军大赦”,希望波希米亚人会支持他。此时,Hus(胡斯)和他的追随者激烈地反对教宗有关的诏书,而因此在布拉格暴发了一些暴动。某一个Wok von Waldstein(沃克)率领一些暴民在布拉格烧毁了教宗的诏书。因此,教宗向Hus(胡斯)郑重地宣布了绝罚,又向他的居住地宣布“禁令”(1412年)。Hus(胡斯)向一个大公会议申诉,又向“最高的审判者”——基督——申诉。他被迫离开布拉格,但一个贵族支持者在Austie(奥斯迪)附近庇护他。波希米亚人民一群一群地去那个地方,要求见到他。当时Hus(胡斯)编写他的主要著作*De ecclesia*(《论教会》),其中在很多方面引用了Wycliffe(威克里夫)同名著作的内容。Hus(胡斯)在其中说,如果一些教会长上或世俗长上违背“基督的法律”,他们的权力是不正义的,而任何人都应该抵抗他们的命令。他又说,没有任何犯重罪(“死罪”)的人可以当教会长上或世俗长上。根据他的看法,教会的“绝罚”和教会的其他惩罚不符合基督的精神。不久后,Hus(胡斯)的派别在波希米亚似乎完全占了上风。

148.3 一个民族似乎完全脱离了传统的教会团体——这个现象深深地震撼了欧洲人的合一意识。在Constantia(康斯坦茨)会议上(参见142),国王Wenceslaus(文策老)的弟兄Sigmund(西格蒙德)皇帝——未来的波希米亚统治者——非常努力地想解决波希米亚教会的分裂。他邀请Hus(胡斯)去Constantia(康斯坦茨)会议并为他写了一封“保证安全的信”(Geleitsbrief)。因此,Hus(胡斯)早于1414年

11月初就来到 Constantia(康斯坦茨),他希望他的主张被接受为正统的信仰,又想影响那些参与会议的人接受他的观点。因为他是被绝罚的人,但仍然举行弥撒、讲道,又因为他在 Constantia(康斯坦茨)的波希米亚对手反对他,所以他被捕入狱,并遭受一些相当严厉的折磨,虽然 Sigmund(西格蒙德)皇帝提出反对。会议在 1415 年 5 月 4 日的第 8 次大会中又谴责了 Wycliffe(威克里夫)那 45 条命题,这就意味着 Hus(胡斯)将会受同样的审判。然而,因为他拒绝收回任何主张,在第 15 次的大会中(1415 年 7 月 6 日)被审判为“顽固不化的异端者”,他的圣职身份被撤销,他被交给世俗的权力,在同一天被烧死。他很勇敢地面对死亡,临终作虔诚的祈祷。他的朋友和支持者, Hieronymus de Praga(布拉格的热罗尼莫)教师在 1416 年 5 月 30 日也同样被处以死刑——他没有著作,以粗暴的方式在波希米亚、匈牙利和奥地利地区传播 Hus(胡斯)的教导。这个人原来在 Constantia(康斯坦茨)收回了他的主张,但后来又肯定了原来的观点。

皇帝 Sigmund(西格蒙德)给 Hus(胡斯)写的“保证安全信”曾经引起过很多讨论。实际上,这封信只有政治上的意义,没有严格法律效果,所以它似乎等于只是一种“通行证”或“护照”。其中提到的“自由地回家”(libere redire)也曾经被理解为一种形式化的套语。除此之外,皇帝还在口头上向 Hus(胡斯)许诺被听审的权利,而如果他不接受会议的审判,他还有自由回家的权利(根据 Hus 胡斯的说法,皇帝确实作了这些许诺)。然而,皇帝的许诺无法保护 Hus(胡斯)不受教会的合法措施。因此,该大会议也在皇帝面前强调自己的权利,他们在第 19 次会议(1415 年 9 月 23 日)也作出这方面的声明。另一方面,皇帝无法采取很严厉的措施,否则他会威胁该会议的主要目标:恢复基督宗教世界的合一。

148.4 虽然 Hus(胡斯)的处死也许根据当时的教会法律和世俗法律是无可指责的,但在波希米亚的人感觉到这种审判是一个国耻,所以引起了很大的混乱。那些不支持 Hus(胡斯)的圣职人员大部分被驱逐,而 Praga(布拉格)的总主教 Conradus(孔拉德)自己也受到威胁。波希米亚的女王 Sophia(苏斐亚)和另一些贵族女士公开支持 Hus(胡斯),称他是国家英雄和殉道士。似乎所有的波希米亚贵族人士都支持向 Constantia(康斯坦茨)写的公开信,其中肯定 Hus(胡斯)的信仰是正统的信仰,认为“波希米亚异端”的说法完全是谎言和“地狱的产物”。同时,他们形成一个贵族联合会(Herrenbund),其目标是确保讲道的自由、不受主教权力的干扰以及不受不公平的绝罚。在此之前,布拉格的教师和司铎 Jacobus de Mies(雅各

伯,因为身材不高被称为 Jacobellus“小雅各”)以及另一些司铎已经允许了平信徒接受圣爵(即喝基督的圣血),而这个“平信徒接受圣爵”的因素现在成为 Hus(胡斯)派普遍施用的象征。国王 Wenceslaus(文策老)和以前一样没有认真地抵抗这个运动,而那个组织起来的“公教贵族联盟”也没有什么影响力。因此,胡斯派在几年的时间内就掌握了整个地区。最后,Sigmund(西格蒙德)皇帝和 Martinus V(马尔提努斯五世)教宗劝勉 Wenceslaus(文策老)王采取一些措施,所以他开始反对 Hus(胡斯)派的领导,于 1419 年恢复了那些被驱逐的公教圣职人员的地位,但这就引起叛乱。借 1419 年 7 月 30 日的一次“圣爵游行”的机会,两个骑士(Nicolaus de Pistna 和 Johannes Zizka)在 Praga - Neustadt(布拉格 - 新城)率领了一群人将 7 位布拉格议会会员从市政厅的窗口扔出去,这样杀死了他们。国王 Wenceslaus(文策老)感到很激动并因此中风,并于 1419 年 8 月 16 日去世。Sigmund(西格蒙德)皇帝是他的继承人,他于 1420 年 7 月底在布拉格被加冕为国王,但胡斯派的人不接受他,因为他们说他是一个没有信用的人,是胡斯的杀手。从此开始了那些可怕的胡斯战争(1420 年 - 1431 年)。Martinus V(马尔提努斯五世)的一个诏书于 1420 年呼吁人们共同镇压那些叛乱者,但这反过来更刺激了他们的宗教狂热和爱国热忱。那个极端的胡斯派在 Tabor(塔伯尔)建立一个新的城市,所以他们也被称为 Taboriti(塔伯尔派)。他们的军事领导是那位具有才华的 Zizka(西斯卡,1424 年去世),所以他们能够打退皇帝的军队。与他们不同,布拉格的居民,大学中的学者和贵族们的态度就没有那么极端了,他们被称为 Utraquistae(双形派)或 Calixtines(圣爵派),因为他们继续要求“以双种形式接受圣体”(拉丁语:sub utraque specie)。这些“双形派”的人愿意和教会及国王达成共识。然而,“塔伯尔派”的极端要求远远超过 Wycliffe(威克里夫)和 Hus(胡斯)的任何主张。他们不仅放弃了一切在《圣经》中没有根据的教会习惯、圣事和节日,而且部分上甚至期待了一种“末日的状态”,他们想取消任何阶级的差异,想取消任何隶属关系。无论他们占领什么地区,他们就颠覆整个教会和社会秩序,他们残暴地毁灭了很多教堂和隐修院,残酷地杀害了很多司铎、修士和修女,称他们为“神圣法律的敌人”。波希米亚的教产大多都落入贵族们的手里。自从 1427 年,这些“塔伯尔派”人在那个严厉的(原来当过公教司铎的)Andreas Prokop(普罗克普)的率领下甚至开始攻击别的地区,他们在匈牙利、奥地利、西里西亚、巴伐利亚、萨克森等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侵袭,烧杀无数无辜的人。他们的暴徒甚至到达了北海。

148.5 作为特使的 Cesarini(切撒瑞尼)枢机在 1431 年 8 月率领了一个十字军军队到波希米亚,但皇帝的士兵在 Taus(陶斯)逃跑了,所以皇帝和教会的领导意识到,他们无法通过武力克服 Hus(胡斯)派,所以要和他们进行谈判。实际上,波希米亚的这些革命者(胡斯派)仅仅对外面保持团结,但在内部也互相残杀。在 Basileia(巴塞尔)举行的大会(143.1)邀请他们来,所以于 1433 年初有 15 位代表(他们代表不同的胡斯派)和他们的随从来到 Basileia(巴塞尔)。他们的主要人物是神学家 Johannes de Rokycana(若克扎纳),他原来是布拉格 Teynkirche(特恩教堂)的司铎,代表 Utraquistae(“双形派”)的温和立场;Prokop(普罗克普)是极端派的将军,而 Nicolaus de Pilgram(尼苛劳/尼哥拉)是 Taboritae(“塔伯尔派”)的主教。他们的要求与 1420 年在 *Articuli Pragenses*(布拉格条例)中提出的四个要求是一样的:他们要求(1)自由讲道的权利,(2)平信徒可以从圣爵中领受圣血,(3)圣职人员不可以有世俗的权力或财产,(4)一切重罪和违背“神圣法律”的行动应该受惩罚。在一些讲演和没有结果的辩论后,双方在布拉格继续这些谈判,并在 1433 年 11 月 30 日在 *Compactatae Pragenses*(《布拉格条约》)中终于签订了一个共同的规定。那四个要求也被允许,但有所限制:平信徒可以接受圣爵,但需要司铎们教导信徒说,基督在圣体和圣血中都完整地临在。自由的讲道权利只给予那些有能力的,并且被批准的司铎。重罪的惩罚(尤其是公开被知道的重罪)需要通过合法的长上,不可以进行私人的惩罚。圣职人员可以有财产,但应该按照教父们的原则管理它们。那些“塔伯尔派”的人不愿意接受这种条约,而“双形派”和大公教会的军队一起在 Lipan(里盘)毁灭了极端派的军队(1434 年 5 月)。他们的领导 Prokop(普罗克普)阵亡。在 Iglau(伊格劳)的全国会议(1436 年)承认并宣布《布拉格条约》并肯定 Sigmund(西格蒙德)为波希米亚之王。

148.6 在那次和平条约后,“Husiti”(胡斯派)这个称呼逐渐消失。那些接受圣爵的平信徒被称为 Calixtines(圣爵派)或 Utraquistae(双形派),其他生活在波希米亚的公教徒被称为 Subunistae(准合一的)或 Unistae(合一的)。然而,该国的教会情况在很长的时期内不太明朗。那位“双形派”的 Rokycana(若克扎纳,1471 年去世)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讲演家和爱国人士,而国会的会议于 1435 年选择他为布拉格总主教,但教宗始终没有肯定他。伟大的方济各会讲道家 Johannes de Capestrano(约翰内斯,参见 156.3)在 1451 年和 1454 年回应 Fredericus III(腓特烈三世)皇帝的邀请,在摩拉维亚和波希米亚地区进行一种针对胡斯派的民众宣讲活动

(Husitenmission),但他获得的效果不太大。波希米亚的国王 Georg Podiebrad(波迪布拉德,1458 - 1471 年)原来是一个胡斯派领导,而 Paulus II(保禄/保罗二世)教宗于 1466 年宣布他为一个顽固的异端者,弹劾他并向他发动了十字军运动。只有 1485 年在 Kutteneberg(库滕贝格)的和平条约中才恢复了外在的和平。部分的原来属于胡斯派的人不满足于“平信徒接受圣爵”的规定,他们脱离了“双形派”的国教并寻求新的教宗生活形式,其中最有名的是 Peter Chelcizki(海尔奇茨基),他是一个富有的农夫并要求一种宁静无社交的生活,只允许耕种和手工业,要求一个贫穷的教会和最朴素的礼仪,严格的纪律,与世俗的权力不要有关系;他放弃誓言,反对死刑、兵役、任公职等。Rokycana(若克扎纳)的一个侄子,名为 Gregor(额我略/贵格利)领导这些有共同愿望的信徒,他们于 1458 年在波希米亚东部的森林地区定居。在那里他们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派别,就是所谓的波希米亚弟兄会或 Unitas fratrum(弟兄会)。通过一个 Waldo(瓦尔多)派的司铎,他们祝圣了自己的司铎。虽然“双形派”和公教会都镇压和迫害他们,但他们依然能够继续生存并自从 15 世纪末以来(1494 年在 Reichenau 赖兴瑙的会议)放弃了他们“脱离社会”的态度。他们开始比较积极地面对社会、国度和科学。他们甚至特别培养了当时刚刚兴起的印刷技术,这样传播了他们的精神。由于波希米亚在 Schmalkald(施马尔卡德)战争中的态度,他们中有很多人被迫移民到波兰(1548 年),其他的与路德派合并,形成 Confessio Bohemica(波希米亚教会,1575 年)。在“白山交战”后(1621 年),波希米亚的公教化(Rekatholisierung)很严格地被落实,而 Ferdinandus II(菲迪南二世)皇帝的敕令(Restitutionsedict,1629 年)也禁止公教徒接受“双形”的圣体。然而,Hus(胡斯)的精神在波希米亚地区从来没有完全消失。

149

15 世纪的一些反教会改革者

149.1 来自 Goch(高贺)的荷兰人 Johannes Pupper(约翰内斯·普佩尔,1475 年去世)曾经在弟兄会(Fraterherren)和在巴黎学习,他作过 Mecheln(梅希恩)附近的 Thabor(塔伯尔)奥古斯丁修女会团体的导师。他认为,只有那些可以根据《圣经》文献证明的宗教真理才是可取的。另外,他还反对那种“隐修者发圣愿有特殊

功劳”的说法,但他又不想取缔修道人的生活。在他的神学思想中,受 Augustinus (奥古斯丁)的影响最多。主要著作有 *De libertate christiana* (《论基督徒的自由》) 和 *Dialogus de quattuor erroribus circa legem evangelicam exortis* (《对话关于四种来自福音规律的错误》)。

149.2 那位来自 Ober - Wesel (维塞尔) 的 Johannes Ruchrat (约翰内斯·儒克拉特, 1481 年去世) 是一个具有人文主义修养的且著名的哲学和神学教授, 他在 Erfurt (爱尔福特) 大学任教, 后来 (1463 - 1477 年) 在 Worms (沃尔姆斯) 大堂当讲道师。他比 Goch (高贺) 的 Johannes (约翰内斯) 更坚定地反对一切《圣经》以外的因素 (所谓的 Schriftprinzip《圣经》原则) 并认为“大赦”违背《圣经》的精神, 说“大赦”只是一种“虔诚的欺骗” (参见他 1475 年的 *Disputatio adversus indulgentias*《反驳大赦的论文》)——这种说法早在 13 世纪已经有。他还认为, 教宗不能命令人参与一些“犯重罪的行动”, 他反驳“原罪”, 反对“终傅”的“圣事”特征等。Worms (沃尔姆斯) 的主教罢免他 (1477 年), 后来他在 Mainz (美因茨) 当大堂司铎, 但因为他和 Hus (胡斯) 派的人有一些可疑的关系, 所以宗教裁判所审问了他。他收回了他的主张, 被判一生再不能离开奥古斯丁隐修院, 两年后在 Mainz (美因茨) 去世。

149.3 另一个改革者是一位平信徒, 即 Wessel Gansfort (甘斯福特, 1489 年去世), 他来自 Groningen (格若宁根), 曾经是 Zwolle (泽沃勒) 的弟兄会的学生, 先研究和主张“实在论” (Realismus), 后来转向 Nominalismus (唯名论), 在 Colonia (科隆)、Heidelberg (海德堡)、巴黎和其他的大学任教, 自从 1474 年一直到死他都生活在他的家乡, 在隐修院和人文主义的朋友圈子享受生活, 而没有人骚扰他。那些崇拜他的人称他为 Lux mundi (“世界之光”), 但属于别的学派的人称他是 Magister contradictionum (“悖论的导师”)。Luther (路德) 认为, Gansfort (甘斯福特) 的著作反映出他自己的精神 (参见 *Farrago*《法拉格》, 1522 年由路德出版, *Mare magnum*《大海》, *Scala meditationum*《种种默想》)。实际上, Gansfort (甘斯福特) 确实怀疑大公会议的无错误性, 反驳了教会的立法权和司法权, 他认为一切信徒有一种特殊的“钥匙权”, 并说“大赦”只能赦免教会法上的惩罚, 但无法影响来世的生活。然而, 在“成义论”和在一些其他的重要观点上, 他和 Goch (高贺) 的 Johannes (约翰内斯) 和 Wesel (维塞尔) 的 Johannes (约翰内斯) 一样, 仍然拥护公教的观点。因此, 这三个人也不能称为名副其实的“宗教改革之前的改革者”。

中世纪的犹太人和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

150.1 在基督宗教的社会和基督宗教国度中,犹太人是一个陌生的、无法同化的因素。他们被视为一种“敌对的民族”,他们的宗教被称为“错误的、亵渎神的教导”。自从 Constantinus Magnus(君士坦丁大帝)以来,历代的基督徒皇帝都通过一些法律限制犹太人的权利,比如禁止他们有基督徒奴隶或与基督徒妇女结婚(参见 Constantius 君士坦提乌斯,339年),禁止他们当兵(Honorius 霍诺利乌斯,404年),禁止他们获得任何公共职位(Theodosius II 狄奥多修斯,438年)。他们都被允许皈依基督信仰,但很少有犹太人真正在内心上皈依了基督信仰。Justinianus(尤斯提尼安)皇帝肯定和部分上强化了前几任皇帝的反犹太人法律,而他的法典在整个中世纪和后来都被视为标准。人们一般容忍犹太人,但他们没有享受充分的法律权利,他们是一个“应该永远当仆人”的民族——这是很多主教会议和教宗文献的说法。他们被迫穿一种特殊的衣服,这样能认出他们是犹太人,而在欧洲南部的城市里,他们必须生活一些隔开的“犹太区”(Ghetto),他们不能有基督徒为仆人,在法院中不能反对基督徒作证,不能任职等等。在德国也一样,人们感觉到犹太人是一种外来的团体,必须根据格尔曼/日耳曼人的“外地人法律规定”对待他们。在 Staufer(施陶费尔)皇帝的时期(1150 - 1250年),犹太人被称为国王的“财政管家”(Kammerknechte),而德国国王向他们收税,因此保护他们。犹太人在中世纪经常是商人,他们是银行家,提供贷款的机会(有时候他们借钱放高利贷)——基督徒被禁止进行贷款(参见 102.2)——所以很多犹太人获得大量财富和影响力。因为犹太人多次放高利贷——这是主要的原因——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进行迫害犹太人运动,尤其在十字军运动的时期。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十字军运动中(1095 - 1095年和 1146 - 1147年),那些无秩序的暴民打死了很多犹太人,称他们为“杀害基督的人”。圣 Bernardus(伯尔纳德)和不同的教宗从 12 世纪到 16 世纪间都反对对犹太人的镇压,说不能以武力或直接用道义上的强制手段(direkter moralischer Zwang, 如恐吓)来强迫犹太人接受圣洗,但他们的声音有时候没有被听从。在个别的地区,犹太人被驱逐,但他们在很多情况下仍然回到原来的城市去。在“黑死病”的时

代,犹太人遭受很严重的歧视。当时(1348 - 1350 年),鼠疫(indische Beulenpest 印度鼠疫)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杀害了许多居民。犹太人被控诉为通过“井内放毒”而引起了这个传染病。因此,在德国南部,从 Alsatia(阿尔萨斯)到 Austria(奥地利)地区都有成千上万个犹太人被杀,很多被烧死。自从 12 到 15 世纪,个别犹太人被怀疑侮辱十字架,以及亵渎圣饼或在一些残酷的礼仪中杀害基督徒的孩子(血迷信),而个别的人因这些控告在法庭中被审判,处以死刑。自从 13 世纪,人们也很坚定地搜查犹太人的 Talmud(塔木德)和其他的犹太人的书籍,认为这些是“反基督宗教的”(参见 155.4)。人文主义运动和(更多)启蒙运动带来了犹太人的解放和他们在经济上的充分发展。

150.2 在西班牙地区,犹太人的情况特别艰难。在那里的犹太人特别多,而因他们那种“不顾及别人的发财心理”,当地的人特别恨他们。西哥特的国王在第 7 世纪想用强大的压力来强迫犹太人皈依基督信仰。在穆斯林的统治下(参见 84.1),犹太人的情况相当好;很多犹太人发了财,在社会上有高的地位。在 Cordoba(科多巴)和其他的城市中有很多犹太人学者和学校,可以与阿拉伯学术界媲美。然而,在 1391 年的 Castilia(卡斯蒂里亚)、Aragon(阿拉贡)和 Catalonia(加泰罗尼亚)暴发了一次广泛迫害犹太人的运动,在很多情况中,当时的犹太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接受洗礼,要么死亡。那些被强迫受洗的人被称为 Marranos(“新基督徒”),但在他们当中很少有一种诚心的、完善的归化。外在的压力一旦减轻,他们中有很多人马上放弃基督宗教,而回到祖先的宗教中去,部分上是悄悄的,部分上公开的这样做。当然也有很多犹太人通过和平的方式找到了基督信仰。在犹太人中间一位很成功的传教士是道明会会士圣 Vincentius Ferrer(味增爵·费瑞尔,1350 - 1419 年)。他是中世纪晚期最伟大的讲道家之一,曾经在他的家乡西班牙,而且也在法国、意大利北部、Savoy(萨伏伊)及瑞士地区进行布道和宣讲活动,几次也率领了一些“补赎鞭策游行者”(参见 152.3)。他在教会大分裂时也参与了教会政治,曾经支持 Avignon(阿维尼翁)的教宗们(参见 141.2; 142.3)。

150.3 那些仅仅在表面上皈依基督信仰的犹太人在西班牙社会上发挥很不好的作用,他们任职,获得很高的地位,有的甚至成为主教。这种现象在 15 世纪下半叶引起强烈的民族性的和宗教性的反弹。在 1473 年暴发了一次反对贵族和 Marranos(“皈依基督的犹太人”)的暴乱,其中有很多人被杀。此后,那些自称为 Catholici(意思是“共同的”)统治者,即 Isabella de Castilia(卡斯蒂里亚的伊莎贝

拉)和 Ferdinandus de Aragon(阿拉贡的斐迪南)一起决定要恢复“宗教裁判所”——在当时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似乎已经完全消失了。这些统治者想利用宗教裁判所来对付王家和教会的危险敌人。在 1478 年, Sixtus IV(西克斯图斯四世)同意建立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所以这个机构被重新建立,首先在 Sevilla(塞维利亚, 1480 年)。因为西班牙政府提出这样的要求,教宗于 1483 年提名一个“宗教裁判所总法官”,就是道明会会士 Thomas Torquemada(托尔克马达),这样该机构才成为一个全国统一的、严格中央化的组织。然而,这个机构也没有兑现人们对于它的期待。罗马的宗座很早(最早 1482 年)就谴责了他们的作法,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个制度太严格,后来还多次批评他们。西班牙的 Marranos(马拉诺)的一次阴谋针对 Aragonia(阿拉贡)的裁判所总法官——奥古斯丁圣职团员 Petrus Arbues(阿尔布斯)。他于 1485 年在 Zaragoza(= Caesaraugusta, 萨拉格撒)的教堂被伤害,此后去世(1867 年被列为圣人)。因此, Ferdinandus(斐迪南)和 Isabella(伊莎贝拉)于 1492 年规定要从他们的领土驱逐一切不愿意受洗的犹太人,于 1502 年又驱逐一切穆斯林。他们想驱逐一切属于别的民族或属于别的宗教的人,这样要逐渐形成他们王朝的极权统治(Absolutismus der Krone)。葡萄牙王 Manuel(马努尔/曼努埃尔, 1495 - 1521 年)也于 1497 年宣布了一个驱逐犹太人的法令。基督徒夺取了很多犹太人的孩子并给他们施洗。然而,这些措施都没有获得很决定性的成功。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后来还很长时间面对那些皈依基督宗教但暗地支持犹太教的 Marranos(马拉诺)人,以及那些表面上皈依的穆斯林(被称为 Moriscos)。在后来的时期,有的人也想在西班牙宣传新教,而宗教裁判所也曾经想阻碍那些尝试。虽然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法院在很多方面受统治者的影响,又多次被政治目标利用和滥用,但在本质上它仍然是教会的机构,因为国王提名了“总法官”,罗马教宗确认他的地位,又授予他种种权利,而这个“总法官”可以任命其他的官员。也许可以称这种机构为一个“混合性的,但主要有教会特色的制度”。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都涉及到一些严重的缺陷和太过分的严格表现,而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尤其如此;但是,近代的部分历史学家有“谴责教会”的倾向,所以他们夸大地描述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种种残酷行动”,也夸大了受害者的人数。当时所举行的 Auto da Fe(从拉丁语 Actus fidei“信仰的事件”)并不是处死人的活动,而是审判的隆重宣布,这也许意味着将被告宣布无罪或(在顽固不化的或再次肯定异端的人那里)宣布一个人要交给世俗权力,因为他将要受死刑。最后一次死刑履行于 1781 年的 Sevilla(塞

维亚)。

151

修会团体:衰落、改革、新的团体

151.1 中世纪晚期的教会生活在相当的程度上处于一种衰退的情况,而修会生活也一样。那些比较早创立的修会团体已经很少能完成它们原来的任务了。一般来说,Carthusii(加都西会)和 Cistercienses(熙笃会)的生活和工作仍然保持原来的精神。隐修院的财富逐渐增多,那种带来灾难的 commenda(教产转让)制度,种种战争和祸害都造成纪律的松懈、宗教追求和教育努力的降低。修道的人不愿意很严格地遵守修会的会规,他们有一些实际上取消会规效力的习惯、豁免或特权。尤其那种 praebenda(隐修院地产)的分配习惯越来越普遍:院长和会士们以一种“有固定收入的教产”的方式分配隐修院的财产。很多古老的本笃会隐修院,比如 St. Gallen(圣伽伦)、Fulda(富尔达)、Reichenau(赖兴瑙)、Ellwangen(厄尔万根)等有灿烂的历史,但后来陷落,成为贵族人士的美好家园(Versorgungsanstalten des Adels),而其中的修道人享受了一种很自由的生活,与世俗贵族人士一样。在很多圣职团修会也没有强烈的修道精神,而那些仍然很“年轻的”托钵会修会早在13世纪末已经失去了原先的高度水平。虽然修会会规禁止他们有个人财产,但这个禁令多次被忽略。托钵修会的会士多次与教区司铎发生冲突,因为他们争夺牧灵工作的权利,这一点也有很不好的后果(参见128.2)。

在 Franciscani(方济各会)那里,“神贫问题”引起的麻烦争论(参见129.3)仍然没有得到妥当的解决。教宗 Bonifatius VIII(博尼法奇乌斯八世)取消了方济各会“灵性派”与 Coelestini(切来斯丁隐修会)的关系,他想重新恢复方济各会的合一,但一些不满意的人很激烈反对他——在这些极端的人中间越来越多有一种“宣传极端-形成教派的精神”(schwaermerisch-sektiererischer Geist,参见131.1)。Clemens V(克雷孟五世)在 Vienne(维恩)的主教会议上(1312年5月)通过 *Exivi de paradiso*(《我从乐园走出来》)诏书再一次解释了那些棘手的问题(他更多支持严格派),并于1314年绝罚那些不服从的会士。Johannes XXII(约翰内斯二十二世)也非常严格地对付了那些“灵性派”的人。在 Marseille(马赛)的宗教裁判所于

1318年烧死了四位不服从的方济各会“灵性派”的人。在意大利有一部分极端的方济各会会士脱离了修会并以 Fraticelli(“弟兄小组”,或称 Bizochi)的名称成为一个异端团体。Johannes XXII(约翰内斯二十二世)甚至和那些温和派的人都有冲突,因为他与他们争论基督的贫穷(所谓的“贫穷的理论性争论”theoretischer Armutsstreit)。方济各会的大会1322年在 Perugia(佩鲁贾)隆重地宣布:“如果说基督和宗徒/使徒们都没有财产——无论是个人的财产或团体的财产——这就是公教会的健全教导。”因此,小兄弟会(方济各会)追求完美的生活就需要符合这种标准。然而,Johannes(约翰内斯)教宗于1323年11月在他的 *Cum inter nonnullos*(《当一些人》)诏书中宣布方济各会那种说法是“异端的”。这就引起修会内的巨大动荡。修会的总会长 Michael de Cesena(弥格尔·切色纳),来自 Bergamo(贝加莫)的 Bonagratia(博纳格拉提亚)弟兄、Wilhelmus de Occam(奥康)等人都转向 Ludovicus Bavarus(路易)皇帝的派别,他们从此以后非常尖锐地谴责了教宗,称他为“异端人士”。有的人于1328年在罗马拥立一位方济各会会士为对立教宗(Nicolaus V 尼苛劳五世,参见139.3)。修会中的种种矛盾逐渐导致了修会的分裂。法国的 observantes(“遵守会规者”,全名 Fratres regularis observantiae)通过 Constantia(康斯坦茨)会议的规定(1415年)获得了某种独立性,而西班牙的 observantes(方济各会)稍后也成为独立的团体,他们有权利自己选择自己的总会长(Generalvikar)。教宗 Leo X(良十世)于1517年最终分开了这两个团体,他的诏书 *Ite et vos in vineam*(《你们也去到葡萄园里》)允许两个方济各会团体的形成,即所谓的 observantes(“方济各守规会”)和 conventuales(“方济各住院会”)。

在 Carmelitae(加尔默罗会)中也存在着一个比较严格的派和一个温和的派。在教会大分裂的时期(14世纪末,15世纪初),很多修会被分裂为两个派别,加尔默罗会也一样。因为部分的隐修院拒绝接受 Eugenius IV(尤金尼乌斯四世)于1431年对会规作的缓和性修改,这个修会从此以后也分为 observantes(守规会)和 conventuales(住院会)。

因为西方的十字军失去了以色列圣地,那些骑士团的主要目标也没有实现——它们被创立的主要目的是照顾在巴勒斯坦的朝圣者和十字军。然而,它们在西欧还能完成很多任务。因为“圣殿骑士团”和“圣约翰内斯骑士团”之间的冲突在巴勒斯坦造成不良的影响,在13世纪末的岁月里有一些人想结合这两个骑士团。然而,由于法国 Philippus(菲利普)王的贪污和残暴,圣殿骑士团早在14世纪

初走向悲剧性的没落(参见 138.2)。这个骑士团的财产部分落入贵族人的手,部分归于“圣约翰内斯骑士团”。在西班牙地区,这些财产交给当地的小型骑士团,而在葡萄牙,圣殿团的财产被利用为创立一个新的骑士团,即 Milita Jesu Christi(“基督的骑士团”)。自从 1310 年以来,约翰内斯骑士团的主要基地是 Rhodus(罗得)岛,因此他们也被称为 Rhodiser(罗得会)。这个骑士团在后来的 200 年间为西方提供了宝贵的服务,因为西欧面临了土耳其人的威胁。在 1522 年,苏丹 Soliman II(苏里曼二世)在英勇的抵抗后终于驱逐了约翰内斯骑士团,所以在 1530 年到 1798 年间他们的总部搬到 Malta(马耳他)岛,因此他们又被称 Malteser - Ritter(“马耳他骑士团”)。后来的宗教改革和 18 世纪末的世俗化(充公运动)为这个修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它在今天仅仅保存了很小一部分的财产和影响力。

151.2 很多人哀叹大部分隐修院纪律的下降,所以在 14、15 世纪也出现了很多改革运动和提高水平的努力,这些努力在个别的地方获得了成功,但从整体来看,它们不够彻底,维持的时间也不够长。教宗 Benedictus XII(本笃十二世)曾是 Cistercienses(熙笃会)会士,他热切地投入于提高熙笃会(1335 年)以及奥古斯丁会(1339 年)的水平。另外,他于 1336 年(通过一个规定,即所谓的 Benedicta)将本笃会分为 36 个会区,又规定本笃会必须要举行一些大会、区会、视察等等。在 15 世纪,一些本笃会的隐修院的联合形成了一些“改革联会”(Reformkongregationen),它们重新开始要求修士们种地,再次恢复了古代的严格精神。比如,来自意大利 Venetia(威尼斯)贵族的 Ludovico Barbo(路易·巴伯)院长在 Padua(帕多瓦)于 1412 年创立了 St. Justina(圣尤斯提纳)会,而西班牙的 Valladolid(巴利阿多里德)本笃会联会就根据这个模式形成(1450 年创立)。西班牙政府于 1504 年命令似乎所有的西班牙隐修院都得加入 Valladolid(巴利阿多里德)的联会。在德国地区,最早的“改革联会”是 1404 年在 Oberpfalz(上法耳斯)的 Kastl(卡斯特)创立的本笃会联会,后来有很多巴伐利亚隐修院加入了它。在 Constantia(康斯坦茨)的会议上,人们又推动本笃会隐修院的改革,在这方面提出很多意见[参见在 Petershausen(佩特斯豪森)于 1417 年举行的区会]。在奥地利、巴伐利亚和施瓦比亚地区, Melk(梅勒克)的联会(所谓的 Melker Union,1418 年后)很有影响。在德国的中北部,那位来自 Northeim(诺特海姆)的 Joh. Dederot(德德若特)院长和一些来自 Trier(特里尔)的 St. Matthias(圣马提亚斯)隐修院的修士于 1434 年恢复了 Bursfeld(布尔费德)隐修院(在 Goettingen 格丁根附近)。它成为一个具有良好影响的改革联

会的核心,这个联会于1469年已经包括36所隐修院,1517年包括94个隐修院(其中有Hirsau、Alpirsbach,还有另一些)。该联会一直存在到1803年。

在道明会那里,就改革而言最有贡献的人是总会长Raimundus de Capua(瑞孟多,1399年去世),他是一个神师和写圣Catharina de Siena(锡耶纳的加大利纳)传记的人(参见139.6)。在德国地区推动道明会改革的人士是:真福Conradus de Prussia(普鲁士的康拉德,1426年去世)、奥地利东北地区的Franciscus de Retz(瑞茨的方济各,1427年去世)——他是一位能干的讲道家和维也纳大学的神学家,以及施瓦比亚人Johannes Nider(尼德尔,参见146.3)。在方济各会中,Observantes(“守规会”)和他们的领导人也推动了类似的改革,尤其两位伟大的群众讲道家圣Bernardinus de Siena(锡耶纳的伯尔纳丁,1444年去世)——他传播了对耶稣圣名的敬拜——以及圣Johannes de Capestrano(卡佩斯塔诺的约翰内斯,1456年去世)——他30年之久在意大利推动了教会的改革和修会的革新,后来(1451-1456年)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奥地利、匈牙利传播反对Hus(胡斯)派和反对土耳其人的思想(参见148.6;156.3)。在德国也有几个公爵和伯爵愿意帮助在自己的领土中恢复隐修院中的良好纪律、消除弊端,比如Wuerttemberg(符滕堡)的伯爵Eberhard im Bart(艾伯哈特,1496年去世)。

151.3 在14、15世纪没有很多新创立的修会团体,而且那些新兴团体的影响力也远远不如以前的团体。

151.3a 在荷兰和德国相当有代表性的一个团体是那些**Fratres vitae communis** = **Fratres devoti**(共同生活弟兄会,德语称Fraterherren)。这个团体是Gerhard Groote(格劳特,1340-1384年)一生努力的成果,但没有一种清楚的“创立”年代。这个人本来在Utrecht(乌得勒支)和Aachen(亚琛)当圣职团团员,但于1374年改变自己的生活。他放弃了自己的财产,几年后进行默想和反省,被祝圣为执事,获得Utrecht(乌得勒支)主教的许可并热切地投入于忏悔讲道以及圣职和民众的宗教信仰复兴。因为某些人攻击他,他与一些志同道合的人退隐到自己的家乡Deventer(德文特尔),在那里进行祈祷、研究和教育。在Groote(格劳特)以后,他的朋友Florentius Radewijns(拉德温斯,1350-1400年),成为该团体的会长,将它组织起来,为它写了一部会规。这些弟兄通过自己的劳动挣得了生活费,尤其是通过抄写礼仪书和灵修书。别的地方的人也模仿了这个团体的组织,先在荷兰的Zwolle(泽沃勒),以及在德国的西北部。这些Fraterherren(弟兄)进行一些“群

众讲演”(Volksmissionen),培养了年轻的圣职人员,他们编写灵修书,又在他们的学校支持一种高尚的人文主义,因此有很大的贡献(参见 155.2)。正如他们的创始人 Groote(格劳特)与 Eckhart(艾克哈特)及比利时的伟大神秘神学家 Ruysbroeck(鲁伊斯布鲁克,参见 146.5)有关系(但他没有采纳这个神秘学家的一切看法);他的学生也同样培养了一种热心的,在神内获得安宁的灵修传统,就是所谓的 Devotio moderna(“现代灵修”)——这种灵修重视“跟随基督”以及一种很平衡的神秘主义思想。他们也已经作那种定期的、有方法的默想。Groote(格劳特)也曾经创立了这个弟兄会的女会,即 Sorores communis vitae(共同生活的姐妹会),她们的目标与 Beguines(贝居因会,参见 117.3)是相似的。

这个弟兄会的人根据他们的原则 extra religionem religiose vivere(“在修会以外过一个修道生活”)在一些房子中生活在一起并形成类似于修院的团体,但他们没有真正的“圣愿”。因为那些托钵会的会士经常攻击他们,弟兄会的人不久后接受了奥古斯丁会的会规,首先在 Zwolle(泽沃勒)附近的 Windesheim(温德斯海姆)隐修院(1387年)。这个修院变成了奥古斯丁会的改革联会的基地,它于 1430 年包括 37 所隐修院,于 1500 年包括 84 个男隐修院和 13 所女隐修院。这个奥古斯丁联合会中最著名的隐修院是在 Zwolle(泽沃勒)附近的 Agnetenberg(阿格内滕堡)的隐修院,真福 Thomas a Kempis(托马斯·肯璧斯)曾经在那里生活与工作(参见 146.5),他就是这种“新的灵修”的主要代表。在德国地区,教会长上 Johannes Busch(布施,约于 1450 年去世)在许多萨克森地区和图林根地区的奥古斯丁会隐修院中根据“共同生活弟兄会”的榜样进行改革。Wuerttemberg(符滕堡)的 Eberhard im Bart(艾伯哈德)伯爵于 1477 年邀请那些弟兄们来到他的地区,而这位伯爵和 Gabriel Biel(比尔,参见 145.4a)一起创立了几个弟兄会团体(在 Urach、Einsiedel bei Tuebingen 等地的 Kollegiatstifter“圣职团体”)。因为这些弟兄都戴一个黑帽子,人们称他们为 Fratres cullati(德语的 Gugelherren, Kappenherren)。然而,Leo X(良/利奥十世)教宗于 1516 年取消了符滕堡的团体,而其他的弟兄会团体在宗教改革的时期中也解体了。

151.3b 在 13 世纪已经有一种本笃会改革会,就是 Silvestrini(“森林会”),而意大利 Siena(锡耶纳)人 Bernhard Tolomei(托罗梅,1348 年去世)于 1313 年根据“森林会”的模样创立了他的 Olivetani(橄榄山会),他们的母院在 Siena(锡耶纳)附近的 Monte Oliveto(橄榄山)。该会的会院主要在意大利和西西里岛。与他们有关

系的女修会是罗马的 Oblatae de Tor de' Specchi(献女会),这个修女会是由圣 Francisca Romana(罗马的方济加,1440 年去世)和另一些罗马贵族女士创立的(1433 年),她们的主要目标是照顾穷人和办医院。

151.3c 在那个时期创立的平信徒弟兄会包括 Alexiani(阿雷克修弟兄会,亦称 Celliti 切利特, Lollardi 罗拉迪),他们在鼠疫的时候(1348/1349 年)在荷兰形成一个小组织为了照顾病人和埋葬死者。他们也在德国传开来了;教宗 Sixtus IV(西克斯图斯四世)命令他们接受奥古斯丁会会规(1472 年)。

真福 Johannes Colombini(科隆比尼,1367 年去世)在锡耶纳创立了另一个平信徒弟兄会,称 Jesuati(耶稣阿提会,1360 年),他们的目标也是照顾病人,原来用本笃会会规,后来接受奥古斯丁会会规。他们的主保是圣 Hieronymus(热罗尼莫/耶柔米),后来被称为“圣热罗尼莫的宗徒/使徒圣职人员”。因为他们失去了原来的精神, Clemens IX(克雷孟九世)于 1668 年取缔了这个团体。

四个独立的,第 14 世纪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形成的隐修团体也尊奉圣 Hieronymus(热罗尼莫/耶柔米)为主保,就是所谓的 Hieronymitae(热罗尼莫会)。他们接受了奥古斯丁会规。其中最重要的团体是 Petrus Ferdinandus Pecha(佩卡)——他曾经是 Castilia(卡斯蒂利亚)王的高官——约于 1370 年创立的隐修团体。这些“热罗尼莫会会士”注重牧灵和研究科学。西班牙的 Hieronymitae(热罗尼莫会)于 1835 年被国度取缔,但于 1926 年再次在 Segovia(色格维亚)附近的 Parral(帕拉尔)重新创立。最后的意大利团体于 1933 年由 Pius XI(比约十一世)取缔。

151.3d 瑞典的伟大女先知和改革者圣 Birgitta(布里吉特,1303 - 1373 年)创立了一个修女会,就是 Birgittines(布里吉特会)。Birgitta(布里吉特)来自瑞典贵族,她也许是整个北欧最伟大的妇女之一。她曾经和她的丈夫一起去西班牙 San Jago de Compostela(圣雅各)朝圣,而在他的丈夫去世后,她在瑞典的 Wadstena(瓦德斯特纳)创立了一个遵守奥古斯丁会规的修女院。因为 Birgitta(布里吉特)有这方面的“神视”,这个修女会特别注重基督的受难,所以她们也被称为“救世主会”。这个修会传播到整个斯堪的纳维亚以及部分的波兰、佛兰迪亚(比利时)和德国(巴伐利亚)地区,在宗教和文化上都发挥了良好的影响。这些修女会团体用特殊的比例接受平信徒弟兄、执事、和司铎隐修者(每一 60 个修女的团体中可以有 13 名司铎、4 名执事、8 名平信徒弟兄),这样她们的隐修院成为“男女共同修道的隐修

院”(参见 116. 2b)。在这些修院中,司铎们也必须服从院长修女。Birgitta(布里吉特)于 1349 - 1350 年去罗马朝圣,在那里过“大喜年”(参见 152. 2)从此没有再离开罗马城。她向教宗、各地君主和民族发出热切的或激烈的谴责和呼吁,她要求教廷应该从 Avignon(阿维尼翁)返回罗马(参见 139. 6)。在 Wadstena(瓦德斯特纳)的修女院,她的女儿 Catharina(加大利纳)当院长修女(1374 - 1381 年)。教宗 Bonifatius IX(博尼法奇乌斯九世)于 1391 年宣布 Birgitta(布里吉特)为教会的圣人。不久后,关于她的“启示”和“神视”发生了一场神学论争,而著名的巴黎大学校长 Gerson(杰尔松)也参与了这个谈论。Basileia(巴塞尔)的大会议也面对这个问题,但没有作出什么决定。教宗 Benedictus XIV(本笃/本尼狄克十四世,1740 - 1758 年)承认 Birgitta(布里吉特)的那些启示“符合正统信仰”。

151. 3e 大约在 1460 年,圣 Franciscus de Paula(保拉的方济各,1507 年去世)在意大利南部的 Calabria(卡拉布里亚)创立了一个有严格的方济各会规的托钵会,名为 Fratres minimi(= Minimi“最小的弟兄”)。根据创始人,他们也被称为 Paulani(保拉尼会),在法国被称为 Bons hommes(好人),在西班牙他们被称为“胜利父们”。16 世纪初是这个修会的高峰时期,当时他们大约有 450 个会院。

152

圣体圣事、弥撒、大赦、庆节、祈祷

152. 1 在中世纪晚期,人们领受圣体的频率不太高,和以前一样(参见 119. 2)。然而,那些神秘思想家说应该多领圣体(参见 *De imitatione Christi*《师主篇/效法基督》IV, 3),而部分的信徒也听到了这些声音。很多司铎忽略了举行弥撒的义务。比如,Ravenna(拉文纳)的主教会议(1314 年)要求司铎们至少一年一次举行弥撒,Tarragona(塔拉格纳)主教会议(1317 年)要求至少三次,而 Toledo(托莱多)会议要求司铎一年至少四次举行弥撒(参见会议文献第 7 条)。

自从第 13 世纪以来(尤其在中世纪晚期),很多报告提到一些“圣体奇迹”(一些流血的圣饼或在火中没有烧毁的圣饼),这方面的报告来自很多地方,比如意大利的 Bolsena(博斯纳),德国的 Andechs(安德克斯)、Deggendorf(德根多夫)、Wilsnack(维尔斯纳克)等(参见 158. 1)。这些报告都有中世纪那种典型的传说的

特征。其中一部分的传说也许与 1300 年后很流行的“基督受难像”(德语称 Erbaermdebilder“可怜基督图像”)有关系或与所谓的 Gregoriusmesse(“额我略/贵格利弥撒”,即为亡者举行弥撒)有关系。

152.2 在中世纪, *indulgentia*(大赦, 参见 119.4; 133.2) 在教会生活中的影响很大。那些“大赦”的数目多、范围广, 尤其在教会的大分裂(1378 - 1417 年)后教会更增多大赦的机会。比如为建造教堂或圣堂, 为朝圣和尊敬圣髑都有获得大赦的可能性。去参与十字军运动(反对胡斯派、土耳其人、西班牙的穆斯林)可以赢得大赦。也有纯粹的“祈祷大赦”和一些“半世俗的大赦”, 比如一个人建立医院或其他的为公益有用的设备就可以获得大赦。在 14 世纪又出现一种新的大赦类型, 就是“大禧年大赦”, 它被称为“完美的和普遍的大赦”。当时的人们群众有这样的信仰: 在一个世纪的结束, 去罗马朝圣的人可以获得一些灵修性的特恩, 而 Bonifatius VIII(博尼法奇乌斯八世)于 1300 年 2 月首次宣布了这种“大禧年大赦”(参见 137.3)。这种机会吸引了众人去罗马朝圣。后来, Clemens VI(克雷孟六世)于 1343 年宣布, 不需要等 100 年, 每 50 年便可以在罗马获得这种特恩, 而 Urbanus VI(乌尔巴努斯六世)于 1389 年将这个时期降低为 33 年, Paulus II(保禄/保罗二世)于 1470 年又规定每 25 年可以在罗马获得大赦(这个规定一直到今天有效)。在 15 世纪, 教会又规定, 在某些条件下, 那些无法去罗马朝圣的人也可以获得“大禧年大赦”。

在中世纪晚期的神学家和那些严肃的灵修作者对于“大赦”似乎都有正面的说法(*fast durchwegs korrekt*), 他们也多次论述, 宣布大赦的机会带给人们很多灵修上的激励和良好的道德果实(参见 119.4)。如果没有大赦, 很多大教堂和艺术作品就不会问世。然而, 在另一方面, 在中世纪晚期也存在着大赦方面的严重缺陷——一切愿意推动改革的人都认为这些缺陷是一个绊脚石, 但不幸的是, 教会的领导者并没有很坚定地抵抗那些弊病。一方面, 那些“大赦”的机会太多, 另一方面, 大赦的期限变得无边无度, 比如 Leo X(良/利奥十世)允许一些一千年、一万年或十万年的大赦, 比如说, 德国的 Wittenberg(维滕堡)教堂保存一些圣髑, 而每当举行一个恭敬这些圣髑的礼仪时(参见 158.2), 信徒们可以获得大赦, 一年可以参与七次, 每次获得 100 年的大赦, 而每项圣髑的小块可以给 100 个 *Quadragesima*(40 天的大赦), 总算大约是 200 万年的大赦!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虚假的东西或一些迷信的倾向。很多人的谴责了某些“大赦宣讲者”和“收大赦钱者”(Quaestores 收钱者)的世俗化表现(参见 133.2)或这些钱的滥用。宗座和教廷自从 Bonifatius IX(博尼法

奇乌斯九世,1389 - 1404 年)的时代也太过分强调了大赦的钱财因素,所以大赦似乎被降低为一种 Geldgeschaeft(买卖事业)。另外,一些君主或城市的市政府也要求教廷提供那些“大赦”,所以他们在分配的时候也为自己获得了一部分的收入。

自从第 13 世纪以来还有这样的教导:教会为亡者可以给予大赦,而人们通过“转求”(per modum suffragii 通过祈祷的方式)可以使亡者得到其效益。不过,教宗为炼狱灵魂中给予的大赦——这种习惯是在 15 世纪才开始的。针对这种“为炼狱灵魂的大赦”,一些讲道者和神学家提出这种教导(Schulmeinung):某些炼灵确切地并全面地会获得这种大赦,而且获得这种大赦不需要进行忏悔和告解(和好圣事),仅仅需要进行施舍(交钱)。根据这种教导,很容易出现错误的说法和滥用。早在 13 世纪出现了一个很不确切的说法,即 remissio (= indulgentia) a poena et culpa[“惩罚和罪责的宽免(即赦免)”]或简单的说 remissio (omnium) peccatorum[“赦免(一切)罪”]。后来甚至有一些神学家和教会法律学家以及一些教宗也引用了这个模糊的说法。某些人后来说,这种说法意味着“大赦”的概念改变为一种“赦免罪”(而不仅仅是“赦免惩罚”),但这是不对的。所谓的 remissio culpa(赦免罪责)或 remissio peccatorum(赦免罪)的说法要么指一个“赦免一切惩罚”的“大赦”(但这种 plenaria indulgentia“大赦”的前提条件是“罪的赦免”,即办告解),要么指一种这样的特权——一个告解神父可以在临终时宣布某些(本来保留给教宗或主教的)特恩。这样的“告解信”或“大赦信”(称 confessionalia)自从 14 世纪以来送给某些贵族人士,被视为特权,但后来普遍地送给那些捐款的人。

152.3 早在 1260/1261 年的意大利就有一些人组织起来,形成一些 Flagellantes(鞭笞游行者)的团体(参见 131.1),他们要通过公开的忏悔表达上主的正义和惩罚,同时要呼求上主的怜悯。在 1348 年和 1349 年的可怕黑死病(鼠疫)传染病时期,类似的活动再一次发生。那些“鞭笞者”的游行队几乎走遍整个中欧地区。然而,因为不久后在这些“鞭笞者”的圈子中出现一此迷信的因素(比如关于一种“来自上天的信”的传说)、一种激烈和不明智的改革精神、结队成派的倾向、异端的观点(不承认圣事和教会圣统制)以及暴动(反对犹太人),所以 Clemens VI(克雷孟六世)在 1349 年 10 月的诏书中谴责了这个“鞭笞者”的组织并要求镇压他们。虽然如此,在 15 世纪初的教会分裂是一种极大的灾难,而当时的著名道明会会士忏悔讲道家 Vincentius Ferrer(味增爵·菲雷,参见 150.2)再一次率领了一些“鞭笞队”穿过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北部。根据 Gerson(杰尔松)的评价文献,Constantia

(康斯坦茨)的大公会议于1417年也谴责了这些“鞭笞者”。在16、17世纪的“对改革时期”中,那种“公开地鞭打自己”的习惯再一次被恢复起来。

152.4 在中世纪晚期出现了一些新的教会节日:教宗 Johannes XXII(约翰内斯二十二世)于1334年规定要遵守“至圣体节”,而 Bonifatius IX(博尼法奇乌斯九世)规定,在7月2日有“圣母访亲”(festum visitationis Beatae Mariae Virginis,后改到5月31日),但这两个节日的传统更古老,因为一些地方教会团体很早就过这些节日;教宗仅仅宣布它们为全教会的共同节日。自从14世纪以来,根据 Scotus(司各脱)的教导(参见145.2),“圣母无染原罪”的节日获得了相当广泛的传播(参见133.7)。在1439年,Basileia(巴塞尔)的会议甚至宣布这个节日应该是整个教会要过的节日,但因为那个会议当时处于分裂的状态,他们的规定没有效果。教宗 Sixtus IV(西克斯图斯四世)宣布在这个节日可以获得一些大赦,并在罗马教区要过这个节日。然而,只有在17和18世纪,这个节日才成为全教会过的正当节日。

根据这些情况,教会的节日还有一点“增加”的趋势,但基本上已经达到了高峰。当时有一些教区一年大约庆祝了100个教会节日!难怪某些主教想反过来降低教会节日的数目,比如 Canterbury(坎特伯雷)的总主教 Simon(西满)于1332年为自己的教省规定要取消11个教会节日。在 Constantia(康斯坦茨)会议上,Gerson(杰尔松)和 d'Ailly(阿伊)建议要减少教会的节日,但没有成功。

守斋的规定基本上都保持了原来的严格标准(参见100.2),但一天第一次吃饭从 nona(下午3点)被挪到 sexta(中午12点),这是根据当时的习惯的自然发展。另外,罗马教廷于15世纪几次允许了欧洲北部的各国在守斋期吃奶制品(牛奶、奶油、干酪),但要进行施舍,所以这种在守斋期“吃奶制品”的习惯逐渐成为普遍的习俗。

152.5 在那些新的灵修方式当中特别值得提到的是 Angelus Domini(“主的天使”)。人们在晚上(在 ignitegium“灭火”时,即“工作结束时”或“下班时”)以及在早上的钟声后祈祷的习惯最早出现在13世纪的意大利(在 Monte Cassino 卡西诺山和周围地区),而因为 Johannes XXII(约翰内斯二十二世)宣布每天作这种祈祷可以获得大赦,这种习俗传播的越来越广泛。最早提到“中午敲钟”的习惯是在1386年的 Praga(布拉格)主教会议上。另外,Calixtus III(卡里斯图斯三世)于1456年规定,中午的钟声应该提醒人们在中午要想到土耳其人的危险并为此作祈祷(参见156.3)。只有在17世纪,一天三次的打钟和三次祈祷才成为普遍的习俗,当时的教宗 Benedictus XIII(本笃十三世)宣布,这种祈祷可以赢得大赦。

由于十字军运动,人们开始更尊敬基督的苦难,而那些托钵会的工作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因为他们重视耶稣的苦难),这就导致了“拜苦路”的习俗。从很古老的时期——尤其是从十字军运动以来——那些去耶路撒冷朝圣的人有这样的习惯:他们会走耶稣当时走过的路(称 *via crucis*),而当地的传统就在这条路上有一些“站”。自从 15 世纪——好像是在神秘思想家的影响下——人们也在巴勒斯坦以外建立这样的“苦路”和其中的“站”。这些站的数目有很大变化,最多是 34 个。在德国很受欢迎的是“七次跌倒”的描述(符合一天七个时期)。今天用的 14 个站在 17、18 世纪成为普遍的(在方济各会的影响下,Innocens XI 依诺森十一世于 1686 年为此宣布大赦)。在此之前,Johann Pascha de Louvain(鲁汶的约翰内斯,约于 1530 年去世)——一位加尔默罗会会士——在他的 *Geistliches Pilgerbuch*(《灵修游记》,1563 年印刷出版)中提到 15 个站,而荷兰的司铎 Christian van Adrichem(阿德瑞很)在他关于圣地的描述中(1584 年)有 12 个或 14 个站。

关于“玫瑰经”,参见 133.7。

152.6 中世纪晚期的民间宗教生活大部分发生在那些“宗教性的弟兄会”(Bruderschaften)当中。这些弟兄会也呈现出当时的灵修的转向:向个人的转变。这些弟兄会很多,仅仅在 Luebeck(吕贝克)城就有 70 多弟兄会,在 Colonia(科隆)大约有 80 个,在 Hamburg(汉堡)有 100 多。这些弟兄会有很多种目标,其中一部分有纯粹宗教性的宗旨,比如敬拜某些信仰的奥迹(耶稣圣体、耶稣圣血、圣十字架等),或尊敬某些圣人[比如那些尊敬圣母的弟兄会有 Liebfrauen - (圣母会)、Rosenkranz - (玫瑰会)、Salvebruderschaften(万福弟兄会)等,圣 Anna(亚纳)会,圣 Jacobus(雅各伯)会,圣 Urbanus(乌尔巴努斯)会,圣 Sebastianus(色巴斯提安)会,圣 Ursula(乌苏拉)会]。有的弟兄会专门为炼狱灵魂祈祷,或专门照顾教堂,注重礼仪等。另一些弟兄会除了宗教性的目标还有社会性的或慈善任务,它们一般都与那些工人会(行会,德语有 Zuenfte, Innungen, Gilden, Zechen 等词)有关系。司铎们也有特殊的弟兄会,这些联合会的前身是早期中世纪的祈祷会(参见 101.1)。

153

讲道、群众的宗教教育和灵修文学

153.1 在 14、15 世纪的社会中,人民群众在宗教上的首要教育工具(和以前一

样)是 *praedicatio*(讲道、布道),所以这种讲道文化一直被重视。在这方面,那些托钵修会的角色特别重要。在主日和庆节的堂区礼仪(弥撒)中,讲道也是一个重要的项目。各个主教会议都一再地强调,司铎们的重要牧灵任务就是宣讲福音和讲道,而平信徒都有聆听的任务。法国 Toulouse(图卢兹)教区的 Lavour(拉瓦尔)会议(1368年)关于民众的宗教教导作出了详细的规定。人们也很渴望聆听一种良好的讲道(道理)。为了获得更好的讲道者,很多德国地区的城市的世俗领导或教会长上建立所谓的 *Praedicatura*(“讲道职位”),这就吸引了一些以讲道为职业的、获得固定收入的人,仅仅在今天的 Wuerttemberg(符滕堡)地区在 1400 年到 1517 年间已经有 46 个这样的职位。在那里的讲道人士被要求有大学学位,或至少受过大学教育。那些比较著名的讲道人士的著作在活字印刷技术被发明(1450年)后被出版,还有一些“讲道杂志”(如 *Parati Sermones*, *Sermones discipuli*, *Sermones dormi secure*)以及一些“例子手册”或其他的帮助人们准备一个道理的工具手册。特别受欢迎的是降临期的道理、四旬期和受难方面的道理。在 Basileia(巴塞尔)当堂区司铎和大学教育的 Ulrich Surgant(苏尔甘特)写过一部杰出的“讲道入门”教科书(*Manuale curatorum*《牧灵者手册》,1503年)。一些人文主义者,比如 Johannes Reuchlin(瑞克林,见其 *Liber de arte praedicandi*《讲道艺术之书》,1504年)和 Desiderius Erasmus(伊拉斯谟,1535年的著作 *Ecclesiastes*《德训者》)也写过这方面的著作。

人们具有讲道的热忱,但他们所讲的内容及他们讲道的方式不一定都令人感到满足。在 *Kunstpredigt*(“练习讲道稿”)中,人们多次谈论不同修会的神学争论或一些神学派的冲突,这就意味着他们讲很多钻牛角尖的问题或讲各种哲学概念的区分,或提出一些比喻或语言游戏。在普通的民众讲道中,人们多次传播了一些乏味的传说、例子或轶事,而那些人文主义者都嘲笑了这些没有水平的说法(参见“复活节传说”,119.7)。当人文主义变得很流行的时候,讲道者经常引用一些来自古希腊罗马经典的语句,超过《圣经》的语句。有的讲道者关于基督讲得太少。然而,始终也都有讲道者确实提供了一种比较好的、有信仰内容的和信仰热忱的道理——经常也加入了一点“神秘思想的油”。那些神秘思想家本身(参见 146)所讲的神奥道理仅仅给一些隐修者的圈子听,不会向广大群众宣讲这些神秘内容。另一些热中于推动改革的人物(包括教区司铎或修会人士)也是杰出的讲道者,部分上在上文已经被提到,比如 Bernardin de Siena(锡耶纳的伯尔纳丁)、Johannes de

Capestrano(卡佩斯塔诺的约翰内斯)、Gerhard Groot(格劳特)、Vincentius Ferrer(菲雷)、Johannes Gerson(杰尔松)、Johannes Nider(尼德尔)、Gabriel Biel(比尔)、Johannes Heynlin de Stein(海恩林)。除了他们以外,应该加上的人物是 Nuremberg(纽伦堡)的 Johannes Herolt(赫若特,1468 年去世)、Florentia(佛罗伦萨)的 Hieronymus Savonarola(萨沃那洛拉,1498 年去世,参见 157.4)——他可能是整个中世纪最伟大的、最有活力的讲道家——、方济各会会士 Johannes Brugman de Kempen(布鲁格曼,1473 年去世)、来自 Waiblingen(外布林根)附近的 Winneden(温内登)的 Stephan Fridolin(弗瑞多林,1498 年去世)、来自 Muenster(明斯特)的 Dietrich Coelde(Kolde)(科尔德,1515 年去世)、著名的维也纳大学神学教授 Nikolaus de Dinkelsbuehl(尼苛劳,1433 年去世)——他也在 Constantia(康斯坦茨)会议上具有重要角色——、Paul Wann(保禄·万,1489 年去世)——他先在维也纳教神学,后来在 Passau(帕骚)任职,以及 Johannes Geiler de Kaysersberg(盖勒尔,1510 年去世),他是 Strasbourg(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明亮号叫”,他始终以强有力的、原创性的、尖锐的或幽默的言辞传播伦理道德的重要价值。

153.2 除了“讲道”以外,自从中世纪末期以来,文献和印刷品对民众的宗教教育起到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尤其《圣经》早已走向人民群众,一些平信徒甚至特别熟悉《圣经》。虽然自从 13 世纪以来存在着个别命令禁止人们用本地语言阅读《圣经》,但这些(不是普遍的)命令是因为异端人士滥用了《圣经》。在印刷技术的初期阶段(1450-1500 年)已经出现了 100 多个《拉丁通俗本圣经》版本(这还不包括那些只印部分《圣经》书卷的版本),而且在 1518 年前已经有一部高地德语(即德国南方德语)的《圣经》译本(1518 年之前已经有 14 版,初版在 Strasbourg 斯特拉斯堡,1466 年初次印刷),也有低地德语译本(4 个版本)。除此之外,人们很喜欢阅读那些“圣经故事”(Historienbibel,见下,153.3)以及所谓的 Postilla(《圣经注解》)和 Plenaria(《全部解释》)——这些著作在开始的时候仅仅包含弥撒中用的《圣经》读经,后来包括整个弥撒的经文,而且用本地语言和种种解释。在 Luther(路德)之前的德国地区大约有 100 个这样的用本地语言解释读经的版本。

儿童的宗教教育也已经有,但仍然不是很发达的领域。一般来说,老家庭为孩子们提供最重要的宗教知识和宗教习俗。圣职人员的讲道和关于办告解的教导等于是进一步的宗教教育。那些“告解手册”或“告解明镜”之类的著作部分是给司铎写的,部分是民众的读物。Johannes Gerson(杰尔松)曾经写过一部《基督信

仰的纲要》(等于是说一种“要理问答”或“基督宗教信理手册”),就是他的 *Opus tripartitum*(《三部曲》,有拉丁语和法语的版本,*Geiler*(格勒尔)也写了德语译本)。另一个“教理书”是方济各会会士 *Coelde*(克尔德)的 *Kerstenspiegel*(《基督徒之明镜》)。在学校和家庭中用的教学资料是一些“教理画版”和“家庭图画”(Katechismustafeln und Haustafeln),上面写着最重要的、需要背熟的信仰知识。

153.3 中世纪晚期最著名的并且经常被赞美的是当时广泛的“灵修文学”(litterae ad aedificationem animi, 德语的 *Erbauungsliteratur*)。这种文学一般来说不仅仅有正统信仰和健康的灵修学,而且也有一种有充满感情的、符合民众需要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在这些著作中比较有名的是 *Seelentrost*(《心灵之安慰》)、*Himmelsstrasse*(《天路》)、*Himmelstuer*(《天门》)、*Schatzbehälter*(《宝库》)之类的著作。为个人的默想,人们多用了 *Psalter*(《圣咏集/诗篇》),许多日课的版本(称为 *Horarien*, *Livres d'heures*)以及一些比较小的经本,是从此发展出来的,很受欢迎的 *Hortulus animae*(《灵魂小花园》,德语 *Seelengaertlein*)以及其他的祈祷经本。那些圣歌部分上是一些拉丁语的赞美诗的翻译,部分上是完全新的歌词,在第15世纪特别盛行。为了带给信徒们一种深厚的宗教体验,一些画家和艺术家为各地教堂创造了非常美好的作品,比如祭坛上有画、有雕像、浮雕、壁画、玻璃画和木雕。特别值得提到的是那些 *Horaria*(日课)和 *Historienbibeln*(《圣经故事》,后者经常模仿巴黎神学家 *Petrus Comestor* 于1170年写的 *Historia scholastica*《故事本》),除此之外还有所谓的 *Reimbibeln*(《韵律圣经》、《快板圣经》)、*Bilderkatechismen*(《插图要理》)、*Blockbuecher*(《画图故事》)、*Biblia pauperum* = *Armenbibel*(《穷人圣经》,就是一种给平信徒写的图解圣经)、*Speculum humanae salvationis*(《人类得救之镜》,德语称 *Heilsspiegel*,可能是由 *Ludolfus de Saxonia* 编写的,参见146.4), *Sterbebuechlein*(即 *Ars moriendi*《如何去世》)以及那些很流行的 *Totentänze*(《死者舞蹈图画》,法语称 *Danse macabre*)——这些画图非常形象化地表达“死亡”对于一切阶级和一切人物的控制,经常也包括一些经文或诗。那位曾经在 *Saaz*(撒斯)和 *Praga*(布拉格)当过公务员的 *Johannes de Tepla*(约翰内斯·特普拉)——他是 *Johannes de Neumarkt*(约翰内斯·纽马克特,参见155.2)的学生——约于1400年写一部重要的散文著作,就是一个扣人心弦的与“死亡”的对话,这个对话在世界观上基本上属于中世纪,但已经呈现出一些人文主义的因素。那些 *mysteria*(《宗教剧》、《神圣话剧》,德语的 *geistliches Schauspiel*)用戏剧的方式表达一些信仰内容,

特别是一个人忏悔和改过迁善,也在 15 世纪达到一个高峰(参见 119.6)。这戏剧同时有教育作用,也有娱乐价值。

154

教会艺术:哥特风格的高峰期和晚期;文艺复兴

154.1 教会艺术在中世纪晚期成为真正的“民众艺术”(Volkskunst)。贵族人士和平民,宗教界和世俗的人都争先恐后地为教堂作美好的装饰,各种手艺的技术有时候达到一种惊人的高度,也有所创意。那个时代的伟大建筑师、雕塑家和画家创造了一些不朽的作品。在当时的文化界中,宗教艺术占有首要的地位,它大声宣布宗教和文化的密切关系。当时的艺术风格也许有太过分的“实在主义”(写实)倾向,又愿意在很大的程度上将宗教的因素“世俗化”和“城民化”(Verbuergerlichung und Saekularisierung),但它也表达了“民间化”和宗教上的团体精神(Gemeinschaftsgedanke),这就是当时的艺术的特点。从整体来看,中世纪晚期的艺术是民众信仰的强大表现,很有感染力。

在建筑方面,Hochgotik(高峰期哥特式)在 14 世纪中叶(1350 年)才结束,此后有所谓的 Spaetgotik(晚期哥特式),它在意大利大约维持到 1420 年,在 Alpes(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地区却维持到 16 世纪,在部分地区(英国)甚至更晚才结束。在北部地区最重要的建筑物是 Wien(维也纳)的 Stephansdom(斯德望/司提反大堂,1339 年以后建造),Ulm(乌尔姆)的 Muenster(大堂,1377 - 1494 年,1890 年继续建造),Gmuend(格蒙德)的 Hl. - Kreuzkirche(圣十字架教堂,1351 - 1410 年)以及 Esslingen(艾斯林根)的 Liebfrauenkirche(圣母大堂,1324 - 1508 年)。在德国北部地区,人们很喜欢建造一些广阔的 Hallenkirchen(“大厅教堂”,砖砌结构)。在意大利,最著名的建筑物是 Milano(米兰,1386 年后)和 Bolonia(博洛尼亚,1390 年后)的大堂,以及 Pavia(帕维亚)附近的 Certosa(切托撒,1396 年后)大堂。

在 1430 年以后,意大利人对于古典风格的恢复导致了一个新的建筑风格的诞生,它在本质上来自古罗马的艺术传统,但在某些方面还是走出一个独立的路线,并保留了个别的早期中世纪因素。这种“早期文艺复兴”(所谓 Quattrocento“第 15 世纪”)的先驱者大师是来自 Florentia(佛罗伦萨)的 Filippo Brunelleschi(布鲁内莱

斯基,1377 - 1446 年,他建造了 Florentia 大堂的拱顶,1436 年)、Leon Battista Alberti (阿尔贝蒂,1404 - 1472 年)、来自 Urbino(包尔比诺)的 Bramante(布拉曼特,1444 - 1514 年)——他是伦巴第(意大利北部)的早期文艺复兴的大师,但在 1500 年后成为罗马高峰期文艺复兴的创造者。

文艺复兴的风格继承了古罗马建筑风格的特点(柱子、柱顶、大梁),但也有很多创新和变化。这种新的风格注重楼房的堂皇高大,又强调装饰和细节(ornamentum)。因此,墙壁和古代一样带着一些花圈或叶条、水果、雕像,墙顶有节,在窗子或门上面有三角形。

154.2 哥特式的雕塑风格在 14 世纪已经呈现出某种不自然的表现:人像太瘦,太高,姿势不自然,都带着微笑。但在 Franken(法兰艮地区,比如 Nuremberg 纽伦堡)和 Suabia(施瓦比亚)地区,一些人仍然创造了几个伟大的作品。德国人的神秘思想加深了艺术家的宗教感情,这样创造了一些很有感染力的形象(比如关于基督或约翰内斯的画,所谓的 Vesperbild 和受苦的耶稣等)。在意大利,学者对自然和古代的研究继续催促艺术的崛起,带来了很杰出的成果。Giovanni Pisano(皮撒诺,参见 133.9)的继承人是他的学生 Andrea Pisano(皮撒诺,1349 年去世)和 Lorenzo Ghiberti(吉贝尔蒂,1455 年去世),他们共同创造了 Florentia(佛罗伦萨)洗礼堂(baptisterium)的著名铜门。Ghiberti(吉贝尔蒂)已经属于意大利的早期文艺复兴,它注重自然和人生中的个体的特征,同时达到很高的审美水平。文艺复兴风格的主要代表是来自 Florentia(佛罗伦萨)的 Donatello(多那特罗,1386 - 1466 年)——他是一个勇敢的创新者,具有戏剧性的力量;Luca della Robbia(罗比亚,1482 年去世)——他创作了很多著名的陶浮雕,以及 Andrea del Verrocchio(韦罗吉奥,1488 年去世)——他的专长是铜像。非常伟大的艺术家是 Michelangelo Buonarroti(米开朗琪罗,1475 - 1564 年),他也来自 Florentia(佛罗伦萨),是雕塑家、画家和建筑师,同时也是一位楷模模式的基督徒,始终忠于教会。他的早期作品,比如罗马伯多禄大殿中的 Pieta(圣母哀痛地抱着基督尸体)仍然属于第 15 世纪。他于 1505 年开始创造 Julius II(尤利乌斯二世)教宗的墓以及著名的 Moses(梅瑟/摩西)像,并于 1521/1534 年完成了在 Florentia(佛罗伦萨)的 Medici(梅迪其)家族的墓(参见第 3 卷,179.2 - 4)。

在德国地区,早期文艺复兴的雕塑艺术(大约在 1450 - 1530 年间)获得良好的发展,但它没有完全放弃哥特式的传统。在 15 世纪末和 16 世纪初,很多教堂开始

有所谓的 Fluegelaltar(“两翼祭坛”),而在这样的祭坛上有很多雕塑的面积。在这方面应该提到的人是 Ulm(乌尔姆)的 Joerg Syrlin der Aeltere(老西尔林,1491 年去世),Tirol(蒂洛尔)的 Michael Pacher(帕赫尔,1498 年去世),Veit Stoss(斯托斯,1533 年去世),Adam Krafft(克拉夫特,1509 年去世),Peter Vischer der Aeltere(老费谢尔,1529 年去世),Tilman Riemenschneider(里蒙施内德,1531 年去世),他在 Wuerzburg(维尔茨堡)。

154.3 自从 14 世纪以来,意大利的绘画艺术非常繁荣。虽然哥特式的理想化风格还在很长时间占统治地位,但人们已经开始追求更多写实的因素、精神上的深化以及结构上的自由。在 Florentia(佛罗伦萨)的 Giotto(乔托,1267 - 1337 年)——他是 Cimabue(契马布埃,1303 年去世)的学生——是这种风格的代表。在 Siena(锡耶纳)也有几个画家(Duccio、Simone Martini 和 Lorenzetti 弟兄)。后来的 Masaccio(马萨乔,1428 年去世)大约在 1420 年使文艺复兴的感受获得强有力的表达,其作品都很杰出,一方面依靠古代的风格,强调世俗世界的美丽,但又保持与宗教和教会的关系。在 15 世纪末,在绘画的领域内已经开始“高峰期的文艺复兴”,其不朽的大师是 Leonardo da Vinci(列奥纳多·达·芬奇)、Michelangelo(米开朗琪罗)和 Raphael(拉斐尔),他们创造了一个在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高峰。在荷兰与德国也出现了一些伟大的有才华的艺术家。

154.3a 在意大利的早期文艺复兴风格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 Masaccio(马萨乔)在 Florentia(佛罗伦萨)的 Brancacci(布兰卡其)圣堂中的墙画(1422 年 - 1428 年间)。除了前面提到的人物,属于 Florentia(佛罗伦萨)学派的人还有 Fra Filippo Lippi(里皮,1469 年去世)——他是 Masaccio(马萨乔)的学生,Domenico Ghirlandajo(吉兰达约,1494 年去世),Benozzo Gozzoli(格佐里,1498 年),Filippino Lippi(里皮,1504 年去世,他是前面的 Filippo Lippi 的儿子),Sandro Botticelli(波坦切利,1510 年去世)和 Lorenzo di Credi(克瑞迪,1537 年去世)。那位与 Masaccio(马萨乔)同时代的道明会会士 Giovanni da Fiesole(通常被称 Fra Angelico 安吉利克,1455 年去世)是一位很有特点的画家,他表达了一种远远脱离世俗生活的纯洁和天堂的美丽。然而,绘画艺术的创造力并不限于 Florentia(佛罗伦萨)——在整个意大利中北部出现了很多画家和绘画学派,比如在 Toscana - Umbria(托斯卡纳——翁布利亚,比如 Fabriano)、Padua(帕多瓦,比如 Mantegna)、Bologna(博洛尼亚)以及 Venetia(威尼斯)。

154.3b 高峰期文艺复兴第一个大师是 **Leonardo da Vinci**(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 - 1519 年),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有细腻的观察能力、深切的感情,其作品的颜色很圆润。他最重要的宗教画是 Milano(米兰)的 S. Maria delle Grazie(圣宠圣母)隐修院中的大厅中的“最后晚餐”(1495/1497 年)。第二个人是 **Michelangelo**(米开朗琪罗),其具有巨人的创造能力和风格,也有丰富的个人主义以及深切的宗教情感。在 Julius II(尤利乌斯二世)的时代(1508 - 1512 年),他在梵蒂冈的 Sistina(西斯廷)教堂画了天顶画和壁画(包括“创造”和“人的堕落”,先知们等)。后来——在 Paulus III(保禄/保罗三世)的时代,即 1533 - 1544 年——他又创造了那种太具体化的“最后审判”,也是在西斯廷教堂。第 16 世纪(所谓 Cinquecento)最重要的画家是 **Raphael Santi**(拉斐尔,1483 - 1520 年),他是 Perugino(佩儒格诺)的学生。他的技术非常成熟,表达理想主义和完美的和谐。他的主要作品——形成在 Julius II(尤利乌斯二世)和 Leo X(良/利奥十世)的时期——是梵蒂冈某些大厅里的 Disputa(“讨论”)、School of Athens(“雅典学派”)、“Heliodor 被驱逐”,Missa di Bolsena 等,还有 Sistina(西斯廷)教堂中的部分墙画及一些版画(如不同的“圣母”,一些教宗的画像,“神圣家庭”,“基督显荣”等)。两个 Florentia(佛罗伦萨)人与这三个大师似乎有同样高的水平,就是道明会会士 Fra Bartolomeo(巴托洛梅奥,1517 年去世,画了一些有庄严感情的“默想画”)——他支持 Savonarola(萨伏纳洛拉)——和 Andrea del Sarto(萨托,1531 年去世,他强调颜色效果和美丽风格)。在 Siena(锡耶纳)的著名画家当时有 Sodoma(索多马,1549 年去世),在 Venetia(威尼斯)有 Giorgione(乔尔乔涅,1511 年去世),Palma Vecchio(维乔,1528 年去世)和年轻的 Tiziano(提香,1477 - 1576 年)——他是 Bellini(贝利尼)弟兄的学生,但他缺少宗教上的深度,有时候不能满足教会艺术的要求。另一个画家有特殊的地位,就是 Antonio Allegri[被称为 Correggio(柯勒乔),1494 - 1534 年],他善于创造光线效果,似乎可以说他已经有一种巴洛克的审善感。

154.3c 在欧洲北部的哥特式教堂中,能够画壁画的面积比起南方的教堂小多了,因此在这里的画多是版画(祭坛上的画,参见 154.2)。在 Carolus IV(查理四世,1346 - 1378 年)的时代,Praga(布拉格)的艺术学派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比如 Meister Theodoricus 特欧多尔)。当时也出现了一个 Colonia(科隆)学派,它的特点是温和与神秘思想的热忱(Wilhelmus de Herle 赫尔勒的威廉,约于 1378 年去世,Stephan Lochner de Meersburg 罗克内,1451 年去世——他创造了科隆大堂的画

图)。除了版画以外,在 14 和 15 世纪还出现了大堂的大玻璃窗子和玻璃画。

与意大利同时,在荷兰也出现了一种“写实”的风格,它与深切感受和宗教信仰结合,产生了杰出的作品。文艺复兴风格的开拓者是 Hubertus van Eyck(爱克,1436 年去世)和他的弟兄 Jan van Eyck(爱克,1440 年去世),他们是油画技巧的创始者或发展者。他们的主要作品是 Ghent(根特)的祭坛组画。在他们之后有 Roger van der Weyden(韦登,1464 年),Hugo van der Goes(古斯,1482 年去世),Hans Memling(梅姆灵,1494 年去世),Quinten Massys(马西斯,1530 年去世)。

从荷兰地区,这个新的风格在 1450 年后传入德国。那些莱茵河上游地区的大师受它的影响,就是 Lukas Moser(摩色尔,他来自 Weil der Stadt),他创造了 Tiefenbronn(提芬布伦)的祭坛(1431 年);来自 Rottweil 的 Konrad Witz(维茨,1447 年去世),Kolmar(科马尔)的 Martin Schongauer(雄高尔,1491 年去世)。属于 Suabia(施瓦比亚)学派的人是 Ulm(乌尔姆)的 Hans Multscher(姆尔切,1467 年去世)——他也是一位杰出的木雕师,还有 Bartholomaeus Zeitblom(宰特布伦,约于 1520 年去世),Noerdlingen 的 Friedrich Herlin(赫尔林,1499 年去世),Nuremberg(纽伦堡)的 Michael Wolgemut(沃尔格姆特,1519 年去世)以及 Augsburg(奥格斯堡)的 Hans Holbein d. Aeltere(老霍尔拜因,1524 年去世)。德国绘画的全盛期是 16 世纪头几十年。当时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画家:来自 Nuremberg(纽伦堡)的 Albrecht Duerer(丢勒,1471 - 1528 年)——他也许是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家,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灵性和宗教热忱(有木刻画,铜版画,版画,著名的画是“万圣画”和“四个宗徒/使徒”);来自 Wuerzburg(维尔茨堡)的 Matthias Gruenewald(= Mathis Gothart - Neithart,格吕内瓦尔德,1528 年去世),他的写实风格很强硬,具有戏剧性和神秘思想的深度,纯粹从绘画的技巧看,他甚至超过 Duerer(丢勒),他的著名作品是 Isenheimer Altar(依森海姆祭坛)和 Stuppacher Madonna(圣母画)。第三个是来自 Augsburg(奥格斯堡)的 Hans Holbein der Juengere(小霍尔拜因,1497 - 1543 年),他是德国的文艺复兴大师,在宗教上的深度不如前面两个人(他有关于《旧约》的木刻画,耶稣受难画等)。

第三章 教会在过渡时期:从中世纪到近代

155

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

155.1 自从 14 世纪以来,在西欧出现了一个新的思想潮流,它很坚定地转向世俗的世界,因此与全盛时期中世纪思想和感受有明确的差别;这个潮流在 15 世纪已经影响了很多有修养的人或社会上的领导者和精英。这个思想传统首先自称为“古代文化的再生”。在高等教育、教育理念、科学研究和文学方面,它被称为 humanismus(人文主义),而在艺术、文化、政治和人生观方面,它主要被称为 renaissance(文艺复兴)。当然,早期中世纪的人并没有忘记古代的经典著作(尤其是拉丁语的典籍),早期和全盛时期中世纪的人也很认真地研究这些古代经典并重视它们,但主要是从“形式”的角度利用它们,就是用古代经典当语文学、修辞学和文学风格的典范。在文艺复兴时代——首先在意大利,因为意大利当时是文化上最发达的地区——这些经典的内容成为一个精神性的力量,这样深入地影响了教育、科学知识、世界观和生活。依赖这些经典,人们想追求个体人格的自由发展和独立发挥,这样尤其强调“纯粹人性的”(vere humanum 人的真正本性)、一种在本质上是世俗化的教育以及一种被理解为“审美性的 - 民族性的”文化(eine aesthetisch - national empfundene Kultur)——这种文化观首先注重尽可能和谐地享受和组织世俗的生活。文艺复兴时代的典型态度是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和平信徒的精神(Individualismus, Nationalismus und Laizismus)。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开拓者是伟大诗人 Dante(但丁,参见 136.2),他在那包罗万象的《神曲》中请 Vergilius(维吉尔)当地狱和炼狱中的向导,他又是作为文学语言的意大利语的创造者,以及 Cola di Rienzo(科拉,参见 139.6),他是罗马的“保民官”,始终热切地崇

拜古罗马的伟大。然而,第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文主义者是 Francesco Petrarca(彼特拉克,1304 - 1374 年),他来自意大利的 Arezzo(阿瑞佐)。他第一次有意识地为基督宗教的“复兴”和“再生”概念作出一种歪曲的解释,就是说他从世俗世界和政治的角度(意大利民族的“复兴”)来理解“再生”。在 1341 年,Neapolis(那不勒斯)的国王 Robertus(罗伯特)给 Petrarca(彼特拉克)举行一种“加冕礼”,在罗马的 Capitolium(卡皮托里山)宣布他为诗人。Petrarca(彼特拉克)很热心地搜集古代大师的手抄本,他是拉丁语书信风格的能手,也曾编写过一些道德哲学论文(比如 *De contemptu mundi*《论蔑视世俗》等),其中用基督宗教的语调来论述 Stoa(斯多亚派)的人生哲学。他看不起经院思想并在他的无名信集(*Liber sine nomine*《无名书》)中尖锐地谴责教会的情况和 Avignon(阿维尼翁)教廷的缺陷,虽然他自己也是一个有 praebenda(教产收入)的圣职人员(他有 ordines minores 小品)并曾经在 Avignon(阿维尼翁)的教廷生活十几年。Florentia(佛罗伦萨)成为人文主义运动的第一个基地。在那里的 Giovanni Boccaccio(薄伽丘,1375 年去世)也已经开始认真地对待希腊文学。他最有名的著作是 *Decamerone*(《十日谈》)这是一部用意大利语写的“故事集”,充满讽刺性。自从 1396 年以来,来自拜占庭的 Manuel Chrysoloras(克里索罗拉)在 Florentia(佛罗伦萨)当希腊语老师,后来也在意大利别的地方教古希腊语。他在 Constantia(康斯坦茨)的大公会议上去世(1415 年),而该会议和 Basilea(巴塞尔)会议及 Florentia(佛罗伦萨)会议一样都对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具有重要的影响。一些渴望学习新知识的意大利人,比如 Guarino de Verona(挂瑞诺)和 Francesco Filelfo(菲雷夫)亲自去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因为他们想从根源上学习希腊哲学和文学,后来要在自己的家乡传播这个传统。东、西方教会的合一运动以及 Ferrara - Florentia(菲拉拉 - 佛罗伦萨)的主教会议(参见 144. 1)吸引了很多有学问的希腊人来到意大利,比如那位在宗教思想上很自由的 Georgos Gemisthos Plethon(普莱顿,1452 年去世),他使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热烈爱慕 Platon(柏拉图)的思想。他的学生是 Nicaea(尼西亚)的总主教 Bessarion(贝萨里翁,参见 144. 1),他在教会合一运动中具有杰出的贡献,因此被教宗 Eugenius IV(尤金尼乌斯四世)提名为枢机主教(1439 年),后来在罗马定居并在那里很明智的、又很慷慨地支持人文主义者(1472 年去世)。土耳其人在巴尔干半岛上占领越来越多的地区,而希腊的帝国没落(1453 年)强迫很多拜占庭的学者去西方避难。因此,人文主义运动似乎逐渐成为所有意大利学者的共同兴趣。印刷技术的发明

也大大地促进了人文主义的传播。Florentia(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富裕商人家族 Medici(美第奇)的成员慷慨地支持艺术和学术,尤其是 Cosimo Medici(克西摩·美第奇,1474 年去世)和他的孙子 Lorenzo Medici(号称 il Magnifico“杰出的”美第奇,1492 年去世,参见 154)。根据 Plethon(普莱顿)的建议,Cosimo(克西摩)在 Florentia(佛罗伦萨)创立了一所“柏拉图学院”,其院长是翻译 Platon(柏拉图)著作的 Marsilio Ficino(菲奇诺,1499 年去世)。从根本来看,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最喜欢的哲学就是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柏拉图主义。自从 Nicolaus V(尼苛劳/尼哥拉五世)以来,罗马的教宗们也相当热心地培养这种新的思想潮流和艺术风格,尤其是 Sixtus IV(西斯图斯四世)、Julius II(尤利乌斯二世)和 Leo X(良/利奥十世,参见 156,157)。意大利的其他贵族宫廷,比如 Milano(米兰)的 Visconti(维斯孔提)贵族,Mantua(曼托亚)的 Gonzaga(公找伽)贵族,Ferrara(菲拉拉)的 Este(厄斯特)贵族,Urbino(乌尔比诺)的 Montefeltro(蒙特菲尔托)家族和 Neapolis(那不勒斯)的 Aragon(阿拉贡)王朝都仿效了这个榜样。在 Padua(帕多瓦)和 Bologna(博洛尼亚)大学也有很旺盛的人文主义研究。在这些大学里,新教育的代表首次被称为 humanista(人文主义者),而那些保持固有传统的人被称为 artista(“七个自由学科的人”,“经院思想人”)。一些杰出的人文主义者(除了上面提到的之外)是 Camaldolesi(加马尔多里会)的总会长 Ambrosius Traversari(特拉维撒里,1439 年去世,参见 144.1),他对于希腊语有良好的掌握,尤其在圣职人员的圈子中传播人文主义的思想,还有 Florentia(佛罗伦萨)的宰相 Coluccio Salutati(撒鲁塔提,1406 年去世)和 Leonardo Bruni(布鲁尼,1444 年去世),那位杰出的教育家 Vittorino da Feltre(菲尔特,1446 年去世)——他在 Mantua(曼托亚)培养王家的儿子们。Poggio Bracciolini(波焦,1459 年去世)曾经当教廷中的秘书,后来在 Florentia(佛罗伦萨)当宰相,他是人文主义书信风格的大师,但更有名的是他的 *Facetiae*(《故事杂集》)。罗马人 Lorenzo Valla(瓦拉,1457 年去世)是“文学革命的真正狂飙者”,他主张一种享乐主义的伦理学(参见他的 *De voluptate*《论欲望》),讽刺隐修者的圣愿并且非常尖锐地谴责“君士坦丁的赠予”(参见 85.3),又反对教宗的世俗权力。

155.2 在 Alpes(阿尔卑斯山脉)以北,人文主义的思潮传入法国、荷兰、英国、匈牙利和波兰,尤其在德国地区。Carolus IV(查理四世)皇帝和他在 Praga(布拉格)创立的国家秘书室早已受其影响。这一点可以参考皇帝的宰相 Johannes von Neumarkt(约翰内斯)的例子:他是 Leitomischl(莱托米施)的主教,后来是 Olmouc

(欧尔姆茨)的主教(1380年去世)。这位主教和宰相是 Petrarca(彼特拉克)和 Cola di Rienzo(科拉)的朋友,他编写了一部“典范书信集”并且很熟练地将教父们的著作译成德语。关于 Johannes de Tepla(约翰内斯·特普拉),参见 153.3。在那些“共同生活弟兄会”(参见 151.3a)的团体中,新的教育工作和教育方式也获得了一个精神家园。指导 Deventer(得文特尔)学校的人是 Alexander Hegius(黑格乌斯,1498年去世),他是一位典型的教育家和早期人文主义者。很多在意大利大学留学的德国人接受了人文主义,而一些在德国地区生活的意大利人也成为人文主义的传播人,比如 Enea Silvio de Piccolomini(皮科罗米尼,参见 144.3)。在 15 世纪末,很多大学的“七个自由学科”的学院(Artistenfakultaeten,其“本科生学院”)都广泛地接受了人文主义思想,比如在 Wien(维也纳)、Basel(巴塞尔)、Freiburg(弗莱堡)、Heidelberg(海德堡)、Tuebingen(图宾根)、Ingolstadt(因格尔施塔特)、Erfurt(爱尔福特)、Leipzig(莱比锡)的大学,以及在很多帝国城市也有一些支持者,如在 Nueremberg(纽伦堡)、Strasbourg(斯特拉斯堡)、Augsburg(奥格斯堡)、Colonia(科隆)。这样,德国的学者似乎都讨论人文主义的问题。其中最核心的基地是上面提到的荷兰的 Deventer(得文特尔)的拉丁语学校(它是由那些 Fraterherren 弟兄会管理的)、在 Schlettstadt(施莱特施塔特)的拉丁语学校, Muenster(明斯特)的大堂学校以及 Erfurt(爱尔福特)大学。其中最有威望或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是:Konrad Mutianus Rufus(慕提阿努斯,1526年),他在 Gotha(哥达)当圣职团成员,热烈反对经院思想,在宗教上也很自由地领导了附近的 Erfurt(爱尔福特)的人文主义者。那位在私人生活和人格上非常可敬的并始终爱戴教会的 Johannes Reuchlin(瑞克林,1522年去世),他来自 Pforzheim(弗茨海姆),曾经在 Wuerttemberg(维尔滕堡)当过 Eberhard im Bart(艾伯哈德)伯爵的法律顾问,后来在 Ingolstadt(因格尔施塔特)和 Tuebingen(图宾根)当教授,教希腊语和古希伯来语,对两个语言的教学都很有贡献(关于 Reuchlin 瑞克林和关于犹太人文献的争论,请参见下文,155.4)。在 Kreuznach(克瑞茨纳赫)附近的 Sponheim(斯彭海姆)的本笃会院长 Johannes Trithemius(蒂特米乌斯,1516年去世)非常用功。那位具有崇高人格的教育家 Jakob Wimpfeling(温菲林,1528年)也是一个著名的爱国者,被称为 Praeceptor Germaniae(德国的老师)。来自法兰克地区的 Ulrich von Hutten(胡滕,1523年去世)骑士是一个有激情的、不安定的人,也缺少道德标准,但他又是一个有才华的、活泼的诗人和讽刺家,对罗马(教廷)强烈的反感。在宗教改革的时期(1520年

后),他的影响才变得比较大。那位施瓦比亚人 Heinrich Bebel(贝贝尔,1518 年去世)曾经在 Tuebingen(图宾根)大学(在 1496 年后)当诗学和修辞学教授,他写过一些部分上是下流的讽刺(根据 Poggio 波焦的模样),又写了讽刺诗 *Triumphus Veneris*(《爱神的胜利》),但他并没有全面地反对教会或隐修院文化。然而,那位来自荷兰的 Desiderius Erasmus Roterodamus(伊拉斯谟/埃拉斯谟,1466 - 1536 年)远远超过一切德国的人文主义者,因为他的知识更广泛,他的著作更多,他的威望更高,无论是在学者的圈子里还是在全欧洲的贵族或在教会圈的子里。他是一位杰出的希腊语专家和熟练的拉丁语大师。当时代的人称他为“知识王国中的大君王”。他的理想是基督宗教的 *humanitas*(人道精神)。他愿意帮助神学一步一步地脱离经院思想的僵化,愿意再一次揭开信仰的泉源,就是《圣经》和教父们的著作,这都值得赞美。他也出版了一部原文的《新约》(参见 145.5),并出版很多教父的著作,这方面有很大的功劳。然而,他并没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教会复兴运动的引导者,因为他缺乏一种坚定不移的信仰基础。他的世界观没有信条,只是一种相对主义和机会主义,而他的 *philosophia Christi*(“基督的哲学”)与一种 *Stoa*(斯多亚)的道德说教没有太大差别。特别有影响的是另一点:他很巧妙地讽刺或挖苦一些教会的人或教会的机构(参见下文,155.3),这样为宗教改革准备了一条路,而在改革的初期阶段中,他的态度也摇摆不定,缺少固定的方向。他的人格也有一些明显的缺点。

155.3 这种人文主义运动对于教会和宗教的态度不一致,它因人而变,因地而变,在不同的时期也不同。无论如何,很多早期的意大利和德国人文主义者通过他们个人的节制和通过他们的著作表明,他们所提倡的新思想并不反对传统的信仰,并不放弃对教会的爱戴。Jakob Burckhardt(布克哈德)曾经说,文艺复兴基本上有一种“非宗教的,非基督宗教的”特点(*areligioeser, heidnischer Charakter*),但这个说法不能成立。L. Pastor(帕斯托尔)试图清楚地区分一种“非基督宗教的人文主义”和一种“基督宗教的人文主义”,但这种区分也是不可能的。那个比较保守的派别和那个激烈的派别是并行的,又混合在一起。在早期,保守派占上风。

毫无疑问,那些人文主义者在研究和教育方面有很大的贡献,他们扩大了西方人的视野。经院思想在很多方面失去了原来的精神,而人文主义者强调语言的重要性、生活和灵活性,他们支持对大自然的自由观察和研究,他们再次恢复了语文学和历史学上的文本分析,他们激活了对《圣经》的研究,他们促进了人们的古代研

究和历史意识,这样又创造了“民族意识”,他们也使用一些新的、进步的教育方法。然而,这个运动也带来了一些危险。对于古代文化的片面崇拜导致部分“诗人”和“哲人”仅仅在外教的经典中找一些宗教和道德问题的答案。他们放弃了基督宗教的启示,部分上或全部地用外教人的世界观来代替基督信仰,他们拒绝教会的权威性,又跨越了基督宗教道德观的种种标准,甚至陷入一种完全没有道德标准的状态(voellige Amoralitaet)。人文主义对一切传统东西的狡猾讽刺引导很多人走入怀疑主义,同时离弃启示的信仰,尤其在意大利。Pomponius Laetus(彭波尼乌斯)约于1460年创立了“罗马学院”(Academia Romana),他当这个学院的指导者,自称为Pontifex Maximus(大司祭),而其中的学生不仅都有古代人的名字,而且在态度上也比较靠近外教传统,远离基督信仰,所以Paulus II(保禄/保罗二世)教宗终于采取了一些取缔“罗马学院”的措施(参见156.5)。部分的圣职人员——甚至在教廷中的人士——也支持这种新的享乐主义和自由主义(Epikureismus und Libertinismus)。一些上面已经提到的人以及Antonio Beccadelli(贝卡德里,1471年去世)和Pietro Aretino(阿瑞提诺,1556年去世)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写出了一些丧失任何道德水平的思想和讽刺。来自Florentia(佛罗伦萨)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Niccolo Machiavelli(马基雅弗利,1469-1527年)具有热烈的爱国精神。他在其Il principe(《君主论》,1513-1514年)中用Alexander VI(亚历山大六世)教宗的儿子Cesare Borgia(杰萨·波尔加,参见154.3)为例,描述了一种完全脱离任何道德原则或伦理约束的政治家,就等于说在他的思想中的政治行动是完全“自律的”。他认为,基督宗教的美德,比如“博爱”或“谦逊”仅仅是软弱的表现。对他来说,宗教仅仅是国度政权手中的工具,统治者可以利用宗教来提高自己的威望和权威性。这个作者也很激烈地反对教宗在教会国的世俗权力,因为他想意大利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度的主要原因就是教宗的权力。

那些人文主义者不仅尖锐地谴责经院思想的拉丁风格,他们进而有意识地分裂了神学和哲学,使哲学脱离神学的秩序和思想基础。他们世界观的基础是古希腊的思想,在Florentia(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院”中,柏拉图似乎享受神仙一般的崇拜。那些现代化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或Stoa(斯多亚派)的追随者,比如Padova(帕多瓦)的Pietro Pomponazzi(Pomponatius)(蓬波纳齐,1525年去世)否认灵魂的不朽,否认神对世界的管理,否认奇迹。他们利用Averroes(阿威罗伊)那种“双重真理”的理论(神学的真理和哲学的真理不同,参见135.1)来掩蔽自己的观点。第

5 届 Lateranus(拉特兰)主教会议于 1513 年谴责了这种观点。

另外,很多人文主义者对于教会提出了一些毫无保留的或无度的批评,他们讽刺和嘲笑教会中的问题、经院思想的缺点、隐修士和圣职人员,这样他们削弱了对教会圣统制的尊敬,确实为信仰分裂准备了一条路。Erasmus(伊拉斯谟)也属于那些讽刺的人,因为他的 *Moriae Encomium*(亦称 *Stultitiae laus*《愚蠢颂》,1509 年)和他的 *Colloquia familiaria*(《家中谈论》,1518 年)也包含着一些相当无情的、滑稽的抨击,他也讽刺经院思想、隐修院生活、朝圣的习惯、对圣人的尊敬、守斋的习俗等。

155.4 因为旧思想和新风格之间的冲突非常大,在经院思想的代表和人文主义者的代表之间的冲突是必然的。这种冲突必然越来越严厉,因为重视传统的人很坚硬地恪守那些具有缺陷的旧思想(在 16 世纪初,很多人批评说,大学中的神学思想没有创造力)。在 Ingolstadt(因戈尔施塔德)大学的两位教授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Georg Zingl(曾格勒)和 Jakob Lochner Philomusus(罗赫内)争论如何在学校阅读古代文献和非基督宗教作者文献的问题。Lochner(罗赫内)是一个很自信的、极端的、年轻的人文主义者,非常无礼地讽刺他的对手,所以甚至连 J. Wimpfeling(温菲林)也开始写文章来保护神学,虽然他自己也是一个人文主义者。

更有灾难性影响的争论是关于 Reuchlin(瑞克林)和犹太人文献的争论。在德国 Colonia(科隆)的医院院长 Johannes Pfefferkorn(普费费尔孔),是一位受洗的犹太人,太过于强调基督信仰并贬低其他的宗教,所以他从皇帝那里获得一个许可(1509 年),可以毁灭犹太人的 Talmud(《塔木德》,即犹太人的法典注解)以及晚期拉比的文献,因为据说这些文献阻碍犹太人的皈依。当时在德国最杰出的犹太学专家是 Reuchlin(瑞克林,参见上文 155.2),他于 1510 年发表了一个尖锐地批评这种说法的文章,并认为唯独那些直接嘲笑基督信仰的犹太文献可以烧毁。因此,两个人之间暴发了一个激烈的论战(参见 Pfefferkorn 的 *Handspiegel*《手镜》和 Reuchlin 的 *Augenspiegel*《眼目之镜》)。那位在 Colonia(科隆)当神学教授的道明会会士 Jakob Hochstraten(胡克斯特瑞登,1527 年去世)——他也管理异端裁判所——针对 Reuchlin(瑞克林)起诉,因为他认为这个拥戴犹太人文献的人可能是异端者。德国 Speyer(施佩耶)主教主持的法院宣布 Reuchlin(瑞克林)是无罪的(1514 年),但 Hochstraten(胡克斯特瑞登)向罗马申诉,而因为宗教改革带来了一些混乱,罗马的法院于 1520 年谴责 Reuchlin(瑞克林),要求他保持缄默并付出法院费用,同时禁止他的 *Augenspiegel*(《眼目之镜》),因为这部书片面地支持犹太人并会引起争论。

然而,在那个时候,两个人的争论已经扩大为人文主义者和经院思想家之间的普遍论战。全德国以及德国以外的人都很好奇地阅读双方的文献,但怨恨与愤怒也越来越多。Reuchlin(瑞克林)于1514年写过一部 *Clarorum virorum epistolae*(《名人书信集》),其中总结了很多支持他的人的观点,将这些人的主张也公开化。然而,于1515/1517年间,一些人文主义者发表了一种讽刺文献,就是著名的 *Epistolae obscurorum virorum*(《无名人士书信集》),这些 *Dunkelmaennerbriefe*(“黑客之信”)的作者主要是 Erfurt(爱尔福特)的 Crotus Rubianus(儒比阿努斯)和 Ulrich von Hutten(乌尔里克)及 Hermann von dem Busche(赫尔曼);他们假装是 Reuchlin(瑞克林)的攻击者并用很野蛮的拉丁语向 Colonia(科隆)的神学家 Magister Ortvinus Gratius(格拉提乌斯)写了这些信。这种虚构著作的目标是谴责和嘲笑教会和隐修院中的无知、虚伪和堕落。在这个信集第二个部分,他们完全轻蔑教会的权威和宗座。这些信又发动了一个庞大的论战,这样在很多地方创造了一种反对经院思想、反对罗马、反对教会的气氛,为人们在思想中接受一种革命性的变化作了准备。

156

从 Nicolaus V(尼苛劳五世)到 Paulus II(保禄二世)的 文艺复兴教宗(1447 - 1471 年)

156.1 教宗 Nicolaus V(尼苛劳/尼哥拉五世,1447 - 1455 年)在解决教会分裂方面具有贡献,他也缓和了德国与罗马之间的冲突,与德国皇帝签订了《维也纳政教协议》(1448 年,参见 144.3,4)。同时,他也是第一个“人文主义者教宗”。他影响了教廷转向一个新的文化政策(*neue Aera der Kulturpolitik der Kurie*),也就是所谓的“文艺复兴教宗们的时代”,这个时期维持到 Leo X(良/利奥十世,1512 年去世)。在外表上,这个时代呈现出很辉煌的成就,但在信仰和教会生活方面,这个时代也有很多阴暗之处。Nicolaus V(尼苛劳/尼哥拉五世)教宗喜欢那种新的艺术和文学风格(所谓的“佛罗伦萨风格”),所以他很重视罗马教堂的装修和美化,又建立了一些新的大楼。另外,他热心地搜集一些手抄本,这样成为梵蒂冈图书馆的真正创立人——这个图书馆在世界上也真是独一无二的。在 1450 年,他隆重地举行了一个普遍的大禧年(参见 152.2),这样又吸引了众多朝圣者来罗马,同时也获得

很多捐款。教宗于1452年3月19日为Habsburg(哈布斯堡王朝)的Fredericus III(腓特烈三世,1440-1493年)皇帝举行加冕礼——这是最后的在罗马举行的皇帝加冕礼。然而,这个礼仪没有给基督宗教世界什么深的印象。Nicolaus(尼苛劳/尼哥拉)教宗没有意识到教会改革问题的全面意义,虽然他对改革有兴趣,因为他派遣一些使者到各地推动一些有关的措施。比如,那位很杰出的枢机主教Nicolaus Cusanus(尼苛劳·库撒努斯,参见145.4c)于1451-1452年在德国与荷兰地区活动,想努力提高教区司铎和隐修院的素质。他在Mainz(美因茨)和Colonia(科隆)举行一些教区会议,这样结束了他的工作。教宗有远见和充足的精力,所以他能够在意大利各力量的混乱争夺中保持和巩固教会国,至少在后来的几十年内能够达成一个稳定的局面。这种和平政策的顶峰是一个“大意大利联盟”的签订,属于这个联盟的国度是教宗、Neapolis(那不勒斯)、Florentia(佛罗伦萨)、Venetia(威尼斯)和Milano(米兰)(1454/1455年)。教宗Nicolaus(尼苛劳/尼哥拉)生活的最后几年受了一种阴谋的影响,因为Stefano Porcaro(波卡若),这个善于煽动人们的贵族,和另一些叛徒计划推翻教宗的权力,甚至想杀害教宗。然而,人们及时发现他们的阴谋,而那些叛徒的领导者被处死。

156.2 对教宗来说,在东方的希腊教会所发生的种种事件也不令人愉快。罗马教会和东方的教会于1439年在Florentia(佛罗伦萨)达成的协议(参见144.1)和那个在13世纪建立的共识一样——它没有很厚的支撑基础,这样也无法长期维持。东方教会的民众、希腊教会的圣职人员和隐修士大多数的人都反对他们皇帝的政策,他们并没有接受“合一”的思想。

在俄罗斯,Moscovia(莫斯科)的大公Vasilius II(=Basilius,瓦西里二世,1425-1462年)反对教会的合一。Kiova(基辅)的总主教和枢机主教(1438年)Isidorus(伊西多尔)在Florentia(佛罗伦萨)的主教会议上无私地推动了教会的合一,但当他回国后,大公逮捕他并押送他到监狱里,又于1441年举行一个地区性的主教会议,其中要求主教们放弃与罗马教会的合一。然而,Isidorus(伊西多尔)能够逃跑,他去了罗马。东方的宗主教们,就是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太)的宗主教、Antiochia(安提约基亚/安提阿/安条克)的宗主教和Jerusalem(耶路撒冷)的宗主教们原来通过他们的代表都同意了教会的合一,但他们于1443年已经退出教会合一。Johannes VIII Palaeologus(约翰内斯八世)皇帝对教会合一的大事也越来越冷漠,因为他看到他的希望没有实现:他盼望,通过合一能够抵抗土耳其人。土耳

其人的军队于1444年在黑海边的 Varna(瓦尔纳)打败了匈牙利人,于1448年在 Amsfeld(安塞尔费德,在 Kosovo 科索沃地区)他们又打垮了匈牙利人。新皇帝是 Johannes(约翰内斯)的弟兄 **Constantinus XI Palaeologus**(君士坦丁十一世,1448 - 1453年),他在1452年12月通过教宗的使者 **Isidorus**(伊西多尔)重新肯定了与罗马教会的合一,但这种政策仅仅维持很短的时间。土耳其人越来越紧密地围绕了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5月29日,该城市落入 **Muhammed II**(穆罕默德二世)的手中。**Constantinus**(君士坦丁)皇帝阵亡。许多居民被杀,好几千个人成为俘虏,被送到别的地区。剩下的居民被允许继续当基督徒,但那个新的统治者很残酷,他用镇压和引诱的方式来吸引他们加入伊斯兰教。虽然如此,大部分的希腊人坚守原来的信仰。当然,这个新的统治者支持教会的分裂,他反对合一。这个 Sultan(苏丹)亲自指定一个反对教会合一的隐修者——**Gennadius**(格纳丢斯)——当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1472年在 Constantinopolis(君士坦丁堡)举行的主教会议正式否认与西方教会的合一。俄罗斯于1459年宣布脱离 Byzanz(拜占庭),而 **Moscovia**(莫斯科)不久后被称为“新罗马”或“第三个罗马”。

拜占庭帝国在好几百年的时期内都是基督宗教文化和教会的坚固堡垒,它曾经长期抵抗了斯拉夫人和穆斯林军,它现在的没落为整个西方世界带来悲痛和深深的哀叹。人们想在欧洲地区存在着一个“大土耳其帝国”,这是世界历史上的一次不吉祥的转折。实际上,种种后果也确实非常严重。在斯拉夫地区和巴尔干半岛(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的基督宗教遭受到了武力的镇压,而这些地区的西部边界又受到土耳其人的威胁。教宗 **Nicolaus**(尼苛劳/尼哥拉)早就呼吁西方的基督徒团结起来,他发表了一个诏书,要求大家共同抵抗土耳其人(称他们为“反基督者的先驱”(Vorlaeuffer des Antichrist),但西方人彼此不和睦,而他们的宗教热忱越来越弱,所以教宗的努力没有效果。由此可见,12世纪西欧人的宗教感情(参见十字军运动)已和15世纪的情况大不一样了。

156.3 土耳其人的问题也是后来几任教宗所关切的,同时也是阻碍教会改革的主要原因:当时的教宗们似乎都没有余力太注意到教会的改革。那位77岁的来自西班牙的 **Alonso de Borja (= Borgia)**(阿伦索·波尔亚)枢机是下一任教宗:**Calixtus III**(卡里斯图斯三世,1455 - 1458年)。他马上重复那种对“抵抗土耳其人的十字军运动”的呼吁,要求人为此作祈祷(参见152.5)或举行祈祷游行,向各

国派遣一些使者,并用自己的资金来装备和组织海军来攻击土耳其人。然而,大部分西方地区对教宗的努力仍然保持一种冷漠的态度:德国人不支持教宗,因为《维也纳政教协议》没有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教廷的税收。教宗规定要收一个“反抗土耳其人的什一税”,但巴黎大学的人反对这种规定并说要召开一个大公会议来谈论这个问题(!)。在那些有海军国家中, Venetia(威尼斯)很担心它在东方的财产以及与小亚细亚地区的贸易,所以威尼斯人早在 1454 年已与苏丹签订了一个可耻的“特殊和平”协议。唯独那些遭受特别大威胁的匈牙利人比较热切地支持教宗。在那里有王国的统帅 Johannes Hunyadi(匈雅提,1387 - 1456 年),他后来成为年轻国王 Ladislaus V Postumus(拉迪斯劳五世,1440 - 1457 年)的监护人。这个将军很勇敢地抵抗土耳其人,部分上也很成功。那位非常杰出的枢机特使 Juan de Carvajal(卡瓦亚尔)和著名的讲道家 Johannes de Capestrano(约翰内斯·卡佩斯特拉诺,参见 151.2)也很支持匈牙利人的抵抗。Johannes de Capestrano(约翰内斯)吸引了很多来自德国、波兰和匈牙利的战士,所以他对 1456 年 7 月 21 - 22 日在 Belgrad(贝尔格拉德)的胜利最有贡献。当时, Muhammed II(穆罕默德二世)的军事力量远远超过抵抗者,但他们仍然能够战胜敌人。不幸的是,他们无法利用这次胜利,因为 Hunyadi(匈雅提)和 Capestrano(卡佩斯特拉诺)两个人在同一年去世。

Calixtus(卡里斯图斯)教宗对于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事业的态度比较冷漠,但他很关心自己亲戚的利益。比如,他提名他的两个侄子为枢机——其中有那位道德水平很低的 Rodrigo de Borja,就是后来的 Alexander VI(亚历山大六世)教宗——并给予他们很多地产以及很高的职位。他又将 Spoleto(斯波雷托)公国交给另一个侄子(名叫 Pedro 佩德若)。这些“カタラニ人”(= 西班牙人)在罗马的表现太自大,因此引起许多人的反感。遗憾的是,这种明显的“政治性的重用亲戚”的作法(ausgesprochen politischer Nepotismus)在后任教宗中也有一些模仿者,甚至有更加剧的现象。

在 Nicolaus V(尼苛劳/尼哥拉五世)和 Calixtus III(卡里斯图斯三世)的时期,法国的国家圣人/圣徒 Jeanne (= Joan) d' Arc(冉·达克/贞德)的荣誉被恢复。这个思想简单的、虔诚的乡下女孩(她来自 Maas 马斯河边的 Domremy 多姆瑞米)于 1429 年听到一些声音,见到一些神视,因此被推动拯救祖国——当时英国人给法国很大的压力。她帮助解放被围攻的 Orleans(奥尔良)城,又引导那个缺乏勇气的国王 Carolus VII(查理七世)去 Reims(兰斯)举行加冕礼(1429 年 7 月)。然而,她

于1430年5月落入Burgundia(勃艮第人)的手,而他们又将她交给英国人。英国的政策当然要求她得死去。当时,Beauvais(博维)的主教 Petrus Cauchon(考熊)——一位缺少骨气的人——指导了一个比较长的、不正当的和不相称的异端法庭,最后宣布她为异端分子和魔术师。此后,Jeane(冉/贞德)说她要作补赎,但又收回自己的“承认表白”,所以他们称她为“顽固不化的异端人”,并于1431年5月30日在Rouen(鲁昂)城中广场被烧死。20多年后,Carolus VII(查理七世)王希望再次检察她的“案件”,结果她于1456年7月7日在Rouen(鲁昂)被隆重宣布为无辜的,而教宗 Calixtus(卡里斯图斯)教宗为此给予许可。这个女士于1909年(由 Pius X 比约/庇护十世)被宣布为“真福”,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Benedictus XV(本笃十五世)教宗将她宣布为教会的圣人/圣徒(1920年5月16日)。

156.4 除了 Nicolaus V(尼苛劳/尼哥拉五世)以外,最杰出的文艺复兴教宗是 Pius II(比约/庇护二世,1458-1468年),他就是原来的人文主义者 Ennea Silvio de Piccolomini(波科罗米尼,参见144.3)。他是一个很有精神的讲演者和作者,曾支持 Basilea(巴塞尔)大会议那些反对教宗的人,后来(1442年)又当 Fredericus III(腓特烈)皇帝的秘书,一步一步脱离早期的松懈生活原则,逐渐有了严肃的人生观,这样于1447年成为 Trieste(意大利北部的里雅斯特)的主教,1450年成为 Siena(锡耶纳)的主教,1456年被选为枢机主教,最后任教宗。在他任期内的主要目标是统一欧洲,拯救基督教世界免受土耳其人的攻击。当时的情况非常危险,因为 Muhammed II(穆罕默德二世)已经开始侵略 Serbia(塞尔维亚)、Bosnia(波斯尼亚)和 Epirus(厄皮儒斯)地区。教宗在 Mantua(曼托瓦)召开了一个全欧洲的大会(1459年/1460年),以响亮的讲演举行开幕典礼,但来参与的人并不多,德国皇帝也只是派遣了一些代表,并没有亲自出面;该会议只作出一些规定,但没有引发什么行动。Hunyadi(匈雅提)的儿子 Matthias Corvinus(玛迪亚·科维努斯,1458-1490年)是匈牙利人的能干领导,他打退土耳其人。另外,Albania(阿尔巴尼亚)的国君 Georgius Castriota(卡斯特瑞欧塔)在1444年以后在自己家乡的游击战中表现得非常勇敢,所以土耳其人称他为 Iskender Bey 或 Skanderbeg(斯坎德倍,就是“亚历山大王”的意思)。然而,阿尔巴尼亚人的国家英雄也无法阻挡土耳其人在他家乡地区的侵入。其他的国度的领导无法达成共识,他们也不热切地支持战争。教宗派遣 Bessarion(贝萨里翁,参见155.1)枢机到德国(1460年-1461年)以及 Venetia(威尼斯,1463年),但这个行动似乎都失败了,为教廷带来的结果令人感到

失望。欧洲各地的人对于教宗似乎有一种敌对的情绪,他们只想自私地保护自己。最终,教宗自己想领导一个船队来抵抗土耳其人,但因过度疲惫,他在出发之前于1464年8月14日在 Ancona(安科纳)港口去世。Pius II(比约二世)是唯一的写过自传并在其中描述其任期过程的教宗(参见他的 *Commentarii rerum memorabilium* 《重要事件记》)。

教宗很注重反抗土耳其人的战争,但同时忽略了其他的任务。虽然 Pius II(比约二世)教宗很想控制教廷和教会中的弊端,但他没有完成一个比较大规模的改革运动。他委任一个教会改革委员会,并请 Nicolaus Cusanus(尼苛劳·库萨)枢机拟定一个改革计划(参见 145.4c)。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恶习,就是人们如果不喜欢教廷的某些规定,他们就说应该召开一个大公会议,因此教宗在 1460 年发表了 *Execrabilis*(《该除掉的》) 诏书来反对这种恶习。然而,因为他自己是原来参与了 Basilea(巴塞尔)会议的成员,甚至当过当时的反对教宗的秘书,所以一些人讽刺他思想的转变。因此,教宗在 1463 年发表了著名的“收回诏书” *In minoribus agentes*(《年轻时的行动》),其中否认了原先在不成熟的年轻时期所发表的观点,并要求大家相信他现在的信念[最有名的句子是 *Aeneam reicite, Pium recipite*“你们应该反对原来的埃涅亚斯(即人文主义者),应该接受现在的比约”,注意:众所周知,在 Vergilius 维吉尔的名著中多次出现 *pious Aeneas*“虔诚的埃涅亚斯”这样的词]。

在 Pius II(比约二世)之前的教宗们都想取消 Pragmatic Sanction of Bourges(《布尔日国事诏书》,参见 144.2),因为这个诏书在很大的程度上减弱了教宗在法国的权力。Pius(比约)教宗在这方面获得了一个小的突破,因为法国的 Ludovicus XI(路易十一世,1461-1483 年)于 1461 年收回了这个诏书,因此教宗赐给他 *Rex christianissimus*(“最有基督精神的国王”)的头衔。虽然如此,这只是表面上的成就,因为法国的国王不久后通过一些相反的规定再一次恢复了“高卢教会的种种自由权利”。

156.5 下任教宗是 Venetia(威尼斯)的枢机主教 Barbo(巴博),取名 **Paulus II**(保禄/保罗二世,1464-1471 年),他在当选之前和其他的枢机们一起发誓说,将来的教宗必须继续反抗土耳其人,必须限制“重用亲戚”的恶习,必须在三年之内召开一个大公会议等。然而,当选后,这个教宗说这种誓言没有约束力,因为它与教会的制度和利益有冲突,所以他强迫枢机们取缔这种约定。当时,枢机团很严肃地反对他。Paulus II(保禄/保罗二世)也努力抵抗土耳其人,但所获得的成就比以前

更小,虽然 Skanderbeg(斯坎德倍)亲自来罗马求助(1466年)。反过来,土耳其人一步一步地前进。Paulus(保禄/保罗)喜欢豪华的生活,对人文主义的研究也有一点兴趣,但他于1464年由于一些弊端取缔了教廷秘书室的 collegium abbreviatorum(“注解团”),这样开除了70个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很多人文主义者,所以那些文艺复兴者极力反对教宗。另外,Pomponius Laetus(彭波尼乌斯)指导的“罗马学院”(参见155.3)具有外教人的精神,也被怀疑准备一个阴谋,所以教宗采取了严格措施来镇压这个“学院”(1468年)。一个被开除的 abbreviator(秘书)是 Platina(普拉提纳),他后来在他的著名 *Vitae Pontificum Romanorum*(《罗马教宗列传》,1479年在 Venetia 威尼斯出版)中进行报复,在这本书中丑化了教宗的形象。

157

从 Sixtus VI(西克斯图斯六世)到 Leo X(利奥十世)的 文艺复兴教宗(1471 - 1521 年)

157.1 在后来50年中的教宗们——从 Sixtus IV(西克斯图斯四世)到 Leo X(良/利奥十世),即从1471年到1521年——呈现出一个很低的水平,从宗教生活和信仰的角度来看,这是10、11世纪以来罗马宗座最堕落的时代。在这个时期,个人的人格不符合其地位的崇高尊严,具体的行动也不符合教宗职位的理想。虽然在这些教宗当中有一些大力资助了文艺复兴的艺术,因此也获得了不朽的荣耀,但他们都忽略了教宗的首要任务,就是照顾宗教性的生活和教会的需要,以及进行教会的改革。这些教宗们与意大利的其他世俗领袖似乎没有差别,他们追求一些世俗的和政治性的目标,他们谋求自己家族的利益,这种似乎明目张胆地“重用亲戚”的作法,使之成为一个固定的制度。教宗牧职的世俗化很清楚表明,基督的精神在当时远离了教廷,而在教会内也很薄弱。这种情况就必然会导致整个基督宗教世界的重大危险。

在 Paulus II(保禄/保罗二世)后,Francesco della Rovere 枢机当选教宗,取名 Sixtus IV(西克斯图斯四世,1471 - 1784年),他原来是方济各会的总会长,后来也始终支持这个修会,他在神学方面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很慷慨地资助艺术和学术,扩大梵蒂冈图书馆,且开放它使之成为大众公用的机构。他美化市容,在梵蒂冈内

建造了以他命名的 Capella Sistina(“西斯图斯圣堂”),后来以非常优美的壁画装饰它。他打算组织所有的基督徒国家共同反抗土耳其人的侵略并派遣一些使者进行这方面的宣传,但西欧的人很少注意到他的劝勉。在意大利东南部的 Apulia(阿普利亚)地区的 Otranto(奥特朗托)城于 1480 年被土耳其人攻克,这就造成极大的危险,但幸亏苏丹 Muhammad II(穆罕默德二世)于 1481 年去世,而土耳其人内部的权力斗争使他们在后来几年中失去对欧洲的威胁性。当时,苏丹 Bajazet(巴亚泽特)驱逐了他的弟兄 Dshem(得升)王子,夺取了政权。因此,Dshem(得升)逃到 Rhodus(罗得岛)的 Johanniter(=Hospitaller 医院骑士团)那里,但他被押送到法国,后来(1489 年)又被送到罗马,后来他被拘留在梵蒂冈直到逝世(1495 年)。为此,教廷还要求他的弟兄 Bajazet(巴亚泽特)每年交纳一种年税。

Sixtus(西克斯图斯)的形象不太好,因为他的 nepotism(重用亲戚)倾向相当严重。他多次提升一些亲戚或使他们发财。上任后不久,他就提升两个侄子为枢机主教并给予他们很多教产,即是那位爱好奢侈生活的、很世俗化的 Giuliano della Rovere(后来的 Julius II 尤里乌斯二世教宗)以及那位挥金如土的、缺少道德标准的 Petrus Riario(瑞阿瑞欧,1474 年去世),他是一位方济各会会士。教宗又将 Imola(伊莫拉)公国封给另一个侄子,即 Girolamo Riario(吉若拉莫·瑞阿瑞欧),这是教会国的一部分地区。教宗也允许这个侄子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自己的决定和看法。教宗后来被牵入意大利的种种复杂政治斗争,主要是因为那个没有良心的 Girolamo Riario(吉若拉莫·瑞阿瑞欧)一心追求政治上的影响。Riario(瑞阿瑞欧)影响教宗支持 Pazzi(帕西)家族的阴谋——Pazzi(帕西)人想推翻当时在 Florentia(佛罗伦萨)掌握政权的 Medici(美第奇)家族(1478 年)。虽然教宗不赞成暴力,但 Giuliano de Medici(朱里安诺·美第奇)仍然在 Florentia(佛罗伦萨)的大堂中遭暗杀。他的弟兄 Lorenzo de Medici(劳楞佐·美第奇)是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真正领导,他能逃脱危险并在后来严厉地镇压了参加阴谋的人。因为这种复仇导致一些圣职人员被处死,包括 Pisa(比萨)的总主教 Salviati(撒尔维亚提),Sixtus(西克斯图斯)教宗绝罚了 Lorenzo(劳楞佐),又针对 Florentia(佛罗伦萨)城宣布禁罚。然而,教宗与这个小国之间爆发的战争没有结果。面临着土耳其人的威胁以及法国人的敌意,教宗只能收回他的惩罚措施,而 Medici(美第奇)人没有作出什么赔偿。不久后,他的侄子又使教宗牵入一些新的战争,比如与 Neapolis(那不勒斯)王 Ferrante(=Ferdinandus)I(菲迪南一世)的战争(1482 年),以及与 Venetia(威尼斯)的冲突

(1483 - 1484 年)。这些战争为教廷带来了许多挫折和侮辱,为教廷的名声造成很大的损失。同时,在罗马和教会国里发生很多分裂,主要是由于 Colonna(科罗纳)和 Orsini(欧尔西尼)家族之间的仇恨。道明会会士 Andreas Zamometic(匪莫梅提基,意大利人错误地称他为 Zuccalmaglio)曾经是 Saloniki(撒洛尼克)附近的 Granea(格拉内亚)的总主教,于 1478/1479 年充当 Fredericus III(腓特烈三世)皇帝的使者。他与教宗有冲突,因此先获得几国(法国、Neapolis、Florentia)暗中的许可,并于 1482 年在 Basileia(巴塞尔)宣布再一次召开一个大公会议。他要求教宗来到 Basileia(巴塞尔)并要求教宗受审判。虽然 Basileia(巴塞尔)城和 Constantia(康斯坦茨)的主教替他说话,但皇帝依然下令逮捕了他,他后来在监狱中死去(也许他自杀了)。当时,教廷中的很多职位是可以用钱购买的,而教宗又增多这些职位,提高了年税和增多了大赦的数目,这一切都引起人们的不满。在教宗去世后,罗马陷入一种无政府状态。关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创立,参见 150.3。

157.2 枢机团——枢机们当时似乎都是很世俗化的人——在会议中选择了一个 Genoa(热那亚)贵族人 Battista Cibo(西博)为 Innocens VIII(依诺森八世,1484 - 1492 年),他以前的生活也不是没有瑕疵的,而推荐他的人是 Giuliano della Rovere(后来的 Julius II);在选举的过程中甚至有行贿的因素。这个新教宗在任期的开始(1484 年 12 月 5 日)就宣布了那灾难性的“巫婆诏书”(参见 158.2)。他既没有力量,又没有愿望去抵抗教廷和教会内的种种恶习。教廷与 Neapolis(那不勒斯)再一次发生战争,为教宗带来很大的危险。教廷的财库完全被抽空,以致于需要抵押教宗的 Tiara(三环冠)以及部分的教廷财产。在教廷管理制度中有多方面的腐败。人们于 1489 年发现了一批教廷公务员,他们曾经向许多人出售伪造的“教宗诏书”。Innocens VIII(依诺森八世)在教廷秘书团中又创造了 18 个或 24 个职位,这些职位都是可以用钱购买的。这个教宗始终很关心他的两个孩子——这孩子来自他当司铎以前的时代,一男一女,都是私生子。他使儿子 Franceschetto(法兰谢托)与 Lorenzo de Medici(劳楞佐·美第奇)的女儿 Magdalena(马达勒纳)结婚,在梵蒂冈很隆重地举行婚礼。因为 Lorenzo(劳楞佐)拥护教宗,Innocens(依诺森)提升他的 13 岁的儿子 Giovanni de Medici(乔万尼,后来的 Leo X 良/利奥十世)为枢机(1489 年)。关于土耳其的王子在梵蒂冈入狱的事,请见上文,157.1。

157.3 当那位 62 岁的 Rodrigo de Borja (= Borgia)枢机——他是 Calixtus III(卡里斯图斯三世)的侄子,1456 年被提升为枢机(参见 156.3)——被选为教宗

Alexander VI(亚历山大六世,1492 - 1503 年)时,教廷的情况走入最恶劣的情况中。他早就渴望当教宗,现在因一些无耻的宣传当上了教宗。他是一个很圆通的、职业性强的人,懂得外貌上的隆重表现,又资助艺术和学术,但他的伦理道德水平不高。当时意大利的道德标准很低,甚至以这种低的标准看 Alexander VI(亚历山大六世)时还会觉得他个人生活中的污点太多。他过去的的生活不理想,而在他当司铎时(1468 年),他并没有改进自己的生活,甚至在他任教宗时,他的欲望一直到最后都牢牢地控制了他的生活。他有几次想除掉自己的恶习,但每次很快又陷入那些根深蒂固的恶习中。近代的学者曾经想恢复这位教宗的名声,但太多不可否认的历史证据表明,这位教宗的缺点很多。Alexander(亚历山大)与贵族罗马女士 Vanozza de Cataneis(瓦诺撒)保持一种婚外关系,并且与她有 4 个孩子,他也公开地承认这些孩子是他的,又想方设法给予他们财富或高的地位,这就是他任教宗的主要目标。这种可耻的“重用亲戚”作风决定了他在意大利和针对法国的政策。当时的法国正企图侵略 Milano(米兰)和 Neapolis(那不勒斯,比如 Carolus VIII 查理八世于 1494 年和 1495 年的攻击)。因为教宗很关心自己的亲戚,他不断被牵入一些困难问题中。他本来反对法国,但因为家庭关系于 1498 年和法国的 Ludovicus XII(路易十二世,1498 - 1515 年)建立了密切联系。

上面提到的 4 个孩子中最小的儿子 Jofre(= Godefredus,周弗瑞,1482 年出生)与 Sanzia de Aragon(阿拉贡的桑基亚)结婚——她是 Neapolis(那不勒斯)王 Alphonsus II(阿方索二世)的女儿,所以他获得了意大利南部的 Squillace(其奎亚斯)公国(1494 年)。第二个儿子 Juan(= Johannes 胡安,1476 年或 1477 年出生)成为 Gandia(甘第亚)公国的领导,又有计划使他成为 Benevento(贝内文托)的公爵(1497 年),但五个星期后他被暗杀,此凶杀案的筹划者也许是他的弟兄 Cesare(切撒尔)。女儿 Lucrezia Borgia(卢克莱西亚,1480 年出生)是父亲疼爱的宝贝,她是一个妩媚的、优柔寡断的姑娘,当然也不能不受当时道德败坏的影响,但实际上她的生活比她的名声好一些。她三次结婚,第一次与 Pesaro(佩撒若)的公爵 Giovanni Sforza(乔凡尼·斯弗撒)结婚,但他们的婚姻被取缔。第二个丈夫是 Neapolis(那不勒斯)王 Alphonsus II(阿方索二世)的儿子 Alphonsus(阿方索),但她的弟兄 Cesare(切撒尔)于 1500 年暗杀了这个人。第三个丈夫是 Ferrara(费拉拉)公国的继承人 Alfonso d' Este(阿方索·厄斯特),他们于 1501 年结婚,此后 Lucrezia(卢克莱西亚)似乎是一个无瑕可指的妻子和基督徒,她加入了方济各会第三会,于 1519

年去世。她曾帮助穷人,而那些学者和艺术家都赞美她。

在 Alexander VI(亚历山大六世)的生活中,他的大儿子 Cesare(切撒尔)扮演了一个特别灾难性的角色。他是一个有杰出才华的人,有顽强的意志力,无度地追求世俗的荣耀,没有道德上的顾虑。虽然他更多有战士和将军的性格,17岁的他还是被提升为西班牙 Valencia(巴伦西亚)的总主教和枢机(1492/1493年),但他仅仅接受了“小品”和辅祭品。他暗杀了自己的弟兄 Juan(胡安,见上),此后放弃了他褻渎的神圣职位(1498年)。他的父亲劝法国的 Ludovicus XII(路易十二世)立他为 Valence(瓦林斯)的公爵,将一个法国的公主嫁给他。教宗于1501年规定, Romagna(罗马纳)公国(意大利东北部)应该属于 Cesare(切撒尔)。父亲和儿子的目标是创立一个很大的、覆盖意大利中部的王国。如果他们的计划能够成功,这就意味着教会国的大部地区被划入 Borgia(博尔吉亚)家族。Cesare(切撒尔)代表着文艺复兴时期的“统治者”,既有才能,又无道德原则(参见 Macchiavelli 马基雅维利的名著,155.3)。他用凶杀和恐怖的战争开始实施他的计划,而且有成功的可能性。他利用宗座财库的钱和1500年大禧年的收入来征服 Romagna(罗马纳)地区!此时教宗于1503年8月18日出乎意料地去世(也许是因疟疾病或因为有人用砒毒害了他),而 Cesare(切撒尔)的事业也就此崩溃了。对教会来说, Alexander VI(亚历山大六世)的任期是一项严重的灾难。历史学家 L. v. Pastor(帕斯托)曾经说,纯粹从教会的事务来看我们无法严厉地谴责这个教宗,因为种种教务习惯性地被完成,而 Alexander(亚历山大)不关心这些,因为他是一个完全世俗化的人。然而,从他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来看,他应该得到最尖锐的批评。Alexander(亚历山大)和 Florentia(佛罗伦萨)的伟大道明会会士和讲道家 Savonarola(萨沃那洛拉)发生了悲剧性的冲突,而这个碰撞由于种种条件导致那位热爱神的、寻求改革的人被处死(1498年)。

值得提到的还有一个传教历史上的重要决定;教宗在1493年5月4日发表的信件(不是“诏书”!)结束了葡萄牙和西班牙之间的争论。这篇文件宣布 Columbus(哥伦布)在“西印度”发现或人们将要发现的新地区应该属于西班牙国王,这是教会的世俗性封地(weltliches Kirchenleben),并且允许葡萄牙和西班牙共同商榷签订一个“分界线”,这样分开两个国度的影响范围。这条分界线应该在 Azores(亚速尔群岛)的西边从北极一直拉到南极。文献中也多次指出,应该使这些新的臣民接受基督信仰。然而,这份文献并不等于是 Alexander VI(亚历山大六世)的一种裁判举

动——在这个事件上,教宗自己没有什么特殊的表现——也不能说这是“新大陆”的瓜分或将美洲交给西班牙,虽然 17 世纪的人错误地这样认为。

157.4 来自 Ferrara(费拉拉)的 Girolamo (= Hieronymus) Savonarola(萨沃那洛拉,1452 - 1498 年)自从 1491 年充当 Florentia(佛罗伦萨)的 San Marco(圣马可)道明会隐修院的院长,他是中世纪晚期最伟大的讲道家和精神领袖之一。他先引导自己的隐修院恢复原先的严格精神,又以一种《旧约》先知的动力和说服力要求教会的全面改革,特别是圣职人员的改革。他预言意大利和教会不久后会遭受到灾难性的惩罚,而当法国的 Carolus VIII(查理八世)于 1494 年从法国去 Neapolis(那不勒斯)时,Medici(美第奇)家族的奢侈统治(Lorenzo 和他的儿子 Piero de Medici)被推翻了,所以人们相信 Savonarola(萨沃那洛拉)的预言应验了。通过他的讲道和影响力,Savonarola(萨沃那洛拉)似乎无限制地统治了 Florentia(佛罗伦萨)并完成了人们伦理道德上的明显改善。他宣布说,基督将要成为这个新的、民主式的共同体的君王。然而,因为他和法国有一些联系,他打扰了 Alexander VI(亚历山大六世)的政治计划和利益,所以教宗想除掉这个难以接受的改革者。他于 1495 年 7 月邀请 Savonarola(萨沃那洛拉)来罗马,于 1495 年 9 月禁止他讲道,又命令他和他的隐修院要加入新创立的道明会 Roma - Tuscia(罗马 - 图斯基亚)的会省(1496 年 11 月),这个会省的精神比较松懈。Savonarola(萨沃那洛拉)犹豫一段时间,后来说他的良心不允许他服从教宗的命令,因此教宗于 1497 年 5 月 13 日的简函(Breve)绝罚了他。他认为,这种绝罚是不公正的,是无效的,又写了一些反驳教宗的传单,并且在 1498 年 2 月后也在讲道中很激烈地反对那个“买卖圣职的、没有信仰的”Alexander(亚历山大),又推动人们召开一个大公会议来弹劾教宗。他相信自己有一个特殊的、来自上天的使命,但他没有想到人民群众的拥戴会突然转变。当时的人要在 Florentia(佛罗伦萨)举行一种“上主的裁判”,要 Savonarola(萨沃那洛拉)的一位拥护者(道明会会士)面对一个反对者(方济会各会会士),但这个计划没有实现,所以人民群众侵入了 San Marco(圣马可)隐修院,逮捕了那位不幸的院长并拷打他。反对他的人的一个法庭依赖于一些“拷打出来的表白”审判他以死刑。因此,他和另外两个道明会会士一起于 1498 年 5 月 23 日被宣布为“异端人物、教会分裂者和蔑视宗座的人”,上吊后被烧死。这个改革者的道德生活始终是无瑕疵的,他有深切的信仰并在信仰的问题上都坚持公教会的立场,所以不应该称他为“Luther(路德)的先驱者”。在死后他仍然有很多朋友及敬仰他的人,比如

Michelangelo(米开朗琪罗)和“罗马的宗徒/使徒”圣 Philippus Neri(内瑞)。没有人能怀疑 Savonarola(萨沃那洛拉)的 bona fides(善意),而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抵抗 Alexander VI(亚历山大六世)的态度也是无可厚非的,然而,他的苦修热忱和“先知精神”也包含一些“煽动”和“狂热”的因素,而他的行动太多涉及到一些政治问题,所以他创造了一些无法控制的危险。

157.5 在 1503 年 9、10 月,枢机们选择了 Alexander VI(亚历山大六世)的继承人 Pius III(比约三世),他原名 Francesco Piccolomini(皮科罗米尼),是 Pius II(比约二世)的侄子,也是一位能干的,有资格的人;他对于德国人也有好感。他的任期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仅仅维持 26 天了。此后,枢机们迅速地、似乎异口同声地——其中也有一些贿赂因素——选择了 Julius II(尤利乌斯二世,1503 - 1513 年)为教宗,就是 60 岁的 Giuliano della Rovere(若维瑞)枢机,他是 Sixtus IV(西克斯图斯四世)的侄子并反对 Alexander VI(亚历山大六世)和他的家族。至少从个人的道德生活来看,这位教宗是无可指责的;但他也是一个相当世俗化的人,一个有毅力的人,易于发怒(他被称为 Il Terribile“可怕的人”),说他是基督徒们的大司祭不如说他是一个国王和将军。他一生不懈地努力工作,不是为了他自己或为他的家族,而是为了扩展宗座的权力和影响力,并且为了获得灿烂的艺术和文化氛围。追求权力和优美的生活是他的主要目标,但他似乎完全忽略了那些真正属于教会的任务。作为一个具有敏锐的审美感的艺术资助者,Julius(尤利乌斯)有杰出的贡献。在他的任期内,意大利最优秀的艺术家(参见 154)创造了他们的不朽作品: Bramante(布拉曼特)为重建圣伯多禄/彼得大堂提供了一个庞大的图案(1506 年动工); Michelangelo(米开朗琪罗)画出了 Sistina(西克斯提纳)教堂的天花板画,又为教宗的墓雕塑了著名的 Moses(梅瑟/摩西)像,而 Raphael(拉斐尔)为梵蒂冈中那些豪华的房间绘画出那些杰出的壁画。这些作品等于是文艺复兴艺术的顶峰。

Julius II(尤利乌斯二世)教宗以同样的精力着手于另一项任务:他需要恢复、巩固和确保教会国的管理,因为他认为,对教会国的统治等于是宗座的独立性和政治能动性的基础。首先,他驱逐 Cesare Borgia(切撒尔·博尔吉亚,他于 1507 年在西班牙阵亡)。此后,教宗亲自勇敢地率领一次战役,于 1506 年夺回了 Perugia(佩鲁贾)和 Bologna(博洛尼亚)。因为教宗加入了 Liga de Cambrai(坎布莱联盟)——这是由法国、德国皇帝 Maximilianus(马克西米连)、西班牙和另一些小国组成的联盟——Julius(尤利乌斯)于 1509 年能够再一次恢复对于 Romagna(意大利东北部

的罗马纳地区)的统治,因为 Venetia(威尼斯)在此之前占据了该地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他成为“宗座的拯救者”,也奠定了现代的教会国,就是一个有政权的现代国度(der Begründer des modernen Kirchenstaates als nationaler Macht)。此后,教宗面对一个困难的任务:法国占领了 Milano(米兰),而教宗想驱逐这个巨大的对手(用的口号是 Fuori i barbari!“驱逐野蛮人!”)。首先,教宗反对 Ferrara(费拉拉)的 Alphonsus d'Este(阿方索)公爵,他是法国的封臣,又是 Lucrezia Borgia(卢克莱西亚)的丈夫(参见 157.3)。教宗绝罚他并弹劾了他。然而,法国的 Ludovicus XII(路易十二世,1495 - 1515 年)既用武力,又施用精神武器来对付教宗。他禁止法国国民与罗马有任何来往,并在 1510 年 9 月在 Tours(图尔)的全国主教会议上要求人们谈论一些对付教宗的措施。在 1511 年的秋天有五个不服从教宗的枢机在 Pisa(比萨)召开一个“大公的”主教会议来反对教宗,而法国也支持他们的行动。德国皇帝 Maximilianus I(马克西米连一世,1493 - 1519 年)不高兴,因为教宗 Julius(尤利乌斯)与 Venetia(威尼斯)签订了和平条约,所以他也在一段时间支持这个反对罗马的“大公会议”。当教宗于 1511 年患病时,这个倾向于醉心和热忱的皇帝甚至考虑到一个奇异的计划:因为他的妻子死了,所以他想在教宗逝世后自己当教宗——如果有需要,他将会贿赂一些枢机——这样能够在他的手中结合基督宗教世界两个最高的权威。虽然 Julius(尤利乌斯)教宗处于很危险的状态,但他没有放弃希望。因为教宗在 1503 年(在当选之前)承诺将在两年内要举行一个改善教会纪律的大公主教会议,但又始终没有来得及兑现他的诺言,他于 1511 年夏天宣布在 1512 年 4 月要在罗马的 Lateranus(拉特兰)召开一个普遍的教会大会(参见下文 157.6)。教宗这样做也是出于另一个考虑:如果他自己召开一个大公会议,他的对手无法再利用这种武器。为了抵抗法国人,教宗于 1511 年 10 月和西班牙与威尼斯共同创立了 Liga Sancta(“神圣联盟”)。虽然法国人在 Ravenna(拉文纳)获得胜利(1512 年),但由于瑞士人在那位能干的 Matthaues Schiner(希内尔)枢机——他是 Sitten(斯登)的主教——的领导下介入了,法国人被迫于 1512 年 6 月从伦巴第地区撤退。在 Pisa(比萨)参与那个反对教宗的主教会议的人不多,似乎都是法国人。在 1511 年 12 月这个会议被迁移到 Milano(米兰),在那里他们于 1512 年 4 月宣布将要罢免教宗,但在法国人被驱逐后,这个会议不久后在 Lyon(里昂)结束。一些人在 Julius II(尤利乌斯二世)去世后仍然以论战性的文献或诽谤传单攻击他,最尖锐的谴责大概是 1513 年发表的 *Julius exclusus [e coelis]*(《被拒

绝在外的尤利乌斯》),这是一个对话篇,作者不明。一些人曾经认为 Erasmus(伊拉斯谟)是这篇册子的作者,但这个观点大概不能成立。

157.6 Julius II(尤利乌斯二世)的继承人是 **Leo X**(良/利奥/莱奥十世,1513 - 1521年),他是 Lorenzo de Medici(劳楞佐·美第奇)的儿子,受过非常高等的教育,13岁就被提名为枢机(参见 157.2),37岁当选教宗。他是人文主义者、文人和艺术家的朋友,曾多次提供给他们一些资助。文艺复兴艺术的灿烂光辉(Raphael 拉斐尔)照亮着他的任期,但他对艺术家的资助并没有引起 Julius II(尤利乌斯二世)时期那么多的创造。在另一方面,教廷的世俗化在当时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程度。Leo(良/利奥)自己是一个身穿教宗祭衣的意大利“王子”(ein italienischer Principe im paepstlichen Gewande),他毫不犹豫地投入于种种享受中,不过他遵守道德规律。他爱好狩猎、豪华的庆祝和戏剧,甚至在宗教改革时期的关键时刻也不慌不忙地参与这些娱乐活动。他不愿意在教会内进行改革。Leo(良/利奥)很关心自己家人的地位,于1516年将 Urbino(乌尔比诺)公国封给自己的亲戚。批评他的人说他的政策是不真诚的,是模棱两可的,而这样的谴责不是没有理由的。在外交上,他的最大成就是在法国那里。他早在1513年与 Ludovicus XII(路易十二世)达成协议,此后法国的国王承认 Lateranus(拉特兰)的会议,他不再支持那个反对教宗的主教会议。Ludovicus(路易)的继承人是 Franciscus I(法兰西斯一世,1515 - 1547年),他于1515年在 Marignano(马瑞那诺)打败了瑞士人,因此重新获得了 Milano(米兰)。教宗与他签订了一个重要的 **Concordatum**(政教协议,1516年8月18日)。这个协议取消了 Bourges(布尔日)1438年的协议(参见 114.2),但教廷必须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法国的国王获得了法国所有教区主教(93个教区,其中有10个总教区)的提名权,以及527个法国隐修院的院长的提名权。针对一些法国主教位,教宗拥有直接的任命权,但在其他方面,他只有那些主教候选人的“认可权”。通过这些新的规定,法国的分裂倾向被控制住,法国再一次和宗座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但在另一方面,国王对法国教会的统治从现在起更多成为一个不可动摇的、有法律根据的制度。1516年的《政教协议》一直到1789年形成了教廷和法国之间的法律基础,而 Lateranus(拉特兰)会议在第11次大会中(1516年12月19日)确认它。

1512 - 1517年间在 Lateranus(拉特兰)召开的主教会议是第5届拉特兰会议,也是第18届大公会议。Julius II(尤利乌斯二世)于1512年5月23日举行了开幕典礼,但这个会议持续了很长时间,Leo(良/利奥)的任期也受其影响。参与会议的

人大部分都是意大利人。Maximilianus I(马克西米连一世)皇帝于1512年11月也开始支持该会议,法国于1513年12月也加入(参见上文)。这次会议没有产生太多成果。在第8次大会中(1513年12月),教宗Leo(良/利奥)谴责了那种“双重真理”的教导(参见155.3),第11次大会时(1516年12月)通过*Pastor aeternus*(《永恒的牧人》)取消了Bourges(布尔日)的政教协议(参见上文),又谴责了“大公会议理论”(参见141.3;156.4),并规定罗马教宗有关于一切主教会议的全面司法权,只有罗马教宗可以召开、迁移或取消教会的大公会议。关于改革的问题,传统的“利益冲突”再次出现。一些规定针对教会职位的任命等程序、圣职人员和平信徒的生活方式、豁免、教廷收税和修会人士的牧灵权利问题,但从整体来看,这些规定缺少彻底性;两位教宗不愿意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进行改革。无论如何,后来的Trento(特伦托)大会议能够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地推动了改革。

从一个发生于1517年的事件可以看出当时教廷和枢机团的情况:Alfonso Petrucci(佩特鲁基)和另一些枢机想暗杀教宗。Petrucci(佩特鲁基)被处死,但这些仅是更可怕的灾难的预兆。在1517年秋天发生西欧教会的大分裂——有的人已经预先感觉到这种分裂——,而Leo X(良/利奥十世)的任期继续维持了4年(他于1517年12月1日去世);这四年为教会带为很多重大的事件,也带来了不幸和灾难。

158

中世纪末期的宗教危机和教会危机。信仰分裂的预备

158.1 虽然发生了许多十分重大的弊端和权力的滥用,并且人们不断提出一些抱怨,但在中世纪末的岁月里,公教会在各个欧洲民族和国度中仍然享受人们的尊重爱戴,教会仍然具有生命力。一些来自新教圈子的学者以前普遍认为,16世纪初的圣职人员和教会的种种机构是完全腐败的,完全破产了。然而,深入的历史研究表明,这种看法是无法成立的。除了一些异端团体或极端人文主义者外,人民群众还是很忠实地拥戴教会、教会的信仰和礼仪、教会的圣事和庆节、教会的祝圣和降福,而教会的牧灵工作也在任何一个时期都呈现出一些美好的果实。公教会的信仰在中世纪末期仍然是民间文化的核心,而各种宗教习俗时时处处包围着人

们的日常生活。由于热切隐修者和教区司铎的讲道(参见 153.1),教会的宗教热忱在 15 世纪下半叶甚至经历了一种新的崛起;宗教生活的形式变得更多、更活泼、更丰富。在这方面的证据是众多教堂的建筑,无数的宗教艺术品,人们作的众多诚心的捐款(in remedium animae“为了救灵魂”),教会财产的增多以及 praedicatura(讲道基金,参见 153.1)的创立。信徒们很注重隆重的教会礼仪,在各地出现很多“弟兄会”(参见 152.6),无数的慈善机构(参见 136.2),人们编写了许多灵修文学著作和教育性的道理文学——部分上一直到今天都没有被超越——《圣经》的普及性也相当大(参见 153.2,3),宗教性的戏剧(参见 119.6)和圣歌(宗教音乐)在 15 世纪经历了一种全盛时期,又出现一些新的崇拜方式或祈祷方式(比如“玫瑰经”,参见 133.7)和“三钟经”(Angelus Domini,参见 152.5),以及“拜苦路”(Via Crucis,参见 152.5),人们也多次参与宗教礼仪,他们愿意获得“大赦”,愿意去朝圣,他们更多尊敬圣人/圣徒以及圣人的圣物。

158.2 虽然如此,以一种太理想化的眼光看改革时期以前的教会情况是不合理的。有的作者曾经美化了中世纪末期的教宗,但如果用这种观点,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一些国度如此迅速地放弃了公教会。实际上,外在的宗教热忱当时很明显,但内在的信仰也许不够深:太多浮浅的、习惯性的、不健康的、无度夸大的因素也同时存在。宗教生活在很大的程度上陷入“物质化”(Verdinglichung)以及商业化中,尤其表现在种种“圣物”(reliquiae)的大量积累上,这种“圣物”有时候很奇怪或没有根据。比如,在德国 Wittenberg(维滕堡)的教堂于 1509 年拥有 5005 块圣物,而萨克森的选帝侯 Friedrich der Weise(明智的腓特烈)到 1520 年增多这些圣物,后来有 18855 块圣物,而教宗 Leo X(良/利奥十世)为这些圣物指定一些大赦。大赦的习惯也容易被滥用(参见 152.2),而那些朝圣活动有时候似乎成为一种以好奇心和探险欲为起点的群众行动。关于那个不幸的 Jetzer(耶泽尔)案件,参见 145.2。当时很普遍的迷信是一个重大的恶劣现象,而圣职人员没有足够地努力抵抗群众的迷信——这种迷信甚至与神圣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占星术和算命术都很不好,但更可怕的是极端的“巫婆狂热”,这种狂热尤其在 Alpes(阿尔卑斯山脉)以北导致了很多人残酷的“巫婆法案”。另外,当时的人多次以话语和图画解释“魔鬼”和恶势力的现象,而这种“魔鬼信仰”(Teufelsglaube)太普遍,以致使许多人感到害怕和恐惧。

中世纪的“巫婆狂热”是古罗马和格尔曼/日耳曼人的遗产,实际上是再一次陷

人一种基督信仰以前的、原始的、充满鬼怪的世界观。在早期中世纪,国度和教会都想消除这种迷信(参见7世纪的伦巴第王 Rothari; Carolus Magnus 查理曼的 *Capitulatio de partibus Saxoniae*《萨克森地区法令》,参见81.1; Regino de Pruem 和 Burchard de Worms 的 *Canon episcopi*《主教的规定》,参见89.5,6; 102.1)。然而,自从 Cathari(清洁派)出现后——他们相信一个恶的元则——以及通过宗教裁判所的活动,巫婆狂热获得新的滋养。比如大约于1215年到1235年间写的 *Sachsenspiegel*(《萨克森之镜》)也提到“巫婆”,甚至那些伟大的经院思想家也曾经谈论种种鬼怪和恶势力对自然和人间社会的影响(参见 Thomas Aquinas 托马斯 *Summa Theologiae*《神学大全》I, q 51 a. 3 ad 6 关于 incubi 和 succubi“恶鬼”的说法)。“与魔鬼的联系”(Teufelsbuendnis)被认为是背弃信仰的事,所以它属于宗教裁判所的事务,而异端裁判所自从13世纪末开始特别镇压和查寻魔术和巫术;他们开始用拷打和虐待的方式强迫人们“承认”罪行;根据古老的罗马法,魔术的惩罚一般都是烧死。被怀疑与邪魔有关系的人大多数都是妇女(这些“巫婆”被称为 *sagae, strigae, maleficae*, 据说她们能够伤害动物和人)。人们相信“与魔鬼的盟约”,相信“与魔鬼的亲密关系”,相信“巫婆飞翔腾空”以及“巫婆安息日”(Hexensabbat),甚至相信有一种“巫婆邪教”,这个邪教在某些地方举行他们的可怕聚会等。Jean d'Arc(贞德/冉·达克)于1431年被烧死,因为据说她是一个异端分子和巫婆(参见156.3)。在同样的时期,瑞士西南部和 Dauphine(法国的道芬地区)的人已经开始大量地镇压“巫婆”。那位在别的方面具有贡献的道明会会士 Johannes Nider(尼德尔,参见146.3)写过一部 *Formicarius*(《蚂蚁书》,1435-37年),其中太多谈论“巫婆之邪恶”。两个道明会会士和裁判所人员 Heinrich Institoris(= Kraemers, 茵斯提托瑞斯)和 Jacobus Sprenger(斯普仍格)要求 Innocens VIII(依诺森八世,参见157.2)发表所谓的“巫婆诏书”*Summis desiderantes*(《渴望至高者》,1484年12月5日),而这种很不光彩的诏书罗列巫婆们的主要恶行和罪行,又给 Constantia(康斯坦茨)教区的人很多特权来对付“巫婆们”,并惩罚那些反对镇压巫婆的人。这部诏书密切联系异端和魔术。虽然该诏书不包含任何信理方面的规定,但教会最高的权威肯定和支持“巫婆狂热”和“巫婆法案”,这无非是一个很可悲的事实。从此以后,反对镇压巫婆似乎成为不可能的事。那两个德国裁判所人员编写了一部 *Malleus maleficarum*(《巫婆之锤》,德语 Hexenhammer),1487年首次在 Strasbourg(斯特拉斯堡)印刷, Colonia(科隆)大学的神学系批准这部书的

发行,在1669年之前已经有29个版本,其中16个德语的——这部著作更成为无数灾难的根源。巫婆的狂热其中似乎被描述为信仰的事!因此,这种不幸的误解——它首先属于文化史,而非教会史——像一种精神性的疾病那样从中世纪走入近代。第17世纪大概是压迫“巫婆”最严厉的时期。只有在几百年后,人们才结束了“巫婆狂热”(参见第3卷,178.6)。

在民间的道德生活方面也出现很多缺陷。人们对精神领袖和对于世俗权威的尊敬降低很多。在很多地方有不服从、不忠实、暴力行为、粗鲁欺骗、高利贷和剥削、浪费和奢侈生活。不道德行为和可耻的表现变得很公开的,似乎所有的社会阶层都被传染,人们似乎都陷入丧失道德的卑劣和淫秽行为中。人们喜欢观看一些放纵的表演和下流的喜剧。在德国地区,甚至那些比较小的城市都有公开的妓院,而意大利的讲道者必须抵抗一些违反自然的恶习。

158.3 尤其不幸的是,基督宗教的领导阶层——圣职人员——的表现在很多方面也不好,其中有很多人玷污了他们的身份。在Alpes(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人也发现,罗马教廷的世俗化,枢机团、甚至个别文艺复兴教宗(参见157)的生活不符合基督徒的理想,这就引起严厉的批评。很多国度都有一些具有高尚道德的教会领袖,但也有很多不认真的人,他们陷入世俗的享受中,由于他们的奢侈生活、浪费和统治欲引起反感。在德国和法国地区的主教位和隐修院院长的职位大多都成了贵族人控制的荣耀(参见112.1)。贵族人士想获得教区的收入,想当一个独立的主宰——主教和隐修院院长有相当独立的地位。古老的“大堂圣职团”的“年税收入”成为高层和低层贵族的“后生儿子们”的“供养家园”(Versorgungsanstalten)。那些“上主的年轻贵族”(Junker Gottes)中很多人没有当圣职人员的资格,没有圣召,他们仅仅由于为了收入才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当时,一个人同时掌握许多教产是很一般的事、且相当普遍,这就更加剧了情况的恶化。在中世纪末,德国的大堂圣职团员的不负责任、无知和粗暴似乎成了众所周知的事实。

低层的圣职人员与高层圣职人员的差距很大,因为上面的榜样太坏,所以下面的人也不会结出什么好的果实。然而,我们很难针对宗教改革前夕的牧灵者的道德表现得出结论,因为主要的信息来源是忏悔讲道稿、讽刺诗、抱怨信、主教会议规定等,而这些文件有“夸大”的倾向,在一定的程度上都有很多主观因素。其他的文献,比如总执事法院报告或视察报告等文献也不很全面。毫无疑问,情况因地制宜。当然,仍然有一些能干的、有热忱的牧灵者,但关于圣职人员的宗教水平、道德

表现和学术水准的怨声非常普遍,又能连续不断听到。首先,圣职人员的平均数目很高,所以那些“有收入者”、“辅祭者”、“副本堂”和其他的“辅助性的”圣职人员的经济情况非常不好,他们的神学教育和牧灵培训也不理想。当时还没有类似于 *seminarium* (“神学院”)的教育机构。有机会在大学读书的圣职人员不多。大多数的司铎候选人只学习一些基本的宗教知识、一点拉丁语和牧灵职务的具体知识(参见 89.1)。因此,这种“圣职人员的无产阶级”(klerikales Proletariat)由于其无知、粗暴、闲散、不合适的额外收入、圣职买卖、贪婪、赌博欲、饕餮和不道德行为造成很大的损失。虽然圣职人员的数目很多,但牧灵工作的质量并不好,所以有很多人抱怨。

在圣职人员当中也有很多与妇女同居的人。1429年的 Paris(巴黎)主教会议曾经批评这一点(第23条)并哀叹说,有的人认为,一次性的通奸行为不是一种重罪。Sigmund(西格蒙德)皇帝在 Constantia(康斯坦茨)和 Basilea(巴塞尔)的主教会议上申请要取缔圣职人员的独身制法律,但没有成功。很多司铎提出这样的申请:他们要求豁免自己的儿子们的 *defectus natalium* (“出生的缺陷”,指私生子不能当圣职人员),为了使他们的儿子也同样当司铎。教会的主教们在很多方面没有抵抗种种恶习,他们仅仅接收了属下的罚款金额;他们更多注意到自己的权利和财富,没有关注那些被委托于他们管辖范围内的圣职人员和平信徒的改进。

虽然某些改革措施获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各种修会和隐修院的情况也并不理想(参见 151.1,2)。贵族人士和那些有钱的城民多视隐修院为一种“供养机构”,他们不重视圣召。在这方面,古老的修会(本笃会)和新的修会(方济各会等)基本上都一样。部分的托钵会隐修院或修女院也相当堕落。他们不再注重 *clausura* (隐修院禁止外人进入)的规定和个人财产的禁令。在宗教改革暴发时有很多堕落的修会人士马上利用这个机会,他们离开了隐修院并放弃了他们的圣愿(即“神贫、贞洁、服从”圣愿)。

在历史书中经常出现的例子是 Ulm(乌尔姆)附近的 Soeflingen(所夫林根)的 Clarissae(加拉修女会)会院的道德败坏。在1484年的一次改革活动中,人们发现了54封信,这些信(所谓的 *Amores Soeflingenses*《所夫林根情书》)是一些方济各会会士给那些修女写的情书。然而,根据这些文献只能看到一种很一般的腐败情况,中世纪末期的其他隐修院也会有类似的堕落现象。Soeflingen(所夫林根)的修女院走向世俗化,它已经成了 Ulm(乌尔姆)上层女士和 Suabia(施瓦比亚)贵族女子

的一种自由化的女生团体。另外,我们无法证明那些女士的“放纵生活”,因为保存的情书是充甜蜜言词的、是情绪化的、没有宗教精神的,但它们又不是下流的或淫秽的。

158.4 在 14、15 世纪,人们似乎都有这样的感觉:欧洲的基督宗教世界是一个“病夫”,教会遭受很多弊病的重大压力。人们也确实意识到了这个情况。在 14、15 世纪的历史阶段中有很多人普遍认为,教会绝对需要一种彻底的改革,才能避免崩溃的危险。因此,当时的一切主教会议都涉及到改进的问题,比如第 15 届大公会议(1311 年在 Vienne 维恩召开,参见 138.4)。这个会议指出,主要的难题是许多圣职人员(上层和下层圣职)没有资格,他们的生活不表达宗教精神,他们滥用他们的司法权,他们忽略礼仪,追求教产的积累、隐修院的豁免,教廷的税收(exspectantiae, provisiones)太多。Constantia(康斯坦茨)和 Basilea(巴塞尔)的大公会议都要求教会“在头部和肢体”的改善,但人们不想为此作出一些牺牲,不愿意进行比较彻底的改变,所以仅仅在个别问题上取得了一点点进步。第 5 个拉特兰会议(1512 - 1517 年,参见 157.5,6)也面临类似的问题。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宗们——从 Sixtus IV(西克斯图斯四世)到 Leo X(良/利奥十世)——也不想认真地进行什么改革。他们本来应该在改革方面充当领导者的角色,但他们不愿意采取行动,这一点令人感到非常遗憾和忧伤。在其他方面,很多怀有教会精神的人物——他们部分上在上文已经被提到——确实始终努力于改善教会的种种问题,这些人包括一些主教、世俗的国君、修会会长、隐修者和教区司铎,而他们的种种努力也获得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那些缺少引导的改革热忱引起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异端,比如 Wycliffe(威克里夫)和 Hus(胡斯)的异端。意识到改进的需要本来是一件好的事,但在 200 年的时期内,教会的全面改革无法进行,这就暗示问题的严重性。结果是一种巨大的不安和激动,人们再也无法控制这种不满。一些人宣布非常阴暗的预言或令人感到恐怖的哀叹,他们预言教会将会遭受严重的惩罚。比如 Conradus de Megenberg(康拉德,参见 139.2)教师早在 1337 年在他的 *Planctus ecclesiae*(《教会的悲叹》)中警告说,人们由于教廷的政策感到愤怒,人们将会恨圣职人员如同恨犹太人一样。德国将面临很大的灾难。Constantia(康斯坦茨)的大公会议预言说,如果再不进行圣职人员的改革,其结果是信仰将被蔑视,新的异端和分裂会出现,平信徒将会攻击圣职人员,神圣的东西将被亵渎。12、13 世纪的异端人士曾经说,圣职人员必须恢复宗徒/使徒们的朴素生活和贫困生活。在教宗和

皇帝的争论时期也有人提出这样的要求,而 Wycliffe(威克里夫)、Hus(胡斯)和其他的热忱的、情绪化的或灵性主义的团体和教派用《圣经》的话再一次提出类似的要求。许多传单和讽刺册子出现了——它们多数都用“神视”或“先知话”的形式,但在内容上表现对司铎和隐修者的反感和憎恨,要求完全没收教会的一切财产和取消教会的一切世俗权利。通过许多人的讲演,对于教会的批评传播到广大的群众中,这就强迫人们坚决地采取某种立场。在 15 世纪末,那位具有感召力的道明会会士 Savonarola(萨沃那洛拉)的预言和讲演在 Florentia(佛罗伦萨)又突出了改革的问题(参见 157.4),但罗马教廷没有太注意到他,因为教廷当时重视培养文艺复兴文化和一些世俗的目标。

在德国有两个宗教改革以前的文献值得注意:1)一篇是用德语写的 *Reformation Kaiser Sigmunds*(《西格蒙德皇帝的改革》),它以皇帝的名义要求社会和教会更深入的改革;这部著作大概是 1433 年或 1439 年在 Basilea(巴塞尔)写的,作者是来自 Rottweil(若特外尔)的 Friedrich Winterlinger(温特林根尔)司铎,他曾经是 Basilea(巴塞尔)会议的拥护者巴伐利亚公爵 Wilhelmus(威廉)的秘书。2)一篇写于 1519 年的拉丁语著作,名为 *Onus ecclesiae*(《教会的负担》),深受 Joachim de Fiore(约亚敬,参见 131.1)思想的影响,严肃地谴责当时教会的缺陷并迫切要求教会在“头部和肢体”的改革。这部书的作者认为,Carolus V(查理五世)皇帝已经是“末世的皇帝”。作者很可能是 Chiemsee(基姆湖)的主教 Berthold Pirstinger(皮尔斯丁格尔,1543 年去世),他也曾经针对改革者写了一部系统神学著作,名为 *Tewtsche Theology*(《德国神学》,Munich 1528 年)。

158.5 在 16 世纪初,时代的记号暗示将要发生的“暴风”。引起大变化的因素很多:中世纪的基本秩序解体,高等教育被世俗化,新的发明(印刷技术!)和发现完全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某些政治发展和种种社会转变使欧洲的人民陷入一种不安和动荡状态中。在那种过渡时期,人们始终寻求一些新的东西,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在德国的情况尤其严重。引起冲突的“燃料”已经积蓄了很长时间,只需要一个人将它点燃。人们久已渴望帝国的改革,而 Maximilian(马克西米连)皇帝也愿意推动一些改革,但没有成功,因此保留了那种“中央权力软弱——各地和各阶层的人分裂”的状态。自从 1450 年起,德国各地推广罗马法,这就意味着,那些有学问的律师们管理司法的问题,这一点引起一般的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愤恨。在社会的各种阶层之间已经形成了很尖锐的冲突,就是在圣职人员和平信徒之间,在

高层圣职和低层圣职人员之间,在教区圣职和修会圣职人员之间,在主教和院长——他们都是地主——以及他们的属下之间都存在很大的冲突。帝国人口的四分之三是农民,但农民在经济和法律上的情况并没有改善,所以他们屡次反抗他们的地主;农民也很容易愿意支持一些极端的自由概念、反圣职人员的革命性思想或类似共产主义的努力,比如他们支持 Hus(胡斯)的运动。低级的贵族(骑士们)由于新的武器和由于城市和王权的崛起失去了他们原有的影响力,他们在很多地方变得很穷,不能独立生活。家族之间的复仇被禁止,但那些骑士不愿意遵守禁令,所以某些贵族人士采取强盗的粗暴手段来达到自己的利益。

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新理想受到“自然主义”的解释,这些人认为一切自然的东西都是美好的,所以他们的观点与教会提出的世界观形成尖锐的对立(参见 155.3)。这些年轻的人文主义者经常辛辣地嘲笑教会的人士、教会的教导和教会的机构。其中有一些人,他们在外表上仍然支持教会,但在内心已经完全放弃了公教信仰。长期以来,罗马教宗的首席权在很多人的眼中相当模糊,教宗的权威性遭受了很重的打击。很多德国人对于 *welsche Kurie*(威尔夫派的教廷)有反感,他们仇视圣职人员为教会的“收益者”,在某些地区,这种敌意令人感到担忧。德国教会太富有,当时的教会几乎掌握整个地产的三分之一,这就引起平信徒们的嫉妒,引诱人们进行大规模的没收和充公。人们抱怨并谴责或诅咒教廷规定的 *exspectantiae, reservationes, provisiones*(各种职位费、预先保留费等,参见 140.2,3)、教产的积累、许多圣职人员——尤其是教廷人士——的虚荣心和贪婪、罗马教廷要求的种种税收和办公费(参见 140.1)——1448 年的《维也纳政教协议》(参见 144.4)也没有适当限制这些税收,或教廷后来又提高了某些税务、什一税和本地圣职人员的其他要求(*Stolgebuehren, Oblationen, Rentenzinsen* 等)、圣职人员的特权(自己的法院、部分上的免税权)、某些隐修院的经济竞争、太多次宣布对某人的绝罚或某地区的禁罚(甚至由于经济利益或政治问题也宣布这些禁令)、教会的法案可以申诉,因此多次被挪到罗马、那些令人讨厌的“大赦”(因为这些大赦引起大量资金流到国外,参见 152.2)等等。这些抱怨在很多方面也是合理的,而且也有一些真正愿意支持教会的人提出这些抱怨。1456 年在 Frankfurt(法兰克福)召开的“君主大会”上,人们首次——在 Mainz(美因茨)总主教 Dietrich(迪特瑞克)的指导下——系统地表达了关于罗马教廷带给德国教会的种种负担的抱怨(所谓的 *Gravamina nationis Germanicae*《德国的种种负担》)。从此以后,在德国的帝国议会

上人们屡次重复了这些《负担》。Maximilianus(马克西米连)皇帝于1510年命令著名的人文主义者 Jacobus Wimpfeling(温菲林,参见155.2)重新编写这些抱怨,而不久后,1518年在 Augsburg(奥格斯堡)的帝国议会,1521年在 Worms(沃尔姆斯)的帝国议会和1522/1523年在 Nuremberga(纽伦堡)的帝国议会都重新提出这些 Gravamina(《负担》);虽然它们仅仅是一个草稿,但因为“负担”的数目很多(100条或102条),语气又尖锐,它们成为宗教改革者的有利武器。除此之外还必须提到另一个发挥深厚影响的条件,就是在德国形成了一种“国君式的教会制度”(landesherrliches Kirchenregiment)。

在14、15世纪的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参见140.3;150.3;157.6)逐渐形成了一种比较全面的“国度教会”或“民族教会制度”(Staats- oder Nationalkirchentum),而在德国也有一个类似的发展倾向。然而,由于德国在政治上的分裂,各地的君主和隶属帝国的城市(Reichsstädte)是这种发展的推动力量,所以君主们(诸侯们)和各地的市政府想尽可能管理自己地区的教会,这样要限制或取缔他们地区中的教会司法权。他们用的最重要的手段是各种管理权、主保权和封地权(Vogtei-, Patronats- und Lehensrechte)。宗教法被镇压,世俗的司法权被扩展,甚至有一些新的规定说,国度可以限制“宗教法律权利的滥用”。虽然教规不允许这样做,但君主们向教会财产与圣职人员要求纳税(参见137.2),教会人士的经济收入受法律限制。世俗的君主们又要求参与教会职位的任命权,他们又在德国北部和东部建立了一些新的教区,要求主教的规定和教宗的法令都需要经过当地君主的批准,说君主对于当地的隐修院、圣职团、本堂和对于一切圣职人员拥有监督权和视察权,要管理和控制教会的经济,管理大赦的宣布,甚至要求为自己地区的“大赦垄断”等等。在一些情况下,一些教宗曾经让步于地区君主的要求,尤其是在“大公会议理论”引起的动荡中,但教宗们这样削弱了教区主教的法律权利(参见144.3,5)。在某些隐修院的改革中,世俗的权力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151.2)。首先在 Kleve(克雷弗)出现的句子 Dux Cliviae est papa in terris suis(“克雷弗的君主在自己的地区内就是教宗”)在中世纪末成为一个典型的说法,并且在其他的地区也同样有效,比如在奥地利、法尔茨、Wuerttemberg(维滕堡)、Sachsen(萨克森)、Hessen(黑森)、Thuringia(图林根)、Brandenburg(勃兰登堡)、Schleswig-Holstein(施莱斯维格)、Mecklenburg(梅克伦堡)等。中世纪的“国度教会制度”和“地区教会法制”(Territorialkirchenrecht)在很大的程度上准备了教宗改革,它成为宗教改革的强有

力支撑。那些新教的君主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宣布的新法律——即管理国度和教会的法规——不会那么快就有成效,如果不是很多类似因素早就存在。

158.6 虽然弊病很多很严重,但情况并不是没有希望的。上主的圣神/圣灵始终不会离开教会,它也引导了当时的教会脱离这种考验,使教会再一次恢复青春的精力。在基督徒们的团体当中仍然有许多完善的、健康的力量,它们成为改善、进步和自我治疗的出发点。这方面的启迪尤其来自欧洲的南部。虽然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精神导致很多传统因素的解体,但意大利仍然在隐修院和世俗的社会中拥有一个坚定的信仰核心。在别的地区,高等教育和教会开始分裂,但在意大利的情况不同:教宗们对文学和艺术的资助保持了教会与文化的合一。在那个充满危险的转变时期,在意大利也有很多杰出的主教与受尊敬的教区司铎。圣人/圣徒和真福人士的数目相当高。关于 Thomismus(托马斯思想)在 15 世纪末和 16 世纪初的复兴运动,参见 145.4b(关键的人物是 Cajetanus)。

当时的西班牙也统治 Sicilia(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参见 144.3)。由于海外的殖民地,西班牙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并对于将来的公教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西班牙在内部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统一制度,在西班牙地区内,中世纪的文化 and 教会传统受到的震撼最小。西班牙人长期以来抵抗穆斯林军,他们于 1492 年攻克了 Granada(格拉纳达),暂时结束了这个战争,但这个奋斗在西班牙民族中形成一个激烈的(似乎狂热的)信仰精神;统治者和人民似乎都成为一体。重新建立的宗教裁判所——它更多是国度的机构,而不是教会的法院——镇压信仰上的对手,比如背信者、犹太人和穆斯林(参见 150.3)。Aragon(阿拉贡)的历代国王很早就有“国度教会”的倾向(参见 109.5; 140.3)。后来,Aragon(阿拉贡)的 Ferdinandus II(菲迪南二世,1516 年去世)和 Castilia(卡斯蒂利亚)的 Isabella(伊沙贝拉,1504 年去世)创立了绝对的君主制度,他们于 1482 年从 Sixtus IV(西克斯图斯四世)那里获得一个“政教协议”,其中得到国王对教会的重要权利(比如国王可以提名教区的新主教,国王可以批准教宗的诏书,人们可以向国王的法院申诉)。Alexander VI(亚历山大六世)教宗于 1496 年赐给西班牙的统治者“公教统治者”(Maiestas Catholica)的荣称。因此,国王和宗教的利益长期有最密切的关系。

对于西班牙教会的改革和巩固有重大贡献的人是方济各会会士 Francisco Ximenes de Cisneros(吉麦内兹,1517 年去世),他曾是 Isabella(伊沙贝拉)女王的告解司铎和她的顾问。Ximenes(吉麦内兹)是伟大枢机主教 Mendoza(孟多撒,1495

年去世)的继承人,于1495年成为 Toledo(托莱多)的总主教和西班牙的首席主教,后成为枢机和宗教裁判所的总管(1507年),在 Ferdinandus(菲迪南)去世后甚至成为 Castilia(卡斯蒂利亚)的总督(1516-1517年),直到 Carolus V(查理五世)的到来。Ximenes(吉麦内兹)很热心地改进教区司铎和修会圣职人员的纪律,促使人们举办一些教区型的会议,亲自准备和领导针对 Oran(欧冉,在 Africa 地区)的十字军运动(1509年)。他在促进研究、培养精神文化方面很多有贡献,尤其是因为他创立了 Alcala(阿尔卡拉)的大学。关于他推动的多语《圣经》版本的发行,参见 145.5。他又支持一种有节制的、指向教会的人文主义。由于这一切因素,西班牙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公教的复兴运动和公教改革的精神家园。

外语 - 汉语索引

拉丁语(粗体) - 英语 - 德语(方括号) - 汉语 - 章号

- Aachen**, town in NW Germany, important center at Charlemagne's time; some medieval German kings were crowned there 亚琛; Synods 主教会议 89.1; 90.2,3; 95.4; 101.1,2; Muenster 大堂 98.6
- Abaelard, Petrus**, [Abelard], 1079 - 1142, French dialectician, theologian, teacher author of *Sic et non*, who spread the scholastic method 阿伯拉尔/阿贝拉德 106.5; 121.5 *
- abbas**, [Abt, abbot], superior of a monastery 隐修院长
- abbreviators**, secretaries in the Roman Curia in the 15th century 教廷秘书 156.6
- Acco**, [Akkon - Ptolemais], fortress in Palestine, besieged and conquered by the crusaders 阿克 109.3; 126.2,5
- Ackermann**, [Johannes de Tepla], Bohemian Poet, ca. 1400 阿克曼 153.3
- Adalbertus**, [Adalbert], King of Italy, crowned in 950 阿达伯特 88.4
- Adalbertus**, [Adalbert], Archbishop of Hamburg - Bremen, shared power with Anno of Cologne in 1062 阿达伯特 81.2; 82.5; 103.6
- Adalbertus**, [Woitjeh, Albert, Bela, Bertin], St. Adalbert, 956 - 997, Bishop of Prague in 983, missionary in Prussia, "Apostle of Prussia", martyred 阿达尔伯特 82.3,4; 88.3; 108.4
- Adaldag**, Archbishop of Hamburg - Bremen 936 - 988 阿达尔达格 81.2
- Adalwardus**, Bishop of Verden, ca 920 阿达尔瓦都斯 82.5
- Adam**, [Adam of Bremen], Bishop of Bremen, +1076 亚当 89.6
- Adelheid**, St., 931 - 999, wife of Lothair, then she turned to Otto I to save her, became his wife and was crowned Empress in 962 阿德莱德 88.4
- Adelmannus**, [Adelmann] of Liege, theologian, opposed Berengar's theories, ca 1050 阿德尔曼 90.6
- Adhemarus de Puy**, Bishop of Puy, leader of crusaders in 1096 阿德马尔 109.1; 119.3
- Ado**, monk, then Archbishop of Vienne, historian, +875 阿多 89.4; 100.3
- Adolphus de Nassau**, [Adolf], German Emperor 1292 - 1298 阿多夫 137.3
- adoptianismus**, theory that Jesus is the "adopted" son of the Father 嗣子说 84.2; 90.3

- aedificatio animi**, [Erbauungsliteratur, edifying literature], encouraging or consoling spiritual texts 灵修文学 153.3
- Aegidius Romanus**, [Egidio di Roma], Augustinian monk, + 1316, founder of the Augustinian school of thought, “doctor fundatissimus”, author of a treatise on papal power, 1302 艾吉丢 137.3; 139.2; 145.4b
- Aeneas**, Bishop of Paris, + 870 艾内亚斯 89.4
- Agapetus II**, Pope 946 – 955 阿格佩图斯 88.2
- Agathias**, ca 570, chronicler in Byzantium 阿格提阿斯 79.1
- Agnes de Poitou – Burgund**, wife of Henry III, Empress 1056 – 1062 阿格内斯 88.7; 103.1,4,6
- Agnes**, Countess of Meran, (illegally) married Philipp II Augustus in 1196 阿格内斯 123.4
- Agnes**, Blessed, of Bohemia, daughter of Ottocar I, became Clarissan sister, supported the “Stelliferi” congregation; + 1282 阿格内斯 117.2
- Agobardus**, Archbishop of Lyon, + 840 阿格巴德 87.1; 89.4; 92.5; 102.1
- Ailly, Peter d’**, French theologian, 1351 – 1420, rector of Paris University, Archbishop of Cambrai, cardinal, scholar, exponent of nominalism and Church reform 阿伊 141.4; 142.2; 145.4a; 152.4
- Aistulf**, King of Langobards 749 – 756 艾斯图尔夫 85.2
- Alamanni**, the Alemannic people, a Germanic tribe 阿勒曼尼人 79.1
- Albericus**, Abbot of Citeaux 1099 – 1109, successor of Robert de Molesme 阿尔伯瑞克 116.3
- Albericus II de Spoleto**, bearing the title Princeps Romanorum 932 – 954, he dominated papal policies and nominated four Popes 阿尔伯瑞克 88.2
- Albericus Tusculanus**, Italian count, ca 1020 阿尔伯瑞克 88.7
- Alberti, Leon Battista**, 1404 – 1472, Italian artist, author, 阿尔贝蒂 154.1
- Albertus**, Antipope 1102 阿尔伯特 105.3
- Albertus de Behaim**, [Albert], legate of Pope Gregory IX ca 1240 阿尔伯特 124.4
- Albertus de Buxhoevden**, [Albert of Riga], canon in Bremen, successful missionary in Livonia 1200 – 1229, founder and bishop of Riga 阿尔伯特 127.1
- Albertus de Jerusalem**, [Albert], Patriarch of Jerusalem, approved the Carmelites in 1210 阿尔伯特 130.2
- Albertus Magnus**, German Dominican, theologian, philosopher, scientist, 1193 – 1280, teacher of St. Thomas Aquinas 阿尔伯特 119.5; 122.1; 133.1,2; 135.1,2b *; 146.1,3; Albertists 145.4b
- Albertus de Saxonia**, [Albert of Sachsen], German theologian, + 1390, scientist, first rector of Vienna University, Bishop of Halberstadt 阿尔伯特 145.4a
- Albigenses**, [= Cathari], heretic sect in the 12th and 13th centuries, they promoted a “pure” life style; one of their centers of influence was the town of Albi and surrounding area in southern France; they spread fast and were persecuted 阿尔比派 113.2; 132.1
- Albornoz, Aegidius**, Cardinal from Spain, restored papal rule in Italy 1353 – 1367, “second founder of the Papal States” 阿尔伯诺兹 139.6
- Albrecht I de Austria**, Duke of Austria, King of Germany 1298 – 1308 阿尔布瑞克特

- 137.3; 138.2
- Albrecht II de Austria**, Duke of Austria, King of Germany 1438 - 1439 阿尔布瑞克特 144.2
- Albrecht Ursus**, Margrave of Brandenburg ca 1150 - 1170 阿尔布瑞希特 108.2
- Alcuinus**, [Alkuin, Alchuine, Alcuin], 730 - 804, theologian, educator, originally from York he became the most eminent scholar at Charlemagne's court 阿尔库因 89.2 * ,3; 92.3; 98.1
- Aldhelmus**, ca 650 - 709, Abbot in Malmesbury, "Father of Anglo - Latin poetry" 阿尔德海姆 89.2
- Alemanni** = Alamanni
- Alexander II**, Pope 1061 - 1073, originally Anselm, Bishop of Lucca, leader of the Patarnes 亚历山大 98.1; 103.6 * ; 104.1,4; 105.4; 117.1; 119.4
- Alexander III**, Pope 1159 - 1181, originally Cardinal Roland Bandinelli, teacher of canon law, 17 years under pressure from emperor Frederick I, reconciled to him in 1177 亚历山大三世 81.3; 96.3; 100.3; 107.3 - 5 * ; 110.2b; 111.3; 114.1
- Alexander IV**, Pope 1254 - 1261, pursued an anti - Staufer policy 亚历山大 124.7 * ; 130.3; 131.1
- Alexander V**, Pope 1409 - 1410, orig. Petrus Philargi, Archbishop in Milan, elected by the council of Pisa to end Church division 亚历山大 141.4 * ; 142.1; 145.4a
- Alexander VI**, Pope 1492 - 1503, originally Rodrigo de Borgia from Spain, capable but immoral, "the worst of the Renaissance Popes", influenced by the ruthless policies of his son Cesare 亚历山大 157.3 * ,4; 158.6
- Alexander de Hales**, + 1245, "Doctor irrefragibilis", English Franciscan, founder of the early Franciscan School of scholastic thought 亚历山大 135.2a * d; 145.2
- Alexiani**, [Alexius - brothers, Celliti, Lollardi], lay congregation founded in the time of the plague (1349) in Holland for the care of the sick and the dead 阿雷克修会 151.3c
- Alexius I Comnenus**, Emperor in Byzanz 1081 - 1118, asked the Pope for help in 1094 and so indirectly triggered the crusades 阿雷克西斯 91.3; 109.1
- Alexius IV**, Son of Isaac II Angelus, Emperor of Byzanz, ca 1200 阿雷克西斯 126.2
- Alexius**, St., whose legendary biography moved Waldes to lead a radical Christian life 阿雷克西斯 114.1
- Alfonso** = Alphonsus
- Alfredus Magnus**, [Alfred the Great], King of England 871 - 901, founder of the English monarchy, supporter of studies and translations 阿尔弗烈德 89.2
- Alger de Liege**, theological author, ca 1121 阿格尔 90.6
- Alphonsus V**, [Alfons, Alphonse], King of Aragonia, since 1442 also King of Sicilia 阿方索 142.3; 144.3
- Alphonsus I**, [Alfons, Alphonse], King of Asturia (N Spain) 739 - 757 阿方索 84.1
- Alphonsus VI**, [Alfons, Alphonse], King of Leon - Castilia who conquered Toledo in 1085 阿方索 109.5
- Alphonsus VIII**, [Alfons], King of Castilia who defeated the Muslims decisively in 1212 at Navas de Tolosa 阿方索 109.5
- Alphonsus IX**, [Alfonso de Leon, Alphonse], King of Leon (Spain), ca 1200 阿方索 123.4

- Alphonsus X**, [Alfonso el Sabio, Alphonse the Wise], King of Castilia and Leon 1252 - 1284 阿方索 124.7
- Alphonsus I**, [Alfons, Alphonse], + 1185, King of Portugal who was able to recover Lisbon from the Muslims in 1147 (with the help of British and German crusaders), 阿方索 109.2
- Alphonsus d' Este**, [Alfons], Count of Ferrara, married to Lucrezia Borgia in 1501 阿方索 157.3,5
- Alsatia**, [Elsass], Alsace, border area between Germany and France 阿尔萨斯 79.1
- altare**, [Altar, altar], place of worship in churches; place of decoration and religious art 祭坛 120.3; 154.2,3c; 158.3
- Alvarus de Cordova**, supporter of Christian zealots in Spain, ca 858 阿尔瓦汝斯 84.2
- Alvarus Pelagius**, Spanish Franciscan, author of a work on the Church, 1332 阿尔瓦鲁斯 139.2
- Amalarius**, Bishop of Metz, + ca 850, author of an important book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liturgy (830), 阿马拉留斯 89.4
- Amalricus de Bena**, theologian in Paris with pantheist and anti-clerical tendencies, ca + 1207, his adherents (Amalricans) were discovered in 1209 and suppressed 阿马尔里克 131.2a *; 135.1
- Amandus**, St., itinerary bishop from Aquitania, missionary in Belgium, "Apostle of Belgium", + 675 阿曼都斯 80.1
- Ambrosius**, [Ambrose], St., Bishop of Milan, important Latin Church Father, ca 330 - 397 安波罗修斯 90.5; 98.1
- Anacletus II**, Antipope 1130 - 1138 阿纳克雷图斯 106.2,3
- Anastasius III**, Pope 911 - 913 阿纳斯塔修斯 88.2
- Anastasius IV**, Pope 1153 - 1154 阿纳斯塔修斯 106.5
- Anastasius**, made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by Emperor Leo in 730 because he supported iconoclasm 阿纳斯塔修斯 92.1
- Anastasius Bibliothecarius**, scholar, cardinal priest, papal candidate in 855; translator of synod acts from Greek into Latin 阿纳斯塔修斯 87.2,3; 89.4; 92.3
- Andreas II**, King of Hungary, father of St. Elisabeth of Thuringia who joined the crusade of 1217 安德烈 126.2; 128.2
- Andronicus**, Emperor of Byzanz 1282 - 1328, opposed to Church union 安德洛尼克 125.3
- Angela de Foligno**, St., visionary, mystic author, 1248 - 1309 安格拉 133.5
- Angelico, Fra**, Italian painter, + 1455, famous for a style of heavenly purity and beauty 安杰利克 154.3a
- Angelus de Clareno**, Franciscan historian, + 1337 安格鲁斯 131.1
- Angelus Domini**, [Engel des Herrn, Angel of the Lord], Christian prayer since the 13th ct, very popular since the 17th century 主的天使 152.5
- Anna de Luxembourg**, Sister of Wenceslaus of Bohemia, married to Richard II in 1382 亚纳 148.1
- annatae**, (annalia), taxes attributed to the Curia from the first annual income of a newly appointed Church office holder 年税 140.1 * .3; 144.2,4; 147.1
- Anno**, Archbishop of Cologne, organized a coup d'etat in 1062 by controlling the young Henry IV 安诺 103.6
- Anonymus de York**, ca 1120, writer who

- wanted to limit the Pope to the spiritual realm 无名人士 111.2
- Anselmus Cantuariensis**, [Anselm] Bishop of Canterbury 1093 - 1109, theologian and philosopher, "Father of Scholasticism", he was exiled twice, but concluded an agreement with Henry I in 1105 安瑟伦 105.4; 121.3 * ,4,5; 122.2; 135.2a
- Anselmus de Laon**, [Anselm] +1117, French theologian, author, one of the early scholastics 安瑟伦 121.4
- Anselmus de Lucca** = Alexander II
- Anselmus de Lucca**, [Anselm the Younger], Bishop of Lucca, canonist, ca +1086 安瑟伦 110.3
- Ansgarius**, [Ansgar, Anskar], St., "Apostle of Denmark", missionary in Denmark and Sweden, ca 801 - 865 安加略/安斯加尔 81.2,3
- Antoninus**, St. Archbishop of Florence, + 1459, Thomist theologian 安托尼努斯 145.4b
- Antonius de Padua**, [Anthony], St., Franciscan from Portugal, then in Italy, famous as preacher and worker of miracles, +1231; popular saint 帕多瓦的安托尼乌斯 129.3; 133.3
- Antoniti**, [Antoniter, Hospitaliter], medical congregation of lay brothers, first founded in 1095 安托尼医疗会 117.3a
- Antwerp**, town in Belgium 安特卫普
- apostolic life** = vita apostolica
- apostolica successio**, [apostolic succession], the doctrine that the authority of Jesus was and is passed down in an unbroken line from the apostles to their successors, the bishops, especially to the Bishop of Rome 宗徒传承/使徒传统
- Apostolici**, [Apostelbrueder, Apostolic Brethren], founded by Segarelli in 1260, later suppressed 宗徒/使徒弟兄会 131.2e
- appellatio**, [appellation to Rome], right of any bishop to appeal to Rome, denied by nationalist rulers (e. g. in England and France) 申诉权 110.1,2e; 144.2; 158.5
- Aquitania**, area in SW Gaul 阿奎塔尼亚
- Aragonia**, [Aragon], area (kingdom) in NE Spain 阿拉贡 104.6
- Arbues, Petrus**, Augustinian canon, inquisitor of Aragon, attacked in 1485 in the Church of Zaragossa 阿尔布斯 150.3
- archidiaconus**, [archidiacon], important ecclesiastical office, disappeared later in the Middle Ages 总执事 95.1; 112.2
- archipresbyter**, priest, ecclesiastical office 总司铎 95.1
- architectura**, ecclesiastical architectural style 教堂建筑风格 98.6; 120; 133.8; 154.1
- Arethas de Caesarea**, 849 - 932, Archbishop of Caesarea in Cappadocia, exegete 阿瑞塔斯 91.2
- Aretino, Pietro**, Italian humanist, author of satires, +1556 阿瑞蒂诺 155.3
- Arialdus de Milano**, leader of the Patarenes, ca 1050 阿瑞阿尔都斯 103.6
- Aristoteles**, Greek philosopher, + 322 BC, whose works profoundly influenced scholasticism, especially since the time of Albertus Magnus and Thomas Aquinas 亚里士多德 121.2,5; 135.1,3; 145.3
- Armenia**, Christians (monophysites) of Armenia were united with the Roman Church in 1439 亚美尼亚 144.1
- Arnoldus de Brescia**, [Arnold of Brescia], 1100 - 1155, priest, demagogue and extreme reformer, executed 布雷西亚的阿

- 诺德 106.5 * ; 107.1 ; 124.5
- Arnoldus de Citeaux**, [Arnold] Abbot of Citeaux, papal legate in the war against the Albigenses 1209 - 1229 阿诺德 132.1
- Arnoldus de Colonia**, [Arnold], OFM missionary in China ca 1300, together with Montecorvino 阿诺德 127.4
- Arnulf de Carinthia**, German king 887 - 899, Emperor 阿尔努夫 87.5,6
- Arpad**, 840 - 907, leader of the Magyars 阿尔帕德 82.6
- artes liberales**, [seven liberal arts], the " trivium " (grammatica, dialectica, rhetorica) and the " quadrivium " (geometria, arithmetica, astronomia, musica), the basis of medieval higher education 七个自由学科/三学四艺 89.1 ; 134.1
- Ash Wednesday** = Cinerum
- astrologia**, [astrology], popular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占星术 158.2
- asylum**, right to hide in a church 避难权 102.2
- Athos**, mountain in N Greece (Chalkydike), with many monasteries, founded in 963, the spirituality of hesychasm developed here 阿托斯山, 圣山 83.4 ; 91.2
- Atto**, Bishop of Vercelli, +961 阿托 89.5
- Augsburg**, town and diocese in Southern Germany 奥格斯堡 79.2
- Augst, Augusta Raurica**, town in Switzerland, 奥格斯特 79.1
- Augusta Vindelicorum**, [Augsburg], town in S Germany, 奥格斯堡 79.1
- Augustinus**, St. 354 - 430, most influential Latin Church father, Platonic - Augustinian thought was very influential, particularly in early scholasticism 奥古斯丁 89.3 ; 90.4, 5 ; 121.1,3 ; 122.1 ; 135 ; 146.1,2 ; 149.1
- Augustinus - Chorherren**, [Canonici], canons living according to Augustine's rule 奥古斯丁圣职团 117
- Augustinus - Eremiti**, [Augustine - hermits] = Ordo Sancti Augustini 奥古斯丁隐修士 130.3
- Augustinus, Regula**, [Rule of St. Augustine], monastic rule combined from Augustine's writings in the 7th ct, according to which many communities of canons lived since the 12th ct 奥古斯丁会规 115.1, 117.1 * ,3c ; 130.1,5 ; 151.3
- Austrasia**, eastern part of the Frankish kingdom (east of the Maas River) 奥斯瑞西亚 80.3
- Avari**, the Avars, a people in Pannonia connected with the Huns, their kingdom collapsed ca 850 阿瓦尔人 82.2.4
- Ave Maria**, prayer based on Biblical texts 圣母经 119.3
- Averroes**, Arab philosopher, 1126 - 1198, interpreter of Aristotelianism, influenced scholastic thought 阿威罗伊 135.1 * ,3ce ; 137.4 ; 139.2 ; 155.3
- Avicenna**, [Ibn Sina], Arab philosopher, + 1037, influenced mystical thought (Eckhart) 阿维森纳 146.2
- Avignon**, town in S France, papal residence from 1309 to 1367, and from 1370 to 1376 ; the move of the Curia to France (" Exile in Babylon ") was partly due to the chaotic situation in Rome and central Italy at that time 阿维尼翁 138 ; 139.5 ; 141
- azyma**, unleavened bread used for liturgical purposes ; some authors in the Eastern Church accused Latin Christians of being " azymites " 无酵饼 94.2,3 ; 98.3 ; 144.1
- Bacon, Roger**, 1214 - 1294, British Franciscan, talented but controversial

- teacher at Paris and Oxford, scholar of natural sciences and the languages 罗杰尔·培根 135.3d
- Balduinus I**, [Balduin of Flanders],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after 1204 巴尔度因 126.2
- Balduinus II**, [Balduin],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overthrown in 1261 巴尔度因 125.1
- Balduinus I**, [Balduin], King of Jerusalem 1100 - 1118 巴尔度因 109.1
- Balduinus II**, [Balduin], King of Jerusalem in 1118 巴尔度因 118.3
- Bamberg**, diocese in Germany, established in 1007 班贝格 82.2; 88.7
- Bandinelli, Roland** = Alexander III
- baptismus**, [Taufe, baptism], important Christian sacrament 洗礼 133.1
- Barbarossa** = Fredericus I Barbarossa
- Bardas**, Cesar Bardas, uncle of Emperor Michael III, ca 856 - 860 巴达斯 93.1
- Baroncelli, Francesco**, Senator of Rome, ousted by Cola di Rienzo in 1353 巴润切利 139.6
- Bartolomeo, Fra**, Italian painter, + 1517 巴托洛梅奥 154.3b
- Bascia**, [Baskenland, Basque], area in the N of Spain 巴斯克地区 84
- Basileia**, [Basel], town in Switzerland, place of an ecumenical council (1431 - 1437), which was recognized by the Pope in 1433 but moved to Ferrara in 1437; the Council of Basel became schismatic in 1438 巴塞尔 143 *; 144.4; 145.4c; 148.5; 151.3d; 152.4; 155.1; 158.4
- basilica**, [Basilika], old style of Church architecture 大殿风格 98.6; 120.1
- Basilius I**, [Basilius], Emperor of Byzanz 867 - 886 巴西略/巴西流斯 83.2; 91.3; 93.3
- Basilius II**, [Basilius], "Bulgaroktonos", Emperor of Byzanz 976 - 1025 巴西略/巴西流斯 83.3,4
- Basilius II** = Vasilius
- Bavaria**, [Bayern], South Germany 巴伐利亚 79.2; 80.3
- Bavarii**, Bavarians, a Germanic tribe 巴伐利亚人 79.1; 80.3
- Bayern** = Bavaria
- Bebel, Heinrich**, German humanist, + 1518 贝尔 155.2
- Bec**, monastery in Normandy 贝基 89.6; 121.3
- Beccadelli, Antonio**, Italian author of satires, + 1471 贝卡德里 155.3
- Becket, Thomas**, St.,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1162 - 1170, objected to the restraint of the English Church by Henry II (Diet of Clarendon 1164), fled to France, was killed by four knights after his return; popular saint 托马斯·贝克特 107.3,5 *
- Beda Venerabilis**, [Bede, Baeda], St., 672 - 732; monk in Jarrow (England), most important precursor of the Carolingian Renaissance, historian commanding extensive knowledge "可敬的"比德/伯达/贝达 89.2; 98.4; 100.3
- Begardi**, [Begharden], pious communities of men, who lived a life like the Beguines, prominent in the Low Countries since 1220 贝格哈德会 117.3d *; 131.2d; 145.4a; 146.3
- Beguinae**, [Begenen, Begginæ, mulieres religiosæ, Beguines], communities of pious women since the end of the 12th century, who lived together but did not take religious vows; they were free to own property, to leave and to marry; they were prominent in the Low Countries and the Rhineland, but

suspected of heresy and dissolved in 1311 贝居因会 117.3d * ; 131.2d; 145.4a; 146.3

Beijing, [Cambaluc, Peking, Hanbali], important town in China, mission activities there started after 1294 北京 127.4

Bela, King of Hungary 1061 - 1063 贝洛 82.6

Belgrade, town in Serbia 贝尔格莱德 156.3

Benedictini = Ordo Sancti Benedicti

Benedictus III, [Benedict], Pope 855 - 858 本笃/本尼迪克 87.2,5 - 7

Benedictus VIII, [Benedict], Pope 1012 - 1024, original name: Theophylactus 本笃/本尼迪克 88

Benedictus IX, [Benedict], Pope 1032 - 1044, deposed by Henry III 本笃/本尼迪克 88.7; 103.1,5

Benedictus X, [Benedict], made Pope in a tumult (1058 - 1059), expelled 本笃/本尼迪克 103.5

Benedictus XI, [Benedict], Pope 1303 - 1304 本笃/本尼迪克 137.4; 138.1

Benedictus XII, [Benedict], Pope 1334 - 1342, former Cistercian who resided in Avignon, made efforts to reform the Cistercians, Benedictines 本笃/本尼迪克 139.4 * ; 140.2; 151.2

Benedictus XIII, [Benedict], Pope 1394 - 1423, former Cardinal Peter of Luna (Spain), who resided in Avignon and refused to unite with the Roman faction 本笃/本尼迪克 141.3

Benedictus XIV, [Benedict], Pope 1740 - 1758 本笃/本尼迪克 151.3d

Benedictus XIV, antipope elected in 1423, resigned 1429 本笃/本尼迪克 142.3

Benedictus de Aniane, + 821; Abbot of Aniane (S France), reformer of the Benedictine order since 779 本笃/本尼迪克

101.1

beneficium, benefice, and endowed church office 有收入的教会职位

Benevento, town in S Italy 贝内文托

Berengar I, [Berengarius], Margrave of Friaul, controlled Italy 900 - 924; crowned Emperor in 915 贝伦格尔 87.6; 88.2

Berengar II, [Berengarius], Margrave of Ivrea, king of Italy in 950 贝伦格尔 88.4

Berengar de Tours, [Berengarius], Bishop, scholasticus at Tours, dialectician, + 1088 贝伦格尔 89.6; 90.6 * ; 119.2

Bernardin de Siena, Italian Franciscan, + 1444, famous popular preacher 伯尔纳丁 151.2

Bernardus de Clairvaux, [Bernard, Bernhard] 1091 - 1153, St., Abbot of Clairvaux, "second founder" of the Cistercians, politician, theologian, mystic ("Doctor mellifluus"), most influential Church authority in his age 伯尔纳德 106.2,4,5; 108.2; 109.2; 110.2e; 111.3; 113.3; 116.3,4 * ; 118.3; 121.5; 122.2 * ; 133.3,7; 137.3; 146.2; 150.1

Bernardus, monk from Spain, missionary in Pomerania ca 1120 伯尔纳德 108.3

Berno de Beaume, first abbot of Cluny, 910 贝尔诺 101.3

Bernoldus, [Bernold], monk in Constance at St. Blasien, author, + 1100 贝尔诺德 89.6; 90.6

Bernwardus, Bishop of Hildesheim, + 1022 伯恩瓦德 88.3; 98.6

Bertholdus de Calabria, [Berthold], founder of the Carmelites, lived as hermit at Mount Carmel 1156 - 1195 贝尔托德 130.2

Bertholdus de Freiburg, [Berthold], Dominican, author of a German version of a

- Summa Confessorum*, ca 1295 贝尔托德 119.5
- Bertholdus de Regensburg**, [Berthold], Franciscan preacher, + 1272 贝尔托德 133.2,3
- Besancon**, town in E France, place of the imperial diet of Besancon 1157 贝桑松 107.2
- Bessarion, Johannes**, 1403 – 1474, Metropolitan of Nicaea, since 1439 cardinal, eminent Greek scholar and supporter of Church union 贝萨里翁 144.1; 155.1; 156.4
- Bibars**, Sultan of Egypt and Syria, 1260 – 1277 比巴尔 126.5
- Biblia**, [Bibel, Holy Bible], the most important book of the Middle Ages, copied, studied, interpreted, printed after 1450, edited in multilingual versions by Ximenes and others; first German printed versions from 1466《圣经》145.5; 153.2; 155.3
- Biblia pauperum**, [Armenibibel], pictorial version of Biblical themes, especially popular in the 14th and 15th centuries 穷人的《圣经》153.3
- Biblia prohibitiva**, forbidden Bible, since the 13th century there were some local prohibitions to translate the Bible into the colloquial language, motivated by the abuse of Biblical texts by heretic sects 被禁止的《圣经》153.2
- Biblia in versis**, [Reimbibeln], versifications of Biblical texts 用诗体编写的《圣经》153.3
- Biel, Gabriel**, German theologian, ca 1420 – 1495, famous professor in Tuebingen, “doctor catholicus”, exponent of Occamism who influenced M. Luther 比尔 145.4a * ; 151.3a
- Birgitta**, [Brigida, Brigitta, Bridget], Swedish Saint, 1303 – 1373, visionary, founded a monastery in Wadstena in 1346, the origin of the Brigittine Sisters, lived an ascetic life in Rome after 1350, her *Revelations* gave rise to disputes 布里吉特 139.6; 146.1; 151.3d *
- Birgittines**, congregation of sisters founded by Birgitta in 1346 in Wadstena, they also accepted deacons and priests in their communities 布里吉特修女会 151.3d
- Bishop** = episcopus
- Blondel**, David, theologian, historian, argued against the reliability of the Pseudo – Isidorian Decretals, refuted the legend of a female pope in 1649 布兰德尔 87.2.4
- Bobbio**, monastery in North Italy, founded by Columbanus ca in 610; it was first granted the privilege of exemption (in 628) 博比欧 101.2
- Boccaccio, Giovanni**, Italian humanist + 1375; author of the *Decamerone* and of books on Greek and Roman mythology, one of the first to study Greek literature 薄伽丘 155.1
- Boethius**, 480 – 524, Roman philosopher, translator, politician who wrote the famous *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 before his execution 波伊提乌斯/鲍埃蒂 89.2; 121.1; 135.1
- Boethius de Dacia**, scholastic writer, 13th et 波伊提乌斯 135.1
- Bogomili**, sect on the Balkans, possibly developed from the Pauliciani in the 9th, 10th centuries, characterized by ascetic dualism, quite influential in Bulgaria and Bosnia, then they moved to the West and formed the Cathari 波格米勒派 91.3; 113.2
- Bogoris**, [= Boris], Duke of Bulgaria, baptized in 864 鲍里斯 83.3

- Bohemi**, Slavic people of central Europe 波希米亚人 79. 2
- Bohemia**, [Boehmen], area in central Europe 波希米亚 82. 3; 148
- Boleslaw**, name of Bohemian Dukes 波列斯拉夫 82. 3
- Boleslaw I**, Count of Bohemia 929 - 967, killed his brother Wenzel but accepted the feudal authority of Otto I in 950 波列斯拉夫 82. 3
- Boleslaw II**, "the Pious", Count of Bohemia 967 - 999, supporter of the Church 波列斯拉夫 82. 3
- Boleslaw I Chrobry**, Count of Poland 992 - 1025, son of Miesko, supporter of the Church 波列斯拉夫 82. 4
- Boleslaw III**, King of Poland ca 1120 波列斯拉夫 108. 3
- Bologna**, [Bologna], city in Italy, seat of one of the oldest universities of Europe 博洛尼亚 110. 3; 134; 155. 1
- Bonagrata**, Franciscan theologian, fled from Avignon to Louis in 1328 博纳格拉提亚 139. 2; 151. 1
- Bonaventura**, [Bonaventure; Ital: Giovanni Fidanza], St., Italian Franciscan, 1221 - 1274, mystic theologian, general of the Franciscans 1257 - 1274 波纳文都拉 122. 1; 125. 1; 129. 3; 133. 3; 134. 2; 135. 2d *; 145. 2
- Bonifatius**, [= Winfried, Wynfrieth], St. Boniface, ca 675 - 754, most important Anglo - Saxon missionary among the Germanic tribes, "Apostle of Germany", martyred 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卜尼法斯 79. 2, 3; 80 *; 85. 1; 86. 1; 89. 2; 95. 2; 101. 2
- Bonifatius VI**, [Boniface], Pope 896 博尼法奇乌斯 87
- Bonifatius VII**, [Boniface] antipope 984 - 985 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卜尼法斯 88. 6
- Bonifatius VIII**, [Boniface], Pope 1294 - 1303, orig. Benedict Gaetani; his struggle against the French king and against the Colonna clan prepared the exile in Avignon 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卜尼法斯 110. 2, 3; 111. 2, 3; 125. 4; 128. 2; 131. 1; 135. 3e; 137 *; 138. 1, 4; 139. 2; 140. 1 - 3; 151. 1; 152. 2
- Bonifatius IX**, [Boniface], Pope 1389 - 1404, resided in Rome, failed to promote Church unity 博尼法奇乌斯/波尼法修/卜尼法斯 140. 1; 141. 3 *; 151. 3d; 152. 2, 4
- Bonizo**, Bishop of Sutri, author of a collection of Canon Law, ca +1095 波尼佐 110. 3
- Bononia** = Bologna
- Borgia, Cesare**, 1475 - 1507, illegal son of Alexander VI, ruthless politician and murderer of his brother, influenced his father's policies 博尔吉亚 157. 3
- Borgia, Lucrezia**, 1480 - 1519, daughter of Alexander VI 博尔吉亚 157. 3
- Borgia, Rodrigo** [Borja] = Alexander VI
- Boris** = Bogoris
- Borussia** = Prussia
- Borziwoi**, Duke of Bohemia, ca 860 波希沃伊 82. 3
- Bourges**, town in central France, the Pragmatic Sanction of Bourges (1438) restricted papal power in France 布尔日 140. 3; 144. 2 *; 156. 4; 157. 6
- Bracciolini, Poggio** = Poggio Bracciolini
- Bradwardin, Thomas de**, [Thomas of Bradwardine], 1290 - 1349, English theologian,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exponent of Augustinian thought 布拉德瓦丁 145. 4b *; 147. 1

- Bramante**, 1444 - 1514, Italian artist who made a plan to rebuild St. Peter's Church in Rome, 布拉克曼特 154.1
- Brandenburg**, town in N Germany 勃兰登堡 82.5
- Bremen - Hamburg**, archdiocese 不来梅 - 汉堡 81.2
- breviarium** = liturgia horarum
- Brigantia**, [Bregenz], town in W Austria, 布雷根茨 79.1
- Brigitta, Brigida** = Birgitta
- Brothers** = Fratres
- Brothers of Common Life** = Fratres vitae communis
- Brugman de Kempis**, + 1473, German Franciscan, famous preacher 布鲁格曼 153.1
- Brunelleschi, Filippo**, Italian artist, 1377 - 1446 布鲁内莱吉 154.1
- Bruni, Leonardo**, Italian humanist scholar, + 1444 布鲁尼 155.1
- Bruno**, St., + 1101; teacher at Rheims, founder of the Carthusians, first community in La Chartreuse in 1084, died in La Torre, Calabria 布鲁诺/布汝诺 116.1
- Bruno de Colonia**, Archbishop of Cologne, Duke of Lothringia, brother of Otto Magnus, + 965 布鲁诺/布汝诺 88.3
- Bruno de Querfurt**, [Brun], Bishop of Querfurt, student of St. Romuald, missionary at the Black Sea and in Prussia, martyred in 1009 布鲁诺/布汝诺 108.4
- Bruno, Giordano**, Dominican, suspected of propagating heresies, free thinker, executed in 1600 布鲁诺/布汝诺 135.3e; 145.4c
- Burchard**, Bishop of Worms, author of a collection of the ecclesiastical law, + 1025 布克哈德 88.3; 89.6; 102.1; 158.2
- Burckhard, Jakob**, Swiss author, (mistakenly) thought the Renaissance to be essentially pagan and non-religious 布克哈德 155.3
- Burдинus de Praga** = Gregorius VIII
- Buridanus, Johannes**, French theologian, + 1358, scientist, rector of Paris University 布里但 145.4a
- Burkhard**, first Bishop of Wuerzburg, ca 741 布克哈德 79.3; 85.1
- Busch, Johannes**, German founder of reformed Augustinians, + ca 1450 布施 151.3a
- Byzantium**, [Byzanz, Constantinopolis], capital of the Eastern Roman Empi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Greek Orthodox Church. Constantinople fell to the Ottoman Turks in 1453. 拜占庭
- Cadalus** = Honorius II, antipope
- Caedmon**, friar in Whitby, ca 630 - 680, author of Biblical poetry in Anglosaxon language 凯德蒙 89.2
- Caelestinus** = Coelestinus
- caelibatus** = coelibatus
- Caena Domini**, dispute about the Last Supper 关于最后晚餐的争论 90.5,6
- Caesarius de Heisterbach**, Cistercian hagiographer, + ca 1240 切撒留斯 133.6
- Caesarius de Speyer**, Franciscan theologian, introduced the order to Germany in 1221 切撒留斯 129.3
- Cajetanus, Thomas** = Thomas de Vio
- Calixtus II**, Pope 1119 - 1124, originally Guido, Archbishop of Vienne, in whose pontificate the agreement on the investiture issue (Concordate of Worms 1122) was accomplished 卡里斯图斯 103.2; 105.6
- Calixtus III**, Antipope 1168 - 1178 卡里斯图

- 斯 107.4
- Calixtus III**, Pope 1455 - 1458, originally Alonso de Borja (Borgia) from Spain, organised resistance against the Turks; cultivated political nepotism 卡里斯图斯 152.5; 156.3 *
- Camaldoli**, [Campus Maldoli], Camaldolensi, congregation that developed in the 11th century from a monastery founded by St. Romuald in 1012 in Italy 卡马尔多里(会) 101.4
- Cambaluc** = Beijing
- campana, campanile**, bell, bell - tower at church buildings 钟/钟楼 98.5
- Canon episcopi**, a legal book from the early 10th century《主教之法典》102.1; 158.2
- Canon Law** = codex iuris canonici
- canonici regulares**, regular canons, clerics with a rule for common life, revived in the 11th and 12th centuries 有会规的圣职团 112.1; 117 *; 151.1,2
- canonicus**, [Kanoniker, canon], a clergyman who belonged to a cathedral chapter or collegiate church. Those who observed a written rule (usually the Rule of St. Augustine) were called regular canons (canonici regulares); those who held personal property and lived in their own houses were called secular canons (canonici saeculares) 圣职团员
- canonissae regulares**, regular women canons, women communities with a rule for common life 女士社祷团体 95.4; 101.1; 117.2
- canonizatio**, [Heiligspredung, canonization], the formal announcement (by the Pope) that a person can be respected and commemorated as "saint" in the Church; first occurrence in 973 宣布为圣人/圣徒 100.3
- Canossa**, castle of Countess Mathilda, where Henry IV received forgiveness from Gregory VII; symbol of papal dominance and imperial submission 卡诺撒 104.4
- Cantuaria, Canterbury**, most important archbishopric in England 坎特伯雷 89.2
- Canutus Magnus**, [Knut, Canute the Great], King of Denmark (and England) 1018 - 1035, supporter of the Church 克努特 81.2
- Capestrano** = Johannes de Capestrano
- capitulare**, orders issued by Charlemagne, the first in 769 法令集 89.3
- capitulatio**, [Wahlkapitulation], the promise of a candidate before his election for the office of bishop or Pope; the promises were sometimes not kept after election and were interpreted as diminution of papal power 选举前的诺言 112.1; 139.5; 156; 157
- capitulum cathedralis**, [Domkapitel, chapter of a cathedral], the clergymen at a cathedral church who enjoyed certain rights 大堂圣职团 95.4; 112.1; 158.3
- Carantani**, Slavic people in central Europe 卡兰塔尼 79.2
- Carinthia**, area in the South of Austria 卡林提亚 88.6
- Carmelitae**, [Ordo Fratrum B. Mariae Virginis de Monte Carmelo], monastic congregation started by Berthold in 1156 in Palestine; they received papal recognition in 1216 加尔默罗会, 圣衣会 130.2; 151.1
- Carolingii**, Carolingians, a short - lived empire founded by Carolus Magnus 卡洛林/加洛林王朝 87
- Carolomannus**, [Karlmann], Carloman, son of Carolus Martellus, + 754, retired from politics in 747 in order to become a monk in Italy 卡洛曼 80.3; 85.1; 96.1

- Carolus Magnus**, [Karl der Grosse], Charles the Great / Charlemagne, 742 – 814, king of the Franks 768 – 814, crowned in Rome in 800, promoted studies and education, supported and used the Church to rule his country, promoted missions 查理大帝/卡尔大帝/查理曼 80.1.3; 81.1; 82.2,3; 84.1; 85.2; 86 *; 89.3 *; 90.2,3; 92.3; 95.2 – 4; 96.1; 98; 100.3; 101.1; 102.3; 107.1,3; 111.1; 158.2; Libri Carolini 92.3
- Carolus II Glaber**, Charles the Bald [Karl der Kahle], Emperor in 875 卡若卢斯 87.1,5; 89.4; 90.5
- Carolus III Crassus**, Charles III the Stout / [Karl der Dicke], king of Italy and Alamannia 876 – 887 卡若卢斯 87.5; 97.1
- Carolus IV**, [Karl, Charles], Charles of Luxemburg, German Emperor. 1346 – 1378, crowned in Rom in 1355; founder of the University of Prague; he clarified the procedure of the election of the German King (*Goldene Bulle / Bulla Aurea*, 1356) 卡若卢斯/卡尔/查理 139.5,6 *; 141.2; 145, 1; 155,2
- Carolus Martellus**, Charles, [Karl Martell], leader of the Franks 714 – 741, defeated a Muslim army in Poitiers in 732 查理·马特 79.1; 80.2; 84.1; 85.1; 96.1; 97.2; 101.1; 102.3
- Carolus V**, [Karl, Charles], King of France 查理 141.3
- Carolus VI**, [Karl, Charles], King of France 1380 – 1422 查理 142.1
- Carolus VII**, [Karl, Charles], King of France 查理 144.2; 156.3
- Carolus VIII**, [Karl, Charles], King of France 查理 157.3,4
- Carolus I de Anjou**, [Karl, Charles], King of Naples and Sicily 1265 – 1285 查理 124.7; 125.1 – 3 *; 126.5
- Carolus II de Anjou**, [Karl, Charles], King of Naples 1285 – 1309 查理 125.4
- Carolus III de Anjou**, [Karl, Charles of Durazzo], King of Naples 查理 141.3
- Cartusii**, [Carthusian Order], founded in 1084 by St. Bruno in Chartreuse 加都西会 116.1 *; 151.1
- Casimirus I**, [Kasimir], King of Poland, ca 1040, supporter of Christianity 卡西米尔 82.4
- Castel Sant' Angelo**, Castle in Rome, built as mausoleum for Emp. Hadrian in the 130s, later in papal possession (14th cent) 圣安杰罗城堡 88.6
- Cathari**, [Cathars, Albigenses], dualist heretic sect especially in N Italy and S France, in the 12th ct and 13th centuries, perceived as danger to society and suppressed by church and state 清洁派 91.3; 113.2,3 *; 114.1; 123.5; 131.2b; 132; 158.2
- Catharina de Bologna**, [Catherine], St., Italian mystic, +1463 加大利纳 146.1
- Catharina de Genua**, [Catherine Fieschi], St. Italian mystic, +1510 加大利纳 146.1
- Catharina de Siena**, [Catherine], St. 1347 – 1380, famous visionary, tried to bring about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Pope and the city of Florence (ca 1376) (锡耶纳的) 加大利纳 139.6 *; 141.2; 146.1
- Catholica Ecclesia**, [Katholische Kirche, Catholic Church], derived from the Greek word 'katholikos' (universal); the expression was adopted in the second century by the mainstream Church in opposition to

(Gnostic) Christian groups 大公教会
celibacy = caelibatus
census Romanus, the income of the Papal Curia from the Papal States in Italy and from exempt monasteries and churches 罗马税 110. 2f; 140. 1
Cerularius, Michael, [Gr; Kerullarios],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1043 - 1058, connected with the schism between East and West 凯卢拉利乌斯/克汝拉瑞斯 94. 2, 3; 103. 2
Cesarini, Julianus, Italian Cardinal, president of the Synod of Basel since 1431, left for Ferrara in 1437 切撒瑞尼 143. 1, 2; 148. 5
Charles = Carolus
Chartres, town in France, SW of Paris, School of 沙特尔/夏特尔 89. 6
Chartreuse 见 Cartusii
Chazari, [Chazaren], turko - finnic tribe on the Crimean Island 哈扎尔人 83. 2
Chelchizki, Peter, 1390 - 1460, founder of the Bohemian Brothers 海尔奇茨基 148. 6
Christianus, Archbishop of Mainz, participated in a military campaign against the Romans in 1167 克瑞斯提安 107. 4
Christianus, Bishop of the Prussians after 1215, asked the Teutonic Knights for support in 1226 克瑞斯提安 127. 2
Christophorus, Pope 903 - 904 克利斯托夫 88. 2
Chrodegang, Bishop of Metz, + 766, wrote a rule for canonical life 赫洛德冈 95. 4
Chrysoloras, Manuel, Byzantine scholar, teacher of Greek in Florence since 1396 and in other Italian cities, he died at the Council of Constance in 1415 克里索罗拉 155. 1
Chur / Curia, town in Switzerland, diocese 库尔 79. 1; 84. 1

Cid, [Rodrigo Diaz de Vivar], Spanish hero, + 1099 熙德 109. 5
Cimabue, 1240 - 1303, Italian painter 契马布埃 133. 9
Cinerum, [Aschermittwoch, Ash Wednesday], important day of fasting 圣灰日 99. 1; 100. 2
Cistercians = Ordo Cisterciensium
Citeaux, [Cistercium], monastery in the area of Dijon, founded in 1098 by Robert of Molesme, it became the mother house of the Cistercian Order 熙笃 116. 3, 4
Civitas Dei, [Gottesstaat, City of God], the ideal state model, inspired by Augustine's thought, influential in the Middle Ages 上主之城/上帝之城 86. 2, 4; 104. 1; 111; 136. 1
Clairvaux, monastery directed by St. Bernard 明谷 116. 3, 4
Clarendon, diet of Clarendon of 1164, which was an attempt of Henry II to control the Church in England 克拉任顿 107. 5
Claudius, Bishop of Turin, extreme iconoclast, + 827 克劳迪乌斯 92. 5
Clemanges, Nicolaus de, French theologian, + 1437 克勒曼 141. 2, 4
Clemens I, St., Pope 88 - 100 克雷孟/革利免 83. 2
Clemens II, Pope 1046 - 1047, originally Bishop Suidger of Bamberg, who crowned Henry III in 1046 克雷孟/革利免 88. 7 *; 102. 3; 103. 1
Clemens III, Pope 1187 - 1191, who could return to Rome and sign a contract with the Romans 克雷孟/革利免 107. 6, 7 * 8; 109. 3; 117. 3e
Clemens III, Archbishop Wibert of Ravenna, Antipope 1080 - 1100 克雷孟/革利免 104. 5 *; 105. 1; 115. 2
Clemens IV, Pope 1265 - 1268, originally

- Archbishop of Narbonne, who accepted Charles de Anjou as King of southern Italy 克雷孟/革利免 110.2f; 124.7 * ; 125.1,2; 140.2
- Clemens V**, Pope 1305 - 1314, he moved the Roman Curia to Avignon and yielded to French pressure in some respects 克雷孟/革利免 110.2a.3; 111.4; 125.4; 127.4; 133.4; 135.3; 138 * ; 139.1; 140.1,2; 151.1
- Clemens VI**, Pope 1342 - 1352, who bought Avignon and the surrounding area from Johanna I of Naples in 1348 克雷孟/革利免 139.5 * ; 150.1; 152.2,3
- Clemens VII**, Antipope in Avignon 1378 - 1394, originally Robert of Geneve, cousin of the French king 克雷孟/革利免 141.2,3 * ; 147.2
- Clemens VIII**, Antipope 1423 - 1429 克雷孟/革利免 142.3
- Clemens IX**, Pope 1667 - 1669; he dissolved the "Jesuati" congregation in 1668 克雷孟/革利免 151.3c
- clerici**, [Klerus, clergy], a collective term for men in the holy orders (bishops, priests, deacons) who hold offices in the Church, a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unordained believers, who are called laity (laici) 圣职人员
- Clermont, Synod of**, Synod in France in 1095, where the Pope exhorted Christians to join the first crusade 克莱尔孟 105.2; 109.1
- Cluny**, [Clugny, Cluniacum], a monastery in Burgundy, founded in 909, it became the central house of the first monastic order, a congregation of several hundred monasteries especially in Gaul; it was the center of monastic reforms in the 10th and 11th centuries 克吕尼 100.1; 101.3 * ; 102.3; 103.1; 105; 115.1; 120.2
- Codex iuris canonici**, Canon law, the body of rules governing the morals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Church, based on papal and synodal documents and edited in different collections since the 11th century 教会法 110.3
- Coelde, Dietrich**, [Koelde], Franciscan preacher from Muenster, + 1515 克尔德 153.1,2
- Coelestinus II**, [Celestine], Pope 1124 切来斯提努斯 106.2,4
- Coelestinus III**, [Celestine], Pope 1191 - 1198, who was confronted with Henry VI 切来斯提努斯 107.8
- Coelestinus IV**, [Celestine], Pope 1241 切来斯提努斯 124.4
- Coelestinus V**, [Celestine], Pope 1294, originally monk Peter, the "angelic Pope", who came under French influence and retired from office after 5 months 切来斯提努斯 125.1,4 * ; 129.3; 137.1,2
- Coelestini - Eremiti**, a congregation of hermits founded in Italy by Coelestinus V 切来斯提努斯隐修士 125.4; 129.3; 151.1
- coelibatus**, [Zoelibat, celibacy], the state of being unmarried, which was required of the clergy in the major orders (bishop, priest, deacon, subdeacon) in the Roman Church and of bishops in the Eastern Church; celibacy was an old tradition but particularly reinforced since the 12th century 独身制度 93.2; 94.2; 102.3 * ; 103.2,5; 104.1,2 * ; 105.1; 158.3 *
- Cola di Rienzo**, [< Nicolaus di Laurentius], Italian demagogue who wanted to restore Roman glory, he made himself tribune " in Rome in 1347 and 1353, but was killed in 1354 科拉·里恩佐 139.6; 155.1

Colombini, Johannes, Bl., + 1367, Italian founder of the Jesuits in Siena 科隆比尼 151.3c

Colonia, [Koeln, Cologne], town in Germany, important center of the Church 科隆 archdiocese 总教区 80.3; Dome 大教堂 133.8; school of painters 画家 154.3c; university 大学 145.1,4b

Colonna, Roman aristocratic family, which had connections to the imperial party; they violently opposed Pope Boniface VIII after 1297 科罗纳 125.3,4; 137.2-4; 138.2; 139.6; 143.1; 157.2

Colonna, Sciarra, member of the Colonna family who helped to imprison Pope Boniface VIII in 1303 科罗纳 137.4; 139.3

Columbanus, [Kolumban], St. Columban, Irish missionary, active around 600 in S Germany and Switzerland, founder of Bobbio 高隆班/科伦巴 79.1; 99.2; 101.2

commenda, [Kommende], concessions of Church property 教会财产转让制度 96.1, 3; 140.2; 151.1

conciliarism, [conciliarism], the doctrine that the supreme authority in the church is embodied in a general or ecumenical council; this thinking was especially influential after the Great Schism (1378-1414) and at the Councils of Constance (1414-1418) and Basel (1431-1439) 大公会议理论

concilium, (synodus), [Konzil, council], ecclesiastical meeting; 1) meeting of bishops with their archbishop or metropolitan ("provincial council"); 2) meeting of a bishop with his diocesan clergy ("diocesan synod"); 3) meeting of all bishops (at least in principle) under the Pope ("ecumenical council") 主教会议

concilium oecumenicum, [ecumenical council], a meeting of all bishops (at least in theory) under the Pope 大公会议

Concordate of Worms = Wormser Konkordat

Concordatum, Concordata, [Konkordat, concordat], an agreement between the Apostolic See and a nation 政教协定

Concordatum de Francia, [Concordate of France], of 1516 (与法国的) 政教协定 157.6

Concordatum Vindobonense, [Wiener Konkordat], of 1448, it regulated the right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Germany until 1803 维也纳政教协定 140.3; 144.4*; 156.3

confessionalia, a kind of special privilege, letter of confession "告解书" 152.2

confirmatio, [Firmung, confirmation], sacrament of the Church 坚振(圣事) 93.2

confraternitates, [Gebetsverbruederungen], popular prayer communities since the 8th century who commemorated the living and deceased members or benefactors of a monastery 祈祷联会 101.1; 152.6

Conradinus, son of Conrad IV, 1252-1268, the last Staufer 康拉丁 124.7*; 125.3

Conradus II, [Konrad], German King 1024-1039 康拉德 88.7; 97.2

Conradus III, [Konrad], rival king under Lothair III, then German King 1138-1152, he was supported by the Church party, but was never crowned emperor 康拉德 106.4; 109.2

Conradus IV, [Konrad], German King 1250-1254, one of the last Staufer kings, opposed by the Popes, he died at the age of 26 康拉德 124.6,7

Conradus, [Konrad], son of Henry IV, +

- 1101 康拉德 105.2
- Conradus**, [Konrad], Duke of Masovia, invited the Teutonic Knights in 1226 康拉德 127.2
- Conradus de Geinhausen**, [Konrad], German professor at Paris, suggested a council to solve the division in the Church (1379, 1380) 康拉德 141.3
- Conradus de Hochstaden**, [Konrad], Archbishop of Cologne, start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amous cathedral in 1248 康拉德 133.8
- Conradus de Constantia**, [Konrad], Bishop of Constance, +975 康拉德 88.3
- Conradus de Marburg**, [Konrad], priest, confessional priest of St. Elisabeth of Thuringia, first inquisitor of Germany since 1227, killed in 1233 because of his rigidity 康拉德 131.2b; 132.3
- Conradus de Megenberg**, [Konrad], German author, canon, +1374 in Regensburg 康拉德 139.2 * ; 158.4
- Conradus de Praga**, [Konrad], Archbishop of Prague, threatened after 1415 康拉德 148.4
- Conradus de Prussia**, [Konrad], Dominican reformer, +1426 康拉德 151.2
- Conradus de Urach**, [Konrad], Cardinal, General abbot of the Cistercians, ca 1220 康拉德 130.1
- Conradus de Waldhausen**, [Konrad], Augustine canon in Bohemia, reformer, + 1369 康拉德 148.1
- Constantia**, Constance, [Konstanz], town in Southern Germany close to the Swiss border 康斯坦茨 diocese 教区 79.1; 158.2; general council 142.2 - 4; 145.4a; 148.3; 151.1; 152.3; 155.1; 158.4; concordate 142.4; 144.4; decrees 142.2; 143.1
- Constantinopolis**, [Konstantinopel, Constantinople, Byzantium], capital of the eastern Roman Empire, closely linked to the Greek Orthodox Church; seat of a patriarch 君士坦丁堡 83.1; 126.2; 144.1; 156.2
- Constantinopolis**, Synods in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举行的主教会议 754 年:92.2; 869/870 年和 879/880 年:93.3,4
- Constantinus** = Cyrillus
- Constantinus**, [Konstantin, Constantine], (illegal) Pope 767 - 768 君士坦丁 85.4
- Constantinus Magnus, Donatio Constantini**, Constantine the Great and the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君士坦丁大帝/康斯坦丁, 他的赠予 85.3 * ; 86.5; 87.4; 103.5; 114.1; 124.6; 145.4c; 152.1; 155.1
- Constantinus V Copronymus**, [Konstantin, Constantine], Emperor of Byzanz 741 - 775, being a ruthless iconoclast he organized a synod in Constantinople in 754 君士坦丁 85.2; 92.2
- Constantinus VI**, [Konstantin, Constantine], Emperor of Byzanz 780 - 802 君士坦丁 92.2
- Constantinus IX**, [Konstantin, Constantine], "Monomachus", Emperor of Byzanz 1042 - 1054, he invited Roman delegates to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 94.3
- Constantinus XI**, [Konstantin, Constantine], Emperor of Byzanz 1448 - 1453, tried to renew unity with the Roman Church 君士坦丁 156.2
- Constantinus Silvanus**, founder of the Pauliciani, ca 650 君士坦丁 91.3
- conversi**, ["converts"]; 1) persons entering a monastery as an adult, in distinction to oblates (oblato), who entered as children; 2) lay brothers living and working in a monastery 皈依者 101.2; 115.2; 116.3

- Corbie**, important Benedictine monastery in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Frankish kingdom 科尔比 81.1; 89.3
- Corbinianus**, [Korbinian], St., missionary in Bavaria, founder of the church in Freising; ca +725 科尔比尼安 79.2
- Cordoba**, town in Spain, center of Arab culture and science after 765 科尔多瓦 84
- Corvey**, [Korvey], close to Hoexter at the Weser, important Benedictine monastery, founded in 822 科尔维 81.1; 89.3
- Cracovia**, [Krakow, Krakau], diocese in Poland, founded before 1000 克拉科夫 82.4; 127.3
- Correggio**, 1494 - 1534, Italian artist 柯勒乔 154.3b
- Crescentii**, members of the Roman Crescentia family who caused unrest in Rome in the years from 973 - 1000 克瑞申蒂 88.6,7
- Croatia**, area at the Adria 克罗地亚 83.2
- Crotus Rubianus**, one of the German authors of the *Dunkelmaennerbriefe* in 1515 儒比阿努斯 155.4
- crucigeri**, [Kreuzfahrer, crusaders], knights and nobles from Western Europe who undertook (eight) military expeditions between 1096 and 1271 to win or hold the Holy Land against the Muslim rulers; the crusaders often sewed the cross on their clothing. 十字军 105.1; 106.5; 109 * ; 126 * ; 138.4
- Cunegundis**, [Kunigunde], St., German Empress, +1040 库尼贡德 88.7
- Cunibertus**, [Kunibert], St. bishop of Cologne, +663 库尼贝图斯 80.17
- Curia Romana**, [Kurie, Roman Curia], the central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 of the Roman Church, the legal and 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system under the Pope which developed in the Middle Ages, especially since the 12th century 教廷/罗马教廷 110.1,2d
- Cyrillus**, [Kyrillos, Kyrill], St. Cyril, 827 - 869, Greek missionary in central Europe, inventor of an early form of the Cyrillic alphabet 济利禄/区利罗/基利洛斯 83.2
- Dagobertus I**, [Dagobert], Frankish king 629 - 639 达格贝特 80.1
- d' Ailly** = Ailly
- Damasus II**, Pope in 1048 for 23 days, originally Bishop Poppo of Brixen 达马苏斯 103.1
- Damiani** = Petrus Damiani
- Dankbrand**, missionary in Iceland 997 - 999 但克布兰得 81.3
- Dante Alighieri**, 1265 - 1321, Italian scholar, political theorist who supported imperial influence in Italy, poet, author of the *Divina Commedia* 但丁 135.1,5; 136.2 * ; 137.4; 138.2; 139.2; 155.1
- David de Augsburg**, Franciscan preacher, + 1272 达味/大卫 133.3
- David de Dinant**, Aristotelian teacher in Paris with pantheist tendencies, sentenced in 1210, died after 1215 达味/大卫 131.2a
- decanatus**, administrative unit of ten parishes 十堂区/总堂区 95.1
- decretum**, [Dekret, decretal], a papal letter or an excerpt from one which rules on a point of Canon Law 宗座文件
- decuma**, [Zehnte, tithe], the tenth par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given to the Church 什一税 96.1 * ; 140.1; 142.4; 158.5
- Denis**, St., city in NW France 圣迪那 85.2
- Denmark**, mission activities in 丹麦 80.1; 81.2

- Desiderius de Tuscia**, King of the Langobards 757 - 774 德西得留斯 85.4; 86.3
- Deusdedit**, Cardinal, author of a collection of canon law, + ca 1097 德乌斯德迪特 110.3
- Deutsche Theologie**, book on spirituality, ca 1400, by an unknown author《德国神学》 146.3
- Deventer, School in**, Christian school in the Netherlands, famous for a kind of Christian humanism in the 15th century 德文特尔 151.3a; 155.2
- Devotio moderna**, [Neue Froemigkeit, New Piety], movement in the Netherlands in the 14th century 新灵修 146.5; 148.1; 151.3a *
- diaconus**, [Diakon, deacon], clergyman holding the holy order just below the priesthood; the word is derived from the Greek diakonia = service 执事
- dialectica**, logic as an instrument to explain the faith, employed much in the scholastic method since Abelard 逻辑学, 辩论派 89.6 *; 90.6; 121.1
- Dictatus Papae**, document by Gregory VII issued in 1075, containing the specific demands concerning the relation of spiritual and secular power and of ecclesiastical freedom from lay control《教宗敕令》104.2; 110.1
- Didacus (Diego) de Osma**, Bishop who helped St. Dominic to found a mission station in 1207 迪达克 130.1
- Dietrich de Freiberg**, [Theodoricus de Vriberg], German Dominican, mystic, ca 1260 - 1320 迪特瑞克 146.2
- Dietrich de Niem**, [Theodoricus de Nieheim], 1340 - 1418, German theologian, who served at the Curia in Rome, exponent of conciliarism 迪特瑞克 142.1
- diocesis**, [Dioezese, diocese], an ecclesiastical division of territory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a bishop; in the 14th century the Western Church had ca. 500 dioceses 教区
- diocesis**, synodus, diocesan synod 教区会议 95.3
- Dionysius Areopagita** = Pseudo - Dionysius
- Dionysius de Ryckel**, Belgian Carthusian, mystic, + 1471, called "doctor ecstastic" 狄奥尼修斯 145.4b,5; 146.5
- Dnepr**, river in Ukraina, Russia 第聂伯河 83.4
- Doctor angelicus** = Thomas Aquinas
- Doctor authenticus** = Gregorius de Rimini
- Doctor catholicus** = Biel
- Doctor christianissimus** = Gerson
- Doctor communis** = Thomas Aquinas
- Doctor ecstasticus** = Dionysius de Ryckel
- Doctor fundatissimus** = Aegidius Romanus
- Doctor invincibilis** = Occam
- Doctor irrefragabilis** = Alexander de Hales
- Doctor mellifluus** = Bernardus Claravallensis
- Doctor modernus** = Durandus de St. Pourcain
- Doctor planus et utilis** = Nicolaus de Lyra
- Doctor profundus** = Bradwardin
- Doctor subtilis** = Duns Scotus
- Doctor universalis** = Albertus Magnus, Alanus de Lille
- Dolcino, Fra**, Italian heretic, + 1307 多基诺 131.2e
- Dominicani**, [Ordo Fratrum Praedicatorum, OP], a congregation founded by St. Dominic in 1216 mainly for preaching the gospel and orthodox faith in order to save people from the influence of heresies 道明会/多明我会 130.1 *; 132.3; 133.7; 134.2; 135.2; 151.2

- Dominicus**, [Dominikus], 1170 - 1221, St. Dominic, born in Castilia (Spain), founder of the Dominicans 圣道明/多明我 130.1
- Dominicus Gundissalinus** = Gundissalinus
- Don**, river in Russia 顿河 83.2
- Donatello**, 1386 - 1466, Italian artist 多那太罗 154.2
- Donatio Constantini** 见 Constantinus Magnus
- Dorothea de Montau**, Bl., Patroness of Prussia, + 1394 多若德亚 146.4
- Dshem**, Turkish prince, + 1495 得升 157.1
- Dualismus**, [dualism], the view that the universe is drawn into a struggle between a good and an evil power; groups holding dualistic views included the Cathars (Albigenses) 二元论
- Duerer, Albrecht**, 1471 - 1528, German painter who chose religious motives; hoping for church reforms he sympathized with Luther 丢勒 154.3c
- Dungal**, Irish monk in St. Denis, ca 825, opponent of iconoclasm 顿伽勒 92.5
- Duns Scotus**, [Johannes Duns Scottus], Bl., Franciscan scholar, 1265 - 1308, "doctor subtilis", exponent of a kind of Augustinian voluntarism 邓斯·司各脱 119.5; 145.2 * ,4b
- Dunstan**, St. 908 - 988,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since 959, successful reformer of the Church 邓斯坦 102.3
- Durandus de St. Pourcain**, Dominican theologian, bishop, + 1334 迪朗都斯 145.4a
- Durandus**, Wilhelm, Bishop of Mende, + 1296, author of a compendium on liturgy 迪朗都斯 98.1
- Durer** = Duerer
- Eadmer**, [Edimer], 1055 - 1124, monk in Canterbury, author 埃德梅尔 89.6
- Ebbo / Ebo**, Archbishop of Reims, organizer of the mission in Denmark after being named papal legate for the North in 822 厄博 81.2; 87.1
- Eberhard im Bart**, Count of Wuerttemberg, + 1496, promoted monastic reforms 艾伯哈德 145.4a; 151.2,3a
- Eberhardus**, Archbishop of Salisbury, opposed the antipope of Frederick I in 1160 艾伯哈德 107.3
- Ebner, Margarete**, Dominican sister, mystic, + 1351 厄布内尔 146.4
- Ebro**, river in Spain 厄布罗河 84
- ecclesia propria**, [Eigenkirche, private church, proprietary church], a church owned by a landlord or a monastery; in the Middle Ages many rural churches were founded by the owner of the land and remained under the control of his family, especially in Germany 私有教堂 96.3 * ; 97.2; 101.1,2; 104.3
- Echternach**, monastery West of Trier, founded by Willibrordus ca 700 厄克特纳克 80.1
- Eckhart, Meister**, [Ekehart], German Dominican, 1260 - 1327, most important exponent of German mystical speculation; his works were sometimes misinterpreted from a pantheistic point of view 艾克哈特 145.4c; 146.2 * ,3-5
- ecumenical council** = concilium oecumenicum
- Edmundus**, Prince of England, he was offered the crown of Sicilia in 1253 埃德蒙 124.7
- Eduardus I**, [Edward], King of England 1272 - 1307, who did not respond to the prohibitions of Boniface VIII about taxing clergymen 爱德华 137.2
- Eduardus III**, [Edward], King of England, ca

- 1327 - 1377, stopped to pay taxes to Rome
爱德华 145.4b; 147.1
- Eginhardus**, [Einhard], ca 770 - 840, Abbot
of Seligenstadt; scholar, architect,
biographer of Charlemagne 艾因哈德 81.1;
86.2,5; 89.3; 98.6
- Eichstaett**, diocese in Germany 艾希施泰特
80.3
- Eigenkirche** = ecclesia propria
- Einhard** = Eginhardus
- Einsiedeln**, important Benedictine monastery in
Switzerland 艾恩西得尔恩 82.6
- Ekbertus de Schoenau**, brother of St. Elisabeth
de Schoenau, abbot; editor of her visions,
ca 1160 艾克伯特 122.4
- Ekkehard I**, monk in St. Gallen, poet, + 973
艾克哈德 89.5
- Ekkehard II**, monk in St. Gallen, poet, + 990
艾克哈德 89.5
- Ekkehard IV**, monk in St. Gallen, historian,
+ 1060 艾克哈德 89.6
- Elias de Cortona**, Italian friar, first Franciscan
general superior since 1221 厄里亚斯 129.2,3
- Eligius**, St., Bishop of Noyon - Tournay, +
660 厄利基乌斯 80.2
- Elipandus**, Archbishop of Toledo ca 720 - 800
埃利班多斯 90.3
- Elisabeth**, [Elsbeth], Bl. Elisabeth of Reute,
German visionary, + 1420 伊丽沙白/依撒
伯尔 146.4
- Elisabeth de Schoenau**, Abbess at Schoenau,
mystic, + 1164 伊丽沙白/依撒伯尔 122.4
- Elisabeth de Thuringia**, St., + 1231,
daughter of King Andrew II of Hungary, wife
of Louis of Thuringia, she selflessly helped
the poor and became a popular saint 伊丽沙
白/依撒伯尔 126.3; 128.2 *; 131.2b;
133.8
- Elsass** = Alsatia
- Emmeram**, [Heimrham], + 715, St.,
itinerary Bishop of Poitiers, founded a
monastery in Regensburg 圣艾梅兰 79.2
- Emmeram**, St., monastery in Regensburg,
Bavaria 圣艾梅兰隐修院 89.6
- Engelbert**, scholar in Admont, author of a work
on the Roman Empire, 1308 恩格伯特
139.2
- Engelbert de Colonia**, Archbishop in Cologne,
guardian and vice - regent of Germany 1220
- 1225 恩格尔伯特 124.1
- England**, received missionaries sent by Gregory
the Great in 597; Archbishop Theodore of
Canterbury (669 - 690) fostered theological
education, and England became one of the
leading centers of scholarship in the Middle
Ages 英国 89.2; 105.3; 107.5; 123.4;
140.3
- Enzio**, son of Frederick II, made King of
Sardinia in 1238 恩西欧 124.4
- epiclesis**, [Epiklese], invocation of the Holy
Spirit at Mass 弥撒中的祷词 144.1
- episcopus**, [Bischof, bishop], a consecrated
church officer, usually the head of a diocese
with spiritual authority over the other clergy
and laity in that diocese. According to
tradition, a bishop is a successor to the
apostles. The election, nomination,
investiture of a bishop or the right of approval
were an important issue in negotiations
between secular and religious power. 主教(的
选择、提名、任命权) 97.2; 112.1; 144.4
- Epistolae obscurorum virorum**,
[Dunkelmaennerbriefe], satirical letters
written in 1515《无名人士书信集》155.4
- Erasmus, Desiderius**, [Roterodamus], 1466
- 1536, Dutch humanist scholar who

- promoted Latin and Greek studies, editor of a Greek New Testament (1517) and of patristic literature, he supported church reforms but was later opposed to Luther 伊拉斯谟/埃拉斯莫 145.5; 153.2; 155.2 * ,3; 157.5
- Erfurt**, German town and diocese, the university became a center of humanist studies 爱尔福特 80.3; 155.2
- Eric IX**, [Erik, Erich], St., King of Sweden, propagated Christianity in Sweden, then in Finland in 1156 - 1157 埃里克 108.4
- Eriugena** = Johannes Scotus Eriugena
- Ermanrich**, Bishop of Passau, sent to Bulgaria in 866 艾曼利克 83.3
- Eskil de Lund**, Archbishop in Denmark, captured in Burgundy in 1157 艾斯克 107.2; 108.4
- Este** = Alphonsus d' Este
- Estonia**, [Estland], mission activities in the 12th century 爱沙尼亚 108.4
- Etherius de Osma**, Bishop in Asturia, opposed adoptianism ca 780 厄特瑞乌斯 90.3
- Eudon de Stella**, [Eon], heretic from Brittany, sentenced in 1148 欧登 113.3
- Eugenicus**, [Eugenikos], Archbishop of Ephesus, opposed the "Filioque" at the Council of Ferrara - Florence 1439 尤金尼库斯 144.1
- Eugenius II**, Pope 824 - 827 尤金尼乌斯 87
- Eugenius III**, Pope 1145 - 1153, Cistercian, student of St. Bernhard, had to reside outside of Rome due to the activities of Arnold of Brescia 尤金尼乌斯 106.5 * ; 109.2
- Eugenius IV**, Pope 1431 - 1447, orig. Gabriel Condulmer, recognized the Council of Basel in 1433, but moved the synod to Ferrara in 1437 尤金尼乌斯 142.4; 143.1 * ; 144.1; 145.4c; 151.1; 155
- Eulogius**, Archbishop of Cordoba, martyred in 859 欧罗格乌斯 84.2
- Eustathius**,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1019 - 1025 优斯塔提乌斯 94.2
- Euthymius Zigabenus**, + 1118, monk and author in Constantinople 优提米乌斯 91.2
- Ewald**, St., Anglo - Saxon missionary, martyred ca 820 (?) 厄瓦德 81.1
- Exarchatus Ravenna**, [exarchate], also called "Romagna", area in Northern Italy where the Greek governor resided; Ravenna was occupied by the Lombards in 751, then in 754 by Pippin who made it a donation to the Holy See, which was reconfirmed by Charlemagne in 774; throughout the Middle Ages the Romagna was considered part of the Papal lands 拉文纳教省 85.2; 86.3; 125.2
- excommunicatio**, [excommunication], the formal suspension or expulsion of a person from the communion of the Church; in the Middle Ages excommunication had serious social and legal consequences, especially for a king, since his subjects were no longer bound to obey him 绝罚 99.4 * ; 143.2; 158.5
- exemptio**, [Exemption, exemption], the immunity from local (diocesan) authority or special privileges of a monastery; exempted monasteries were directly affiliated to Rome 豁免权 101.2,3; 142.4; 158.5
- Exeter**, town in England, monastery where Winfried - Bonifatius was educated (ca 700) 埃克塞特 80.2
- exspectantiae**, [Exspektanzen], payment for candidacy for an ecclesiastical office 候选金

- 110.2g; 140.2; 158.4
- Eyck, Hubert van**, Dutch painter, + 1436, brother, of Jan van Eyck, + 1440 爱克 154.3c
- fasting** = ieiunium
- Felix V**, originally Amadeus VIII of Savoy, antipope 1439 - 1449 with dwindling support 菲理克斯 144.3,4
- Felix de Urgelis**, Bishop in Spain, supporter of Archbishop Elipandus in 780 菲理克斯 90.3
- Felix de Valoi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Trinitarians, + 1212 菲理克斯 117.3a
- Feltre, Vittorino da**, Italian humanist scholar, educator, + 1446 菲尔特 155.1
- Ferdinandus II**, [Ferdinand], King of Aragonia, married Isabella of Castilia (1479), expelled Muslims from Grenada in 1492 斐迪南 109.5; 150.3; 158.6
- Ferdinandus III**, [Ferdinand the Saint], King of Castilia 1217 - 1252, who conquered Cordoba and Sevilla, restored Christian rule; he was the founder of the University of Salamanca 斐迪南 109.5
- Ferdinandus I**, [Ferdinand Ferrante], King of Naples, fought against his uncle Pope Sixtus IV in 1482 斐迪南 157.1
- Ferrara**, town in NE Italy, ecumenical council of Ferrara - Florence 1438 - 1442 费拉拉 143.2; 144.1* ; 155.1
- Ferrer, Vincentius**, St., ca 1350 - 1419, Spanish Dominican, influential preacher, who supported Benedict XIII for a long time 味增爵·菲雷 141.2; 142.3; 150.2; 152.3; 153.1
- festum ecclesiae**, [Festtage, feast days], some feastdays were a local custom and became feasts of the whole Church, when approved by Papal decision 教会节日 100; 119.6; 133.4; 152.4
- Festum Corpus Christi**, [Fronleichnam] the feast celebrating the Holy Body of Christ, it began as a local tradition and was made a universal feast in 1264 by Urban IV 耶稣圣体节 133.4
- Festum fatuorum**, [Narrenfest; festival of fools], celebrated on the first of January 愚人节 119.6
- Festum orthodoxiae**, [Fest der Orthodoxie], introduced after 843 when the iconoclasm movement was over 正统信仰的节日 92.4
- Festum Sanctissimae Trinitatis**, [Dreifaltigkeitsfest, Feast of the Holy Trinity], proclaimed in 1334 as feast of the universal Church 圣三节 152.4
- Ficino, Marsilio**, Italian humanist scholar, + 1499, director of the Plato - Academy in Florence 菲奇诺 155.1
- Fiesole, Giovanni da** = Fra Angelico
- Filelfo, Francesco**, Italian scholar who went to the East to learn Greek, ca 1400 菲雷夫 155.1
- Filioque**, ["and from the Son"] a formula in the creed claiming that the Holy Spirit proceeds from the Father "and from the Son", opposed by the Eastern Church, but accepted at the Council of Ferrara/ Florence of 1439 "及由圣子"/"由圣子" 90.2; 93.2; 94.3; 125.1,3; 144.1
- Finlandia**, [Finland], mission work started from Sweden 芬兰 108.4
- Flagella, Flagellantes**, rigid groups of reformers who used whips to beat themselves as a sign of penitence, especially after the outbreak of epidemic diseases in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ies; a Papal bull of 1349 tried to

- suppress them 鞭笞运动, 鞭笞己身派 101.4; 131.1; 150.2; 152.3
- Flandria**, [Flanders], part of Belgium 佛兰德(比利时)98.5
- Floδοartus**, +966, historian in Reims 弗罗多特 89.5
- Florentia**, [Florenz, Florence; It: Firenze], important city in Italy, center of humanist learning since the 14th ct; Ecumenical Council of Ferrara / Florence, see Ferrara 佛罗伦萨 139.6; 155.1; 157.1
- Florus de Lyon**, writer, author of a *Martyrology*, before 848 佛罗鲁斯 100.3
- Flotte, Petrus**, French official who wrote an anti-papal Pseudo-bull in 1302 佛洛特 137.3
- Folmar**, Archbishop of Trier 1186, ordained against the will of the emperor 佛尔马尔 107.6,7
- Fontevrault**, [Fons Ebraldi], Congregation of Fontevrault, founded in 1100 by Robert of Arbrissel, dissolved in the tim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冯特沃 116.2b
- Formosus**, Bishop of Porto, Pope 891 - 896, condemned in a postmortal trial 福尔摩苏斯 83.3; 87.6 *
- Francis I**, [Franz], King of France 1515 - 1547; signed a concordate in 1516 法兰西斯 157.6
- Francisca Romana**, St., Italian noble lady, + 1440, co-founder of the Oblates of Rome in 1433 方济加 151.3b
- Franciscani**, [Ordo Fratrum Minorum, OFM; Minoriten, minorites], congregation founded by St. Francis, confirmed by Pope Innocens in 1209, it spread fast across Europe, but due to the controversy about poverty soon split into spirituals and conventuals 方济各会 129 *; 131.1; 134.2; 135; 151.1,2; Franciscan school of thought 方济各思想学派 135.2ad; 145.2
- Franciscus**, [It: Francesco, Engl: Francis, Germ: Franz], St. Francis of Assisi, 1181 - 1226, Italian monk with a new approach to religious life, famous and popular for his spirit of poverty and humility, his charitable attitude to the poor and to nature; founder of the Franciscans; canonized in 1228 方济各/法兰西斯/弗朗西斯 114.1; 127.5; 128.2; 129 *; 130.1
- Franciscus de Paula**, St., Italian founder of the Fratres minimi in Calabria (1460) 方济各/法兰西斯 151.3e
- Franciscus de Retz**, Austrian Dominican, + 1427, preacher, professor, reformer 方济各/法兰西斯 151.2
- Frankfurt**, town in Germany; synod of Frankfurt of 794 法兰克福 90.3; 92.3,5
- Franko de Colonia**, German musician, originator of mensural and figural notation theory, ca 1200 - 1250 法兰克 98.5
- Fratricelli**, sect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influenced by Joachim's thought 弗拉提切利 151.1
- Fratres Apostolici** = Apostolici
- Fratres de Ponte**, [Brueckenbrueder], lay association with the aim to build bridges, mainly in S France; religious order since 1187, they disappeared in the 15th ct 修桥弟兄会 117.3c
- Fratres devoti** = Fratres vitae communis
- Fratres militiae Christi**, [Schwertbrueder], order of knights, founded in 1202 by Bishop Albert in Riga, they merged with the Teutonic Knights in 1237 基督士兵弟兄会 127.2; 151.1
- Fratres Minimi**, mendicant order with strict

- Franciscan rule, founded by Francis de Paula in Calabria in 1460 最小的弟兄会 151.3e
- Fratres vitae communis**, [Fratres devoti, Fraterherren, Brothers of Common Life], community devoted to education and prayer, organized by Groote after 1374 共同生活弟兄会 145.4a; 146.4; 149.1,3; 151.3a * ; 155.2
- Fredericus I Barbarossa**, [Friedrich, Frederick] German King 1152 - 1190, Staufer, crowned Emperor in Rome in 1155, went to Italy 5 times, tried to control N Italy and the Church, he was reconciled to Pope Alexander in 1177, died on a crusade in Asia Minor 红胡子腓特烈 106.2,5; 107 * ; 109.3; 110.2c; 114.3
- Fredericus II**, [Friedrich, Frederick], German King and Emperor 1215 - 1250, son of the Staufer Henry VI, educated in Apulia (Italy), under the guardianship of Innocens III, crowned Emperor in 1220; he founded of the University of Naples in 1224, went on crusade in 1228, but tried to control Italy and came in conflict with the Popes; he was banned 1227 - 1230 and 1239, 1245 腓特烈 97.1; 102.1; 118.4; 123.2,3; 124 * ; 125.1; 136.1,3 * ; 127.2; 129.3; 132.2; 134.1; 136.3
- Fredericus III**, [Friedrich, Frederick], Frederick of Hapsburg, German King and Emperor 1440 - 1493, accepted Pope Eugen in 1445, signed the Concordate of Vienna in 1448; he was the last German Emperor crowned in Rome (1452) 腓特烈 144.3,4; 148.6; 156.1,4
- Fredericus III**, [Friedrich, Frederick], King of Aragon and Sicilia 1296 - 1337, son of Peter III of Aragon 腓特烈 137.2,4
- Fredericus de Lothringia**, (= Pope Stephanus IX) 腓特烈 94.3; 103.2
- Fredericus de Austria**, [Friedrich der Schoene], candidate to become German King in 1314 腓特烈 139.1 - 3
- Fredericus de Saxonia**, [Friedrich der Weise], Kurfuerst of Sachsen, ca 1520, bought many relics for the church of Wittenberg; 腓特烈 158.2
- Fredericus**, [Friedrich, Frederick], Duke of Suabia who joined a crusade in 1190 腓特烈 109.3; 118.4
- Freising**, town in Southern Germany, Bavaria, diocese 弗赖辛 83.2
- Fridauer, Bartholomaeus**, Swiss spiritual author, ca 1400 弗瑞刀尔 146.4
- Frisia**, Frisii, Frisia, Frisian people in N Germany 弗里西亚/弗里斯兰, 弗里斯兰人 80; 131.2
- Fritzlar**, place in Germany, monastery founded by Boniface, ca 725 弗利茨拉尔 80.2
- Fulbertus**, [Fulbert], Bishop of Chartres, eminent scholar, +1029 夫尔贝特 89.6
- Fulda**, German town, important Benedictine monastery, founded by Boniface in 744 富尔达 80.2; 89.3; 101.2; 103.2
- Gaetani, Benedictus** = Bonifatius VIII
- Gallen, St.**, monastery in Switzerland, founded by St. Gallus, one of the leading centers of culture and scholarship in the time of the "Ottonian Renaissance", ca 900 - 1000 圣伽伦隐修院 84.1; 89.3,5,6; 98.5; 151.1
- Gallia, Gallicanism**, [Gaul, Gallicanism], special privileges and rights of the French king over the Church in France like nomination of bishops 高卢主义 140.3;

- 141.4; 144.2
- Gallus**, St. companion of Columbanus, missionary in Switzerland ca 612 - 645, founder of the monastery St. Gallen 圣加卢斯/圣伽伦 79.1
- Gallus, Thomas**, mystical writer in Paris, later abbot in Vercelli, +1246 加卢斯 122.3
- Gandulphus de Bolonia**, Italian author of a dogmatic and canonical collection of sentences, ca 1160 甘都尔夫斯 121.6
- Gansfort, Wessel**, + 1489, Christian lay reformer from Groeningen, teacher at Heidelberg and Paris; humanist and nominalist with some similarities to Luther 甘斯福特 149.3
- Gaudentius**, + 613, the first bishop of Constance 高登提乌斯 79.1
- Gaunilo**, monk of Marmoutier, who argued with Anselmus, ca 1100 高尼罗 121.3
- Gauzbert**, relative of Archbishop Ebo of Rhemi, missionary bishop in Sweden from 832 - 845 高斯贝特 81.3
- Gebhardus**, Bishop of Constance, + 995 格布哈德 88.3
- Gebhardus**, Bishop of Constance 1084 - 1110 格布哈德 115.2
- Geiler, Johann**, famous preacher in Strasbourg, + 1510 盖勒尔 153.1
- Geisa**, Duke of Hungary 972 - 997 格萨 82.6
- Geismar**, place in German, where Bonifatius felled the oak of Donar, symbol of pagan superstition, in 724 格斯马尔 80.2
- Gelasius I**, Pope 492 - 496, he sent a letter about the division of spiritual and secular powers to Emperor Anastasius in 494 葛拉西乌斯 111.1
- Gelasius II**, Pope, 1118 - 1119, who banned Henry V and died in Cluny 葛拉西乌斯 105.5
- Gemisthos Plethon** = Plethon
- Gennadius**, monk, opponent of Church unity, made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after 1453 格纳丢斯 156.2
- Gerardus de Borgo S. Donnino**, [Gerard], Franciscan, supporter of the ideas of Joachim de Fiore, sentenced in 1255 格拉德 131.1
- Gerardus**, [Gerard], Superior of the Hospitallers ca 1090 - 1120 格拉德 118.2
- Gerbert de Aurillac** = Silvester II
- Gerhoh de Reichersberg**, Provost in Reichersberg (Austria), writer, opposed violence against heretics, + 1169 格尔霍 114.3; 117.1
- Germanus**,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deposed in 730 for his defense of sacred images 格尔曼努斯 92.1,2
- Gerson, Johannes**, [Jean Charlier de Gerson], French theologian, 1363 - 1429, "doctor Christianissimus", influenced the Council of Constance; wrote several hundred books 杰尔松 141.4; 142.2; 145.4a *; 146.5; 151.3d; 152.3,4; 153.2
- Gertrudis Magna**, [Gertrude; Gertrud the Great], Cistercian sister in Helfta (Germany), famous for her mystical theology, + 1302 格尔特儒德 133.5
- Gewilib**, Archbishop of Mainz, deposed in 747 格维里布 80.3
- Ghibellini**, [Waiblinge], pro - imperial faction, opposed to the Guelphi; they supported a certain influence of the German Emperor in Italy 吉伯林派 111.3; 124.7; 137.2
- Ghiberti, Lorenzo**, Italian artist, + 1455 吉贝尔蒂 154.2

- Gibraltar**, street of Gibraltar, between Spain and Africa 直布罗陀 84
- Gilbertus**, [Gilbert of Sempringham], St., English founder of Gilbertines ca 1140 格尔贝特 117.2
- Gilbertus de la Porree**, [Gilbert], French scholar, + 1154, teacher at Chartres and Paris, 1142 Bishop of Poitiers, controversial for his teaching on the Trinity 格尔贝特 119.1; 121.5 *
- Gilbertus de Tournai**, [Gilbert], author of a critical document demanding Church reforms in 1270 格尔贝特 136.3
- Giotto di Bondone**, Italian painter, 1267 - 1337 乔托 154.3
- glass - paintings**, in Churches 玻璃画 133.9; 154.3c
- Gnesnia**, [Gniezno, Gnesen], first Polish archdiocese, established in 1000 格涅兹诺 82.4
- Godehard**, Bishop of Hildesheim, + 1038 格德哈德 88.3; 89.6
- Godinus**, French magister, heretic, executed in 1212 in Amiens 格迪努斯 131.2a
- Gorze**, monastery in Germany 格尔泽 101.3
- Gothica Ars**, [gotische Kunst, Gothic art], especially Gothic architecture 哥特艺术风格 120.2; 133.8; 154
- Gottesfreunde**, Friends of God, spiritual movement in Germany in the 14th and 15th century 上主之朋友运动 146
- Gottesfrieden** = Treuga Dei
- Gottfridus de Bouillon**, [Geoffrey], Count of Lorraine who led crusaders in 1096 戈特夫里德 109.1
- Gottfridus de Fontaines**, [Geoffrey], Parisian theologian, + 1306 戈特夫里德 136.3
- Gottfridus de Lothringia / Tuscia**, [Geoffrey], Count of Lorraine and of Tuscia, ca 1050 - 1060 戈特夫里德 103.4, 6
- Gottschalk**, Christian leader of the Wendes, ca 1050 - 1080 格特沙尔克 82.5; 108.2
- Gottschalk**, ca 804 - 869, Benedictine monk, poet, the first Saxon theologian, exponent of strict predestination 格特沙尔克/戈特沙克/哥特沙耳克 81.1; 89.4; 90.4
- Gran**, archdiocese in Hungary, established ca 1010 格兰 82.6
- Grandmont**, congregation founded in Limoges area by St. Stephen of Thiers in 1076, disappeare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格兰德蒙 116.2a
- Gratianus**, canonist of the 12th century, author of an important early collection of Canon Law (*Decretum Gratiani*, ca 1140), therefore called "Father of Canon Law" 格拉提安 96.3; 110.3; 119.1
- Greenland**, mission area around 1000 格林兰 81.3
- Gregorius I Magnus**, St. Gregory the Great, Pope 590 - 604, important organizer of the church in Rome, author, supporter of the monastic movement; he sent the first missionaries to Britain 大额我略/贵格利/格列高利 89.3; 119.5; 152.1
- Gregorius II**, Pope 715 - 731, he warned the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not to promote iconoclasm 额我略/贵格利 79.2; 80.2; 85.1; 92.1
- Gregorius III**, Pope 731 - 741, he approached Karl Martell in 739 for protection against the Langobards 额我略/贵格利 80.2; 85.1; 92.1
- Gregorius IV**, Pope 827 - 844, he was invited by King Lothair in 833 to come to Germany

- to decide quarrels in the royal family 额我略/贵格利 81.2; 87.2
- Gregorius V**, Pope 996 – 999, originally Bruno of Carinthia and grand – grandson of Otto the Great, he crowned Otto III in 996 额我略/贵格利 88.6,7
- Gregorius VI**, Antipope 1012 额我略/贵格利 88.6,7
- Gregorius VII**, Pope 1073 – 85, originally monk Hildebrand, papal legate and active in the Curia since Leo IX (1049 – 54); he was an ardent Church reformer, opposed lay investiture and fought for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Church, deposed Emperor Henry IV in 1076 but absolved him in Jan 1077 at Canossa. His *Dictatus Papae* claims the supremacy of the Pope also in secular matters. 额我略/贵格利七世 90.6; 98.1; 100.2; 103.2,4,5; 104 * ; 105.4; 109.1; 110.1,2; 111 * ; 115.2; 116.1; 117.1; 123.1,3; 137.1,3
- Gregorius VIII**, Pope 1187, whose pontificate lasted only 8 weeks 额我略/贵格利 107.6, 7; 109.3
- Gregorius VIII**, Antipope Burdinus 1118 – 1121 额我略/贵格利 105.5,6
- Gregorius IX**, Pope 1227 – 1241, originally Ugolino de Ostia, canonist (*Decretales Gregorii*), supporter of the Franciscans; banned Frederick II in 1227 and in 1239, faced severe pressure from the emperor 额我略/贵格利 110.2e,3; 111.2,3; 117.3d; 124.3,4 * ,6; 126.3; 127.2; 129.2,3; 130.1,4; 131.2bc; 132.3; 134.1
- Gregorius X**, St., Pope 1271 – 1276, originally Theobaldo Visconti from Piacenza; he worked for the reun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hurch at the ecumenical council at Lyon in 1274 额我略/贵格利 119.2; 125.1 * ; 126.4.5; 128.2; 135.2d,3f; 136.3
- Gregorius XI**, Pope 1370 – 1378, the last French Pope, he responded to Catharina of Siena's appeals and returned from Avignon to Rome, taking quarters in the Vatican (instead of the Lateran) 额我略/贵格利 139.6 * ; 141.1; 147.2
- Gregorius XII**, Pope 1406 – 1415, originally Angelo Corrarior, he wanted first to achieve Church unity but did not retire from office after the election of Alexander V at Pisa in 1409 额我略/贵格利 141.4 * ; 142.1,3; 148.2
- Gregorius Asbesta**, Archbishop of Syracuse, banned by Ignatius, he ordained Photius in 858 额我略/贵格利 93.1
- Gregorius Franke**, missionary, co – worker of Bonifatius 额我略/贵格利 80.2
- Gregorius Palamas**, [Gr: Gregorios], 1296 – 1359, main exponent of Hesychasm, 额我略/贵格利 91.2
- Gregorius de Rimini**, Italian Augustinian, theologian, + 1358, “doctor authenticus” 额我略/贵格利 145.4a
- Gregorius**, count of Tusculum, who supported Pope Benedict X in 1058 额我略/贵格利 103.5
- Groote, Gerhardus**, founder of the Brothers of common life, 1340 – 1384, first preacher in Utrecht 格劳特 146.5; 151.3a * ; 153.1
- Grosseteste, Robertus**, [Grosso Capitis, Greathead], Franciscan scholar at Oxford, 1175 – 1253, Bishop of Lincoln 1235 – 1253 格劳斯泰特 135.3a * de; 136.3
- Grottaferrata**, famous monastery in Italy, founded in ca 1000 格若塔费拉塔 101.4
- Gruenewald, Matthias**, German painter,

- famous for images of cross and resurrection,
+ 1528 格吕内瓦尔德 154.3c
- Gualbertus, Johannes** = Johannes Gualbertus
- Guarino de Verona**, humanist scholar who went
to Constantinople to learn Greek, ca 1400
挂瑞诺 155.1
- Guelphi et Ghibellini**, [= *Welfen und Waiblinge*], two opposed factions, the
Bavarian Welfs (= *Guelphi*) and the
Waiblinge (= *Ghibellini*), one papalist,
the other demanding equality between Pope
and emperor or a certain political influence
of the emperor in (northern) Italy 归尔甫派
和吉伯林派 124.6
- Guido de Spoleto**, [= *Wido*], Emperor 891 -
894 古多/维多 87.6
- Guido de Lusigna**, crusader, King of Jerusalem
1186 - 1194 古多 109.2
- Guido de Arezzo**, musician, famous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notation, ca +1050 古多 98.
5
- Guido de Milano**, Archbishop of Milan,
accepted papal demands in 1059 古多 103.6
- Guido de Montpellier**, founder of the
Hospitalers of the Holy Spirit in 1180 古多
117.3b
- Guido de Vienne** (= *Calixtus II*, 1119 -
1124), Archbishop of Vienne 古多 105.5,6
- Guigo**, Carthusian Prior, author of the
Carthusian Rule, +1137 古依格 116.1
- Guilelmus** = *Wilhelmus*
- Gundissalinus, Dominicus**, [*Gundisalvi*];
archdeacon in Segovia, translator of Arab
Aristotelian works, 12th century 多米尼库
斯 135.1
- Gunther**, Archbishop of Cologne ca 860 巩特尔
87.3
- Guenther**, hermit, + 1045; missionary in
Bohemia 翁特尔 82.3
- Guenther de Schwarzenburg**, count of
Thuringia, royal candidate in 1348 巩特尔
139.5
- Habsburg**, House of Hapsburg / Habsburg,
Austrian royal (imperial) dynasty in power
from 1278 to 1919; many of the Habsburg
kings were chosen to be Emperors of the
Holy Roman Empire 哈布斯堡王朝
- Hadrianus I**, Pope 772 - 795, from Roman
nobility; facing pressure from the
Langobards he turned to the Frankish king
and received Charlemagne in Rome in 774
哈德良 86.3 * ; 90.3; 92.2,3; 98.1
- Hadrianus II**, Pope 867 - 872, who banned
Photius 哈德良 83.2; 93.3
- Hadrianus III**, Pope 884 - 885 哈德良 87.6
- Hadrianus IV**, Pope 1154 - 1159, the only
Pope from England, originally Nicolaus
Breakspear; he crowned Frederick
Barbarossa in 1155 but faced increasing
pressure from Frederick 哈德良 107.1,2
*,5
- Hadrianus V**, Pope 1276 哈德良 125.2
- Hadrianus**, Abbot, sent to Britain ca 670 哈德
良 98.2
- haereticus**, [*Haeretiker, heretic*], a person
who obstinately holds to a view that is
contrary to one or more of the fundamental
beliefs of the Church; the obstinate holding to
the error when instructed by a properly
constituted authority was punished severely 持
异端者
- hagiographia**, [*Hagiographie, hagiography*],
historical or edifying literature about
Christian saints, for example *martyrologia* 关
于圣人/圣徒的文学 100.3; 133.6

- Haimo**, Bishop of Halberstadt, historian, exegete, +853 海莫 89.4
- Hakon**, King of Norway 938 - 961 哈孔 81.3
- Hamburg - Bremen**, archdiocese in Germany 汉堡/不来梅 81.1,2
- Harald**, King(s) of Denmark, ca 850 哈拉尔 81.2
- Harald II**, King of England, defeated by William the Conqueror in 1066 哈拉尔 105.4
- Harding, Stephanus**, [Stephen Harding], the third abbot of Citeaux, 1109 - 1134, author of the constitutions *Charta caritatis* of 1119 哈丁 116.3
- Hariolf**, founder of the monastery of Ellwangen in Germany 哈瑞欧夫 79.1
- Hartwig**, Archbishop of Bremen ca 1160 哈特维格 108.2
- Hathumar**, first bishop of Paderborn 806 - 815 哈图马尔 81.1
- Havelberg**, area in N Germany 哈韦尔贝格 82.5
- Hedwigs**, St. Duchess of Silesia and Poland, later Cistercian nun +1243 赫德维 136.1
- Hegius, Alexander**, Dutch educator and early humanist, +1498 黑格乌斯 155.1
- Heidelberg**, University founded in 1386 海德堡 145.1
- Heidenheim**, double - monastery close to Eichstaett, founded in 751 by Wunibald and Walpurgis 海登海姆 80.2
- Helfta**, monastery of Cistercian nuns near Eisleben, place of spiritual education, home of the authors Mechtildis and Gertrudis 赫尔弗塔 133.5
- Heliand**, poem about the gospel in Saxonian language, ca 830《救世主》81.1; 89.4
- Heloise**, 1098 - 1164, student and lover of Abaelard, later abess 埃洛伊兹 121.5
- Henricus I**, [Heinrich, Henry], Saxonian German King 919 - 936, father of Otto I 亨利 81.2; 82.5; 88.3; 97.1
- Henricus II Pius**, [Heinrich der Heilige, Henry the Saint], German King, Emperor 1002 - 1024; generously supported or founded churches, crowned emperor in 1014 by Benedict VIII 亨利 82.2.5; 88.7 *; 97.2; 101.3;
- Henricus III**, [Heinrich, Henry], German King, Emperor 1039 - 1056, tried to restore order in the Church in Rome, held a synod at Sutri 1046 and supported the German Pope Clement II 亨利 88.7; 97.2; 101.3; 102.2; 103 *; 111.1
- Henricus IV**, [Heinrich, Henry], 1050 - 1106, German King 1056, in power since 1066, he tried to depose Pope Gregory VII at a synod in Worms in 1076, he was excommunicated but absolved again at Canossa in Jan. 1077, faced much opposition in Germany, finally occupied Rome and was crowned emperor in 1084 亨利四世 89.6; 97.2; 103.4.6; 104.3 - 5 *; 105.1.2.5
- Henricus V**, [Heinrich, Henry], German King 1106 - 1125, forced his coronation in Rome in 1111 亨利 105.5,6 *; 106.1,2; 117.2
- Henricus VI**, [Heinrich, Henry], German King, son of Barbarossa 1165 - 97, Emperor 1191 - 1197, married to Constance of Naples - Sicilia, died on a crusade 亨利 107.6.7.8 *; 109.3; 123.2
- Henricus VII**, [Heinrich, Henry of Luxemburg], German King 1308 - 1313, crowned emperor in 1312 亨利 111.4; 138.2 *; 139.1,5

- Henricus (VII)**, [Heinrich, Henry], son of Frederick II, opposed his father in 1235 亨利 97.1; 123.3; 124.1,4
- Henricus I Beauclerc**, [Henry], King of England 1100 - 1135, arranged an agreement with Anselm of Canterbury concerning the investiture issue 亨利 105.4
- Henricus II**, [Henry of Anjou - Plantagenet], King of England 1154 - 1189, tried to control the Church (Diet of Clarendon 1164), first he was a friend of Thomas Becket, later he opposed him 亨利 107.3,5
- Henricus III**, [Henry] King of England 1216 - 1272, who confirmed the *Magna Charta* 亨利 123.4
- Henricus IV**, [Henry] King of England 1399 - 1413; started to suppress Wycliffe's movement in 1400 亨利 147.2
- Henricus Superbus**, [Heinrich der Stolze, Henry the Proud], Duke of Bavaria, received the lands of Countess Mathilda as a fiefdom from the Pope in 1133 亨利 106.2
- Henricus Leo**, [Heinrich der Loewe, Henry the Lion], Duke of Saxony and Bavaria, + 1195, the most powerful of the German dukes; he at times opposed Frederick Barbarossa 亨利 107.4; 108.2
- Henricus Raspe**, [Heinrich], Landgrave of Thuringia, proclaimed king in 1246 but died soon 亨利 124.6
- Henricus**, King of the Wendes ca 1105 亨利 108.2
- Henricus de Gent**, [Heinrich, Henry], Doctor solemnus, Professor at Paris, + 1293, representative of Augustinism and opponent of Thomas 亨利 135.3c
- Henricus de Langenstein**, [Heinrich, Heinbuch, Henry], + 1397, German author, vice rector of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suggested a council to end the division of the Church (1379, 1380) 亨利 141.3; 145.4a
- Henricus de ? Lausanne**, heretic agitator against the Church in the Provence, ca. + 1145 亨利 113.3
- Henricus Mandé**, [Heinrich], spiritual author, + 1431 亨利 146.5
- Henricus de Noerdlingen**, [Heinrich, Henry], priest, spiritual director of mystics, ca + 1350 亨利 146.4
- Henricus Suso**, [Heinrich Seuse] = Suso
- Heraclius**, [Heraklios],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610 - 641 赫拉克留斯 83.2
- Heriger de Lobbes**, abbot and director of a school at the monastery of Lobbes (Laubach) in Germany 赫瑞格尔 89.5
- Hermannus de Fritzlar**, [Hermann], lay author of spiritual literature, 1343 赫尔曼 146.4
- Hermannus de Metz**, [Hermann], Bishop of Metz, ca 1080 赫尔曼 111.2
- Hermannus de Salm**, [Hermann], rival king of Henry IV 1081 - 1088 赫尔曼 104.5
- Hermannus de Salza**, [Hermann], Hochmeister of the Teutonic Knights 1210 - 1239, had good connections to Frederic II and to the Popes 赫尔曼 118.4; 123.3; 127.2
- Hermannus Contractus**, [Herman the lame], monk in Reichenau, spiritual author, 1015 - 1045 赫尔曼 89.6
- Herolt, Johannes**, famous Dominican preacher in Nuremberg, + 1468 赫若特 153.1
- Herp, Heinrich**, [Harpius], Dutch Franciscan, mystic, + 1477 赫尔普 146.5
- Hesychasmus**, monastic quietism in the

- monasteries of Mt. Athos, Sinai; main exponent: Gregorius Palamas 宁静派/静修主义 91.2
- Hexen** = malificae
- Heynlin de Stein**, [Johannes Heynlin de Lapide], 1428 - 1496, German theologian belonging to the school of realism 海恩林 145.4b; 153.1
- hierocratia**, [Hierokratie, hierocracy], papal hierocracy, the aim of Gregory VII 教宗/教皇的神圣统治 111.2,3
- Hieronymitae**, several hermit congregations founded in the 14 century in Italy and Spain, some of them dissolved in the 19th ad 20th centuries 热罗尼莫会 151.3c
- Hieronymus de Praga**, Bohemian theologian 1370 - 1416, friend of Jan Hus, sentenced to death for heresy 热罗尼莫/哲罗姆 142.4; 148.3
- Hildebrand**, monk = Gregorius VII
- Hildegardis**, St. Hildegard, 1098 - 1179, Benedictine abbess in Bingen (Germany), respected author of medical and spiritual literature 希尔德加德 122.4
- Hilduinus**, [Hilduin], Abbot of St. Denis + 840 荷尔都因 89.4
- Hillin**, Archbishop of Trier at Barbarossa ' s time, ca 1150 希林 107.2
- Hincmarus**, Archbishop of Rheims 845 - 882, counsellor of Charles II, author 安克马尔 87.3; 89.4; 90.4
- Hirsau**, monastery in Germany, base of Gregorian reforms after 1070 希尔骚 101.2; 115.2 * ; 120.2; 151.2
- Hochstraten, Jacobus**, Dominican inquisitor, + 1527 胡克斯特瑞登 155.4
- Holbein, Hans, der Juengere**, German painter, 1497 - 1543(小)霍尔拜因 154.3c
- Holstein**, area in N Germany 荷尔斯泰因 82.5
- homilia, homiliarium** = praedicare
- Honorius II**, antipope 1061 - 1071, originally Cadalus, Bishop of Parma 霍诺利乌斯 103.6
- Honorius II**, Pope 1124 - 1130, originally Bishop Lambert of Ostia, who kept contact with King Lothair 霍诺利乌斯 106.2
- Honorius III**, Pope 1216 - 1227, originally Cardinal Savelli, crowned Frederick II in 1220 霍诺利乌斯 124.2 * ; 126.2,3; 129.2; 130.1,2
- Honorius IV**, Pope 1285 - 1287, from the Roman Savelli family 霍诺利乌斯 125.3 * ; 131.2e
- Honorius Augustodunensis**, [Honorius of Autun], ca 1100 - 1150, monk (in Regensburg?) and encyclopedic writer, exponent of a Christian Platonism 霍诺利乌斯 121.6
- Horarium**, [Fr. : Livres d' heures; office of the hours], prayer books flourish in the 14th and 15th centuries; see: liturgia horarum 日课,祈祷本 153.3
- Hortulus animae**, [Seelengaertlein, little garden of the soul], popular spiritual books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灵魂之花园 153.3
- Hospitaliter** = Antoniti
- Hospitaliti de Spiritu Sancto**, [Taubenbrueder; Hospitallers of the Holy Spirit], founded ca in 1180 by Guido de Montpellier, cared for the Hospital S. Spirito in Sassia in Rome after 1204 圣神医务会 117.3a
- Hospitaller**, [Johanniter, Malteser], knight order, founded 1119 in Jerusalem, mainly concerned with medical services; their hospitals were model institutions; since 1310

- their main center was Rhodus, and from 1530 - 1798 their headquarters were at Malta; Reformation and secularization after 1800 brought severe losses for them. 医院骑士团 109. 1; 118. 2 *; 138. 4; 151. 1; 157. 1
- hostia**, [Hostie, host], the holy bread, Body of Christ 圣饼/基督圣体 119. 2; 152. 1; 158. 2a
- Hrabanus** = Rabanus
- Hrotsvita** = Roswitha
- Hucbaldus**, monk of St. - Amand in Flanders, introduced polyphony, +930 胡克巴德 98. 5
- Hugo**, King of the Provence and Italy 926 - 948, married Marozia 胡格/雨果 88. 2
- Hugo de St. Cher**, French scholar, cardinal, + 1264; organizer of scholarly institutions to correct Bible editions, author of the first Bible concordance 胡格/雨果 145. 5
- Hugo de Cluny**, [Hugo the Great], Abbot in Cluny 1049 - 1109 who upheld the ideal of St. Benedict and supported church reforms; he was an advisor of Gregory VII 胡格/雨果 101. 3; 103. 2; 104. 4; 115. 1
- Hugo de Payens**, one of eight French knights who founded the Templars in Jerusalem ca in 1119 胡格/雨果 118. 3
- Hugo de St. Victor**, French scholar, mystic, 1096 - 1141, director of the school at St. Victor, Paris 胡格/雨果 121. 6 *; 122. 1, 3; 137. 3
- Humanism**, revival of classical studies and poetry in the beginning mainly promoted by Italian scholars (since Petrarca), many of the Renaissance Popes were outstanding humanist scholars themselves. Humanism was conducive to Biblical studies but had some harmful influence due to a naturalist world view and the satirizing of clergy and certain Church institutions (conf. Boccaccio, Erasmus). 人文主义 145. 1; 151. 3a; 153. 1; 155 *; 157; 158. 3, 5, 6
- Humbertus de Romans**, French Dominican, almost made Pope in 1241; later general of the Dominican order; he submitted a reform paper at the Synod of Lyon in 1274 亨伯特 124. 4; 133. 2; 136. 3
- Humbertus de Silva Candida**, + 1061, monk in Moyenmoutier (Lorraine), since 1050 Bishop of Silva Candida and cardinal; influential legate in Constantinople in 1054 亨伯特 89. 6 *; 90. 6; 94. 3; 97. 2; 102. 3; 103. 2 - 5
- Humiliati**, a pious lay movement among cloth producers in Milan and N Italy; many of them joined the Waldenses, the rest was reorganized in 1201 as religious order with a Third Order 卑微派 114. 1; 117. 3b *; 132. 1
- Hungari, Hungaria**, [Ungarn, Magyars, Madyar], people and area in central Europe 匈牙利(人) 79. 2; 82. 6; 142. 1; 156. 3, 4
- Hunyadi, Johannes**, [Janos Hunyadi], Hungarian regent, 1387 - 1456, defeated the Turks in 1456 匈雅提 156. 3
- Hus, Jan**, Bohemian reformer 1372 - 1415, influenced by Wycliffe; sentenced and executed at the Council of Constance 胡斯 142. 2, 4; 143. 1; 145. 4c; 148 *; 149. 1
- Hutten, Ulrich von**, + 1523, German humanist scholar, poet who satirized Rome and was politically active after 1520 胡滕 155. 2
- iconoclasm**, [Bildersturm, iconoclasm], the destruction of icons; a campaign in the Greek

- Church to remove religious images (edict of Emperor Leo III in 726) or to destroy them (edict of 730), which remained the policy of Byzantine emperors between 725 and 842; it led to fierce struggles in the 8th and 9th century, caused tension between East and West and was repudiated by most believers in the east and in the west 破坏圣像运动/反圣像运动/捣毁圣像运动/圣像破坏之争 92
- ieiunium**, [Fasten, Fasttage, fasting], fasting on Fridays, Saturdays, in the Quadrages 守斋期/守斋日 99.1; 93.2; 94.2; 100.2; 152.4
- Ignatius**, [Ignatios], Patriarch in Byzantium 847 - 858, 867 - 877, rival of Photius 伊格纳提乌斯 83.4; 93
- imagines**, [Bilder, Bilderstreit; icons], controversy about the veneration of sacred images; the destruction of sacred images is called "iconoclasm" 圣像, 圣像争论 92
- Imitatio Christi**, [Imitation of Christ], very popular spiritual book by Thomas a Kempis, ca 1420《师主篇》/《效法基督》146.5
- In caena Domini**, [Abendmahlsbulle], collection of papal sanctions (13th ct) announced on the Thursday of Holy Week 《最后晚餐诏书》110.2b
- inclusae**, [Inklusen, recluses], monks or nuns who led a life immured in a small cell 封闭隐修者 101.2
- indulgentiae**, [Ablass, indulgence], indulgences, practice in the Church life of the late Middle Ages, usually understood as doing penance or giving alms in support of the deceased ("remissio sive indulgentia a poena et culpa"); this pious practice helped to build magnificent churches but also gave rise to misuse and superstition 大赦, 罪罚的赦免 99.3; 119.4 *; 133.2; 141.3; 142.4; 149.2,3; 152.2 *; 158.1,2,5
- Ingolstadt**, university of Ingolstadt, center of Humanism 因格尔施塔特 155.4
- Innocens II**, [Innocent], Pope 1130 - 1143, originally Cardinal Gregory, faced opposition from Antipope Anacletus II, he fled to France and was supported by St. Bernard 依诺森 106.2 - 5 *; 110.2f; 118.3; 121.5 *
- Innocens III**, [Innocent], antipope 1178 - 1180 依诺森 107.4
- Innocens III**, [Innocent], Pope 1198 - 1216, originally Lothar Segni,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Popes in history, expert of canon law, he confirmed the new mendicant orders and organized the 4th Lateran council in 1215 依诺森 86.5; 98.2; 102.1; 104.1; 110.1,2d; 111.3,4; 117.3ab; 123 *; 124.3; 126.1,2; 127.1,2; 129.1; 132.1; 137.1,3
- Innocens IV**, [Innocent] Pope 1243 - 1254, originally Sinibald Fieschi, avoided Frederick II and went to Lyon (1244 - 1251), where he held a synod in 1244 依诺森 110.2d; 111.2,3; 124.5,6 *; 126.4; 127.2 - 4; 130.2,3; 132.3; 133.2; 134.1; 135.3a; 136.3
- Innocens V**, [Innocent], Pope 1276 依诺森 125.2
- Innocens VI**, [Innocent], Pope 1352 - 1362, resided in Avignon 依诺森 139.5,6
- Innocens VII**, [Innocent], Pope 1404 - 1406 依诺森 141.3
- Innocens VIII**, [Innocent], Pope 1484 - 1492, originally Battista Cibo 依诺森 157.2; 158.2
- inquisitio**, [Inquisition, inquisition], an ecclesiastical institution (court) to find and punish heretics, in response to the spread of

- sects (Cathars) after 1180, supported by the Lateran Council of 1215 and by Emperor Frederick II. The inquisition was notorious for reviving the means of torture used by Roman Law in antiquity. The inquisition in Spain after 1480 was mainly directed against Jews and Muslims. 宗教裁判所/异端裁判所 114.3; 132.2,3*; 150.3*; 158.6
- Institoris, Heinrich**, German Dominican, one of the authors of the *Malleus Maleficarum* (1487) 茵斯提托瑞斯 158.2
- interdictum**, [Interdikt, interdict], the prohibition of certain sacramental actions or the access to some churches, used as political tool by some Popes 禁罚 99.4*; 143.2; 158.2
- intercalaria**, [Interkalfargefaelle], a certain tax paid at the vacancy of an office 空位税 140.1; 142.4
- investitura**, [Investitur, investiture], the act of formally putting someone into an office or a landholding; the ceremony of handing over regal rights to a (Church) official, usually performed by handing over the bishop's ring and crozier or similar symbols; Church reformers in the 11th and 12th centuries opposed lay rulers (kings) who invested clergy with the symbols of their positions, see Investiturstreit / Investiture Controversy 授权礼/授职礼/叙任仪式 97.2*; 103.5
- Investiturstreit**, [Investiture Controversy], conflict over the right of lay people (kings) to bestow powers to a bishop, (see Gregory VII), resolved by the Concordat of Worms in 1122 授权之争/主教任命权之争/叙任权之争 101.3; 104*; 105*
- Irene**, [Eirene], Empress of Constantinople 780 - 802, reigning for her young son Constantine VI she tried to correct the iconoclastic policy of former emperors 伊任内 86.5; 92.2
- Irnerius**, law teacher in Bologna, founder of a "Roman School of Law" in 1084 伊内利乌斯 110.3
- Isaac II Angelus**, Emperor of Byzanz 1185 - 1195 依撒克 126.2
- Isabella de Castilia**, Queen of Castilia 1474 - 1504, married Ferdinand of Aragon and united the two kingdoms (1479), renewed the inquisition in Spain 伊莎贝拉 109.5; 150.3; 158.6
- Isidorus**, [Isidoro, Isidore], Archbishop of Sevilla, the "Last Latin Father", important compiler, author of *Etymologiae*, 560 - 636 伊西多尔 87.4; 89.4
- Isidorus**, [Isidoros], Metropolit of Kiev, participant in the Council of Ferrara 1438, arrested after his return 伊西多尔 144.1; 156.2
- Islam**, the religion founded by the Arab prophet Muhammad (570 - 632) in Medina and Mecca; the believers of this religion are called Muslim (= Moslem); the expansion of Islam effected the (forced) conversion of large Christian areas in northern Africa and Asia Minor, it caused long-term conflicts, especially in Spain, and eventually led to the crusades 伊斯兰/穆斯林 84; 109.5; 127.5; 156
- Ivo de Chartres**, [Yves], 1040 - 1115, Bishop of Chartres, important writer and canonist 伊夫 105.4,6; 110.3; 117.1
- Jacobus de Vitry**, + 1240, Cardinal, hagiographer 雅各伯 133.6
- Jacobus de Voragine**, [Jacobus de Varazze],

- + 1298, Italian Dominican, Archbishop of Genoa, famous hagiographer, author of the *Legenda aurea* 雅各伯/雅各 133.6
- Jacopone da Todi**, Franciscan poet, + 1306; he wrote spiritual poems but also attacked Boniface VIII 雅各布尼 131.1
- Jaroslav** = Yaroslav
- Jeanne d' Arc**, [Joan d' Arc, Johanna von Orleans], French national hero, 1412 - 1431, responding to visions she helped to liberate Orleans but later fell into English hands, she was sentenced and burned in 1431 but was declared innocent in 1456. She was canonized in 1920. 冉·达克/贞德 156.3
- Jesuati**, lay congregation founded 1360 in Siena for the care of the sick, later called "Apostolic Clerics of St. Jerome", dissolved in 1668 耶稣阿提会 151.3c
- Johanna**, legendary female pope, proven to be a later fiction 约翰纳 87.2 * ; 125.2
- Johanna I**, Queen of Naples 1342 - 1382, she sold Avignon to the Pope in 1348, opposed Pope Urban VI in 1381 约翰纳 139.5; 141.2,3
- Johanna II**, Queen of Naples, + 1435 约翰纳 144.3
- Johannes** = Ioannes / John / Hannes / Jean / Juan / Joao / Ivan / Jan / Giovanni 约翰内斯 = 约翰/若望/汉斯/让/胡安/若安/伊凡/杨/乔凡尼
- Johannes VIII**, Pope 872 - 882, talented and energetic, he crowned two emperors but received little support from them 约翰内斯 83.2,3; 87.5 * ; 93.3,4
- Johannes IX**, Pope 898 - 900 约翰内斯 87.6
- Johannes X - XIX**, Popes 914 - 1032, who had to face the power struggles of Roman clans (like the Crescentii) and the influence of German kings (like Otto I - III) 约翰内斯 82.4; 88.2 - 7; 97.2; 100.3
- Johannes XXI**, Pope 1276 - 1278, originally Petrus Hispanus, born in Lisbon, outstanding logician and medical expert, professor in Paris and Siena, cardinal in 1273 约翰内斯 125.2; 135.3f * ; 145.3
- Johannes XXII**, Pope 1316 - 1334, originally Jacob Duese from Cahors, the most influential of the Avignon Popes, talented and diligent, but too much influenced by France. He developed the administration system of the Curia. 约翰内斯 110.3; 117.3d; 130.2,4; 133.7; 135.2c; 139.1 - 3 * ,5; 140.1,2; 145.3; 146.1; 151.1; 152.4,5
- Johannes XXIII**, Pope 1410 - 1415, originally Bishop Cossa, he had political interests, elected by the synod in Pisa; he tried to flee from the council of Constance, where he was deposed 约翰内斯 142.1,2 * ; 148.2
- Johannes VIII Palaeologus**,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1425 - 1448, he promoted Church union, was participant in the Council of Ferrara in 1438 约翰内斯 144.1; 156.2
- Johannes Lackland**, [John], King of England 1199 - 1216, who signed the *Magna Charta Libertatum* (失土王) 约翰内斯 123.3,4
- Johannes Bonus**, St., hermit in Mantua, founder of the Jambonites (ca 1217) 约翰内斯 130.3
- Johannes de Brienne**, King of Jerusalem, leader of a crusade to Egypt 1218 - 1221 约翰内斯 126.2.3
- Johannes Presbyter**, [Prester John], mythical priest - king in the East 约翰内斯 127.4
- Johannes Buridanus**, 1300 - 1358, French

- scholar, scientist 约翰内斯·布里丹 145.4a
- Johannes de Capestrano**, St., Italian Franciscan, + 1456, popular preacher against the Hussites and against the Turks 1451 - 1456 约翰内斯 148.6; 151.2 *; 156.3
- Johannes Capreolus**, + 1444, French Dominican theologian, "Thomistarum princeps" 约翰内斯 145.4b
- Johannes Damascenus**, monk in the Sabas - Monastery at Jerusalem 715 - 749, most influential Greek theologian of his century, author of *Fountain of Wisdom*, precursor of scholasticism 大马士革的约翰内斯 91.2 *; 92.1,2; 131.1; 135.3a
- Johannes de Freiburg**, theologian, author of a confessional sum, + 1314 约翰内斯 119.5
- Johannes de Goch**, Christian reformer, + 1475, emphasized Biblical orientation 约翰内斯 149.1
- Johannes Gualbertus**, St. monk in Italy, founder of a monastery in Vallombrosa (1038) and of the Vallombrosian Congregation, + 1073 约翰内斯 101.4
- Johannes de Jandun**, theologian at the court of Louis IV, + 1328 约翰内斯 139.2
- Johannes de Jenzenstein**, Archbishop of Prague, had a conflict with King Wenceslaus in 1390 约翰内斯 141.3
- Johannes de Kastl**, German Benedictine spiritual author, ca 1400 约翰内斯 146.4
- Johannes de Matha**, St. founder of the Trinitarians in 1213 约翰内斯 117.3a
- Johannes de Montecorvino**, [Giovanni, John], Italian Franciscan, successful missionary in China (Cambalic = Beijing) under the Mongols 1294 - 1328, first Bishop of Beijing in 1307 约翰内斯/孟高维诺 127.4
- Johannes Nepomuk** = Johannes de Pomuk
- Johannes de Neumarkt**, + 1380, Bishop of Leitomischl and Olomouc, chancellor of Charles IV and humanist scholar 约翰内斯 155.2
- Johannes Nider**, 见 Nider
- Johannes de Parma**, [John, Giovanni], General of the Franciscans 1247 - 1257, supporter of Joachim's spiritualism 约翰内斯 131.1
- Johannes de Piano del Carpine**, [Giovanni de Planocarpini], Italian Franciscan who traveled to the Mongols (Karakorum) in 1245 - 1247 约翰内斯 127.4
- Johannes de Pomuk (Nepomuk)**, St., canon and vicar general in Prague, popular pastor, was martyred in 1393 by King Wenceslaus 约翰内斯 141.3
- Johannes Quidort**, Dominican writer in Paris, supported separation of powers in 1302 约翰内斯 139.2
- Johannes de Ravenna**, Archbishop of Ravenna, accepted the authority of the Pope in 861 约翰内斯 87.3
- Johannes Scotus Eriugena**, Irish scholar ca 810 - 877; translator, director of the court school of Charles the Bald, one of the leading thinkers in the 9th century 艾利基纳/艾留金那 89.4 *; 90.5; 121.1; 131.2a
- Johannes de Tepla**, official in Prague, author of the *Ackermann*, a dialogue with death, ca 1400 约翰内斯 153.3; 155.2
- Johannes de Torquemada**, Dominican scholar in the 15th ct., doubted the originality of the Pseudo-Isidoriana 约翰内斯 87.4

- Johannes de Trani**, Bishop in Apulia ca 1050
约翰内斯 94.2
- Johannes Veccus**,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supporter of Church union, forced to resign after 1282 约翰内斯 125.3
- Johannes de Wesel**, [Johann Ruchrat], Christian reformer, + 1481, emphasized the Bible, opposed indulgences 约翰内斯 149.2
- Johanniter** = Hospitaller
- Jonas**, Bishop of Orleans, opponent of iconoclasm, ca. 825 尤纳斯 87.1; 92.5
- Jordanus de Saxonia**, [Jordan of Sachsen], German Dominican, second general superior of the order 1222 - 1237 约达努斯 130.1
- Josephus, St.**, [Joseph], Christian saint, foster - father of Jesus, venerated since the later Middle Ages together with Anna, the mother of Mary 若瑟/约瑟夫 conf. 158.1
- Josephus**, [Joseph],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deposed after 1274, restituted after 1282 若瑟/约瑟夫 125.3; 144.1
- jubilaeum**, [Jubilaeumsjahr, jubilee year], since 1300 the Popes announced jubilee years which were celebrated with pilgrimages to Rome; indulgences were granted 大禧年 137.3; 152.2 *; 156.1
- Judaei**, [Jews], persecution of Jews, especially severe during the first and second crusade (1095, 1146) and during the time of the plague (1348 - 1350); some humanists promoted studies of Jewish tradition (Reuchlin) 犹太人 150 *; 152.3
- Juliana Falconieri**, St., Italian noblewoman, + 1341, founder of the Mantellati, the third order of the Servites, ca in 1305 尤利安纳 130.5
- Juliana de Norwich**, [Julian], English recluse and mystical author, ca + 1413 尤利安纳 146.1
- Julius II**, Pope 1503 - 1513, originally Giuliano della Rovere, nephew of Sixtus IV 尤里乌斯 111.4; 133.7; 154.3b; 157.1,2,5 * ,6
- Justinianus**, [Justinian], Emperor of Byzanz 527 - 565, who confirmed the traditional anti - Jewish legislation 尤斯廷尼安 114.3; 150.1
- K = C**
- Karl = Karolus = Carolus**
- Katharer, Katharoi = Cathari**
- Kiev = Kiovia**
- Kilianus**, [Kilian, Killena], St., Irish Bishop, missionary in Germany, Wuerzburg, + 689 基利安努斯 79.3
- Kiovia**, [Kiew], important city in Russia, metropolis ca in 1030 基辅 83.4
- Knut = Canutus**
- Konrad = Conradus**
- Kunigunde = Cunigundis**
- Ladislau**, King of Naples, expelled Pope John XXIII from Rome in 1413 拉迪斯劳 141.3, 4; 142.1; 148.2
- Ladislau V Postumus**, young king of Hungary, 1440 - 1457 拉迪斯劳 156.3
- laica confessio**, confession to a lay person 向平信徒告罪 119.5
- laica investitura**, lay investiture 平信徒任命 (主教) 的权利, 见 investitura
- laicus abbas**, lay abbot 平信徒隐修院院长 101.1
- laicus calix**, [Laienkelch; lay chalice], lay people receiving the Holy Blood of Christ, (i. e. receiving communion in both species) 平信徒接受圣爵 119.2; 148.6

laicus frater, [lay brothers], also called “ conversus ”, who lived and worked in monasteries 平信徒修士 101.2; 115.2; 116.

3

Lambertus, Lambert of Spoleto, Emperor 892 - 898 兰贝图斯 87.6

Lambertus, monk and author in Hersfeld, Hessen, + ca 1078 兰贝图斯 89.6

Landulfus de Milano, one of the leaders of the Pataria movement, ca 1055 兰多尔夫 103.6

Lanfranc, [Lanfrank], ca 1010 - 1089, Prior of Bec in the Normandy,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1070 - 1089, author 兰弗朗克 89.6 * ; 90.6; 105.4; 121.1

Langobardi, [Langobards], Germanic tribe which invaded Italy in 586; they controlled northern Italy and occupied the exarchate Ravenna in 751; as they threatened Rome, the Popes appealed to the Franks for help; their capital Pavia was destroyed by Charlemagne in 774 伦巴第人 85.1,2; 86.

3

Langton, Stephanus, + 1228; theologian at Paris, Biblical scholar, writer; he becam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in 1207 兰顿 123.4; 145.5

Lateranus, [Lateran], papal palace in Rome, old episcopal church of the Pope, many synods were held there 拉特兰, 主教会议: Synod of 769 年: 85.4; 92.3; Synod of 1059 年: 90.6; 103.5; Synod of 1060 年: 103.6; Council of 1123 年 (= 第 9 次大公会议): 105.6; Council of 1139 年 (= 第 10 次大公会议): 104.1; 106.3,4; Council of 1179 年 (= 第 11 次大公会议): 107.4; 114.1; Council of 1215 年 (第 12 次大公会议): 100.3; 102.1; 110.2b; 112.1; 119.2,5; 123.5 * ; 128.1; 129.2; 131.2a; 132.2;

133.2; Council of 1512 - 1517 年 (= 第 18 次大公会议) 111.4; 145.4b; 155.3; 157.5.6 *

Lebuinus, [Liefwin], St. missionary in Saxony ca 700 (?) 雷布因 81.1

Lech, river in the border area between Germany and Austria, an important battle there defeated the Hungarians in 955 莱希河 82.6

Leo III, Pope 795 - 816, fled to Germany (Paderborn) in 799, crowned Charlemagne in 800 in Rome, which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 Holy Roman Empire ” (so called since the 13th century) 利奥/莱奥 85.1; 86.4 * ; 90.2,3; 111.4

Leo IV, Pope 847 - 855 利奥/莱奥 87.2

Leo V - VIII, Popes 903 - 965, who had to face power struggles of Roman factions 利奥/莱奥 88.2,5

Leo IX Sanctus, St., Pope 1049 - 1054; originally Bruno, from Alsatian nobility, Bishop of Toul; he was an effective reformer of the Church through the nomination of talented cardinals 利奥/莱奥 94.3; 102.3; 103.2 * ,5; 104.1; 106.3; 115.2

Leo X, Pope 1513 - 1521, originally Giovanni Medici, maecen of arts and literature, but he failed to prevent the great split of the Church in Germany effected by M. Luther 利奥/莱奥 151.1; 154.3b; 157.6 *

Leo III, Isaurus, Emperor in Byzanz 717 - 741, launched iconoclasm in 726, his edict of 730 ordered the destruction of images 利奥/莱奥 92.1

Leo IV, Chazarus, Emperor in Byzanz 775 - 780 利奥/莱奥 92.2

Leo V, Emperor in Byzanz 813 - 820, who renewed iconoclasm 利奥/莱奥 91.2,3;

- Leo VI**, Emperor in Byzanz, 886 - 912, who deposed Photius; his fourth marriage in 906 triggered the Tetragamy controversy 利奥/莱奥 93.4,5
- Leo**, friar, a friend of St. Francis 利奥/莱奥 129.3
- Leonardo da Vinci**, Italian artist, painter, scientist, 1452 - 1519 列奥纳多·达·芬奇 154.3b
- Leopoldus de Austria III**, [Leopold, Luitpold], St., Margrave of Austria, founder of (Cistercian) monasteries, 1095 - 1136 利奥波德 conf. 105, 106
- Leopoldus de Austria V**, Duke of Austria 1177 - 1194, rival of King Richard Coeur de Lion 利奥波德 107.8
- Leopoldus VII**, Duke of Austria, joined the crusade of 1217 利奥波德 126.2
- Libertas Romana**, [paepstlicher Schutz; Papal protection]; papal protection of a monastery, granted for an annual fee, since the 9th and 10th century; similar to exemption“罗马自由”101.2
- Liege**, [Legia, Leodium, Luettich], town in Belgium 列日 89.6
- Lioba**, St., relative of St. Boniface, abbess in Tauberbischofsheim 利欧巴 80.2
- Lithuania**, country in NE Europe 立陶宛 127.3
- liturgia**, [Liturgie, liturgy], after a plurality of Mozarabian, Ambrosian and Gallic liturgies, Roman liturgy became prevalent since the 10th, 11th centuries 礼仪/罗马礼 84.2; 98.1
- liturgia horarum**; *horarium*, *breviarium*; [Stundenbuch, Stundengebet; Breviary], the traditional prayer of monks and clergy, many prayer books were edited in the 15th century 日课/每日礼赞 153.3
- Liudger**, St., first bishop of Muenster, 804 - 809 卢德格 81.1
- Liutprand**, King of the Langobards 712 - 744 留特布兰德 85.1
- Liutprand**, Bishop of Cremona, historian, ca +970 留特布兰德 88.2; 89.5
- Livonia**, [Livland], mission activities in the 12th century 里夫尼亚 108.4; 127.1
- Lobbes**, [Laubach], monastery in Germany 罗贝斯 89.5
- Lochner, Jakob**, German humanist scholar 罗赫内 155.4
- Lochner, Stephan**, German painter, + 1451 罗克内 154.3c
- Loire**, river in France 卢瓦尔河 84
- Lollardi**, adherents of Wycliffe 罗拉迪人 147.2
- Lollardi** = Alexiani, 151.3c
- Loreto**, famous pilgrim destination in Italy since the 14th century 罗瑞托 133.7
- Lorraine** = Lotharingia
- Lotharingia**, [Lothringen, Lorraine], duchy in the border area between Germany and France 洛林 89.6
- Lotharius**, [Lothar, Lothair], son of Louis the Pious, Co - Emperor 817 - 843 洛塔尔 86.6; 87.1.2
- Lotharius II**, [Lothar, Lothair], German king 855 - 869 in control of Lorraine (between the French and the German part of the Frankish empire) 洛塔尔 87.1,3
- Lotharius III**, [Lothar, Lothair], Lothair of Supplinburg, Saxon Duke, King of Germany 1125 - 1137, supported Innocens II, was crowned Emperor in Rome in 1133 洛塔尔 106.1 - 3; 117.2
- Lotharius II**, Italian king 948 - 950 洛塔尔 88.4
- Luciferiani**, adherents of a sect (allegedly)

- worshipping the devil in the 13th ct 路齐弗尔 131.2b
- Lucius II**, Pope 1144 - 1145 卢修斯/路齐乌斯 106.4
- Lucius III**, Pope 1181 - 1185, who could reside in Rome only for a few months due to republican tendencies of Roman nobles 卢修斯/路齐乌斯 107.6; 114.1,3; 117.3bc
- Ludmila**, Duchess of Bohemia, ca 900 卢德米拉 82.3
- Ludolphus de Saxonia**, Carthusian author of a Vita Christi, +1378 鲁多夫 146.4; 153.3 路易,德国王:
- Ludovicus I Pius**, [Ludwig der Fromme / Louis the Pious], son of Charlemagne, Emperor 814 - 840, who divided the Frankish empire among his three sons 路易一世(虔诚者) 81.1; 86.6; 87.1 *; 92.5; 97.2; 101.1
- Ludovicus II**, [Ludwig / Louis], son of Lothair, king of Italy 844 - 875, anointed in 850, crowned Emperor in 872 路易 87.2,3
- Ludovicus III**, [Ludwig / Louis], King of the Provence, crowned Emperor in 901 路易 88.2
- Ludovicus Infans**, [Ludwig / Louis the Child], German king (only seven years old) 900 - 911, last of the east - Frankish Carolingians 路易 87.6
- Ludovicus Teutonicus**, [Ludwig der Deutsche / Louis the German], ruler of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Frankish empire 843 - 876 路易 82.3; 83.2.3; 87.1,5
- Ludovicus Bavaricus**, Ludovicus IV, [Ludwig der Bayer / Louis the Bavarian], German King 1314 - 1348, Emperor, banned in 1324, but resisted the Popes in Avignon (with the help of Occam and others) 巴伐利亚人路易 139 *; 140.2; 145.3; 146.1; 151.1
- Ludovicus**, [Ludwig / Louis], Margrave of Brandenburg, son of Louis the Bavarian, married to Margareta Maultasch of Tyrol in 1342 路易 139.4 路易,法国王:
- Ludovicus II**, [Ludwig / Louis the Stammerer], King of France, 877 - 879 路易 87.5
- Ludovicus VII**, [Ludwig / Louis], King of France, took part in the crusade of 1147 路易 107.3; 109.2
- Ludovicus IX Sanctus**, [Ludwig der Heilige / Louis the Saint], St., King of France 1226 - 1270, model of a Christian ruler who led an ascetic life, died on a crusade 圣王路易九世 102.1; 124.6; 125.1; 126.1.4 * , 5; 127.4; 128.2; 132.2; 133.8; 135.3b; 137.2
- Ludovicus XI**, [Ludwig / Louis], King of France 1461 - 1483 路易 156.4
- Ludovicus XII**, [Ludwig / Louis], King of France 1498 - 1515 路易 157.3,5,6 路易,其他:
- Ludovicus**, [Ludwig / Louis], I and II, of Anjou - Neapolis, sided with Johanna of Naples after 1381 路易 141.3
- Ludovicus**, [Ludwig / Louis], Landgrave of Thuringia, husband of St. Elisabeth, +1227 路易 126.3
- Ludovicus d' Aleman**, [Louis], Archbishop of Arles, leader of the (then schismatic) Council of Basel after 1437; +1450 路易 144.2
- Luebeck**, town in N Germany 吕贝克 82.5
- Luettich** = Liege
- Luitgard de Wittichen**, German nun, mystic, +1348 路德加德 146.4
- Lul**, bishop in Mainz in 753 鲁尔 80.4

- Lullus** = Raimundus Lullus
- Lund**, archdiocese in Sweden, established in 1104, in charge of Denmark, Sweden, Iceland, Greenland 隆德 81.2
- Lupoldus de Bebenburg**, Bishop of Bamberg, author, + ca 1350 鲁波德 139.2
- Lupus de Ferrieres**, Abbot of Ferrieres, important author, + 826 卢普斯 89.4; 90.4
- Luther, Martin**, 1483 - 1546, German reformer, edited some of Gansfort's works; see volume III 路德 145.4; 146.2; 149.3
- Lyon**, [Lugdunum], town in southern France 里昂; Synod of 1245 年会议: 110.2g; 124.5 *; 126.4; Synod of 1274 年的会议: 125.1 *; 126.5; 128.1; 135.2d; 136.3
- Maas**, river in N Germany, Netherlands 马斯河
- Machiavelli, Niccolo**, 1469 - 1527, Italian humanist, author of *Il principe* 马基雅维利 155.3
- Magdalena, Sorores**, Sisters of Magdalene, established to do penitence or to care for former prostitutes, established by Rudolf of Hildesheim in 1226 玛达勒纳修女会 130.1
- Magdeburg**, town in Germany, archdiocese since 967 马格德堡 82.5; 88.5
- Magna Charta**, document protecting civil rights, signed by King John in 1215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英国大宪章》123.4
- Magnus**, monk in St. Gallen, missionary in Allgaeu, ca 750 马格努斯 79.1
- Maimonides, Moses**, Jewish philosopher, + 1204, is works influenced mystical thought 迈蒙尼德 146.2
- Mainz**, [Lat: Moguntia], town and diocese in Germany; the bishop of Mainz was one of the electors of the German king 美因茨
- Majolus**, Abbot of Cluny 954 - 994 马尤卢斯 101.3
- Malachias**, Archbishop of Armagh, introduced Roman liturgy to Ireland, + 1148 马拉基亚 98.1
- maleficae**, [Hexen, witches], superstitious belief in the existence of witches and sorcery was long existent, but the persecution of witches at a large scale started only at the end of the 15th century 巫婆狂热, 巫婆案 102.1; 157.2; 158.2 *
- Malmsbury**, monastery in Wessex 马尔梅斯堡 89.2
- Malta, Malteser** = Hospitaller
- Manasses**, Archbishop of Rheims, notorious for simony, deposed in 1080 马纳西斯 116.1
- Mande, Heinrich**, Dutch mystic, + 1431 曼德 146.5
- Manegold de Lautenbach**, Augustinian canon in Alsace, + 1103, theological author 马内格德 90.6
- Manfredus**, King of Sicilia, Stauffer prince, brother of Conrad IV, + 1266 曼弗雷德 124.7; 125.3
- Mantellati**, a third order of women performing medical services, founded in the early 14th century by Juliana Falconieri 曼特拉提 130.5
- Mantua**, town in N Italy, the Synod of Mantua was held in 1062 曼托瓦 103.6
- Manuel I**, [Manoel], King of Portugal 1495 - 1521 who expelled Jews from Portugal in 1497 马努尔/曼努埃尔 150.3
- Marcus Eugenicus**, Archbishop of Ephesus, inimical to the Latin Church at the Council of Ferrara - Florence in 1439 马可 144.1
- Margareta Maultasch**, Duchess of Tyrol married to the son of Louis the Bavarian in

- 1342 玛格丽特 139.4
- Margareta**, Queen of Scotland 1069 - 1093, introduced Roman liturgy to Scotland 玛格丽特 98.1
- Maria**, [Mary], the mother of Jesus, traditionally respected and venerated by Christians 玛利亚/马利亚 100.3; 133.7 *; 152.6; 158.1
- Maria de Oignies**, Bl., supporter of Beguines, + 1213 玛利亚 117.3d
- Mariae Immaculata Conceptio**, [Immaculate Conception of Mary], traditional faith and traditional feast, led to controversies 无染原罪的圣母 119.6; 133.7; 145.2; 152.4
- Marianus Scottus**, Irish monk, founded a monastery at Regensburg in 1075, the origin of the "Schottenmoenche" 斯格托 116.2c
- Marinus I**, Pope 882 - 884 马瑞努斯 87.6; 93.4
- Marinus II**, Pope 942 - 946 马瑞努斯 88.2
- Marozia**, daughter of Theophylact; she was married to Guido and then to Hugo of the Provence; as "Senatrix and Patricia" she supported her son John XI (Pope 931 - 935) and influenced papal policies 马若基亚 88.2
- Marquard de Lindau**, [Marcus], German spiritual author, + 1392 玛卡尔 146.4
- Marrano**, **Marranos**, converted Jews (or Muslims) in Spain and Portugal who secretly supported their old religion; they were perceived as dangerous and suppressed by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马拉诺, 在中世纪被迫接受基督信仰的犹太人(或穆斯林), 他们暗地依然支持他们原来的宗教 150.2,3
- Marsilius de Inghen**, German theologian, nominalist, + 1396, rector of Paris University, first rector of Heidelberg University 马尔西留 145.4a
- Marsilius de Padua**, [Marsilio], Italian theologian, 1270 - 1342/1343; professor at Paris, then writer for Louis IV; critical of papal power and of many traditional tenets 马尔西留 139.2 * , 3,4; 140.3; 142.1; 147.1
- Martinus IV**, [Martin], Pope 1281 - 1285, original name Simon de Brion, he was under French influence 马尔提努斯/马丁 125.3 *; 128.2
- Martinus V**, [Martin], Pope 1417 - 1431, orig. Odo Colonna, elected in Constance, the first pope universally accepted after the Great Schism, he convoked the synods of Pavia (1423) and Basel (1431) 马尔提努斯/马丁 130.5; 142.3,4; 143.1 *; 148.4
- Martinus**, [Martin], St., Bishop of Tours, missionary, ca 316 - 400, a very popular saint 圣马尔提努斯/马丁 79.1
- Martinus de Troppau**, [Martin], historian, ca 1250 马尔提努斯/马丁 87.2
- martyrologium**, [martyrology], lists or records of martyrs, see also hagiography《殉道士列传》100.3
- Mary** = **Maria**
- Masaccio**, Italian painter, + 1428 马萨乔 154.3a
- Mathilda**, wife of Henry I, granddaughter of Widukind 马蒂尔德 81.1
- Mathilda de Tuscia**, Countess of Tuscany, 1040 - 1115, supporter of the papacy and of law studies, received Gregory VII in her castle in Canossa in 1077, resisted Henry IV 1090 - 1097 玛蒂尔达 104.4; 105.2; 106.2; 107.6
- Matthias Corvinus**, Hungarian King 1458 -

- 1490 玛迪亚·科维努斯 156.3
- Matthias de Janow**, Bohemian cleric and reformer, +1394 玛迪亚 148.1
- Maximilianus I**, [Maximilian], German King, Emperor 1493 - 1519, developed the power of the House of Habsburg 马克西米连 157.5,6; 158.5
- Mechtildis de Hackeborn**, [Mechthild], +1299, Cistercian sister in Helfta (Germany), writer of mystical theology 梅希特尔德 133.5
- Mechtildis de Magdeburga**, [Mechtild], Sister in Helfta, author of mystical theology, +1285 梅希特尔德 133.5
- Mecklenburg**, area in Germany, missionary activity since 920 梅克伦堡 82.5
- Medici**, famous and influential clan in Florence 美第奇 155; 157
- Medici**, Cosimo de, Florentine merchant, humanist, +1474 美第奇 155.1
- Medici**, Lorenzo de, +1492; "Il Magnifico", Italian maecen of arts, leader of the Republic of Florence 1469 - 92, escaped the assassination of 1478 and had some of his rivals executed, therefore banned by the Pope 美第奇 155.1; 157.1,2,4
- Medici**, Giovanni = Leo X.
- Medici**, Giuliano de, Italian politician, murdered in the Dome of Florence in 1478 美第奇 157.1
- Medici**, Piero, son of Lorenzo de Medici, overthrown in 1494 美第奇 157.4
- Meinhard**, missionary in Livonia, ca 1180, bishop 1186 梅因哈德 108.4
- Melk**, Melker Union, Congregation of Benedictine monasteries in Austria and Bavaria, established in 1418 梅尔克 151.2
- Memling**, Hans, painter in the Low countries, +1494 梅姆灵 154.3c
- mendicantes**, [Bettelorden, mendicant orders], the Franciscan and Dominican friars 托钵修会 128; 129; 151.1,2
- Mendoza**, Archbishop of Toledo, +1495 孟多撒 158.6
- Mercedarii** = Ordo B. Mariae Virg. de mercede redemptionis captivorum, 130.4
- Merswin**, Rulman, Layman in Strasbourg, mystical author, +1371 梅尔斯温 146.4
- Methodius**, St., 825 - 885, from a noble family in Salonici, sent to Moravia in 863 by Photius, missionary in central Europe, together with Cyrillus he translated the Bible and liturgical texts into the local Slavic language; after a visit in Rome 867 he was made Archbishop of Pannonia but was opposed by the bishops of Salzburg and Passau who claimed Pannonia as their area. 美多迪乌斯/梅托丢/麦托丢斯 83.2
- Metrophanes**, Archbishop of Smyrna, opponent of Photius, ca. 859 梅特若法内斯 93.1
- metropolita**, [Metropolit], bishop in charge of an important town 大主教 86.1; 110.2e
- Metz**, town in France, important center of the Church at Charlemagne's time 梅斯
- Michael II**, Emperor of Byzanz 820 - 829, iconoclast 弥格尔/米迦勒 92.4
- Michael III**, Emperor of Byzanz 842, 856 - 867, who influenced Bulgaria to accept missionaries 弥格尔/米迦勒 83.2,3; 92.4; 93.1
- Michael VIII Palaeologus**, Emperor in Byzanz 1261 - 1282; offered Church union to Rome in 1263 in order to avoid French aggression 弥格尔/米迦勒 125.1,3
- Michael Cerularius** = Cerularius
- Michael de Cesena**, Italian monk, general

- superior of the Franciscans, who supported Louis the Bavarian after 1323 弥格尔/米迦勒 139.2; 151.1
- Michelangelo Buonarotti**, Italian artist, painter, sculptor, architect, 1475 - 1564 米开朗琪罗 154.2,3b
- Mieczyslaw I**, / Miesko, Duke of Poland, 960 - 992, who married the Christian daughter of Boleslaw I of Bohemia and was baptized in 966; his land was soon led to Latin Christendom by Bohemian and German missionaries; Miesko donated his land to the Pope in 990 and received it back as fiefdom, which meant more independence from Germany. 梅士科一世 82.4,6
- Migetius**, heretic in Spain, ca 780 米格提乌斯 90.3
- Milic de Kremsier**, Bohemian cleric and reformer, + 1373 米里基 148.1
- Militia Jesu Christi**, [Christusorden; Order of Christ], order of knights, founded 1318 in Portugal 基督骑士团 138.4; 151.1
- Mindowe**, Duke of Lithuania, converted in 1250 明多维 127.3
- Minimi = Fratres Minimi**
- Minorites** = Ordo Fratrum Minorum, Franciscani
- Molay, Jacobus de**, General of the Templars, unjustly arrested and accused in 1307, forced to a "confession", executed in 1314 摩莱 138.3,4
- Mombaer, Johannes**, [Mauburnus], Dutch mystic, + 1501 蒙巴尔 146.5
- monasteria mixta**, [Doppelkloester], monasteries where women communities were living close to male religious communities 男女共同修道的隐修院 116.2b; 117.2; 151.3d
- Mongoli**, [Mongols], an ethnic group in Central Asia which attacked Eastern Europe 1223 to 1241; they were open to missionaries, see Johannes de Monte Corvino 蒙古人 124.4,5; 127.4
- Monte Cassino**, oldest Benedictine monastery in Italy, founded in 529, important library and center of studies 卡西诺山隐修院 89.3; 101.3; 103.4; 105.1,5; 152.5
- Monte Corvino** = Johannes de Montecorvino
- Moravi, Moravia**, Moravians, Slavic people of central Europe, led to the faith by Cyrill and Methodius after 863 摩拉维亚(人) 79.2; 82.2; 83.2 *
- Moriscos** 见 Marranos
- Moscovia**, [Moskau, Moscow], capital of Russia, in 1328 the metropolitan see of the Russian Church was moved from Kiev to Moscow; Russian rulers opposed Church unity in 1441, proclaimed independence from Byzanz in 1459; the Grand Duke of Moscow Ivan III married Zoe (the niece of the last Greek Emperor Constantine XI) in 1472, and thereafter Moscow was called "the Third Rome" 莫斯科 156.2; (186.2)
- Moser, Lukas**, German painter, ca 1430 摩色尔 154.3c
- Mozarab**, Christians in Spain under Arab rule, 9th to 15th century 莫扎勒布/摩尔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基督徒 84.2; Mozarab liturgy 礼仪 98.1
- Muenster**, [Monasterium], diocese ca 800 明斯特 81.1
- Murner, Thomas**, Franciscan related to the Jetzer case of 1509 穆尔内 145.2
- Mutianus, Konrad**, German humanist scholar, + 1526 慕提阿努斯 155.2
- mysteria**, [Mysterienspiele; moral plays], 道

- 德剧/宗教话剧 119.6
- mystica**, [*Mystik*; *mystic*], mystical experiences (voices or visions) and literature about these spiritual experiences; mysticism flourished since the 12th century 神秘主义/神秘神学/神秘文学 122 * ; 130.1; 133.5; 145.4ac; 146 * ; 152.1,5; 153.1; 154.2
- Narbonne**, French city, conquered by the Arab invaders after 718 纳博讷 84
- national church**, [*Nationalkirchentum*]; tendencies of kings to control the church in their dominion 国度教会 107.5; 140.3 * ; 150.3; 157.6; 158.5
- national synod**, [*Nationalsynode*]; synod of the Frankish kingdom 国度主教会议 95.3
- nepotismus**, [*Nepotismus*, *nepotism*], the tendency (of some Popes) to support relatives by providing benefices or offices for them 重用亲戚 125.2; 137.1,2; 139.5; 143.1; 156.3; 157.1-3.6
- Nestor**, Russian monk in Kiev, ca 1050 - 1114, "Father of Russian Historiography" 涅斯托尔 83.4
- Nestorians**, [*Nestorianische Kirche*, *Nestorians*, *East - Syrian Church*], spread to Central Asia, India and China but suffered under the Mongol invasions 聂斯托利派/东叙利亚教会(42.5; 54.5); 127.4
- Netter, Thomas**, 1370 - 1431, English theologian who refuted Wycliffe, he was given the title "doctor praestantissimus" 内特 147.2
- Neustria**, western part of the Frankish kingdom 诺斯提瑞亚 80.3
- Nicaea**, ecumenical synod of Nicaea in 787 尼西亚会议 91.2; 92.2 *
- Nicephorus**, [*Nikephoros*],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opponent of iconoclasm, exiled in 815, died 829 尼克弗若斯 91.2; 92.4
- Nicephorus I**, [*Nikephoros*], Byzantine Emperor 802 - 811 尼克弗若斯 92.2
- Nicetas**, legendary "pope" of the Cathars 尼克塔斯 113.2
- Nicetas Stethatos**, eminent monk in Studios (Constantinople), critical of the Latin Church; opponent of celibacy, ca 1050 尼克塔斯 94.2,3
- Nicolaitismus**, term for clerogamy, according to Rev 2: 6. 14 尼苛劳/尼哥拉主义 94.3; 102.3
- Nicolaus I**, [*Nikolaus*], Pope 858 - 867, the most outstanding Pope between 600 and 1070, he directed church life in Italy, France, Germany, he sent missionaries to Pannonia (*Methodius*) but faced resistance from Constantinople (*Photius*) 尼苛劳/尼哥拉/尼古劳 81.2; 83.2.3; 87.3 * ; 93.2; 102.1; 110.1; 111.1; 132.3;
- Nicolaus II**, [*Nikolaus*], Pope 1058 - 1061, originally Gerhard, Bishop of Florence, who decreed on the order of the election of the Pope and promoted reforms (Synod in the Lateran, 1059) 尼苛劳/尼哥拉 97.2; 98.1; 103.4,5 * ; 104.1; 117.1
- Nicolaus III**, [*Nikolaus*], Pope 1277 - 1280, from the Roman Orsini family with some political achievements, but prone to nepotism 尼苛劳/尼哥拉 125.2,3
- Nicolaus IV**, [*Nikolaus*], Pope 1288 - 1292, former Franciscan general, close ally of the Colonna family and therefore opposed to the Orsini 尼苛劳/尼哥拉 110.2f; 125.3 * ; 131.2e; 133.2

- Nicolaus V**, [Nikolaus], Pope 1447 - 1455, orig. Thomas Parentucelli, the first of the "Renaissance Popes", supported building activities in Rome and the Vatican Library 尼苛劳/尼哥拉 144.3.4 * ; 155.1; 156.1 *
- Nicolaus**, antipope 1328 - 1330 尼苛劳/尼哥拉 139.3; 151.1
- Nicolaus Cusanus**, [Nikolaus von Kues], 1401 - 1464, German cardinal, humanist scholar, important author, promotor of Church unity; left the Council of Basel in 1437 in support of the Pope 尼苛劳/尼哥拉 85.3; 87.4; 135.3e; 143.2; 144.3; 145.4bc * ; 156.1.2.4
- Nicolaus de Dinkelsbuehl**, professor of theology in Vienna, famous preacher, + 1433 尼苛劳/尼哥拉 153.1
- Nicolaus de Fluehe**, [Nikolaus von der Fluehe], St., Swiss hermit, + 1487, man of peace 尼苛劳/尼哥拉 146.4
- Nicolaus de Loewen**, priest of the Johannites, ca + 1380 尼苛劳/尼哥拉 146.4
- Nicolaus de Lyra**, French Biblical scholar, + 1349, professor in Paris, author of the *Postilla* (literal exegesis of the Bible) 尼苛劳/尼哥拉 145.5
- Nicolaus Mysticus**, nephew of Photius,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blamed Emperor Leo VI, was deposed but restituted in 911 尼苛劳/尼哥拉 93.5
- Nicolaus de Pilgram**, Husitic bishop of the Taborites who came to the Council of Basel in 1433 尼苛劳/尼哥拉 148.5
- Nider, Johannes**, German Dominican, + 1438, mystical author, reformer of the Dominican order 尼德尔 146.4; 151.2; 158.2
- Nilus Minor**, Abbot and monk in Italy, founder of Grottaferrata, + 1005 尼卢斯 101.4
- Nogaret, Wilhelmus**, [Guillaume de Nogaret], French Chancellor of Philipp the Fair; he captured Boniface VIII in Sept. 1303 诺加雷 137.4; 138.2
- Nolasci** = Ordo B. Marae Virgine de mercede redemptionis captivorum; 130.4
- nominalismus**, [nominalism], the theory that universal ideas only exist "nominally" and not "really", this school of thought was increasingly influential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the opposed theory is "realism" 唯名论 121.2,4; 145
- Nomokanon**, the legal code of the Greek Orthodox Church, attributed to Photius, but probably older 教会法典 91.2
- Norbertus**, [Norbert], St., Archbishop of Magdeburg 1126 - 1134, founder of a monastery at Premontre near Laon in 1120, mother-house of the Premonstratensians 诺伯特 106.2; 113.2; 114.1; 117.2 *
- Normanni**, [Normannen, Normans, Vikings], tribes in N Europe which invaded coastal areas in Western and even Southern Europe, especially in the 9th and 10th centuries 诺曼人 81.4 * ; 87.5; 88.1; 103.2,5; 104.4; 105.2
- Northumbria**, one of the early kingdoms in England 诺森伯兰 89.2
- Norway**, Christian missions in Norway started under King Hakon and Olaf Trygvason in the 10th century 挪威 81.3
- Notker Balbulus**, [Notker der Stammler], German monk, poet, composer in St. Gallen 840 - 912 诺特克尔 89.5
- Notker Labeo**, [Notker Teutonicus], monk in St. Gallen, writer and teacher, translator of Latin works into German + 1022 诺特克尔 89.5

Notker de Liege, [Notker of Luetlich], Bishop of Liege, founder of a school, + 1008 诺特克尔 89.5

Nowgorod, city in Russia 诺夫哥罗德 83.4

oblatus, [oblatus], a child offered to a monastery by his/ her parents, a practice already recognized in St. Benedict's Rule; see also "conversi" 被奉献者 151.3b

observantes, [Observanten], a group of Franciscans 方济各会守规派 151.1,2

Occam, Wilhelmus de, [William of Occam], Franciscan philosopher and theologian 1295 - 1349, exponent of nominalism, denied the rationality of faith, fled from Avignon to Louis IV's court in 1328 奥康的威廉 139.2; 145.3 *

Oderic = Odoricus

Odilo, Abbot of Cluny 994 - 1048, called "Archangel of the Monks", introduced the feast of the commemoration of the deceased 欧迪罗 100.1, 101.3; 102.2

Odilo, Duke of Bavaria, asked Boniface to organize the Church of Bavaria in 738 欧迪罗 79.2

Odo, Abbot of Cluny 927 - 942 欧多/奥多 101.3

Odo, Bishop of Lucca, + 1146 欧多/奥多 121.6

Odoricus de Pordenone, St., Italian missionary in China, 1286 - 1331 和理德 127.4

Ohrdruf, monastery, close to Gotha, Germany, founded by Bonifatius ca. 730 欧得儒夫 80.2

Olaf Haraldson, / Olaf the Saint (national saint of Norway), King of Norway and Sweden 1014 - 1030, who promoted

Christianity in Norway with the help of Anglo-Saxon missionaries 奥拉夫 81.3

Olaf Trygvason, King of Sweden and Norway 995 - 1000 who was baptized in England 奥拉夫 81.3

Oldenburg, town in N Germany 奥尔登堡 82.5

Olga, (= Helena) widow of King Igor of Kiev, baptized in 954 奥尔加 83.4

Olivetani, [Order of Our Lady from the Mount of Olives], a reformed Benedictine congregation founded 1313 in Siena, Italy 橄欖山会 151.3b

Olivi, Petrus Johannes, Italian Franciscan, controversial author, leader of the Spirituales, + 1298 欧利维 131.1

Onus ecclesiae, [Burden of the Church], reform document of 1519, influenced by Joachim's thought, probably written by a German bishop《教会的负担》158.4

ordalium, ordalium, [Gottesurteil, ordeal], pagan custom, the attempt to find out the guilt of a person by submitting him/her to some test, or a duel; the outcome was seen as "decision of God" 神的裁判 102.1

ordines, ordines minores, ordines maiores, [minor/ major orders], the grades of the Christian ministry; the so-called minor orders were door-keeper, acolyte, lector, exorcist; the major orders were subdeacon, deacon, priest, bishop 品位/小品/圣秩圣事

Ordo Beatae Mariae Virginis de mercede redemptionis captivorum, [Mercedarians, Nolasci], congregation founded in 1222 with the aim of freeing slaves 慈母会 130.4

Ordo Cisterciensis, OCist, [Zisterzienser, Cistercians], a monastic order based on the Benedictine tradition, it began as a reform

- movement in 1098, flourished in the 12th and 13th centuries, in particular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St. Bernard of Clairvaux. They promoted a return to the strict, more literal observance of Benedict's Rule. The mother house of many affiliated monasteries was in Citeaux. 熙笃会 101.3; 107.3; 108.1,2; 116.3,4 * ; 120.2; 130.1; 133.7; 151.1,2
- Ordo Fratrum Minorum, OFM** = Franciscani
- Ordo Hospitalis** = Hospitaller
- Ordo Praedicatorum, OP** = Dominicani
- Ordo Sancti Augustini, OSA**, [Hermits of St. Augustine], monastic congregation founded in 1256, based on the rule of St. Augustine 圣奥古斯丁会 130.3
- Ordo Sancti Benedicti, OSB**, [Benediktiner, Benedictines], founded ca in 529 in Italy by Benedict of Nursia through his Rule (Regula), hugely influential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monastic culture, education and scholarship 本笃会/本尼狄克修会 101; 115; 116; 151.1,2
- Ordo Sanctissimae Trinitatis de redemptione captivorum**, [Trinitarians], founded in 1198 in France by St. Johannes de Matha and St. Felix de Valois, main aims: freeing of captives and medical service 圣三会, 117.3a
- Ordo Teutonicus**, [Deutschorden, Teutonic Knights], founded ca in 1190, they occupied Prussia after 1226 条顿骑士团 118.4 * ; 127.2,3
- organum**, [Orgel, organ], musical instrument used in churches, possibly developed from instruments that came to the Franks from Byzantium in 757 and 812 管风琴 98.5
- Orsini**, Roman aristocratic family, opposed to the Colonna family in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y 欧尔西尼家族 125.2,4; 139.6; 157.1
- Orsini, Matthaeus**, Roman senator who influenced the papal election of 1241 欧尔西尼 124.4
- Orthodoxia, festum** = Festum Orthodoxiae
- Ortlieb**, originator of a heresy in Strasbourg, ca 1215 欧尔特里布 131.2a
- osculatio pedum**, [kiss of the feet], an expression of respect, sometimes performed when greeting the Pope 亲脚礼 111.4
- Osnabruock**, diocese since ca 800 奥斯纳布吕克 81.1
- Otfried de Weissenburg**, monk in Fulda, author of a Book of the Gospels, ca 800 - 870 奥特弗里德 89.4
- Othmarus**, [Otmar], St. Othmar, abbot in St. Gallen, ca 700, 欧特马尔 79.1
- Otloh**, Monk in St. Emmeram, Regensburg, author of theological literature, ca +1070 欧特罗 89.6
- Otto I Magnus**, [Otto the Great], German King 936 - 973, he defeated the Huns in 955, was crowned Emperor in Rome in 962; he confirmed the position of the Pope in Italy. 奥托 82.3 - 6; 88.3 - 5 * ; 97.1.2
- Otto II**, German Emperor 973 - 983, who died in Rome at the age of 28 奥托 88.5,6
- Otto III**, German Emperor 983 - 1002, who influenced the papal election in 996 and was crowned emperor the same year, founded archdioceses in Poland and Hungary but was forced to flee Rome in 1001 together with Pope Silvester II 奥托 82.4; 88.6 * ; 101.4
- Otto IV de Brunsvic**, [Otto von Braunschweig], King of Germany 1198 (1208) - 1215, crowned Emperor in 1209

- 奥托 123.3 * ; 125.1
- Otto de Bamberg**, St., Bishop, + 1139; invited by Boleslaw to do mission work in Pomerania 1124 - 1128 奥托 108.3
- Otto de Freising**, bishop, historian, 1111 - 1158.奥托
- Otto de Passau**, German spiritual author, ca. + 1386 奥托 146.4
- Oxford**, University established in the 13th century as one of the earliest universities of Europe; emphasized philosophy of nature and sciences 牛津大学 134.1; 135.3a; 147
- Paderborn**, German town, established as diocese ca in 800 帕德博恩 81.1
- Padua**, the University of Padua (Italy) was a center of humanist studies 帕多瓦 155.1,3
- paenitentia** = poenitentia
- pallium**, [Pallium], honorary white stole sent to archbishops; later also a source of income for Rome 白羊毛披肩带 110.2e; 110.2f; 140.1; 143.2
- Papa**, [Papst, Pope], the word meaning "father" was originally a term for any bishop, but later became the exclusive title of the bishop of Rome, who as the successor of St. Peter was regarded as the chief Bishop of the Church. The Pope had dominant influence in the governance of the (Western) Church. 教宗/教皇
- papalis electio**; [papal election], the process of appointing a new Pope; Nicolaus II decreed in 1059 that only cardinals could elect the Pope, since then the people of Rome and other clergymen had only the right of acclamation. 选择教宗/教皇的过程 85.4; 87.6; 103.3,5 * ; 105.6; 107.4; 125.1
- Papebroch, Daniel**, historian who doubted the historicity of a Carmelite tradition, after 1668 帕佩布若克 130.2
- Parentucelli** = Nicolaus V
- Paris**, university of Paris, founded ca 1200, emphasized philosophical studies 巴黎大学 134 * ; 135; 139.2,3; 141.3
- parodia**, [parody], satires and parodies ridiculing Church and clergy 讽刺 119.7; 136.3
- Pascalis I**, Pope 817 - 824, who crowned King Lothair in 823 帕斯卡利斯 81.2; 86.6; 92.5
- Pascalis II**, Pope 1099 - 1118, he opposed lay investiture and was taken prisoner in 1111 by Emperor Henry V 帕斯卡利斯 105.1,4,5;
- Pascalis III**, antipope 1164 - 1168 帕斯卡利斯 107.3
- Paschasius Radbertus**, Abbot of Corbie, writer, + 856 帕斯卡修斯 89.4; 90.5
- Passagi**, small sect in N Italy, ca 1180 - 1200 帕撒格 113.3
- Passau**, city and diocese in S Germany; the bishops of Passau were quite influential since the 9th century 帕骚 79.2; 82.2
- Pataria**, lay movement in Milan after 1050, they demanded ecclesiastical reforms 帕塔利亚 103.6. * ; 104.4
- Patrimonium Petri**, Legacy of Peter, estates (mainly in central Italy)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Popes 圣伯多禄/彼得的遗产 85.1
- Patricius Romanorum**, [patron of Rome], title of Pippin confirmed by the Pope in 754, later of Charlemagne 罗马人的保护者 85.2; 86.4
- patrocinium**, [patron feast of a church], reports about the dedication of a church are important historical sources 主保节日 100.3

- patronus**, [Patron], protector, founder or patron of a church who enjoyed certain rights 主保 96.3
- Paulani** = Fratres Minimi
- Pauliciani**, sect of the 9th century, which originated in Armenia 保利基阿尼 91.2.3 * ; 92.6
- Paulinus de Aquileia**, scholar at Charlemagne's academy, patriarch of Aquileia, + 802 保利努斯 89.3; 90.2
- Paulus I**, [Paul], Pope 757 - 767, who continued to develop the relationships to the Franks 保禄/保罗 85.3,4
- Paulus II**, [Paul], Pope 1464 - 1471, originally Cardinal Barbo, who tried to counteract Turkish aggressions; he also suppressed the Roman Academy 保禄/保罗 110.2d; 133.7; 148.6; 152.2; 155.3; 156.5 *
- Paulus III**, [Paul], Pope 1534 - 1549, maecen of Michelangelo 保禄/保罗 154.3b
- Paulus IV**, [Paul], Pope 1555 - 1559 保禄/保罗
- Paulus V**, [Paul], Pope 1605 - 1621 保禄/保罗 104.5
- Paulus de Bernried**, [Paul], biographer of Pope Gregory VII 保禄/保罗 104.5
- Paulus de Burgos**, [Paul], Spanish bishop and exegete, + 1435 保禄/保罗 145.5
- Paulus Diaconus**, [Paul], monk in Monte Cassino, later at Charlemagne's academy, writer, historian, + 799 保禄/保罗 89.3; 98.4
- Paulus de Populonia**, [Paul], Bishop of Populonia, sent from Rome to Bulgaria in 866 保禄/保罗 83.3
- Pavia**, town in North Italy, capital of the Lombards until 774, place of synods (1160, 1423) 帕维亚 107.3; 143.1
- Pazzi**, clan in Florence 帕基 157.1
- Pecha, Peter Ferdinand**, Spanish founder of a Hieronymitae congregation in 1370 佩卡 151.3c
- Pelagius**, Papal legate, leader of a crusade to Egypt, 1218 - 1221 佩拉格乌斯 126.2
- penitence** = poenitentia
- Pentapolis**, area in the Papal States east of Rome 五城区 85.2; 123.2
- peregrinatio**, [pilgrimage], a journey abroad or to a holy place for the purpose of worship, thanksgiving or doing penance (indulgences); the most famous pilgrim destinations were the Holy Land, Rome and the shrine of St. James at Compostela (northern Spain). 朝圣 100.3; 158.1,2
- Peters, Gerlach**, Dutch mystic, + 1411 佩特尔斯 146.5
- Peterspfennig**, a kind of (symbolic) tribute paid to Rome by some countries (England, Poland, Denmark, etc.) 伯多禄税 81.2; 82.4; 110.2f
- Petrarca**, [Petrarch], Italian humanist scholar and poet, 1304 - 1374, lived as a cleric of minor orders at the Papal court of Avignon for ca 18 years, supported Cola di Rienzo (1347) and the return of the Pope to Rome 彼特拉克 139.6; 155.1 *
- Petrobrusiani**, followers of Petrus de Bruys, 12th ct 伯多禄/彼得·布汝西阿尼 113.3
- Petrucchi, Alfonso**, Cardinal, planned to kill Pope Leo X, was executed in 1517 佩特鲁基 157.6
- Petrus d' Ailly** = Peter of Ailly 见 Ailly
- Petrus**, [Peter], Archbishop of Amalfi, one of the legates sent to Byzanz in 1054 伯多禄/彼得 94.3

- Petrus**, [Peter, Pierre], of Amiens, hermit, one of the crusade - preachers after 1095, allegedly the originator of the crusade movement 伯多禄/彼得 109.1
- Petrus**, [Petros, Peter], Patriarch of Antiochia, tried to restore unity between East and West after 1054 伯多禄/彼得 94.3
- Petrus II de Aragon**, [Peter], King of Aragon, made strict laws against heretics in 1197 伯多禄/彼得 114.3; 123.4
- Petrus III de Aragon**, [Peter], King of Aragon, King of Sicilia 1282 - 1286 after the insurrection of Sicilia against the Anjou - regime in 1282 伯多禄/彼得 125.3
- Petrus Aureoli**, [Peter], Franciscan theologian, +1322, bishop of Aix, exponent of nominalism 伯多禄/彼得 145.3
- Petrus de Bruys**, [Peter, Petrobrusianus], heretic priest, burnt to death by the people of St. Gilles, Arles, in 1133 伯多禄/彼得 113.3
- Petrus de Castelnau**, [Peter], Cistercian, papal legate, killed in 1208 in Toulouse, which triggered hostilities against the Albigenses 伯多禄/彼得 132.1
- Petrus Damiani**, [Peter], Italian reformer, monk, 1057 cardinal bishop of Ostia, papal legate in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penitence preacher, wrote against marriage of the clergy, + 1072 伯多禄/彼得·达米阿尼 89.6 * ; 101.4; 102.3; 103.4; 117.1
- Petrus Hispanus**, [Peter], = Pope Johannes XXI 1276 - 1277, from Portugal, author of *Summulae logicales*, professor in Paris and Siena, medical expert, later cardinal and Pope 伯多禄/彼得 125.2; 135.3f * ; 145.3
- Petrus Lombardus**, [Peter], Italian scholar, 1100 - 1160, teacher at Paris, author of a famous collection of maxims of theology (*Libri IV Sententiarum*) 伦巴第人伯多禄/彼得 91.2; 118.1; 121.6 * ; 135.2a; 145.2
- Petrus de Luna**, [Peter] = Pope Benedict XIII 伯多禄/彼得 141.3,4
- Petrus Nolascus**, [Peter], St., + 1256, co-founder of the Mercedarians (founded 1222 at Barcelona) 伯多禄/彼得 130.4
- Petrus Philargi**, [Peter], = Pope Alexander V 伯多禄/彼得 141.4; 145.4a
- Petrus de Pisa**, [Peter], Italian grammarian and scholar at Charlemagne's academy, ca + 799 伯多禄/彼得 89.3
- Petrus de Poitiers**, [Peter], theologian in Paris, + 1205 伯多禄/彼得 119.5
- Pfalz**, area in Germany 法耳次 79.1
- Pfefferkorn, Johannes**, a converted Jew in Cologne who attacked Jewish books and Jewish studies in 1509 普费费尔孔 155.4
- Philargi, Petrus** = Alexander V 斐拉基 145.4a
- Philippus de Suabia**, [Philip] son of Frederick I Barbarossa, German king 1198 - 1208, faced opposition from Otto IV 菲利普 123.3; 126.2
- Philippus I**, [Philip], French king 1060 - 1108, negotiated with Urban II in 1098 about investiture issues 菲利普 105.4
- Philippus II Augustus**, [Philip], King of France 1180 - 1223, who started the third crusade together with Richard I of England in 1190 菲利普 109.3; 123.3,4; 132.1
- Philippus IV**, [Philippe le Bel, Philip the Fair], King of France 1285 - 1314, he had a conflict with Pope Boniface VIII, expelled Jews, persecuted the Templars and confiscated their possessions, and his pressure was one factor in the move of the

- Roman curia to Avignon (1309) 菲利普 125.4; 137 * ; 138.1 - 4; 140.3
- Philippus VI**, [Philip], French king 1328 - 1350, tried to negotiate between the Curia and Louis the Bavarian in 1341 菲利普 139.3,4
- Philippus Benizzi**, [Philip], St. , fifth general of the Servites, founded the Servite Sisters; + 1285 菲利普 130.5
- Philippus Neri**, [Philip], St. founder of the Oratorians, + 1595, admirer of Savonarola 菲利普 157.4
- Photius**, [Gr: Photios], 810 - 897, (St.)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858 - 867 and 877 - 886; he sent Cyril and Methodius to Moravia and broke off relations with Rome in 867; he was an eminent scholar, author of the *Bibliotheca*. 佛提乌斯/傅丢斯 83.2; 87.3,5; 89.4; 91.2; 93 * ; 94.2,3
- Piccolomini, Enea Silvio de**, [= Pius II], humanist scholar in imperial services before 1455; see Pius II 皮科罗米尼 87.2; 144.3; 155.2
- pictura**, Christian paintings 教会绘画艺术 98.6; 120.4; 133.9; 154.3
- Pierleoni**, Roman family influential in the 12th century 皮尔雷欧尼 106.2
- pilgrimage** = peregrinatio
- Pilgrim**, Bishop of Passau 971 - 991, sent missionaries to Hungary 彼利基姆 82.6
- Pippinus**, [Pepin the Second], father of Charles Martell, first a kind of administrator (Maiordomus), then Duke (Dux Francorum) 688 - 714, supporter of Willibrord 丕平 80.1
- Pippinus**, [Pippin, Pepin the Short], father of Carolus Magnus, king of the Franks 751 - 768, he received anointment from St. Boniface, was anointed by Pope Stephen II in 754, expelled the Langobards from Ravenna and donated the area to the Pope 丕平 80.3; 85.1.2 * ; 86.1,3; 96.1; 98.5
- Pirminus**, [Pirmin], St. , itinerary bishop, + 753, founder of the monastery in Reichenau, 皮尔明努斯 79.1
- Pirstinger, Berthold**, [Puerstinger], Bishop of Chiemsee, + 1534, urged reforms in his *Onus ecclesiae* 皮尔斯丁格 158.4
- Pisa**, town in Italy, place of a general council in 1409 比萨 141.1 * ; 145.4a; schismatic Synod of Pisa of 1511: 157.5
- Pisano, Giovanni**, Italian artist, father of Andrea Pisano 皮撒诺 133.9
- Pisano, Andrea**, Italian artist, + 1349 皮撒诺 154.2
- Pius II**, Pope 1458 - 1464, originally Enea Silvio Piccolomini, brilliant humanist, historian, secretary of Emperor Frederick III, in his pontificate he organized resistance against the Turks, he also tried to tackle Church reforms. 比约/庇护 117.3c; 145.4c; 156.4 *
- Pius III**, Pope 1503 比约/庇护 157.5
- Pius V**, Pope 1566 - 1572 比约/庇护 98.2
- Pius XI**, Pope 1622 - 1630 比约/庇护 151.3c
- Placet**, approval, the right of approval, usually the right of a king to approve (or disapprove) papal decisions or documents 批准权 158.6
- plaga**, [Pest], bubonic plague, " black death ", the worst outbreak happened in the years 1348 - 1350, which possibly killed a third of the European population 鼠疫 139.5; 150.1; 152.3
- plastica**, [Plastik], sculpture, part of Christian art 雕像 98.6; 120.4; 133.9; 154.2
- Plato**, Greek philosopher, 427 - 347AD, whose

- influence o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thought was profound 柏拉图 121.2.5; 135.2d; 155.1,3
- Plethon, Gemistos**, Byzantine scholar who promoted Platonism in Italy, + 1452 普莱顿 155.1
- Podiebrad, Georg**, Bohemian King 1458 - 1471, former Husite leader, he was deposed by Pope Pius II in 1466 波迪布拉德 148.6
- poenitentia**, [Busse, penitence], penitential practices, usually fasting, praying, pilgrimages, giving alms or donating money to beneficial projects and churches 忏悔/悔罪/补赎 91.1; 99; 119.4,5
- poenitentiaria**, an office at the Roman Curia 补赎法院 110.2bd
- Poggio Bracciolini**, Italian humanist scholar, + 1459 波焦 155.1
- Poitiers**, town in France, where Charles Martell stopped Arab invaders in 732 普瓦捷 84.1
- Poland**, mission area in the 9th, 10th century, see King Miesko 波兰 82.4
- Polo, Marco**, 1254 - 1324, Italian merchant, who was in Mongol China, his report about China became very famous 马可·波罗 127.4
- Pomerania**, [Pommern], border area between Germany and Poland at both sides of the Oder River, successful mission activities in the 12th century 波美拉尼亚 82.4; 108.3
- Pomponatus, Pietro**, [Pomponazzi], + 1525, Italian humanist, who denied the unity of theological truth and philosophical truth 蓬波纳齐 155.3
- Pomponius Laetus**, Italian humanist, founded the Roman Academy ca in 1460 彭波尼乌斯 155.3; 156.5
- Pope** = Papa
- Porcaro, Stefano**, Italian aristocrat who planned an attack on Nicolaus V in 1454 波卡若 156.1
- Portiuncula**, chapel in Italy where St. Francis got his vocation; after 1270 the practice of "Portiuncula - indulgences" emerged later "小块教堂" 129.1,2
- Portugal**, the fate of the Church in Portugal was in many ways dependent on the situation in Spain 葡萄牙 109.5; 118.5; 138.4; 150.3; 157.3
- Posna**, [Poznan, Posen], city in Poland, first Polish diocese, established in 968 波兹南 82.4
- Postilla**, commentaries on the Bible were called postilla, especially the one of Nicolaus of Lyra 波斯提亚 145.5; 153.2
- praebenda**, [Pfruende, prebends], property of a monastery, sometimes divided among the monks 修院财产 151.1
- praedestinatio**, [predestination], controversy about predestination 预定论 90.4
- praedicare**, [Predigt, preaching], important means of spreading the gospel or of converting heretics; the Dominicans were founded as an "Order of Preachers" 讲道/布道 98.4; 133.3; 153.1; 158.1,4
- praedicatores, Ordo Praedicatorum** = Dominicani
- praedicatura**, office for a good preacher; many of these preaching posts were established in Germany (Wuerttemberg) ca in 1400 讲道职位 153.1
- Praemonstratenses**, [Norbertines, Order of Premontre], founded by St. Norbert in 1120 at Premontre (Laon); their dress is white 普雷蒙特会 101.3; 108; 115.1; 117.2 *; 130.1
- Praepositinus**, ca 1180 - 1200, theologian,

- teacher at Paris and Mainz, tried to convert sect members in Italy 普瑞波西提努斯 113.3
- praepositus**, praelatus, [D: Propst; E: prelate], superior of an ecclesiastical (canonical) community (圣职团的) 长上 95.4; 117.2
- Praga**, [Prag, Prague], city in Bohemia, diocese since 973; first university (1348) in the German speaking countries 布拉格 82.3; 139.5; 148.1,2; 148.5; 154.3c
- Pragmatic Sanction of Bourges**, a set of rules proclaimed as law by King Charles VII of France in 1438 after a synod of the French clergy; the law tried to restrict papal powers in France and formed the basis of the gallicanism of later centuries 布尔日国事诏书 140.3; 144.2 *; 156.4; 157.6
- presbyter**, [Priester, priest], a man who held an office in the Church, working under the guidance of a bishop 司铎/神父
- Pribizlaw**, ruler of the Wendes north - east of Germany, who was baptized after 1150 皮比拉夫 108.2
- prior**, the second in command after the abbot (in a Benedictine monastery); also the head of a religious community that did not have the legal status of a monastery 隐修院副院长
- privilegium fori**, [privilege of the court], the privilege of clergymen to be judged at ecclesiastical courts 法院的特权 95.2; 107.5
- Proclus**, Neoplatonic philosopher, 410 - 485 普罗克洛斯 146.1,2
- procuratio**, arrangements of ecclesiastical offices 预先安排 140.1; 142.4
- Prokop**, one leader of the Hussites, invited to the Council of Basel in 1433 普若克普 148.4,5
- Proprietary churches / monasteries** 见 Ecclesia propria
- Propst** = praepositus
- Prouille**, mission station founded in 1207 by St. Dominic 普若伊 130.1
- Provence**, area in SE France 普罗旺斯
- provincialis synodus**, council of an ecclesiastical province 教省主教会议 95.3
- provisiones**, [provisions], taxes or fees for services of the Curia 教廷费 110.2fg; 140.2; 144.2; 158.4
- Prudentius de Troyes**, Bishop of Troyes, France, ca 850 普卢登提乌斯 90.4
- Prussia**, [Preussen; Lat. Borussia], the area between Weichsel and Memel, Livland 普鲁士 108.4; 118.4; 127.2 *
- Pseudo - Dionysius Areopagita**, author of very influential theological texts, ca 500; according to medieval tradition a disciple of St. Paul who heard him at the Areopagus in Athens 伪丢尼修斯 89.4; 122.1; 135.2bc, 3af; 145.4c; 146.1,2
- Pseudo - Isidorianae Decretales**, forged decretals from the 9th century, important information about canon law principles 伪伊西多尔教令集 85.3; 87.3.4 *; 91.3; 95.1; 101.3; 110.1
- Puerstinger** = Pirstinger
- Pullani**, children of the crusaders in Palestina 普拉尼 109.1
- Pulleyn, Robert**, [Pullus], English scholar, + 1146, professor at Oxford, Paris, later cardinal 普莱因 121.6
- purgatorium**, [Fegfeuer, purgatory], discussed in Florence 1439 炼狱 144.1
- Pyrenaei montes**, [Pyrenaeen, Pyrenees], mountain range between Spain and France 比利牛斯山脉 84

- Quadragesima**, forty days of fasting, season of lent 四旬斋期 99.1; 100.2
- Quadrivium**, the four arts of arithmetica, geometria, astronomia, musica, which formed the seven liberal arts together with the Trivium (grammatical, logica, rhetorica) 四科 88.7
- Quaestores**, medieval collector of alms, sometimes notorious for their rough methods 收施舍的人 133.2
- Quatemberfasting**, a special kind of fasting at four seasons 四次守斋期 100.2
- Quedlinburg**, nunnery in Germany, founded in the 10th century, a place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奎德林堡 89.5
- Quierzy**, treaty of Quierzy from 754, a compactation between Pope and the Frankish King 克尔西条约 85.2,3
- Rabanus Maurus**, [Hrabanus], Abbot of Fulda, 780 - 856, important educator and author 拉班努 89.1,4 * ; 90.4,5
- Rachis**, king of the Langobards, deposed by Austulf in 749 拉赫斯 85.2
- Radbod**, king of the Frisians, + 719 拉得博得 80.1,2
- Radewijns, Florentius**, Superior of the Brothers of Common Life, 1350 - 1400 拉德温斯 151.3a
- Raffaello Santi** = Raphael
- Raimundus de Capua**, [Raymund of Capua], Dominican general superior, + 1399, biographer of St. Catherine of Siena 瑞孟多/赖孟多 151.2
- Raimundus Lullus**, [Ramon Lull], Spanish Franciscan Tertiari, 1235 - 1316, promoted mission among the Muslims and language studies, author of ca 300 works in Latin, Arab and Catalan language 瑞孟多/赖孟多 127.5; 135.3e * ; 145.4c
- Raimundus de Pennaforte**, [Raymund de Penafort], St. , 1175 - 1275, Dominican scholar and canonist, general of his society 1238 - 1240, co - founder of the Mercedarians 瑞孟多/赖孟多 110.3; 119.5; 130.4 *
- Raimundus du Puy**, [Raimund of Puy], Superior of the Hospitallers 1120 - 1160, he wrote a rule for them 瑞孟多/赖孟多 118.2
- Raimundus de Sabunde**, [Raimund, Raymond], Spanish philosopher, theologian, physician, ca + 1450 瑞孟多/赖孟多 145.4c
- Raimundus VI**, Count of Toulouse, supporter of the Albigenses, ca 1200 瑞孟多/赖孟多 132.1
- Rainaldus de Dassel**, [Rainald], Chancellor of Frederick I 1156 - 1167, influenced the anti - papal policy of the Emperor 莱纳尔德 107.2
- Raphael**, [Raffaello Santi], Italian painter, 1483 - 1520, famous for religious motives 拉斐尔 154.3b
- Rastislaw**, Moravian King 846 - 870 拉斯提拉夫 83.2
- Rather**, Bishop of Verona and Luettich, important author, + 974 拉特尔 89.5; 102.3
- Rathramnus**, monk in Corbie (Germany), writer, ca + 868 拉特兰努斯 89.4; 90.4,5
- realismus**, school of thought in scholasticism, taking universal concepts for really existing 实在论 121,2; 145.4
- redemptio**, redemption 救赎 99.3 * ; 119.4
- Regensburg**, town and diocese in Germany, important center of the Church 雷根斯堡

- 79.2
- Regino de Pruem**, Abbot of Pruem (Eifel), historian, +915 瑞格诺/雷吉诺 87.3; 89.5 *; 95.3; 102.1; 158.2
- regulares**, [regular clergy] monks, canons, friars and other clergymen who lived in communities under a rule; see clerici regulares
- Reichenau**, famous monastery in southern Germany 赖兴瑙 79.1 *; 89.3; 98.6; 151.1
- reliquiae**, [Reliquien, relic], an object venerated by believers because it was associated with a saint; the relics were often a part of the saint's body, a mantle or a book kept in a shrine (reliquary) 圣物/圣髑 100.3; 133.6; 158.2
- religio regis**, [Landeskirchentum], control of the local church by the secular ruler 地方教会受本地统治者的管理 107.5; 140.3; 144.2; 158.5 *
- Remi**, [Rheims], town and episcopal see in the NE of modern France 兰斯
- Remigius**, Bishop of Lyon, ca 850 瑞米格乌斯 90.4
- Renaissance**, [It: rinascimento], revival of classical learning, especially of classical Greek and Latin studies, see: humanism 文艺复兴 154; 155 *
- Rene**, Count of Anjou, in 1442 he was defeated by his rival for the crown of Naples, Alphonse V of Aragon 瑞内 144.3
- reservatio**, reservation of benefices 保留采邑 110.2g; 140.2 *; 143.2; 144.2,4; 158.5
- Reuchlin, Johannes**, German humanist scholar, Hebraist and Grecist, 1455 - 1522, author of the first textbook for classical Hebrew, *De rudimentis hebraicis* (1506) 瑞克林 145.5; 153.1; 155.2
- Riario, Pietro; Riario Girolamo**, nephews of Sixtus IV, their greed and recklessness influenced the pope's policies 瑞阿瑞欧 157.1
- Richard I Coeur de Lion**, [Richard Lionheart], King of England, 1189 - 1199, captured in Austria 1192 on his return from a crusade, ransomed in 1194 理查德 107.8; 109.3; 123.4
- Richard II**, [Richard], King of England, married Anna of Luxemburg (the sister of the king of Bohemia) in 1382 理查德 148.1
- Richard de Cornwallis**, [Richard], elected by the Cologne faction to be German King in 1256 理查德 124.7
- Richard de St. Victor**, [Richard]; important mystical writer, +1137 理查德 122.3
- Richardus de Aversa**, Norman count in Capua, ca 1059 理查德 103.5
- Riemenschneider, Tilman**, German artist, + 1531 里蒙施内德 154.2
- Riga**, archdiocese of Riga, center of mission activities in the 12th and 13th centuries 里格 127.1,2
- Rimbertus**, [Rimbert], Archbishop of Bremen, missionary in Denmark and Sweden, 865 - 886 林伯特 81.2
- Robbia, Lucca della**, Italian artist, +1482 罗比亚 154.2
- Robertus**, [Robert], King of Naples, regent of the Papal estates in Italy in 1317 罗伯特 127.5; 138.2; 139.1,3; 155.1
- Robertus Guiscard**, [Robert], Norman Duke, enfeoffed by the Pope with Apulia, Calabria, Sicilia in 1059 罗伯特 103.5; 104.5; 105.3
- Robertus**, [Robert], Norman leader = Rollo

- Robertus de Arbrissel**, [Robert], itinerary missionary and eminent preacher, he established the Order of Fontevault in 1100; died in 1117 罗伯特 114.1; 116.2b
*
- Robertus de Molesme**, [Robert] Abbot, who founded the reform monastery Citeaux (Cistercium) in 1098 罗伯特 116.3
- Robertus de Sorbon**, [Robert], 1201 - 1274, chaplain of Louis the Saint, founder of a college called "Sorbonne", later the name of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罗伯特 134.2
- Rodericus**, [Roderich, Rodrigo], King of the Visigotones (Spain), beaten by Muslim forces in 711 若得瑞克/罗德里格 84
- Rodolphus Glaber**, German author, +1056 若都尔夫 89.6
- Roger I**, Norman Duke, 1061 - 1101, who conquered Sicily from the Muslims in 1072 罗杰/若格尔 105.3
- Roger II**, Norman Duke in S Italy and Sicily 1101 - 1054, supporter of the antipope Anacletus II 罗杰/若格尔 106.2,3
- Rokycana, Johannes**, Leader of the Utraquistes, + 1471, after 1435 later archbishop of Prague but without Papal confirmation, 若克扎纳 148.5
- Roland Bandinelli** = Alexander III
- Rollo**, [Robertus], ca 860 - 936, leader of the Normans, pacified and baptized in 912, he was given a piece of land in the Normandy, where he founded a state 若罗 81.4
- Roma**, [Rom, Rome], center of Western Christendom, traditional seat of the Pope; religious, cultural, political center of Italy; conf. "Vaticanus", "Lateranus" 罗马 85.1; 98.1; Synod of 1412/1413: 142.1
- Romagna**, area at the NE coast of Italy, at times part of the Papal states 罗曼地区 125.2; 157.3,5
- Roman law; ius Romanorum**, Roman law, revived in the Middle Ages 罗马法 110.3; 158.5
- Romanus**, Pope 897 若马努斯 87
- Romualdus**, St., Bishop of Ravenna, friend of Otto III, founder of Camaldoli in 1012, from which developed the Camaldolese Congregation; + 1027 若姆阿尔德 88.6; 101.4 * ; 108.4
- Roscelinus**, [Roscelin of Compiègne], French theologian, 1050 - 1125, exponent of nominalism 洛色林 121.2,4
- Roswitha**, nun in Gandersheim, author of didactic plays written in Latin, +1002 罗斯维塔 89.5
- Rota Romana**, court of the Curia in Rome 罗马法院 110.2d
- Rothadius**, Bishop of Soissons, deposed in 862 若塔丢斯 87.3
- Rubruk** = Wilhelmus de Rubruk
- Rudolphus**, [Rudolf of Habsburg], Duke of Austria, King of Germany 1278 - 1291, recognized by the Pope but not crowned Emperor 鲁道夫/儒多尔夫 125.1,2
- Rudolphus IV**, [Rudolf], Duke of Austria 1358 - 1365, founder of the University of Vienna in 1365 鲁道夫/儒多尔夫 145.1
- Rudolphus**, Rudolph of Rheinfelden, rival king of Henry IV 1077 - 1080 鲁道夫/儒多尔夫 104.5; 106.1
- Rudolphus de Wied**, [Rudolf], Archbishop candidate for Trier in 1184 鲁道夫/儒多尔夫 107.6
- Rupertus**, [Hrodbert], St., of Worms, missionary in Salisbury, +722 儒佩特 79.2
- Rupertus de Deutz**, Benedictine Abbot, prolific

- writer, mystic, +1135 儒佩特 122.2
- Ruprecht I von der Pfalz**, German Kurfuere (elector), founder of the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in 1368 儒波瑞克特 145.1
- Ruprecht III**, King of Germany 1400 - 1410, who did not accept Pope Alexander V in 1409 儒波瑞克特 141.3.4; 142.1
- Rurik**, leader of the tribe of the Rus, +879 留里克/儒瑞克 83.4
- Rus**, Norman tribe which settled in Nowgorod and the Ukraine in ca 850 儒斯人/罗斯人 83.4
- Russia**, mission activities in the area since the 10th century; Olga, the widow of Grandduke Igor, was baptized in 954 俄罗斯 83.4 *; 104.1; 156.2
- Ruysbroek, Johannes**, [Ruisbruk], theologian 1293 - 1381, important mystic from Flanders, unjustly accused of pantheism in 1402 鲁伊斯布鲁克/鲁斯布鲁克 145.4a; 146.5 *; 151.3a
- Saale**, river in Germany 萨勒河 82.1
- Sachsen** = Saxones
- Sacramentarium Gregorianum**, Gregory's sacramentary 额我略/贵格利的经本 98.1
- sacramentum**, sacrament, concept of 圣事 119.1
- Saisset, Bernard de**, Bishop of Pamiers, arrested in 1301 塞色 137.3
- Saladin, Sultan**, Muslim leader, who ruled over Egypt, Damascus and Mesopotamia after 1171 - 1183 萨拉丁 109.2,3
- Salier**, Frankish dynasty of German Emperors (Conrad III, Henry III, IV), 1024 - 1125 撒里尔
- Salisburgum**, [Salzburg, Salisbury], town and diocese in Austria, founded by St. Rupert before 722 萨尔茨堡 79.2; 82.2
- Salomo III**, Abbot of St. Gallen, Bishop of Constance, 890 - 920 萨罗莫 89.5
- Salutati, Coluccio**, Italian humanist scholar, +1406 撒鲁塔提 155.1
- Salve Regina**, prayer, song, popular since ca 1100 “母后万福” (祈祷经文) 119.3
- Salviati de Pisa**, archbishop of Pisa, executed under Lorenzo de Medici after his assassination plans failed (1478) 撒尔维亚提 157.1
- sancti**, [Heilige, saints], exemplary Christians, traditionally respected or formally proclaimed saints by the Church authorities (“canonization”, first in 973); saints are commemorated or venerated by the believers; literature about them is called “hagiography” 圣人/圣徒 100.3; 133.6; 158.1,2
- satira**, [satires], about religious themes 讽刺诗 136.3; 158.4
- Savelli**, Roman aristocratic clan, Cencius Savelli = Honorius III 撒维利 124.2; 125.3; 143.1
- Savonarola, Girolamo**, Italian Dominican 1452 - 1498, preacher and influential reformer in Florence after 1491, later executed 萨沃那洛拉 157.4 *; 158.4
- Saxones**, [Sachsen, Saxons], a people in Germany, converted by force in Charlemagne's time 萨克森人 81.1
- Saxonia**, Saxony, [Sachsen], area in Germany 萨克森地区
- Sbinko**, Archbishop of Prague, who excommunicated Hus in 1410 斯宾科 148.2
- scapulare**, [Skapulier], monastic dress, of special importance for the Carmelites 圣衣 130.2
- Schiner, Matthaeus**, Swiss Cardinal, Bishop of Sitten, expelled the French from Lombardy

- in 1512 西内尔 157.5
- schisma**, [Schisma, schism], a formal split in the Church over a disagreement concerning a practice (not faith); the formal break between Roman Catholicism and the Greek Orthodox Church happened in 1054; the Great Schism (1378 - 1414) was the split in the Western Church between the Roman faction and the Avignon faction 教会分裂 94; 141; 142
- schola**, monastery schools 学校/隐修院学校 89.1,3; 134.1
- scholasticism**, [Scholastik, scholasticism], studies and academic work combining faith and reason, especially from the 12th to the 15th century; Thomas Aquinas is usually regarded as the most outstanding exponent of scholasticism; humanism was opposed to the dry and legalist method of scholastic reasoning 经院思想 89.6; 91.2; 121 * ; 135; 145 *
- Schongauer; Martin**, German painter, + 1491 雄高尔 154.3c
- Schwarzwald**, Black forest, area in Germany 黑林山 79.1
- Scotti**, [Schottenmoenche, Scottish monks], Congregation of Irish/Scottish Monks in Germany, founded in 1075 close to Regensburg, had 12 monasteries 苏格兰会 116.2c
- Segarelli**, Gerardus, Italian heretic, founder of the "Apostolici", ca 1260 色格瑞里 131.2e
- Sendgericht, Send**, [Lat: synodus], a kind of local court held at the annual visitation of the bishop 巡逻法庭/临时法庭 95.3 * ; 112.2; 119.5
- sententia**, [Sentenz, sentence], the scholastic way of discussing matters was to use authoritative sentences (statements, proposals); many collections of theological sentences were compiled in the Middle Ages 命题/论题 121.1,4
- Serbia**, area on the Balkans 塞尔维亚 83.2
- Sergius I**, Pope 687 - 701, he supported Willibrordus' mission 塞尔吉乌斯 80.1
- Sergius II**, Pope 844 - 847 塞尔吉乌斯 87.2
- Sergius III**, Pope 904 - 911 塞尔吉乌斯 88.2
- Sergius IV**, Pope 1009 - 1012 塞尔吉乌斯 88.7
- Sergius II**,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999 - 1019 塞尔吉乌斯 94.2
- Servatus Lupus**, Abbot of Ferrieres, + 862 塞瓦特 89.4; 90.4
- Serviti**, [Servi Beatae Mariae Virginis, Servites], an order founded in Florence by seven pious laymen in 1233; they accepted the rule of Augustine and developed also a branch of Servitian sisters 圣仆会 130.5
- servitia communia**, fees paid at the approbation or confirmation of an ecclesiastical office 就任税 110.2f; 140.1; 144.4
- servitudo**, [Sklaverei, slavery], serfdom and slave trading existed in the Middle Ages, but there were improvements; see: Trinitarii 奴隶 102.2
- Seuse** = Suso
- Sicilia**, island at the SW end of Italy, it was under Greek influence, then it became a fiefdom of the Pope, was occupied by Muslims, reclaimed by Normans (in 1072, see Roger I), then under German, French, Spanish influence 西西里岛 105.3; 106.2; 107.8; 109.5; 125.3; 144.3
- Siciliana Vespera**, [Sicilian Vesper], an insurrection of the locals against the French on the Easter Monday of 1282, the Sicilians voted for Peter III of Aragon although Pope Martin IV supported the House of Anjou 西西

- 里晚祷大屠杀 125.3
- Siena**, town in Italy, synod in 1423; painter school 锡耶纳 143.1; 154.3
- Siger de Brabant**, Philosopher in Paris, exponent of Averroism, +1282 希格尔 135.1
- Sigmund de Luxemburg**, German King and Emperor 1410 - 1437; promised to protect Jan Hus at the council of Constance 西格蒙德 142.1, 2 *; 143.1; 148.3, 4; 158.3; 158.4
- Sigmund de Tirol**, Count of Tyrol (Austria), who had a conflict with Nicolaus Cusanus in 1460 西格蒙德 145.4c
- Silesia**, [Schlesien], area in Poland 西里西亚 82.4
- Silvester I**, [Sylvester], St. Pope 314 - 335; according to medieval belief, Emperor Constantine had bestowed on him the rule over Italy and the western lands; this is the so-called "Donatio Constantini" 西尔维斯特 85.3
- Silvester II**, Pope 999 - 1003, the first Frenchman becoming Pope, originally Gerbert de Aurillac, advisor of Otto III, archbishop of Ravenna, eminent scholar; he had to flee from Rome in 1002 西尔维斯特 82.6; 88.6 *; 89.5
- Silvester III**, Pope in 1045 西尔维斯特 88.7
- Silvester IV**, Antipope 1105 - 1111 西尔维斯特 105.1
- Silvestrini**, Benedictine reform congregation, founded in the 13th century 西尔维斯特联合会 151.3b
- Simeon** = Symeon
- Simon de Montfort**, Count of Montfort, leader of the war against the Albigenses, +1228 西满/西门的孟福特
- Simon Stock**, first general superior of the Carmelites, 1242 - 1265 西满/西门·斯托克 130.2
- simonia**, [Simonie, simony], (derived from Simon the Magician, Acts 8:5 - 24), the buying or selling of Church offices or generally mingling the secular and sacred (see Investiture Controversy). It was one of the main problems of the medieval Church which needed reforms. 圣职买卖/圣物交易 88.7; 97.2; 101.3; 102.3 *; 103.1, 5; 104.1; 105.1; 142.4; 143.2
- Sistina** = Sixtina
- Sixtina**, [Ital. Sistina], chapel in the Vatican with famous paintings by Michelangelo and Raphael, sponsored by Pope Sixtus IV, Julius II and other "Renaissance" Popes 西斯提纳教堂 154.3b; 157.1
- Sixtus IV**, Pope 1471 - 1484, Francesco della Rovere, former general superior of the Franciscans; generous supporter of arts and sciences, builder of the Sistina Chapel whose image is tainted by nepotism 西克斯图斯 145.2, 4a; 150.3; 151.3c; 152.4; 157.1 *; 158.6
- Skanderbeg**, Duke of Albania, 1405 - 1468, originally George Castriota, repeatedly defeated the Turks from 1444 to 1466, went to Rome to ask for help 斯坎德倍 156.4
- Slavia**, mission in Slavic areas was successfully started by Cyril and Method; Slavic liturgy used the local language for celebrations 斯拉夫 82; 83; 83.2; 81.1; 98.1
- Soissons**, town in France, synod of 744 苏瓦松 80.3
- Sorbonne**, college in Paris, founded by Robert de Sorbon 索邦学院 134.2
- Sorores vitae communis**, [Schwestern des gemeinsamen Lebens], founded by Groote in

- the 14th century; see *Fratres vitae communis*
共同生活的姐妹 151.3a
- Spitigniew**, Duke of Bohemia, ca 895,
supporter of Christianity and German
influence 斯彼提涅夫 82.3
- spolia, ius spoli**, the right of the owner of a
church (see: *ecclesia propria*); after the
death of a cleric the church property falls
back to the former owner 产权 96.3; 107.7;
123.3; 140.1; 142.4
- Sprenger, Jacobus**, German Dominican, one of
the authors of the *Malleus Maleficarum*
(1487) 施普仍尔 158.2
- Staufer, Hohenstaufen**, German imperial
family, esp. Frederick I Barbarossa and
Frederick II 施陶费尔
- Stedinger**, [Stedingi, Stadingi], a tribe in
Frisia, were banned and defeated in 1234 施
特丁格 131.2c
- Steinbach, Wendelin**, German theologian,
student of Gabriel Biel 施泰因巴赫 145.4a
- Stelliferi**, [Kreuzherren vom roten Stern,
Carriers of the Red Star], Augustinian
canons in Bohemia, founded in 1234 红星十
字架会 117.2
- Stephanus II**, Pope 752 - 757, facing pressure
from the Langobards he went to Ponthion
(France) in 754 and secured the support of
Pippin 斯特凡努斯 85.2 * ; 111.4
- Stephanus III**, Pope 768 - 772, he was worried
about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Franks and
Langobards; he opposed the iconoclast
movement in the East 斯特凡努斯 85.4; 86.
3 * ; 92.2
- Stephanus IV**, Pope 816 - 817 斯特凡努斯
86.6
- Stephanus V**, Pope 885 - 891, who was under
severe pressure from Spoleto 斯特凡努斯 83.
2; 87.6 * ; 102.1
- Stephanus VI, VII, VIII**, Popes in the 9th and
10th century who were exposed to the power
struggles of Roman nobles 斯特凡努斯 87.6;
88.2
- Stephanus IX**, Pope 1057 - 1058, originally
Frederick of Lorraine, he was a reformer
supported by Hildebrand; he nominated
Petrus Damiani Bishop of Ostia and cardinal
斯特凡努斯 94.3; 103.4 *
- Stephanus**, [Stephan, Stephen], St., King of
Hungary 997 - 1038, decisiv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urch in Hungary 斯特
凡努斯/斯德望/司提反 82.6
- Stephanus Abbas**, abbot in the Greek church,
he was killed in 764 for defending icons 斯特
凡努斯 92.2
- Stephanus de Autun**, + 1140, Bishop of
Autun, theologian; possibly the first to use the
term "transsubstantiatio" 斯特凡努斯 119.2
- Stephanus Harding** = Harding
- Stephanus de Thiers**, St., founder of the Order
of Grandmont in 1076 斯特凡努斯 116.2a
- stercoranismus**, an exaggerated version of the
transsubstantiation theory, 10th century 粪土
论 90.5
- Strasbourg**, [Strassburg], Argentoratum, town
in the border area between Germany and
France, diocese possibly of Roman origin 斯
特拉斯堡 79.1
- Sturm**, Abbot of Fulda at Bonifatius' time 施图
尔姆 80.2
- subdiaconus**, [Subdiakon, subdeacon], one of
the minor orders 五品 104.1
- subunisti**, name of the Catholics in Bohemia
after the Hussite Wars 合一派 148.6
- successio apostolica** = apostolica successio
- Suebia**, [Schwaben], area in S Germany 施瓦

- 比亚 82.6
- Suger**, Abbot and builder at St. Denis, Paris, + 1151 徐格 120.2
- Suitbertus**, [Suitbert], St., missionary in Saxony, ca 700 苏伊特贝特 81.1
- summa**, compendium or encyclopedic work of scholastic authors, for example *Summa Theologiae*, *Summulae logicales*, *Summa Moralis* etc. “大全”, 如《神学大全》等 121.1
- Summenhart, Konrad**, German theologian, + 1502, rector at Tuebingen 苏门哈特 145.4b
- Surgant, Ulrich**, pastor in Basel, author of a book on Homiletics (1503) 苏尔甘特 153.1
- Suso, Henricus**, [Heinrich Seuse], 1295 - 1366, German Dominican, mystic theologian 苏索 146.3
- Sven**, King of the Danes 988 - 1014 斯文 81.2
- Sweden**, mission area since the 10th century 瑞典 81.2,3; 151.3d
- Symeon Metaphrastes**, + ca 1000, most important hagiographer of Byzantium, editor of a collection of legends, *Menologion* 西默盎/西面 91.2
- Symeon**, the “new theologian”, 949 - 1022, Abbot in Constantinople, considered the greatest Greek mystical author 西默盎/西面 91.2
- synodus** = 1) concilium; 2) Sendgericht
- Taboriti**, [Taboriten, Taborites], followers of Jan Hus 塔伯尔派 148.4,5
- Tanchelm**, [Tanchelin], heretic from the Netherlands, ca 1100 - 1151 坦赫林 113.3
- Tankred de Lecce**, Count of Lecce, half - brother of Constance, King of Sicily, Apulia and Capua 1190 - 1194 坦克瑞德 107.8
- Tarasius**,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ca 787 塔拉修斯 92.2
- Tauler, Johannes**, 1300 - 1361, German Dominican, influential mystic theologian 陶勒尔 146.3,4
- taxatio**, [paepstliches Steuerwesen, papal taxation system], the system was elaborated in the 14th century 教廷税制 110.2f; 140 *
- Tegernsee**, monastery in Germany 特格尔恩湖 98.6
- Tempier, Stephanus**, Bishop of Paris, condemned more than 200 Aristotelian tenets in 1270 and 1277, marking the turn to a critical reception of Aristotelian tenets 坦皮耶 135.1
- Templarii**, [Templerorden, Templars, Milites templi], knight congregation, founded in 1119 in Jerusalem; soon they became quite rich, especially in France. They were unjustly accused and dissolved in the early 14th century due to the reckless greed of the French King Philip IV (1285 - 1314). 圣殿骑士团 109.1; 118.3 *; 126.4; 138.3 *; 151.1
- terminismus, terministae**, [nominalismus], the nominalism of the Late Middle Ag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Occam) was called terminism, conceptism, or “via moderna” 唯名论 145.3,4
- tertiarii**, [Tertiari, Third Order], lay people who are associated with an order, especially with the Franciscans 第三会 128.2 *; 129.2; 130.1
- Tetragamiae controversia**, [Tetragamie - Streit], the controversy triggered by the fourth marriage of Emperor Leo VI in 906 四次婚姻争论 93.4
- Thaddaeus de Suessa**, a judge who defended

- Frederick II in 1245 达德乌斯 124.5
- Thangmarus**, [Thangmar], teacher at Hildesheim, + ca. 1022 汤马尔 89.6
- Thecla**, abbess in Ochsenfurt, ca 750 特克拉 80.2
- theatrum** = mysteria
- theocratia**, [Theokratie, theocracy], the theory that all power should be subjected to God or a religious leadership; one example might be the *Dictatus Papae* of Gregory VII 神权政治 111
- Theodo**, duke of Bavaria, went to Rome in 715 特欧斗 79.2
- Theodora**, Empress in Eastern Rome 842 - 863, ended iconoclasm in 843 狄奥多拉 92.4
- Theodora**, wife of Theophylactus, "Senatrix", mother of Theodora the Younger, influenced papal policy in the time from 910 - 930 狄奥多拉 88.2
- Theodoricus**, Antipope 1100 - 1102 特欧多瑞克 105
- Theodoricus de Vriberg** = Dietrich
- Theodorus II**, Pope 897 特欧多儒斯 87
- Theodorus**, [Gr: Theodoros], Greek monk who was sent to England and becam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669 - 690; he cultivated studies in England 特奥多尔 89.2; 99.2
- Theodorus**, Monk in St. Gallen ca. 750 特奥多尔 79.1
- Theodorus**, [Gr: Theodoros], + 826, Abbot of Studios Monastery (Constantinople), courageous opponent of iconoclasm 特奥多尔 91.2; 92.4 *
- Theodulfus**, Gothic poet from Spain, + 821; later Bishop of Orleans, scholar at Charlemagne's court 特欧多夫 89.3; 90.2; 92.3
- Theophanu**, Byzantine princess, wife of Otto II, crowned Empress in 972 狄奥法努 88.5,6
- Theophilus**, Emperor in Byzanz 829 - 842, iconoclast 特欧菲卢斯 92.4
- Theophylactus**, consul and leader in Rome 900 - 924, protector of Sergius III and other popes, husband of Theodora, father of Marozia and Theodora the Younger 狄奥菲拉克图斯 88.2
- Theophylactus** = Benedictus VIII
- Theophylactus**, Archbishop of Achrida in 1078, exegete 狄奥菲拉克图斯 91.2
- Thietgaud**, Archbishop of Trier, deposed by Pope Nicolaus ca in 862 提特高德 87.3
- Thietmar**, Bishop of Merseburg, historian, + 1018 提德马尔 89.6
- Thomas**, name of one apostle 托马斯/多默/多马/道茂
- Thomas de Aquino**, St. , [Thomas Aquinas], Italian Dominican, 1225 - 1274, most outstanding theologian of the Middle Ages, born in Italy, educated partly in Cologne, taught in Paris, author of many works, esp. *Summa Theologiae* (partly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in the 1650s), creatively combined Aristotelian thought and theology 托马斯/多默/多马 91.2; 110.2b; 122.1; 132.3; 133.1,4; 134.2; 135.1,2c *; 137.3,4; 145.2,4b; 146.1,2; 158.2
- Thomas de Bradwardin** = Bradwardin
- Thomas de Celano**, biographer of St. Francis, 1190 - 1260 托马斯·杰拉诺 129.2
- Thomas de Chantimpre**, [= Cantimpre], Dominican hagiographer, + ca 1270 托马斯 133.6
- Thomas a Kempis**, [Thomas Hemerken von

- Kempen], Augustinian at Zwolle, 1380 - 1471, author and copyist of theological literature, author (or compiler) of the *Imitatio Christi / Imitation of Christ* (ca 1420) 托马斯/多默/多马 146.5 * ; 151.3a
- Thomas Netter (Waldensis)**, Carmelite theologian, + 1431, the most outstanding opponent of Wycliffe's theories 托马斯 147.2
- Thomas de Strasbourg**, Augustinian monk, theologian, + 1357; after 1345 general of the Augustinian order 托马斯 145.4b
- Thomas de Vio (Cajetanus)**, [Thomas of Gaeta], Italian Dominican, Cardinal, 1469 - 1534, outstanding Thomist, exegete, author of works on social ethics and economy; since 1508 general of the Dominican order 托马斯 145.4b
- Thuringia**, [Thuringen], area in Germany 图林根 79.3
- Thuringii**, the Thuringians, a Germanic tribe, 图林根人 79.3; 80.2,3
- Tiara**, special crown ("helmet") of the Pope 教宗冠/教皇三重冠 110.2a
- Tithe** = decuma
- Tiziano**, [Titian], Venetian painter, 1477 - 1576 提香 154.3b
- Tolomei, Bernhardus**, Italian monastic reformer from Siena, + 1348, founder of the Order of Our Lady of Mount Oliveto (= Olivetans) 托罗梅 151.3b
- Tolomeo de Lucca**, Italian historian, + 1326 托罗梅 125.2
- Torquemada, Thomas**, Spanish Dominican, in charge of the inquisition in Spain from 1483 - 1498 托尔克马达 150.3
- tortura**, [Folter, torture], means of forcing confessions at court, used in ancient Rome, prohibited by Nicolaus I in 866, re-admitted by Innocens IV in 1252 拷打, 虐待 132.2; 158.2
- Tostatus, Alphonsus**, [Alfonso], Spanish Bishop, + 1455, Bible expert, professor at Salamanca 托斯塔图斯 145.5
- transsubstantiatio**, the theory of transsubstantiation, which means that the bread and wine turn into the true Body and Blood of Christ at Holy Eucharist 体变说 119.2
- Traversari, Ambrogio**, [Ambrosius], General of the Camadoleses, theologian achieving union at the Council of Ferrara - Florence in 1439 特拉维撒里 144.1; 155.1
- Trento**, [Trient], ecumenical council of Trient (= Tridentinum), 1545 - 1563 特伦托(大公会议) 128.2; 145.4c; 157.6
- Treuga Dei**, [Gottesfriede, Peace of God], a peace movement since the 11th century, inspired by the Church, which tried to forbid fighting on Sundays and during the main religious seasons and feasts (or at crusades) 神的和平/上主的和平 101.3; 102.2; 109.1
- Tridentinum** < Trento
- Trier**, town in Germany; the Archbishop of Trier was one of the electors of the Emperor in the Middle Ages 特里尔
- Trinitarii** = Ordo Sanctissimae Trinitatis de redemptione captivorum
- Tritheismus**, the theory that there are three gods 三神论 121.5
- Trithemius, Johannes**, German humanist, + 1516 蒂特米乌斯 155.2
- trivium**, [Trivium], the study of grammar, rhetoric and logic; together with the quadrivium, the trivium formed the "septem

- artes liberales”, see: quadrivium 三学/三个学科 89.1
- Trosly**, synod at Trosly of 909 特若斯里 88.1; 101.1
- Trudpert**, St., hermit in Germany (Breisgau), + 643 特儒德贝特 79.1
- Tuebingen**, university of Tuebingen, place of nominalist (G. Biel) and realist (J. Heynlin) professors in the 15th century 图宾根 145.4ab
- Tuscia**, [Toscana, Toskana], area in Italy 托斯卡纳
- Tusculani**, Roman clan, influenced papal policies 1012 - 1050 托斯库拉尼 88.7; 107.3
- Ubertinus de Casale**, Franciscan writer, + ca 1328, critical of Boniface VIII 乌贝提努斯 131.1
- Ugolino de Ostia** = Gregorius IX
- Ukraina**, area in the South of Russia, first Russian settlers arrived ca in 862 乌克兰 83.4
- Ulricus**, [Ulrich], St., Bishop of Augsburg, who defended the city against the Hungarians ca 855 乌尔里克 82.6; 88.3; 100.3
- Ulricus Engelberti**, [Ulrich], Dominican scholar, student of Albertus Magnus, + 1277 乌尔里克 135.2b
- Ultramontani**, term for French bishops who were inclined to nationalism in the 14th century 越山主义, “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 141.2
- Unam Sanctam**, Bull by Boniface VIII, 1302, emphasizing ecclesiastical power《唯一至圣(教会)》111.2; 137.3 * ; 138.2
- universalia**, [Universalien, universals], controversy of universals, the debate about the reality of universal ideas, which divided medieval philosophers into nominalists and realists 共相之争 121.2, 5 * ; 145.2
- universitas**, [Universitaet, university], emerged from monastery schools, cathedral schools in the 13th century, were import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ological thought 大学 134 * ; 145.1
- Uppsala**, [Upsala], archdiocese of Sweden, established in 1164 乌普萨拉 81.3
- Urbanus II**, Pope 1088 - 1099, from France, originally Cardinal Odo of Ostia, former abbot of Cluny, continued the reforms of Gregory VII 乌尔巴努斯 100.2; 104.1; 105.1 - 4 * ; 109.1; 116.1; 119.4
- Urbanus III**, Pope 1185 - 1187 乌尔巴努斯 107.6,7
- Urbanus IV**, Pope 1261 - 1264, of French descent, former Patriarch of Jerusalem, he nominated 6 French cardinals and offered the crown of Naples and Sicily to Charles de Anjou, thus influenced future papal policy 乌尔巴努斯 119.3; 124.7 * ; 133.4
- Urbanus V**, Bl. Pope 1362 - 1370, tried to move the Curia from Avignon back to Rome 乌尔巴努斯 139.6; 147.1
- Urbanus VI**, Pope 1378 - 1389, orig. Bishop Prignano from Naples, was elected and properly installed in Rome, but the French cardinals withdrew later from him, thus causing a schism 乌尔巴努斯 141.1 * ; 147.2; 152.2
- Usuardus**, monk at St. Germain (near Paris), author of a martyrology 乌苏阿德 100.3
- usura**, [Zinsen, usury, interest], since antiquity Christians and especially clergymen were not allowed to charge interests, Jews were excepted from this prohibition, and for

- this reason they often became money lenders
利息/利润/高利贷 102.2; 150.1
- Utraquisti**, Christians who wanted to receive
Christ in bread and win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movement of Jan Hus 体血并领派 148.4-6
- Utrecht**, town and diocese in the Netherlands;
Willibrord was the first Archbishop of Utrecht
(695) 乌得勒支 80.1,4
- Valentinus**, Pope in 827 瓦伦提努斯 87
- Valla**, Lorenzo, Italian humanist scholar, 1405
- 1457, doubted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attacked the
secular power of the Pope 瓦拉 85.3; 155.1
*
- Vallombrosa**, **Vallombrosani**, monastery and
congregation founded in 1038 close to
Florence 瓦伦布罗撒 101.4
- Vasari**, **Giorgio**, Italian scholar, 16th century,
he was the first to use the term “Gothic art”
瓦撒瑞 120.2
- Vassilius II**, [**Basilius**, **Wassilij**, **Vasily**],
Great Duke of Moskow 1425 - 1462,
opposed ecumenism after 1439 瓦西里二世
156.2
- Vaticanus**, a hill of Rome, became the seat of
the Pope, especially after 1380 when the
Pope returned from Avignon 梵蒂冈 139.6
- Vaticanus**, **bibliotheca**, Vatican library,
greatly enlarged by some Renaissance Popes
梵蒂冈图书馆 156.1; 157.1
- Veghe**, **Johannes**, German spiritual author,
+ 1504 维格 146.4
- Verdun**, town in NW France 凡尔登 87.1
- Verona**, town in Italy, Synod of 1184 维罗纳
107.6; 114.1,3
- Verrocchio**, **Andrea del**, Italian artist, + 1488
韦罗吉奥 154.2
- Vicelinus**, **St.**, Scholasticus at Bremen, then
missionary in NE Germany, Luebeck,
Neumuenster 1126 - 1154 维切林 108.2,4
- Victor II**, Pope 1055 - 1057 维克托 103.4
- Victor III**, Pope 1086 - 1087 维克托 105.1
- Victor IV**, Pope in 1138 维克托 107.3
- Victor IV**, Antipope 1159 - 1164 维克托 106.3
- Victor**, **St.**, monastery and school in Paris, the
congregation of St. Victor was founded in
1108 by William of Champeaux, see also
Hugo of St. Victor; Richard of St. Victor 维
克托 117.2 * ; 121.4,6 * ; 122.3; 135.
2a; 146.5
- Vienne**, town in southern France, ecumenical
council of Vienne, 1311/1312 维恩 117.3d;
127.5; 135.3; 138.4 * ; 145.5; 158.4
- Vincentius de Beauvais**, + 1264, French
Dominican, author of the greatest
encyclopedia before 1750, educator of King
Louis' sons 文森特 135.3b
- Vincentius Ferrer** 见 Ferrer
- Virgilius**, [**Virgil**], Irish missionary, Bishop of
Salzburg (Austria), + 784 维吉留斯 79.2
- Visconti**, **Philippus Maria**, Count of Milan,
opposed the Pope in the 1430s 维斯孔提
143.1
- Visigothones**, [**Westgoten**, **Visigoths**], the
kingdom of the Visigoths under Roderich was
occupied by Muslim forces in 711 西哥特人 84
- visio beatifica**, [**vision of God**], the blessed
vision of God (after death), conf. the end of
Dante's *Commedia*; there was a controversy
in the 14th century whether the souls of the
just would enjoy the vision of God only after
the last judgment 真福荣观 139.3; 144.1
- visitatio**, [**visitation**], control visit of the
bishop; the bishops had to visit the parishes
of their dioceses 视察 95.3; 140.1

vita apostolica, apostolic life, the way of life of the apostles, emphasizing lack of a stable home, poverty and preaching; this ideal became very influential, particularly in the 12th and 13th centuries, confer Mendicants 宗徒/使徒生活

vita sanctorum = hagiography

Vitalianus, Pope 657 - 672, he sent the monk Theodore to Canterbury and appointed him Archbishop 维塔利阿努斯 89.2

Vittorio da Feltre, Italian humanist and outstanding paedagogue, + 1446 维托瑞欧 155.1

Vogt, vocatus, [overseer], the administrator of a fiefdom or piece of property, often notorious for extracting unjust taxes 管理者 96.2; 158.1

Vladimir, [Wladimir], Russian King 956 - 1015; baptized in 987, he led his people to Christianity 弗拉基米尔 83.4

Vulgata, the Vulgate edition of the Bible, the authoritative Latin Bible translation of the Middle Ages, often copied, re-edited, improved (by adding numbers to each verse etc.), studied 拉丁通俗圣经译本 135.3d; 145.5; 153.2

Walafried Strabo, 808 - 849, Abbot of Reichenau, teacher of Charles the Bald, poet, exeget, author, 瓦拉夫瑞德 89.4; 98.5

Waldemar I, King of Denmark, conquered Ruegen, introduced Christianity there in 1168 瓦尔德马尔 108.2

Waldo, [Petrus Waldes], merchant from Lyon, + ca. 1217; founder of a pious but heretic movement after 1176, failed to get recognition from Alexander III in 1179

(Lateran Synod) 瓦尔多 114

Waldenses, movement founded by Waldo, influential in southern France and northern Italy after 1180 瓦尔多派 114 *; 117.3c; 148.1

Walpurgis, St., nun in Heidenheim, ca 750 瓦尔普格斯 80.2

Wann, Paul, professor of theology in Vienna, famous preacher, +1489 保禄·万 153.1

Welf, Welfh, [Guelph, Welfen], noble family of Bavarian, Frankish origin, fought against the faction of the Hohenstaufen (Ghibellini), see: Guelphi 威尔夫 124.6

Welf V, Duke of Bavaria, married Mathilda of Tuscina in 1089 威尔夫 105.2

Wenceslaus, [Wenzel], son of Charles IV, German King 1378 - 1400 (deposed) 文策老/文西斯劳斯 141.2,3; 148.2,4

Wenceslaus, [Wenzel], St. Duke of Bohemia, +929 文策老/文西斯劳斯 82.3

Wendes, Slavic tribe at the Elbe; crusades against them (1147) without positive results 温德人 82.2; 108

Wenck, Johannes, von Herrenberg, theologian in Heidelberg, doubted the orthodoxy of Nicolaus Cusanus 温克 145.4c

Wenilo, Bishop of Sens, ca 850 维尼罗 90.4

Wenzel = Wenceslaus

Weser, river in N Germany 威悉河

Wessel Gansfort = Gansfort

Westgoten = Visigothones

Westphalia, district in Germany 威斯特法伦

Wibert, Archbishop of Ravenna, made antipope (Clement III) in 1080 维贝尔特 104.5

Wiclif = Wycliff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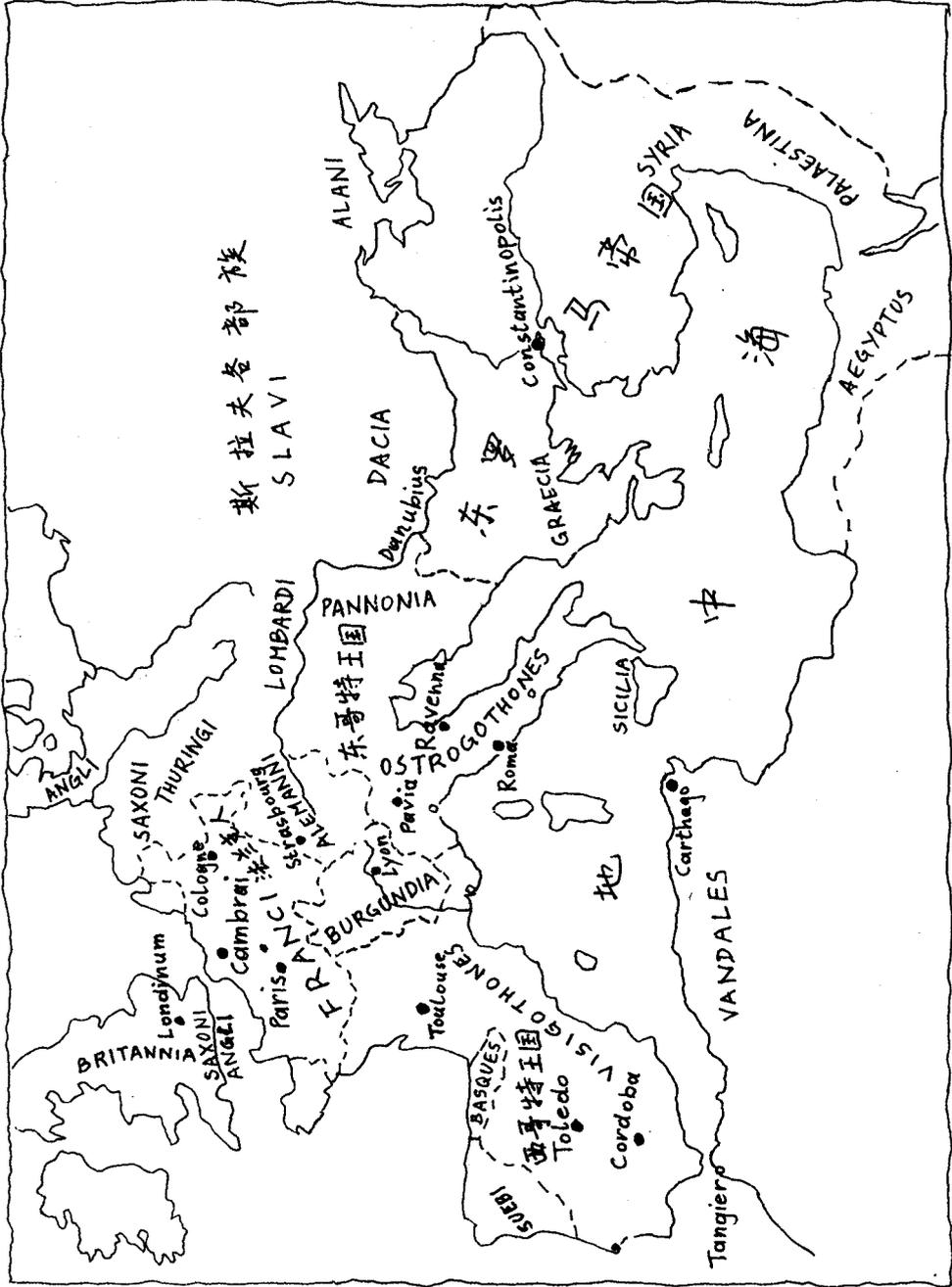
Wido = Guido

Widukind, [= Wittekind], leader of the Saxons in 782, he rejected Christianity 维德

- 金特 81.1
- Widukind**, historian in Corvey (Germany), + ca 973 维德金特 89.5
- Wigbertus**, [Wigbert], abbot of the monastery of Fritslar, ca 725 维格贝尔图斯 80.2
- Wilfrith**, [Wilfrid, Wilfried], Bishop of York, expelled from England in 678/79 威尔弗利得 80.1
- Wilhelmus** = Wilhelm = William = Guillaume
- Wilhelmus**, [William], King of Holland, proclaimed German King 1247 - 1256 but without influence 威廉 124.6
- Wilhelmus I**, [William the Conqueror], King of England 1066 - 1087; in the battle of Hastings 1066 he defeated the last Anglo - Saxon King Harald II and established the rule of the Normans in Britain; he supported the Church reforms directed by Archbishop Lanfrank 威廉 89.6; 105.4 *; 107.5; 111.2
- Wilhelmus II Rufus**, [William the Red], King of England 1087 - 1100, he persecuted Anselm of Canterbury in 1097 威廉 105.4
- Wilhelmus I**, [William], King of Naples - Sicily 1154 - 1166, son of Roger II, 威廉 107.2,4
- Wilhelmus II**, [William], King of Sicily 1166 - 1189 威廉 107.7,8
- Wilhelmus de Aquitania**, [William], Duke of Aquitania, founded Cluny in 910 威廉 101.3
- Wilhelmus**, [William], of St. Amour, opponent of mendicant professors at Paris University after 1252 威廉 134.2
- Wilhelmus de Champeaux**, [Guillaume, William of Champeaux], theologian, 1070 - 1121; exponent of extreme realism, founder of St. Victor in Paris (1108), bishop of Chalons 1113 - 1121 威廉 117.2; 121.4 *
- Wilhelmus Durandus**, [Wilhelm, William], Bishop of Mende, + 1296; liturgical author, 威廉 98.1
- Wilhelmus Durandus**, [Wilhelm, William], William Duranti the Younger, Bishop of Mende who demanded Church reforms in 1312 威廉 108.1; 138.4
- Wilhelmus de Hirsau**, [William], Abbot of Hirsau 1071 - 1091, originally from St. Emmeram in Regensburg, developed the monastery of Hirsau 威廉 105.2; 115.2
- Wilhelmus de Maleval**, [William], St., hermit in Italy, Siena, Maleval, founded the Wilhelmites in 1156 威廉 130.3
- Wilhelmus de Moerbeke**, [William], Dominican translator, + 1286, friend of St. Thomas Aquinas, important translator of Aristotelian and other Greek texts into Latin, later Archbishop of Corinth 威廉 135.1
- Wilhelmus de Occam**, [William of Occam] = Occam
- Wilhelmus de Paris**, [William], heretic, "prophet" of the Amalricans, was executed in 1212 in Paris 威廉 131.2a
- Wilhelmus de Rubruk**, [William Rubroek], Franciscan from Flanders, traveled to the Mongol court in 1253 - 1255 鲁布鲁克 127.4
- Wilhelmus de St. Thierry**, [William], Friend and biographer of St. Bernard, mystical author, + 1149 威廉 122.2
- Wilhelmus de Sarzano**, [William], Italian Franciscan professor who emphasized papal power in the 1330s 威廉 139.2
- Willehad**, St. missionary in Saxony, bishop of Bremen 787 - 789 维利哈德 81.1
- William of Occam** = Occam
- Willibaldus**, Bishop of Eichstaett (Germany) in

- 743 维利巴尔都斯 80.2
- Willibaldus**, priest in Mainz, biographer of St. Boniface, ca 750 维利巴尔都斯 80.2
- Willibrordus**, St. Willibrord, 658 - 739, Anglo - Saxon missionary in Europe, called 'Apostle of Frisia' for his successful activities there, Archbishop of Utrecht in 695 "弗里西亚的宗徒/使徒", 维利波德/威利布罗德 80.1
- Willigis**, Archbishop of Mainz, chancellor of Otto I and II, + 1011 维利格斯 88.3,7
- Wimpfeling, Jacobus**, German humanist scholar, + 1528 温菲林 155.2; 158.5
- Windisch, Vindonissa**, town in Switzerland, diocese founded in Roman times 温迪施 79.1
- Winfrieth** = Winfrid = Bonifatius
- Winterlinger, Friedrich**, German priest, urged reforms in a document of 1433 温特林格尔 158.4
- Wladimir** = Vladimir
- Woitjeh** = Adalbertus
- Wolfgang**, St., 924 - 994, Bishop of Regensburg in 972 沃尔夫冈 82.3,6
- Worms**, town in Germany 沃尔姆斯
- Wormser Konkordat**, [Concordate of Worms, Pactum Calixtinum], an agreement of 1122, regulating the question of lay investiture and formally ending the "Investiture Controversy" 沃尔姆斯协约 96.3; 105.6 * ; 106.1,2
- Wuerzburg**, [Lat: Herbipolis], diocese in Germany, founded in 741 维尔茨堡 79.3; 80.3
- Wunibaldus**, abbot of Heidenheim at Eichstaett, ca 751 翁尼巴尔都斯 80.2
- Wycliffe, John**, [Wiclif], English cleric, teacher at Oxford, 1330 - 1384, he opposed traditional Catholicism and caused much conflict but died peacefully; he promoted English Bible translations, influenced Hus and later reformers. 威克里夫 139.6; 140.3; 141.2; 142.2.4; 145.4b; 147 * ; 148.1 - 3
- Ximenes, Francisco**, Archbishop of Toledo, supported academic institutions; published a polyglot Bible edition in 1514/1520 吉麦内兹 145.5; 158.6 *
- Yaroslav Mudry**, Grand duke of Kiev 1015 - 1054, supporter of Christianity 雅罗斯拉夫 83.4
- York**, Anonymus of, writer of the early 12th century who vigorously opposed papal power in secular matters 约克的无名作者 111.2
- Yves** = Ivo
- Zacharias**, Pope 741 - 752, a Greek from southern Italy, he managed to keep peace with the Langobards; he agreed that Pepin / Pippin should be chosen king of the Franks (751) 扎卡利亚斯/扎迦利 80.3; 85.1 *
- Zamometic**, Dominican, Archbishop of Granea (Saloniki), announced the reopening of the council of Basel in 1482, died in prison 匝莫梅提基 157.1
- Zehnte** = Tithe = Decuma
- Zeitblom, Bartholomaeus**, German carver, artist, + 1520 宰特布伦 154.3c
- Zerbolt, Gerhard**, Dutch mystic, + 1398 泽尔伯特 146.5
- Zins** = usura
- Zizka, Johannes**, one of the leaders in the Husite Wars (1420 - 1431), he died in 1424 西斯卡 148.4
- Zoelibat** = coelibatus

附 图



公元 500 年的欧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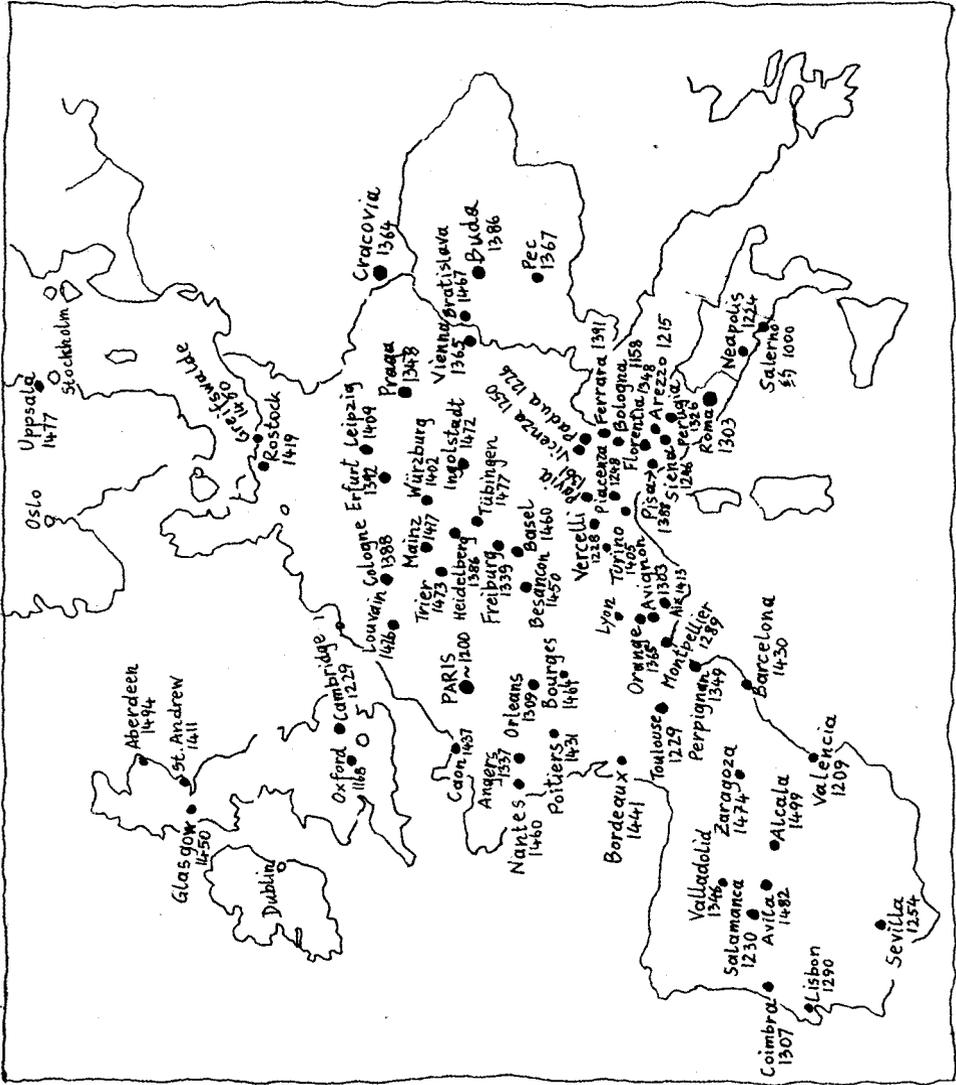
约 900 年的欧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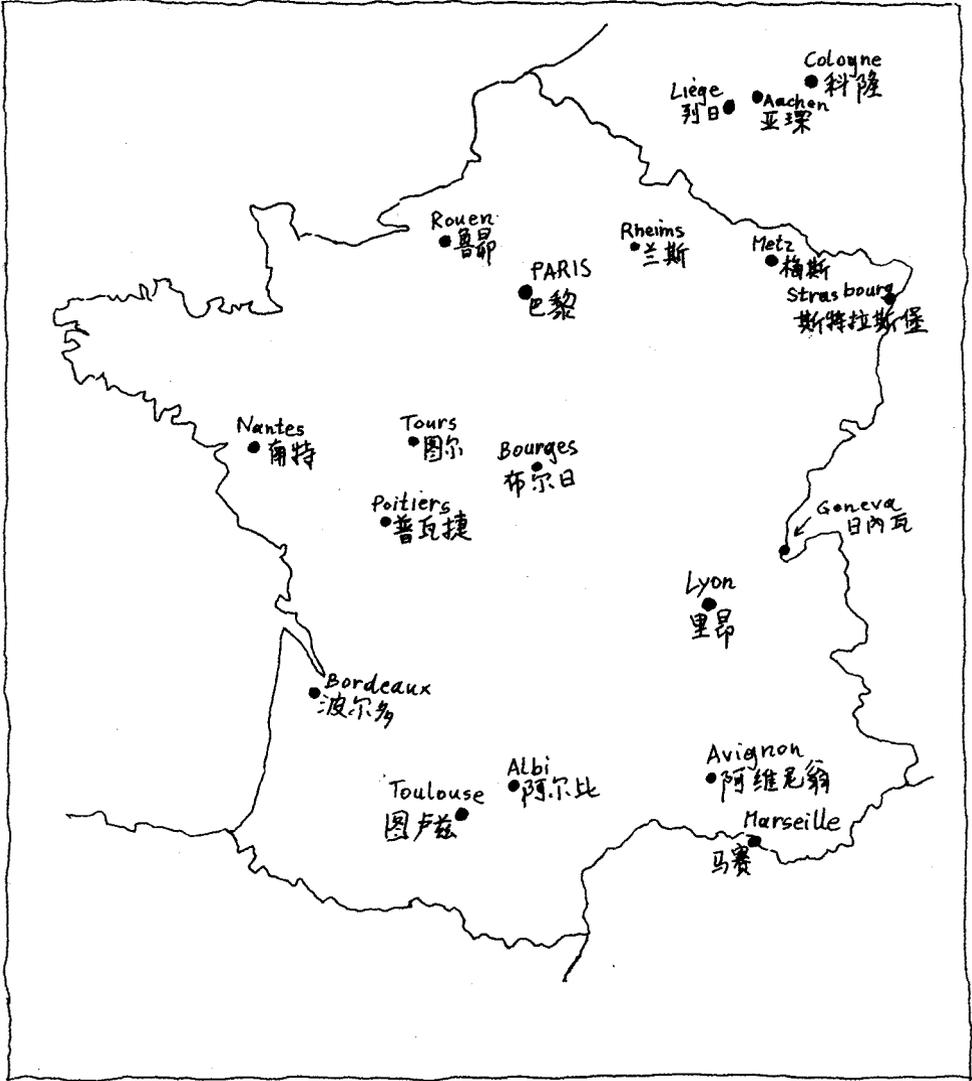
德国和意大利地区的王国、公国与伯国(约 1200 年)



8 到 13 世纪的教会国(意大利中部)



欧洲部分大学的分布和创立年代(13到15世纪)



法国地区重要城市



德国地区重要城市



定价：60.00元